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

朱杰勤 主编

菲律宾华侨史

黄滋生 何思兵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家豪

ISBN 7-5361-0009-4/K·3

统一书号：11343·13

定价：3.70元

144
76131
596

228704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

朱杰勤 主编

菲律宾华侨史

黄滋生 何思兵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28 3, 2, 2

菲 律 宾 华 侨 史

黄滋生 何思兵 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市佛冈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381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 册

ISBN 7-5361-0009-4/K·3

统一书号 11343·13 定价 3.70元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总序

朱杰勤

一

这部东南亚华侨史丛书计划于四年前，中经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分科编写，征求意见，反复修订，定稿付印种种程序，至今天才能与读者相见。趁这套丛书出版的机会，我作为主编，受有关方面的委托，谨将我们编写这部丛书的原因、目的和经过敬告读者。

华侨史的研究和编写很有必要。华侨是中华民族移居海外的一部分，所谓“海外赤子”。我们研究和编写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的本国史，就不能不涉及华侨史，编写中国通史和地方史都包括华侨。最近各省、市和自治区正在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凡有本地人侨居海外者，都特辟华侨一栏以载，以备将来国史的采摘。可见华侨史既是地方志的重要内容，又可备修国史者参考。

华侨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有些因反抗封建王朝，失败后流亡海外；有些饱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而移居异国；有些被西方殖民者欺骗掠夺，威逼利诱，而留在南洋各岛。他们具有刻苦耐劳的体质和坚强不屈的意志，未离开祖国前，已受尽旧社会的歧视和阻挠；出洋时，又历尽旅途风波的险恶；到外国后，又要“披荆斩棘，以启山林”，与疾病和猛兽作斗争，来创造生活条件，

并协助当地居民共同开发资源，建设社会，进行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对侨居地和祖国都作出有益的贡献。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就应加以宣扬，著于史册，传之久远。

华人侨居国的历史或地方志，如果作者毫无偏见，也会提到华侨。因为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数目，而且他们早已和当地人民一同劳动，开拓资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共同创造历史，就应该在历史上占有恰如其分的地位。例如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华族人口约占75%。如果要写一部新加坡史，就不能不提及占人口过半的华人。

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部分，华侨是中外友好关系的媒介和当事人。中国的海外交通、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等都有华侨参加，并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研究中外交通史、中国国际关系史、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史、中国外交史等，都要涉及华侨史。我国制定和执行华侨政策的人们，也必须掌握华侨历史知识和现状。所以华侨史研究是一门符合国家需要，有裨实用的学科，在今天执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尤有现实意义。

海外华人不仅爱乡爱国，同时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侨居海外，一向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协助他们建设社会，甚至彼此通婚，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及至侨居国受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并沦为殖民地前后，华人与当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投入反抗斗争。例如上世纪末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战争和两个世纪之交的抗美战争，多有华人参加。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华侨的爱国思想和行动更为突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得到海外华侨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时，华侨汇款回国充军饷的，仅东南亚地区就达数百万元。回国参加战斗的人也为数不少。自民国成立后，他们又支持各种革命运动，如反英帝的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热

血沸腾，奔走呼号，不少人毁家纾难，捐输物资，并且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不仅出力，而且献身。在祖国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海外华侨渴望祖国富强康乐，纷纷捐献物资，协助社会建设，还有不少人回国服务。他们高度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和具体事迹，值得大书特书。所以我们有华侨史的编纂。

最近有些人认为：自从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海外华侨除一部分保持中国国籍外，其余越来越多地加入当地国籍。在这种情况下，华侨史的研究对象势必大减，华侨史研究恐怕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了。我们认为，只要海外有华侨存在，我们都可以研究。中国移民海外，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了。商周之际，华人从海路移入朝鲜。秦汉之际，华人成批移入日本。唐宋之际，移居海外就更多了。唐代求法印度的玄奘法师，“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包括旅程）。义净在室利佛逝（印尼古国）著书译经，亦居留12年之久。有些中国法师还老死于该地。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谈》卷二曾提到：“北人（华人）过海外，是岁不归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这些十年不归的住蕃华人，当时无华人之名，却有华侨之实。明清之际和近代，移居外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更为众多。如果我们把二千年来的海外华侨作为研究对象，就不愁没有材料可写。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海外华人普遍具有双重国籍，因此，在第二次大战前，“华侨”与“华人”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不须严格分开，即使在第二次大战后或近年来加入外国国籍的人，已不属华侨，但在他们尚未加入外籍时，仍然是华侨的一分子。因此编写华侨史绝对不能把这一大批“昨天的华侨”排除出外。何况一个人口众多的海外华人家庭，其成员有中国籍的，也有外国籍的。他们父母子女同一血统，骨肉情深，不能把一家人拆开，分别对待。我

们写他们的历史时，必须作为整体来叙述。根据中国和西方传统的史传体裁，凡为某人立传，可以附带提及他的子孙后代，亦可上溯他的家世源流。我们为华侨人物立传，也不妨提及他的后裔和家族先辈事迹。

海外华人学者用华族史或华人史来代替华侨史，是根据当地的政治社会等条件来拟定的。我们毫无异议。但由于我国和外国国情不同，在外国认为适当可行的，在我国反而窒碍难通。百年来，中国政府和民间沿用华侨这个名词，没有不便之处，一旦改称，反易使人发生误会。西人把华侨、华人或华族统称为“海外华人”，与华侨这个名词的含义基本相同。日本人至今还用华侨一词，可谓不谋而合。

二

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有四方之志。华人的足迹遍布于全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有华侨的存在。可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观点正确，体例谨严，内容丰富，有独到之处的世界华侨通史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憾事。

1981年，我参加北京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受代表们的委托，写了一份《关于编写华侨史的倡议书》，向大会提出，得到全体代表赞成。大会委托我召集到会的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商讨协作编写世界华侨通史事宜。可惜时间限制，仅集会一次，还未就绪，而大会结束，代表云散，此事遂暂作罢论。这一件事使我感觉到，集体编写全面的庞大的华侨通史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困难。虽然国内有条件执笔的学者大有人在，但他们散处四方，各有工作单位和任务，一时难以集中起来，分工合作。除非在有关领导部门大力支持下，组织一个有代表性的编纂委员会领导起

来，从全国各地抽调人力，给予编写人员以优厚待遇，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在可能范围内，还须争取海外侨胞的参加和外国学术团体的合作。我们相信，在坚强正确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团结合作，在十年内，写出一部能够代表我国这方面学术水平的华侨通史，并非不可能的。

为着编写世界华侨通史准备条件，最好先多写一些国别华侨史，待五洲各国华侨史都写成出版后，我们进而编写庞大的世界华侨史就有比较牢固的基础。英国人珀塞尔先写了一部《马来亚华人》（1947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再写出一部《东南亚华人》（1951年），他就省力得多。这是循序渐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点到面的办法。

1981年华侨史学会在北京成立时，廖承志同志到会讲话，希望我们尽快地写出美国华侨史和东南亚华侨史。可谓真知灼见，知所先务了。自中美复交后，双方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日有发展。这是与美国华侨或华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与美国讲信修睦，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于美国华侨的历史和现状，都希望有所了解。故有编写美国华侨史的建议。又早在二千年前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已建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华人移入东南亚各国为时最早，为数最多。中国与越南和缅甸领土相接，唇齿相依，关系更为密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中西交通的要冲，在亚太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同属第三世界，亦有互相了解，团结合作的必要。我们也很想知道东南亚华侨历史和现状。廖承志同志希望我们赶快写出东南亚华侨史是有深意的。

由于对华侨史的重视，这几年来，各省和地区的华侨历史学会纷纷成立，有关华侨史的书刊的出版也逐年成倍增多。1982年，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历史学会共同委托我负责主持东南

亚华侨史的编写工作。

三

我们的编写计划得到领导上的支持后，就从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华侨研究所华侨史研究室和东南亚研究所吸收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員参加编写工作。他们多数已具有20年以上的教学和科研经验，也懂得一门以上的外语（包括东南亚语种）。我们根据各人的专长和志愿，请他们分别担任撰写与本人专业对口的东南亚各国华侨史共六种，即越南、柬埔寨、老挝华侨史，缅甸华侨史，泰国华侨史，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菲律宾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每种约15—35万字。1986年全部完成，定名为东南亚华侨史丛书，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

这部丛书的公开出版在国内还算是一种尝试。但大轱椎轮，难免简陋，后来居上，理所当然。丛书的作者认识到华侨史的撰述和出版，是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华侨史工作者是一项不能旁贷的任务。他们于是惨淡经营，按时完稿，出版问世，以就正于专家学者，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同时为华侨史研究提供木屑竹头之用。

我与丛书的作者长期共事，关系亦深，互相了解，合作无间。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曾多次集会，共同讨论丛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问题，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启发，集思广益，结果往往形成一种合理的意见和可行的措施。我作为一个主编人，唯有小心翼翼，进行丛书的修订和定稿的工作而已。

丛书不设总的体例。各国华侨史的体例由作者自定。只有这样，一方面，可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主攻方

向并不一致，而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背景又各不相同，各国华人社会的历史发展，虽有一般规律可循，但仍有特殊之处，不能一概而论，还是由作者自定体例为宜。关于华侨史时期的划分亦同样由作者自己掌握。作者可以根据历史事实，由古到今，顺序论述。一般要求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东南亚各国独立自主时期为止。至于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华人社会性质的变化，华人处境及其前途，可由作者作简括适当的说明，或另作专书来论述。我们要求作者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华侨历史情况，还要从我国对外的方针政策出发，既尊重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又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不偏不激，立论得宜。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请我任这部丛书的主编，并负责审定全部书稿。我在反复审阅和润饰书稿过程中，虽然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也从中吸取了很多专业知识，得到较大的好处，特别是这部丛书的出版，实现了我晚年的宿愿而有以自慰。我应该向作者和出版社表示感谢。

这部丛书从草创到出版过程中，都获得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华侨研究所、广东中山图书馆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等都向我们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和有益的意见。广东省把它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补助我们一笔科研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热心文化事业，重视侨务工作，不计成败利钝，慨然承担这套丛书的出版任务，使它今天能与读者相见。如果没有上述机构的热情支持和协助，我们的工作必不能顺利开展，更谈不上“三年有成”了。我们于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昔曹植（子建）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由于我和作者的学识和经验还浅，参考资料不足，调查研究工作又做得不

够，这部东南亚华侨史丛书一定有很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海外侨胞们批评指正。我们还希望这部丛书出版后，能有更多更好的同类著作出现，既可以满足读者对华侨史更高的要求，又可以尝到“倒啖蔗渐入佳境”的滋味。谨序。

前 言

华人移居海外，是在我国同海外有了交通往来，建立一定的贸易关系之后。我国同东南亚国家的交通，首先是同那些与我国海岸直接或间接相连的国家，然后才同那些与我国有海洋相隔的国家发展起来。由于海洋的分隔，中菲间的直接交通、通商，要晚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直至唐代，我国与菲律宾的贸易，还主要通过阿拉伯人进行；直至982年，在我国史籍中，才首次出现有关中菲直接贸易的文字记载。据此，菲律宾之有中国移民，即华侨，当不早于唐代。

由于生产事业的落后，商业的不发展，早期的菲律宾还未具备大量容纳中国移民的条件。直至16世纪70年代以前，在菲华侨仍很少，也没有建立永久性居留地，华侨对当地社会生活未能产生重要影响。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改变了中菲贸易的性质和项目构成。以前，中菲贸易纯粹是双边贸易，华商运菲商品，多是当地所需的用器、布匹及装饰品等，易回的是少量的黄蜡、苏木、玳瑁、吉贝（木棉）花之类，规模有限。此后，随着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的出现和发展，马尼拉大量需要中国商品，作为对西属美洲转口贸易的主要货源。华商将大量丝绸、丝束、各种精美织物、陶瓷及各种各式日用品、奢侈品运销菲律宾。而“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指西班牙）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①。国内崇尚白银，而“西洋

^①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

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①于是，中菲贸易大有发展，到菲中国商船，由1572年的8艘，直线上升至16世纪末年的每年30—40艘。大量白银由此流入中国。仅16世纪80年代，每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即达30—50多万比索；至90年代达100万以上^②。这就形成了中菲贸易中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这样特有的贸易现象。

随着中菲贸易的发展，中国沿海的各行业工匠和破产农民，为菲律宾的富饶所吸引，纷纷附商船至菲谋生。西班牙殖民者也需要他们，以供其役使，于1585和1590年两次到闽粤招工^③。

“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致我沿海之“民争趋之”^④。这样，移居马尼拉的华侨，1571年还只有150人，至1588年即超过1万人，1603年更达3万人。后来，西班牙殖民当局以华侨人数过多，会危及其安全为借口，一再把华侨人数限为6000，并在1603、1639、1662、1686和1762年，先后对华侨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屠杀；1596年和18世纪中期，又对华侨进行几次大规模的驱逐。这些措施，对中国人向菲律宾移民，

①何乔远：《闽书》卷一五〇《南产志上·蕃薯》。

②据成田节男《华侨史》，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纯银，1582年为30万比索，1586年50万比索，1598年100万比索，1602年200万比索，1621年300万比索。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从墨西哥运进菲律宾的银币总额4亿美元，其中流入中国的有1—2亿美元，见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第198—199页。另参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第444页。

③施良：《菲律宾研究》，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33页。

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崇祯十三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

是极其不利的。但因西班牙人需要华侨的服务和商品供应，菲律宾人也需要华侨填补商业空白；而对华侨来说，菲律宾的环境虽然严酷，但仍不失为一个可以谋生的地方，因而，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菲律宾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几千至数万人组成的华侨社会；到西班牙殖民统治垮台前夕，在菲华侨更达10万人。在美国统治时期，由于取消华人入境人数限制，允许华侨商人卷入境，新移民日见增多。至菲律宾独立后，虽然限制以至完全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但由于华侨社会内部的自然繁衍，华侨、华人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目前华人已达100多万，其中华侨约占1%左右。

一千多年来，菲律宾华侨对侨居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经济方面，在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还未从事菲律宾国内商业活动时，是华侨填补了这个空白，维持当地人民生活的正常供应，保证产销渠道的畅通，活跃国内外贸易，对菲律宾商业和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因西班牙人的侵略，致菲律宾北部、中部地区与南部地区相互隔绝的200多年间，由于华侨的艰苦努力，两地区间得以进行起码的物资交流，维持贸易联系，这对后来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华侨出资出力，帮助恢复濒于凋败的农业生产，重建被夷为废墟的大小城市，并配合菲律宾的工业化政策，大量投资，发展工业生产。菲律宾今天在东南亚国家中，成为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重要工业国，华侨在其中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在文化方面，华侨为菲律宾引进中国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如灌溉，施肥，畜力的使用，饲养业和园圃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华侨还向菲律宾人传授各种技术知识，如建筑方面的砖木、木石建筑物的构建；石灰、

砖瓦的烧制方法；陶瓷和家具的制作；冶铁，熬糖，铸造大炮，配制火药，印刷书籍以及制作各种日常用品的工艺技术，等等。华侨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语，在菲律宾语言中有一定影响。菲律宾语言学家E·阿尔森尼奥·曼努埃尔在其著作《泰加洛语中的汉语因素》一书中说：“在现在通用的标准泰加洛词汇中，约有2%大概来源于汉语；随着获得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加充分的便利条件，这一比例必然还要提高”^①。

华侨与菲律宾人民长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互通婚姻，在血统上对菲律宾人有深刻影响。按照人种学家的估计，华人血统构成现在菲律宾人口的10%。奥特雷·贝耶尔教授就此解释道：

“这就是说，今天生活于菲律宾的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祖先的子孙，或属于中国种族类型。”^②菲律宾的学者也公开承认：华侨“与菲律宾人的通婚，对形成更加强健的菲律宾民族，以及对这个国家物质及其人民文化的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这种通婚，在物质上已为这个国家带来财富，而在社会上则已产生了其在公众中的领导作用已变得显而易见的优秀人物。”^③

华侨把菲律宾看成是第二祖国。在反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华侨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不惜献出自己的财富、鲜血以至生命。在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战场上都可以发现华侨的尸体，因为在所有菲律宾起义者同西班牙人作战的场合，华侨都充当起义辅助部队^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人民掀起反

①转引自E·M·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99.

②Ibid., P.95.

③Ibid., P. 119.

④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以下简作BR), Vol. 41, P 86

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反抗美国侵略的独立战争。华侨以财力、物力支持革命政府和起义军。不少华侨青年还参加起义军，在前线与西、美殖民军作战，其中刘亨勋还成为“菲律宾革命的华人将军”。在日本法西斯占领菲律宾期间，作为他国公民，本来无须负担任何直接抗敌责任的华侨，主动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和许多地下抗日组织，与菲律宾军民互相配合，一直坚持抗日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必须指出，华侨的业绩，是在长达几百年中，在屡次遭受殖民主义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驱赶，以及深受其他种种歧视、迫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更显得他们的贡献是多么可贵。

但是，长期以来，华侨却极不公正地成了菲律宾政治上的替罪羊，被加以种种诬蔑不实的罪名。例如说“华侨是菲律宾人的敌人”，“华侨在菲律宾是非和平的”因素，“华侨最善行贿，收买官吏”等等，不一而足。

华侨所受的苦难必须如实记述，他们的贡献必须传扬，对那些加诸他们的种种污蔑，必须根据史实予以澄清和驳斥。

但是，建国30多年来，国内迄未出版过有关菲律宾华侨史的系统、详备的论著；港、台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材料丰富，可作参考，但因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方法，立论方面难免存在种种偏颇。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推进中菲友好关系过程中，广大群众都希望有一部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的菲律宾华侨史出版。为满足群众的要求，我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不付愚陋，负起本书的编写任务。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主要是资料方面的困难。

赴菲华侨都是为了谋生，又受文化水平的限制，故在上一世

纪末以前，他们都未留下文字记述，国内对这方面也缺乏详细、系统的记载。我们对早期菲律宾华侨史，不得不借助于西班牙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又主要限于勃莱尔、罗伯逊编辑的53卷文献集《菲律宾群岛》。这些文献的作者，多是以探险者、传教士、政府官员等身分出现的西班牙殖民主义分子。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观点记述与华侨有关的事情。对此，我们根据不同的文献，尽力恢复和反映历史的真相，并尽量理顺这个时期菲律宾华侨史的发展线索。

20世纪以后，有关菲律宾华侨问题的记载和记述，较前已丰富得多。但就某些问题、某些事件而言，还缺乏细节材料。如30年代以来，菲律宾华侨为支援国内抗日爱国斗争和抗日战争，组织了许多爱国组织和行动，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和英雄人物。这本来可以充实菲律宾华侨史的内容，且是对国人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可惜许多当事者在战争及革命年代未及著述，解放后又来不及写成回忆；而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身历其境的人或已离开人世，或噤若寒蝉；幸而活下来者，则因时间和年事关系，许多身历的具体细节已记忆不清了。但我们还是尽可能请有关人士提供资料。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感谢梁上苑、蔡建华、张光、高天雄、林季良等先生的热情帮助。

作者在编撰本书过程中，对菲律宾地、人名的原有中文音译，深感烦难。因为这些名称多用闽南话音译，使非闽南人根本无法同原文读音对照。这样，在不附原文的情况下，难以查找原文对照。考虑到本书是面向国内读者的，故书中地、人名音译，除少数已通用者外，一律用普通话音译。这种尝试是否得当，欢迎读者提出意见。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资料室、华

侨研究所资料室、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广东中山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等单位，以及加拿大杜张慧婷女士、简国庆先生、澳大利亚黄维正先生、香港叶丽生先生、关慧芬女士、在菲学习的罗林先生等在图书资料方面的热情帮助，一并在内致谢。

本书是在朱杰勤教授指导和热情关怀下撰写的。具体内容，分别由我们两人执笔：何思兵（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撰写第八、九、十章，其余各章由黄滋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撰写。在成书之前，何思兵因出国学习，由黄滋生负责总成全书的工作。

本书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滋生 何思兵

目 录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总序.....朱杰勤	(1)
前 言.....	(1)
第一章 16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菲关系和菲律宾华侨	
.....	(1)
一 远古的移民.....	(1)
二 经济交流.....	(4)
三 政治交往.....	(9)
四 16世纪70年代以前的菲律宾华侨.....	(12)
第二章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和华侨大批赴菲.....	(19)
一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	(19)
二 华侨大批赴菲.....	(21)
第三章 16世纪后期华侨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及潘和五	
事件.....	(30)
一 林凤进袭马尼拉.....	(30)
二 华侨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37)
三 华侨遭受的限制和迫害.....	(48)
四 潘和五等刺杀菲律宾总督.....	(62)
五 菲西当局同中国的交涉和对华侨的报复.....	(66)
第四章 1603年的华侨起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一次	
大屠杀.....	(72)
一 华侨起义的背景.....	(72)
二 华侨起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一次大屠杀.....	(79)
三 大屠杀后菲西当局面临的经济、军事危机.....	(91)

四	中、菲当局关于屠杀案的交涉	(93)
第五章	17世纪初至30年代华侨社会的变化和1639年的 抗暴斗争	(104)
一	旅菲华侨再度激增	(104)
二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限制和掠夺	(115)
三	卡兰巴计划	(124)
四	华侨的抗暴斗争和殖民当局对华侨的第二次大屠杀	(128)
第六章	17世纪中后期华侨的处境和殖民者对华侨的第三 第四次大屠杀	(138)
一	17世纪中叶菲律宾的形势和华侨的处境	(138)
二	郑成功护侨的正义行动	(145)
三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三次大屠杀	(148)
四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四次大屠杀	(157)
第七章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新迫害和17世纪末至18世纪 70年代的华侨社会	(164)
一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新迫害	(164)
二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华侨社会的变化	(173)
三	华侨的反西斗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五次大屠杀	(188)
第八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政策	(199)
一	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转变	(199)
二	菲西当局对华人的移民政策	(202)
三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税收政策	(209)
四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职业及旅行政策	(218)
五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法律歧视	(221)
六	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华宣传	(224)
第九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华侨经济活动的恢复和发展	(229)
一	菲律宾经济状况的变化	(229)

二	华侨经济活动的恢复	(232)
三	华侨与中菲贸易	(234)
四	非欧贸易中的华侨中介商业活动	(242)
五	华侨在菲律宾南部地区的贸易活动	(250)
六	华侨在零售业和其他行业中的活动	(256)
第十章	19世纪的菲律宾华侨社会	(265)
一	19世纪华侨社会概况	(265)
二	华侨社区的组织	(268)
三	清政府在非设领始末	(279)
第十一章	华侨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菲律宾革命战争	(293)
一	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	(293)
二	华侨投身菲律宾革命战争	(295)
第十二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发展	(310)
一	华侨人口的上升	(310)
二	华侨经济力量的增长	(315)
三	华侨团体组织的发展	(339)
四	华文报刊业的发展	(347)
五	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352)
第十三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对排华活动的抗争	(361)
一	菲美当局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和华侨的反限制斗争	(361)
二	“禁米条例”的颁布和华侨的抗争	(375)
三	“簿记法”的实施和华侨的抗争	(378)
四	菲化政策的实施和华侨的抗争	(390)
五	1924年的排华风潮	(398)
第十四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的爱国运动	(404)
一	菲律宾华侨与辛亥革命	(405)

二 菲律宾华侨与反帝反袁斗争	(414)
三 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420)
四 菲律宾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	(432)
第十五章 日本占领时期的菲律宾华侨	(447)
一 日本占领菲律宾	(447)
二 日本占领当局对中国外交官和侨领的屠杀迫害	(449)
三 日寇铁蹄下的华侨社会	(455)
四 伪华侨协会的成立及其事敌害侨活动	(463)
五 华侨的抗日斗争	(470)
附 主要参考书(文)目	(484)

第一章

16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菲关系 和菲律宾华侨

一 远古的移民

地质学家的研究证明，在距今1万多年以前，在几十万年的悠长岁月中，由于地球气候的巨大变化，北半球的陆地大部分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海洋水位因而降低，使得不仅现在的菲律宾群岛各岛连成一片，而且，它的北部同中国大陆和台湾仅一水之隔，南部有陆桥同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加里曼丹岛相连。后来，地球气候变暖，冰层解冻，海水上升，陆桥淹没，才分隔成现在的大陆和东南亚各岛群。从远古以来，亚洲大陆的移民，通过陆桥或后来的大陆与岛间、岛与岛间的狭窄水道，源源移居东南亚各岛屿（包括菲律宾群岛），并与当地的原始居民融合，逐渐形成现代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民族。

目前菲律宾各民族，除个别民族，如内格里托人(Negritos)^①，绝大多数属马来人系统。所谓马来人，是在蒙古利亚种的华族原始人南迁过程中，与东南亚的内格里托人、印度尼西亚人

^①又名埃塔人(Aeta)，即我国古籍中所称的“海胆人”。也有人根据其体型特征称之为矮黑人(Pygmy)。他们约在2.5—3万年以前通过陆桥，从亚洲大陆迁到菲律宾及东南亚其他岛屿。

(Indonesians) 混血而产生的新型民族。这些华族原始人南下时,先居于我国东南部(后来形成我国古代所称的百越、百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继续沿海岸线及水路,以舟楫为工具,逐渐向南洋群岛迁徙。其迁徙路线分为两条:大部分沿西线,即经由印度支那而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和菲律宾,他们同印度尼西亚人和内格里托人的混合,在华南时即已开始,而在南迁过程中,混血不断加深;小部分沿东线,即经由台湾而至菲律宾、加里曼丹、爪哇等地,他们同内格里托人、印度尼西亚人的混合,也经历了同样的进程^①。

这些华族原始人在南迁过程中,已经加进新的血液;进入东南亚各岛后,他们已是新型的马来人了。正是由于马来人有着很大比重的华族原始人血统,因此,他们同华南的古民族百越、百濮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直至现代,东南亚各地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在体型、发肤、眼鼻和面型等方面,同华南人是相同的。

菲律宾人同华南古民族的这种关系,还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是华南和菲律宾所发现的新石器,同出一源。菲律宾的历史学家大都赞同贝耶尔的见解,认为菲律宾人的祖先所使用的有段石铤,起源于华南^②。贝耶尔曾断言,这种高级的有段石铤应发生在菲律宾;过渡期的以及原始型的,应在大陆和台湾。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论断。在闽粤赣发现的有段石铤多属原始型和成熟型,江浙有高级型的,台湾多属成熟型和高级型,菲律宾却

①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②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P. 93-94.

全属高级型的^①。有段石锛的传播路线，正是华南人经由台湾迁徙菲律宾的路线。有段石锛就是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改进，由初级发展为高级的。

其次是民俗相同，例如新娘子坐花轿，未婚妇女集居少女房，喜庆时打铜鼓敲铜锣，妇女以背带背负婴儿，老人自备寿衣寿板，瓮葬等等。

再其次，我国的梯田文化，在古代菲律宾有高度的发展。菲律宾的梯田文化集中在吕宋的高山省。居住在这个山区的阿帕瑶（Apayao）、伊夫高（Ifugao）、伊朗戈（Ilongot）、本托克（Bontoc）、卡林加（Kalinga）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山峦中开出层层梯田。每层梯田之间以石垒砌，高者达50英尺。梯田引山水灌溉、种植水稻。耕作方式，与我国无异。这些梯田中，以伊夫高族在巴纳韦地区所开辟的规模最大，面积近400平方公里，被称为世界最大工程之一。1940年，菲律宾历史委员会在巴纳韦梯田区立碑作记，碑文说：“伊夫高梯田面积几及400方公里，假若将其田岸相连一起，其长度将超过地球圆周之一半，……此梯田为菲律宾群岛历史中最古者。据史家考察，该梯田乃伊夫高族人费时逾2500年所筑成者。”伊夫高梯田乃世界梯田中之海拔最高、最辽阔及最坚固者；“相信梯田文化乃由南中国或越南移民传至吕宋岛、南日本，而至爪哇及巽他群岛者。……”^②梯田文化源于南中国，这是没有疑问的，它或者沿东线经由赣浙闽台而随华南人传至菲律宾，或者沿西线经由印度支那传至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各岛屿。

①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

②碑文译文见郑玉书：《中菲间历史文物之梗概》，《台湾风物》第十卷第二期（1961年2月）。

由此可见，远在上古时期，中菲两地之间，就存在血统上的交融，并由此而有了生产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中菲关系的起源或开端，甚至能追溯到西班牙的十字架和宝剑赢得对菲律宾土地的控制之前很久很远的史前时代”^①。这一说法是符合上述历史情况的。

二 经济交流

有人根据考证，认为中国人至菲贸易，可以远溯至公元前二千年间，或周秦时代^②。但这种说法，迄未获得文字或文物的证明，纯属推论。且在四五千年前，中菲两地均处于原始时代，生产落后，在本地区内即可交易各自有限的剩余生活资料，无需远渡重洋进行交换。因此，彼此进行路途艰险、遥远的海外贸易，似乎没有必要；当时的造船技术，也难以支持这种贸易，并使之有利可图。

根据菲律宾考古发现，中菲贸易，至迟在晚唐即已开始。近百年来，在菲律宾各地出土大量陶瓷器和陶瓷碎片，在山区民间也发现珍藏的古陶瓷器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产自中国。自晚唐迄清代，各朝代的陶瓷均有发现，但以明清为最多，宋元次之，晚唐最少。属于晚唐的陶瓷器物，在菲律宾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巴坦群岛、巴布扬群岛；北吕宋的伊洛科、邦加斯南；中吕宋的新怡诗夏、庞邦加；马尼拉附近的圣安娜、黎萨、内湖；

①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3.

②参见李永锡：《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压迫的政策与罪行》，
《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明多罗、宿务、保和以及卡加扬苏禄岛、和乐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唐代陶瓷，或者是通过阿拉伯商人转手运到菲律宾的，或者是通过中菲间的直接贸易贩销菲律宾的^①。一些地方除发掘出唐瓷之外，还发现唐钱币，这是唐时中菲间有直接贸易的有力证据。如果中菲贸易是完全由阿拉伯商人垄断的话，唐钱币至少不会流至菲律宾，因为钱币并非商品。中菲间在唐代已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当是没有疑问的。

有关中菲贸易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宋代史籍。《宋史》卷四八九《阇婆传》说，“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载宝货至广州海岸。”^②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中菲贸易的首次记录，此后历代史籍对中菲贸易情况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从宋代起，中菲间同时存在两种形式的贸易。一种是官方的贸易，表现为菲律宾的某些小国遣使来中国“朝贡”，以及中国皇帝对来使的赐授，实即以所贡方物，交换赐授汉物。当然，这种朝贡赐授关系，意义不限于物质上的交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政治上的修好。官方贸易由于并非每年进行；进行这种贸易的地区，又只限于菲律宾某些极小的局部，如一个或几个小国；且所交换的方物、赐授物数量有限，项目又仅限于统治阶级所追求的奢

①参阅陈台民：《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及其他》，J·M·艾迪：《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富斯：《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器》；费·兰达·约卡诺：《中菲贸易关系史上的中国外销瓷》。以上文章均刊载于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1年第1辑。

②在我国史籍中，摩逸亦作麻逸、麻叶、磨叶，是 Mait· 的不同音译。一般认为，摩逸国故地在明多罗岛，但也有人认为是在明多罗岛和南吕宋一带。

侈品，如贡物是带枝、丁香、丁香母、白龙脑、玳瑁、红鹦鹉，甚至还有“昆仑奴”^①，赐授物是冠带、衣服、器币、缙钱、仪仗、鞍马、铠甲、文绮、绒锦、紵丝、纱罗、彩帛、金织裘衣、麒麟衣等，因此，官方贸易除了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外，经济意义不大。古代菲律宾同中国有过官方贸易关系的，在宋代有明达璫东北部的蒲端；在明代有吕宋南部卡马林内斯地区的合猫里、北吕宋的冯嘉施兰（即邦加斯南）、吕宋（今马尼拉一带）、明达璫的古麻刺朗（亦作麻刺国）以及苏禄等国。

中菲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民间贸易。982年的摩逸商船到广州海岸，当是民间贸易。此后，中菲贸易稳步发展。这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据记载，在宋代，我国商人已同菲律宾的麻逸、三屿、蒲里噜、白蒲延^②、苏禄等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白锡、五色琉璃珠、铁针、皂绫、纈绢、伞等，博易当地土产，如黄蜡、吉贝（木棉）、吉贝布、贝纱、真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椰心簟（用椰心草织成的席子）等。中国商人尊重当地的交易习惯，彼此凭信用买卖。如在麻逸，中国“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官场者，其国阘阘（即市场）之所也。登舟与之杂处。酋长日用白伞，故商人必赍以为赠。交易之例，蛮贾丛至，随筏篱（作驳船用竹排）搬取物货而去。初若不可晓，徐辨认搬货之人，亦无遗失。蛮贾乃以其货转入他岛屿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

①我国古代称黑肤色者为昆仑人。史籍也有记载东南亚其他国家献昆仑奴的。昆仑奴当指上述的矮黑人中之为奴者。

②三屿，今卡拉绵、巴拉望、布桑加诸岛；另一说在吕宋岛西南沿岸。蒲里噜，今之波利略岛；另一说“蒲”为“满”之误，满里噜即马尼拉。后一说更合理些。白蒲延，即巴布扬群岛。

得准偿舶商。”在三屿，商舶则“先驻舟中流，鸣鼓以招之，蛮贾争棹小舟，持吉贝、黄蜡、番布（即木棉布）、椰心簟等至与贸易。如议之价未决，必贾豪自至说谕，愧以绢伞、瓷器、藤笼，仍留一二辈为质，然后登岸互市。交易毕，则返其质。停舟不过三四日，又转而之他。”^①

元代及明代前期，中菲贸易情况见于中国史籍者不多，这可能与下列原因有关。一是元明两代，海上贸易由朝廷垄断，构成中菲贸易主要部分的民间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二是元朝时，由于集中全国工匠生产兵器和为少数贵族生产消费品，大批手工业工人沦为工奴，从而大大地损害了手工业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自由经营，使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商业的发展也因之受到极大的打击；三是明代为垄断对外贸易，为防止劳动人民利用出海之便，聚众反抗，而厉行禁海政策。到了嘉靖年间，因倭寇之患日见严重，兼以葡萄牙人及沿海大姓与之勾结，使东南海防日益恶化，海禁进一步加强，甚至发展到罢市舶司，关闭海外贸易大门，连渔民出海捕鱼也遭禁止的地步，使海外贸易更受到严重摧残。

但中菲间的贸易，还是存在的。这首先是以朝贡为形式的官方贸易，时有进行。例如，在明代，特别是在郑和访问菲律宾以后，由于中国声威所及，合猫里、冯嘉施兰、吕宋、古麻刺朗、苏禄等国都时断时续地同明廷保持朝贡贸易。其次，虽然元明两代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但民间贸易以走私的形式，冲破官方的垄断和封锁，一定程度上还继续进行。因为这种贸易是以走私的“非法”方式进行的，故在元明两代未见之于典籍，这是很自然

^①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麻逸国》、《三屿、蒲里噜》，参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的事；等到张燮写成对中外贸易有较多记述的《东西洋考》（刊行于1617年），其时已不属本章论述的范围，且海禁早已在隆庆年间（1567—1572）废止了。明代中菲民间贸易的兴旺，这从早期到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的有限记述中可窥见一二。例如，在我国史籍未见提及的岛屿，如宿务、霍蒙汉、里马沙瓦等都可见到中国商品，更不用说那些历来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地方了。1521年，麦哲伦在霍蒙汉岛看到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沙瓦看到中国的陶罐，在宿务看到中国制造的描花漆碗和丝头巾。他的同伴在一些地方看到中国的瓷盘、铜锣、用金线和丝织成的织物。他们还这样记述了南部群岛土人所使用的铜钱：中间有一个方洞，一面铸有四个中国文字，表示中国皇帝的年号。在宿务岛，他们了解到，这个岛屿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在明达瑙获悉，中国每年都有六或八艘帆船到吕宋从事贸易。1570年5月，西班牙殖民头目米格尔·洛佩斯·列加斯比派马丁·戈第率船队到吕宋岛进行“勘查”、“访问”。在不到一个月中，后者先是在明多罗岛的巴托河面发现两艘华船，又获知在此五西班牙里（*legua*、每里合5572.5米）以外的明多罗城还停有三艘华船；月底他到达马尼拉时，又看见海湾里停泊着四艘中国商船^①。可见，早在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之前，华商同菲主要岛屿间就已存在直接贸易关系。

贸易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系，既有中国商人频繁至菲贸易，当亦有菲律宾商人来华贸易。前述太平兴国七年，摩逸国“载宝货至广州海岸”，可作印证。又，元时，三岛（即三屿）“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至元三十年（1293），平章政事伯颜等曾向忽必烈言及，“此（三岛）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

①BR, Vol. 2, PP. 35, 42, 69, 72; Vol. 3, PP. 73—104;
Vol. 33, PP. 22, 225, 354.

贾者”^①。但总的说来，菲商贾来华贸易，见于中国史籍的着实不多、不细，这可能与他们来华贸易在次数与贸易额方面相对较少、较小有关。

三 政治交往

经济上的交流，导致政治上的交往，中外古今皆然。中菲两国间的国家关系，是从贸易关系发展积累而建立起来的，在这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关系，还带有很大比重的贸易色彩。

中菲间的政治交往，有文字可考者，始自宋代。据《宋史》卷七、卷八及《宋会要辑稿》中的《占城、蒲端》、《历代朝贡》两目所载，11世纪初，明达瑙岛东北部的蒲端国频繁遣使来华。真宗咸平六年（1003）九月，蒲端王其陵遣使李匏罕，副使加弥难来华“贡方物及红鹦鹉”；次年正月，真宗在上元节夜遣蒲端使“观灯、宴饮、仍赐缗钱”。同年五月，其陵再遣李匏罕来贡方物。景德四年（1007）六月，其陵又遣已絮汉等贡玳瑁、龙脑、带枝、丁香、丁香母及方物；真宗则赐冠带、衣服、器币、缗钱及杂彩小旗等。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蒲端国王悉离琶大遐至遣使李于燮进金版镌表，献丁香、白龙脑、玳瑁、红鹦鹉及昆仑奴。当时，真宗正在祭祀汾阴后土，命李于燮至祭祀处朝觐，以示重视。及后，真宗“诏以李于燮为怀化将军”，还按后者之奏，赐予旗帜、铠甲，以满足他“以耀远方”的要求。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蒲端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关系是很密切的。宋时中国与菲律宾的政治交往还仅限于离中国较远的

^①汪大渊：《岛夷志略·三岛》；宋濂：《元史》卷二一〇《三屿》；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五三《岛屿诸国》。

明达璫岛部分地区，离中国较近的吕宋岛反而未见同中国有政治关系，且《宋史》所记往麻逸国、蒲端国的路程，都以占城（越南中部）为起点计程^①。由此可知，当时中菲间的交往，是经由西线进行的，而不是象后来（明代）那样，由福建的港口发航，经巴布扬群岛、巴坦群岛、吕宋西海岸而至菲律宾中、南部各地。

元代史籍，未见有关中菲政治交往的记载。元代统治者对南洋各地（安南、缅甸、占城、爪哇）屡次用兵，未重视发展与南洋各国的政治关系，这可能就是元时中国与菲律宾间缺乏政治联系的原因。但到明初，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对南洋的影响与日俱增，与菲律宾的政治关系也异常密切。明朝建立之初，洪武五年（1372）正月，吕宋遣使来贡；明廷也在永乐三年（1405）十月遣使赉诏，抚谕其国。同年九月，合猫里遣人以方物来贡，赐文绮、裘衣。冯嘉施兰于永乐四年（1406）八月派土酋嘉马银等来朝；永乐六年（1408）七月，该国头目玳瑁、里欲各率其属来朝，贡方物，永乐帝赐二人钞各百锭，文绮六表里，余赐赉有差；永乐八年（1410）十一月，又与吕宋等国入贡。

永乐、宣德年间，明廷曾七遣郑和下西洋，向南洋和西洋各国宣播中国国威，促进了我国与南洋、西洋各国的关系。与菲律宾有关的，是郑和第三次（1409）出访。这次出访，范围广泛，西至东非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竹步，东至淳泥国和菲律宾的三岛国、苏禄国^②。永乐十五年（1417），为配合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的活动，成祖于九月遣太监张谦赉敕往谕菲律宾明达璫

①《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徐松：《宋会要辑稿》册一九七《占城、蒲端》；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二《占城》。

②陆容：《菽园杂记》卷三。

的古麻刺朗国国王斡刺义亦敦奔，并赐之绒锦、纁丝、纱罗^①。经过这些访问，中非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其中尤以苏禄、古麻刺朗为显著。

明初，苏禄与中国的关系盛极一时。据《明史·苏禄传》记载，“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刺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缕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②永乐帝对苏禄国王等礼之颇隆，如封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对他们的同行者亦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有差。三王留北京二十七日，然后辞归，成祖又各赐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帛三百匹、钞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还遣官护送。使团至德州，东王“卒于馆”。成祖闻讣，“不胜哀痛”，遣礼部郎中陈士启祭以文，赐谥恭定，又命有司营葬，为文树碑墓道^③。又命留妻妾谦从十人守墓，令三年丧毕返国，遣使资敕谕其长子都马含^④，册封为苏禄国东王。其后，苏禄国还多次（永乐十八、十九、二十二年，即1420、1421和1424年）派遣“王叔”、“陪臣”、“头目”来华访问；明廷也于洪熙元年（1425）遣千户汪海等90余人，宣德二年（1427）遣千户赵清等41人，先后两次“奉使苏

①《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七，永乐十五年秋九月戊午条。

参阅《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七、《殊域周咨录》卷九和《东西洋考》卷五。三王的关系，据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三王者，东王为尊，西、峒二王副之。”三王治地，东王在苏禄群岛，西王在加里曼丹东北部，峒王可能在巴拉望岛南部。

②祭文及碑文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苏禄》。

③永乐帝的谕敕见《明史·苏禄传》和《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七，永

④乐十五年秋九月乙丑条。

禄等国”^①。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刺朗国王斡刺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访，上表贡方物。成祖命礼部赍之如苏禄国王^②。同月，斡刺义亦敦奔要求成祖：“（斡）虽为国中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之。”成祖以其旧号赐封，授予印诰、冠带、仪仗、鞍马、文绮、纱罗、金织裘衣，赐王妃冠服，陪臣等亦各有赏赐^③。及至第二年四月，斡刺义亦敦奔在归国途中，病率于福建。明廷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赐谥康靖，命有司治坟墓，以王礼葬于闽县，以后每岁一祭；其守墓陪臣及其子孙等，世食官粮。又命其子刺苾嗣王位，率众归国，仍赐之钞币^④。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拉苾遣头目叭谛吉三等奉金叶表笺来朝，贡方物^⑤。

苏禄三王、古麻刺朗国王先后访问中国，是古代中菲关系史上的盛举。巴都葛叭答刺、斡刺义亦敦奔为促进菲中关系而客逝中国，名垂千古。

四 16世纪70年代以前的菲律宾华侨

由于两国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菲律宾人、中国人彼此在对方国土上侨居、定居的现象也随之发生。

①《明宣宗实录》卷一二，洪熙元年冬十二月己丑条；卷三二，宣德二年冬十月壬戌条。

②《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八，永乐十八年冬十月己乙条。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二〇，永乐十八年冬十月丙辰条。

④《明太宗实录》卷二三〇，永乐十九年夏四月丙辰条；何乔远：《闽书》卷一四六《岛夷志》。

⑤《明仁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十二年冬十月辛亥条。

苏禄东王病逝后，偏妃葛本、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刺及陪臣、国人等十人留守茔墓。“其后子孙依而居焉”^①。其子孙据二王子名首字，分为安、温两姓，“生齿渐烦〔繁〕”，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安姓已传五代；雍正十年（1732），两姓已繁衍193人^②。守斡刺义亦敦奔墓的陪臣，也遗有葛等一二姓。嘉靖中，其族人葛良贵曾为候官诸生^③。

中国人留居菲律宾，当较上述菲律宾人留居中国为早。但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早的上溯至东晋，说“东晋高僧（法显）自天竺归，途经苏洛群岛时，已有华人居聚其间。”^④迟的认为“菲律宾……确有中国移民，自明始。”^⑤前一说失之过早，亦无确实证据。法显归途既未经苏禄，当然谈不上在该处见到“华人居聚其间”；后一说失之过迟，仅以中西史乘有华人移居菲律宾的明确记载，才作方始，未免偏颇。还有一说，是自公元七世纪起，即有华人移居菲律宾。这一说似较合理。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同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的。由于商务方面的需要，往往会使一些商人滞留以致居留海外；由于航海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上海途的艰险，对自然条件（如季风）的依赖，以及遭遇海难等，也会使商人和船员在海外或长期或短期地居留；况且中国沿海的居民，常常是附商船移居异国，以谋生计。当然也有因政治原因流寓海外的，如新王朝建立时，

①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

②《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三；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二六九。

③何乔远：《闽书·岛夷志》。

④郑玉书：《中菲间历史文物之梗概》。

⑤刘继宣、束世徽：《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9页。

旧王朝的遗臣遗民，就有远去海外，以此逃避政治迫害，或以此表示对旧王朝的忠贞的；但主要是与贸易相联系的移民。本章第二节已谈到，至迟在唐代，我国同菲律宾就已存在贸易关系。由此推断，在唐朝时期，或具体说来是晚唐时期，我国就可能有移民在菲律宾。阿利普在《十个世纪的非中关系》一书中说。“中国人之移居菲律宾，由几个浪潮组成，即7世纪的移民，16、17世纪的移民和19世纪的移民。”^①但在唐、宋、元几代以迄于16世纪前期的明代大部分时期，我国史籍中均未见有关菲律宾中国移民的明确记述。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一些史料推知中国移民的存在。

元时，即有中国人流寓加里曼丹岛。据《岛夷志略·浣泥》记载，当时该岛西岸土人“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的作者据此认为“华人之留居者綦众，至得彼土人之欢心”^②。又据《岛夷志略·勾栏山》记载，元初，“军士征闍婆（今爪哇），遭风于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唯存丁（钉）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只。若橈柁、若帆、若篙，靡不具备，飘然长往。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这里所称的勾栏山，就是今天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格兰岛。以上两事，似与菲律宾无关，但应考虑：一、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地，自远古以迄近现代，都是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移民进入菲律宾南部苏禄、巴拉望等地的海上桥梁，因而，加里曼丹的中国移民，是肯定会辗转而至菲律宾南部各群岛的。二、

①Apli,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23.

②见该书第54页。

在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方面，加里曼丹与菲律宾南部岛屿、特别是苏禄群岛、巴拉望等地关系向来密切。苏禄西王治地就在加里曼丹岛东北岸的克莱班坦干山一带^①，移民由此进入苏禄、巴拉望，也是很自然的。

也有关于古代中国移民在菲律宾活动的传说。例如，“相传十四世纪间，有闽人名林旺者，航海到菲，为菲人烈山泽，驱猛兽，教菲人以种种耕稼上之知识，菲人始由游牧时代，渐入农业时代。日用诸物，亦皆自吾国南方输入，因之吾国南方商人，相继偕来。”^②个别人在菲律宾社会发展史上能起这样伟大的作用，是不足信的。但是这个传说反映当时菲律宾有中国移民生活于土人之中的情况当是可信的。传说显然把当时许多在菲律宾农业方面起过作用的华侨，典型化成为一个林旺，或者把这些作用都集中到林旺这个杰出人物身上了；历史传说的逻辑往往如此。

16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已有中国侨民，这已有明确的史料证明；但在此前，仍有某些迹象和史料，使我们据以得出明前期菲律宾有中国侨民的结论。

明朝自洪武至嘉靖时期厉行海禁。但一些商人，因利之所在，继续以走私形式维持同菲律宾的贸易。沿海农民、渔民，因失去谋生手段，也铤而走险，附商船至吕宋等地谋生。私自出海，既属非法，赴国外寻找生路的劳动者，不敢附船归国自不待说，就是商人，也自然有不敢返国而居留当地的了。郑和对菲律宾的访问，促进了中菲间在国家关系、贸易关系方面的迅速发展。这有利于创造一种环境，使中国人乐意前往菲律宾从事贸

①汪大渊著，苏继庾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0页。

②郑民：《菲律宾》，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1—32页。

易，甚至长期定居，与当地通婚。

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三王来华访问，是中非关系史上的创举；这当然是由郑和等访问菲律宾部分地区这一事件所促成的。但是，一个前此还未同中国有过直接交往的国家，竟在一开始就由其全部最高当权人物，率领庞大的访问队伍，来到他们相对陌生的中国，进贡方物，请求并接受封赐，如果对中国当时的典章制度没有详细的了解，没有既熟悉苏禄各方面的情况、又熟悉中国各种情况、且为苏禄王室极其信任的人的筹措和帮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次通好也是难以成行或取得如此满意的结果的。这样的人，不可能是苏禄本地人，而只可能是前此就已居留苏禄的中国流寓者。有两件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样的推断。其一是有关“本头公”在苏禄的史实。关于本头公其人，神奇传说很多，甚至说他是开辟苏禄埠、“感化”当地人的伟人。这当属当地华侨对他的溢美之词，可信程度不大；但由此可见当地华侨对他的敬仰。本头公原名白丕显，大约是1405年或1422年随郑和的宝船之一到苏禄；有人据此说他是郑和的随行人员之一。关于他在苏禄的活动，未见翔实记载。但从他在当地至今享有声望看来，他在苏禄地区似乎起过不小的作用。后来，他死于和乐岛。其墓在和乐镇附近两英里的地方，今天已成为后人景仰之处^①。其二，类似这种史实，在中菲关系史上也确实发生过。1726年，由于华侨陈典策、龚廷彩的协助，苏禄国再次遣使访华，使得已断

①Cesar Adib Majul,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Sultan-ate of Sulu, i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P. 149; Filipino Heritage, Vol. 3, P. 591; 郭公惠：《华侨与苏禄群岛》，《南洋文摘》第9卷第1期；黄竞初：《华侨名人故事录》，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9—40页。

绝多年的两国关系，得以重新接续、发展(事见第七章第二节)。1726年以后，《清高宗实录》就有好几处由华侨、华商领衔，代表苏禄国向明廷贡方物的纪录。

在国外的文献中，也有一些有关这段时期菲律宾有华人移民的实证。

根据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一书(页142—143)所引用的国外资料,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阿拉伯法官麦东氏,乘坐中国海舶,到苏禄群岛中的Simunul (Simonor?)岛,传播伊斯兰教。与他同往的还有不少中国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其中一名叫Mohadum Amin-Allah(又名Sayyid An-Nikab)的回族领袖,后来还成为苏禄的法官。他处事公正,很得民心。及后,他死于苏禄,其墓至今犹在。另一位回族学者,也在苏禄传教,终于塔普尔岛;至今,该岛山中还保存着他的坟墓。

在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前夕,吕宋也有若干华人流寓者;但见于文献的,只有马尼拉的华人。按照列加斯比的叙述,1570年5月,戈第抵达马尼拉时,“在这座城镇中住着40名已婚的中国人和20名日本人”^①。月底,戈第打败马尼拉土王苏里曼,焚毁马尼拉城。许多华人男子在抗击侵略者,保卫马尼拉的斗争中,同菲律宾人并肩战斗;在斗争失败后,他们又随同苏里曼逃往外地,其中一些人的妻子被西班牙殖民者俘虏;若干华人则在这次变故前在西班牙船上访问,随后乘华船跟西班牙船队退往明多罗岛。被俘华人妇女后被送上华船回国^②。翌(1571)年5月,居住在马尼拉的华人又达150人。这个数字,当然包括上一年逃往外地而及后又随苏里曼回马尼拉的华人,但大都是1571年3、4月间

^①BR, Vol. 3, P.101.

^②BR, Vol. 3, PP.101—102.

随船到来的新移民。一位亲眼见到这些华人的西班牙佚名作者写道：这些华人“男女都富有朝气，肤色浅淡。……由于中国所发生的某种事件，这些华人逃出他们的国家，生活在土人之中。他们都把妻室带在身边。……到这里之后，他们都已成为基督教徒。他们都是一些既非常谦逊，又非常朴实的人，穿棉布长袍和丝绸衣服。同西班牙人一样，他们穿宽大的裤子、宽袖衣服和长统袜子。他们又是非常机敏和爱清洁的人。……男男女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但都很好地梳理和束结在头上”^①。这大概是非律宾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对菲律宾华侨所作的首次最详细的文字记述了。

①BR, Vol. 3, PP. 167—168. 考虑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这些华人刚来一两个月，西班牙殖民者也只是在5月才占领马尼拉，还未及开展传教活动，因此，这些华侨都成为基督教徒的说法，是不足信的。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徒，实际上是天主教徒。在有关菲律宾的古文献中，“基督教”一词实即“天主教”，本书循这一习惯。

第二章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和华侨大批赴菲

一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

西班牙人东来，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东方商品——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香料，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陶瓷、丝绸等高档商品。弗尔南·麦哲伦就是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到东方寻找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而开始他的环球航行的。

麦哲伦一行，于1521年4月7日在宿务岛登陆。不久，他被马克坦岛的土著所杀。他的残部继续西航，于1522年9月返抵西班牙。

西班牙于1525年派出远征队，以便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摩鹿加，但以失败而告终。

1542年，西班牙又派出以路易·洛佩斯·比利亚洛沃斯为司令官的远征队，其目标是西方群岛（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群岛的一种叫法）。但这次远征，由于缺粮和受到明达瑙、萨兰加尼岛土著的敌视、袭击，以及受到葡萄牙人的威胁等原因，未能在菲律宾立足。远征队在付出包括司令官在内的大半人员折亡代价之后，于1549年回到西班牙。正是这个远征队把西班牙王子菲利普（即在1556—1598年任国王的菲利普第二）的名字加给这个群岛；菲律宾群岛这个名称一直沿用。

此后，西班牙殖民者视菲律宾为它在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

1559年9月，菲利普第二要墨西哥筹组远征队，再征菲律宾。在这支远征队出发（1564年11月）之前，墨西哥最高法院据西王谕旨，要求他们尽力使当地土著皈依基督教，查明当地物产，弄清返回墨西哥的航路，并授权远征队司令列加斯比：如果你断定哪个地方是非常富饶的，就应该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并应同土著维持“最稳固的友好关系”^①。

列加斯比远征队于第二年（1565）2月13日到达宿务岛，因土著的袭击而无法靠岸。他们又先后转往坦达亚^②和马萨瓜岛^③，但都受到当地人的敌视。4月27日，远征队进攻宿务。宿务国王率人民抗战，但败退山中。6月，列加斯比迫宿务国王签订所谓和平条约，要后者承认西班牙的统治，向西班牙纳贡。宿务成了西班牙殖民者侵略菲律宾的桥头堡。

列加斯比派小分队到附近各岛屿进行活动，搜集有关贸易、物产等情报，勘测海岸、港湾，寻找粮食，尽可能同各岛的达图^④们拉拢关系。1566、1567年，远征队两次从墨西哥获得增援，积极进行扩大侵略和同葡萄牙人对抗的准备。1569年，列加斯比把殖民基地迁至帕奈岛，又先后占领马斯巴特、蒂考、布里亚斯、明多罗、伊林、卢邦诸岛，从而敲开了马尼拉湾的门户，开始觊觎菲律宾最大的港口马尼拉。

1570年5月8日，列加斯比遣戈第对马尼拉进行探查和“亲

①BR, Vol.2, P.63.

②很可能是现在的莱特岛。

③即里马沙瓦岛。

④当时，菲律宾最基层的政治、经济单位是巴朗圭（Barangay），即村社。巴朗圭由30—100个家庭组成，各由达图（Datu），即酋长治理。

善访问”。24日，戈第等进入马尼拉湾，遣使者致书马尼拉土王苏里曼，表示“和平友好”之意，并于27日与苏里曼及另一土王拉亚歃血为盟。但随即以武力迫两土王接受西班牙的统治，向西班牙王纳贡。两土王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28日，戈第进攻马尼拉，放火烧城。苏里曼领导人民奋战，败退巴石河北岸。但戈第也因兵力单薄，缺乏后援，且台风季节将届，恐到时无法与殖民基地联系，不得不率船队返回帕奈。

1571年5月中旬，列加斯比亲率殖民军再攻马尼拉。苏里曼自知独力难以胜敌，便焚毁城寨，退往北方。旋于6月3日带领哈戈奈、马加比比和其他村社的达图们和军队，乘战船向西班牙船队发动猛烈进攻，但再遭失败，苏里曼也壮烈捐躯。

西班牙殖民者乘势进占吕宋和比萨扬其余岛屿。到1576年，除明达瑙、苏禄群岛外，菲律宾其他地方都已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列加斯比在顿多土王拉康杜拉的帮助下，重建马尼拉。他们强迫当地人筑炮台，辟街道，建房舍、修道院、总督府和军营。从此，马尼拉成了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的统治中心。

二 华侨大批赴菲

对于同东方、特别是同中国贸易，西班牙历次探险队和远征队，都是很关心的。如第一章所述，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时，就注意到许多海岛的居民都使用中国制品，打听到一些岛屿同中国有正常贸易关系。1526年，随加西亚·罗爱沙远征队到过菲律宾的安德烈·乌尔达内塔，后来写道：“人们告诉我们，为贸易的目的，每年有两艘帆船从中国来到明达瑙。明达瑙之北是宿务。据土

著人说,它也产金。中国人为了金,每年都来宿务贸易。”^①1527年的阿尔瓦罗·萨阿维德拉远征队,也有关于“人们从中国到这里,在这些岛屿之间从事贸易”^②的记载。比利亚洛沃斯远征队在明达瑙岛看到一些与西班牙形制不同的中国瓷器和铜铃,这些东西在土著人的喜庆活动中,是极受推崇的;还有麝香、琥珀、麝猫香、药用苏合香和芳香的树脂香料。这一行西班牙人还从中国商人手上买到这类香料。

列加斯比以前的几次远征,未能实现西班牙人夺取香料群岛的梦想。甚至对菲律宾是否产香料也未弄清楚。这就促使西班牙王敕令组织新的远征队,着其“尽力取得香料”和勘查在西班牙划区内“亦产香料的岛屿”。但列加斯比远征队发现,除了肉桂之外,菲律宾并不产任何香料。在西班牙人占领宿务一个月之后——1565年5月28日,远征队的财务官基多·拉维萨里斯等三人,写了一封信给墨西哥最高法院院长。这封信唯一提到的香料是明达瑙产的肉桂;那是在蒲端向摩洛^③商人购买的。他们郑重其事地把这种香料样品让“圣佩德罗”号带到墨西哥,转送给西班牙国王和上述法院院长。

值得注意的是,该信所开列要求迅速补给的项目中,有“用于中国沿海的大镀金货币一箱”,“用于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纯银硬币和小银条”^④。这说明西班牙人急于同中国进行贸易。

但是,以前一直同宿务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商人,在宿务被西

①BR, Vol.2, P.35.

②BR, Vol.2, P.42.

③“摩洛”(Moro)是西班牙人对菲律宾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统称。从17世纪起,主要用于称呼菲律宾南部岛屿的伊斯兰教居民。

④BR, Vol.2, P.191.

班牙人占领之后，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仍有中国商品运到宿务，那是摩洛哥商人从未被殖民者占领的岛屿转贩来的。在西班牙据有宿务两个月之后，即有七八名吕宋土著商人来到西班牙人的营地，要求准许他们到这里做买卖。他们说，倘西班牙人愿同他们做买卖，他们就从吕宋载大量商品前来。他们闻说西班牙人拥有大量白银和小硬币，因此特地前来了解交易方式。不久，他们就从明多罗岛引来两只商船。船上载有中国的铁器、锡器、瓷器、披巾、柔软的毛织品、波纹绸、香水和其他杂物。我们由此可以推知：中国商人虽不愿到宿务贸易，但同吕宋、明多罗等地商人仍维持正常贸易往来。吕宋等地商人是转贩中国商货到宿务销售的；他们是被西班牙人的白银吸引到宿务的。摩洛哥人显然是用所赚取的白银，交易中国商人的商品，因为白银是后者特别欢迎的交易手段。至于华商突然中断同宿务贸易往来的原因，由上引材料看来，似乎主要是担心人身及商货的安全，也不了解西班牙人做买卖的方式。因此，在16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商人一直未同西班牙人进行商业接触。列加斯比发回西班牙及墨西哥的报告，很清楚地道出这种情况。1567年7月23日，他在给菲利普第二的报告中说：

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年都到〔吕宋和明多罗〕这些地方贸易。他们运来丝绸、毛织品、钟、瓷器、香水、铁器、锡器、彩色棉布和其他小商品，回程则运去黄金和黄蜡。该两岛的居民是摩洛哥人，他们购买中国人和日本人载来的货物，并在群岛各地贩卖。虽然他们有些人到这里贸易，但我们对前往上述地方则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这支力量太小，无法分散到许多地方去^①。

在1569年7月7日给墨西哥总督的报告中，列加斯比则强调：

^①BR, Vol.2, P.238.

目前，肉桂是我们在菲律宾由之能获得收益的唯一商品；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矿藏能够开采之前，黄金的供应将一直是小量的。我想，如果西班牙人移入和定居菲律宾，我们就不仅能够获得大量黄金、珍珠和其他值钱的商品，而且将促进与中国的商务关系，从那里取得丝织品、瓷器、安息香、麝香和其他商品①。

西班牙向菲律宾移民一直效果不大。殖民者虽然不满意同中国只存在间接贸易的状况，但也暂时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在他们为避开葡萄牙人的军事封锁，倾巢迁往帕奈（1569年）后，依然未能吸引华商。他们越来越迫切希望与中国商人建立直接贸易关系。

在征略明多罗和马尼拉过程中，戈第非常注意寻找亲近中国人的机会。但也发生过在明多罗岛袭击中国商船的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570年5月8日，戈第率船队从帕奈出发，于同月中旬航至明多罗，停泊在巴托河上。在听说五西里外有两艘中国商船时，戈第即命胡安·萨尔塞多领船前往侦察和“要求同他们和平友好”。第二天黎明时分，他们已靠近中国商船停泊处。华人“不知道是因为听到西班牙人到来的消息，还是听到火绳枪射击声”，便走上甲板，手执武器，擂鼓吹笛，发射火箭弹和开炮。西班牙人看到这种情况，也不问根由，袭击中国商船。两船共有80名华人，其中20人被击杀，船上所载生丝、丝织物、金丝、麝香、描金瓷碗、棉布、描金茶壶和其他新奇物品等贵重商品，以及甲板上所堆放的陶坛、瓦罐、大瓷瓶、瓷盘子、瓷碗、精瓷壶和铁、铜、钢和向当地购买的小量黄蜡，尽为西班牙人抢夺。戈第闻悉这个消息，虽然很生气，但认为这是接触中国人的大好机会，便火急赶往出事地点，向华商表示歉意，也说及

①BR, Vol. 3, P. 58.

华人的错处。他答应释放生还的中国人，并送他们回国。他又安排修理损坏的中国船只，还要求华人派人前往帕奈。然后，戈第派船载着12名吕宋摩洛人、四名华人，由四名西班牙人护送去帕奈。不言而喻，西班牙人是要华人消除疑惧，说服他们同西班牙人做买卖。出于同样的目的，这支船队中的胡安·萨尔塞多分队，在吕宋南部的巴拉扬海岸登陆，打退当地人的反攻，在进入该镇时，把两名被土人关禁的华商释放了。

西班牙人对上述华商所表现的姿态，很快有了初步的效果。一些华商对西班牙人的疑惧和戒备心理有所消除。当这支西班牙船队驶至马尼拉湾，在四艘华船附近刚停泊下来时，华人立即驾轻舟前来拜见戈第。他们带来白兰地、鸡、米、绸料和价钱不高的零星饰物等作为进见礼，向戈第诉说：马尼拉的摩洛人，强行抢去船上的帆、舵和最好的货物。当时，这位指挥官友好地接待他们，但没有理会他们的怨言。因为戈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怎样实现其对马尼拉的野心，他忙于笼络马尼拉土王苏里曼，所以，暂时还需要装出一副“希望同所有的人和睦相处”的面孔。在西班牙人撕毁同苏里曼达成的友好协议，对马尼拉枪炮相向，导致双方激烈战斗时，他们便“小心保护华船”，还根据戈第的命令把被摩洛人抢走的帆、舵交还中国人，让华船在他们的船队附近停靠，免受炮火的伤害。后来，这支远征队开回帕奈，四艘华船相随。这时，华船上只有一些大陶瓷、瓷器和从菲律宾购买的黄蜡。许多西兵用杂七杂八的不值钱的东西换取船上的黄蜡。据说，这些华人同西班牙成了极好的朋友，前者还给了后者若干安全符（*letters of security*）；那是用白布做的，上面画着一个很大的盾形纹章。这些华商还答应在下一年将到帕奈，同西班牙人进行直接贸易。对于华人要求提供回航所必需的东西，西班牙人一一予以满足，并尽其所能，显示出善待华人的样子。然后，这四艘

华船离开西班牙船队，迳往明多罗。在这次马尼拉战役中，西班牙人俘虏了80多人，其中有若干华人妇女。这些妇女的丈夫都已随马尼拉土著逃走。按西班牙人的规矩，本应将她们变成奴隶；但戈第却一本吸引华人的主旨，将她们交给上述华船遣送回国。对另一名患精神病的华人妇女，也按其意愿，让她随西班牙船队前往帕奈，以候将来再行返国。

西班牙人多年来追求直接同中国贸易的努力，首次获得中国商人明确响应。1571年5月，在列加斯比由帕奈出发征略马尼拉时，这个重要港口已住有150名华人。他们大多数是新来者。他们从同戈第等有过接触以后回国的人口中，了解到西班牙人要求同中国贸易的迫切愿望，了解到同新对象贸易的方式，以及西班牙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因而决定离开当时内忧外患、灾战频仍的祖国，附商船前来菲律宾谋生。这些商船、商人中，也肯定包括依上年之约重来者，以及在这些舶商影响和鼓励下随之而来的其他商人、商船。西班牙人同华商之间的贸易，在这一年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同中国有大量的贸易”^①。新总督拉维萨里斯于1573年6月29日报告西班牙国王，说许多中国商船到吕宋岛的各个港口贸易。这个报告是1573年来船季节结束时写的，故所指当是当年的贸易情况。他颇为心满意足地写道：

在我们在这个岛屿所度过的两年中，中国人每年都以更多的人数、更多的船只到来，并且比通常来得更早。对同他们的贸易，我们是感到有把握的^②。

当时的文献没有记录来菲华人人数，只记有来船数。据首席公证官埃尔南多·里克尔写的记述，1572年，有三艘中国商船到

①BR, Vol. 3, P. 172.

②BR, Vol. 3, P. 181.

马尼拉港，另有五艘到邻近岛屿^①；至于到其他港口的商船有多少，则未见记述。由此可知，上述数字是该年最低限度的来船数。

直接贸易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并日见发展、扩大。但西班牙人对此时的中菲贸易，还存在隐忧和不满足之处。

首先，西班牙人认为华商运来的商品不合他们的胃口。1572年，华船运来的商货，仍以适应菲岛土著需要的普通生活用品为大宗，如大陶瓮、普通陶罐、铁器、铜器、锡器等诸如此类的货物；也为土著酋长带来一些绸料子和精瓷器，为西班牙人运来一些精美器皿和其他物品。所以，拉维萨里斯在以满意的口吻向西王报告华船、华人来菲情况之后，又抱怨华商不象对待马六甲那样，把丝绸和漂亮的物品运到菲律宾出售。

其次，对只能用白银同华商做交易，感到忧心忡忡。华商之所以同西班牙人贸易，是因为后者拥有从墨西哥运来的大量白银；西班牙人除了白银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同中国人交易的手段。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不论是墨西哥还是菲律宾，没有一样可出口到中国的东西是中国所没有的。菲律宾出产的布，在中国并不稀罕又不值钱；中国糖产极其丰富；而黄蜡和药材，无论在什么地方，华商都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因此，以重商主义^②为其教条的西班牙人不得不用白银同华商交易。对大量白银流向别的国度，西班牙殖民者，是颇为头痛的。例如，西班牙的墨西哥总督马丁·恩里克斯在1574年1月9日致西班牙王的信中说：

我认为〔同中国贸易〕这整个事情是枉费力气，与其说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倒不如说是一种看来要亏本的生意。……由于

^①BR, Vol. 3, P. 243.

^②有关重商主义的内容，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87页《重商主义》条。

〔我们〕支付这些货款，他们带走黄金和白银，他们对黄金和白银〔的追求〕是那样热切，以致不接受其他东西〔作为交易手段〕，我已获知他们已从菲律宾群岛带走四万余粒卡特的金、银①。

第三，葡萄牙人对中非贸易的干扰。在西班牙人侵略菲律宾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出于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援引1494年6月7日葡西两国签订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规定②，认为菲律宾在葡萄牙划区之内，因而极力阻挠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征略，甚至武力相向。在西班牙确立对菲律宾的统治之后，葡萄牙人在菲律宾周围、在各个方面继续同西班牙人对抗。对中菲贸易，也从中作梗。据拉维萨里斯的上述报告，来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人告诉他们，葡萄牙人要华商不要同他们做买卖，因为他们是强盗，是来盗窃和劫掠的。因而中国人大感窘惑。葡萄牙人这种做法，严重威胁着西班牙的贸易利益。

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中国商品，西班牙人不惜花费手中的白银。在1572年同华商的首次直接交易中，西班牙人以白银交换精美的中国瓷器和其他商品，就使中国商人高兴地答应：在六、七个月后，他们将把非常珍贵的商品大量运来。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对于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问题，只是一种远虑，而不是近忧。因为在直接贸易关系刚建立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人更急切的是获得中国商品，而不是顾及白银的外流。简言之，就是对中国商品的近望，压倒对白银外流的远忧。对于葡萄牙人的干扰，他们既不愿意以同前者和好或开战的方式作彻底的解决，就只能继续用善待华商的办法，以抵销葡萄牙人的谣言；因而，就有

①BR, Vol. 3, P. 226 note 75.

②该条约规定以佛德角群岛以西370西里处为界，界以西已发现或将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领有，以东归葡萄牙领有。

1572年给西班牙人手中的华人奴隶以自由，并遣送回国之举。这些华人奴隶回国后，向自己的同胞传播有关菲律宾的消息，说华人可以安全地到那里并自由地进行贸易。这些措施，有力地促使华商更踊跃赴菲贸易。大约在1573年3—6月间，华商应西班牙人的要求，载运下列中国商品样品至菲律宾，以便商定出售价格：水银、火药；胡椒、优质肉桂、丁香、糖；铁、铜、锡、黄铜器皿；多种丝织品、丝束；雄黄、樟脑；各种陶器；香甜橙；另有一千种其他商品以及许多小玩意。还运来耶稣受难像和非常精致的图章。据1574年7月17日拉维萨里斯给菲利普第二的信，华商由于受到善待，每年都增进他们的商业，所运来的商品，除了上述项目外，还有面粉、坚果，葡萄干、梨、精瓷器以及在菲西班牙人所欠缺的其他琐碎的用品。华人甚至把根块作物的种苗也带来，以便在菲律宾种植。大概在相同的时期内，自中国舶来的还有成批制作精良的青铜炮和各种军需品。来菲船数，据一份可能是写于1575年的文献记载，“每年从中国大陆满载货物到马尼拉城的船只有12或15艘”^①。

随着中菲贸易的重建和扩大，随船赴菲的华侨人数当有增加，可惜未见到1571年以后10多年的有关数字。重建后的中菲贸易与西占前的中菲贸易相比，已起了根本变化，即从过去分散在各岛进行，逐渐发展到集中在马尼拉港进行；商品结构，也从过去以普通生活用品为主，变为以适应西班牙人需要的高级商品、特别以丝织品为主。这些商品，除了小部分由在菲西班牙人和本地的上层消费外，绝大部分成了由西班牙人垄断，有巨利可图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的重要商品，运往西属美洲销售。中菲贸易也因此由双边贸易，逐渐转变为转口贸易。

^①BR, Vol. 3, P. 299.

第三章

16世纪后期华侨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及潘和五事件

一 林凤进袭马尼拉

在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刚刚建立，还有待于巩固和扩大，中菲贸易关系初具规模，尚望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之际，1574年底发生了林凤袭击马尼拉的事件。

明廷实行“禁海”政策，以便垄断海盐和对外贸易之利，防止人民从海上聚众反抗。嘉靖年间，倭寇和葡萄牙人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日见严重，海防日益恶化。明王朝更进一步加强海禁，甚至于罢市舶司，关闭海外贸易的大门，连渔民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沿海部分人民的谋生之路也因之被堵塞，正当的通商活动也受到严重打击。于是，一些失去生计的人便聚众海上，实行武装反抗；一些商人也为着维持正常贸易活动，实行武装“走私”。这样一来，在闽粤两省沿海，就出现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林凤就是一个武装集团的领袖^①。

①当时东南沿海既有这里所说的武装集团，也存在披着倭寇外衣，与倭寇勾结的武装集团。后者由土豪、奸商组成，在东南沿海“世家”、“贵官”、“大姓”支持下，勾结日本商贾，进行损害民族利益的贸易活动，甚至在沿海打家劫舍，肆行掠夺。这里所说的“武装集团”非指后者。下同。

林凤俗名林阿凤^①，广东饶平人，1571—1574年活跃于广东、福建、台湾沿海，屡次攻陷潮（州）、饶、惠（来）等地要镇和碣石。11月，闻闽粤两省将集中水陆主力来攻，凤自知处于劣势，便率船队退到澎湖。

不久，林凤遇到从马尼拉回航的中国商船。该船舵工向林凤介绍菲律宾的特产、财富，以及菲律宾人被一小撮外国人掠夺等情况。还告诉林凤，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全部不超过70人，且都是老残病弱。他们在马尼拉相当麻痹，没有设堡垒，没有作防御准备。

林凤决定突围前往菲律宾，他稍作准备，即亲自率领战船62艘，步卒、水兵各2000人，妇女1500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各业工匠，于1574年11月启程，向马尼拉进发。他们希冀在那里觅到一片乐土，作久居之计。从这方面来说，林凤等去国与一般华侨出国基本一致，都属移民性质^②，只是由于他们的经历和背景，使他们更有组织，对在新的地方组织生活考虑得更为周到，更能发挥群体的力量罢了。

在驶往马尼拉途中，林凤船队在伊洛科附近海岸发现一艘西班牙武装运粮船。在冲突中，运粮船被焚，船上西班牙士兵和水

①在欧美、菲史籍中，往往将林阿凤名字拼作 Limahong, Lima-phong, Li-ma-hong, Li-ma-bong, Li-ma-fang 和 Li-ma-hon. 我国一些译者亦错译为李马红、李马奔、李马芳、利马红。又林凤、林道乾曾随诸良宝（或朱良宝）活动，后诸歿，二林各自独树旗帜，林道乾活动于西洋，林凤活动于东洋。有些史籍（如《明史·吕宋传》）因之将林凤错当林道乾，致有“万历四年，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吕宋〕国”之误。

②参阅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94—95、96、98页。

手全部被消灭。不久，驻在比干的胡安·萨尔塞多看到林凤的船队。他猜想船队的航向是马尼拉，便立即派人乘小舟前往报讯，同时着手在驻军中尽量召集士兵，人数估计有50多人，从陆路驰援马尼拉。

11月29日夜間，林凤船队抵马尼拉湾，停泊于巴塔安半岛南端、马尼拉湾进口处的马里韦莱斯，打算第二天黎明攻城。那天晚上，林凤派出全部小船，载着700人，在日本人庄公率领下起航，30日早上，他们抵达马尼拉南面的帕拉尼亚克。先遣队上岸后，沿着海岸，向北直取马尼拉的总督府及大炮放置处。他们于9—10时之间，未遭任何抵抗，便抵达马尼拉城南的巴贡巴扬。西班牙驻菲军队总指挥戈第的家就在这里。林军本无攻袭戈第住宅的计划，但因遭到戈第妻子的辱骂，这支先遣队便转而对该寓所发动攻击，杀死了戈第及若干人，烧毁房子。

在此之前，林凤的行动，一直未为西班牙殖民者所觉察，因而后者未曾采取任何防卫措施。“大炮被放置在地上，没有架设起来，炮弹在整个兵营里到处散置。”^①这支先遣队将近到达巴贡巴扬时，曾被若干居民和士兵发现，他们跑进城内告警。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警告，人们把这看作是谣传，或者看成有人在开玩笑。如果没有巴贡巴扬的行动，先遣队将毫不费力地直捣殖民者的巢穴。戈第寓所的火焰和烟柱，给了西班牙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消息很快传到总督拉维萨里斯那里。西班牙人马上组织力量进行反扑。

袭击巴贡巴扬之后，先遣队重新集合，试图继续沿海滩前进。但这时，西班牙军官兵已赶到海岸边，以房屋作掩护，面向海滩，用火绳枪向先遣队密集射击。先遣队受此猝然打击，死80

^①BR·Vol·4，P.29.

多人，立即上小船退至卡维特。西班牙人亦被斩死十三四人。

这一仗结束后，拉维萨里斯立即采取备战措施。他逮捕了两名当地酋长，预防土著人民通过他们把粮食供给林凤；动员马尼拉所有的西班牙人以木板、原木、充沙的木箱和大酒桶构筑防御工事；又在马尼拉城沿巴石河直到海滩围起一道道木栅栏，以防林凤循河道攻城。还在一个战略地点架起四门大炮，把西班牙人全部集拢在这个临时筑起的小堡内。萨尔塞多率领的几十名援兵，于12月1日晚间到达，也立即投身修筑工事。

西班牙人这时正面临着更严重的局势。一方面，他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对付林凤进攻；另一方面，菲律宾人民以起义响应林凤的进攻，使他们受到新的威胁。12月1日菲律宾人民起来造反。殖民者杀害两名酋长后，更使人民的愤怒火上加油。在短时间内，马尼拉周围就有1万多人参加起义。连曾充当西班牙鹰犬的拉康杜拉，也一度率众投向起义队伍。起义迅速扩及卡维特地区和明多罗。起义者把马尼拉包围起来。他们到处捕捉西班牙修道士，故意褻渎教堂，甚至在这些神圣场所宰杀牲口。他们发誓要杀死全部殖民者。起义者乘着小船，准备在林凤再来攻城时，随时配合行动。他们推出使者，到卡维特同林凤联系。

12月2日凌晨4时，林凤的船队出现于马尼拉海面。黎明时分，船队全部大炮鸣炮三响，接着降下小船，载着战斗人员，浩浩荡荡地驶向海滩，在巴贡巴扬登陆。林凤也上岸指挥战斗。林凤把1000名战士分成三路：一路经马尼拉主要街道；一路沿海滩，即11月30日的同一进军路线；其余一路沿巴石河畔挺进，准备一举拿下马尼拉城。

林军集中力量从两侧猛攻小堡，但遭到来自河岸和堡内西班牙人的激烈抵抗，致有若干人牺牲。80名林军冲进堡内。由于敌人进行疯狂反扑，80名勇士全部阵亡。鉴于伤亡较大，战斗几近

一天，小堡屡攻不下，林凤不得不下令退回卡维特。他派出小船进入巴石河，佯作增援，借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撤退。土著人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堡垒，使得西班牙人不能阻击撤退中的林军。小堡内的大炮，因架置匆促，炮位不牢，又没有炮手，以致在林军登陆和撤退的关键时刻，无法发挥作用。在这次进攻中，林军遭到重大损失，许多人受伤，牺牲者达200多人。据说庄公也在此役阵亡。

林凤在卡维特停留两天，以便收集并埋葬牺牲者。由于两次进攻均未得手，他放弃图取马尼拉的计划，决定率领余部北上。几天以后，他们到达邦加斯南省的邦加斯南河（现阿格诺河）河口，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他们在离河口四西里处建立新居留点，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堡垒，周围用棕榈树干筑起了一道很高的围栏，以利防御。他们友善地对待土著人；土著人也支持林凤，为他的部众提供各种方便，充分地供应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由是，林凤及其部下安全地在这里住下来。

殖民当局获知林凤在邦加斯南建立居留地，忧心不已。拉维萨里斯认为，此事若不及早制止，日后就难以补救，并终将对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酿成严重的祸害。认为：林凤的土著人“同盟者和附庸遍及整个群岛”，他们支持林凤打败和杀死西班牙人的主张，可能起来反抗殖民者；况且，他们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杀死区区少数的西班牙人。拉维萨里斯立即召集马尼拉附近的所有西班牙人，命令他们集中到城里来；派人传令给比萨扬群岛各村落的庄园主^①，要他们尽可能多地组织船只和人力赶来，以

①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把他们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领地制，即恩康敏达（Encomienda）制度移植到菲律宾。他们把村社合并成行政、经济单位，然后把它作为领地，分配给在侵菲过程中有功的军政人员和教会。领地的领有者就叫做庄园主（Encomiendados or seigniors）。

便征讨林凤。与此同时，拉维萨里斯又驱使当地人重建马尼拉的堡垒。经过一番准备，一支由250个西兵，2500比萨扬人、50艘船只组成的远征队，由萨尔塞多指挥，于1575年3月23日离开这个殖民地首府，30日凌晨抵邦加斯南河口。这时，萨尔塞多已被任命为菲律宾西班牙驻军的总指挥。

林军经过几个月的平静生活，似乎已失去警觉性。他们甚至连哨兵也不设，在河口也没有设瞭望哨。一支由九只小船、大约70人组织成的西军突击队，在当天早上，溯河而上，企图找到林船，将之击沉，以便堵塞河道，截断林军的河上通道。快要接近林军堡垒时，他们与35只正要外出寻找供应品的林船遭遇。林船惊惶失措，掉头便走。西军紧追不舍，并向林船频频射击，使后者几乎全部搁浅。船上林军弃船逃回堡中；船只尽被西军缴获、烧毁。约10时，西军开始进攻。堡垒被攻破，许多男人被杀，100多名妇女儿童被掳。接着，西军放火烧第一堡，并诡称是当地人所为，以便挑拨林凤与土著人的关系。西军在要塞中大肆劫掠。这时，林凤的队伍已开始集结，进行抵抗。这时天色已晚，西军疲惫不堪，兼有五名西兵、30多名土兵死亡，多人受伤，因而无心恋战，匆忙撤退。

这一天，西军虽然取得胜利，但内部却因这次军事行动而发生争吵。萨尔塞多埋怨手下军官不执行命令，去堵塞河道；后者则责怪前者没有及时支援，反而妒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以致士气低落。林凤方面，经过这次失败，连夜修筑被破坏的堡垒，架起三门大炮和许多小重炮，做好防卫准备。第三天，萨尔塞多领兵来攻，但在获悉林凤上述准备后，思忖进攻不利且可能损兵折将；又考虑到林凤的船只已被烧毁，无法逃遁，便放弃进攻，退到河中一个沙洲上，企图以军事包围，用饥饿迫使林凤投降。但西军还来不及部署阵地，林凤便命令部下向敌军

发炮，迫使西军从沙洲撤往河岸。自此，两方形成隔河相峙之势。这期间，西军斗志更形衰退，甚至发展到放任自流，以赌博和到附近村落征税、勒索打发日子。林军则经常派出小分队，以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和伏击敌军，使之大受骚扰，伤亡不少。但是林凤的小股袭击行动，仅是一种掩护性的行动。此时林凤已秘密派人伐木造船，作离开此地的打算。不久，他们就造好30只船。1575年8月4日夜间，在被围困四个月之后，林凤率新船队，拔除敌军在河中安设的桩柱，安然沿河出海回国^①。

林凤回国后，仍活跃于闽、粤沿海。后由于明廷饬令闽粤两省“严督所在水兵，同心戮力，务使片帆不遗，方许收兵”，而地方官员，抚剿两手并用，使林凤所部急剧分化，许多人“分踪散泊，束身待招。凤知众心已散，已罪不赦，掣舡夜遁。”时为万历五年（1577）十二月。从此，东南沿海再未发现林凤的活动^②。

林凤由邦加斯南回国时，所乘的30艘船都是小船，无法载走所有随他到菲律宾的人。可以想见，林凤带走的，当多是作战人员，留下的，当多是妇幼、工匠。未能随船回国的群众，为了生存，避开西班牙殖民者而进入吕宋北部山区，与当地的伊戈洛特（Igorrote）族人杂居，通婚，向他们传授中国的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对发展中菲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中菲间的文化交流作

①本节内容除拉维萨里斯的报告、信件外，另可参阅BR, Vol. 4, PP. 24—45, Vol. 6, PP. 91—110;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P. 47—50; 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90—120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万历三年十一月丙辰条、辛酉条；卷四五，万历三年十二月己卯条；卷四六，万历四年正月己未条；卷五七，万历五年十二月乙亥条。

出贡献。据说，这些人的后裔，从他们优美修长的身躯、浅淡色的皮肤，细斜的眼睛，仍可从当地人中区别出来。这些华人的后裔，形成为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Chinese)^①，至今对中国人怀有真挚的感情，且不讳言他们的祖先是林凤。

二 华侨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在林凤留菲期间，中国同菲律宾西班牙当局发生了第一次交涉。中方代表是福建的一个把总王望高，西方代表是驻菲西班牙总督——先是拉维萨里斯，后是桑德。

王望高受福建当局（通过漳州知府）派遣，于1575年（万历三年）4月初至6月中、同年10月底至翌年5月初，两次出使菲律宾。第一次使菲的任务是探寻林凤的下落。此行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对林凤的队伍进行分化、孤立，杀害或俘获林凤，一是组织一支武装力量随着赴菲，相机进行武力征剿。王望高一行在前往马尼拉途中，在林加因湾的布里亚诺（即现在的波利瑙）偶遇给萨尔塞多运输军需品的船只，因而曾到过邦加斯南，见到萨尔塞多。时值林凤首战失利，损失大批船只、人员。王望高了解到林凤已无法再弄到船只，且已失去作战能力，其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于是接受萨尔塞多的劝告，转往马尼拉。

在马尼拉的接触中，双方对消灭林凤这股力量有着共同利害关系，但又各怀鬼胎。西班牙人认定林凤已处于西军的围堵之中，无法逃遁，自己稳操胜券；同时也看准福建当局对消灭林军的迫切心情，因而以此作王牌，提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与中国

①BR, Vol. 43, P. 117; Vol. 48, P. 82;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50.

通商的要求。王望高意识到，要消灭林凤，只能指靠西班牙人，自己无从插手；也担心自己率领的庞大舰队在菲耽搁太久，会招致西班牙人的怀疑，惹来杀身之祸。因而在获得拉维萨里斯的保证——一旦林凤被俘或得到他的尸体，就及时将之交给中国——之后，便同意带西班牙教士随船回国^①。

王望高回到福建，将拉维萨里斯送给福建当局的礼物，私吞一大部分，并将拉维萨里斯给福建当局的函件，肆加窜译后，交给了巡抚刘尧海。经窜改的函件，捏造了王望高等在西军焚毁林凤的船队、摧毁林凤的堡垒时，曾亲临前线英勇杀敌，鼓舞西军作战；除了队长之外，给每名西兵白银400两，以示酬谢等情节，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捞取名利。

随着王望高到中国的马丁·拉达和赫罗尼莫·马丁两位神父，在福州四五个月，形同软禁，始终未获在华传教及通商的许诺，到王望高第二次使菲乃随船遣返。两神父向总督诉说在中国的遭遇及王望高的劣行，引起殖民当局的不悦。更有甚者，在第二次使菲途经中国近海Plon岛时，王望高已获悉林凤撤离邦加斯南，返回澎湖；及抵马尼拉，这个消息又为殖民当局所证实。可是，王望高为了卑鄙的目的，极力要求新总督桑德写信给中国，说林凤已死亡；甚至设法弄来许多人头，谎称为林凤及其部众的首级；伪造林凤的图章，完了还向桑德索礼。对此，桑德俱加拒绝。对西班牙人再派传教士随他到中国的要求，王望高起初未予理睬。但经殖民当局的一再要求，王望高也考虑到带教士回国，会得到后者若干财物，因而最终答应带拉达和奥古斯丁·阿尔武克尔克两神父同行。船至桑巴列斯海岸，王望高索贿未遂，竟把两神父丢在一个小岛上，又杀害随两神父的两名林凤旧部，以防他

①BR, Vol. 6, PP. 112—114.

们回国后讲出林凤安全离菲的真相。王望高决定回国后杜撰所谓林凤和萨尔塞多均已阵亡，西军因失去指挥者，已撤回马尼拉，致使林凤部众逃遁等情节，以欺骗当局。王望高的弄虚作假，亦可从我国史籍得到某种佐证。如万历四年九月，福建巡抚刘尧海据王望高报告，向神宗奏报：“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凤溃围遁，复斩多级，并吕宋所贡文、方物以进。”^①王望高原来的打算与刘尧海的奏报，已有出入。因在王望高回国时（5月底或6月初），已得知林凤从万历三年十一月起，又活跃于闽粤沿海。

有一种看法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前此对华人华商的印象一向甚佳，但由于林凤事件和王望高的劣行，致使殖民当局“亲华心理”尽行丧失；并把西班牙人此后对华侨的限制、虐待、驱赶和大屠杀等暴行，归诸由上述因素而产生的“恐华心理”。如果同意这种看法，那就等于承认华侨此后所遭受的苦难，是林凤和王望高造成的，从而在客观上为西班牙殖民者解脱。从表面上看来，西班牙人前此对华人确实有过“亲近”的表示，但这并非他们的心理本质，而仅仅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较早的时候，就是为了追求西方所崇尚的中国高级商品。只有善待华人、华商，他们才能获得上述东西。在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较稳固地建立殖民统治之后，他们仍善待华侨，目的仍旧，且随着大帆船贸易的开始、发展^②，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更急剧增长，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万历四年九月丙申条。

②大帆船贸易（又称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是菲律宾同墨西哥间的跨太平洋贸易，用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进行。大帆船满载东方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绸），每年一次由马尼拉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再由此满载美洲白银回马尼拉。列加斯比在1565年5月占领宿务后，为开辟回墨西哥的航路，并报告他的拓殖情况，便派乌尔达内塔神父率圣巴勃罗号于6月10日从宿务港启航，横渡太平洋，同年10月8日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就是大帆船贸易的开始。但大帆船贸易变得有利可图，因而获得发展是从同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16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因而，这一目的更加明确了。此外，另一些需要也跟着突出起来，那就是：第一，对在菲西班牙人的粮食、日常用品等生活资料的供应，甚至是军需品的供应亟需解决。当然，这些供应品都可以取自墨西哥，但路途太远，风险太大，量小花费高，适应远渡重洋的船只太少。因此，指望从墨西哥得到上述项目的供应，是根本不现实的。由于当时的生产水平，菲律宾本身也不能提供上述必需品。供应问题成了西班牙在菲能否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关键。在同中国官方没有贸易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希望通过中国商人取得他们的供应品，这是唯一可行的，最近捷的办法。第二，他们需要中国劳工的服务。一是需要中国工匠在菲律宾为他们生产消费品、日用品以及从事大帆船贸易所需的部分商品。二是需要中国劳工从事农业生产，充当大帆船或战船的桨手，以及修建桥梁、大公共建筑物、道路和教堂等公共工程的劳动力。第三，不论是殖民民政当局，还是教会当局，一直都梦寐以求地企图取得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权利。在这种企图一再受到中国当局冷遇，因而已变得毫无希望之后，他们转而致力于使在菲华侨皈依教，并希望通过这些华侨的帮助，最终实现他们在中国大陆传播“福音”的梦想。简言之，西班牙殖民者是为了达到多种目的，因而不得不做出善待华侨的姿态。姿态与心理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不言自明的。

在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亲华”姿态后面，包藏着侵华的打算和仇华情感。菲利普二世本来就有征服中国的野心。拉达神父早在1569年7月，就在给墨西哥总督的信中，表达了使菲律宾成为侵华基地的意向^①。还在林凤进袭马尼拉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即1573年，一名殖民军指挥官迭戈·阿铁达写信给菲利普第二，提

^①陈台民：《中非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88—89页。

出“如果陛下希望勘察〔中国沿海〕这块土地，给我两艘各250吨的船只，每艘船配备50名士兵，以及所需的一切大炮、弹药和粮食的话，我将为陛下效力。……我将确定在中国如何进行贸易和征服。”^① 埃尔南多·里克尔在1574年1月也提到：以少于60名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中国^②。至于刻骨仇视中国人民的桑德，在其总督任内，就曾反复向西班牙国王建议、恳求用武力征服中国^③。桑德还一再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表示愿作侵华的马前卒，狂妄宣称，只用2 000或3 000人，占领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中国。西班牙殖民者的上述表现，是它的侵华野心和西方殖民者传统性敌视东方人民的本质的暴露。

林风事件期间，一些西班牙官兵对中国人采取公开的敌视态度，以致连和平侨民和商船也被加害，使中菲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菲西当局担心他们的供应和大帆船贸易因此受到影响，因而不得不继续作出姿态，善待华人。例如，拉维萨里斯1575年致墨西哥总督的信，就提到一件事：西班牙人缉捕两艘满载商货的中国帆船，劫去全部货物，然后把其中一艘连同四名华商带到马尼拉。拉维萨里斯认为，上述无端加害于中国人的行为是不明智的，因而他把这四名华商，连同在菲律宾各地逮捕的华侨送回中国，以便挽回“我们在中国的信誉”^④。又如，桑德一莅任，即酝酿对中国进口货物征收关税。但考虑到当时来菲中国商船数量虽逐年有所增加，但总的说来还不够多，来货尚少；若要开征关税，总数也不会多，“如果我们不好好对待他们”，华商就

①BR, Vol. 3, P. 206.

②BR, Vol. 3, P. 247.

③BR, Vol. 3, PP. 312—313; Vol. 4, PP. 58—60, 145—146.

④BR, Vol. 3, P. 291.

不敢再来，在菲西班牙人就要遭受匮乏的痛苦，因此桑德说：

直到目前（桑德写这个报告的时间是1576年6月7日——引者）还没有征收进出口税或其他税。因为我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到任，而人民（当指在菲西班牙人——引者）又是如此贫困，人数是如此之少，使得我未敢征收这些税。就我而言，在征收这些税能够变得有利可图之前，谈论它们为时尚早^①。

他在1577年6月8日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两个报告都建议国王同意菲律宾殖民当局豁免中国船只、货物的税收及其他税收30年。这也足以证明，西班牙殖民者善待华人，是为了得到来自华人的物资供应，以满足在菲西班牙人的生活需要，求得殖民者内部的稳定，以便维持他们在菲的统治。

善待华人，既是一种策略、手段，其执行就只能是暂时的；一旦目的达到，情况改变，策略、手段均可变换，善待可代之以歧视和虐待。

自中菲贸易在新的情况下重建之后，由于西班牙人鼓励华商运销中国商品到菲律宾，由于中国商人为西班牙人手中的白银所吸引，因此，虽有林凤事件和西班牙人夺船掳货，逮捕华侨等情况发生，中菲贸易还是不断发展，来菲华船、华商、华侨的数目，所运销商品的种类、数量都逐渐增加。据菲律宾主教多明戈·萨拉萨尔所见，他于1581年3月抵达马尼拉时，巴石河对岸的顿多已有不少华侨居住，马尼拉城内也有若干华侨开设的店铺。至于华侨人数有多少，未见具体数字；但从1582年因不堪虐待而回国的华侨即有400人之多，可以想见当年华侨人数已不少。1584年，来菲华船数为25—30艘，附船而来的华商、华侨达4000人^②。

^①BR, Vol. 4, P. 88.

^②BR, Vol. 6, P. 61.

可见，这时中菲间的贸易已达相当规模；中国商品除了满足在菲西班牙人的生活需求之外，已构成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即大帆船贸易的几乎全部货源，每年越海而来的中国商船，成为马尼拉繁荣的基础^①。

1570—1603年中国赴菲商船数

年 期	船 数	年 期	船 数
1570	9	1588	46
1573	8	1589	11—12
1575	12—15	1591	21
1577	9	1592	22—28
1578	9	1596	40
1580	19	1597	14
1581	9	1599	19（或30—50）
1582	24	1600	25（或40）
1584	25—30	1601	29
1586	25—40	1602	18
1587	30	1603	16

资料来源：Pin—tsun Chang, *Chinese Maritime Trade, the Case of Sixteenth—Century Fu—Chien*, Table 22.

①W·L·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转引自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150页。

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财政收入，除向当地人民征收贡金外，大部分仰赖每年来自墨西哥的财政津贴^①。桑德总督任内，为了降服邻近岛屿，连年对明达瑙、苏禄、婆罗洲等地用兵，消耗庞大的军费。进入16世纪80年代，日本海盗又年复一年地侵扰菲律宾，特别是吕宋岛北部，这又给殖民当局加上沉重的军费负担。

当局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从1581年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除征收3%的关税外，另每吨船载货物征收12比索的停泊税^②，以代替桑德时期按船载大小，每船分别征收25、30和50比索的停泊税。同时，鉴于马尼拉华侨日益增多，为西班牙人的几倍，殖民当局便设法加以防范，且为便于管理，利于征税和敲榨勒索，遂于1582年改变华侨与西班牙人杂处的状况，在马尼拉城北与巴石河间一荒地建立居留地，名叫帕利安。帕利安周围围以栅栏，华侨在其中开设店铺，从事买卖，集中居住。

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针对华侨的。设立帕利安是为了限制华人。征收进出口商品税和停泊税，名义上适用于所有的商品和船只，但由于当时（甚至在以后两个多世纪中）菲律宾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同中国进行的，因此，开征上述税项，是着眼于中国商品和商船。西班牙人所强加的苛刻待遇，给华侨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痛苦。

值百抽三的关税和每吨12比索的停泊税，已严重损害华侨、

①殖民政府每年都不能维持其财政支出。西班牙国王命令墨西哥当局每年给马尼拉一笔财政津贴，其数量视殖民政府的需要而定，最少是1666年的8.5万比索，最多是1786年的346 912比索，平均每年25万比索。直到1821年墨西哥独立，财政津贴才终止。

②BR, Vol. 5, P. 29.

华商利益。而在具体征收这些税项时，西班牙官吏的胡作非为、敲榨勒索，更成灾难。萨拉萨尔主教在1582年所写的《菲岛情况》中，对华侨所受的迫害，有较详细的披露^①，可归纳如下：

在华商必须缴税的借口下，规定商品出售之前，必须进行登记，否则予以处罚。但在登记时，最好的商品被稽查员或登记员以任意确定的价格取走。有的通过暴力抢走华商的货物，并拘留他们；有的不按货值付款；有的取货时只给便条，往后拒付货款。后一种方式最为流行。那些在此类事务方面拥有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更好更便宜的商品，甚至不许华商把商品卖给自己喜欢的人。这些当权者控制着全部货物，从中挑选自己认为最合意的，随意付给货值，而后又把其余的货物配给自己手下的人、朋友和同事。一些华商不甘自己的货物被贱价取走，便设法隐藏，以供定购者或待较好的价钱出售。但一经查出，便受严厉惩罚，例如受笞100鞭之外，还要科以75墨西哥银币（toston）^②的罚款。为避免货物被窃，华商必须雇士兵看管。

华商住进帕利安，行动受到诸多限制。当局所任命的帕利安西班牙人区长，具有随时可以惩罚华侨的权力。华侨动辄受罚，如因夜间在帕利安之外消遣，或住处不够清洁都要被科罚款。

此外，华侨还被强迫从事苦役，例如被召到远征队和船队服役；为免除此役，他们每人要付出多至三四十比索的代役金。尤其使华侨不满的是，当局竟抓捕20或30名于1582年来菲居留的华侨，迫他们充当远征队一艘大帆船的桨手。随后，为给远征队输送粮食，又迫令二三十名华侨同往。为避免此行，那些没有仆人

^①BR, Vol. 5, PP. 236—240.

^②每1 toston值4里亚尔（real）。每8里亚尔合1比索（Peso）。

可以顶替的华侨，只好花10比索雇人代替。

结果，许多华商获利不多，甚至亏损；一些靠双手营生的人，因被征服役而失去生计；再加上受到各种歧视和迫害，致使许多华侨无法在菲生活而思归故国。萨拉萨尔说，各种不公正的行为，“已使今年来菲定居的200名华人归国；另外200名或更多些原已在此居住的华人亦已离去。在巴石河对岸通常是非常繁盛的华人居留地（指顿多——引者），现在几乎看不到一个华人了。”^①

西班牙人对华侨的种种倒行逆施，到头来不仅损害华侨的利益，也严重地扰乱了西班牙人和本地人民的经济生活。1582年，虽然有20多艘中国商船到马尼拉，但市面上几乎看不到中国货，偶然见到，也是价高惊人。例如，一匹缎子，从前值10或12墨西哥银币，现在猛涨至40或45墨西哥银币，且还很难找到。甚至连教堂也无法得到用作装饰的丝绸。从前沿街叫卖也没有多少人理会的某些中国货，现在也难得看到。由于华侨渔夫被抓去当桨手，随后又征去运送粮食，使得从前在街上大量摆卖、价钱极便宜的海鱼，价高而尚不可得。连马尼拉最高法院也不得不承认，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供应品极其缺乏，使这里的人极感苦恼”^②。

上述迫害华侨的措施，在朗吉略·培尼亚罗萨总督死(1583)后继续施行。物质缺乏的情况继续存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对此深感不满。1586年4月19日，马尼拉各阶层西班牙人举行代表会议。他们针对供应、华侨问题，向国内专管殖民地事务的印第安评议院（Indian Council）提出如下要求：1、由于菲律宾还极端落后和贫困，朗吉略所征收的3%的关税又完全无助于这个

①BR, Vol. 5, P. 240.

②BR, Vol. 6, P. 259.

殖民地的财富增殖，建议在马尼拉免征此类关税。2、对运来菲律宾的各国货物，特别是粮食、各种补给品、各种物资 免 征 关 税，以免华人不愿来菲律宾交易。3、禁止墨西哥的富人把大量金钱投到菲律宾，以免他们垄断中国商品，提高价格，致穷人和普通人不能购买和向西属美洲出口上述商品。4、严禁中国及其他国家商船零售商品，严禁本城居民公开或秘密购货。由政府指定专人成批购买中国商船运菲的货物，然后按原价加上杂费，公平地分配给西班牙市民、华侨和土著居民。5、禁止华侨商人、小贩在马尼拉居留，以免他们囤积和零售商品，所有的华侨零售店应于本年内由西班牙人接管。今后只准华侨基督教徒、华侨老居民中的工人（技工、木匠、花果匠和农夫）以及粮食供应者在城外居留。6、任命一名保民官，以保障土著人的利益，受理他们的诉讼；这位保民官兼管生丝市场和马尼拉的华侨^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禁止华侨从事零售业的建议，此后一直成为一项排华政策。

同年6月26日，菲律宾西班牙当局最高决策机关——马尼拉最高法院（audiencia），在给菲利普第二的信中，也谈到减轻华商负担以解决马尼拉的供应问题。信中说：我们已停止向输入菲律宾的资金征收1.5%税款；为鼓励中国人给我们运来充裕的供应品（包括马匹和家畜），已对他们运来的谷物、饼干、面粉和所有其他粮食免征关税^②。

自马尼拉西班牙人代表会议提出“成批购买”要求后，殖民政府从这年起，即酝酿“整批交易”（pancada）制度，并很快在马尼拉施行。“整批交易”制度规定，中国商人运菲船货，由

①BR, Vol. 6, PP. 162—163, 166—168, 176.

②BR, Vol. 6, P. 260.

总督派员整批估价，然后按比例分配给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私人不得与华商直接交易。殖民当局企图以此限制中国商品输菲数量，压低中国货价，减少白银外流，缩短中国商人在马尼拉的居留期限，以达到既排挤华侨，又限制华侨的经济活动的目的。

有关禁止华侨从事零售业，限制华侨在马尼拉居留等建议，日后也由西班牙国王批准而成为定制。

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上述限制付诸执行，对西班牙人是无益而有害的，因而实际上无法实行而成为具文。但殖民者却往往用这些限制性的立法作为依据，随时宣布华侨的有关活动为违法，借以达到肆意敲榨勒索的目的。就此而言，对华侨的歧视，已变本加厉了。

三 华侨遭受的限制和迫害

菲律宾原来的生产水平就不高。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后，强制推行领地制，向土著居民收取贡金，剧烈地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加以殖民者屡屡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土著，大批征调土著参加接连不断的征战，更使菲律宾丧失大量精壮劳动力。一些地区，如盛产粮食的中吕宋地区，因缺乏维持正常生产的劳动力而百业荒废，物资短缺。大批非生产、高消费的西班牙人的到来，以及连年的征伐，殖民当局对华侨、华商的打击和限制，使中菲贸易遭受不小的损害，更加剧上述困难。结果，百物腾贵，生活费用高昂。1584年6月15日，马尼拉最高法院举行一次调查会，一些证人用具体的数字和事实，以证实普遍存在的供应紧张和一些西班牙人的穷困。1580年花1墨西哥银币能买到的中国面粉，现在花3比索（值6墨西哥银

币)还买不到;往常6法内格^①的大米才值1墨西哥银币,现在却值3比索,即1墨西哥银币1法内格;通常12—16只家禽卖4里亚尔(值1墨西哥银币),现在每只卖2—3里亚尔;原来一头猪是4—6里亚尔,现在用6—7比索还买不到。“因此,贫穷的〔西班牙〕居民遭受极大的痛苦,甚至无法养活自己。从前,一个士兵以15或20比索就能维持一年的生活,现在,同样的钱只够维持一个月。”^②马尼拉西班牙人的生活尚且如此,菲律宾人民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殖民者把物质匮乏的罪责,归诸华侨的到来,甚至说:“每一个中国人吃得比五个摩洛哥人还要多。纵使价钱高昂,他们总还是要吃最好的东西,由此,粮食的价钱更贵了。”如此违背常理的话,不值一晒。海外华侨以勤俭、刻苦著称。况且,以工匠、劳工和小商贩为主要成分的非律宾华侨,以其寄人篱下的处境,低微的收入,也无法过如此奢侈的生活。马尼拉最高法院法官罗哈斯的这一指陈,旨在推脱殖民者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灾难的罪责,并为迫害华侨制造舆论。

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不足,以及对热带气候的不适应,每年都造成大批西班牙士兵的死亡;而内忧(自1584年以来,庞邦加、比萨扬、顿多、宿务、卡加扬、桑巴列斯先后爆发反西起义和发现起义的密谋)和外患(倭寇的侵扰和日本对菲律宾的威胁)又接踵而来,使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地位受到极大威胁。为解救这种处境,他们除了不断向母国及墨西哥要求增调兵员和军用物资以外,急切需要解决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由此,遂有上节所述1586

^①fanega, 量谷物的单位。每1法内格在不同地区分别合22.5公升或55.5公升。

^②BR, Vol. 6, PP. 50—52.

年马尼拉市民代表会议的建议和马尼拉最高法院的措施。这反映出殖民当局对中国供应品依赖之深。

进入16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属美洲对奢侈品的需求几乎与中国人供应他们的能力一样，好象是没有止境的”^①，因此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菲律宾西班牙行政和教会的高级官员，都深深卷入这一贸易，他们为着获得从事这项贸易所需的中国高档商品，在坚持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坚持“整批交易”的基础上，设法改善中国商船到马尼拉港时的交易条件，鼓励华商继续来菲贸易。

虽然自朗古略·培尼亚罗萨任总督时起，对中菲贸易作出一系列限制，但因有上述两种迫切需要，中菲贸易仍有所发展，这又刺激了华侨移居菲律宾的热情。而殖民当局为着发展当地的生产，解决供应，减少对中国粮食、食品和制造品的依赖，减少白银外流，也极力吸引华侨劳工、工匠到菲律宾。1585和1590年，菲律宾总督圣地亚哥·贝拉、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先后“遣人来吾闽粤各地，招募华工。”^②从16世纪80年代后期至17世纪初年，在菲华侨人数迅速增长。

据贝拉1587年6月26日给西班牙国王的信，该年有30多艘装载量相当大的中国商船到菲律宾，随船来了3 000移民^③。第二年，亦有同样数量的华船、华人到达马尼拉。到1588年，马尼拉的华侨数就超过1万人^④。直至90年代，每年来菲的华船大抵

①Schurz, *Manila Galleon*, 引自李永锡：《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丛》第1集，第213页。

②郑民：《菲律宾》，第34页。

③BR, Vol. 6, P. 302.

④BR, Vol. 6, P. 316.

都在20—30艘之间，也有超过40艘的（1596年），华侨也有较大增加。

华人所运来的货物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按照安东尼奥·莫加的记述，16世纪90年代，由中国运到马尼拉的货物，包括各种丝织物、各式天鹅绒、毛织物、锦缎、金银线团、缎子、波纹绸、粗松丝织物、各种颜色的衣料、亚麻布、供各种用途的白棉布；麝香、安息香、象牙；床上装饰品、帷幔、床单、挂毯、台布、垫子、地毯；马饰；金属盆子、铜水壶、铜锅、铸铁锅、各类铁钉、薄铁板、铅、锡；硝石、火药；面粉；蜜饯、桔子、桃肉、梨、肉豆蔻、姜及其他中国产的干果；腌猪肉及其他腌肉；活家禽、阉鸡；新鲜水果：各种桔类，上等栗子、胡桃、梨等；各种优质线、针、小饰物；小盒子、文具盒；床、桌子、椅子、长凳；水牛、鹅、马、骡、驴；数不胜数的无实用价值的小玩意和饰物；各种精陶器；黑色或蓝色的长袍；各式珠子、成串的红玉髓、各式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还有无数珍品。“甚至还有笼养的小鸟，它们有的会说话，有的会唱歌，中国人还教会它们耍无数把戏。”^①这些商品数量都较大，连同墨西哥运来的产品，已使马尼拉的居民在衣、食的供应方面，平时已无匮乏之虞。并且，中国商品价钱便宜，以致贝拉在上述信件中也表示，虽然中国人在此地的贸易中获利巨大，“但是，依照我的看法，他们的商品卖价是那样低廉，使我们只能认为：要不是在他们的国家里，这些产品无需花多少力气制作、种养，就是俯拾皆

①BR, Vol. 16, PP. 178—180. 莫加1595年6月到菲律宾任最高法院成员，1603年离菲赴墨西哥任最高法院成员。此处所记中菲贸易情况，当是他在菲时所见，主要是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初年的事。

是。”^①

华侨、华商的经营活动，对菲律宾的经济生活，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甚至对在菲律宾西班牙人的社会生活，都有不可抹煞的贡献，这已为西班牙人自16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菲贸易兴衰而产生的社会效果所证实。但殖民者总是在顺境时千方百计地要限制、虐待华侨，限制中菲贸易。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殖民者在菲律宾的统治基础极薄弱，在菲西班牙人人数也少得可怜。他们所以能维持殖民统治，主要是利用宗教对土著居民的控制和利用当地居民部族间、地方间的对立关系，惯常使用以菲律宾人打菲律宾人的手法。他们担心，华侨人数的增加，甚至在数量上十倍于他们，将会危及他们的安全，威胁他们在菲律宾的统治。因此，每当华侨人数超过他们认为安全的数额，他们便加紧

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 菲律宾
每年获得白银数及由菲流入中国白银数
(单位：万比索)

年 代	美洲白银运菲数	年 代	由菲流入中国白银数
		1586以前	30
		1586	50+
1598	100	1598及以前	80—100
1602及以前	200	1602及以前	200
1604	250+	1604	250+
1633	200	1633及以前	200

资料来源：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38、444页。

^①BR, Vol. 6, P. 302.

迫害华侨，制造事端，借机屠杀，或进行大规模的驱逐，以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事实上，要不是殖民者危害到华侨的生命财产，以经济活动、赚钱养家为目标的华侨，是根本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威胁的。二是在中菲贸易中，菲律宾只能用白银、黄金易中国的商品，以致白银滚滚外流。中菲贸易的发展，同从菲律宾流出的白银成正比（见上表）。罗哈斯给菲利普第二的信说，每年流向中国的白银30万比索，1586年更达50多万比索；此外，华商还带走通过交易所换得的大量黄金^①。三是中国商品，特别是丝和丝织品通过菲律宾转口输进西属美洲市场，威胁着西班牙的丝及丝织品在美洲市场的销路，这不仅打击了西班牙本国的蚕丝、丝织业，而且造成菲律宾、墨西哥、秘鲁、西班牙等地的西班牙商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对于由贸易而产生的上述问题，西班牙人不是循积极的方式去解决，而以消极限制中菲贸易的办法解决，以致在菲律宾供应趋于正常的80年代中期，又酝酿着新的限制措施。

关于限制或禁止华侨经商，在1586年4月19日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代表会议上，即已作为建议提出。其后，在同年6月30日，马尼拉最高法院法官佩德罗·罗哈斯又向西班牙国王详细阐述上述建议。现将这封信中有关段落译引如下：

通过由贸易所提供的机会，许许多多的华人到这里来，这对一个如此虚弱、如此贫困的地方是不小的损害。因为每一个中国人所吃的东西比五个摩洛哥人还要多，而且，纵使价钱昂贵，他们总还是吃最好的东西；粮食的价钱因而更贵了。为了追求非常的收益，他们不愿充当工匠为西班牙人服务……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除了留在这个国家当农民、牲畜饲养者之外，再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能够做的了。还有其他人可以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行业——建筑业中当工匠。这样，他们既可由 此获益，而西班牙

^①BR, Vol. 6, P. 269.

人也因之得到他们所需的全部服务；并且，这种服务的费用是极其低廉的①。

这项建议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批准，并在1589年8月9日训令将赴任的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到任后执行。在此项训令的末尾，菲利普第二特别强调，“你切勿允许中国异教徒小贩留在菲律宾，或者让如此多的华人变成那里的居民，以致他们得以制造麻烦。这是至关重要的事。”②

达斯马里纳斯忠实执行国王训令，推行限制和迫害华侨的政策。他在任总督的第三年——1592年6月20日，向国王报告：

“为了避免其他令人不快的后果，我已经颁令，中国商人不得以进出口批发商的身分在菲居留；除只准那些技工工匠在此居留外，其余华人，一待他们的货物卖完，就应回国。”③

但不管是国王的训令还是总督的政令，在菲律宾往往成为具文。由于菲律宾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在非西班牙人从事大帆船贸易的需要，中菲贸易是无法禁止的，华侨商人是无人能代替的。西班牙官吏的贪婪，使他们不愿失去敲榨勒索，借以自肥的最佳对象——华侨。教会当局也不想由于限制华侨居留而失去向更多华人宣教的机会。因此，既无法禁止中菲贸易，也无法遏制中国人移入菲律宾。达斯马里纳斯上述限制华侨的措施，立即遭到教会当局的反对。这使他懊恼不已。他说，“萨拉萨尔主教和所有的修道士都说，华侨不能因而被剥夺来此定居的自由，在良心上我们也不能以这样的命令和规定强加于他们。他们甚至在讲坛上宣称，总督将沉沦地狱！”这位总督也承认，如果断绝中

①BR, Vol. 6, P. 269.

②BR, Vol. 7, PP. 154—155.

③BR, Vol. 8, PP. 273—274.

非贸易，菲律宾当局每年将丧失3—4万比索的关税收入^①。

与此同时，殖民当局积极在华侨中推行基督教，以便同化华侨。

西班牙人初到菲律宾，并未特别重视向华侨传教，原因是他们一心想打开中国的国门，以菲律宾为跳板，向中国派出传教士，以遂他们宗教先行，舰队随后，征服中国的目的。70年代中期，西班牙人曾有机会派两名教士随王望高赴福建，但终未获得在华传教的许可。1579年6月21日，五名西班牙神父从马尼拉抵广州，但立即被关押，经审问后驱往澳门^②。其后，耶稣会的阿隆索·桑切斯神父又两次作为菲总督的使者派往澳门。第一次是在1582年3月至第二年3月，目的地是广州和澳门，表面理由是要布谕澳门当局服从西班牙王的统治^③，探究在马尼拉和中国的一些港口间建立商务关系的可能性，但也抱有使中国向西班牙传教士开放的打算。桑切斯此行只在某种程度上完成第一项任务。由于西班牙人在广东地方官的眼中是一群邪恶的人，到处杀人越货，把别国领土据为己有^④，因而，极端怀疑西班牙人的意图和认为西葡两国合并可能给中国造成更大威胁。这样，通商关系当然无从建立；传教问题，更是完全没有触及。

①BR, Vol. 8, P. 274.

②H. de la Costa, S.J.,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 39.

③菲利普第二利用葡萄牙国王死后无直接继承人之机，在1580年把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并入西班牙。1640年，葡萄牙脱离西班牙，恢复独立。

④明张燮所说的西班牙人“性婪甚，靡国不至，至则谋袭人”，概括地道出了中国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印象，见《东西洋考·吕宋》。

桑切斯回到马尼拉，即与代理总督迭戈·朗吉略、萨拉萨尔主教等制订一项远征中国的计划，“从菲律宾派出一支武装远征队，其目标是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在这些传教士传教时由中国政府提供武装护卫，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中国政府抗拒，即行宣战，并在被征服的中国领土上强制施行西班牙的统治权。”由于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要派人面陈西班牙国王，而派人回国之前又得预先通知，因而延宕下来。

桑切斯第二次出使中国，是在1584年5月至10月，表面上是前往澳门解决西班牙船员哗变问题，而实际上是要同中国当局就在福建沿海设立贸易站问题进行谈判，以此试探中国当局是否愿意向西班牙人伸出友谊之手，甚至最终使中国政府向西班牙传教士开放。但桑切斯始终未能说服中国考虑建立贸易站的要求。最后他只好离开中国。此后，菲律宾西班牙行政和教会当局在武力征服中国，武力传教问题上，还瞎嚷了一阵，并以1586年4月的详尽入侵计划^①为标志，达到高潮。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菲西当局，就连西班牙本身也无法抽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到远东来推行这一冒险计划。因为在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国内一再发生人民起义，连年对土耳其、葡萄牙、英、法、尼德兰用兵，它的“无敌舰队”又在1588年被英国打败，几乎全军覆灭；结果，西班牙国力耗尽，财政枯竭，国运衰落，自顾不暇。

既然向中国传教无门，征服计划形同画饼，西班牙人便转而重视对在菲华侨的传教活动，以图通过信仰基督教的华侨，把基督教以至西班牙教士带进中国。

西班牙教士对在菲律宾的华侨的传教活动，在16世纪70年代

^①BR, Vol. 6, PP. 197—226. 中文译文见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164—186页。

始，所以有若干华侨受洗，皈依基督教。但那时还未有专门向华侨传教的教士和场所。至1581年，奥古斯丁教会在华侨聚居的顿多开设教堂，负责管理该处华侨，并向他们进行宣教活动。但宣教时用的是泰加洛语，成果不大。至1587年5月，圣多米尼克会（即多明我会）教士来菲，在靠近马尼拉的拜拜、比农多和帕利安建立教堂，并在帕利安建立圣加夫列尔医院，又让教士专习华语、华文，专门对华侨从事宣教活动。许多华侨相继皈依基督教。到1589年，在顿多已有一个华侨基督教徒村落。在这些信仰基督教的华侨中，当然不乏真心实意的虔诚教徒；但大多数是在当局把信仰基督教规定为华侨居留菲律宾的条件的情况下，受洗皈依教的。

放弃基督教信仰，本是个人私事，却为教会所不容。1587年，萨拉萨尔主教下令华侨在施洗礼时一律剪去长发，受洗后一律禁止回国。这不仅不合常情，对华侨爱乡爱家感情以及个人的自尊心，也是一种粗暴的侮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民族歧视。这样一来，不但非教徒华侨，就连教徒华侨，都遭受西班牙统治者的迫害和限制；而且，后者所受到的迫害和限制，更加令人不可忍受。结果，相当部分本已倾向基督教的华侨，拒绝接受洗礼，从而使当局在华侨中推行基督教化的政策受到阻碍。由此也引起主张准许改宗者留发、回国，以便有利于上述同化政策推行的行政当局，与顽固坚持民族迫害和歧视的教会当局之间发生分歧和磨擦。但这种改宗削发的做法，直至17世纪前期，仍未废除。1617年刊行的张燮《东西洋考》所说的华侨“间有削发长子孙者”^①，既说明了基督教徒华侨削发，被禁止回国的事实，也说明愿意削发者之少。

①《东西洋考·吕宋》。

为了限制中外贸易，殖民当局禁止菲律宾人穿中国织品。达斯马里纳斯任总督的第二年，即1591年3月30日，公布一项禁止菲律宾人穿中国织品的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由中国进口的丝织品、棉织品和其他织品、成衣等，均在禁止穿用之列，但主要是棉织品及其制成品。关于实施这项法令的主旨，达斯马里纳斯在1592年6月20日给菲利普第二的信中有所表述，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中国商人在贸易中把大量白银带走，从而损害菲律宾的利益；在这种贸易中，输非商品大部分是棉布。第二，禁止中国织物，将有利于鼓励菲律宾人种植棉花，织造棉布，由此可减少白银外流，还可将菲律宾的棉花输往墨西哥，从而每年可增加一笔40万比索的收入^①。

为证明这项法令是合理的，达斯马里纳斯接连指示马尼拉及其邻近省份的地方官员，要他们举行一系列征询会，以了解这项法令是否给菲律宾人带来好处；是否可以防止种种罪行和恶习；是否有停止其实施的理由^②。在庞邦加省苏瓦奥村举行的征询会上，被邀作证人的，是包括拉莫斯、利辛在内的十名皈依基督教的当地酋长。但十人之中，八人所作的证言同上述两人的证语相同。至于征询的方式，则先由庞邦加省长胡安·阿尔塞加发问，并就有关问题加以解释，甚至提供统计数字，然后令证人申述意见。事实上，这些证人对每一项问题，都只是确认阿尔塞加的诱导性解释^③。可见征询会是由主持者导演的，证言也是按主持者的愿望和调子编造的。这些证言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①BR, Vol. 8, P. 273.

②BR, Vol. 8, P. 78.

③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96页，有关征询会的详细情况，请参阅BR, Vol. 8, PP. 79—95.

第一，西班牙征服菲律宾前，菲律宾人是用本地生产的棉花，在本地织成棉布，做成衣服，从未穿用外国布料。中国商船从未运输棉布到菲律宾。

第二，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主权后，中国商船大量载来各种织物、成衣。结果，菲律宾人纷纷用中国织物，着中国做的衣服，不愿再从事种棉，纺纱，织布，以致花费在中国织物和成衣方面的钱，由过去每年3万比索增至20万比索。

第三，西班牙人来菲律宾之前，所有本地人都在农村中从事耕种、养殖、酿造，自给自足。西班牙人来后，由于中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已经毁灭了本地的生产，并使本地居民堕落。禁止穿用中国织物，将消除这种堕落行为，种种违背上帝意志的罪行也将绝迹。

第四，禁令实施后，将促进本地居民与华商前此所进行的物物交易，从而制止白银外流，且由于鼓励棉花种植，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造外，还可出口墨西哥及中国。

菲律宾西班牙当局所谓禁用中国织物的理由颇为危言耸听，旨在嫁祸于人。菲律宾沦为殖民地之后，由于殖民者的屠杀，无休止的劳役和掠夺，从而使人口大量减少^①，加以生产关系的剧烈改变，菲律宾的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幸存的土著人，为逃避贡赋和劳役，为图生存，被迫逃离乡土，放弃农耕，另谋生计，甚至有部分人忍心杀死初生子女，或做出被殖民者视为“堕落”的“种种罪行”来。这样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在加意诱导的证言中，也露出破绽。例如，拉莫斯就曾披露：

西班牙人到来以前，所有的土著人都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努力

^①何塞·黎萨估计，在西治最初十年，菲农村人口减少了1/3。见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292、303页。

播种庄稼，酿造棕榈酒和米酒，其他人种植棉花，饲养家禽家畜，因而人人都从事劳动。再者，人们也服从和尊敬酋长，整个国家都供应良好。但自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以后，这一切全都消失了。因为自他们来到时起，所有的土著人已都沉迷于恶习和流浪生活，浪荡于村落之间，以便逃避劳动，放纵恶行——因为他们看到西班牙人有的是钱，迫切要为后者效劳。他们发现这样就拿到钱，或用一天的劳动就得到食物和衣服，这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诱使他们回到自己村里耕种土地，饲养牲畜，或使之象从前那样努力劳动了。这种情况在这群岛屿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在试图强迫一个本地人劳动时，他就是立即逃跑，到处流浪，只有到了一个容许他游手好闲的地方，才停下来，由此产生在发问中所提及的犯罪行为……^①。

拉莫斯的证言，使人可以从中得出殖民者应对菲律宾社会生产凋败负责的结论。再者，重建后的中菲贸易的发展，也有个过程，在相当时间里，华商运销的有限商品，还是以供西班牙人消费、转运的商品为主；后来运载相当数量的棉布来菲律宾，也是由于菲律宾人民需要衣着。否则很难解释，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中菲素有贸易往还，只有华商从菲律宾运回吉贝（木棉）布，却从未有由中国运来棉布，土著人也“未尝穿过用外国布料所裁制的衣服”这样的事实。

这项禁令，只禁止本地人用中国织物，特别是棉布。在本地人中，能花得起钱购买丝织品的，只限于酋长和富人，一般自由民和奴隶，只能穿廉价的布料。所以，受禁令影响的对象，是土著菲律宾人。反之，西班牙人用中国织物、从事中国织物（主要是丝织物及高级棉织物）转运贸易，虽然是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的重大项目，却不在禁止之列。这既反映了殖民者不顾菲律宾人民

^①BR, Vol. 8, P. 87.

死活的本质，也反映了达斯马里纳斯虽想减少白银外流，但又不得不考虑到禁止中菲贸易，每年将损失3—4万比索的关税收入，以及大批高级政教人员从事大帆船贸易的现实^①，禁止中菲贸易，将严重触犯这些权贵的利益，从而招致他们的反对，不若禁止土著人用棉织品那样风险小。

但是，禁止菲律宾人用中国织物的法令，还是立即遭到以萨拉萨尔主教为首的教会当局和以贝拉为院长的最高法院官员的激烈抨击。萨拉萨尔大主教^②在禁令公布后不久，就以保民官的身分，严词指责这项禁令有害民生，声称“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项禁令〕更糟糕了”^③。由于达斯马里纳斯在禁用中国织物，为马尼拉城建要塞、筑城墙而征收财产税，对大帆船货物一律征2%的出口关税^④等一系列措施上，侵犯了最高法院院长、法官、主教、教士和担任各种圣职的人的经济利益，这些人秘密集会，宣布达斯马里纳斯受到教廷的圣餐训令的谴责，并把他逐出教门^⑤。这证明，这些身居政教要职的人，在进出口华布方面也有既得利益。禁用中国织物法令，既然如此不切合实际，不得人心，又遭到殖民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而且，对年值20万比索的华布所能征收的一笔不小的进口税，也是颇为诱人的，因此，这项禁令很快就形同虚设，无法执行了。

①BR, Vol. 8, PP. 255—256, 171—172.

②萨拉萨尔于1581年任菲律宾主教。1591年，马尼拉成为大主教区，他升格为马尼拉大主教。

③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11.

④这项出口关税从1591年起开征，至1597年，马尼拉城堡建成，乃停止征收。

⑤BR, Vol. 8, PP. 271—272.

总之，殖民者虽有限制中菲贸易的幻想，但是由于“中国的商品和这些商品在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引者）销售所得的利润，是支撑菲律宾的主要手段”^①，因此，限制中菲贸易是完全行不通的。

四 潘和五等刺杀菲律宾总督

潘和五等杀死达斯马里纳斯事件，发生于西班牙殖民者远征摩鹿加群岛途中。

摩鹿加群岛当时分属巴扬、德那特和蒂多雷三个土邦。其中德那特、蒂多雷两土邦拥有大部分岛屿，实力相当，时有纷争。葡萄牙人利用土邦间的矛盾，维持其对摩鹿加的统治。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和强力推行基督教，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因而时有起义。158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摩鹿加主权名义上也归属西班牙，但仍由葡萄牙人管理。在整个80年代，德那特不服葡萄牙的统治，葡萄牙驻军无法使它折服。菲律宾总督朗吉略·培尼亚罗萨和圣地亚哥·贝拉虽几次组织远征，但毫无结果。德那特土王的势力因而扩大，蒂多雷的西葡驻军受到威胁。英、荷正在觊觎摩鹿加，利用土著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从中渔利。英国人甚至与德那特签订贸易协定。西班牙对摩鹿加的“主权”和香料贸易垄断权，受到严重威胁。达斯马里纳斯上任后，痛感形势危急，便有亲征之举。

潘和五事件，是由西班牙人强迫华侨充当桨手触发的。

华侨被强征从事苦役，在朗吉略·培尼亚罗萨任内即已开始。此例一开，以后便成定规，每有远征或重大工程，华侨都在

^①BR, Vol. 7, P 120

被征之列。1588年6月，贝拉总督就曾承认，他曾征募300名华侨充当桨手，在大帆船上供役。达斯马里纳斯上任后，大兴土木，为马尼拉城修筑永久性石结构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及寺院、衙门等，为此又征华侨服役。他们对待服役华侨，就象对待奴隶一样，稍不如意，鞭鞑立至。所以，华侨与殖民当局间，常常因征役发生矛盾和纠纷。

达斯马里纳斯上任伊始，即继续进行远征摩鹿加的准备工作，如储备各种物资，建造大小各式船舰，训练船舰管理人员，征集和训练桨手，刺探摩鹿加情报等。准备工作虽紧锣密鼓、不惜花费地进行，但真实目的却一直秘而不宣，公开只说是为加强菲律宾守备，对抗日本人南侵。

到1592年5月，殖民当局已有四艘大型划船。最初，为这几艘大划船配备土著桨手，但不敷配备。达斯马里纳斯便进而命令菲律宾的西班牙庄园主出资，购买当地酋长的奴隶充任桨手。但这些奴隶一上船就受到非人的待遇，以致船队还未起航，这些人便纷纷死亡。这样一来，桨手更加缺乏，连达斯马里纳斯的旗舰也未觅得桨手。

直到1593年，远征准备工作似乎已经完成，达斯马里纳斯才公开他的真实意图，宣布亲征摩鹿加。接着，他任命他的儿子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为他的副官，先行率领大部分船只、全部正规军前往宿务，并约定待整个远征队在此集齐，然后前往摩鹿加。他本人则留在马尼拉，继续武装他的旗舰，并为它配备桨手。

达斯马里纳斯为解决旗舰配备桨手问题，下令在当年到菲的华人中征集250人，答应每人每月由国库支付两比索的酬金，保证不拴锁链，让他们享有人身自由，甚至准许他们携带武器，充当士兵；至于他们的职责，则只是在风平浪静、或旗舰要绕行海岬

时，才需要他们划桨。

消息传到华人中，他们全都严加拒绝。但总督一意孤行，令华人管理官召集会议，讨论如何抽调桨手的问题。这位管理官威胁说，他将在每十名华侨中抽出一人充役。华侨哗然，纷纷关门闭户，停止营业，拒绝供应粮食，以示抗议。总督诬指华人谋反，悍然逮捕50名华人，强制安置于大划船的桨位上，并召集华人，迫他们出足250人之数。后因被抽出的250人，没有一个愿意充役，便只好向他们分摊代役金。这样共集得2万比索，征募另一批愿意从役的华人赴役，除每月由国库发给他们2比索的酬劳之外，每人一次过从2万比索代役金中分得80比索。华人桨手这才最后集齐。这时，已是1593年8、9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了。这些被征的华人分成五队，每队指定一名华侨基督教徒为队长。据《东西洋考·吕宋》引《政和堂集》的材料，这些华人以“高肖为把总，魏惟修、杨安顿、潘和五、洪亨五为哨官，郑振岳为通事，郭惟太等为兵。”

10月19日，达斯马里纳斯带着六艘大划船、一艘大帆船以及其他船只和士兵、从军人员，离开卡维特港，开往宿务。在他的旗舰上，配备着上述250名华人，还有80名西班牙人。舰队沿吕宋海岸南航，旗舰则在离岸较远些的外海航行。25日，旗舰准备在巴坦加斯南海岸的阿苏弗雷岬角过夜。当时正刮东南风，这里海流强劲，波浪滔滔。旗舰想找个背风点停泊，但海流使它不能前进，且徐徐向后倒退。华人虽然不停地操桨，但毕竟是新手，所以几经拼力，已是疲倦不堪，后力不继。舰上的西班牙军官对此不加体察，反而要他们拼死划桨，甚至还以严厉惩罚相加。华人认为这有违总督原先的保证。但作过这项保证的总督，这时也凶相毕露，以给他们拴上锁链，并削掉他们的头发相威胁。

达斯马里纳斯侮辱性的要胁，使这些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严

重的打击，郁积在心里的怒火，再也不能遏制了。他们在25日深夜酝酿反抗。“潘和五等谋曰：‘叛死、鏖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战死，不若杀酋以泄吾忿，胜则扬帆故乡；即不胜，死未晚也。’”^①

当夜，达斯马里纳斯与同僚赌博，至第一轮值班结束，才兴尽就寝。船上华人按计划分别躺在每个西班牙人身旁，假装睡觉。黎明之前一小时，船上正轮值最后一班。这时，西班牙人深深地堕入梦乡。突然，一阵哨声响过，所有的华人一跃而起，杀死各自身旁的西班牙人。这一行动进行相当神速。当船尾部的西班牙人惊醒时，睡在其他地方的西班牙人已经身首异处了。

那时，达斯马里纳斯正在舱里睡觉。起义者故意大声喧闹，高叫总督出来“调解争吵”。这位殖民头子匆忙穿上衣服，打开舱口，把脑袋伸出舱外。霎那间，几支矛枪猛然向他刺去。达斯马里纳斯忍着剧痛，缩回舱里，倒在床上，一命呜呼。他的侍从人员也一一被杀死。

事件发生时，其他船只上的西班牙人，看到旗舰上烛光晃动，也微弱地听到传来的喧闹声，但都以为舰上正进行着某种活动。后来，他们虽从溺水逃生者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但都感到无能为力，只好袖手旁观。及至东方发白，他们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易手的旗舰，乘着东南风，满帆地向西北——中国方向驶去。

这批备受虐待、侮辱的中国人，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而殖民者则为虐待和侮辱华人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旗舰上原有80名西班牙士兵，外加总督及其八名杂勤人员，一名叫做蒙蒂利亚的神父，以及一位名叫胡安·德奎利亚尔的总督秘书。只有12名士兵死里逃生。蒙蒂利亚和德奎利亚尔两人则因躲在甲板底下，成为留

^①《东西洋考·吕宋》。

在旗舰上的幸存者。这样，从贝拉统治时期（1584—1590）起，迄于达斯马里纳斯统治时期（1590—1593），殖民当局的远征准备，经潘和五一役，全部付之东流，远征不得不半途而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250名中国人取得的胜利，客观上支援了摩鹿加人民反对殖民者、维护自己主权的斗争。

潘和五等驾船离开吕宋海岸，直驶中国，但因途中遇风，漂流到交趾支那（亦即广南，今越南中部地区），船上所载武器、财宝，全数“为交酋所掠”。潘和五等人大部分“竟留交夷，不敢还”，“独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①。

五 菲西当局同中国的交涉 和对华侨的报复

达斯马里纳斯死后，根据他生前立下的任命书，他的儿子路易斯成为临时总督。

路易斯一上任（12月初），便采取措施为他父亲复仇。他派人同中国的地方当局进行交涉，要求“还其战舰、金宝，戮仇人”，并在马尼拉对旅菲华侨进行报复。

关于路易斯遣使来华交涉一事，不论是阿尔亨索拉的《摩鹿加群岛远征记》、莫加的《菲律宾群岛记事》，还是《明史》、《东西洋考》等中西史籍，都有记载，但都没有明确交待日期。只在路易斯1594年初致福建巡抚的信中，提到“从兄巴礼于旧年十月驾船往贵省，奔诉父冤”时，还有日期可据。“旧年十月”，大约是阴历十月底，相当于公历12月初。这就可以断定，路易斯遣使来华交涉的时间，是在1593年12月初。

^①《东西洋考·吕宋》；BR, Vol. 16, P. 262.

路易斯派他的表兄弟费尔南多·卡斯特罗率领两名神父，携带致广东、福建巡抚的信函急件，要求中国当局把“罪犯”移交给殖民当局，并归还战舰、旗帜、大炮和财宝。这也就是《明史·吕宋传》所说的，郎雷猫客“遣僧陈父冤，乞还其战舰、金宝、戮仇人以偿父命”。但由于潘和五等人“失路之广南”，舰上所载，悉“为交酋所掠”，250人也流散各地，西班牙人的要求遂无法实现。所以，许孚远公事例行，奏报神宗；神宗则“诏戮罪人，厚犒其使”^①，遣其归国。这次交涉，毫无结果。

第二年初，路易斯对中国接侨人员加意巴结，给粮以归，乘机作第二次交涉，“致书及辞，重诉父冤”，加诬潘和五等人，并为自己迫害马尼拉华侨的罪行开脱。函件内称：

其被害战船，乞追军器、金银宝贝，并究杀父之人偿命，以警后人，以正法纪。从兄巴礼于旧年十月驾船往贵省，奔诉父冤，万里悬情，惟冀秉公严追究治。从兄巴礼厚遣归国，感佩图报。又诉词一纸，为辨明父冤事。缘父守国，欲讨美洛居。时有润内唐民，愿充助敌者二百五十人，自备行粮，立功给赏。时父与兵同船，开驾到交逸地方，有佛郎人与唐兵言竟，父责番人，吊在船桅惩戒。原船装载金银莫计，同船番目各带宝贝、银钱数多。船进合万门湾泊，父令唐人牵罟捕鱼，共烹而食。卧至半夜，唐人心贪财宝，阴谋不轨，将父并番目四十余命尽行杀死，仅存巴礼、书记二人报息，将本船宝贝驾逃^②。

中国当局对路易斯的要求迟迟未作答复，原因可能是侦捕、“置惟太等于理”而至最后判决“正法”，都需时日。直至万历

①《明史·许孚远传》。

②《东西洋考·吕宋》。巴礼，是priest（僧侣）的音译，此处当指路易斯的表兄弟卡斯特罗。美洛居，即摩鹿加。交逸，即卡维特。佛郎人，即佛郎机人，指西班牙人。合万门当即阿苏弗雷岬角。

二十二年十月丁未（1594年11月14日），兵部才覆议：“将获犯正法，厚遣酋使，以坚内向之心，且藉侦日本夷情。”经万历帝“诏可”^①，始通过福建巡抚许孚远作复。

路易斯1594年的遣使中国，以及向中国提出的归还船、物、武器的要求，纯属胡闹蛮缠。首先，殖民当局在事件发生后很快就了解到，那艘战舰已漂流到交趾支那，潘和五等已流散各地；其次，在1593年12月派卡斯特罗使华返菲“几日之后，由总队长弗朗西斯科·席尔瓦·梅内塞斯在马六甲俘获的若干犯罪华人，已在那里解到马尼拉”，并从这些人口中得到有关旗舰被潘和五等占夺，达斯马里纳斯死亡方面更精确的情况。尽管如此，路易斯还是第二次遣使随华船到中国，重提第一次的要求。甚至在1596年年初还第三次遣使赴华，但受风浪所阻，被派遣者又转回马尼拉。这最后一次遣使的意图，是要使者力争面见中国皇帝，同他讨论这个帝国的改宗和“过去的事件”两个问题。

达斯马里纳斯被杀死，纯粹是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对中国桨手（原是商人）肆加侮辱，“刑杀惨急，遂激成此变”，是殖民者“不戢自焚，固其自取”。而潘和五等人所采取的完全是正当的自卫行为。但在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殖民当局不唯毫无反省之意，反而迁怒于马尼拉的无辜华侨，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且在迫害华侨时，又以同侵菲日本人“每有交通之情”的罪名相加。他们对华侨的报复行动，在上引路易斯致福建当局的书函中，虽然经多方诡辩和文饰，但仍可窥其大概。纵观殖民当局的这种排华手法，可归纳为“革回唐人”和“移洞”两个方面。

关于“革回唐人”。在刺杀达斯马里纳斯事件发生后，马尼拉当局随即煽起排华浪潮，于同年底驱逐5000名华侨回国。迫害

^①《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八，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丁未条。

华侨的活动仍继续发展。一些华侨为了安全，不断逃回中国。这就引起“闽抚遣贾舶招回久住吕宋华人”^①一举。1594年初，一支相当大的中国船队，由福建七名省级官员率领，载着士兵和武器到达马尼拉，招回流寓马尼拉的华人3 000人。刺杀达斯马里纳斯事件过后三年，即1596年，殖民当局又一次大规模驱逐华侨。这一年7月，莫加向西班牙国王报告，“我已经开始驱逐在菲华人，迄今已有1.2万人乘船回国。”1597年4月，新任总督弗朗西斯科·特略又报告西班牙国王：

考虑到可能引起的麻烦以及这里华人人数众多——大约1万人以上，……我已经驱逐一大批过去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不久我还要命令许多人离开，只留下为这个国家服务所必需的3 000或4 000人^②。在以后几年中，又有许多人从马尼拉遣配到各省，其借口是防止华侨对殖民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③。

关于“移润”。“润”就是润内，即帕利安。马尼拉及其附近是移菲华人的登岸地、旅菲华侨的最大聚居地；帕利安又是马尼拉及其附近华侨最集中的地方，可说是一个中国城。住在帕利安的华侨，在16世纪末年，通常在2 000—4 000之间。此外，每年大约有2 000以上从事中菲贸易的商人在此临时居留。润内华侨店铺约200间。自1582年建立以来，虽然迭经焚毁，但每次焚毁之后，又以更大规模重建。潘和五起事的消息传来时，殖民者即加捣毁，对居住其间的华侨，也横加迫害。在上引书函中，路易斯也不得不承认，“各属闻变，共议报冤，将城内旧润拆

①《东西洋考·吕宋》。

②BR, Vol. 9, PP. 266, 319—320; Vol. 10, P. 42.

③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36.

卸”。而被路易斯掩饰的真相是，“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吕宋者，尽逐华人于城外，毁其庐”^①，令华人在城外另一个地方设新涧。但新涧“起盖未完”，又借口“日本报警”，“再议移涧”于巴石河口的比农多岛，使华侨中心居留地更远离马尼拉。后来，一则因比农多岛的新涧于1595年8月毁于火，一则因一个重要商业区设在一个岛上，对于该城居民，对于主要经营面向马尼拉的商业的华侨，都极感不方便，于是，便把帕利安迁回马尼拉城旁。但新址是在圣加夫列尔要塞旁边，处于要塞的炮口之下。

对涧内华侨的掠夺也加紧了。例如，马尼拉市当局每年仅征自帕利安店铺的租金收入就达4 000多比索。租金之外，还要负担主管华人事务的最高法院法官和管理帕利安的官员的薪金。据说，仅那笔4 000比索的铺租，就足供马尼拉市的必要开支而绰绰有余，并可供今后营造公共建筑物之用^②。

在排华的狂潮下，不少华侨为了继续留菲谋生，不得不含辛忍辱，备受盘剥。素以贪婪著称的西班牙殖民官员乘机敲榨勒索。一些西班牙市民假庇护之名，把华侨藏在家中，让后者以其熟练的技艺为自己效力。殖民当局则以特许居留作为手段，既可满足西班牙移民社会所需要的华侨劳动力，又可趁发放特许证的机会，收敛钱财^③。

①《明史·吕宋传》。

②BR, Vol. 9, PP. 268—269, 231.

③BR, Vol. 4, P. 301. 华侨要获得居留许可证，在1612年（或1610年）以前，名义上每人需交付2里亚尔的费用，但主管发放居留许可证的总督或最高法院法官往往超额收费，以至高达20里亚尔（2.5比索），甚至5—8比索。有人估计，1602年仅此一项收入，即达6—7万比索。参阅BR, Vol. 12, PP. 104, 148—149;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P. 205—206.

总之，西班牙殖民当局在潘和五事件中，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而是象张燮所说的那样，“夷人故奴视华人，征赋溢格，稍不得当，呵辱无已时，犯者即严置以法。自兹衅既结，疑贰日深，夷益虜使我矣。”^①

^①《东西洋考·吕宋》。

第 四 章

1603年的华侨起义和菲西当局 对华侨的第一次大屠杀

一 华侨起义的背景

华侨移居菲律宾，纯为经济目的。他们利用当地社会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严重缺乏生活必需品，土著人没有能力从事商业活动，而在菲西班牙人又不屑于从事艰辛而又利微的零售业，致菲律宾内部商业渠道不畅的情况，相率从事商业，因而在商业领域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西班牙人既不能稍缺中国的供应，而他们在商业活动方面又只满足于坐享高利润的大帆船贸易，对菲律宾内部的商业活动，既不愿参与，也无法与华侨竞争。但他们对华侨的经济地位又妒忌，又忧虑，总是千方百计加以扼杀，因而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对中国输菲商品征收关税、停泊税，实行整批交易，禁止菲律宾人穿中国织品，并有禁止华侨商人、小贩在菲居留之议。经济上的矛盾，已成为西班牙人与华侨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

西班牙人在菲人数同华侨人数相比，经常处于悬殊的少数。16世纪70和90年代，又先后发生林凤进袭马尼拉事件和潘和五等刺杀达斯马里纳斯事件。虽然前者纯出偶然，而后者是殖民者对华侨“刑杀惨急”，致“激成此变”，但两事都触动西班牙人在

菲统治基础薄弱这个神经痛处。此后，他们一直把华侨视为西班牙在非统治权的一大威胁。虽然出于供应、服务方面的考虑，他们不能不容纳一定数量的华侨居留菲律宾，但自16世纪80年代起，就对华侨采取日益严格的隔离政策，90年代则一再大规模驱逐华侨。在西班牙人越演越烈的掠夺性措施和迫害政策之下，华侨对西班牙人的不满和反抗，也日益强烈。殖民者与华侨间的政治矛盾，也尖锐起来。

在西班牙人看来，要解决上述矛盾，就只有给华侨以各种打击。在采取掠夺、隔离、限制、驱逐等措施仍未能解决矛盾，而华侨的人数又达到西班牙人认为对其统治地位构成威胁时，殖民当局就制造或寻找借口，诉诸暴力，对华侨进行大屠杀。

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第一次大屠杀是在利用明朝官员到卡维特“勘金”一事，蓄意煽起反华歇斯底里，挑动华侨自卫起义的情况下进行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小吏，敛财成性。加以连年用兵，对内镇压各种变乱，对外进行援朝战争（1592—1598），“国用大匱”；又值乾清、坤宁两宫灾（万历二十四年）和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万历二十五年），修复乏资，“计臣束手”。于是，大学士张位乘机“请开采（金银矿）以充边储”；“四方言利之徒”，也纷纷奏请开矿，并徐及榷税。“上谕其议”^①。“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②这些“言矿者”，大都是一些谋取一己私利的佞臣、奸民。

万历三十年（1602）七月，曾在吕宋居留多年的木匠张疑，

①《东西洋考·税珔考》。

②《明史·陈增传》。

笼络京师禁卫武弁阎应龙^①等五人，联名上疏神宗，声称“福建海澄县机易山土产金银，备缸往淘，每岁可献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②后来奉命赴吕宋勘查机易山的中国专使高案，在致菲律宾总督的照会中，曾部分摘引张、阎奏折，现将摘引部分转译如下：

海澄城外，有地名吕宋者，中有机易山，独处大海。该山无所归属，土人无需纳贡。其地可采集巨额金银，故土人挥金如豆。尝见该地土人掘土取金，每户人家，贫者有金三甘塔（ganta），富者竟至百甘塔。……今陛下库中黄金枯竭，寻获无着，且往机易山取金，易如反掌，与征取陛下臣民相较，自不可同日语也。……至若采金所需人力物力，一应由小民独力承担。……两年之后，小民即以倍于所诺之金银数，亲奉陛下，彼时，不唯陛下可心满意足，即举国臣民，亦必喜不自胜也^③。

阎、张等人的奏章，完全是一派谎言，别有用心。但神宗昏聩，求金心切，竟致信以为真，接受机易采金议。“命下，举朝骇异”。都御史温纯上疏，指出该议为奸徒妄言，其意“不过假借朝命，阑出禁物，勾引诸番，以逞不轨之谋。”其他言官亦联

①《耶稣会会士在菲律宾，1581—1768》一书称阎为“百户阎应·龙”（Pehou Yameng Liang），而马尼拉大主教贝纳维德斯1603年7月上书西班牙国王时也把阎说成“姓龙，官职百户，名阎应”。见BR, vol. 12, P. 103.

②《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五，万历三十年八月丙戌条。机易山即吕宋岛的卡维特地区，“机易”即Cavite的对音。当时的菲宾律华侨多是福建海澄人，因把海澄以外大海中的卡维特地区，误作“福建海澄县机易山”。

③BR, Vol. 12, PP. 92—93.

章力争，神宗一意孤行，“皆不听”^①。

神宗即令福建官员赴吕宋勘查。事下福建，又起争议，致有海澄进士、翰林院检讨高克正《折吕宋采金议》^②，请福建当局“为万姓请命，以杜乱萌”。福建地方官员慑于朝命，勉强执行。于是，以宦官、海澄市舶、福建税监高案为首，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千一城随行，押张嶷往机易查核。这就是西史所称中国三官员马尼拉之行。

1603年5月中旬，高案等一行泊船于马尼拉湾入口处，先送照会^③给菲律宾总督佩德罗·阿库尼亚，说明此行是奉皇帝之命，前来核实机易是否产金，事毕归国，回报皇上，不拟逗留，请贵督放心，无需疑惧。照会语气，无疑是奉命公干一套，似乎没有强加于人之嫌。但平心而论，明廷派官员到吕宋勘查金矿一事，完全是无视别国主权的举动，是这个政权的大国意识的产物。

5月23日，三名中国官员获准上岸。这几名官员身处异邦，仍按国内官员出巡的仪式，摆排场，显威风，旁若无人。在离船前往总督府路上，他们穿着佩有司法标志的衣服和帽子，由携带棍棒、绳索等行刑工具的武弁、刀斧手及其他随从陪伴，前呼后拥地行进。不久，他们又在住处自设公堂，以国内的执法方式，受理华侨诉讼，传讯被告，对被认为有罪者施行刑罚。5月底，这几名官员决定拜会阿库尼亚。这是一次更为壮观的排场——带有戏剧色彩的游行队列。这支浩浩荡荡的行列，穿过看热闹的人群，在王家大街上行进，直到总督府前才停止下来。三名官员步

①《明史·吕宋传》；《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五，万历三十年八月丙戌条。

②《东西洋考·艺文考》。

③照会全文见BR, vol.12, PP.87—93.

入总督府去会见阿库尼亚。会见后返回寓所，前呼后拥的仪式照行无误。这些明朝官员在马尼拉的执法穿戴，无视当地管理当局的存在而执行裁判权，以及过分显示官威的仪式，都引起西班牙人的反感。特别是按中国方式执行裁判权，更是刺痛了他们的神经，从而招致阿库尼亚、最高法院法官莫加的干涉。前者还以总督身分，有针对性地颁令，“禁止中国官员在西班牙领土上执行司法权”，且不准他们离开马尼拉^①。

在马尼拉期间，中国官员同阿库尼亚会见两次。一次是在5月23日，由中国官员说明此行目的；阿库尼亚简单表示欢迎。第二次是在5月杪，阿库尼亚代表殖民当局要求高案等从速处理他们的事务，事毕立即回国。中国官员则重申此行是奉旨而来，不得不照旨勘查，一旦完成此项任务，便起程回国。

接着，阿库尼亚派一队士兵护送高案等到卡维特地区。在卡维特港上岸后，三官员问镣铐啣嘴的张嶷：此地是否即机易山。他点头称是。再问他金在哪里。他畏缩地回答，这里每一样东西都藏有黄金；机易的沙子确是沙子，但皇帝能够把沙子变成黄金。还说，你们已看到马尼拉及其财富，这足以说明，只要采取我无需明说的措施，控制马尼拉，它就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金银矿^②。几名官员莫可奈何，装上一筐泥土，以便作为物证回禀皇帝。然后，他们便取道马尼拉回国。

高案等“机易山探金”的荒唐事件，随着他们回国，本可结

①BR, Vol.12, PP.83—97, 103; Vol.15, PP.272—273;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P.203—204.

②我国史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如《东西洋考·吕宋》记载：阿库尼亚诘问中国官员“金豆是何树生来”，“嶷云：‘此地皆金，不必问豆所自。’盖嶷欲借朝命临之，袭破其国耳，至是不敢显言。”

束。但殖民者却抓住这一事情，制造谣言，加意渲染，以达到他们反华排华的预谋。中国三官员刚走，马尼拉就有谣传：中国官员是来察看菲律宾的国土，详细了解它的真情。因为中国皇帝想中断同西班牙人的关系，在年底以前派一支10万人的舰队来占领菲律宾。那位在1590年曾随三哥、施源企图到中国传教，但被当作间谍驱逐出境，现任马尼拉大主教的米格尔·贝纳维德斯，则同其他教士一起，宣称他们拥有可靠情报证明中国舰队很快就会前来进攻马尼拉，并警告总督和马尼拉市民密切注意该城的防务^①。必须说明，西班牙人在散播这些蛊惑人心的谣言时，心里也明白，以明当局当时的处境，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海上远征。他们从每年来菲的中国人中，确切了解中国内外交窘的境况。1603年7月6日，贝纳维德斯写信给菲利普第三时就说到，“中国皇帝由于〔各省矿监税使搜刮金银，勒索巨额贡赋〕而感到非常苦恼。此地华人毫不隐讳地对我说，他们认为两年内外，中国将爆发叛乱。”^②这正说明，马尼拉当权者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

中国官员在马尼拉期间，殖民当局便要求下属加紧警卫马尼拉城。中国官员回国后，他们更是全面地进行备战活动：

拆毁帕利安最靠近马尼拉城墙的那部分房屋，使两者之间有一段空旷的缓冲地。

加强马尼拉城的防卫设施，如修筑城墙，继续建筑要塞，役使华侨在帕利安和沿巴石河岸直到海边挖掘护城壕沟。

通报马尼拉邻近各省省长，要他们了解各自辖区内菲律宾人拥有武器的情况、可信赖程度等，并将情况上报总督；了解和搜查华侨，特别是石匠、烧石灰者、锯木工、渔夫、园圃农所拥有

^①BR, Vol.15, PP.274, 276.

^②BR, Vol.12, P.105.

的武器及粮食，并要这些华侨劳动者为王家仓库制造弓、箭、矛枪、火绳枪等军需品。

收集和储备粮食。

通令马尼拉邻近各省省长召集土著步兵部队，提出土著步兵队长人选名单，并为这些土著部队配备武器，供应给养，以便驱使他们为殖民者火中取栗。利用日本侨民与华侨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召集日侨头领，要求他们同西班牙人一道，做好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高价收购华侨铁器。殖民者搜查华侨武器之后，仍不放心，还虑及华侨可能以家用铁器制造或当作武器，便设计购买华侨的铁制器物。《明史·吕宋传》记载，西班牙人“声言发兵侵旁国，厚价市铁器。华人贪利尽鬻之，于是家无寸铁。”《东西洋考·吕宋》载：“夷遂决计谋杀诸流寓。诡言将征他国，凡华人寸铁，辄厚售之，即切肉小刀，价至数钱。”

殖民者制造、散播谣言，在社会上煽起对华人的恶感和仇恨，以及疯狂备战，都给人一种印象：以华侨作内应的中国“入侵”肯定要发生。一股反华、排华歇斯底里情绪，在马尼拉迅速滋长、蔓延。西班牙殖民者蓄意以谣言和战备行动煽起这种情绪，而让受其蒙骗者（西班牙市民、士兵，土著群众和日侨）以侮辱和暴行去挑动华侨的感情。在受蒙骗者中，不少人着眼于华侨社会的巨额财富，渴望谣言成为事实，以便趁乱掠取华侨的财货，或吞没华侨托管的财物。他们在马尼拉及其郊区，肆意凌辱、虐待华侨。市井无赖（一些是土著，另一些是日侨）和士兵，随意夺取华侨的财物，并咒骂华侨是猪、狗和叛徒。他们公开地在大街上威胁华侨，说他们也知道华人终将造反；但在华人行动之前，他们很快就会杀死所有的华人，因为总督正在为此做准备。或者说，如果听到中国舰队入侵的消息，他们就先杀死在这

里的华人，再去同入侵者对抗。一些不良日侨，更是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地向华侨吹嘘，总督已请他们参加屠杀中国人①。

这一切，无疑向华侨敲起警钟：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将要降临到他们头上。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担心，已支配了华侨的头脑。这时，尽管阿库尼亚几次亲自到帕利安，召集有影响的华侨开会，极力解释有关屠杀华侨的流言纯属造谣，但没有人相信他。阿库尼亚的这一姿态，是要麻痹华侨，解除他们的思想武装，以使大屠杀顺利进行。

二 华侨起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 第一次大屠杀

西班牙殖民者掀起反华、排华歇斯底里，旨在制造屠杀华侨的借口。莫加在叙述殖民当局的备战以及土著、日侨和士兵对华侨的挑衅性行动之后评论说，“对华人来说，仅此便适足以促使他们有必要去干他们原来没有打算干的事情。”②

官逼民反。巴石河北岸的华侨劳动者清楚地认识到，按照西班牙人的计划，他们的毁灭是肯定无疑的。他们不想坐以待毙，因而推举孙大（音译，教名胡安·翁塔）为领袖，开始筹划起义。他们在顿多村靠近马尼拉的一个隐蔽地点修建堡垒。

这时，马尼拉及其近郊的华侨，对起义的态度有三种：一小部分人死心塌地地投靠西班牙殖民者，这主要是华侨基督教徒中

①BR, Vol.12, PP.153—154;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208.

②BR, Vol.16, P. 32.

的少数人，以及一小撮华侨败类。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西班牙人的朋友，或为洗刷自己的罪行，纷纷戴上假发辫，乔装打扮，混在侨众中，刺探消息，甚至不惜捏造情节，向当局报告所谓华侨很快就举行叛乱等“消息”。帕利安的小工匠、小商人等，在起义前八天（大约是9月25或26日）就开始逃离原居处，到巴石河北岸的华侨菜农、渔夫、盐工、石匠、铁匠、织工、烧炭者、马车夫和木匠那里寻找安全所。这些人积极支持和参加起义，是起义的中坚力量。帕利安的富有华侨商人，为保身家财产，开始把自己的财产和货物转到城内，托西班牙朋友保管。他们同一部分华侨基督教徒一起，对形势采取观望态度，既不愿与起义者为敌，也不愿与殖民当局对抗。

华侨富商黄康（音译，教名胡安·包蒂斯塔·贝拉）属于第三种人。他是华侨领袖，这一年由华侨推举，再任帕利安华人管理官。起义前，黄康把华侨正在酝酿暴乱的消息报告总督。总督派他到河北岸，劝阻正在进行的“鲁莽行动”。但当他到达北岸时发现，由于他养子孙大的努力，起义思想在群众中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形势的发展，已非他的能力和影响所能挽回。孙大企图挽留他。群众看中他的政治经验（多次出任帕利安华人管理官）、活动能力及其在华侨社会中的威望，推举他为起义领袖，孙大也公开宣布他为起义领袖。但黄康始终拒不接受这一地位，并设法潜回马尼拉。10月3日，在黄康不在家的情况下，西班牙士兵闯进他的家，发现其黑人仆役拥有大量火药。当局不问这些火药是用以制造爆竹，还是制造枪弹的，便在黄康回到马尼拉向总督报告河对岸的华侨已经结集，即将起义的消息时，将他逮捕关禁。10月11日，黄康被误作起义领袖处死。在场的一名西班牙神父格雷戈里奥·洛佩斯说，黄康象一名基督教徒那样死去，他把对他的判决作为对他的罪孽的一种惩罚来接受，但直到他死前，他

还断言，他是清白无罪的^①。他的1.5万比索巨额家财也被殖民当局没入国库。黄康是第三种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死也是殖民者狂斩滥杀华侨的一个典型事例。

起义的组织者曾经劝说留在帕利安的商人到河北岸参与他们的行动。但这些商人因怕与西班牙人为敌招来灾祸，而无动于衷，仍留在帕利安，守护着自己的身家财产。形势的发展是无情的。那些市井无赖和士兵，轮番地抢掠他们的家财货物，而且还在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抢劫。富有的华侨商人于是寻求当局的庇护，要求准许他们带着最值钱的货物进入城内。贝纳维德斯大主教支持他们的要求，并在城内为他们指定一个临时居留区——一个便于软禁、监视他们的地方。即令这种带侮辱性的许诺，也遭到许多西班牙市民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些华侨商人是一只“特洛伊马”，可能同那些不大可靠的黑人奴隶联合起来，从内部夺取马尼拉。

起义者原定于11月底的圣安德鲁节举义，后因事机不密，为当局所获悉，因而决定提前行动。

10月3日夜里，在顿多附近修建的堡垒中，聚集了两千华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从马尼拉一带集拢而来。起事在即。

约深夜11点钟，起义开始了。起义者首先袭击殖民军的一个头目埃斯特万·马基纳的乡间第宅，杀死马基纳及其家属等20多人，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接着，起义者进攻基亚坡村，杀死在这里过夜的一名西班牙神父，烧毁这个村庄，然后返回堡垒。此时，

^①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 215,
BR, Vol. 14, P. 130.

起义人数已达万人左右^①。他们所用的武器，仅是矛枪和棍棒，利器特别是火器非常缺乏。按照计划，在焚毁基亚坡，廓清侧翼之后，下一步将进攻顿多，占领它的重要据点和教堂，以便于控制顿多以北、以西一带地方，然后南向巴石河推进，以人数上的优势压垮比农多的西班牙人，使北岸尽入起义者之手。他们预料，黄康这时会集合帕利安的华侨起而响应，扫荡马尼拉南郊的敌人。这样，他们即使不能强攻马尼拉城，也能把城墙内的西班牙人困至粮尽投降。

华侨起事后，仍未知悉黄康被捕。为了增强起义者的斗志，孙大还对起义者说，起义的领导人是他的养父黄康，并预言很快就会听到黄康在对岸行动的消息。他们准备在第二天进攻顿多。

前总督路易斯·P·达斯马里纳斯通常住在比农多。10月3日晚上，他先是听到非常大的喧闹声，许多人的奔跑声，以及不时从远处传来的喇叭声。接着看到远处（马基纳家）火光冲天。他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估计起义者会进攻顿多，便连夜派人渡河到马尼拉，要求阿库尼亚给他增援。4日早晨，由正规军和马尼拉西班牙市民组成的援军，由阿库尼亚的侄子托马斯、顿多省长阿尔塞加（原任庞邦加省省长）等四人带领，到达比农多，支援路易斯。后者以大约70人守备比农多，自己带着其余约140名火枪手到顿多村，企图抢占该村的石造教堂。同一时刻（11时），1500起名义者也来到这里，两军相遇，激战一个钟头，守备比农

^①关于这时参加起义的确切人数，众说不一，差落极大。从2 000至1.2万不等。对于这些数字，笔者认为菲律宾最高法院所用的1—1.2万较为可靠。因为这个数字是1603年12月12日，即起义失败后一个月使用的；这时，对起义者的审讯、刑罚已告一段落。参阅BR, Vol.12, P. 143; Vol.14, P.122;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210.

多的70名西军也前来增援。起义者的棍棒矛枪，敌不过火枪的排射，牺牲500人，被迫退回堡垒。路易斯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决定追击。但追至一片林中洼地时，他们掉进长满芦苇的烂泥潭里，无法自拔，火药筒被浸湿，导火线熄灭，火枪也掉进污泥中。起义者乘势向敌人反击，用棍棒把敌人逐个打死。这支殖民军，除四人逃生外，全军覆灭。起义者在战斗中缴获一批火器；路易斯和阿尔塞加的首级，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这支精锐部队的覆灭，使马尼拉城的守备力量顿遭削弱，城防危急。为对付起义者的攻城，阿库尼亚派信使到庞邦加和布拉干，命令两省省长立即会同土著部队，前来救援。

10月5日，星期日。起义者按计划等待黄康在帕利安的行动，以便配合进军马尼拉南郊。但他们一直未看到帕利安起事的迹象，相反，却看到那里的侨商，在面对帕利安的城门——帕利安门进进出出。原来，阿库尼亚终于同意贝纳维德斯的建议，“邀请”华商带着他们的商品进入城内，借此割断帕利安华侨同起义者的联系，减少马尼拉城的威胁。不过，华商虽乐意把货物运进城内托管，却拒绝入城居住，因为他们担心西班牙人此举有诈。在西班牙人看来，即使是货物寄存在城内，也可以稳住这部分商人，使之不得不考虑与西班牙人敌对的后果。起义者隔河看到华商把货物运进城内，顿时明白这些商人并未与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连孙大也无法解释。起义者认为受了孙大的欺骗和愚弄，便立即处死孙大，其家人也被杀害。孙大临死时大叫：黄康欺骗了他和全体起义者。米格尔·翁梯和阿隆索·萨戈伊^①被起义者推为最高指挥。是夜，起义者求签卜问

^①这两人当是华侨基督教徒。根据教会当局的规定，凡皈依基督教的华侨，在受洗礼时，除削发外，还必须改用西班牙姓名。

起义的结果。签语显示：他们能攻占马尼拉。他们连夜派人去帕利安，说服那里的华侨参加起义。但后者坚持中立立场^①。

6日早晨，起义华侨群集巴石河畔，准备渡河。阿库尼亚自知无力阻挡，便派人在帕利安纵火，然后紧闭帕利安门。华侨过了巴石河，进入浓烟滚滚的帕利安，杀死那些坚持与起义对抗的人，号召其余的人参加起义。他们沿着最近的胸墙，用缴获的火枪向城墙上的西班牙人射击。殖民者令西班牙人、日本人和土著连队防守各段城墙。起义者扛着云梯，手执棍棒、矛枪以及少数火枪，冲到城下。一部分人架置云梯，企图登城；另一部分人试图用棍棒和斧头，砸开城门。敌人则凭他们的枪炮和居高临下的有利地位，疯狂地向起义者射击。华侨由于缺乏火器，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相互配合，虽然自早至晚，反复攻城，但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到帕利安和迪劳两处石教堂。阿库尼亚趁此机会，在暮色掩护下，又派人到城外周围放火，企图使攻城者无所凭借和掩护，并为第二天出击做准备。城东南的圣米格尔、迪劳和城南的巴贡巴扬都陷于火海之中。起义者彻夜赶制战车、可移动的掩体、云梯、焰火以及其他作战器械。

7日黎明，起义华侨对马尼拉城展开猛烈的进攻。城墙上的敌人拼死抵抗。起义者在器械、人员方面均受到重大损失，再次退回帕利安和迪劳。接着，阿库尼亚命胡安·J·加利纳托带领50名西班牙火枪手和500名日本步兵，开出了迪劳门。以日本步兵为前导，西军殿后，向起义者展开进攻。起义者退守之后，猝然受到攻击，500人牺牲，多人受伤，被迫放弃迪劳教堂，但随即组织反击，迫使日本人和西班牙人撤离迪劳教堂，退回城内。起

^①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212;
BR, Vol.12, P.144; Vol.14, P.124.

义者乘胜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只是凭着优势的炮火，西班牙人才勉强打退起义者的进攻。但马尼拉城的威胁未能解除。

在这重要关头，路易斯·贝拉斯科率领1 000布 拉干、庞邦加土著部队抵达马尼拉。他们乘战艇溯巴石河，靠近帕 利 安 和迪劳，突袭两地华侨起义者，纵火焚烧帕利安。迭经大火的帕利安完全化为灰烬。300名最富有的华侨巨商陷身火海，为免落入西班牙人之手，他们或者悬梁自尽，或者在火中与财产同归于尽。看到土著士兵正在摧毁帕利安，并且大肆劫掠，日本人、西班牙士兵也赶来抢夺。他们杀死所遇到的每一个华侨，把抢掠的丝织物和其他贵重商品，装满箱子、布袋，甚至裤子也脱下来充作载具。劫掠由下午持续到夜里。在这次作战中，被杀华侨 达1 400人，另有400人被迫投降。

起义者在敌人两面夹攻之下，看到无法在马尼拉同敌人正面对抗，便放弃进攻计划，把队伍分成三部分，退往内地：第一部分到巴石城，第二部分到阿荣邦，第三部分到内湖省的圣巴勃罗（即我国史籍所称的大崙山）和巴坦加斯^①。

阿奎尼亚一面命令贝拉斯科带500名西兵、1 000名土著兵，追击撤退的华侨；一面传话给各地村民，要他们杀死所遇到的华人。贝拉斯科率军打败了开往巴石城和阿荣邦的两支起义队伍，并将起义者全部杀戮，然后，带70名西兵追至圣巴勃罗山，又屠杀了大批华人。但这个恶贯满盈的剑子手，在稍后冲入起义军营

^①BR, Vol. 16, P. 40. 关于起义华侨撤往内地，另有一说是分成两支，一支约2 000人，撤往巴石城，同样人数的另一支撤往卡兰巴地区。参阅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 215. 笔者采用莫加的说法。阿荣邦今地不详。

地时中伏，连同10名西兵被起义者击毙。其余西兵撤回马尼拉。华侨继续在圣巴勃罗山和巴坦加斯设防自卫，并力图说服当地人民同他们联合，共同抗西。但因土著人受殖民者蒙骗（后者利用土著人的宗教感情，进行反对“中国异教徒”的煽动等），不仅拒绝合作，反而参与对华侨的屠杀。

阿库尼亚听到贝拉斯科被杀的消息，非常震怒，决心消灭起义者，便于10月20日派克里斯托瓦尔·阿斯科埃塔领200名西兵、400名日本人、2000名庞邦加土著兵和200名摩洛哥人、300名黑人开赴圣巴勃罗。他们查清起义者的营地和退路，逐一占领战略地点，封锁一切通道，然后向华侨营地进攻。华侨经过顽强抵抗，折损400多人后，退至附近一个高地。第二天，阿斯科埃塔又发动大规模进攻。起义者拼力抗击。战况惨烈，华人牺牲者达1400人，幸存的300人散匿于附近的灌木丛和树林之中。第三天早晨，殖民军对幸存者进行搜捕，300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西军在圣巴勃罗休整三天，便开赴巴坦加斯，因为他们获悉在巴坦加斯海岸一个村子里，聚集着一支2500人的华人起义军，正打算乘船回国。西军经过五天行军，方始抵达该村附近。第二天，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华人仓促应战，兼以武器落后，无法抵挡，在混乱中被杀1100多人，其余逃进内陆山区。西军命200名庞邦加土兵进山追击。几日之后，这些逃生者也被斩杀净尽。

这时是1603年11月12日，即华侨首义的第41天。至此，马尼拉华侨所发动的抗暴起义以失败告终。

起义的失败，并非由于华侨缺乏斗争精神。这批海外孤儿，处于西班牙殖民者暴虐相待，屠刀相加的绝境中，不畏强暴，不顾军事上的劣势，不考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奋起抗争，前仆后继，一干到底。这种英雄气概，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大无畏精神。

起义的失败，也并非因为华侨缺乏团结。据估计，起义前，马尼拉华侨人数是1.6万或1.8万，加上同年随船来菲华人，总数可达2万。这仅是领取了居留证，因而可以统计的人数；还有不少华侨是因无力缴纳领证费用或其他原因，私住下来的。当时马尼拉华侨总数，比较普遍引用的数字是3万人^①。这3万人中，大部分对起义持积极的态度。例如，据莫加记载，黄康为了解将要参加起义的人数，要每个参加者给他一管针，放进一个小盒子里。结果，针数最终达到22 150管^②。不管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如何，这个数字却反映了绝大部分华侨是同仇敌忾，团结抗暴的。起义的第二天，即有1—1.2万人参加起义；在起义计划泄露，不得不提前行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致对敌的精神，是不可能在此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有这样多的人冒险参加抗争的。许多华侨基督教徒也参加义军，甚至成了起义领袖。进入马尼拉投靠殖民者的，只有300名教徒。最初对起义抱观望态度的帕利安商人，6日也大部分加入了义军行列；那300名最富有的华商最终自杀，也是为避免受西班牙人之辱而采取的最后行动，宁死不辱。在起义开始走下坡路以后，战斗屡遭败绩，人员成百上千地牺牲，斗争处于绝望之中，但除了前述400人6日被迫向殖民军投降之外，再没有发生过另外的分化。这在任何群众起义中，都是不多见的。

起义的失败有其根本原因。一是缺乏利器，特别是缺乏火器。由于起义者的绝大部分武器是棍棒和矛枪、日本刀、弯刀，因而只有近战，才能有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密集的人群能够接近敌人之前，敌人的炮火，已使他们成百累千地倒下，无法继续前进。这就是殖民者以极少数的

①BR, 12, Vol.12, PP.147, 168.

②BR, Vol.16, P.33.

伤亡，而能屠杀成千成万起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起义者缺乏必要的军事经验，因而在组织进攻，配合作战方面，都显得混乱，战术单调，一味硬拼，以致过多过快地消耗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责怪起义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和平的商人、匠人、劳工；而且，起义的时间短促，他们还来不及从战争中取得军事经验，就在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遭到彻底的失败。

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殖民当局对华侨肆意残杀，犯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屠杀华侨，而且根据阿库尼亚的命令追杀溃散、丧失战斗能力的起义者。甚至和平的华侨居民也惨遭杀害。例如，庞邦加省省长阿瓦洛斯抓到400多名华侨居民，“把他们两个两个地连铐起来，带到一条河的河口，转交给日本人，将他们全部杀死。”^①

殖民者在40天中所杀害的华侨总数，在历史文献中，说法纷纭，但基本上可归纳为三个大概数。一是菲律宾的西班牙当权者所用的数字。贝纳维德斯1603年12月16日给西王的信中说，所有参加起义的中国人，除了留下少数为陛下服役之外，大约1500人（显然是“1.5万人”之误——引者）已被杀死^②。阿库尼亚1605年7月致福建巡抚徐学聚的覆函则称：华人叛乱时被杀者不到3万之数的一半^③。

另一数字分见《明史》卷三二三《吕宋传》：华人“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明神宗实录》：吕宋酋长“屠戮商民二万余”^④；《东西洋考·吕宋》：华人“计捐二万五千

①BR, Vol.16, P.42 note 15.

②BR, Vol.12, P.151.

③BR, Vol.14, P.47.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〇四，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午条。

人，存者三百口而已”；马尔多纳多《1603年华人起义》：在全菲律宾有2.2万华人死亡，存活者不到800人^①；阿尔亨索拉《摩鹿加群岛征讨记》：这次“起义丧失了2.3万多华人的生命，只有500人留下来，从事大帆船苦役。”^②

第三个大概数，见于福建巡抚汤兆京、福建税监高案、福建巡抚徐学聚等三人，在万历三十三年二月致菲律宾总督、最高法院和大主教的信函（三函内容相同），其中说：“流寓吕宋华人三万余人惨遭杀戮。”^③

这三个大概数中，第一个及第三个，因涉外交需要或其他政治上的考虑，都有可能将实际数字任加窜改。这次华侨被杀人数以2万至2.5万之间的数字较为可信。因为起义前全部2万多到3万华侨中，有部分商人、基督教徒以及小部分其他人（如充当西班牙人鹰犬者）没有参加起义，一般不致被杀；也有一部分起义者以各种方式，例如利用与土著人的亲善关系，在后者的掩护下，隐瞒着身分躲起来，或藏匿山林中，而得以逃脱劫难。至于300—800名被置于大帆船中服苦役的幸存者，当是起义者中的被俘或投降人员，而不是指菲律宾全体华侨的仅存者。

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殖民当局对华侨财产肆行抢掠和焚毁，使华侨遭受巨大的损失。由于西班牙当局在帕利安及马尼拉南郊几次纵火，使华侨的住所、财产、货物遭到无法计算的损失；起义前夕和起义开始后，日本侨民和土著人中的不良分子、西班牙士兵的强取和劫掠，使华侨在财产、特别是贵重商品方面损失惨重。仅上述6日对帕利安的那次抢掠，就使8万比索资财一扫而

①BR, Vol.14, P.134.

②BR, Vol.16, P.295.

③BR, Vol.13, P.288.

空^①。从可见的统计数字看来，给华侨财产造成最大损失的，是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侨财产的没收。

当局没收华侨财产，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将华侨商人寄存的贵重商品变卖没收。如上所述，华侨商人经阿库尼亚同意于10月5日将其贵重商品存放马尼拉城内。这些商品实值多少，由于寄存者有的被殖民者所杀，有的在战乱中死亡，已无从查核。但不久即由总督、最高法院和财政会议一致决定，将这批商品中的一部分卖给西班牙人，将其所得现金3.6万比索存入国库，以充军饷；其余则尽由受托管的西班牙人攫为己有^②。二是没收参加起义、或被怀疑参加起义的华侨的财产。例如没收黄康1.5万比索的财产。这部分华侨财产数量也是相当大的。

据德拉科斯塔神父所引用的数字，阿库尼亚后来归还少数幸存侨商7万比索，那是他们寄存城内的商品值。另有无人认领的、值36万比索的商品，阿库尼亚将之作为赏赐，分给“得胜部队”^③。当局藉没华侨财产数值之大，仅此亦可见一斑。当局这种掠夺行为，已使不少华侨直觉地感到，西班牙人是为了攫取他们的财产，才下毒手夺去华侨的生命的。为了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形象，阿库尼亚不得不在1604年上半年，象征性地发还华侨存放马尼拉的财产^④。至于被没收的财产与被发还的财产之间的悬殊比例，仅从上面提到显然是经过大大缩小了的（36万比索）以及经过夸大了的（7万比索）数字，也可窥其大概。

①余焯：《一六〇三年菲律宾华侨惨杀案始末》，香港《新亚学报》第9卷第2期。

②BR, Vol.13, P.223; Vol.14, PP. 38—39.

③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215.

④BR, Vol.13, P.222.

三 大屠杀后菲西当局面临的 经济、军事危机

在镇压华侨起义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兴高彩烈，在马尼拉疯狂地欢庆他们的胜利。各个教堂都敲响了祝捷的钟声，并向冥冥之中帮助他们取胜的上帝颂恩。刽子手阿斯科埃塔的队伍，受到阿库尼亚、最高法院成员和全城西班牙人的盛大欢迎。阿库尼亚向庞邦加士兵的全体队长说尽了恭维话。参与镇压华侨的庞邦加人、日本人，每人都获得一大份劫掠品，主要是黄金、白银、现金和珍珠。阿斯科埃塔除获其他奖赏之外，还在马尼拉郊区和邦加斯南各得一个极佳的庄园^①。

祝捷的钟声犹在人们耳际萦迴，欢庆胜利的热烈场面仍历历在目，西班牙人就已发现：自己处于自身促成的经济、军事危机之中。

随着战争的结束，马尼拉经济萧条，物质匮乏的困难便接着开始了。华侨人数的急剧减少，使曾经是那样繁华的马尼拉顿时冷落下来。被萨拉萨尔大主教引为骄傲的帕利安已化为灰烬；种类繁多、令人喜爱的商品早已变成殖民政府、殖民军、雇佣军的赃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菲律宾提供日常用品、食品以及其他服务的华侨商人、工匠和劳工，在殖民者的屠刀下已化成累累白骨。结果，在马尼拉，“当时，没有裁缝，没有鞋匠，没有厨师，也没有农夫和牧人。”^②莫加和阿尔亨索拉

^①BR, Vol.14, PP.134—135; Vol.13, P.314.

^②转引自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 - Chinese Relations, P.40.

都以几乎相同的笔调哀叹：这次战争停止，就是马尼拉匮乏的开始。由于华侨的急剧减少，各种手作行业全停止了，没有手工艺品，没有鞋子，没有粮食，甚至以极高的价钱也买不到^①。事情还不止此。包括阿库尼亚在内的西班牙人还认为，由于加诸华侨的大屠杀，将挫折中国人同在菲西班牙人的交往，使得惯常运载粮食和货物来菲的中国商船不会再来^②。其后果将是：马尼拉国库将丧失5.2万比索以上的常年关税收入；在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备受欢迎的中国织品将要升价^③；供应马尼拉的粮食，供转口到墨西哥和其他地方以赚取高额利润的中国商品，将因之中断。这样，用阿库尼亚的话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就无法维持，西班牙也不能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支撑菲律宾的开支。“因为，中国商人在这这里缴纳的税款，以及那些转运织品的商人在新西班牙缴纳的捐税，总数大大超过这里的开支总数；纵使我们除了正常的开支之外，总是同这个或那个敌人进行战争。”^④这一次，由于殖民当局紧接中国官员的离开而进行的疯狂备战活动，以及接下来的镇压华侨起义，军事开支浩大，财政上早已捉襟见肘，只能向马尼拉的西班牙市民借贷度日；而墨西哥每年拨来的财政津贴，甚至不够偿还这些贷款。他们已不能再经受中菲贸易断绝的打击了。

在军事上，殖民当局虽然取得了镇压起义的胜利，但危机感却反而突出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屠杀华侨一事感到心虚，担心幸存者会向中国当局说明同胞被惨杀，财产被劫掠、籍没的情

①BR, Vol.16, PP.42, 295.

②BR, Vol.16, PP.43, 296; Vol.12, P.156.

③BR, Vol.12, PP.156—157.

④BR, Vol.12, P.159.

况，明廷因此会集结舰队，越海前来，兴师问罪，为国人报仇^①。菲律宾群岛孤处一隅，四面受敌，守备薄弱，与西班牙或墨西哥相隔重洋，远水近火，一旦有事，势难救援。整个殖民者社会为此忧心如焚，尤以大主教及各教会为甚。他们对“中国舰队进攻”的恐惧，已达到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程度^②。

殖民当局甚至对明达瑙摩洛人以大军进袭莱特、萨马两岛的严重局势，也无暇顾及而专注着中国的动静^③。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硬着头皮，拨出经费，驱使土著人和幸存华侨，继续构筑和修理防御工事：在城墙上增建若干棱堡，加高部分城墙，在城墙外围开挖护城壕沟，建造其他必要的工程，修复要害点的要塞，修理和装备新旧战船，如此等等。

当西班牙殖民者刻意加强战备的时候，军队的待遇，却由于财政状况恶化而变坏。军饷只能分两期发给；发饷所用的银子，也是借来的。正当军队急需充足供应的时候，士兵却由于没有口粮分配而挨饿。种种困难，造成士气低落，而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又使殖民当局恐慌万分。

马尼拉许多富有的西班牙人，对形势悲观失望，纷纷准备离菲，另觅出路。1604年6月，趁两艘帆船开往墨西哥之机，有一批富人带上他们的财产，举家赴墨西哥。

四 中、菲当局关于屠杀案的交涉

殖民当局为从窘境中解脱出来，除了一再上书西班牙国王，

①BR, Vol.16, PP.43, 296; Vol.12, PP.157, 139, 145.

②BR, Vol.12, P.157; Vol.13, PP.225—226.

③BR, Vol.12, PP.162—166.

要求他命令墨西哥总督拨给一笔相当大的款项外，便着力修补同中国的关系，借以消除所谓中国进攻的威胁，并争取中国商人恢复对菲律宾的贸易。

阿库尼亚为此一面在马尼拉做些表面工作，如部分发还帕利安华侨商人存放在马尼拉的财产，并发动幸存下来的华侨商人，写信给死者的国内亲属和商务合伙人，企图以此证明西班牙殖民者“清白”；一面派遣马科斯·奎瓦，由两名修道士陪同，带领140名西班牙人，携带致广东、福建两省巡抚和其他官员的函件，以及华侨商人写给国人的信，于1603年12月10日乘船前往澳门，中转广州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并趁机刺探中国有否进攻菲律宾打算的军事情报^①。上述信函内容，无非是按当局的口径，一是说明屠杀事件的所谓真相——华人起来叛乱，西班牙人被迫杀死他们；二是保证华侨商人委托保管的财产，将一律附以优厚利息偿还，西班牙人所欠和平华侨的债务，也要偿还；三是通知中国商人，今后仍可来菲律宾进行贸易，“并将受到热诚的欢迎，但他们必须于同年随船回国。”^②阿库尼亚考虑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对中国的风俗习惯、形势和谈判方式等，都有更详尽的了解，因而想在奎瓦与中国当局的交涉中，取得澳门当局的帮助，以便更好地达到交涉的目的。所以，他也写了几封信，详述华侨起义事件，并附上致中国官员函件的副本，着奎瓦分发给澳门的司令官、主教、在政务方面有较大发言权的耶稣会诸神父，以及其他教会和有影响的人。

奎瓦一行因遇风暴，于第二年2月折回马尼拉。2月25日又由

^①BR, Vol.12, P.157.

^②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P.216;
BR, Vol. 12, P.157.

150名西兵和一名神父陪同，再度赴澳门。抵达澳门后，奎瓦立即转送阿库尼亚分致澳门葡萄牙人的信件，并将当局致中国地方当局的函件交给澳门当局，托他们转送中国官员。但葡萄牙人出于减少贸易竞争对手的考虑，不愿菲西当局同中国修好，始终未将函件转交中国方面；只是表面上对奎瓦等虚与委蛇，假意应付。因此，奎瓦在澳门逗留期间，一直未获中国方面的答复，因而与中国当局交涉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们也未虚此行。第一，奎瓦等抵达澳门的消息传到漳州，即有几位常川往来漳州和马尼拉的富商关三（音译，下同）、施奴、郭春到澳门与他们相见，答应替他们把函件转交中国官员，并表示回漳州后，设法动员华侨去马尼拉进行贸易。第二，奎瓦在澳门亲自了解到，中国政府已知道华侨起义及遭受屠杀的消息，但全国平静，没有集结舰只进攻马尼拉的迹象。第三，他们在澳门购买了一批西班牙殖民当局短缺且急需的军事物资：火药、硝石和铅。奎瓦一行于5月回到马尼拉。

有关上述史实，中国史籍的记载与西班牙文献记载相符。《明史·吕宋传》说：殖民者屠杀华侨后，“酋寻出令，诸所掠华人资，悉封识贮库。移书闽中守臣，言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帑。”《东西洋考·吕宋》也有类似记载。还有史籍说，“酋犹虑中国兴兵问罪，入广东香山澳侦谍，中国乃寂然。”^①

奎瓦等带回的消息，使马尼拉西班牙人前虑大消，对这个殖民地的前途又恢复几分希望。当年5月，大约在奎瓦返回马尼拉不久，即有13艘中国商船，载着食物和商品，抵达马尼拉。这同常年来菲的30—40艘的中国商船数相比，为数不多，所载货物也较

^①何乔远：《名山藏》册六二《王享记三·吕宋》，香山澳即澳门。

常年大为减少，但西班牙人从这支小商船队的到来，看到中国商人是愿意继续前来做生意的，中菲贸易并不因前事而中断。为了吸引更多华商今后继续来菲，以恢复正常贸易，殖民当局一反常态，作出一些让步：华商鉴于西班牙人过去常常赊欠不还，损失甚大，所以，这次要求现银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殖民当局默许这种办法；往日，华商只能在帕利安停留和发售其运来的货物，不准进城住宿、销货，现在，由于帕利安被毁，准许华商进城居留，在城内出售货物，并破例准许他们自由进出马尼拉；过去，西班牙人对华商的货物予取予夺，现在则申明，未经华商同意，不得擅自拿走。

由于这次华商来货不多，且西班牙人已经受几个月匮乏的折磨，所以货品供不应求，进口税收入也因而大减，同时因无货转运墨西哥，又少了一笔出口税收入。据统计，1604年（当指1603年11月至1604年5月这个中国商船来菲年度），征自中国货物的进出口税总额，比1603年少了4万比索^①。所以，殖民当局亟望明年有更多的华船华货来菲。

为恢复中菲贸易，当局从1604年开始，在旧址重建新帕利安，并于1605年1月修建完毕。

1604年来船年度过后不久，西班牙人很快又感到商品严重缺乏，大帆船贸易回程无货可运到阿卡普尔科。他们渴望华商明年运载更多的商品，提早来菲。但时至1605年5月底，虽然西班牙人望眼欲穿，还是看不到华船的半片帆影，有关华船的消息一点也得不到。相反，却从澳门传来消息，说中国已调集一支军队，准备前来兴师问罪，为死难同胞复仇。这又使西班牙人惊惧不已。事实上，这只是一次误传，大概是将明神宗说的“吕宋酋擅杀商

^①BR, Vol.13, P.223.

民，〔福建〕抚、按议罪以闻”^①，即着福建官员“移檄吕宋”，数落西班牙当局杀戮我国商民的不是，错当兴师问罪了。这种误解，完全符合他们当时的徬徨心理状态。

屠杀案发生后，通过逃难回国华侨的传播，福建当局及明廷也逐渐了解事件真相。对于这样惨重和如此损害国威的事件，明廷理应郑重交涉，维护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岂料明廷一本其贱视、仇恨华侨的态度，竟作出亲痛仇快的反应。

对于导致1603年大屠杀的原因，明廷不是归罪于西班牙殖民者仇视华侨，蓄意挑衅，借机肆行屠杀，而是把近因归诸“张嶷等无端欺逛朝廷，生衅海外，以致三万商民尽遭屠戮，损威遗祸”^②；把远因归诸“奸商前年〔1593〕杀其酋长，积怨蓄憾”。是中国人“有以激之”，因而西班牙人屠杀华侨以万计，“情有可原”。据此，明廷便差官将张嶷押解至京，与阎应隆一并究问，将张嶷梟首传示海上，以此敷衍国内群情，减轻明廷与西班牙殖民当局进行交涉的压力。这种杀人者有理的论调，不啻是为西班牙殖民者解脱。

明廷对屠杀案的第二个反应是，与传旨将张嶷梟首的同时，着福建巡按汤北京、福建税监高棗和福建巡抚徐学聚等“移檄吕宋”。这份《谕吕宋檄》于1605年5月底或6月初，由中国贸易船队中一名船主胡安·三带到马尼拉，分交菲律宾总督、马尼拉最高法院和马尼拉大主教。《谕吕宋檄》中文本已不见世，现传世的，一见于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③中间的引文，起于“檄传谕佛郎机国酋长、吕宋部落知道”，止于“有司再请天

①《明史·吕宋传》。

②《明神宗实录》卷四〇四，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午条。

③《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三，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

怒，且及一旅，仅赖釜山，播州白骨在望，能不噬脐？”内容完整。一见于当时的西班牙文译本，该本的英文译文见于《菲律宾群岛》第13卷，题为《中国官员致阿库尼亚的信》。但西班牙文译本及其英译，与《疏》中引文对照，误译殊多，故引用时以《疏》中引文为宜。

《檄》全文给人以炫耀国威，色厉内荏，是非不分，出卖华侨，放弃原则，舍本求末，例行公事，敷衍了事，仅求顾全大国面子的印象。

《檄》谴责“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追溯“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贸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隩区，甲诸海国”。反诘“此辈何负于尔？有何深仇遂至戕杀万人？”但对这桩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尊严的公案，檄文未进一步严加追究，伸张正义，并要西班牙殖民当局保证华侨今后生命财产的安全，便忙不迭地反复引用明神宗的话，宣布对殖民者“不忍加诛”，“其海外戕杀姑不穷治”，并转而仅要求西班牙方面“当思皇帝浩荡之恩，中国仁义之大”，从而暴露明廷对屠杀事件的软弱态度，大大降低《檄》的严肃和郑重性。

檄文充分显示明廷贱视华侨的态度。明政府一贯贱视华侨，将华侨视为弃民。但在涉外文书中，竟然也表现这种思想，并将之传达给屠杀华侨的一方，明确无误地向外国刽子手和劫掠者宣布“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这无异于向企图杀绝华侨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声明，华侨不受本国保护，该杀该死，可以放开手脚去杀；屠杀华侨不仅无罪，反因代明政府“兵之”、

免它“劳师”而有功，从而起到鼓励殖民者屠杀华侨的作用。西班牙殖民者继后又四次大规模屠杀华侨，与明政府这次所表现的容忍、鼓励是有密切关系的。西班牙人当时对檄文的理解，足以说明这一消极作用。一位名叫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德马尔多纳多的作者，用这样的话诠释上段檄文：“那些被杀的人是绝对该杀的，因为他们是被遗弃的人。”^①

《檄》的全部要求，最后归结为放还被禁商民和被劫财物：

“若前〔屠杀〕事讹传，未有兵革，投款效顺，商舶往来，交贸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仇杀，可将该岛所有漳、泉遗民子孙，追敛各夷劫去财货，资送还郡，自此商舶交易仍听往来如故。”以下还以断绝海舶交易及使用武力相胁。檄文既全未提及要追究殖民当局屠杀华侨的责任，向中国政府及受难者家属道歉、赔偿全部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未要求殖民当局以后保证华侨生命财产安全，而仅把交涉重点放在遣还“遗民子孙”和“各夷劫去财货”方面。必须指出，早在1603年12月，阿库尼亚在托奎瓦带给广东、福建地方官员的信中，就已明确表示要加息偿还华侨托管的财产，以及西班牙人所欠华侨债务；甚至在着幸存华侨致受害者的国内家属和合伙人的信中，也作过同样的表示。檄文只就西班牙人答应的事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显示明廷在交涉中的软弱性和无所作为。再者，既然要求遣还被囚商民和被劫财货，又不提出具体的数字，甚至没有提出组织调查以确定应遣还的具体数字，因而明显地给西班牙殖民当局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使得后者把任何象征性的遣还，都可以声称为全数遣还，从而使交涉顺利结束。观诸檄文在提出遣还要求之前，尚使用“若前事讹传，未有兵革”这样的不肯定句，更证明明廷压根儿未想过要作认真的交

^①BR, Vol. 14, P. 137.

涉。

因此，可以认为，明廷通过发出《谕吕宋檄》所作的交涉，仅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其目的仅是借此对内敷衍死难者家属及侨乡的要求，好有个交代，对外挽回和保持大国的面子而已。

《谕吕宋檄》传至菲律宾，使一年半以来一直在作着明廷兴师问罪、断绝贸易恶梦的殖民主义者大感意外。他们未想到明廷竟如此宽容，因而前虑尽消。对于明廷以武力恫吓为前提的遣还要求，既符合殖民当局原来的设想，政、教各方面便都比较重视，主张顺应中国方面的要求，避免事态扩大。这种倾向，在贝纳维德斯大主教1605年6月的两份请愿书中和在同月马尼拉最高法院的裁决中，都得到反映。

贝纳维德斯认为：如果我们不答应中国皇帝提出的两点要求，他就派遣战舰千艘进攻马尼拉。据异常友好的中国人说，中国皇帝相当有可能断绝中菲贸易，对我们施以最严厉的惩罚。这将意味着整个联邦（按指菲律宾）的毁灭。因此，他要求最高法院把华商存放在马尼拉的财货，通过使者或中国船主，立即交还中国。首先将存在国库的变卖华商财货所得归还，如尚不足，还可通过向市民借贷、节省开支等等集款项。经过详细调查和审讯后，释放在起义中被俘、及后在大帆船中服苦役的人，特别是那些“罪行”较轻的华侨^①。

马尼拉最高法院于6月13日开会研究大主教的请愿书，作出如下裁决：

着令〔华商财货〕各保管人尽快提出一份所保管财货之帐目，以便移交；〔装载墨西哥财政津贴的〕西班牙船抵菲时，应将需要

^①BR, Vol.14, PP.38—43.

偿还欠款款项解入国库；至于在大帆船中服役的华人，要进行审查，以便采取适当措施，使在中国商船离开此地之前，能够作出决定，并公布判决①。

但檄文的弱点也被西班牙人所利用，加以阿库尼亚从华商所带来的消息——如若干地区发生水灾，淹死20万人，地震持续两个月，在朝鲜同日本打仗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中，中国已被弄得焦头烂额等，得出中国无力进攻菲律宾的判断。因此，在他7月5日给福建巡抚的复函②中，对《檄》中各点，逐一批驳，避重就轻，语多诡辩，言词傲慢。现将复函要点概括如下：

——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派使者至澳门，打算托葡萄牙人把有关信函转致中国官员。岂料葡萄牙人因贸易利益的考虑，未代转达，致中国未知事变真相，也不了解华人应对他们引起的损失负极大责任的事实。否则，中国当局肯定会认为，这些华人的罪行，是超过加于他们的惩罚的。

——中国同外国素来没有商业关系，因而只知有己，妄自尊大。中国皇帝应该知道，由菲律宾至西班牙宫廷，相距5 000西里，其领土几有中国之大。“在西班牙国王看来，中国是非常渺小的。”

——在叛乱中被杀的华侨，没有3万那么多，甚至没有此数的一半。

——中国官员指责说，西班牙人对为菲律宾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华侨，残酷无情和忘恩负义。我们西班牙人心地并不残酷，没有正当理由，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开战。我们对待这里的华人犹如兄弟和儿子，对他们毫未戒备。若不是上帝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

①BR, Vol.14, PP.43—44.

②全文见BR, Vol.14, PP.44—50.

解救我们，他们的背叛目标可能已经实现了。

——谅中国皇帝不至未先了解我们是否有过错，就受人左右而对吕宋开战，否则，我们就不能说他对中国的治理是英明的。

——来函说我们对杀死如此众多的人，定感悲痛，思改悔。对中国人所遭受的损失，我们实感悲痛，但谈不上改悔。要不是我们先行动，他们将杀害我们。

——关于中国方面以武力威胁提出两要求，华人罪应处死，但出于怜悯，准许若干人在大帆船中服役，以免其死罪。其后，若干罪疣较轻者已予释放；其他曾充苦役者，亦已获得自由。可以肯定，在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巡抚也会认为他们是罚不当罪的。华人前年存放的财货，已发现物主或物主委托人的，经已发还；这是我能够从国库发还的部分。国库中还有若干华人存放的财货，尚未找到物主，但明年当尽力发还其余部分。请巡抚注意，发还财货一举，是因为它是正当的，而不是由于对吕宋开战的要胁。我不相信，以中国皇帝及大臣的英明而因小事发动战争。但如他们有意开战，西班牙人亦善能保卫领土。

——关于准许中国船只同吕宋贸易问题，相信中国皇帝及其他人不会同意丧失每年从这里运走的大量白银。这些通过交易得来的白银，全部留在中国，没有一个子儿流出那个国家；而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极不耐用的消费品。因此，在这项贸易中，中国人所得到的利益就象西班牙人所得到的那样大，甚至要大得多。

明廷当时确实无力支持海外用兵；即使有用兵之力，正如《谕吕宋檄》所宣布的那样，也不会为“贱民”而“兴动兵革”。且对墨西哥银洋的极端渴求，也使明廷不愿断绝中菲贸易，切断财源。菲西当局则因兵力单薄，求援困难，根本无力同中国对抗，且中菲贸易是他们赖以维持其殖民统治，维持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的生命线，不能想象他们会冒断绝中菲贸

易，从而导致他们在菲律宾的统治彻底崩溃的风险。因而双方都不愿扩大事态，希望早日了结这桩公案，维持正常关系。这次交涉之所以轻易了结，原因就在这里。

阿库尼亚的复函既已答应中国方面仅有的实质性要求，并随函于1605年7月遣回若干商民和货财，明廷交涉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徐学聚在接到复函和看到遣还的商民、财货时，其大喜过望，绝不下于殖民当局收到《谕吕宋檄》时的欣喜之情，以致他既不核实应遣还人数、财数，也根本不顾阿库尼亚复函态度傲慢，就匆忙写就《报取回吕宋囚商疏》呈送神宗。疏的末尾违反事实地写道：“该臣（当指徐学聚）会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汤兆京，看得吕宋原禁商民并劫去财货，遵照传檄悉经放还；详阅来文，词甚恭谨”。疏文以凯旋式结束：“皆仰借皇上之宠灵，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烦兵费饷，坐令怀德畏威，实得柔远固圉一策，即臣仰荷天语，责成至意，亦可少抒其万一矣。”于是，这次重大交涉，便在牺牲绝大多数死难华侨及其家属的利益，并给在菲华侨今后命运留下消极影响的情况下了结。

第 五 章

17世纪初至30年代华侨社会的变化 和1639年的抗暴斗争

一 旅菲华侨再度激增

1603年对华侨大屠杀过后，殖民当局顿感经济萧条，掌握技术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鼓励华商前往菲律宾通商。一些西班牙人纷纷将华人留在家中，给予“庇护”，以供家庭服务和从事手工艺制作，为自己增殖财富^①。历史从正反两面又一次证明，没有中国商品的供应，没有华侨的服务，西班

① 菲律宾总督罗德里戈·比韦罗，在1608年给西王的报告中说：每一年有3 000华人在马尼拉留下不走，因为准许最高法院每个法官拥有50个或更多的中国人作私人仆佣，现在已成定例；也允许马尼拉市议员、修道院、某些官员和杰出市民拥有华人，与他们同住，充当私人仆佣。一些华人用于建房，或其他技术性劳动，如刺绣匠、银匠、画匠等。由于其劳动非常廉价，这些市民通过在阿卡普尔科销售其制作品，获得巨额利润。L.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1570—1770)*, in A. Felix 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P. 185.

牙人就无法在菲律宾生活下去。

明朝末年，阉党擅权，厂卫横行，政治更加腐败。各地矿监税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朝廷借口辽东战事紧急，一再强派“辽饷”，以后还有各种加派和强征丁役。王公勋戚，地主豪绅，更加疯狂兼并土地，不断增加租额。这一切，都进一步促使农民、手工业者破产。

全国情况如此，菲律宾华侨侨乡福建也不例外。泉州地主豪绅不断增加租额，用大斗加强盘剥，以致群众忍无可忍，执彩旗，鸣鼓吹，不断闯入豪绅大户之家，声称查看斗斛^①。明当局更以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发达，特设舶税。出海商舶，需领“引”交税，叫做引税。引税之外，“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水饷者，以船广狭为准，其饷出于船商。陆饷者，以货多寡计值征输，其饷出于铺商。……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迫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万历三年，舶税岁额六千，第二年，“饷溢额至万金”，至十一年，“累增至二万有余”，至二十二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及至税监高案入闽（由万历二十七年至四十一年，即1599—1613年），更以掘矿为名，勒索人民；设关收税，“舟车无遗，鸡豚悉算”，“正税外索辨方物，费复不貲”；“里市贫民挟货无几，案朝夕所需，无钜细悉行票取，久乃给价，价仅半额，而左右司出入者几更横索，钱始得到手……〔海〕澄税已属有司转解，然案日遣税棍，

^①乾隆《泉州府志》卷二〇《风俗》引《温陵旧事》，转引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9页。

诡名督催，仍买取方物，迫勒减价，商民无所望天。”^①于是，漳、泉破产农民、商民和工匠，或铤而走险，出海为盗；或离弃家园，远走异邦，寻求活路。从16世纪末开始的新移民浪潮，在17世纪前期继续发展。

1605年初，帕利安重新建成。在此以前的1604年，殖民当局已对来菲华商作出了特别欢迎的姿态和某些让步。华商因利之所在，破产农民及手工业者为寻觅出路，在1603年屠杀事件过后又联袂来菲。如同《明史·吕宋》中所说的“其后，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

据史籍记载，1604年，有4 000多华人居住在马尼拉城内西班牙人家中。他们是由当年5月来菲贸易的13艘华船载来的商人和移民。由于帕利安被毁，阿库尼亚准他们住在城中。贸易事务完结后，大部分人于当年乘船回国，只有457人留下来^②。从1604年至1639年，中国商船到马尼拉的数目如表1。这些商船除了做买卖的商人外，都载来或多或少的移民。1605年，18艘华船载来3977人，当年回国的3 687人，290人留居马尼拉。但在这些船只抵达马尼拉之前，以及启航离开马尼拉之后，共有901人先后离船上岸，及后又设法来到该城城外居住下来，从而使1605年居留马尼拉及其近郊的华侨人数达到1 648人^③。1606年来船数达26艘，载来人数共6 533人。这一年，马尼拉最高法院准许1 500名当年来菲的华人居留。此后，菲律宾的华侨人数不断增加。到1621年，马尼拉持有居留许可证的华侨已达到1.6万多人；另约有此数1/3的华

①上述引文及资料见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

《税珰考》。

②BR, Vol, 14, P.150.

③BR, Vol, 14, PP.150—151.

侨是没有居留许可证的^①。这样算来,这一年,仅该城及其邻近的

表 1

年 代	船 数	年 代	船 数	年 代	船 数
1604	15 *	1612	46	1632	18
1605	18	1620	23	1633	31
1606	26	1621	30—40	1634	29
1607	39	1627	22	1635	43
1608	39	1628	10	1636	31 * * *
1609	41	1629	4	1637	51
1610	41	1630	21	1638	17
1611	21	1631	36* *	1639	34

资料来源: Pin-tsun Chang, chinese Maritime Trade,
P.364 table 22.

* 阿尔亨索拉说是13艘。见BR, Vol, 16, P.297.

* * 胡安·梅迪纳说是大小船合计50艘。见BR, Vol, 23, P.193.

* * * 科奎拉说是33艘小船, 见BR, Vol, 26, P.274.

华侨即达2.2万人之谱。1635年, 仅帕利安就有华侨2万人以上, 在其他海岛还有1万多人^②, 共3万多人; 直至1639年华侨掀起抗暴斗争前夕, 大抵维持这个数字, 或稍多些。例如, 菲律宾检察官在1644年写的《关于华人许可证的报告》中, 就说到“1638

①BR, Vol. 20. P. 96.

②BR, Vol. 25, P.49.

和1639年，有2.5万或3万华人”，这仅是领了许可证的华侨^①，如果加上无证居留者，这个数字可能达到3万多或4万人。

这个时期（17世纪初年至30年代），菲律宾华侨社会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其一是华侨居留地向马尼拉以外扩展。这与华商活动范围扩大有关。马尼拉仍是华侨最大的聚居中心。它由顿多、比农多、拜拜和圣克鲁斯等几个基督教徒华侨村，以及非教徒华侨商人、单身教徒华侨居住的帕利安组成。一般情况下，马尼拉的华侨占全菲华侨的2/3以上。在马尼拉以外的许多地方都有或大或小的华侨居留点。中吕宋及其附近的省份布拉干、庞邦加，邦加斯南、内湖、卡维特等省区，集中了马尼拉以外的绝大部分华侨。在遥远的地区，也可看到华侨的踪迹。据胡安·梅迪纳神父1630年所著《菲律宾奥古斯丁会史》，当时在帕奈岛的怡朗镇，有100多名华侨同该城土著妇女结婚，其人数日益增多^②。早期华侨社会向以男性为主。该镇既有这样多已婚的华侨，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单身男性。怡朗镇西面不远的奥顿，有相当数目的华侨。在南方的和乐岛，也有华侨流寓，其人数多少，未见记载，但从岛上的卢陶斯镇设有华人市场这一情况看来，似不在少数。此外，吕宋岛的卡加扬、伊洛科、桑巴列斯、卡马林内斯等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华侨居留。可以说，华侨已遍布菲律宾各个重要地区了。一般说来，华侨主要分布于西班牙人居住地附近。这是同华侨的商业活动，西班牙人需要华侨的各种供应和服务密切关联的。

①BR, Vol. 35, P. 190. 据《华人起义纪事》所列数字，1639年，在马尼拉及其郊区，有居留许可证的华人3.5万人，另有1万人住在马尼拉以外。见BR, Vol. 29, P. 257.

②BR, Vol. 23, P. 216.

尽管这个时期华侨已稍有分散，但马尼拉的帕利安仍是菲律宾华侨最大的社区。下面概括地介绍帕利安的发展情况。

殖民当局为便于对华侨的防范、管理、征税和敲榨勒索，于1582年在马尼拉城北与巴石河之间的荒地，围以栅栏，令华侨在其中居住，存放并销售他们的货物。这就是第一个帕利安。其所在地在1591年马尼拉建城墙时被划进城内。帕利安的店铺一般都是用竹木草构建，顶多是用瓦盖顶，故频频发生火灾。加以殖民当局一再对它进行纵火（如1603、1639年）、拆毁（如1593年），所以，从它建立起至19世纪80年代取消，曾经十二次重建，七易其址^①。但不管帕利安怎样迁移、重建，其址始终是在马尼拉城东北，或在与马尼拉城相对的巴石河北岸；不是处在圣地亚哥堡就是处在圣加夫列尔堡的枪炮射程之内；始终同巴石河有小河道相通，有着从船上起货之便。中国古籍称帕利安为润内，原因就在于此。

帕利安是随着中菲贸易和大帆船贸易的发展而发展，随它们的式微而衰落的。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中菲贸易还处于重建阶段，大帆船贸易也处在起步时期，中国移民还没有后来那样大的数目。大多数华侨住在巴石河以北的顿多，小部分华侨还可在马尼拉城内居住和设店售货，与西班牙人杂处。到80年代初，在中菲贸易中，中方售货所得，每年即达30万比索（1586年更达50万比索）。中菲贸易的趋于繁荣，反映了大帆船贸易的走向兴旺。因此，在帕利安设立、华侨基本集居之后，帕利安商业逐渐繁

①参见刘芝田：《华侨来菲的发祥地——润内与八连》，见《菲律宾民族的渊源》，东南亚研究所1970年版，第221—253页；郑德华：《马尼拉的华人社区——巴利昂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打印稿）；*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PP. 84—117.

盛，华侨数与店铺数都有迅速的增加。1590年店铺 200 间，华侨已达三四千人^①；1598年，中菲贸易额已达80—100 万比索，大帆船贸易规模相当。因而尽管殖民当局在1593—1596年间几次驱逐华侨，帕利安一再毁、迁，但在16世纪最后几年，这里的华侨仍达3 000人，店铺发展至300间^②。1602年，两种贸易各发展至200万比索，帕利安有华侨8 000多人，店铺400 间^③。此后两种贸易长期维持在200万比索的水平，但有时达250万比索（1604年）、300万比索（1620、1740年），甚至400万比索（18世纪20年代）^④，帕利安的华侨也达到1.2—1.5万人（1628、1662年）^⑤，有时达2万多人（1638年）^⑥；店铺数目1645年最高达1200间^⑦。上述华侨数字，还仅限于常住人口，每年中国商船来船季节，尚有数千华商在帕利安暂时停留。有时华侨人数众多，帕利安容纳不下，便有相当一部分安排到拜拜村和比农多村。可见，帕利安是菲律宾最大的华侨社区。

帕利安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发祥地。华人移民菲律宾，除了那些为避免检查登记而中途离船上岸者外，其抵岸地点是马都尼拉，在那里由殖民当局登记，便留在帕利安居住、营生，往后才陆续散居到马尼拉周围，以至于菲律宾各地；换句话说，菲律宾

①BR, Vol. 8, P.97; Vol. 7, P.230.

②BR, Vol. 10, PP.259, 42.

③BR, Vol. 16, P.296.

④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38、444页。

⑤BR, Vol. 17, P.211；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第248页。

⑥BR, Vol. 29, P.69.

⑦箭内健次：《关于马尼拉之所谓八联》，引自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146页。

各地的华侨社区，都是由帕利安“繁衍”出来的。

殖民当局对华侨征收高额居留证费、贡金，并一再屠杀。华侨缺乏安全感，负担又重，致罕有携眷赴菲的。帕利安成了清一色的男性社会。他们除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外，绝大部分人保留故国的精神信仰，是西班牙人眼中的“异教徒”。帕利安也因而被称为“异教徒的帕利安”。他们都是单身汉，至少未同当地妇女正式结婚。一旦与菲律宾妇女正式结婚，他们就得搬到比农多或圣克鲁斯等已婚基督教徒华人村。帕利安的居民，不论是否基督教徒，每年都要领取居留许可证。如要到帕利安以外的地方营生，还得领取特别许可证，而且每证只限12天，其活动范围也限于《廉政条例》规定的几个省区。

住在帕利安的华侨，从事各种行业。他们中有裁缝、鞋匠、面包师、木匠、制烛者、糖果匠、药师、油漆匠、银匠、理发师，甚至还有刻板印刷、装订书本者等各类工匠；有经营中国货，但以丝绸和陶瓷为主的殷富商人；有小商贩，在帕利安贩卖肉类、禽类、鱼类及其他食品；有从事自由职业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还有受雇的店伙和家庭佣人。帕利安长期是一个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社区。到了1804年，西班牙政府要工匠迁出，帕利安才成为一个纯粹的市场。

帕利安是菲律宾的商业中心，马尼拉商业生活的神经中枢。中国商船每年运到马尼拉的货物，都运到帕利安存放、发售。大帆船贸易所需大宗货物，绝大部分在这里采购，马尼拉的许多西班牙商人，是从华侨商人那里告贷购货或赊货以从事这项贸易的，因而每年五六月墨西哥来船季节，就成了马尼拉商人向华侨清偿货款的日子。菲律宾其他消费中心所需中国商品，也由这里转运。转贩中国商品者中，有已信奉基督教的已婚华侨，也有定期到马尼拉采购丝绸和细棉布的明达瑙、苏禄的穆斯林商人。马

尼拉的西班牙人，更为帕利安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所吸引。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都是由帕利安华侨供应的，他们是这个“中国城”的常客。“每天早晨，城门一开，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便从城内川流不息地到帕利安去采购物品。”^①帕利安的许多饭店，也是西班牙人经常享口福之处。殖民者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甚至为马尼拉城之有帕利安这样繁荣的商业区而感到骄傲。早在1590年，多明戈·萨拉萨尔主教就表露这种情感：

这个帕利安是如此装点了马尼拉城，使得我毫不犹豫地向下断言，在西班牙或在这一带地区，再没有其他为人所知的城市，能象帕利安那样，拥有这样种类繁多，又如此令人喜爱的东西了。因为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的全部商业，有来自那个国家的每一种商品，以及许多稀奇的东西^②。

从1587年起，多米尼克教会专负向华侨传教的工作。他们在拜拜村、比农多村和帕利安设立教堂。帕利安教堂通常设有四名传教士，其中两人通华语，一人甚至识华文。这个教会还在教堂附近建立圣加夫列尔医院，由中国医生用中药为华侨治病。

殖民当局对帕利安的管理是多头的。首先是由总督，有时由最高法院负责向华侨发放居留许可证。在最高法院负责这项工作时，则由每位法官轮流负责一年。在具体管理方面，实行“以华制华”的监督管理体制。其法是由总督为帕利安任命一名西班牙人为区长（*alcalde-mayor*），其下有由华侨在基督教徒华侨中选出的三名管理人员，其一担任管理官（*governor*）^③；其余二人

①Zaide,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102.

②BR, Vol. 7, PP.224—225.

③有时也称治安员（*gobernadorcillo*），该词的西班牙语义为“兼理司法与行政的低级官员”。

分别担任书记官和监狱管理官，作为管理官的助手；还有由管理官委任的司法官若干人。可见帕利安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但法庭只处理初审案件，上诉案件由顿多省长，或帕利安区长和最高法院处理。管理官在行政管理方面，受两人监督，一是兼任华人保护官的检察官，一是帕利安区长；在税收方面则受顿多省长的监督。名义上，管理官是西班牙殖民当局与华侨之间的中介人，但在华侨毫无权利的情况下，他主要是秉承当局的意旨，执行当局的歧视、限制政策，或办理当局对华侨的各种摊派，从而成为殖民者“以华制华”的工具；而管理官因受检察官、帕利安区长和顿多省长、甚至还有最高法院在司法、行政和税收方面的多重监督，也很自然成为殖民者手中的工具。

华侨社会变化之二，是改宗基督教者有所增多。华侨改宗基督教，大都为形势所迫，因为菲西当局一再申明只准基督教徒华侨留菲，一再宣布要给皈依教者以优待。例如，西王于1620年9月5日颁令，命菲律宾总督在正常劳役之外，不要再向华侨教徒征私人劳役。同年8月5日，规定在马尼拉郊区给皈依教且与土著妇女结婚者以未开垦的土地。1629年6月14日（一说是1627年11月19日）更颁令教徒华侨可在十年中免缴贡金，在这以后则按土著的贡金额（约1.5比索）缴付^①。这些措施，对缺乏经商本钱、经验，又缺乏手工技艺，苦于赋税负担的华侨，肯定具有某种程度的吸引力。殖民当局对华侨的同化政策有了一定的效果。首先是华侨教徒增多了。帕利安向以居住异教徒见称，甚至到了1656年，西班牙人还说它是“中国异教徒的帕利安或丝市”^②。但从

① BR, Vol. 22, PP: 156—157, 158.

② BR, Vol. 28, P. 84.

1618年到1633年这15年中，这里竟有4752名华侨接受洗礼^①，平均每年300多人。其次是由于华侨教徒的增多，出现了一些基督徒华人村镇。上面说的怡朗镇，就有100名已婚华侨居住。虽然材料没有说明这些华侨是基督徒，但按当时菲西当局的规定，只有皈依基督教的华侨，才能同当地妇女结婚。较大的基督教华侨村镇，是马尼拉对面、巴石河北岸的比农多、拜拜、圣克鲁斯村^②，还有基亚坡村、顿多村。这些村镇，居住着数以千百计的已婚华侨教徒。在基亚坡和顿多，各有250名已婚华侨在从事农业^③。拜拜村的华侨共有580个贡赋单位，即以每个单位两个人计，这里也有1000多人^④。这个时期，已婚华侨教徒最多的村镇比农多的人数未详，但据载，1622年该村华菲混血儿即有500人^⑤，可见规模不小。华侨表面上改变宗教信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改变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他们虽然和非教徒华侨隔离居住，但与后者休戚与共，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无法分隔的。1639年，他们就共同进行抗暴斗争。

华侨社会变化之三，是在殖民当局的强制下，相当数量的华侨，被迫从事农业劳动。过去，华侨绝大部分是工匠、商人和其他劳动者，部分在马尼拉附近（例如基亚坡）从事农业的，也只限于园圃、饲养等；只有少数人在马尼拉郊区教会土地上从事水稻生产。从20年代起，有大批的华侨被驱赶到中吕宋和南吕

① BR, Vol. 32, P. 85.

② 1656年，圣克鲁斯的华侨有500个（或稍少些）贡赋单位，BR, Vol. 28, P.84.

③BR, Vol. 12, P.109; Vol.34, P.432.

④BR, Vol.27, P. 82.

⑤BR, Vol.20, P.232.

宋地区，在那里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到1639年，仅在内湖湖畔的卡兰巴一地垦荒种稻的华侨，就达6 000人。这在3—4万华侨中，已占不小比例。

二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限制和掠夺

菲律宾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有赖于中菲贸易的正常化和华侨人数的增加。1603年事件过去后，由于殖民当局的招徕，中菲贸易迅速恢复和发展，华侨人数也逐年增加，且很快超过6000人之限额。西班牙人赖之得无供应匮乏、服务无人之虞。但中菲贸易的发展和华侨人数的增加，又伴随着华侨在菲律宾商业地位的恢复和增强。殖民者同华侨的经济矛盾又逐渐突出。因华侨人数增加而引起的不安全感，又开始占据殖民者的神经中枢。殖民者中的一部分人，出于其对华侨的仇视，甚至在中菲贸易刚刚恢复，华侨“复稍稍往”的1605年，就迫不及待地制造排华舆论；催促殖民当局对华侨进行新的迫害。其急先锋，就是在1603年为屠杀华侨推波逐澜的贝纳维德斯大主教。

贝纳维德斯大主教于1605年2月3日、5日和9日，先后三次向马尼拉殖民当局控告华侨。他摆出“素来熟悉华人情况，精通其语言，了解其习惯，在华多年〔？〕”的架式，极尽诬蔑中伤之能事，罗致种种罪名，强加到华侨头上，并笼络若干所谓证人“作证”。他所罗列的华侨的“罪恶”是：崇拜偶像；过分淫荡，并从这两个方面败坏菲律宾人的道德，使他们离弃天主教信仰；在1603年力图杀尽西班牙人，冀图统治菲律宾，现在又以非常公开的敌意和仇恨，要为他们被杀的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以及被毁灭的财产复仇，这是一个恒久的危险根源；挑拨和离间菲律宾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关系；以贿赂为手段，千方百计地

打听任何秘密；煽动和资助明达瑙海盗对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战争行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位大主教建议：驱逐华侨；只允许华商在来船贸易的三个月（4—6月）期间在马尼拉某个地方居留，然后让他们回国；只让少数华侨居留在离马尼拉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但禁止他们同土著交往^①。

同年7月5日，一名殖民官员，写信向菲利普第三报告：由于修理马尼拉城被毁部分和服务上的需要，马尼拉最高法院已准许1500异教徒华人留下。西王批示同意，但强调不得超过此数^②。第二年7月，财政官罗德里戈·迪亚斯·吉拉尔，鉴于最高法院有关华船每艘只许载200人来菲，在船只抵达及返航时不许有人逃避检查统计等规定无法执行，写信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为菲律宾安全计，不允许中国人居留；每年来菲华船数量及其载来人数应予确定，所载人数应尽可能少；给违反规定者以严惩；帕利安店铺数目应予明确限制，规定每一店铺只住一人，这个人需要有某种为人所知的职业，且是基督教徒；不准超载人员的船只进港^③。

在殖民当局的敦促下，西班牙国王下令限制菲律宾华侨人数。他在1606年11月4日颁令，重申1602年的法令，把华侨人数限制在6000以内，认为这个数字对菲律宾的安全是适当的。但这项命令告诫菲律宾殖民政府，千万小心谨慎，使华侨人数不致太多，并要使他们沉寂地、担惊受怕地和顺从地生活。这项命令以后还在1620年5月29日、1622年12月31日两次重新颁布^④。上述

①BR, Vol. 13, PP. 271—286.

②BR, Vol. 14, PP. 51—52.

③BR, Vol. 14, PP. 151—153.

④BR, Vol. 22, P. 157.

命令虽然以国王名义一再重申，但华侨的人数仍不断增加。

殖民当局无法限制华侨人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华侨劳动者的人数，似乎一直无法满足殖民者的公私需要。如上所述，许多西班牙人把华人留在家里，供私人役使。这些被收留的华侨，大概是属于没有居留许可证，或无力缴交许可证费用的“非法”居留者。在1603年大屠杀之后几年中，对华人移民限制较严，华侨劳动力极端缺乏，私人收留更为突出。例如在1604年，“如果有一个华人刺绣匠、裁缝、雕刻匠或其他工匠，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便把他带到他们家中，以使华人失去自由的方式，使他为他们做大量工作。”^①不仅高级殖民官员如此，在菲的一般西班牙市民也是如此。西王在1608年5月颁令，命令菲律宾总督不准马尼拉公民和居民把华侨留在自己家中，否则加以严惩并重课罚款。殖民官员违反限制华侨人数的敕令这一事实，无异于自行否定有关法令，从而有利于华人移居菲律宾。其次，殖民政府因连年对付荷兰人的侵扰等，军费开支庞大，财政短绌。为了解脱财政窘境，他们利用每年向华侨签发居留证的机会，滥收费用，甚至滥发许可证，从而使居留者大大突破限额。

向华侨颁发居留许可证，每年每证收取8比索费用，是根据胡安·席尔瓦总督1612年11月12日（一说1610年）颁布的法令开始施行的^②。从那时以来，据可见数字，殖民政府历年的许可证

①BR, Vol. 13, P. 235.

②BR, Vol. 17, P. 238; Vol. 19, P. 84; Vol. 35, P. 190. 华侨每年除缴交8比索5里亚尔普通许可证费（包括8比索居留许可证费，4里亚尔贡金，1里亚尔职业税）之外，领许可证时还要缴纳2里亚尔杂费，合共8比索7里亚尔，见BR, Vol. 26, P. 139; Vol. 27, P. 135.

(又名普通许可证, general license) 收入, 及其在每年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如表 2 ①。

表 2

年 度	总 收 入	其中许可证收入	许可证收入在总收入
	(单位, 比索)		中所占百分比
1610 *		120 000	
1620—21 **	255 541	80 000	31.3
1630—31	555 775	87 606	18
1631—32	475 889	116 697	24.5
1632—33	622 484	105 898	17
1633—34	546 873	51 396	9.4
1634—35	7 5 849	162 941	22.8
1636—37 ***	573 922	112 000	19.5
1638—39 *		230 000	

资料来源: * 据 BR, Vol. 35, P.190; ** 据 BR, Vol.19, PP, 20—21; *** 据 BR, Vol.27, PP.135—137. 其余据 BR, Vol.25, PP.74—86. 1636—1937年的573 922比索“总收入”仅系该年度十一项主要收入数, 非指全部收入。

①有的著作把表中所列1610年的数字误为1644年的数字, 如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502 和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 第146页。

从表中数字可见，即使是1633—1634年度的许可证收入，按每人8比索计算，领取许可证的人数也超过6 000人的限额，且领许可证的人数一般都低于实际人数，因为在敛财的指导思想下，许可证的发放数量是不加限制的。西班牙政府虽一再颁布1606年第一号法令，但鉴于每年有这样一笔可观的收入，明知华侨数连年累万，也只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未予干涉。在菲西班牙人的生活，较西班牙和墨西哥艰苦，收入也较低，也乐于看到可任意勒索的华侨人数增加。再其次，华侨也千方百计移入菲律宾。菲西当局虽对华侨人数和每艘华船载来人数有限制，但华人既利用西班牙殖民当局贪财的弱点，也钻殖民当局只在马尼拉港检查出入境人数的空子，求得在菲居留。《东西洋考·吕宋》有云：1603年“衅隙而后，彼亦戒心于我，恐族类既繁，后复为乱，辄下令：每舶至，人只二百为率，毋溢额；舶归，所载回必倍以四百，毋缩额。我人当放舟时，多诡名充数，听其查核，中流辄逃回彼土。”殖民政府检察官罗德里戈·迪亚斯·吉拉尔也承认：

虽已规定来菲最大华船每船限载200人，但实际上一只不大的船即已载大约500人，而这些新来的华人，或者在船抵马尼拉之前，或者在船只驶离马尼拉之后登陆，然后设法登记、领取居留证，并在马尼拉城外、山区或其他易于容身的地方建造住所，居住下来^①。

限制华侨人数的做法既行不通，殖民当局便转而采取措施，进一步把华侨同土著菲律宾人、西班牙人隔离开来，使华侨在人身自由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当局规定，非教徒华侨除了在帕利安之外，不得在其他地方居住或拥有房舍；实行华侨与土著居民相隔离，不允许杂居；除非持有特别许可证，华侨不得前往马尼拉城两西里以外的地方；在马尼拉城门关闭以后，不能在城内过

^①BR, Vol.14, PP.150—151.

夜，否则处以死刑^①。

这种歧视政策，严重伤害华侨的民族自尊心，妨碍了他们的经营活动。所以，华侨不断为争取行动自由和维护人身自由而斗争。1634年，胡安·萨拉曼加总督开始准许华侨在缴交特别居留费之后，在帕利安之外居住^②。1636年上半年，塞瓦斯蒂安·H·科奎拉总督下令所有未获许可而在帕利安以外的农牧场和园圃居住的华侨（显然是从事农业、饲养、园圃业的劳动者），一律返回马尼拉。大多数华侨都不得不照办。但随后他们纷纷要求和申请返回他们的劳动地点。科奎拉以增收许可证费，即以10比索2里亚尔代替8比索7里亚尔的普通许可证费，也就是增收1比索3里亚尔特别许可证费为条件，同意他们的请求^③。自此，华侨在缴交特别居留费后，获准在帕利安之外的地方进行有限期、有限范围的经营。例如华侨商人一般只能到外地营业12天，且限于顿多、布拉干、庞邦加、内湖等省及卡维特港辖区。至于受洗剪辫问题，教会当局一直未予取消。及至1621年，菲西当局由于财政异常困难，连水手和士兵的薪金也无法发放，因而在应急办法中，又设置一项许可证，华侨在交付一定费用后领取此种许可证，在接受洗礼时就可以免剪发辫^④。菲西当局的贪婪和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在殖民当局的剥削和敲榨勒索下，华侨的经济负担是非常沉重的。这种负担可分为关税和杂税两大项。

先说关税。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运货到菲律宾，每吨

①BR, Vol.16, P.198.

②BR, Vol.24, P.310.

③BR, Vol.26, P.139.

④BR, Vol.20, P.64.

货物要缴交 12 比索的停泊费，还要交纳货值 3 % 的关税。仅此两项，对华商已是莫大负担。他们每次来船多载、超载移居者，实际上是为了多收客运费以弥补停泊费和关税的巨额开支。在中菲贸易刚告恢复的 1606 年 11 月，阿库尼亚又下令增征关税——在原征 3 % 的基础上，加征 3 %^①。自此，6 % 的进口税，即成定

表 3 十六七世纪间马尼拉每年平均征收的入口税(单位：比索)

年 代	入口税总额	向华货征收的入口税	华货入口税在入口税总额中所占百分比
1586—1590	13 383	4 909	36.68
1591—1595	36 155.5	22 065	61
1596—1600	43 104.5	24 155.5	56.04
1601—1605	42 982.9	30 304.2	70.5
1606—1610	59 066	46 390.6	78.52
1611—1615	70 355	64 482	91.5
1616—1620	51 337	37 843	73.5
1626—1630	25 720	18 623.5	72.4
1631—1635	42 194	34 283.8	81.1
1636—1640	31 037	27 483.8	88.6
1641—1642	31 425	28 930	92.06
1641—1645	22 075	18 599.4	84.06

资料来源：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eriques*, PP.200—205, 转引自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31页。

①BR, Vol.16, -P.182 note.

规^①。实行新进口税率之后，从中国商品所征进口税，最高是1611—1615年的年平均64 482比索，最低是1626—1630年的年平均数（见表3）。

从数字看，向中国商品征收的进口税，1606年之后一些年代并不比1606年之前高多少，多数年代甚至更低些。但有几种因素是要考虑的。其一，从17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中菲贸易船遭到两种武装力量的轮番袭击：在中国沿海，它们遭受中国海盗的拦截、劫掠；当它们侥幸逃脱而驶抵吕宋海岸或马尼拉湾外时，又遭受荷兰武装船只的劫掠。因此，这个时期到菲贸易的船数虽略有增加，但大多是载量较小行动较灵活的船只。载货量既少，运费开支当然也相对较大。货量减少，而进口税收入数基本上维持原状或稍有增加，也说明华商关税负担比前加重。其二，中国商品运销菲律宾途中的风险，使一些华商对中菲贸易裹足不前。澳门的葡萄牙人乘虚而入。他们利用地理上的便利，通过在广州每年举行的定期集市，投入大量金钱，购买各种商品运销马尼拉。又极力以各种理由吓唬华商，使部分华商不敢前往马尼拉，从而控制中菲贸易。因此，在中菲贸易中，葡萄牙人所占比重增大，华商所占比重减少，但征自华商运销菲律宾商品的关税仍然是如此之大，亦可见殖民当局对华商所征关税是如何之重。

中国货物进口关税奇重，使中菲间直接贸易出现衰退，菲律宾市场上中国商品稀缺。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商品价格昂贵。因为华商不得不在商品价格上取得补偿。葡萄牙人既以同西班牙的特殊关系，获得通商马尼拉的方便^②，又借马尼拉欠缺中国商品

①对中国进口货征6%的进口税额，实行到1714年，又增至8%。

②西班牙禁止亚洲以外的国家同菲律宾贸易。葡萄牙虽是欧洲国家，但因有一段时期合并于西班牙，故不受此限。

之机，奇货可居，漫天要价。中国商品价格成倍飞涨，又使大帆船贸易的利润减少。再加以这一时期大帆船贸易事故较多，1635—1639年，西班牙政府又严格控制货运量，干预货价收入的利润，使得马尼拉商人运输中国商品到墨西哥，或墨西哥商人来马尼拉采办中国货，都有明显的减少。在17世纪30年代前后一段长时间内，墨西哥白银运菲数量随之大减（参阅本书第52页表格）。菲律宾既缺乏白银作为交易手段，华商又面临苛捐杂税的重负和西班牙人予取予夺的威胁，不仅使他们不愿意运货到菲律宾，连许多原已在马尼拉的华商也打点行装，关闭店铺，作返国之计。中菲贸易的形势更加恶化。

其次是杂税及其他额外负担。华侨除了交上述许可证费、特别居留费、免剪发辫特许证费之外，每人每年还要缴付4里亚尔贡金给西班牙国王，12里亚尔作为对西王服务的摊派，交给马尼拉金库^①。所谓对西王的服务，实际上是服劳役，包括各种紧急的差遣，例如在战船、帆船、赴墨西哥的贸易船、火药库服役，以及造船、修筑公共工程等。每个华侨每年12里亚尔的服务摊派，其实就是交给殖民政府的一笔代役金。

华侨社会中所凑集的社区基金（Community Chest），也成了西班牙人搜刮的目标。这项基金，是阿尔丰索·法哈多—滕卡总督于1622年5月4日宣布在帕利安设立的。随后，圣克鲁斯和顿多两镇也于1636年合设基金。每个华侨每年交社区基金12里亚尔，分两次交纳。社区基金本应用于华侨的福利和设施，但事实上其用途完全与此无关。例如，支付任兼华人保护官的检察官的薪金，支付在各村主持圣事的神父的酬金，支付代管圣克鲁斯—顿多公共基金的顿多省长的酬金，支付帕利安卫队长的酬金等等。这些

^①BR, Vol.22, P.287.

人的薪金因而免由国库负担。殖民当局为着某种特别需要，也随意动用社区基金。如修筑马尼拉城墙上的两个堡垒，就“用适当措施”从帕利安社区基金中一次“帮助了”4万比索，又以4000比索“资助”在卡维特港建要塞。还有其他工程的修建，也是从两笔公共基金中开支。更有甚者，掌握和控制着帕利安社区基金的两名多米尼克教会神父，在14年中，用这项基金为自己的教会弄到10万多比索^①。因此，华侨的公共基金，实际上成了殖民当局的一笔财政来源，其使用安排，一概任由己意。马尼拉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把华侨社区基金称作“公共税”（Communal tax）^②，这是再恰当不过了。

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经济掠夺，除上述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敲榨勒索，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 卡兰巴计划

17世纪初年至30年代，华侨尽管遭受恶劣的待遇，他们还是含辛茹苦，胼手胝足，安分守己，兢兢业业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菲律宾的社会生活作出了贡献。只要殖民当局不是迫得他们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可是，殖民当局和在菲西班牙人对华侨的压榨和役使有加无止。特别是科奎拉总督上台以来，华侨的日子愈发难过，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华侨在1639年被迫举行第二次抗暴斗争。

^①BR, Vol.24, P.328; Vol.26, PP.140, 143—145, 185;

Vol.20, P.211.

^②BR, Vol.20, P.212.

激发1639年华侨抗暴斗争的直接原因，是殖民政府强迫华侨到卡兰巴地区开荒种地。

早在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就利用华侨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在私人、教会的地产上生产稻谷、蔬果，饲养禽畜，增殖财富。最先把土地租佃给华人耕种的，似乎是教会方面。贝纳维德斯大主教在1603年7月5日给菲利普第三的信中，就讲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仅是基亚坡村的耶稣会会士，就使大约250名华侨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每名华侨每月需交给该村耶稣会4里亚尔和1只家禽（值4里亚尔），每周星期五交付一定数目的鸡蛋及同样数目的鹅蛋，还要交水果、蔬菜，并无偿为耶稣会士栽培果树。耶稣会在基亚坡邻近的其他地产，情况也是如此。奥古斯丁会在顿多村的田庄，也役使250名华侨。还有大量华侨在西班牙人的私人农庄中佃耕。但利用华侨耕种土地，这时还未形成一种政策措施。把安置华侨从事农业生产作为殖民统治的安全需要提出来的，是长期任菲律宾殖民政府检察长的费尔南多·里奥斯·科罗内尔神父。科罗内尔受马尼拉西班牙居民的委托，回到马德里，于1619、1620年向西班牙国王提交一份叫做《菲律宾需要改革》的陈言书和若干封信，对治理菲律宾提出不少意见。他在陈言书第31款中写道：

许多华人同土著菲律宾妇女结婚，成为基督教徒，住在马尼拉城附近。他们唯一的职业是当零售商。要是把他们集中到某个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建立村镇，耕地种粮（因为他们是优秀的农夫，况且那里有非常多可以给他们耕种的荒地），这样，就不仅使他们变得对社会非常有用，而且，无数由他们引起的头痛事……将可避免。这是特别吸引人的，因为以这种方式，他们会变得更加驯善，更加温和；而且，由于他们生齿日繁，要是他们集中在一处，马尼拉城就不会有安宁，今后再把他们送去耕种土地，也就不会象现在

那么容易了^①。

科罗内尔的建议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赏识和支持。后者在1620年8月25日向菲律宾总督法哈尔多—滕卡下达一项敕令。这项敕令以科罗内尔建议的内容讲明事由，责令菲律宾总督循此制定一项法律，并着力提防华人。殖民当局如何贯彻这项敕令，未见记载。但此后许多西班牙人和修道院办起了农庄。他们向愿意从事农业的华侨贷款，还给每人另贷25比索，以便华侨能在农庄中安身和购买农具。华侨经过一年垦种，收获之后归还借款，从第二年起要缴交地租。每100寻（braza）土地每年交地租15—20比索，或15—20法内格大米^②。上述办法，想必就是殖民当局为执行国王敕令所进行的试验。经过几年试验，胡安·尼尼奥·塔沃拉总督在1628年8月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得意地说：

我们正蒙受极大的恩赐，那就是将从最近由西班牙人建立的许多农庄生产大量稻米。这些农庄是靠华人耕种的。他们是优秀的农夫。我正竭尽所能鼓励这种做法，因为我认为这是向马尼拉城供应丰富食物的捷径^③。

第二年，塔沃拉又向西王报告：

过去三年，华人（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专心致志地在播种稻谷。结果，菲律宾有了充裕的粮食供应……^④。

殖民当局看到这一政策在私人农庄已著成效，便进一步在殖民政府所掌管的土地（即所谓“国王陛下的地产”）上加以推行。他们计划在马尼拉溯河12西里的内湖西南畔，即卡兰巴地区

①BR, Vol.18, PP.305—306.

②BR, Vol.23, PP.36—37; Vol.29, PP.208—209.

③BR, Vol.22, P.270.

④BR, Vol.23, PP.36—37.

拨出两大段荒地，强制安置2 000名华侨，让华侨把这些荒地开垦成良田，并在一两年内收回成本。他们设想，两千华侨每年可提供4万法内格大米，若假以时日，还可达5万法内格，足供菲律宾军政人员所需的口粮；在华侨还清贷款之后，每年就可坐收地租。这就是塔沃拉计划，亦称卡兰巴计划。

这种政策可以解决在菲西班牙人的粮食需要，减省每年4—5万比索的庞大开支，免除对土著农民的大米摊派。这对在菲西班牙人、对当局的财政是最大的支持。这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华侨，虽然免除了许可证费及贡金的负担，但从垦殖的第二或第三年起，即需缴交比8比索多得多的地租，使殖民政府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成倍的增加。数以千计的华侨从马尼拉城附近迁到12西里以外（更不用说较远的中吕宋地区了）的地方，对殖民当局来说也可以增加几分安全感；且由此还可以减少华侨零售商贩的人数，也就给西班牙人以从事零售商业的机会。因此，殖民当局虽预见到会出现华侨在领到安置费和置备农具的费用之后，一些人可能逃走，一些人可能死亡，因而上述垫支款无法收回的风险，“但鉴于在修道士和居民所建庄园已产生的人所共见的各种好处，这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①。但未知是什么原因，塔沃拉的上述计划，终塔沃拉和萨拉曼加两总督的任期（1626—1635）都未见执行，直到科奎拉接任总督时为止。

科奎拉在1635年6月抵达菲律宾后，便立即着手贯彻塔沃拉计划。他强迫华侨零售商和小贩（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到卡兰巴，任命卡兰巴计划监督官，管理垦殖事务。到1639年，被驱赶到卡兰巴的华侨，总数达6 000多人。

^①BR, Vol.23, P.37.

四 华侨的抗暴斗争和殖民当局 对华侨的第二次大屠杀

卡兰巴地区原是灌溉不便、疫病流行的莽原沼泽地。被强制到这里来的华侨，必须披荆斩棘，挖渠导水，才能把这些荒地开辟成农田。由于劳动强度大，条件恶劣和水土不服，许多华侨先后死亡，仅1639年，罹病死亡者即达300余人。生存者都面临疟疾、死亡的威胁。他们的负担奇重，每年每人必须缴交25比索的地租，外加内湖省省长、塔沃拉计划监督官、西班牙人路易斯·阿里亚斯·莫拉的敲榨勒索、刑罚和其他虐待。潜藏于卡兰巴华侨心中的怒火，只需一星半点火种，即可成为燎原烈火。

其他华侨的日子也不好过。科奎拉赴菲上任，路经墨西哥时，看到各地仓库里尽是因价高无法销售的中国织物和其他商品。莅任之后，他未发贸易船去阿卡普尔科。结果，马尼拉以至整个菲律宾市场上缺乏白银的情况更为严重，菲律宾商业也受到更大的打击，进出口关税收入大大减少。原来就已空虚的国库，早已无法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现在情况更加恶化了。为了解救困难，当局加紧对华侨的强课滥征，一般商品也任意征调。缺乏正常补给品的西班牙士兵，常常到华人住宅，任意抢掠食物和衣物。由于没有从墨西哥运来的资金，已购买华侨货物的马尼拉商人无以偿付货值^①。凡此种种，都使华侨正常生计无法维持，商业不能继续。一些人被迫作归国计；更多的人继续留在居留地，但他们的激愤情绪，已无法控制了。

1639年华侨抗暴斗争的导火线，是殖民者催迫卡兰巴华侨交

^①BR, Vol.29, P.208 note 50; Vol.36, PP.49—50.

纳地租。华侨无钱交租，而西班牙人却四出催迫。地租之外，莫拉又乘机进行形形色色的勒索，且不时施加强暴。走投无路的华侨，“为求解脱他们颈上的枷锁，铤而走险”^①。他们用砍刀、鹤嘴锄、长矛和绑扎在竹、木竿上的大小镰刀武装起来，于11月19日冲进卡兰巴镇，杀死莫拉和两名神父，纵火烧毁他们的住宅和教堂，捣毁附近村庄的教堂。抗暴斗争爆发了^②。

起义华侨把妻儿隐置山林之中，做长久之计。然后，集中三千精壮，浩浩荡荡向马尼拉进发。

直至20日夜间，马尼拉当局才获知卡兰巴华侨起义的消息，但详情不明。殖民当局立即采取防卫措施：向马尼拉全城及其郊区示警，也借此向郊区华人进行恫吓；让住在郊区的西班牙人迁移入城，以策安全；连夜派遣30名骑兵驰往出事地点，以便查明情况，伺机打击起义者；派人至卡维特港，通知当地军事长官做好防备。

21日早晨，向马尼拉进军的3 000名华侨起义者在圣佩德罗·图纳桑附近与西班牙骑兵遭遇。起义者杀死陷入泥淖的骑兵头目及其三名同伙。其余西兵退至帕拉尼亚克村。华人虽有不少伤亡，但士气大为振作，队伍增至4 000人，乘势北进。当日抵达马尼拉附近的圣佩德罗·马卡蒂，包围并进攻这里的一所耶稣会教堂。这座教堂的神父指挥聚集在教堂中的当地人顽强抵抗。正在这个时刻，军士长胡安·阿尔塞奥带领西班牙骑兵80名、步兵200名以及100名庞邦加土兵，400名泰加洛土兵，全都配备火枪，

①BR, Vol.29, P.209.

②有关起义的情况，除另注者外，参阅BR, Vol.29, PP.201—207, 208—258;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Philippines, PP.389—392.

并备有两门大炮，前来进攻起义军。经过短暂的交锋，起义者要求停火，西班牙人也同意谈判。岂料停火谈判正在进行，西班牙军的一名副官突然率25名士兵，从河道向群集在一起商讨和议的华侨发动猛烈攻击；阿尔塞奥也背信弃义地指挥西军和士兵，追逐已经走散的起义者。起义者由于武器简陋，组织不严，毫无作战经验，死亡千多人，被俘300余人，不得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绕过马尼拉，前往北面的圣马特奥和塞拉马德雷丘陵；另一部分大约1500人撤回·卡兰巴，在附近的苏卡尔山筑堡自卫，人数很快又增至2000人。阿尔塞奥领兵追赶后一支队伍，途中与一支约500人的士兵会合后，分兵两路，登山合击起义者。起义者以石头、长矛为武器进行反击，但终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当场被杀死1500人，幸存者逃进丛山深谷，后来也被搜捕杀害。

西班牙人取得胜利，以为华侨起义“已告结束；因此在第二天（星期天），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唱起了赞美诗。”^①

但殖民者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的屠杀暴行，激起各地华侨的仇恨。就在他们庆祝“胜利”之际，萨加尔（今黎萨尔省省会巴石城）的华侨农民起事，烧毁农庄，鼓动各个庄园以至于马尼拉的华侨参加起义。他们连夜出发，于11月29日黎明抵达梅哈利吉农庄。西班牙殖民当局慌忙派遣正在凯旋归来的阿尔塞奥迳直赶往圣克鲁斯，以防止起义者占领该村，阻止起义者与帕利安华侨的联合，力图制止起义的进一步扩大。总督也亲自出马，前往圣克鲁斯进行部署。圣克鲁斯的华侨（都是已婚基督教徒）试图占领该村、俘获科奎拉。后者逃脱之后，立即命令西军向该村开炮、纵火。在熊熊大火中，西班牙人及他们所纵容的土著，对该村华人住宅肆行抢掠。接着，西军开往梅哈利吉，并立即派遣骑兵、

^①BR, Vol. 29, P. 205, 215.

步兵和日本人对那里的起义者发起进攻。起义者顽强战斗，歼灭一批西班牙官兵和打死23名日本人，迫使殖民军退回圣克鲁斯，但自己方面也受到不小损失。

起义队伍进一步扩大。帕利安方面也有起事之势。圣克鲁斯和马尼拉都受到严重威胁。科奎拉命令驻圣克鲁斯的殖民军撤回马尼拉，以保该城安全。他又下令拆毁巴石河上的桥梁，毁掉船只，防止起义者渡河攻城。他还命令军队，如发现帕利安有一点异常情况，即以大炮轰击。

起义队伍声势日盛，西班牙人人心惶惶。起义者在河对岸窥视马尼拉，但无法渡河。西班牙人也无力同起义者较量。从11月26日至12月2日，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西军从河北岸撤回马尼拉后，对上述几种预防措施仍不放心，担心城内的华侨同起义者里应外合。科奎拉下令杀死城内全部华侨，凡藏匿华侨者以叛逆罪论处。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和两名其他官员，由一支别动队陪同，逐户搜捕华侨，一经抓获，不问情由，就地处决。“所有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到濒死的华人。他们的哀号声和哭泣声，即使是处于全面的战乱之中，还是使人油然产生怜悯之心。”^①帕利安华侨闻此噩耗，悲愤交加，决定起事。12月2日午前10—11时之间，他们愤然行动，杀死若干西兵，高声呐喊：“拿起武器反对西班牙人！”“冲过桥去！”希望同河北的起义同胞汇合。西班牙人连忙派人防守桥梁^②，迫使起义者撤回帕利安教堂。科奎拉鉴于人力缺乏，又怕帕利安的起义者攀

①BR, Vol. 29, P. 222.

②这里有关桥梁的叙述，明显地同上述科奎拉下令拆毁桥梁的命令有矛盾。桥梁是否已拆毁，文献记载不详，笔者只好存异。BR, Vol. 29, PP. 219, 221.

墙进城，使命神父和修道士守护城墙，同时持续发炮，向帕利安进行残酷的轰击。许多华人在炮火下丧生。帕利安变成一片火海。不少人为了逃生，冲向河里，但随即落入敌人手中，被折磨至死；有的人躲在家中，被活活烧死。帕利安的建筑，连同它的贵重商品和其他财产，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化成灰烬。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一天被屠杀的华侨也达3 000人。西班牙人杀红了眼，甚至连两百名次日从躲藏处出来请求宽宥，显然是未参与起义的华侨商人也不放过。

12月5日，科奎拉不顾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悍然向各地发出命令，要西班牙地方官员处死当地所有的华侨。于是，各地相继对华侨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中卡维特港的大屠杀，尤其令人发指。

卡维特要塞长官接到命令后，看到整个港口的华人都慌乱不已，便假意宣布，为他们的安全计，需要他们集中在一起。半个小时内，就有大约1 000华侨集中到市政大厅。这位长官要求各教会的修道士给这些华侨中的非基督教徒施洗礼，听取其中的基督教徒的忏悔。接着，这位名叫阿尔丰索·加西亚·罗梅罗的要塞长官，借口总督要召这些华侨去马尼拉，把华侨10人一批地领出，在外面逐一斩首。在300人被杀后，厅里的华侨开始觉察到西班牙人的诡计和暴行，起而自卫。他们用砖头、瓦片掷击厅内的西班牙人，放火焚烧建筑物，推倒墙壁，使400人得以逃生。他们冲出大厅，冲破西班牙人和日本人的堵截，奔向海滩。在那里，约有30人被西班牙人射杀，其余大部分人在12月6日被抓获处死，另一些人被迫自尽。只有23人死里逃生，辗转来到马尼拉附近的起义者那里。7日，屠杀仍在继续。这时，屠刀是向着躲在各住宅里的华侨。这样，三天之内，卡维特港的华侨被杀者共达1 300人。紧接着起义的卡维特500名华侨农耕者，也很快被消灭

净尽；分散在附近的西兰和马拉冈顿的华侨450人也遭死难。

根据科奎拉12月5日的命令，吕宋各地华侨被杀人数如表4。

表 4

地 点	迪亚斯《征服记》 的数字		《华人起义记实》的数字	
	被杀人数	被俘人数	被杀人数	被俘人数
卡 维 特	1 100	600以上	1 300 *	
马拉冈顿和西兰			450	
庇 邦 加	1 800		600	
布 拉 干	500以上		300	
顿 多 省	300			
内 湖 省	200			
塔阿和巴拉扬省			500	
邦 加 斯 南	500		200	
伊 洛 科	100			
桑巴列斯海岸等地			600 * *	

资料来源：BR, Vol. 29, PP. 226—227, 227note 67.

*另卡维特地区农耕者500人。

* *仅为发现尸体数。

无数华侨在起义后的半个多月中被杀害，但起义并未停息。

巴石河北岸为数众多的华侨起义者，在丘陵间筑工事扎营。西班牙殖民当局能集合起来打仗者不足300人，守城尚且感到力量不足，更没有多余的人力用于进攻北岸的起义者。双方隔岸对峙又达20日之久。

直到这时，西班牙人才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和危险性。科奎拉加紧储备粮食和弹药，同时向庞邦加、桑巴列斯等地征集士兵。

士兵到达后，西班牙人对华侨展开小股袭击，并在接近起义者营地的有利地点设岗扎营，以便对起义者实行包围。为着消灭起义者的有生力量，科奎拉以重奖鼓励士兵猎取华人首级。每天都有许多华人首级带进马尼拉城。

起义者不断遭到损失，却又无法过河打击敌人，便于12月2日晚，趁着夜色撤走。西班牙人进行追击，使起义者受到不少伤亡，一再北撤。他们曾一度试图取道庞邦加，前往邦加斯南，但由于西军的堵截而未果。他们折回巴石河北岸的波考埃和圣何塞，又一次威胁马尼拉。时已1640年1月初，战争又回复到僵持状态，双方各有进退。西班牙人再次故技重演，在接近起义者处筑堡建塔，架大炮，设栏栅，兵力一再增加。起义者屡次试图夺取敌人的堡垒，但都未能实现，反而受到重大伤亡。1月10日再度撤退。殖民军追杀半西里，杀死起义者1500人。

由于武器的落后，使起义者从抗暴斗争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军事组织的不严密，没有正确的策略思想作指导，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及在殖民者政治煽动和宗教麻痹下，土著人对起义者的不友好态度，使这种劣势更形明显。在将近两个月的斗争中，经过不断的作战消耗，起义者损失大批有生力量。但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暴行仍在继续，猎取华人首级的奖励，杀害全部华侨的命令仍然有效。这些都使起义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抗

暴斗争一干到底。

起义者撤出波考埃，开回萨加尔和圣马特奥。最初，他们分成小股活动，觅取粮食，但很快又集中起来，在山上建起营地和掩蔽所。不久，在殖民军追击下，他们又被迫退至安蒂波罗山区，占据高地，用石料建筑围墙，层层构筑工事，准备长期据守。在这里，他们曾予西班牙人以沉重打击——杀死他们约20人，本身也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后，起义华侨不得不放弃这个营地，先后撤回塔马、卡因塔等村庄。这时，队伍的人数已不足2000人了。

起义者退出安蒂波罗山区后，人员又有损失，士气有所低落，一些人已开始动摇，甚至冒死离开营地，去向西班牙人要求宽大。西班牙人为要分化起义队伍，实现早日结束战争的目标，便把这些变节者送回马尼拉。但是，更多的人对殖民者不信任，宁可继续战斗而不愿乞求宽宥和投降。形势的发展，对起义者越来越不利了。当局乘势授权圣克鲁斯村的耶稣会神父奥诺弗雷·埃斯夫里与起义者进行谈判。科奎拉要神父向起义者转达：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即可获得宽赦和友好的对待。华侨鉴于总督处死各地全部华侨的命令仍未撤销，对当局的许诺持怀疑态度。科奎拉一方面对其未撤销屠杀命令的行为进行辩解，说什么在仍有一部分华人战斗的情况下，让另一部分华人自由是荒唐的，因为后者将利用给他们的第一个机会，再次拿起武器反对西班牙人；一方面又施加威胁，说什么如果华人不知利用目前的机会，实现和解，他们全体将彻底灭亡。起义领导者深知，自己方面已处于绝对劣势，和解的条件已取决于西班牙人，只要在放下武器后享有人身安全，和解还是可以接受的。就这样，起义者作出了同意放下武器的答覆。

1640年3月15日,8 000名华侨^①交出他们的武器,向殖民当局投降。殖民军把他们押送马尼拉。在那里,他们被分成两部分——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前者被允许在圣克鲁斯耶稣会教区居住。后者则被指定在比农多的多米尼克会教区;那里有围墙围住,关在里面的人被禁止超越围墙半西里,违者严惩。

华侨的抗暴斗争,经过近四个月的浴血奋战,至此结束。

在这次斗争中,2.2万华侨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批与起义毫无关系的华侨和平居民死于殖民者的魔掌。这次残酷的大屠杀,使华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长达六个多月中,河水被尸首弄得恶臭异常,以致不能饮用。在许多西里范围内,人们也不敢食鱼,因为这个范围之内的鱼儿,都因啖人肉而变肥了。”^②华侨的财产受到无法统计的损失,仅帕利安所损失的货值即达500万比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西班牙人仅丧失40或45人,土著约300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到殖民者嗜杀成性到了什么程度。

华侨的抗暴斗争结束之后,殖民者立即加强对华侨的限制,宣布完全禁止华侨到各地,不管他们是居民还是行商,俱在禁止之列。但是,华侨的斗争并非是毫无成果的。科奎拉鉴于华侨对卡兰巴计划的反感,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臭名昭著的卡兰巴计划,终于在华侨的斗争中彻底破产。

1639—1640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进行大屠杀时,明政权正受到农民大起义和满族统治者的夹击,濒临末日。如果说,在1603年的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明政权还例行公事,传檄吕宋,

① de la Costa所据的数字是6 000,见他的前引著作《耶稣会会士在菲律宾》第392页。BR, Vol. P.258所列具体数字为7 793人。

② BR, Vol. 29, P. 249 note 73.

总算表明它对那桩严重事件的态度，那么，对这次大屠杀它干脆保持沉默了。客观上，明廷前此向西班牙人称1603年被杀华侨为“弃民”、“贱民”，已使殖民当局在新的一轮屠杀中消除后顾之忧；现在，明朝统治岌岌可危，殖民者在屠杀中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第 六 章

17世纪中后期华侨的处境和殖民者 对华侨的第三第四次大屠杀

一 17世纪中叶菲律宾的形势 和华侨的处境

17世纪40—60年代，菲律宾西班牙人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荷兰人对菲律宾虎视眈眈，在军事上同西班牙人展开激烈的争斗。不堪西班牙殖民者奴役的菲律宾人民，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反西浪潮。殖民者遭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和物质全面匮乏。

自16世纪后期以来，荷兰人一直想染指由葡萄牙人垄断的香料贸易。1594年，当时兼有葡萄牙及其海外领地的西班牙禁止荷兰和英国使用里斯本港，促使荷兰人作航行东方的尝试。1595—1597年，荷兰人远航爪哇成功。从此，它在东南亚迅速扩展势力，到17世纪初，已在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等地确立势力，且把军事力量伸张到摩鹿加、班达两群岛，在那里建立一系列要塞，派军驻守，同西、葡对抗。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阻碍着荷兰独吞摩鹿加野心的实现；马尼拉作为远东贸易中心，以及它的战略地位，又使荷兰人垂涎欲滴。这两种因素使荷兰人滋长占领菲律宾的野心。从17世纪初年起，荷兰人不断侵扰菲律宾沿海战略重地，拦截和劫掠至马尼拉贸易的商船，甚至封锁马尼拉湾。在他们侵入澎湖（1622），占领台湾（1624）后，更

加紧了对菲律宾的军事活动，阻截马尼拉同中国、日本的贸易。对大帆船贸易，对菲律宾从墨西哥取得接济，也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荷兰人的军事威胁，使西班牙有丧失西太平洋全部领地（包括摩鹿加群岛）的危险。西班牙殖民当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荷兰人进行反击，在1600、1610和1617年给荷兰人以重创。1606和1616年又两次远征摩鹿加，但第一次远征无战果，第二次则半途而废。从20年代至1642年，荷西之间的争夺扩展到台湾，但以西班牙人被赶出台湾而告终。以后几年，特别是1646年，战争不断，海战不下五次。1647年发生决定性战役。荷兰舰队进入马尼拉湾，炮轰卡维特，占领科雷言多岛，蹂躏巴塔安地区。西菲军队给入侵荷军以重创，迫其退出菲律宾。1648年，西荷两国签订芒斯特条约，荷军的侵扰逐渐减少，但至60年代才完全停止。

荷兰人在几十年间对菲律宾的侵扰，加重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军费负担，使它的财政更加支绌；当地的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同邻国的贸易逐年减少。

马尼拉当局的经济、财政困难，复因下列原因而加深。

17世纪40年代，中国正值明清交替，战乱不已，生产凋败。中国对外贸易，因而面临极大的困难。据西班牙人记述，1644年到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仅三艘；另有三艘被荷兰人截获，货物全部被掠，人员大部分被杀。1647年来菲华船、华货也很少。中国及菲律宾其他邻国对马尼拉贸易的明显减少，使殖民者生活、贸易、军事供应产生困难，也大大减少了殖民当局的关税收入。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同荷兰人对抗，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对土著人进一步实行强征滥调，从而激起持续不断的地区性起义。结果，为要镇压这些反抗斗争，又得增加对内的军事开支。

17世纪中期，由于每年从墨西哥运来的财政津贴的减少（某

些年份甚至没有津贴或其他接济)，由于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船、接济船不断失事，由于多次火山爆发和地震所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以及南部摩洛人对吕宋和中部群岛的武装袭击，更加深了殖民当局的各种困难。

西班牙殖民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打败荷兰人，消除了荷人对菲律宾的威胁。这毋宁说是殖民者利用土著人对天主教的感情，以及借助对后者进行欺骗性政治宣传，鼓动他们为殖民者火中取栗的结果。土著人为此作出巨大的牺牲。但在同荷兰人对抗期间，殖民者对土著却乘机加强奴役，实行更加残酷的掠夺政策——强迫劳动制和强迫出售产品制。根据强迫劳动制，除了酋长和他的长子之外，所有土著都必须服劳役，其中包括伐木、运木、造船、筑堡、在战船中充当水手和桨手，等等。这种劳役极其繁重，劳动条件非常恶劣。而且极少付酬，只发给必需的口粮。按照强迫出售产品制，殖民当局强制土著出售他们的产品，而只给交售者象征性的代价，甚至只发给期票。劳役的折磨以及交售制所导致的饥饿、疾病，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使土著人口显著减少^①。人民对强迫劳役、对无偿强征农产品的强烈不满，同对大封地制度、对教会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因而，从17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爆发了一系列的反西起义。其中主要的有卡加扬(1621、1625、1629和1639)、保和及莱特(1622)、庞邦加(1645、1660)、邦加斯南(1660—1661)、萨马(1649—1650)、班乃的奥顿(1663)、桑巴列斯和伊洛科(1660—1661)等地的起义。在60年代中吕宋——庞邦加、邦加斯南、桑巴列斯的反西起义中，据说都有许多华侨同土著人民并肩作战。一位西班牙人在写到1661年这几处起义时说，无论什么时候西班牙人同菲律宾人作

^①D.G.E.霍尔：《东南亚史》，第315页。

战，在战场上都可以发现许多华人的尸体，因为在所有的场合中，华人都充当菲律宾起义者的辅助部队^①。

由上可见，在40—60年代，菲律宾正值多事之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那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比菲律宾还要坏得多。清兵南下过程中，对坚持抵抗的城市动辄屠城。“迁界”对人民为害之甚，仅次于屠城。迁界一经实行，沿海30里宽、几千里长的范围之内的居民，都得弃家内迁。在内迁过程中，情况惨不忍睹。据海外散人所著《榕城散记》（抄本）记述，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福建、浙江、广东、南京（江南）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负妻子，载道露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途，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担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沿海人民，特别是漳、泉一带人民为求生存，冒险出海。他们有的参加郑成功的队伍，投身抗清斗争；有的流寓南洋各地。已两次发生过屠杀华侨事件、局势动荡的菲律宾，也成了自发移民的目标^②。

西班牙殖民者镇压了1639年的华侨反抗斗争之后，一方面加紧对劫后余生华侨的迫害，一方面又着意鼓励华人前来贸易。

对华侨的迫害，除上章末所列的隔离、限制之外，经济上的迫害也加强了。为了说明经济掠夺的残酷性，下面详细地介绍殖民当局一名高级官员的证词。

1644年8月，科奎拉总督卸任，由迭戈·法哈多继任。由法

①BR, Vol, 41, P. 86.

②居留菲律宾的中国移民，原以福建漳、厦人为主。经过1603、1639年两次大屠杀，漳、厦移民多视菲律宾为畏途。此后菲律宾华侨以福建泉州地区移民为最多。

哈多总督主持特别法庭^①，对卸任总督科奎拉进行审查。马尼拉最高法院检察官塞瓦斯蒂安·卡瓦列罗为此提出一份证词^②，揭露科奎拉对华侨惩罚性地征收新税。证词用22个论点论证科奎拉在任期间征收、保管和使用这些新税的非法性。诚然，这种控告，纯粹是出于新总督对其前任例行审查的需要，也属殖民官员对其原上司挟嫌报复的一种方式。在这次审查后，特别法庭虽然判处科奎拉以五年监禁和25000比索罚款，但这对华侨却毫无意义。因为在审查之后，科奎拉所加征之税继续征收。但这份证词毕竟是通过一位高级殖民官员之口，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盘剥的严重性和非法性。

据卡瓦列罗的证词，科奎拉1635年上任伊始，即向希望离开马尼拉城到外边做买卖、做工、耕种土地和从事一些最低下工作的华侨，在征收8比索5里亚尔的许可证费之外，另征11里亚尔（即1比索3里亚尔）的特别许可证税。这样，一个要到马尼拉之外营生的华侨，每年为取得普通许可证和特别许可证，就必须缴付10比索的费用。在镇压了华侨的反抗斗争之后，科奎拉“为惩罚华侨”，下令对华侨征收10比索的普通许可证税，以代替1639年以前的8比索5里亚尔。凡欲离开帕利安赴其他地方营生者，必须另外缴交10比索，以领取另一种许可证，即称为“政府”或“筑堡”许可证。1643年，又向华侨征收6里亚尔的特别税，叫做临时许可证，以此集资修建巴贡巴扬的工事。

该检察官认为，对华侨加征捐税和设立新税，是非法的，有害的。所以说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卡瓦列罗举出许多论据，其主

① “特别法庭是西班牙在菲律宾及其他殖民地建立的一种特殊制度。它是对于任期届满的政府官员的审查……由他的继任人主持审查。”

Zaide,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P. 81-80.

② 证词全文见BR, Vol. 35, PP. 185-195.

要点可以归结如下：（一）总督无权订新税；有关用加税和征新税惩罚华人的做法，事先并未获国王钦准；（二）菲律宾并未出现紧急、迫切的情况，例如以通常的收入无法维持统治或继续军事行动等，因而不能证明加税、增征新税是正当的；（三）加税和增征新税对贫富人同等对待，是不公平的；（四）总督有权修理现存防御工事，但无权建筑新的工事。而旧的靠征税建起来的工事，因已证明有利于敌人，不利于西班牙人而被拆毁。再者，国王早已指定把每年纸牌垄断所获得的3000比索，专用于筑堡和修理马尼拉城墙上的防卫设施。如此款不敷应用，必须征收新税和特别税，那也只能向本城的市民和那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征收，因为修理上述防御设施是为了庇护和保卫他们个人及其财产的。因此，上述税项不应加在作为外国人和暂居客的华人头上，因为他们今年来做生意，明年就回国了。况且修理这些防御工事是针对他们的，是一种仇视他们的标记。

在卡瓦列罗看来，加税和增征新税所以有害，是因为华人所缴交的款项本已非常巨大，再加征和设新税，是必然要招致风险的。华人受到诸多勒索和摊派的压迫，可能要放弃对菲律宾的贸易，从而使国王陛下丧失已经确立起来的中菲贸易。

卡瓦列罗最后以有力的事实，强调说明对华侨征收苛捐杂税已造成的社会后果。他说：

这种许可证新税，已对整体福利、公众利益造成普遍的损害。……1639年，2法内格大米值4里亚尔，现在1法内格就值2比索，零售价更高。其原因是本群岛的主要农夫是华人。他们不缴付高至10比索的许可证特别税，就休想自由外出劳动和耕种土地。对他们来说，为这种劳动而出外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农夫中的大多数总是贫穷和卑下的人。……在渔业和其他必不可少的职业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华人是菲律宾的支撑者——就

涉及这个国土的给养，以及这种新税已使这种给养中断而言。……如果从中国到本群岛谋生的华人，来时不名一文，却要为普通许可证缴付10比索，为筑堡许可证（即特别许可证——引者）缴付10比索，此外还有给书记官的费用，那么，他的劳动及劳动产品收双倍价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情况：纵然一个工人——木工、石匠或其他工人的正常工资以前是2里亚尔，现在却要4或5里亚尔；而且，这些工人还不愿意为这样的价钱去干活，还得恳求他们，给他们以所要的价钱，因为再也没有其他人能干这些活了。一双鞋从前值两里亚尔，现在值4里亚尔；从前做一套外衣花2比索，现在得花四五比索；其他一切事情的情况莫不如此。这全都导源和始于1639年，随着普通许可证和筑堡许可证的新税各10比索的征收，他们负担的增加而来的。这种负担是如此之重，以致我认为，在属于西班牙王国的各个国度中，未尝有过一种个人的摊派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

在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掠夺的检察官笔下，华侨的情况已是如此可悲，那就更不用说身受其害的华侨该是多么痛苦了。在这种水深火热的处境中，华侨经常参加土著人民的反西起义，那是很自然的。

但殖民当局又着意吸引华商来菲贸易。鉴于原来的帕利安已在1639—1640年的起义中烧毁，殖民当局在起义过后的1640年在拜拜村另建新帕利安。把帕利安建在马尼拉隔河的东北面河口处，显然是出于所谓安全的考虑，因而当局不顾马尼拉城居民到对岸购物的不便，也不再考虑这些中国“异教徒”影响土著皈依者的危险。这次，帕利安是处于马尼拉以致整个菲律宾最著名、最重要的圣地亚哥堡的大炮射程之内。两年以后，即1642年，这个帕利安在华人祭拜祖先时，连同大量货物被一烧而空。受大火牵连的比农多村也大部分被烧毁。1644年，帕利安重建于马尼拉城东的圣加夫列尔堡附近，在该堡枪炮射程以内。

在40、50年代,华侨人口又逐渐增加。莱托纳在其1662年写的《菲岛纪事》中提到,通常帕利安有1.5万华人^①。如果按通常帕利安华侨占菲律宾华侨总数二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计算,全菲华侨人数当在2—3万之间。

华侨每增加到一定数量,西班牙殖民者的恐惧症就要发作一次,就要寻找借口屠杀华侨。这次的借口,是所谓防止华侨作郑成功侵略菲律宾的内应。

二 郑成功护侨的正义行动

1644年,清兵入关,清政权建立。第二年,清军攻陷南京,俘明福王。明朝的忠贞之士,振臂而起,勤王复明。郑成功于1647年起兵勤王,以东南沿海为活动舞台,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反清复明斗争,转战于东南沿海四省。1659年,郑成功率军围攻南京,功败于垂成,退回厦门,转图台湾。1661年初,郑成功率领将士在台南禾寮港登陆。经过几近一年的战斗,迫使荷兰的台湾总督揆一于1662年2月1日投降,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在台湾发展生产,厉行法治,鼓励大陆人民移居台湾,设立乡塾,提倡教育,亲善高山族,振兴海外贸易,锐意开发台湾。

郑成功在鼓励沿海流离失所的人民到台湾的同时,也帮助希望转往海外谋生的人到南洋各地。一些明室宗族,亦赖郑成功的船只南渡至南洋而成为华侨。据写于清嘉庆年间的《西山杂志》(手稿)记述,明朝岷王子等90余人,由厦门航海到暹

^①BR, Vol. 36, PP.203—205.

罗；鲁王子等70余人由金门航海到菲律宾北部岛屿；福王子、唐王子则先后航海至爪哇^①。由于郑成功有较深的海外因缘（父亲曾旅居日本；或说他曾作为进出口商和成衣商而在帕利安居留过；母亲是一位归化日本的华人的女儿），祖籍又是著名的福建侨乡——南安，且长期以侨乡厦门为根据地，同东南亚各地有广泛、密切的贸易联系，因此他很了解侨情，关心华侨的疾苦，对菲律宾华侨所处逆境尤其关切。据《台湾通史》所载，南洋“诸岛之中，惟吕宋待我中国最无礼，先王（郑成功）在口，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国人之恨。然因开创，至世藩业已兴师，乃接耿藩之变，遂移兵过厦，而事又止。”^②但郑成功还是在1662年4月遣使致书菲律宾总督，谴责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残暴行为，表明维护华侨利益的严正立场。现将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之国书》^③全文转录于下：

大明总统使国姓爷^④寄马尼拉总督曼利克·德拉腊之宣谕：承

①引自蔡力哲：《郑成功与华侨》，《福建日报》，1982年4月14日。

②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5页。

③该国书中文本已散失，存世者仅西班牙文译本。见 F. Combes' Historia; Diaz's Conquistas; Murillo Velarde's Historia de Philipinas等书，中文译文原见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台湾风物》4卷1期。转引自林金枝、韩振华：《读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中国历史上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先驱》，《南洋问题》1982年3期。

④1645年，郑成功被隆武帝朱聿键赐国姓（朱），国人因尊称之为“国姓爷”。西方史家循国人尊称，称郑成功为Koxinga, Cotsen, Cogsen, Cogsin, Kuosing, Kuesing，也有称他为Pumpuan, Pompoan的。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1860

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咸宜效顺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勒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1661）四月率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

你小国与荷夷无别，凌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你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唯念你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你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敕宣谕。倘你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覆命，予当示恩于你，赦你旧罚，保你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你邦贸易；倘或你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唯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①三月七日。国姓爷。

纵观全书，内容有二。一是以荷兰人“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且经屡谕，仍“执迷不悟”，遂招讨伐的“前车之鉴”，开宗明义；喻西班牙人毋“虐我百姓”，“凌我商船，开争乱之基”，并为退到这种正义要求而用了“原拟率师亲伐”，但“暂留师台湾”的措词，暗示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性，既警告了西班牙殖民当局，又给它留有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的余地。从上下文看来，郑成功之遣使赴菲，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可以说，护

①永历帝死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但郑成功及其子郑经、孙郑克塽继续奉永历年号，直至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政权归顺清政权时为止。

侨护商，是郑成功致书菲律宾总督的主旨。二是向马尼拉当局提出“每年俯首来朝纳贡”的要求。对此，没有要必为郑成功之未能审时度势文过饰非。但从全书内容来看，这是附带性的。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完全不提郑成功的护侨护商要求，反而片面强调郑成功要求“菲律宾应向他纳贡，并以荷兰人的实例相威胁”^①。而后世学者，乃至中国学者，也未辨是非，过分渲染“纳贡”方面，不提护侨护商方面，从而实际上把郑成功描写成一个侵略者、暴君，甚至是“东方阿提拉”^②。这是极其不公正而且违背历史事实的。

三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三次大屠杀

1662年5月5日（阴历三月十八日），受郑成功派遣、由比托利奥·利西神父^③陪同的中国使节抵达马尼拉。由于西班牙人事先已得悉利西等一行的使命的性质，郑氏政权使节受到冷淡的接待^④。菲律宾总督曼利克·德拉腊全面拒绝郑成功的指责和要

①BR, Vol. 36, P. 219.

②引自G·F·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1, P. 281 note 57. 阿提拉为匈奴帝国国王（433—453），曾横扫西罗马帝国，有“上帝之鞭”之称。

③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多米尼克教派神父，是最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Mateo Ricci）的亲属。1648年抵马尼拉，在华侨中传教及习华语达7年之久，然后到厦门传教，结识郑成功，深得郑氏父子赏识，因而在1662、1663年两度受托赴马尼拉交涉。

④一些著作、论文说：利西等一行“受到隆重的接待”，这与当时的文献记录相悖。参阅BR, Vol. 36, P. 219.

求，并写一封措词轻蔑的信函作覆，立即打发中国使节回国。

当时，马尼拉只有600名西班牙士兵，其中胜任作战、守城的不足200人。殖民当局前此备受荷兰人的侵扰，财政支绌，物质缺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在菲西班牙人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因而处于内外交窘之中。

殖民当局收到郑成功的信之后，便进行战争准备，并编造了郑成功写信给在菲华侨，要他们为他攻菲作内应的谎言，以便在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中造成危机感，从而达到既做好郑成功来攻的防御准备，也转移内部矛盾，使当局摆脱窘境，又煽起新一轮排华浪潮的三重目的。

殖民当局的备战活动，是与排华行动同时进行的。

为了煽动排华，拉腊首先下令驱逐非基督教徒华侨。但他马上发现，没有足够的船只运载那样大量的人回中国，于是便公布另一项命令，规定全菲华侨集中到帕利安和比农多，把这里作为非基督教徒华侨的囚禁区；俟后，在囚禁区以外发现任何华人，都予处死；华侨的财产同时予以冻结^①。

为了加强马尼拉的兵力，当局放弃在摩鹿加(德那特)和明达瑙岛上的伊利甘、三宝颜的前哨基地，将上述基地的驻军和分散于全菲的驻军集中到马尼拉。同时加紧向马尼拉邻近省份征募土著部队，以增援马尼拉的守备力量。又从养马场运来战马，以便在军事当局迅速控制各通道之后，制止华侨任何“轻率的企图”，迫使他们平静地上船回国。在所有据认为有可能受侵犯的海滩驻

^①Charles J. McCarthy, *On the Koxinga Threat of 1662*,

另有人说“政务会议终于作出结论：中国商人可以允许随身带着他们的财产，与他们的商品一起，平静地回中国去。”见BR, Vol. 36, P.221.

扎骑兵部队。吕宋各养马场的马匹因而被抽一空。

殖民当局驱使土著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日夜轮番挖掘壕沟，垒建胸墙，修理城墙和构筑工事。城墙的修理和堡垒的构筑，平时一直是进展缓慢，代价高昂的，现在却以很少的开支而进展神速。

当局下令拆毁了马尼拉市郊区巴贡巴扬、埃尔米塔、马拉特、帕拉尼亚克、迪劳、帕利安、比农多和圣克鲁斯的教堂。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发生战事，这些教堂可能成为敌人的观察哨、指挥所，并对敌人的进攻起屏障作用。再者，修城、筑堡也急需大量石料；拆毁这些教堂，可以解决上述急需。

为储备物资，殖民当局派出人员到吕宋各地，搜刮大米及其他食物。卡维特造船厂也乘机催索更多的木材、枪木、绳索；大批土著为此被驱进原始密林，在监工的监视和鞭打下采伐木料。

对于西班牙殖民者这种备战措施，英国人福尔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切战备都已处于有准备状态时，西班牙人便千方百计地挑动华人造反，以便为大屠杀找寻借口。”^①

华侨以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西班牙人的行动。他们意识到，由于西班牙人煽起对中国人的仇恨，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是第一批受害者。某些受殖民者蒙蔽的人，包括土著士兵，在街上向华侨耀武扬威。他们威胁华侨：所有男性华侨都已被判死刑，行将被梟首；5月25日将是华侨灭亡的日子。他们对华侨肆加侮辱，任意伤害，对帕利安华商的财产、货物随意抢掠。意味深长的是，24日夜晩，卡维特的西班牙军事长官传给拉腊一个“消息”，说帕利安华人将在次日发动叛乱。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

^①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77.

间内，彼此之间又如此默契，如此带有挑衅性，以致使人强烈地预感到华侨又将要遭受一次浩劫。华侨对前两次惨剧记忆犹新。但面对新的屠杀威胁，因经济地位不同，华侨的应变措施也不一样。包括小商贩在内的劳动者，在形势危急的24日晚就开始逃亡，试图避免屠杀的厄运，而不是以孤注一掷的反抗斗争来促成殖民者的屠杀计划。帕利安的华侨商人，考虑到自己的身家财产和货物（当时还是商船来马尼拉贸易的季节），不敢轻举妄动。当25日拉腊到帕利安，力图稳住华侨的情绪（阿库尼亚在1603年也曾这样做）时，帕利安华商要求他提供保护。拉腊答应派一支小部队保护他们。

当天，拉腊召集30名中国船主到城里开会，说是要讨论保护华侨问题。此举在华侨心里投下了新的阴影。整个帕利安都为这30名同胞的命运担心。许多人走出帕利安，停在马尼拉帕利安门前，怀着忧虑的心情，同这几十名船主作最后诀别。当最后一名船主要进入城门时，一些华人拦住他，把手放到他身上，表示不忍他就此去送死。就在这当儿，城门上的西军突然向拥挤的人群开火。圣加夫列尔堡也向帕利安发炮轰击。有的人当场被打死打伤。商人们遭此猝然打击，顿时发出惨叫哀号，四下夺路逃跑。混乱中，又出现新的传闻：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都要来进攻他们，把他们通通赶进河里。

自利西一行抵马尼拉时起，二十天来一直担心出现大屠杀的华侨，把25日在帕利安城门所发生的一切看作是大屠杀的前奏。在帕利安的华侨商人都惊惶失措，为着逃生，慌不择路。许多人冲向河边，有的乘独木舟划向正待启航回国的中国商船；有的凭着几根竹竿浮游，力图游向中国商船或对岸的圣克鲁斯。由于人心慌乱，人群拥挤，加以有些人不熟悉水性，当场溺死不少。还有许多人同马尼拉郊区的华侨一起，被股股地逃到附近的农村、

山区，同早先的逃亡者会合。大约有1 500人，在事发后感到走投无路，在绝望中上吊或投河自尽。

据说，当时仍有八九千华侨留在帕利安^①。他们在恐怖中沉着应变，但饱受轮番抢掠的侵扰。拉腊派来“保护”帕利安的西班牙骑兵，实际上是来监视华侨的行动的。他们到来之后，抢掠行为继续发展。

因害怕华侨起来武装对抗，拉腊又一次到帕利安，要求华侨保持镇定，以防止事态发展到西班牙人无力控制的地步。拉腊清楚地知道，当时国库中没有钱，农村歉收，城市缺乏食品供应。没有足够的人力配置到城墙上。公开的冲突，将使物质和人力的缺乏更加突出。拉腊宁可让事态有控制地发展，而不愿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担心地看到，逃亡到附近农村和山区的华侨，已同殖民者处于对抗状态。他们流动于马尼拉周围，对该城构成潜在威胁。为此，拉腊除了派军队追歼逃生者之外，加紧征募庞邦加的弓箭手和退伍军人，增援马尼拉。

25月下午，拉腊派利西神父和何塞·马德里德神父同帕利安的华人谈判。双方就对华侨实行大赦和释放船主进行交涉。利西留下马德里德神父在帕利安，自己去同总督商量。当天黄昏，马德里德被华侨杀死了^②。第二天，大约2 000帕利安华侨逃至圣马特奥，在那里筑堡自卫。一些西班牙人得知马德里德这位土著修士被杀之后，趁机要求杀死全体华侨。他们唯恐华侨生存下来将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时也希图乘乱占有华侨的财货。《1662—1663年马尼拉纪事》的佚名作者这样叙述这些人的情况：

①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77.

②参见McCarty, *On the Koxinga Threat of 1662*;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77.

这时（5月26日——引者），针对华人的行为流行起来的谎言是如此之多，这些谎言是如此易为那些希望消灭他们的人……所接受，以致连最小心谨慎的人也因而犹豫起来。……人们难得发现一个对华人的破产不感兴趣的人；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得到赃物，其余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占有华人的财产，或者赊欠着华人大量货物。许多人成了他们熟悉的华人朋友财产的托管人。他们担心，他们〔受托管〕的财产会转移到别人手里，把它交给他们（当指华侨——引者）的亲密朋友保管。而且，通过杀死华人，即可不用清偿钱物而抹掉账目。人们在1639年的〔华侨〕起义中，通过经验就已发现，那些被华人寄以最大信任的人，也就是第一批最迫不及待地投票赞成毁灭华人的的人^①。

但直到这时，拉腊还未下令屠杀，甚至不顾那些迫切希望屠杀华侨的人骂他是懦夫，仍然通过使者继续同逃生的华侨进行交涉。他不得不以谈判等待时机。他几乎派不出100名健全的人到前线打仗。华侨也竭力采取克制态度。即使是在圣马特奥山筑堡自卫的华侨，也明确宣布，他们不是反叛者，而是担惊受吓的逃生者；他们不加害于任何人的生命，也不侵犯人们的财产。西班牙人也承认，“华侨除了惊恐逃生之外，并未犯下罪行”^②。被迫逃生的华侨希望通过谈判保障自己的安全，以便坐船回国或回到原居留地点。谈判从5月26日起一直在进行。6月2日，双方终于以华侨所提出的答复为基础，达成协议：华侨回到帕利安，在那里乘船回国；基督教徒则去圣克鲁斯和比农多，或者到拉腊指定的其他地点；以6月3、4两日为执行上述协议的时间。

华侨按协议纷纷离开营地，回到帕利安。但还有相当多的人

^①BR, Vol. 36, PP. 230—231, 232.

^②BR, Vol. 36, PP. 233, 236.

不相信西班牙人的诚意，仍然留在山上。

大约在4日或5日，由胡安·马卡帕加尔带领的300弓箭手，弗朗西斯科·拉克沙马纳带领的200名退伍军人，从庞邦加抵达马尼拉。他们的到来，使拉腊现出本来面目。他立即命令所有士兵做好准备，以使他挑选一支部队去惩治华侨。

在可供选择的部队中，拉腊选择了庞邦加土著部队。西班牙人从统治吕宋岛以来，就刻意培植庞邦加的地方势力，豢养庞邦加的土著部队，使他们成为殖民者推行“以菲律宾人打菲律宾人”政策的有力工具。殖民者已利用这支部队镇压过菲律宾人民的多次起义。这次所以特别选中庞邦加土著部队来镇压华侨，还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庞邦加地区曾经一再掀起反殖民者的起义。西班牙人为转移他们的仇恨，除驱使庞邦加士兵镇压土著的起义之外，还在1603年和1639—1640年两次驱使他们参与对华侨的屠杀。但在1645年和1660年，庞邦加人又两次拿起武器，反抗殖民统治。拉腊这次驱使庞邦加土著部队为殖民统治者充当马前卒，其罪恶用心，在于借这次对华侨的军事行动考验庞邦加人对西班牙的忠诚，也使华侨仇恨庞邦加人，迫使两者成为敌人，借此离间菲中人民的关系。

6月6日，拉腊向庞邦加士兵下令：向华侨逃亡者的营地进军，砍下在营地所看到的每一个华人的头颅。又下令内湖、布拉干两省的省长各带300名弓箭手守住所有道路，以便消灭溃散的华人。庞邦加士兵于6日出发后，拉腊又加派两队西班牙骑兵，以作后援，并监督庞邦加人的军事行动。

庞邦加土著部队当天下午5时接近圣马特奥，未作休息，即抢在西班牙骑兵抵达之前，向营地猛扑。他们杀死60多名华侨，把据点夷为平地，掠取营地的全部粮草辎重。当时，夜色已深，土著士兵陶醉于所获得的战利品，对逃散者未予追赶。7日早

晨，西班牙骑兵赶到，即对华侨进行追击，把后者驱进一个乱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山间。由于遭到山区黑人的残杀，大部分逃生者悲惨死亡；余生者被内湖、布拉干两省省长指挥的士兵屠杀。留在营地的1 500名逃亡华侨无一得免死亡的厄运。

接着，拉腊下令对在吕宋各省未能及时赶到帕利安一比农多囚禁区的华侨进行大屠杀，连最遥远的省份的未到者也不例外。在这次动乱中曾逃亡，但后来自动回帕利安的华侨，被分别集中到帕利安和卡维特，使他们处于马尼拉圣加夫列尔堡和卡维特要塞的炮口之下，并被强制为殖民当局修筑海岸防御工事和哨所。拉腊还下令对各行业的华侨工匠进行登记，留下满足马尼拉城各种需要的人数，其余尽数让中国商船超载运送回国。据说，一艘平时只能载500人的船只，被迫载1 300人，以致船上的人挤得几乎无法坐下来。载运被逐者的船只，在6月7日以后陆续启碇起航。最后三艘——其中一艘载有利西神父——是在6月10日开航的。

为了加强对华侨的军事控制，拉腊从各地调集土著部队，驻防于华侨的集中居住区。例如，卡拉加（即现在的苏里高）团驻卡维特，宿务、保和两团驻巴石河北岸比农多附近，卡加扬团驻圣克鲁斯，另有若干队骑兵分驻卡维特、比农多、梅哈利吉。这样，在马尼拉地区，从巴石河的河口直至上游，一切通向华人集中点的通道，完全由重兵把守、封闭。华人行动所受的限制，比囚犯犹甚^①。

在5月25日的混乱中，有一些华侨乘小船从海上回到台湾。他们向郑成功诉说西班牙人已下令把华侨统统杀死。他们还谈到利西神父如何为殖民当局效劳，背叛华侨的利益。郑成功听说华

①BR, Vol.36, P.243.

侨遭到杀戮，不胜震怒，立即着手组织舰队，以便惩治西班牙人，为侨胞报仇。但这一护侨行动还未实现，他便因肺结核病而在1662年6月23日溘然去世。他的儿子郑经接着治理台湾。官员们力促郑经接原计划征讨西班牙人。但刚从马尼拉回到台湾的利西，却不厌其烦地向郑经说明，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是如何有力，它对华侨所采取的行动是如何正当。他极力劝说郑经：比起武力行动来，同西班牙进行贸易，会获得更多好处。

利西重新取得郑氏政权的信任。他第二次被派往马尼拉，代表郑氏政权同殖民当局进行交涉。利西于1663年4月8日到达马尼拉。经过谈判，同西班牙人达成一项和平条约，恢复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西班牙人同意郑氏政权的两项要求，一是归还华侨托马尼拉市民保管的被当局冻结的财产，一是归还被伊洛科、卡加扬两省省长所扣留的华商货物。

殖民当局决定继续让华侨居留马尼拉，但又援引1608年的西班牙王室法令，把人数限为6 000。

在这次大屠杀中遇害的华侨人数到底有多少，从现在可见到的文献中，未发现明确的记载。近人所列举的数字，都是从当时的文献的叙述中推断的，出入比较大，有说是2 000的，也有说是4 000的。从实际情形看来，5月底，在殖民军炮击帕利安事件发生时，一些人已被杀；事件发生后，帕利安1 500人绝望自尽，还有无数人在巴石河和海上溺水丧生。6月6、7日在圣马特奥山区被害人也是个大数目，据《1662—1663年马尼拉纪事》记载，这个数字是1 500人。这样，仅这两个见于记载的数字，即已达3 000人。帕塞尔所说的“在六个月中被西班牙人和泰加洛人追杀的华人达2 000”^①，明显是个保守数字。4 000之数，当是比较可信的。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521—522.

比起前两次大屠杀，这次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一些作者把这归于拉腊的仁慈和善意。这种看法，源于早期西班牙作者的叙述。《1662—1663年马尼拉纪事》就把拉腊描写得道貌岸然。

事实上，以拉腊为首的殖民当局，原计划是要杀绝华侨，但在实践中却未能这样做。其原因首先是，郑成功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①，提出严正护侨声明，使殖民者在屠杀华侨时不得不有所克制。

其次，拉腊不能不考虑前两次屠杀华侨给殖民地社会造成的种种灾难，不能不考虑眼前殖民者在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等方面面对的严重困难。以当时那样的虚弱地位，殖民当局已不能经受全面屠杀华侨所带来的新打击了。

四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四次大屠杀

经过第三次大屠杀之后，在菲华侨人数，在17世纪余下的近40年中，一直未恢复旧观。据文献记载，在80年代，帕利安通常也只有5 000—6 000人^②。究其原因，不外如下几点。

一是殖民当局对入境华人实行严格限制。

二是清政府严格禁止人民出海。清政府为制止沿海人民归附郑氏政权，60年代以来，实行迁海，强迫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尽烧其居室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不仅越界者立斩，就是在海外居住、贸易和耕种也都列为问斩之罪。据《大清律例全纂》，“凡国人在蕃托故不归，复偷漏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凡官员民兵私自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但以通贼

^①西班牙人当时认为，郑成功有兵员100万，大小战船1.5万艘，其中许多船舰每艘装有40门大炮。见BR, Vol. 36, P. 250.

^②BR, Vol. 39, P. 123.

(当指郑氏政权)论斩。又州县同谋,或知情隐匿,亦将处斩。”^①这种政策的施行,大大抑制了人民移居海外的活动,同海外的贸易也因之几陷于停顿^②。

三是经过三次大屠杀,一些寓居马尼拉的华侨,纷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辗转移向吕宋其他地方、中部群岛和南方岛屿。

此外,菲律宾西班牙当局经济上的困难,马尼拉市民的贫困,致华人的经营缺少利润,也使赴该地的华人一年少于一年。

卡西米罗·迪亚斯说,当时华人人数未及法令许可的6 000人。但他所指的,分明是马尼拉的华侨数^③,而非全菲华侨数。

在曼努埃尔·莱昂总督统治时期(1669—1677),为解决经济、财政困难,恢复40年代以来陷于衰落的中菲贸易,他同台湾郑氏政权维持着“有礼貌的交往”,以取得通航台湾海峡的便利,保持同台湾的贸易。又派员到澳门交涉,重新准许澳门葡萄牙人到菲贸易,由此也打开了同广州的贸易。交涉后第二年,就有三艘货船从澳门、多艘货船从广州至马尼拉。同宁波的贸易往来也建立起来,西班牙人从那里取得蚕丝,转运墨西哥。经过这种种努力,在某些年份,每年到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达30艘。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到菲贸易的商船,大抵也有同样的数目。中国商船给马尼拉运来丝织品、衬衣、精陶器、药材,甚至针和线,从而也为当局带来大量关税收入^④。

闭关锁国造成对外贸易的萎缩。正是在清政府实行迁界、禁海,严厉实施锁国政策的20年中,其他国家的商人(其中特别是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商人)开始打进马尼拉市场。从17世纪

①转引自刘芝田:《中非关系史》,第488页。

②BR, Vol. 42, PP. 149—150.

③BR, Vol. 42, P. 252.

④BR, Vol. 42, PP. 118—119, 149—150.

7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千方百计地利用菲律宾西班牙官吏的贪婪和玩忽职守，大力支持英、印商人运销印度白布、擦光布、其他廉价棉布和铁器等到马尼拉，以赚取马尼拉的墨西哥白银。因此，与中国对马尼拉的贸易呈衰退状态的同时，印度对马尼拉的贸易（也称科罗曼德尔贸易）却出现逐渐发展的趋势。华商在马尼拉贸易中仍占优势，但前此所占的垄断地位已被科罗曼德尔商人打破了。这从到马尼拉从事贸易的中、印商船数，以及马尼拉征收进口税总数中中、印商人所占百分比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见表1、表2及第五章表3）。在17世纪上半叶，马尼拉当局征自中国商人的关税，平均每年都占进口税总额的71—92%。但从17世纪80年代起，每年平均只占40—50%，其中有15年只占30%多。而征自科罗曼德尔商人的关税，则一般已占10—30%。这可以说是17世纪后期华侨经济地位的一大变化。

表1 16—18世纪到马尼拉的中国和印度商船数比较

年 代	中 国	印 度	年 代	中 国	印 度
1581—1590	102	0	1671—1680	49	13
1591—1600	119	1	1681—1690	89	38
1601—1610	290	0	1691—1700	171	35
1611—1620	49	9	1701—1710	204	34
1621—1630	73	0	1711—1720	94	24
1631—1640	325	1	1721—1730	123	38
1641—1650	162	3	1731—1740	152	31
1651—1660	68	0	1741—1750	116	12
1661—1670	57	2	1751—1760	134	15

资料来源：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erique*. 转引自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P.172.

表 2 1686—1760年在马尼拉征收的进口税中
 中印商人所占百分比

年 代	中 国	科罗曼德尔	年 代	中 国	科罗曼德尔
1686—1690	51.03	29.33	1726—1730	44.35	6.50
1691—1695	53.36	2.35	1731—1735	44.35	22.74
1696—1700	55.71	10.95	1736—1740	60.51	14.46
1701—1705	55.6	14.37	1741—1745	41.37	14.21
1706—1710	60.84	9.39	1746—1750	48.71	5.09
1711—1715	50.79	9.43	1751—1755	34.77	—
1716—1720	36.51	10.39	1756—1760	57.15	2.90
1721—1725	31.73	20.17			

资料来源：Chaunu, op. cit. 转引自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1570—1770*, P.173.

马尼拉当局同台湾郑氏政权虽保持“有礼貌的”关系，但抱有不信任情绪。1671年，不知从什么渠道传来郑经打算进攻菲律宾的消息。莱昂立即备战，集结舰队。但舰队集结到马尼拉之时，恰好收到郑经无意攻菲的确实消息。

1686年又发生了两起迫害华侨的事件。这一年，西班牙王命令菲律宾殖民当局在六个月内驱逐全菲华侨^①。殖民当局已开始登记造册，为驱逐做准备。帕利安的华侨，以旅菲同胞的名义申明，驱逐日期应延至季风时节墨西哥船到来之时，因为他们有许多事务需要时日才能清理完毕。后来，由于担心这个殖民地经受

①E.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 — 1898*, P. 15. 另有一说是驱逐全菲非教徒华侨，除非他们在两个月内改信天主教。见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 — 1770*, P. 187.

不起失去华侨经济贡献的打击，又恐康熙帝取消西班牙人在华南传教的许可，马尼拉最高法院才未执行驱逐令。6月16、17日，马尼拉有一则谣传，说经营面包烘房的华侨，将碎玻璃和碎金属块散置于面包之中，以便把西班牙人弄死。殖民当局未作调查，匆忙把华侨逐出这一行业，让西班牙人接手经营。后来经过法院的调查，证实所谓碎玻璃、金属片，“仅仅是自然地落入面粉中的磨石碎片”；而由西班牙面包师制作的面包，不仅远远无法满足马尼拉西班牙人的需求，而且“烤得很糟糕，以致吃这种面包的人都得了病”。于是，在马尼拉市民的强烈要求下，华侨重新回到面包行业。这两个事件，在华侨中一度引起恐慌和愤怒。1686年的帕利安华侨骚动^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一年8月，丁哥等300名华侨在帕利安发难。他们冲进警长家，杀死警长和另一西班牙人，然后赶往帕利安区长比维恩家，企图把他杀死。比维恩听到风声，未及穿衣便逃到一座桥头堡中，带米士兵，当场逮捕了丁哥和许多起事者。大多数人逃脱了。丁哥等被殖民者吊死并肢解，肢体被陈放在巴石河沿岸。逃到帕萨伊的起事者遭西军追杀。敌人以华侨的头颅作战利品回到马尼拉。这次被屠杀的华侨有几百人。

骚动过后，在殖民当局所作的调查中，诬蔑起事者是一伙为清政府追捕，近年来从福建逃出的犯罪分子——“声名狼藉的乔装窃贼和拦径强盗”，在帕利安内外专事盗窃者。诬蔑丁哥是一个因道德败坏，被长期关禁的犯人。把起事的性质，说成是一伙罪犯和300名流氓，想进行一次大抢劫，以便改善其命运，并毫无危险地归国。

但从卡西米罗·迪亚斯引用的一些调查材料看来，却反证上

^①BR, Vol.42, PP.247—252.

述种种都是诬蔑不实之词。

首先，起事计划事先得到帕利安大批群众支持。迪亚斯说，群众以现款支持和帮助丁哥等等，后者也把行动计划同群众商量。既然这次行动具有群众基础，它就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不是少数“犯罪分子”和“流氓”的刑事犯罪行为，而是备受殖民者歧视、侮辱和迫害的华侨群众进行反抗的表现。迪亚斯没有举出多少有关华侨反对这次行动的事实，只说丁哥等对殷富华侨保守行动秘密。因为“这些富有华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不仅不会参与秘密计划，反而会泄露它”。富户的不支持，并不削弱这次反迫害斗争的群众性。

其次，关于丁哥其人，殖民者给他加上罪犯、刑事犯罪集团头子的称号，以贬其人格。丁哥确曾长期坐过牢，但在殖民者专横，华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要把一名华侨投进监狱，捏造罪名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从迪亚斯的记述，也可见丁哥的真正为人。他说：

〔丁哥〕在狱中关禁的时间很长，因而学会读、写西班牙语文，成为一个胜任愉快的代笔人，帮助其他囚犯写申诉书和信件；因为他头脑非常聪明敏锐。作为一名长期囚犯，他可以在狱中自由走动，并帮助监狱看守看管其他囚犯。靠着代笔所得，他惬意地养活自己^①。

这次起事，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直接骑在帕利安华侨头上，肆意敲榨勒索，作威作福的帕利安警长、区长。而且，华侨的这次反抗，是由驱逐令直接引起的^②。因此，这次起事是华侨以暴力斗争的形式，抗议殖民者对华侨犯下的种族歧视，政治迫害和经

^①BR, Vol. 42, P. 248.

^②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P.3.

济掠夺的罪行。说华侨“密谋策划打败驻军，抢掠教堂和店铺，洗劫住家和修道院，然后带着赃物离开菲律宾”^①，都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①G. F. 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 P.282; 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43.

第七章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新迫害和17世纪末至18世纪70年代的华侨社会

一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新迫害

在镇压了1686年的华侨反抗斗争之后，殖民者又为进行新的迫害制造舆论。奥古斯了会的传教士卡西米洛·迪亚斯在他的多卷著作《征服记》中，一面为中菲贸易的正常化而庆幸，认为华侨在经营手工技艺方面，甚至连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工匠也是相形见绌的，因而“同这些异教徒交往是非常必要的”^①。一面却鼓吹，可以在对殖民者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实现这种交往，“一则按国王的法令，仅准6 000华人在菲律宾居留；一则不准他们在各省从事贸易，或者不允许他们在村镇中同土著人杂居。而且应使他们处于被制肘的地位……”。

1701年10月，大主教何塞·贝拉等五名神父，联名致书多明戈·萨瓦尔武鲁·埃切瓦里总督，其中提出有必要禁止华人、特别是他们中的异教徒同土著间的贸易和往来，禁止他们进入土著的住所和农田^②。

^①BR, Vol.44, PP.119, 257.

^②BR, Vol. 42, P. 135.

这一种族隔离建议，并没有什么新内容。早在科奎拉时期，就借口使土著免受所谓华人道德败坏的影响，实行隔离政策。但这一政策既违反华侨与土著密切交往的现实，也与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背道而驰，因而无法贯彻，反而出现华侨受到“为数更多的人的袒护”的现象，许多华侨分散到各省首府，在土著中间居住^①。

迪亚斯和贝拉等人对华侨的敌视，还只限于言论上的煽动，1745年9月有关华侨起义的谣传，则是煽动排华的具体行动了。据记载，那时，加斯帕尔·托雷总督在病中听到巴坦加斯省巴拉扬土著起义的消息，病情加重。接着又传闻华侨起义，且言之凿凿，说起义者已进入马尼拉城。托雷因震惊而病入膏肓，几天后死去。死前，他犹下令逮捕了七名最富有、被认为最可能策动起义的华侨。同时，指令对这一传闻进行调查。继任者胡安·阿雷切德拉经过调查，发现所谓华侨起义纯属子虚乌有，“华侨既没有起义的打算，也没有予人怀疑他们起义的把柄”^②。至于七名富有华侨，在被殖民当局关了六个月后，因查无实据，也释放了。但当局还是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驱逐不少所谓“众所周知的流浪者和无职业的华人”，强使他们乘该年来菲的华船回国^③。可见，上述谣传，纯属为排华而蓄意制造的舆论。

17世纪末至18世纪50年代，殖民者对华侨的迫害是层出不穷的。

①BR, Vol. 42, P.252; Vol. 44, P. 135.

②BR, Vol.48, P. 144.

③BR, Vol. 48, PP. 141—142, 142 note 64.

在立法方面,克鲁萨特—贡戈拉总督在任期间,曾于1696年重新修订并颁布科奎拉在1642年制订的《廉政条例》(Ordinances of Good Government)。在61项条例中,有三项是直接针对华侨的,即第十四、第十六和第三十四项。

第十四项规定,西班牙人、华人和土著不得为商业目的付钱给其他土著;必须付钱者,也不得超过(甚至在须付稻米或其他农产品款项的借口下也不得超过)5比索;一切农产品收购者必须按收割时的现价付款;在王家仓库收购农产品及土著缴付贡金之前,个人不得采购^①。这一条例是针对中介商业的。中介商业是旅菲华侨的重要商业活动之一。中介商往往又是零售商。他们从马尼拉批购中国进口商品,运往农村或内地出售,并在当地收购农产品运销马尼拉。在收购农产品过程中,为解决土著农民的急需,常在农产品收成之前预付款项。这项商业活动艰苦而利润不高。西班牙人满足于靠特权在马尼拉过优游生活,满足于更有利可图的大帆船贸易,不屑于为小利而身历旅途艰辛和危险,深入穷乡僻壤;土著菲律宾人既缺乏资本,也缺乏经验。因而,中介商业也就成了主要由华侨商人经营的经济领域之一。这一条例,名义上把西班牙人、华人和土著同等对待,而实际上是完全为了限制华侨中介商业活动,力图由殖民当局及其地方官员支配农产品收购。

第十六项规定:不管华侨是基督教徒与否,地方官员都不能掉以轻心。华人异教徒不得在土著中备有住处。若在任何村镇发现该等异教徒,应立即押送马尼拉帕利安;如不顺从,鞭答200,并在卡维特港服劳役四年。基督教徒华人,若证明对土著有不良

^①BR, Vol. 50, P. 199.

影响者，已婚者应遣送圣克鲁斯和比农多镇，单身者则送马尼拉帕利安。华人商人持许可证可在顿多^①、布拉干、庞邦加、内湖等省和卡维特港辖区经商。但每一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仅有十二天。又规定外出经商华侨不得在上著村镇宿夜，否则处以在卡维特港服劳役两年的刑罚。居住村镇的基督教徒华人人数，不得超过为修道院及村镇服务所需之数（除非已同当地妇女结婚），且需持有许可证。省长或地方长官允许无许可证华人在村镇居住或从事经营活动者，罚款200比索，还要缴付该华人无证期间的全部许可证费^②。

第三十四项规定，对已获得政府许可在任何省份做买卖的华人手工艺者，在许可期间，不得给他们设置障碍；但在许可期限终止时，他们必须返回马尼拉，省长及地方长官不得为其续期限。在政府许可证有效地区——顿多、布拉干、庞邦加、内湖等省及卡维特港辖区之外，若发现华人（无论是否持有政府许可证），应予逮捕，并与其工艺品、证言一起解送马尼拉，以便量刑处罚；若省长或地方长官非法发放或再续许可证，一经发现，罚款1 000杜卡多（ducado），且终身不再录用^③。

这几项规定的实施效果如何，未见文献记载，但观诸过去殖民当局，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有关华侨的限制性法令，都因殖民官员贪赃枉法，勒索受贿而不能实行，在吏治方面没有根本改变的当时，所谓廉政条例，相信也无非是一种腐败吏治的遮盖布，徒

①当时的顿多省，包括今天马尼拉市很大一部分和黎萨省的相当部分。

②BR, Vol. 50, PP. 199—203.

③BR, Vol. 50, PP. 211—212.

具虚文。这一时期华侨的广泛分布，足以说明条例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在具体行动方面，殖民政府千方百计企图铲除华侨零售业，以及对华侨一再实行大规模的驱逐。

为了剥夺华侨在菲律宾零售业方面的优势地位，西班牙殖民当局建立贸易公司。1755年，佩德罗·曼努埃尔·阿兰迪亚总督准备按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大规模驱逐华侨。一些熟知菲律宾国内贸易情况的西班牙人，出于本身及殖民统治利益的考虑，劝告阿兰迪亚：如果驱逐华人，菲律宾就没有足够的人力经营国内贸易。阿兰迪亚我行我素。为要证明上述看法是浅薄的，他组建了一家由西班牙人和西菲混血儿出资的贸易公司。这类企业在菲律宾其他地方曾经试办过，但都失败了。他下足决心要把这家公司办好。该公司资本共153股，合76 500比索。公司之下，分设零售店，每店由两名西班牙人代理，“无需华人为这些店铺做任何事情”^①。原来设想是：成批地购进货物（这比零购可少付约16%的钱），然后以高于购进价30%的价格出售。“这种收益，8%付给国王陛下，以补偿国库因失去〔被驱逐的中国〕异教徒过去缴付的许可证费而出现的亏损；10%归股份持有人，余下的12%留作支付薪金和作为促进菲律宾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公共基金”^②。但他们无法象华侨零售商同华侨批发商那样做交易，也无法象华侨零售商那样艰苦、勤俭经营，因而很快就亏损了大部分资本。阿兰迪亚命慈善会(Misericordia)借出10万比索，圣弗朗西斯教会借出3万比索，以债券形式，给该公司以资金支持。当时

①BR, Vol. 48, P. 183 note 105.

②BR, Vol. 48, P. 183 note 106.

在交易中普遍使用“剪币”^①，又使公司遭受极大损失。由于“这种困难和其他困难，使该公司在一年内倒闭，被迫解散；除了挽回已投入的资本之外，它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②。事实说明，华侨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作用，并不是凭殖民者的意志所能代替的。随着公司的倒闭，一度受到影响的华侨零售商业，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华侨所受的最大迫害，主要的已不是像17世纪那样的周期性大屠杀，而是频繁的、大规模的驱逐。在史学家笔下，这个时期就叫做“驱逐时期”或“驱逐时代”。

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这段时期，殖民者对华侨的迫害，所以转为主要采取大规模驱逐的做法，可以归结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首先是华侨应变态度的变化。清政府对海外华侨，一本明王朝的政策，继续视作弃民，不予任何保护。在17世纪，华侨被迫进行的几次自卫斗争，又都遭到失败，血的教训，使这些海外孤儿越来越谨小慎微。在1662年面临屠杀威胁时，华侨以逃生或沉

①“剪币”，英文作 *clipped money*, *cut money*，西班牙文作 *moneda cortada*。菲律宾向来极缺辅币。为解决这一困难，曾把一比索和半比索银币剪裁成小块，并在每小块上打上表示币值的戳记，作为辅币使用，故称“剪币”。这样，半比索硬币剪成两块，每块即2里亚尔；剪成4块，每块即1里亚尔，如此等等。但因戳记只表明新的币值，并不表示块块的体积、重量，故在流通过程中，人们任意切割，尽量截取银料，以致块块越来越小，币值也随之贬低。参阅BR, Vol. 50, P. 185 note 107.

②BR, Vol. 48, PP. 183—184; P. 183 note 105;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252.

着应变的态度,对付敌人的挑衅行动,未作积极的正面反抗。1886年丁哥等起事,较之过去几次的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绝大多数华侨未公开介入。以后几次面对大规模驱逐时,华侨也未进行有组织的正面对抗。这当然不会予殖民当局进行屠杀的任何把柄。

其次,殖民者在找不到屠杀华侨的借口的情况下,以驱逐作为其在华侨问题上两难处境的折衷性措施。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菲律宾人的传统》一书的一段文字,加以说明。它认为,在经过几次华侨起义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对中国移民的源源流入处于两难状态。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华侨作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工匠、园圃农、中介商、粮食供应者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认为华侨对殖民政府的安全构成“威胁”。为了既发挥华侨的经济作用,又消除华侨的“威胁”,“在缺乏把全部华人居民杀绝的任何借口的情况下”,殖民当局便对华人“执行驱逐政策”^①。这种分析切中了殖民当局执行驱逐政策的用心。

再其次,17世纪几近百年(“大屠杀时代”)的四次大屠杀的经历,以及由大屠杀引起的严重社会后果,已证明屠杀政策是失败的,行不通的。因此,殖民当局不得不考虑再进行血腥行动产生的影响,因而中止屠杀政策,对不断移入菲律宾的华侨,转而实施驱逐政策。

1709年,新任总督乌尔苏亚—阿里斯门迪抵菲律宾,即着手驱逐华侨。大部分华侨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过剩的华人”而被赶走;其余的华人作为手工业作坊和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人,“买得居留吕宋的许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乌尔苏亚在出卖许可证时,因在收益中占有不光彩的一份而弄得声名狼藉。

^①Filipino Heritage, Vol. 4, P. 1012.

另一次大驱逐发生在临时总督阿雷切德拉神父任内，时为1746年。当时，关于1745年9月华侨起义的恶意谣传经已调查澄清，以嫌疑罪捕关的七名华侨，亦已结案释放，然而不少华侨竟被加以“众所周知的流浪者和无职业的人”的罪名而驱逐出境。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1747年的驱逐令。1747年8月，马丁内斯·阿里萨拉神父带着西王驱逐华侨的命令，到菲律宾就任马尼拉大主教的职务。从他到达的那一天起，因托雷死亡而空出的总督职位，应自动由他临时担任^①，但阿雷切德拉及马尼拉最高法院，以王室任命书未送到为理由，拒绝向他交出职位。阿里萨拉既未能问鼎总督宝座，便将驱逐令秘而不宣。1750年7月，专任总督奥万多—索利斯到达马尼拉。阿里萨拉立即向奥万多转交那项驱逐令。总督为此召开一次政务会议。但殖民者政、教势力间长期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对立情绪，使两者的关系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一触即发。会议一开始，就由于座次和礼仪问题，在总督和大主教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以致双方把问题提交马尼拉最高法院仲裁。最后，最高法院虽然“作出有利于大主教的决定”，但这场争吵已“使国王陛下驱逐华人的意图受挫”^②。1747年的驱逐令就此流产。

①早期总督缺出，由最高法院代行民事和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由资深法官执掌。从1719年起，改为由马尼拉大主教担任临时总督。如果这时马尼拉无大主教则指定最靠近马尼拉的主教担任临时总督。托雷总督1745年去世时，阿里萨拉还未赴菲就任马尼拉大主教，故按规定由当时最靠近马尼拉的伊洛科主教区主教阿雷切德拉担任临时总督。

②BR, Vol. 48, PP. 145—146, 153—154. 所谓座次和礼仪问题，其实就是在政务会议召开时，“大主教想坐到一张在总督左边、会议桌首〔正座〕的椅子上，但总督既不容许他在那个座位上就座，也不同意在大主教进入会堂和进出城门时，让卫兵列队向他致敬。”

1754年9月3日，西班牙国王再度颁令驱逐非基督教徒华侨，但准予后者一段时间清理他们的事务。刚上任不久的阿兰迪亚总督为驱逐华侨作多方面的准备。一是对基督教徒华侨人口进行调查（所得数字是3 413人）。二是组建前面已谈到的那家短命贸易公司，以此为驱逐华侨零售商，并为西班牙人及西非混血人取而代之作好准备。三是在巴石河河口北岸（属比农多）的圣费尔南多建立丝市场（Alcayseria），以取代帕利安，供来马尼拉贸易华商临时居住和存放货物，以便西班牙人接管帕利安，铲除华侨的商业势力。四是用驱逐令推行同化政策，即规定1755年6月30日为华侨改宗基督教日，至是日仍不改宗者，一律予以放逐。据说，在那个日期（也是被逐华侨启程回国的日期），为逃避驱逐而要求施洗礼改宗的有515人，要求留在马尼拉“研究基督教义”的有1 108人。6月30日，驱逐令正式实施，除基督教徒、自愿留菲农耕者及上述1 100多人外，其余华侨均被驱赶回国。来菲贸易的华商，从此也只能临时居住圣费尔南多丝市场，不得从马尼拉到内地同土著作任何交易；在他们的商船启航回国时，一律随船回国。这是一次最有组织、最有准备的驱逐行动，但被驱的华侨也只有2 070人。

1755年的驱逐，被驱逐人数虽少，但声势浩大，因而给菲律宾经济很大打击，商业变得停滞不前，大帆船贸易开始迅速走向衰落，国库每年损失3万比索的税收。随后，连马尼拉当局也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所以，在阿兰迪亚死（1759年5月）后不久，驱逐令就被撤销了。

在各次驱逐中，华侨虽没有进行正面有组织的对抗，但他们利用驱逐令的漏洞，进行消极对抗。一是用各种合法借口留在菲律宾，如表示愿意“改信”基督教，留菲“研究基督教教义”，“愿意”在菲从事农耕等等。许多华侨在驱逐浪潮过后，

很快就抛弃农业，重新从事商业。“他们借口耕种土地而留在这里，并由此获得〔居留〕许可证；但每1 000华人中竟没有1人从事这项工作。”^①二是顺应殖民官员的勒索要求，给他们以经济、物质上的满足。西班牙殖民官员为非法获得额外收入，都不愿严格执行来自母国的驱逐令。连身居高位的乌尔苏亚，也一面执行驱逐政策，一面从出卖许可证中捞取好处。三是在驱逐高潮期间，分散到边远地区、内地，暂避锋芒，事后就返回原居留地或留在新居留地谋生。也有一些华侨被驱逐回国后，又设法重返菲律宾。这样的对抗方式行之有效，大大缩小驱逐令的实施效果。

对财政长期拮据的殖民政府来说，若真正驱逐华侨，每年要丧失数以十万计的许可证收入，且得不到墨西哥或西班牙政府的补偿，风险过大。个中苦衷，对颁布驱逐令的西班牙国王、印第安评议院来说，是根本不会有切身体会的。

二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华侨社会的变化

这个时期，华侨人数慢慢有所增加。1740年，马尼拉有2万华侨^②；1749年，全菲华侨为4万人^③。他们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在手工行业、商业、农业、渔业和服务行业中，为菲律宾社会经济生活，为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一位西班牙官员

①BR, Vol. 44, P. 146 note 40.

②Filipino Heritage, Vol. 4, P. 1012;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494, 503.

③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 P. 284.

说，“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所表现的勤劳和爱财，使他们得以支配这个群岛的全部手工行业和手工艺，以及除同新西班牙的贸易之外的贸易。”^①

这个时期的华侨社会有了重大的变化，以下分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华侨分布更加广泛

华侨分布更加广泛，是这个时期华侨社会变化主要表现之一。这一变化是由三种因素造成的。首先，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为了解决华侨大量集中马尼拉对殖民统治的“威胁”，也为了促进马尼拉邻近各省，特别是中吕宋的农业发展，在1610—1639年间，曾将相当数量的华侨安置到上述农村地区。其次，西班牙人一向认为，愿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的华侨是较易控制的。为配合教会争取华侨改宗基督教，民政当局给基督教徒华侨以种种优待，如分配土地，少征贡金，允许与土著妇女结婚，18世纪又允许在群岛各地居住，自由来往，从而促进华侨向马尼拉以外各地区流动。再其次，就是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历次驱逐，使华侨不得不流转至马尼拉以外的山区、边远地区，特别是当时西班牙殖民势力尚未伸及的南方岛屿。前两种因素使华侨主要分散到吕宋和中部群岛，后一种因素则使明达瑙及和乐（苏禄）等南方岛屿的华侨人数，在18世纪期间迅速增长。

到18世纪中叶，菲律宾的许多地方都有华侨居住。中吕宋及马尼拉邻近地区——卡维特、内湖、布拉干、顿多、庞邦加、巴塔安和邦加斯南等省，集中了马尼拉以外的大部分华侨。伊洛科

^①BR, Vol.44, P. 277.

地区，主要集中在比干周围。在帕奈、宿务、纳加、三宝颜的西班牙人村落周围也有华侨聚居。在这些村落周围，已出现新的帕利安和小帕利安（Pariancillo），著名的有宿务城的帕利安，帕奈的阿雷瓦罗、卡皮斯、莫罗和萨马岛、纳加以及比干的小帕利安^①。庞邦加的古阿瓜也有华人帕利安。据说，住在其中的华侨人数，仅次于马尼拉帕利安的华侨人数^②。

在南部岛屿，华侨的增加更为迅速。1758年，马尼拉当局的大规模放逐，使大量华侨难民流入南部岛屿，定居于明达瑙岛的拉瓦斯河（也称明达瑙河或哥打巴托河）河口，今哥打巴托城（旧称明达瑙城或马金达瑙城）一带以及苏禄群岛。曾在1775年到过马金达瑙的英国人托马斯·福雷斯特说，马金达瑙城对岸的塞兰干住有许多中国人。还说中国人控制了马金达瑙的商业^③。1773年，和乐城（即苏禄城）有4 000华人居民^④。

这样，华侨开始遍布全菲，改变过去几乎全部集中在马尼拉及其附近的状况；但马尼拉及其邻近仍是菲律宾最大的华侨社区。

（二）华侨同菲律宾南部人民友谊的发展和对密切菲中关系的贡献

明达瑙（指明达瑙城及其附近一带。下同）和苏禄的华侨，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12; John T.Omohundro, *Chinese Merchant in Iloilo*, P.16.

②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P. 148.

③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22; BR, Vol.46, P.45—48 note 6.

④BR, Vol.50, P.44 note 20.

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上面已谈及华侨控制明达瑙的商业。他们以从苏禄进口的中国商品，交换当地的稻米和其他产品，然后运到苏禄和中国市场。有些华侨在那里成了稻米磨坊主、木匠和棕榈酒酿造者。一些华侨还充当当地人的司帐。17世纪80年代曾在明达瑙旅行的英国人威廉·丹皮尔说：“明达瑙人并非高明的会计，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为他们计算账目。”^①当地的达图对华侨的经济活动给予帮助，但都是用近似强迫的办法，要华侨向他们借高利贷，每年收取25—30%的高利，而且，除非华侨要回国，否则达图们拒绝收回本金。这种强迫接受高利贷的情况在苏禄同样流行。

在苏禄地区，由于西班牙人的封锁和袭击，苏禄人的海上贸易已陷于衰落。华侨接过这种贸易，使苏禄在与西班牙殖民者对抗期间，同其他地区之间、同外部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渠道保持畅通。最使人感兴趣的现象是，在苏禄和明达瑙，都用中国的粗布（kangan），染成黑色的南京布（当地叫kousongs）和特白的亚麻布（当地叫kompow）作货币。明达瑙还使用中国铜钱，但比较珍贵^②。

华侨同南部菲律宾人民友好相处，在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中并肩战斗。

西班牙殖民者从1575年起，就一再派兵入侵明达瑙岛和苏禄群岛。他们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虽占有明达瑙岛的若干沿海地区和三宝颜，但他们征服明达瑙内地、南部地区及苏禄群岛的

①BR, Vol.39, P.62.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22—23;
Travel Accounts of the Islands 1513—1787, PP. 299,
300.

企图一直未能得逞。南部人民还组织武装船队，不时北上，对中部群岛和吕宋南部沿海的殖民据点进行袭击，使殖民者遭受很大的损失。从18世纪初年起，西班牙人又以三宝颜为基地，多次侵犯南部岛屿。于是，南部的穆斯林，又投身反侵略斗争。他们得到华侨的支援。华侨冒着被西班牙人袭击的风险，使南部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得以持续，这本身就是对南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种实际支持。

华侨还给南部人民运去武器、弹药。1751年7月底，西班牙人再攻和乐，并迫使苏禄苏丹签订和约。苏禄人民对此深感不满，积极准备驱逐西班牙的侵略势力，推翻投靠西班牙人的苏丹。和约签订不久，西班牙人就抓获两艘在和乐进行贸易的华船，理由是这些华船把大炮卖给苏禄人。不久，殖民者又抓到一艘开往明达瑙的华船，船上满载货物，其中包括一批大炮、其他武器、弹药。这仅是被发现、抓获并见诸记述的两次，成功地把武器运到南部人民手中，未见记载的情况，必定要多得多。

侨居菲律宾南部的华侨，在促进中菲两国的友好关系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宋、明两代，我国同菲律宾南部的若干古国，就有友好往来。明初，苏禄国同我国有过密切交往。但从15世纪20年代起的200多年中，关系未见再续。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苏禄国王森烈拍遣使三人前来，请求藩封。康熙“颁给驼纽银印，付以时宪”^①。但这次通好之后，关系又复中断，直到18世纪20年代，通过两位华侨的运筹和实践，才再次接续起来。这两位华侨，就是旅居苏禄的龚廷彩和陈典策。

龚廷彩，福建晋江（泉州）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吕宋从事贸易，因本利亏蚀，被迫流寓吕宋。雍正三年（1725）

^①梁绍献等：《南海县志》卷二六《杂录下》。

由吕宋至苏禄经商。苏禄国王母汉末母拉律林见他和陈典策“二人虽为商贾，而品行端方”，遂委龚廷彩为正使、苏禄国人阿石丹为副使、华侨杨佩宁为通事，率官员人等11人，华侨舵工、水手31人，奉苏禄王“赤心”，出使中国。母汉末母拉律林托龚廷彩带国书呈雍正，并托他向雍正“敬献本国所产土物珍珠二颗、玳瑁十二片、描金花布一匹、金头牙萨二匹、白幼羊布二匹、苏山竹布二匹、燕窝一箱、龙头花刀一对、夹花标枪一对、满花番刀一对、花藤席一对、活猿一对，聊效野人负暄之意。”^①

使团于雍正四年七月初五（1726年8月2日）由苏禄启碇，七月二十五日（8月22日）至泉州目湖港（今晋江县石湖港）。龚廷彩趁便探望家乡父老。雍正帝得知苏禄国来贡，降旨：“闽省起送来京之时，著沿途地方官护送，应用夫马食物，著从厚支給，以示朕加惠远人之至意。”^②随遣布政司经历沈士升伴送使团进京。

雍正五年六月，雍正回赠苏禄国王蟒缎六匹、青蓝彩缎十四匹、蓝素缎十四匹、衣素缎十四匹、闪缎八匹、锦六匹、绸十四匹、罗十四匹、纱十四匹；龚廷彩、阿石丹、杨佩宁各给赏彩缎、罗绢；并回书母汉末母拉律林：

尔苏禄国王母汉末母拉律林，属在遐陬，克舒丹悃，敬恭遣使，梯航不隔于沧溟，恳切陈词，琛贄并将其方物，慕义之忱，良可嘉尚。……至王所请贡期，念尔国远在重洋，往来迢递，酌俟五年之外，一修岁献之仪。若王有所敷陈，则随时上达^③。

使团将回国之际，还由礼部筵宴两次，至福州筵宴一次，才遣发

^①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卷二六九。

^②《清世宗实录》卷四九，雍正四年十月丁卯条。

^③《清世宗实录》卷五八，雍正五年六月丙申条。

回国。

雍正十年（1732），母汉末母拉律林再遣龚廷彩至福建，上表感谢清政府对1726年所遣使团的接待和赏赐，另具疏要求清政府修葺其祖东王巴都葛叭答刺在德州的坟墓，赐恤存留中国看守坟墓子孙。雍正令礼部行文饬山东巡抚查覆，由此知道东王墓神道、享亭都已坍塌，东王后裔安、温两姓老幼已繁衍193人。十一年（1733）六月，雍正令山东地方官员“清查苏禄国王墓址，所有神道、享亭、牌坊等项，修饬整理；于安、温二族之中，遴选稍通文墨者各一人，为奉祀生，给与顶带，永以为例。”^①

此后，苏禄历代国王还多次遣使到中国；清政府亦热情接待来使，并赏赐有加。

在再续苏禄与中国的关系中，陈典策则作为苏禄国王的谋臣，起了决策的作用。陈典策的具体情况，史籍缺乏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见于母汉末母拉律林给雍正的《汉字表》中。表中说，“臣母汉末母拉律林，……每与本国甲必丹天朝人氏陈典策图，维欲效祖父〔东王〕以输诚”；“臣视陈、龚二人虽为商贾，而品行端方”。由此可知，陈典策是一位旅居苏禄的华侨商人，早于龚廷彩到苏禄，因为人正派，为苏禄王室所赏识，委以甲必丹职。苏禄国王常与陈谋议大事，每每谈及欲效法先祖东王巴都葛叭答刺，与中国修好，只“缘沧溟实阻，指南无车道，……且思必得熟海之人，方能上达愚诚”^②。可见，在龚廷彩到苏禄之前，与中国再续关系一事，苏禄王同陈典策早已商量妥当，只欠“熟海之人”而已。龚廷彩的到来，才使上述决策得以实现。

①《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二。雍正十一年六月戊午条；《福建通志》卷二六九。

②以上引文，均见《福建通志》卷六九。

18世纪20年代重新恢复的中国、苏禄友好关系，在苏禄华侨的协助下，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和乐岛在1851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

华侨是中国同华侨侨居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桥梁。观诸龚廷彩、陈典策在促进中国、苏禄友好关系发展方面的作用，此说确属名言至理。

(三)殖民当局同化华侨政策的失败及中菲混血儿社会的产生

这一时期，华侨社会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华侨社会中，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菲混血儿(或称美斯提索)^①社会。为了说明这一变化，得从殖民者对第一代华侨同化政策的失败谈起。

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后，在与强制当地人民改宗基督教的同时，极力劝诱华侨皈依基督教。其目的有三：扩展基督教信仰；向华侨灌输忠于西班牙的思想；促进华侨同化^②。从16世纪下半期以来，特别是从80年代起，菲律宾的教会当局，即加紧在华侨聚居区进行传教活动。为此，他们设教区，建教堂，办医院。民政当局也给改宗者以种种优待，同时对非基督教徒实行种种歧视和限制，以便迫使华侨接受基督教。但尽管如此，成就却极其有限。据估计，在任何一个时候，菲律宾的华侨基督教徒，从未多于三四千人；而华人居民常多至二三万人^③。华侨基督教徒

①在西占时期，菲律宾有西菲混血儿、中菲混血儿，前者的人数相当少。中菲混血儿不仅人数多，他们对菲律宾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也非常巨大。因此，在使用“美斯提索”一词时，既指西菲混血儿，也指中菲混血儿；但习惯上往往是专指中菲混血儿。笔者遵循这一习惯用法。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5.

③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6.

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数教徒所以改宗基督教，并非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只是作为取得在菲律宾居留、经营和生活上的方便的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对西班牙的忠诚是大有疑问的，更不要说他们同化于西班牙人或菲律宾人了。例如，在反对西班牙压迫的自卫斗争中，许多华侨基督教徒就同大多数华侨站在一起，进行抗西斗争，有的还成为反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潘和五事件中的一名华侨杨安顿就明显是一个基督教徒；1603年抗暴斗争的领导人和组织者胡安·孙大、米格尔·翁梯和阿隆索·萨戈约也都是基督教徒。平时，许多华侨只要离开菲律宾，便放弃基督教信仰。西班牙人对华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实际效果，也持怀疑态度，从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前期，教会当局强令华侨受洗时剪去发辮，并禁止他们回国，就是这种怀疑心理的表现。卡西米罗·迪亚斯直言不讳地承认，华人基督教徒，就其大多数来说，“是为了世俗的目的，例如要〔与土著妇女〕结婚和过国王般舒适奢华的生活”^①。一位名叫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阿夫雷乌的高级殖民官员说得更直言不讳：“他们之成为基督教徒，通常是为了自私、世俗的目的，不久就重新信奉他们从前信奉的异教。他们甚至有一句俗话：‘在马尼拉，照马尼拉的做法；在中国，照中国的做法’。”^②实践证明，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同化华侨第一代是办不到的。

同化第一代华侨的政策既无成效，西班牙人便转而鼓励华菲通婚，着意同化华侨第二代，在华侨社会中制造对立面。着手试验这种同化政策的，是主管马尼拉华人宣教工作的多米尼克教会，地点是比农多村。该村（或称镇）建于1594年，原是路易斯·达斯

①BR, Vol. 42, P. 253.

②BR, Vol. 45, P. 77.

马里纳斯在驱逐华侨、拆毁帕利安后，作为安置留下为马尼拉社会服务的华侨商人、工匠的新村基址。但随着帕利安在旧址重建（1595），多米尼克会，便把帕利安和比农多两个华侨村镇加以调整。于是，比农多成了已婚基督徒华侨居留地，而未婚教徒华侨及非教徒华侨，则住在帕利安。大概是在17世纪第二至第四个十年之间，耶稣会也使圣克鲁斯村成为已婚基督徒华人村。关于该村建立的经过，未见于史料。但到1656年，该村已约有500名华侨纳贡。这样看来，圣克鲁斯村这时应有500名华侨，若连家属，则至少有1000人以上。

华侨远离故国，经年在外，忙于生计。为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便与当地妇女结婚或同居；其中更多的是同居，因为与菲律宾妇女同居的华侨，可以不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因此享受不到已婚基督徒所享受的优待和权利。殖民政府对居住比农多（以后当然也及于圣克鲁斯）的已婚华侨，予以同土著人一样的待遇，缴交同样的贡赋，可以到菲律宾任何地方居住、经营；未婚基督徒华侨不能完全享受这些权利（见上面引用的《廉政条例》第十六款）；非基督徒华侨则完全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比农多镇也被赋予若干特权，如比农多村址土地，由殖民政府永久地转让与居住在这里的基督徒华人和美斯提索，免征租税，但不能转让与非华人和非美斯提索。这个基督徒华人和美斯提索社会被认为是这个村镇的唯一业主，有权向居住于其中的非本镇居民征收地租^①。

比农多所享有的特权，比农多和圣克鲁斯已婚华侨所享有的某些权利，不啻是行政和教会当局共同树立的样板，旨在吸引华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Mestizo in the Philippine History*, PP. 69—70.

侨改宗，鼓励华侨与土著妇女通婚。因此，凡是华侨足迹所至的重要城镇，都或多或少出现华菲结合的家庭，繁衍出众多的美斯提索。在比农多镇，1622年就已有500名美斯提索。1738年，胡安·弗朗西斯·圣安东尼奥神父写道：

现在，整个群岛、特别是泰加洛人各岛屿，充满另一个混血种族。在发现时期，这个种族是不存在的。这些人被称做华人混血儿（Sangley Mestizo），其人数是数不胜数的①。

这些美斯提索，主要分布于马尼拉及紧接该城东、南、北几个省份，即顿多、布拉干、庞邦加和卡维特。

托马斯·科明在《1810年菲岛状况》一书中，较详细地提供了当时菲律宾各省土著人和美斯提索的统计数字（参见下表）②。这些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仍可看出美斯提索人口分布及其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的大致情况。表中两个合计数，加上约7 000名华侨，4 000名包括西班牙人、西菲混血儿在内的“勃兰科人”，当时菲律宾群岛总人口数为2 527 298人；美斯提索在人口总数中约占5%，构成菲律宾人口的第二大种族。

①The Philippine Chronicles of Fray San Antonio, Casalinda and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Manila, 1977, P. 130. 西班牙文献所说的菲律宾“发现时期”，是指1521—1565年这一段时期。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Mestizo in the Philippine History, P. 72. 该表人口数字所以有小数点后数字，是按各省纳贡单位数乘以6.5人而出现的。数字原出于Tomas de Comyn, Estado de las Islas Filipinas en 1810.

美斯提索从出生之日起，就生活于基督教的社会中。在家里，他们受到菲籍母亲或美斯提索母亲的菲律宾传统、基督教传

省 份	土著人	美斯提索	省 份	土著人	美斯提索
顿 多	143 910	35 077.5	萨 马	88 595	791.5
庞邦加	127 920	20 997.5	三宝颜	1 500	500
布拉干	143 910	20 037.5	桑巴列斯	23 985	474.5
卡维特	51 967	7 195.5	卡皮斯	87 145.5	396.5
巴塔安	23 985	5 596.5	莱 特	68 007.5	306.5
宿 务	151 905	4 797	卡加扬	76 752	162.5
伊洛科	361 271	4 797	塔亚巴斯	71 955	162.5
巴坦加斯	127 920	3 997.5	安提克	39 325	
邦加斯南	159 900	3 997.5	卡拉绵	15 995	
内 湖	95 940	3 198	卡拉加	19 183	
卡马林内斯	159 900	2 398.5	明多罗	13 169	
阿尔拜	103 935	2 398.5	米萨米斯	18 388.5	
怡 朗	167 895	1 599	新怡诗夏	9 750	
内格罗斯	41 574	799.5			
合计	土著人	2 395 676.5	美斯提索	120 621	

统的教育；在社会上，他们又受着西班牙传教士的宗教传统和西班牙传统的教育，以及忠于西班牙的教育。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忙于营生，没有时间和精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当时，既不可能有华文私塾或学校（只有清一色的教会办的学校），也不能送子弟回国生活或受教育，因为按清朝定例，“商人往外洋诸番贸易，迟至三年以外始归者，将商人、舵水人等，勒还原籍，永远不许复出外洋”^①。加以当时的华侨，是清一色的男性，几乎没有纯血统华人女性，这就决定了华人若要结婚，便只能同菲律宾妇女结合。这样经世累代，当初由华侨与菲律宾妇女衍生的后代，除了保留父系的姓氏（或以华人祖先的姓名合起来作姓），以显示其美斯提索身分，以及他们的华侨祖先遗传给他们的外型特征之外，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语言，同华侨已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却同土著人社会融为一体了。因而，在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方面，美斯提索已独立于华侨社会。

殖民当局有意通过行政措施，使美斯提索成为特殊的社会集团。法律承认，一个华人在菲律宾生育的男孩子一出生，就自动地成为美斯提索，成为美斯提索公会（*Mestizo Gremio*）的成员，因而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菲律宾人，而无需他宣布脱离同中国的关系。至于女孩子，其身分视成年后婚姻情况而定，同华人结婚，她就是中国人，同菲律宾人结婚，她就是菲律宾人。

殖民政府规定，美斯提索享有与土著相同的权利。在缴纳赋税方面，也显示了殖民政府的社会划分政策。从美斯提索的人数发展到足以划分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时起，菲律宾各地居民，就正式划分成四大类别，即免赋税者（西班牙人和西菲混血儿）、土著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二，乾隆十二年正月庚子条。

菲律宾人、美斯提索和华侨。后三类人可称为纳赋税阶层，分别缴交不同数量的赋税。土著菲律宾人赋税最低，华侨最高，美斯提索则介于两者之间。例如，18世纪时的具体数字是，每个美斯提索贡赋单位每年要交20里亚尔的贡赋和4里亚尔的杂税，合共3比索；华侨每人每年缴付总数达10比索的许可证费；土著菲律宾人每一贡赋单位每年缴交8里亚尔贡赋和5里亚尔杂税，合共1比索5里亚尔^①。

美斯提索既由于父辈的经营，过着较优裕的生活，受较好的教育，又由于学会父辈的经营本领以及后来继承父辈的产业，一般生活较为富裕，文化水平也较高，因而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方面都优于土著人，为土著居民所羡慕。殖民当局赋予美斯提索的权利，较轻得多的赋税负担，比华侨较少遭受殖民者的迫害，又使他们优于华侨。因而，不少美斯提索，无论对土著人，还是对华侨，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优越感。西班牙化程度越高越是如此。

华侨社会的长期缺乏女性华人，使得已婚基督教徒华侨专住区的人口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比农多和圣克鲁斯，由于靠近马尼拉，不断有新改宗的华侨补充，加上土著人的迁入和美斯提索人口的不断繁衍，很快就形成三大种族集团杂居的局面。两个村镇的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原来由华侨单一支配，现在也发展为多元支配。1687年，比农多已有土著人和华侨两个公会，后者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Life*, PP. 9,10,31; Wickberg, *The Chinese Mestizo in the Philippine History*, PP. 63-64; 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菲律宾史稿》，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页；BR, Vol. 35, P. 186.

由十名华侨首领和五名美斯提索首领为首构成。后来，美斯提索发展成为该镇最主要的人群成分，遂于1741年自华侨公会中脱颖而出，另组美斯提索公会。同年，圣克鲁斯镇也出现三个公会。中吕宋平原各地，马尼拉城东、南邻近地区，宿务、怡朗邻近各城镇，自1755年大批驱逐华侨之后，华侨人数显著减少；但大凡有足够数量的美斯提索的城镇，都存在美斯提索和土著人两个公会。美斯提索的地型分布模式，大体上就是华侨地理分布的模式，即分布于重要城镇和西班牙人村落附近，同华侨杂处。这些地方的美斯提索一旦脱离华人公会，另组自己的公会，就标志着他们完全脱离华侨社会的范畴，发展成为独立的人群集团。

美斯提索从其母体——华侨社会中衍生出来之后，就在观念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同母体格格不入。在1639年华侨抗暴斗争中，比农多的美斯提索就同起义者对抗。“那些在教堂中的美斯提索，为表现他们的忠诚”，便同该村多米尼克教会的神父一起，拼力抵抗力图攻占教堂的华侨起义者。还有两连美斯提索被征募，参与对华侨的屠杀，及后还一再自豪地声称，他们是一向支持西班牙人反对华侨的^①。在其他地方，他们基本上也是亲西班牙的。在经济领域，从18世纪后期起，美斯提索的商业活动，作为一种土著民族的商业成分，在殖民当局的挑拨下，也逐渐同华侨的商业活动发生冲突。

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西班牙殖民者同化华侨政策的部分成功。所以说是“部分成功”，是因为他们始终无法同化华侨，而只能同化并融合华侨同菲律宾妇女所生的混血一代。

^①BR, Vol.29, PP. 220, 258, 219 note.

三 华侨的反西斗争和菲西当局 对华侨的第五次大屠杀

1756—1763年，英法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战争。1761年8月，同属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查尔斯第三与法国国王签署《家族条约》，在战争中站到法国一边。1762年1月2日，英国对西班牙宣战。7月29日和8月1日，英国远征队先后从印度的马德拉斯启航，于9月23日^①黄昏进入马尼拉湾，并发出要马尼拉当局投降的最后通牒。菲总督曼努埃尔·罗霍严加拒绝。第二天早上，英军开始攻城。西军恃城坚势众，拼死抵抗。

10月3日下午，罗霍召集政府要员、军官、教会显要，讨论和战问题，决定继续抵抗，同时任命最高法院资历较浅的法官西蒙·安达—萨拉萨尔为副总督、无任所法官（judge-at-large），授权他动员土著居民抵抗入侵者。4日夜间，安达前往布拉干省。5日，英军一举攻进马尼拉。龟缩在圣地亚哥堡的罗霍，于6日向英军投降。安达在布拉干宣布建立独立政府，继续同英国人对抗。不久，安达为避开英军的进攻，转移到庞邦加，以巴科洛尔为临时首都。

^①这个日期，英国方面的资料和西班牙方面的资料，记载相差两天，根据英国远征军舰队长柯尼什的信件，是24日（BR, Vol. 49, P. 46.）；根据菲律宾临时总督罗霍的日记则是22日（Ibid., P. 109）。在1845年1月1日以前，菲律宾所用的日期都比较标准时间迟一天。据此，上述日期似应是23日（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 P. 2 note 4）。下面所用的日期，也有这个差别。

西班牙军队之被英军打败，殖民当局之向英国人投降，粉碎了西班牙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战争中，菲律宾人民亲眼看到，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西班牙人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这就使他们对西班牙的虚弱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再者，安达政府因势单力薄，不得不转过头来，求助于菲律宾人民，以对付新入侵者。这又使菲律宾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菲律宾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奴役的斗争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在1762—1764年英军占领马尼拉期间，内湖、巴坦加斯、塔亚巴斯、卡维特、卡马林内斯、卡加扬、邦加斯南和伊洛科等省份，萨马、帕奈、宿务等岛屿和三宝颜，都爆发了反西起义。马尼拉周围一些地方的土著居民，也给英军以人力、物力的帮助，以此反对西班牙殖民者。早在1744年就已开始的保和反西起义，这时也进一步发展。南部的穆斯林，趁着这个机会，加强了对殖民者的海上袭击。殖民者陷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中。200年来，他们还从未遭遇过如此严重的局面。高级殖民官员弗朗西斯科·L·比亚纳，在1765年给西班牙印第安评议院的陈情书中作这样的经验谈：可以肯定的是，土著居民希望摆脱西班牙人“温和的枷锁”。当他们认为西班牙人软弱时，就不愿做基督教徒，也不愿做国王的臣民。在他们找到反抗的时机时，就不尊重、也不顺从任何人。直到1765年，比亚纳还心有余悸，担心上述局面再次出现，惊呼：“我们仍然受到许多残酷无情的敌人的包围”，例如英国人、摩洛人、华人，甚至菲律宾土著居民^①。

在这次风起云涌的起义高潮中，较重要的是邦加斯南和伊洛科的起义。它们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

1762年下半年，邦加斯南省长派员征集赋税。人们的愤怒由

^①BR, Vol. 48, P. 202.

此爆发。他们要求取消赋税，撤换省长。在短时间内，起义队伍发展至1万人。安达很快纠集西班牙殖民军和庞邦加雇佣军，迅速将起义镇压下去。11月3日，在胡安·克鲁斯·帕拉里斯的发动下，斗争重起。他号召人民继续战斗，并向起义者说明，西班牙人已是英国人的手下败将。起义迅速蔓延，并控制了邦加斯南省大部分城镇。1763年秋，伊洛科的起义被镇压，西班牙人调集伊洛科土著军队，镇压帕拉里斯领导的起义。1764年3月，起义被镇压，帕拉里斯在下一年被处绞刑。据西班牙人记述，在起义期间，由于殖民者的屠杀，进入山区的起义者死于饥饿，加上许多人逃到其他省份等原因，使原有60 383人的邦加斯南省，到1766年5月，只剩下33 456人，几乎减少了一半^①。

这期间最著名、最具有典型性的起义发生于伊洛科，其领导者是迭戈·西朗。英军占领马尼拉后，比干的上层人物乘机抗议省长的横征暴敛，要求撤换某些官员。西朗也在1762年12月14日发动人民起义，把省长和其他西班牙人赶出比干，宣布比干为独立政府的首都，要求把革命运动推向邦加斯南和卡加扬。西朗的革命行动遭到教会和比干上层的反对。起义者重创比干主教组织的雇佣军，关禁主教，全部修道士和反对起义的上层人物。1763年，西朗受到安达的进攻威胁，便寻求英国人的保护。他在一封给英军统帅的信中，承认英国国王对菲律宾的统治权。西班牙人于该年5月派人刺杀西朗。他的妻子和叔父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直至同年9月他的妻子被处死时为止。

菲律宾人民的这次斗争高潮，同以往的历次斗争不同，那就是这些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利用另一个国家侵入菲律宾，打败西班牙人所出现的有利时机，起来同世代压迫和奴役自己的老

^①BR, Vol. 50, P. 24.

殖民者进行斗争。其中相当部分的反西斗争，特别是马尼拉周围地区的大小起义，就象西朗那样，都曾借用英国人的力量，或与英国人合作，或给英国人以各种方式的帮助，以便借助新殖民者之力，使自己从老殖民者奴役下解放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但我们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首先，这些古人在西班牙殖民者的严密禁锢之下，不了解世界的大势，不知道英国也是一个象西班牙那样的殖民国家，因而，不可能有近代的政治头脑，同时反对两个处于敌对关系的殖民者。再者，在遭受长达200年的殖民奴役之苦，经历200年来反西斗争的挫折之后，看到自己的压迫者那样轻而易举地被英国人打败，从而朦胧地认识到，虽然“西班牙人比菲律宾人多一点，但比其他国家少得多”^①。英国人没有西班牙人所施加的宗教强制，也在客观上强化了他们对英国人的幻想。最后，英国人在打败以安达为首的西班牙人之前，也极力谋求土著居民和华侨的帮助，千方百计进行欺骗、讨好，施以一些小恩小惠，为自己树立美好的形象，使土著居民和华侨视之为解放者，心甘情愿与之合作。总之，这一历史事实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今天，我们只能总结并吸取其历史教训，而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对它横加指摘。

英军占领马尼拉期间，华侨也起来进行反西斗争。华侨的斗争，构成这个时期菲律宾反西起义高潮的组成部分。

华侨几经屠杀、驱赶，长期备受种种虐待，对西班牙人恨之入骨，无奈力量对比于己不利，因而自1686年以来的70多年中，一直未敢轻举妄动。由英国人占领马尼拉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使华侨看到，摆脱西班牙桎梏的时机已到。他们（不管是帕利安的非基督教徒，还是巴石河彼岸的基督教徒）在英军入城后，虽然

^①BR, Vol. 43, P. 199.

在财产和生命方面遭到重大损失，但还是对西班牙人的失败额手称庆，同时，对敌人的敌人，则同马尼拉周围的土著居民一样，从行动上和物质上给予帮助。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虽已投降，但安达在庞邦加的巴科洛尔组织流亡政府，并依仗庞邦加等北方省籍雇佣兵的支持，对外抵抗英军的北进，对内镇压各地的反西起义。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存在，不仅对英国人在马尼拉的地位构成威胁，而且对在起义中获得某些自由的土著居民以及大部分已摆脱西班牙殖民枷锁的华侨也依然构成威胁。消除以安达为代表的西班牙人的威胁，是英国人、土著人和华侨甚至是罗霍一派西班牙人的共同要求；虽然他们彼此所怀有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但近期任务却是一致的。英国人和罗霍一派西班牙人宣布安达为叛徒，悬赏4 000比索逮捕或杀害他，并几次组织对布拉干和庞邦加的进攻。在这些进攻中，英国人获得马尼拉周围的菲律宾人和华侨的配合，但由于西班牙人及其土著士兵的顽强抵抗，迄英国人将马尼拉交还给西班牙人的1764年，一直未著成果。

华侨也在西班牙人新的心脏地带酝酿起义。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仅在1762年12月份，庞邦加即发生两起事件。一起是一名华侨企图行刺安达，但子弹仅损及他的大衣，而未伤及他的皮肉^①。另一起是该省的900多名侨，同来自马尼拉的1 000名华侨，在与巴科洛尔仅咫尺之隔的古阿瓜镇秘密组织起义。他们计划同帕利安的5 000华侨联合行动。后者随英军北进，在庞邦加的1 000多人则分散到巴科洛尔周围城镇村落，在圣诞节（12月25日）前夜，在人们集中到教堂里举行礼拜和庆祝活动时，乘虚袭击，杀死安达一派的西班牙人，使早已待机而进的英军，以及随英军北进的马

^①BR, Vol. 49, P. 292.

尼拉华侨乘着混乱开进庞邦加。武器、弹药已在筹集，许多人已经武装起来。本来，这些行动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行刺安达事件已引起西班牙人警觉。在预定行动日期的前几天，一封涉及这次行动的信被西班牙人截获。起义计划由此泄露^①。

安达立即采取紧急措施。12月21日，安达向集中在古阿瓜的华侨发出招降令，提出投降条件：（一）不得作任何抵抗，交出全部武器；（二）该省各村镇已婚华人应交出住所；（三）古阿瓜镇已婚及未婚华人，连同家属、财产一起，迁移到政府指定的地方；（四）今后不得持有武器，亦不得前往庞邦加省的冲要村镇；（五）必须领取普通许可证。一些军官受命将条件通知华侨，并逐屋进行搜查，对华侨分类登记，还在他们家中安置士兵。22日，阿帕利特、卡隆匹特、哈戈奈和马洛洛斯等镇的长官，受命准备追击从古阿瓜逃出的华侨，如遇反抗，俱加杀戮；如肯投降，则解往巴科洛尔。所有华侨不得前往马尼拉和卡维特，否则没收财产。安达还下令在23—25日，在未部署警戒的情况下，不得开放教堂或举行每日祈祷。

23日，安达进攻古阿瓜，发现该镇由一支配有火炮的5 000名华侨、美斯提索和本地人防守着。安达发起猛攻，占领该镇。100名华侨战死，另181人被俘，在巴科洛尔处绞。其他溃散者，途中被杀，或被抓捕后惨遭杀害。起义者的火药、枪械和9 000比索也全部被缴获。几乎同时，随同英军试图从陆路和海路进入庞邦加

^①BR, Vol, 49, PP. 291—292, 有些资料没有提到截获华侨信件一事，但提到华侨的密谋是“由一名土著告知安达”的。见BR, Vol, 49, P. 147 note 92. 赛德在《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中则说，一位密谋者的土著情妇，将暴动计划报告给庞邦加省墨西哥教区的神父，事机由此泄露。见该书Vol. I, P. 283.

的2 000华侨，也有许多在战斗中牺牲。

安达对华侨进行骇人听闻的报复。他下令绞死群岛各地所有的华人。这项命令直到1765年仍继续执行。在这期间，究竟有多少华侨死于屠刀、枪弹和绞刑架下，未见精确数字。在可见但并不全面的数字中，有的说是6 000人，有的说仅处以缢首之刑^①者就有数千人。还有一说，仅在1763年，邦加斯南一省就有6 000华侨被杀。后一数字如果属实，全菲被杀华侨当远逾6 000之数。由于大批华侨在1762年圣诞节期间被杀，历史学家因而称这个圣诞节为“1762年的红色圣诞节”。

1763年2月10日，英、法、西签订《巴黎和约》，七年战争结束。按照条约，英国将菲律宾和古巴交还西班牙。1764年5月31日，安达率领的西军“凯旋”马尼拉，而英军则在下一个月的10—11日才最后从马尼拉湾撤走。

随着西班牙人重新主宰马尼拉，对华侨的新一轮反攻倒算开始了。英国人刚撤离，帕利安全体华侨都被当作“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叛徒”，许多人被绞死。一些人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迫害。400—500名马尼拉华侨被迫为殖民者修理城防，挖掘护城壕，以此“作为对他们先前的叛乱的一种惩罚”。这些不堪苦工折磨的华侨，在给国库一笔12 000比索的“慷慨赠款”，以解救处于“枯竭状态”的国库，另给最高法院8 000比索，作为劳役代金之后，才得以免除苦役。在殖民者看来，由于这些华侨的生命已被饶恕，“他们现在在王家设施中服劳役恰恰是公正的，对他们来说已是十分体恤了。”^②

①所谓缢首之刑，即将10人或15人作一批，以发髻相互结绑，系以大石，投诸水中溺死。

②本段引文及数字均见BR, Vol. 50, P. 157 note 88.

行政当局的一些头面人物，不惜违反菲律宾人民、甚至在菲西班牙人的利益和意愿，变本加厉地煽动对华侨的仇恨，鼓吹对华侨采取更进一步的迫害措施。这些人当中，尤其臭名昭著的是检察官比安纳和卸任临时总督安达。

比安纳可以称得上是西班牙殖民官员中较有远见的财政改革者。他在1765年初所提交的《1765年陈情书》^①中，提出了在当时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并且在18世纪后期开始执行的经济改革意见。但他和安达一样，对菲律宾人民、对华侨刻骨仇视，是排华的急先锋。他在陈情书中宣布，“几乎所有的帕利安华人都已成为上帝和国王的叛徒”，“对华人所作出的任何表现，都要抱怀疑态度”。他曾经几次提出进一步迫害华侨的措施：（一）政府应对在战争期间离开帕利安回国，然后又回到马尼拉的华人早先的状况、行为和品质作严密的调查，不管他们中谁被发现背叛过西班牙人，都应给予极端严厉的惩罚。对那些没有背叛行为的人，因其未获许可即离开帕利安，因而，每人应科50比索的罚款。（二）马尼拉最高法院应驱逐帕利安和丝市（圣费尔南多丝市场）的华侨商人，没收他们的全部动产，作为对他们最近的背叛行为以及他们控制马尼拉零售业的一种惩罚。（三）将马尼拉的已婚华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送到圣伊内斯铁矿区，使这个矿区成为一个惩罚性的囚区，让他们在那里为政府开采铁矿，开荒种地^②。

安达在战时是双手沾满华侨鲜血的刽子手，战后是排华的吹鼓手和干将。他用更下流的语言咒骂华侨，宣称华侨是“偶像崇拜者、叛教者、叛徒和鸡奸者，对菲律宾社会没有一点好处”。这种不负责任的谩骂，无需多花笔墨加以反驳。早在上个世纪末，

①BR, Vol. 48, PP. 197—338.

②BR, Vol. 50, PP. 157 note 88, 161 note 60, 107 note 55.

就有一位名叫T. H. 佩德罗·塔维拉的“菲律宾学者、自由主义者和进步爱国者”，针对安达对华侨的各种谩骂和诬蔑，一一给予有力反驳。其中，塔维拉说到：

说真的，华人本来可以无需受到更坏的待遇：他们向来备受各种指摘。说到他们的存在对菲律没有好处，这一断言与事实完全相反。华人有许多陋习，这是真的。但只有承认他们是勤勉的、刻苦的，尊重别人的和有理智的，这才是正确的。由于上述品质，他们对他们所在的菲律宾，毫无疑问地是有好处的①。

安达在1764年夏末要求西班牙国王全面驱逐华侨，包括全部基督教徒华侨。但又担心在菲西班牙商人、教会人士将会反对驱逐华侨的建议。并且，人们也担心驱赶华侨将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带来破坏。安达为消除这种顾虑和反对意见，用主观虚构的办法，设计了几条理由：反对驱逐华人的人，定将遭受他们希望保护的华人所加的灾难；一旦摒弃了华人，这些反对者就可以取而代之，成为商人、零售商和店主；驱逐华人后，土著人也将被迫重操他们的旧业，从事各种生产，从而使国库的收入得以增加②。

安达的主张，终于获得教会集团、新总督何塞·拉昂和西班牙印第安评议院的支持，国王也于1766年4月17日发布全面驱逐华侨的命令，规定凡在英国人占领马尼拉期间犯有暴行的华人基督教徒，一律驱逐出菲律宾③，只准真正的基督教徒留下；该等

①BR, Vol. 50, P. 157 note 88.

②BR, Vol. 49, P. 308; Filipino Heritage, Vol. 4, PP. 1012—1013.

③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1766年4月17日的授权书，所有在菲华人，包括基督教徒，均应驱逐。因为，在英国人占领马尼拉期间，他们犯了不忠诚、背教和其他丑恶的罪行。只留下真正的基督教徒。”转引自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27 note 9.

留菲华人应分别指定到适当的区域和村镇，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且仅限于从事农业及各种手工行业；除获法官、总督及省长批准者之外，不得离开所居住的村镇，否则终身逐离菲律宾。还规定对居留者征收越来越高的各种捐税。这些税捐之高，使那些愿意回国或留下从事农耕的绝大部分人，在驱逐令生效之前，就被迫放弃他们的商业活动^①。

驱逐令一公布，就在菲律宾社会中引起极大的不安。在这一年的10月，法国天文学家勒让蒂受法国政府的委托，为作近似金星凌日观测而到达马尼拉。他在《航海记》中记录了马尼拉人的怅茫心情。他说：

在马尼拉，我所认识的西班牙人，无不对华人的离开从心底里感到惋惜，无不坦率地承认，菲律宾将为此遭受痛苦，因为土著人无法代替华人。……对失去这种勤劳的人，西班牙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不感到沮丧的^②。

为了给执行驱逐令作准备，殖民当局在1766年就开始将在1762—1764年屠杀中的幸存者集中起来。1769年，驱逐令开始生效，许多华侨被驱逐。这项排华法令实行的结果，并不象安达的设想那么美妙。在驱逐令有效时间(1769—1778)，由于缺少华侨的人力和经济服务，菲律宾又经历了一次经济萧条，商业几陷于停顿。到头来，在排华运动中尝到最大苦头的，还是西班牙人自己。他们一向依靠特权生活，既极端缺乏节约观念和习惯，对出现的困难也漠不关心和缺乏主动精神。要他们去填补华侨离开后留下

①BR, Vol. 50, P. 253; 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45.

②Le Gentil, Voyage, I, P. 101, 见 BR, Vol. 51, P. 231 note 148.

的空缺，他们是极不乐意的；即使愿意，他们也缺乏华侨那种经营活力和吃苦耐劳精神，无法使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转。因此，在安达死后两年，即1778年，上述驱逐令已无法再继续执行，不得不宣告撤销，代之以新的、较宽容的法令，鼓励中国匠人移居。这一转变，尽管幅度不大，但实际上是否定1766年的驱逐令，间接宣告殖民者前此对华侨的苛政，特别是屠杀、驱逐政策的失败，从正面宣布：在保持菲律宾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促进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华侨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

第 八 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菲西当局 对华侨的政策

一 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转变

在18世纪以前，西班牙的殖民政策遵循重商主义的原则，对殖民地的内外贸易都严加统制，致使菲律宾的商品经济一直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直至18世纪后期，西班牙在菲律宾传统的统治方式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情况才起了变化。

18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与重商主义针锋相对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它对欧洲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殖民国家纷纷抛弃孤立主义的殖民政策，开放殖民地，解除对工商业的限制^①。这一时期，西班牙国内的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发展。资产阶级要求王室采取立法措施鼓励发展工农业，王室中要求改革旧传统的势力也十分活跃。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1759—1788）接受了“开明专制制度”，在他的财政大臣、重

^①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 p. 62. 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 主张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竞争，自由地发展国内和对外贸易，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它是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农学派经济学家佩德罗·康波曼内斯的协助下，从60年代开始，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本国经济的措施，对殖民政策也作了相应的改变。王室批准了西班牙一些主要港口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自由贸易。在1765年以前，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的全部贸易只通过加迪斯一个港口进行。到1778年，西班牙本土已开放了13个港口，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开放了24个^①，改变了由极少数商业机构垄断殖民地贸易的状况。在亚洲，除了继续维持对大帆船贸易的垄断外，王室也企图建立起西班牙与菲律宾的直接垄断贸易。1776年10月，查理三世派遣的一艘载有欧洲货物的船只，首次绕过好望角到达马尼拉，建立了西班牙与菲律宾的直接交通和定期贸易^②。

在菲律宾，由于殖民政府长期实行掠夺政策以及对华侨的经济活动进行排挤和限制，造成经济凋敝。18世纪后期，大帆船贸易又因受到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贸易的挑战而开始衰落。这使长期以来以大帆船贸易的赢利和墨西哥殖民政府财政补贴为主要财政来源的菲律宾殖民政府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濒于破产，殖民政权岌岌可危。为了维持和巩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权，西班牙王室和殖民地政府开始寻求其他途径解决财政问题。

①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0—13页。

②Encyclopedia of the Philippines, vol. v.P.57; 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I, P.31; Conrado Benitez,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Revised Edition), P.226. 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和1609年的安特卫普条约，西班牙船只只能循西线，即经墨西哥或绕合恩角开往东方属地，见John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253.

1762—1764年英国占领马尼拉的冲击，终于使西班牙放弃了在菲律宾实行的孤立政策^①。在英军占领期间，英国对外开放马尼拉港，并出口菲律宾产品。在英军撤出后，一些西班牙殖民官员开始考虑并向王室提出了发展菲律宾产品的生产、出口的建议和要求^②。1778年，经王室允准，新任菲律宾总督何塞·巴斯科—巴尔加斯开始推行他的以在财政上不再依靠墨西哥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总计划”，鼓励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农工商业。巴斯科的到来，是西班牙对菲律宾殖民掠夺史的转折点。

巴斯科的经济发展计划着重于发展供出口的经济作物。1781年，殖民政府组建了“马尼拉乡村之友经济协会”，以帮助发展农业生产。1782年设立了烟草专利权。烟草生产全由政府垄断，实行强迫种植。1785年，西班牙政府在国内组建了一个商业垄断公司——菲律宾王家公司，垄断西班牙与菲律宾的直接贸易，投资经营菲律宾的工农业生产，鼓励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王室和殖民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菲律宾商业贸易的限制，西班牙对菲律宾实施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变。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商业贸易政策经历了从既开放又限制到完全开放的漫长过程，但是对其传统的殖民政策并没有作出根本的改革。

西班牙对华侨的政策是直接为其殖民政策服务的。为了利用华侨开发菲律宾群岛，从18世纪末起，殖民政府对华侨的政策也有相应的变化。

1778年，巴斯科撤销了1766年驱逐华侨的法令。他认为“华

①D.G.E.霍尔：《东南亚史》，第812页。

②Maria Lourdes Diaz-Trechuelo, “Philipp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1746—1779”, *Philippine Studies*, vol.12 (1964), PP.212-321.

侨的协作将促进他的计划的实现”^①。殖民政府改变了过去对华侨进行周期性大屠杀和大规模驱逐的政策，转而采取对华侨的活动进行严密控制和监督的新政策。从这时起直至西班牙统治的结束，没有再发生过对华侨大屠杀和大驱逐的事件。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敌视态度并没有改变，对华侨的迫害依然存在，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殖民当局对华侨活动的严密控制与监督主要通过移民、税收、职业、居住、旅行等政策来实施。它还为实施这种控制、监督而实行法律歧视和反华宣传。

二 菲西当局对华人的移民政策

18世纪末，为了配合开发非岛的计划，殖民当局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开始有所放宽。1778年，殖民政府撤销了1766年全面驱逐华侨出境的法令，相当多的华侨又回到马尼拉。巴斯科的经济发展规划着重发展供出口的经济作物。殖民政府放宽对中国移民的限制，主要是为了获得农业劳动力。它几乎始终坚持这样一个理论：对中国移民进行不断的调整以促进农业生产^②。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殖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华人移民和居留的各种法令，力图使华侨的经济活动限制在农业方面。1785年4月1日，殖民政府下令在庞邦加的干达巴建立一个200人的华侨居留地，对当地进行开发^③。又规定中国移民入境要宣誓只从事农业生产^④。1804年的

①BR, Vol.50, P.50.

②BR, Vol. 52, P. 144.

③BR, Vol.50, P.57.

④Elliott C. 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th-19th Centuries", *Philippine Studies*, Vol.18 (1970), P.86.

一项法令规定只允许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华侨留居菲岛^①。为贯彻这项法令，同年强迫马尼拉华侨店主八天内离市，只准与菲律宾人结婚的华侨继续开店；同时，规定他们离市后在各省从事农耕，且不得离开耕作区，违者判处二至三年徒刑。准许他们离开耕作区的官员也要受处罚，区长科罚200比索，副省督科罚25比索。1834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华侨只能居住在马尼拉帕利安，到外省居住的只能从事农业。1838年，华侨被划分为暂时居留和定居两种，没有获得居留许可证的将判劳役。1849年，又规定暂居的华侨可在菲停留三个月，定居的可以永久居留^②。从1778到1849年这段时间里，殖民政府虽然重新准许华人移入菲岛，但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1785年2月25日，殖民政府曾下令把所有华侨逐出马尼拉，只准小部分华侨在城外指定地点居住^③。1789到1804年间，仍有不少华侨被驱逐出境。因此，这个时期华侨人口增加的速度不快，而变化幅度却相当大。1790年，据谨慎的估计，全菲华侨约有4 000人，而官方统计则有5 000人。1807年已登记的华侨有4 700人，连流动的在内估计有7 000人。1828年下降到5 708人。此后，又以平均每年500人的速度增长，1839年达到11 575人，但在1840年突然降至5 729人，从1840到1847年，华侨人口有波动，但实际人口没有增减，到1847年约为5 736人，与1828年人口几乎相同，只是到1848年才开始稳步上升，到1849年达到了8 757人^④。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30.

②BR, Vol.51, P.58; Antonio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27.

③BR, Vol.50, P.57.

④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24, 53;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503.

这个数字与前两个世纪的华侨正常人口相比仍然偏低。

19世纪中叶，菲律宾处于经济大改造时期。马尼拉开港后，外国资本广泛渗入，导致了大部分地区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地区性单一作物经济体系。随着海外市场对出口作物需求的增大，殖民政府对菲律宾的加紧开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当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菲律宾出口贸易和一部分商品性农业生产的西方商人，经常以各种形式向殖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给他们的商业活动以更多的方便，以及要求政府鼓励进口华工。这就迫使殖民政府进一步改变对中国移民的限制政策。1850年8月5日，菲律宾总督颁布法令，鼓励庄园主和种植园主进口华人农业劳工，同时规定这些华工的职业限于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从1850年开始，中国移民的数量几乎不受限制^①。这时，中国人口膨胀。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农业凋敝，内乱迭起，民不聊生。大量沿海贫民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从1847到1874年，估计有25万到50万华人移居海外，1879年到1889年间，仅从厦门港出国的人数就达415 074人。这时厦门和香港至马尼拉轮船的通航，为向菲律宾移民提供了方便。由于上述原因，菲律宾华侨人数激增。到1895年为止的19世纪后半期，中国到菲移民比以前增加了八倍。1864年全菲华侨已超过18 000人，1876年共计30 797人，1886年增至93 567人，1896年达到10万人^②。

随着马尼拉与香港交通、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从19世纪中叶开始，广东籍华侨开始增多，从原来的500余人增加到19世纪

①Edgar Wickberg, "Early Chinese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1850—1898", *Pacific Affairs*, Vol. 36 (1962), P. 278.

②Censu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903, Vol. I, P. 490.

末的3 000多人，约占华侨人口的3.3%左右。这个时期的移民绝大多数为男性，1870年女性只占华侨人口的0.8%，1886年占0.3%，到1903年占1.3%^①。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在1875—1898年的24年间，从厦门到马尼拉的华人有204 747人次，从马尼拉到厦门的有168 166人次。据华人甲必丹的统计，从1876—1886年华

表 1 1876—1886年华人出入境人数统计

年 份	入境人数	出境人数	增加人数
1875	—	—	30 797
1876	6 410	4 344	2 066
1877	7 582	4 120	3 462
1878	11 907	4 338	7 569
1879	10 352	2 778	7 574
1880	8 994	3 582	5 412
1881	9 411	5 203	4 208
1882	9 903	4 611	5 292
1883	16 809	5 188	11 621
1884	14 881	4 466	10 415
1885	11 893	4 711	7 122
1886	5 513	1 899	3 614

资料来源：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34—35.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74.

他们频繁地往返于两地的原因，不外出于商业贸易的需要，其次是相当一部华侨并没有作长期定居的打算。

中国移民进入菲律宾必须交纳入境税。到1890年，入境税从原来的2比索提高到20比索^①。19世纪中期以前，移民大多数乘中国帆船赴菲，无力支付旅费和入境税的，可以与船主谈妥，赊欠旅费和入境费用，到菲后再从工资中按月扣还。当西方企业介入中菲航运以后，这种移民方法演变为契约劳工制。到19世纪中叶，中菲间的航运多为英国轮船公司经营。1852年，英国人除了自己拥有的18艘轮船外，还租用了61艘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从事中菲航运业务。轮船公司在中国散发广告，鼓吹向菲律宾移民。据《马尼拉日报》所列举的数字，19世纪60—90年代，英国人所经营的轮船运载了大量中国人到菲律宾。到菲律宾的中国移民多数是自备旅费的自由劳动者，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有亲戚朋友或同乡可以依靠，工作一般不成问题。但也有一些是契约劳工，以立约赊欠旅费的方式移民到菲。

向菲律宾贩运契约劳工的苦力贸易主要是在187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由于菲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西方商行需要大量搬运工人，西方轮船公司便积极地向菲贩运苦力。经营苦力贸易的主要有三家设在香港的公司：英国的太古行、怡和行和美国的旗昌行。1891年以后，日本的N. Y. K轮船公司也参与苦力贸易^②。

劳工由客头（客贩）招募，轮船公司让这些劳工欠费乘船，由头客负责到埠后偿还。移民的手续比较简单，只要在厦门的西班牙领事馆取得入境签证，即可由客头率领乘船赴菲，上岸后递人出入境人数如下：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76 note.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70.

交入境呈报单，并向华人甲必丹登记交费，手续即算完备。殖民政府对新客进行登记，并把名单登载在市政府的公报上。

契约华工到菲后被卖给头客(Cabecilla)^①，一般每个苦力可卖20—30比索。头客把这些苦力出租给其他雇主。这些契约劳工必须受头客和雇主的摆布和约束，在还清路费和入境税之前他们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中有些是被迫或被骗到菲律宾去的。同治八年(1869)，《总理衙门致闽浙总督及福州将军请照招工章程办理啤喇哦招工案书》中说及：“洋人贩卖人口出洋，俗谓之卖猪仔。唯吕宋此风为甚。……赫税司(赫德总税务司)钞录荣税司(英税司荣雅国)各件，有陈何氏稟诉其子陈麒麟冤遭诱骗来厦，卖给吕宋招工一节，……而该华工之半多拐卖，此其明证也。”^②

据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第一帮办温切斯特1852年关于移民出洋问题的笔记，西班牙船只曾经把600名诱招到的契约华工从厦门运往菲律宾。西班牙人还企图在英商的协助下从厦门运出600名华工到巴坦和巴布扬等岛屿开发荒地，还计划输入华工开采铜矿，但都没能实现。西班牙在中国招募苦力的活动，遭到当地人民的抵制。西班牙在其招工活动失败后，居然以武力入侵相要挟。“光绪六年(1880)，该国以广东阻其招工，声言将派兵船带八千人至中国，危词恫喝。”^③1854年，在厦门港的一艘英国船“英格伍德号”(Inglewood)上发现窝藏着40多名七到八岁的中国女童，据

①Cabecilla 一词意为老板、头目等，这里指的是专门经营契约华工雇佣劳动的华侨老板。

②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1—532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

说他们是从宁波、镇海、慈溪等地买来的，将被运往马尼拉的烟厂^①。美国驻华专员伯驾说，他在中国港口曾经见到过胸前标有“P”字样以示运往菲律宾的苦力^②。

西班牙殖民者还以招工为名，把菲律宾华侨拐卖到另一西属殖民地古巴。驻广州的西班牙领事在给西班牙海外事务部的一封信里，诉说为古巴罗致华工的困难，并建议在菲律宾招募华工。事实证明，他的建议已被西班牙政府采纳。光绪十五年（1889）

“七月，古巴领事禀称，西班牙轮船到埠，船有中国人十名相向哭。问其情由，据称皆闽人，向在小吕宋谋生，此次被人骗称雇工，到此方知立约做工，与卖身同。”^③在1876年古巴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一位名叫韦良（音译）的华工作证，他是和其他华人一起在菲律宾被绑架到古巴去的。据非官方的不完全统计，1847—1862年，从马尼拉到古巴去的船只载去华人325名^④。西班牙政府从菲律宾向古巴输送华工的计划并未能全部实现，因为当时菲律宾也需要大量华工，并没有多余的华工可以输出，其他华侨多是从商，也不愿意到古巴去当苦力。因此，西班牙人只能拐骗到少量华工。

①英格伍德号事件详见：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7—134页。

②Elliott C. Arensmeyer, *The Chinese Coolie Trade and the Philippines: An Inquiry*, *Philippines Studies*, Vol. 28 (1980) P. 192, 194.

③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④另据谭乾初：《古巴杂记》，1860年有一船华工从菲运往古巴，人数不详。见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页。Arensmeyer, “The Chinese Coolie Trade”, P. 196.

这个时期的苦力贸易非常残酷，对菲律宾进行的这种肮脏交易也不例外。苦力贩子视华工如同草芥。1893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L·罗哈斯拥有的轮船唐胡安号在香港装载了10万墨西哥银元，企图走私偷运到马尼拉，船上载有西班牙乘客和20名中国苦力。船行至吕宋西岸时着火，船员和西班牙乘客纷纷弃船乘救生艇逃命，旋即从海岸开来汽艇救援，但西班牙人竟然置华工之死活于不顾，只去抢救银元，听任华工在熊熊烈焰里与轮船一起沉没，20名华工全部葬身鱼腹，无一幸免^①。西班牙殖民者对华工的态度在这场惨剧里表露无遗。

向菲律宾贩运契约劳工的苦力贸易，与美洲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地区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且不典型。大多数菲律宾的中国移民还是自由劳动者。这是因为闽人旅菲历史较长，到菲的新客多数都有亲戚或同乡在菲定居，而且菲律宾华侨经商者为多数，一般都有能力为他们的同乡或亲戚支付路费。这就使得中菲间苦力贸易难以发展。因此，西方苦力贩子不可能对菲律宾大规模地进行这种罪恶的交易。

三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税收政策

从列加斯比1565年征服菲律宾到1884年这300多年间，菲律宾殖民政府的税收政策是以1523年对西属殖民地颁布的《印地法》（*Las Leyes de Indias*）为基础的。根据这个法律，属土臣民必须向西班牙缴纳贡金，最初每户每年纳1比索，后来提高到1.25比索，1851年提高到1.5比索。除了贡金外还有两种主要税项：人头税和行业税。

^①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291.

西班牙在菲律宾实行与在墨西哥以及其他西属殖民地相似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的特征是把赋税的沉重负担压在贫苦百姓身上。如征收人头税而不设所得税就极不合理。行业税也极不合理，如对雇员和零售业小业主征收重税，对巨商及大实业主征收的税额与其资产和收入相比则微乎其微。另外，对酒等奢侈消费品征税很轻，而对贫苦大众所需的大米等日常消费品却课以重税。在这种政策下，华侨受害最大。

对华侨的歧视是这种政策的另一特征。西班牙殖民者一向把对华侨征收的税款作为一大财源，对华侨横征暴敛，也希望以重税来限制和控制华侨的经济活动。在菲各人种、等级中，华侨的赋税负担最重。1790年以前，华侨与菲律宾人、华侨与中菲混血儿的赋税额比率分别为5：1、10：3；1790到1828年为7：2、7：3；1828年以后，由于专门对华侨开征行业税和商店税，华侨纳税额大幅度上升。1870年，最高等级的华侨店主与同级菲人、中菲混血儿的纳税比率分别为21：1、16：1；最低等级的店主则分别为4：1、3：1。人头税一项，华侨在1820年共缴纳3万多比索，到1888年竟增至236 250比索。1888年华侨所缴纳的税款就占殖民政府年税收总额的1/20；而当时华侨人数还不到总人口的1/70。19世纪最后25年，人头税是当局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华侨在1884年和1893年交缴的人头税分别为227 751.15和490 755.19比索^①，此外，华侨还得交付数目可观的行业税、关税和印花税。1894—1895年，华侨缴纳这三项税额分别为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159 — 160;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42; *Censu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903*, Vol. I, P.360.

1 323 000、4 565 000和510 000比索^①。华侨所缴纳的赋税成了殖民当局不可缺少的财源，这是华侨在19世纪没有再被大规模驱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人头税

人头税的征收明显地表现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歧视政策。殖民政府规定，年满25岁的男性和已婚或年满25岁的女性都要交纳人头税。西班牙人、西菲混血人以及除华人以外的外国人享有免税特权。人头税分菲律宾土著居民、华菲混血人和华人三个等级，菲律宾土著居民每年交纳1.5比索；华菲混血人3比索^②。1790年以前，华侨的人头税为5里亚尔，但还须付8比索的居留许可税和“捐献”1.5比索的“社区基金”^③，年税额共81里亚尔（10 $\frac{1}{8}$ 比索）。从1790年开始，废除了居留许可税，社区基金降至6里亚尔，同时将人头税提高到6比索^④。其他两个等级的人头税不变，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叶。从1790到1828年，华侨年总纳税额从以前的81里亚尔降至54里亚尔（6 $\frac{2}{3}$ 比索）。殖民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移民，以填补由于18世纪中期驱逐华侨所造成的某些行业劳动力的空缺和发展经济作物的出口。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42.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43.

在十九世纪中叶，1比索相当于1美元；1890年代至1941年约相当于0.5美元。

③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9.

④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44;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58.

从1878年起，殖民当局开始实行适用于各人种的行业税（Contribucion industrial）。这是一种按财产、收入征收的直接税。1884年，当局废除了贡金和人头税，实行分级课税的新税制，以发放身分证（Cedula Personal）的形式征收。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人头税，因为在菲律宾的每一个年满18岁的居民，都必须领取身分证。这种主要根据直接税额征收的新税，最初分为十等，后来增至十六等，分级课税，主要是一至九等，征税情况如表2。十至十六等是特殊等级，其中有些不是根据收入来划分的。华侨不在上述各等级之内，另有规定。

表 2 菲律宾人身分证税 （单位：比索）

等级	年直接税额	身分证税	备 注
一	400以上	37.50	
二	300—400	30.00	
三	200—300	22.50	
四	100—200	12.00	
五	50—100	7.50	
六	12—50	5.25	
七	8—12	3.50	
八		3	第七等纳税人的妻子
九	8 以下	2.25	

资料来源：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61.

在1884年推行新税制时，华侨的人头税暂时仍保持不变，但直接税在100比索以上的华侨，须按上述规定纳税，不再交纳人头税。到1889年，殖民当局全面修订了有关华侨人头税的法令，于1890年实施。每个华侨，不论其性别和年龄，都必须领取“人头税身分证”（Cedula de Capitation Personal）。这种证件的性质与效力，与土著居民领取的身分证完全一样，有效期为一年，因此必须每年纳税。根据所交纳的直接税（主要是行业税）数额，华侨按九等分级课税，详见表3。

表 3 华侨身分证税 （单位：比索）

等级	年直接税额	身分证税	备 注
一	400以上	48.90	男性十四岁为法定纳税年龄，下同
二	300—400	40.75	
三	200—300	32.60	
四	100—200	24.45	
五	50—100	16.30	
六		9.78	前五等以外，年满十四岁的男性
七		4.89	年满十七岁的女性
八		免税	十四岁以下及伤残、丧失劳动力者
九		免税	在职的征税员、华侨社区管理官员和他们的妻子

说明：一至五等是商人或店主，第六等大部分为前五等的雇员。

资料来源：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46; Wickbery,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62.

华侨一至五等的划分标准与其他人种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作一比较：

表 4 华侨与其他人种身分证税比较 (单位：比索)

等 级	华 侨 税 额	其他人种税额
一	48.90	37.50
二	40.75	30.00
三	32.60	22.50
四	24.45	12.00
五	16.30	7.50

从表 4 可见，每一等级华侨的税额，都高于同一等级的其他人种。以这五个等级平均来算，其他人种每付 1 比索税，华侨就得付 $1\frac{2}{3}$ 比索。换言之，华侨须多纳约 66% 的税。

根据 1897 年从八个省份抽样获得的统计数字，大部分华侨属于第六等级，详见表 5。

划为第六等的华侨全是雇佣劳动者，平均每天工资只有 5—10 仙，最高的也不超过 15 仙^①。与他们的收入相比，9.78 比索的人头税是相当重的负担。

为了强迫华侨购买这种证件，西班牙官员经常进行检查，没有身分证的华侨一旦被发现，要 罚 款 50 比索或监禁 30 天。没有能力购买身分证的华侨则被驱逐出境。殖民政府曾于 1880 年 1 月

^① 1 仙 = 1/100 比索。

表 5 1897年八省华侨身分证税等级抽样统计

人 数 省 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西内格罗斯						100			
巴 塔 安				1	6	100			
安 蒂 克				4	4	200			1
阿 尔 拜	5	3	8	50	100	1 200			
东内格罗斯		3	3	2	17	211			2
内 湖			8	13	50	650		8	3
索 索 贡	3	3	4	1	35	900			
萨 马	6	2	7	40	70	1 400	15	20	10
合 计	14	11	30	121	282	4 661	15	28	16

资料来源: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49.

28日下令将拖欠政府债务合计一年的华侨押往马利亚纳群岛, 在公共工程中服劳役, 直至债务还清为止。为了便于辨认华侨, 殖民政府还规定华侨必须穿着他们传统的服装, 不准穿土著居民或混血人的服装, 违者罚款10比索^①。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47.

另一种形式的人头税是代役费（falla）。殖民政府规定，华侨和其他土著居民每年都必须服劳役40天，包括修建道路、桥梁、教堂、码头等公共工程，传递邮件、伐木、造船、铸造火炮以及为西班牙军人和旅行者当脚夫等等。也可以出钱代役，每天1.5里亚尔，全年合计7.5比索。1883年7月1日王家法令把役期缩短为15天，全年代役费为3比索，即每天1.6里亚尔。但是，1884年3月6日法令又规定1883年7月1日法令对华侨无效，他们不在减役之列，仍须按旧规定服役或交代役费^①。

（二） 行业税

1828年，殖民政府看到华侨商业已经恢复元气，认为可以进一步盘剥，便下令专门对华侨开征行业税，以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也借此对华侨商业加以限制。其征收办法是，根据所从事的行业或职业，华侨被划分为三类纳税：第一类，批发商，年税额120比索；第二类，零售商，年税额48比索；第三类，各种工匠，年税额24比索。与此同时，1790年开始实行的人头税继续保留。这个法令还规定，拒绝纳行业税的华侨必须在六个月之内离境；拖欠三个月而又无力缴交者，将被押到种植园工作，日薪不低于2里亚尔，另供给口粮，但种植园主要将其工资扣下，交给所属省份的有关官员，直至他还清所欠税款为止。后来又规定，拖欠行业税的华侨可用于公共工程和修筑工事，如果他们再次欠税，将被驱逐出境。由于许多划归第三类的华侨工匠实在付不起每年24比索的行业税，殖民当局只好于1830年增设第四类税额，每年12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48.

比索。1828年法令还要求将华侨按巴朗圭的形式组织起来^①，由华侨头目代收税款；只是由于绝大部分地区的华侨都不愿充当这类角色，西班牙政府才不得不放弃在全菲实行巴朗圭制的计划，而只在少数僻远地区的华侨社区中实行。根据1831年的税收登记，马尼拉的5 708名华侨，7人属于第一类，166人属第二类，4 509人属第三类，830人属第四类，另有196名年龄超过60岁的华侨免纳行业税。华侨对征收行业税极为不满，有800人拒绝纳税，返回祖国；1 083人逃到山区，453人由于无法回国，又无力纳税，被强迫在公共工程中服劳役。由于华侨的强烈反对，行业税难以征收，殖民政府不得不在1834年8月授权税务监督在“较易和解的基础上”，对原有的税法加以修改，以对华人商业企业征收特别营业执照税代替行业税，但直至1849年才公布修正的规定，从1852年起实施。

1852年起实施的税收法是以纳税人的经济能力为基础，通过对华侨商店征收营业许可税（以下简作商店税）的方式实施的。商店税与行业税的不同之处是，它只对店主征收，店员及其他华人免纳此税。根据商店规模的大小以及经营商品的性质种类，华侨商店被划为四类：第一类年税额为100比索，第二类60比索，第三类30比索，第四类12比索。这种商店税只对华侨征收，对其他人种直到1878年才开始实行。据1886年的统计，属于第一类的华侨店主有170人，第二类2 132人，第三类有2 437人，第四类有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83. 殖民政府的计划是：每50—100名华侨组成一个巴朗圭，设一名巴朗圭头目。该头目在本巴朗圭中负责征收赋税，维持秩序，并对全体成员的举动进行监视。巴朗圭头目由当局指定，并直接向当局负责。

2 028人。此外，在1868年底以前，如果要到每周一次的定期集市出售商品，华侨店主每年还得付60比索的特别税。1867年，殖民政府还要求华人用西班牙文记账。实际上他们只是以此作为向华侨敲榨的手段，因为西班牙人明知绝大多数华侨不懂西班牙文，这项法令根本无法实行。因此，在华侨的抗议下，在西班牙官吏收取了华侨的钱财礼物之后，这项法令也就不了了之。

西班牙的税务官员除了征收法定税项之外，还经常擅自向华侨征收其他苛捐杂税或任意提高税额。1867年以前，殖民政府没有出版过法令汇编之类的文件，以后出版的法律文件又全是西班牙文本，而绝大多数纳税人都不谙西文，无法了解有关的税收法令，只好听凭摆布。殖民官吏还经常以驱逐出境来要挟，向华侨勒索钱财。华侨在菲岛生命财产毫无法律保障，一听到殖民政府在酝酿对华侨不利法案的风声，就得集资送礼，破财挡灾。例如为了使韦勒总督不将进一步加重华侨赋税的法律付诸实行，华侨就向他送了8万比索，给他的妻子送了钻石和其他礼物，无偿地给他派了个一流的厨师，并供应他全家的食物。

华侨并不甘心听凭西班牙殖民者任意敲榨。保存下来的大量殖民政府档案资料表明，为争取他们的权益，废除不合理的税收，他们曾经与西班牙殖民者作过长期的斗争^①。

四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职业及旅行政策

在19世纪，西班牙殖民当局除了对华侨征收重税以外，还在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49—50.

职业及旅行等方面进行严密控制，以限制华侨的活动。

在1834年马尼拉开港以前，西班牙殖民政府为了保护其商业利益，曾于1800、1807和1816年三次下令禁止外国商人在菲居留和从事商业活动，1823年又下令禁止外国商人从事零售商业以及到外省从事商业活动；1840年重申这一法令。1834年8月10日的法令规定，华侨商人只能住在马尼拉的帕利安内，可以从事各种行业，但仍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到外省居住的华侨必须从事农业。1844年的一项法令禁止外国人以任何借口住在外省。1850年又特别规定，进口的华工不得从事商业贸易、手工业和工业，只能从事农业，或麻和蓝靛加工业。到1857年再次重申这些法令。

对旅行的限制政策主要体现在1839、1852和1888年颁布的三项法令里。这些法令规定，华侨要离开合法居住地到外地从事贸易或其他活动，不管其距离远近，每次都必须向殖民政府报告，申请特别旅行通行证。

西班牙殖民政府限制旅行及职业的政策，充分表现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歧视态度。186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殖民政府规定，居住在外省的外国人，如要离开居住地到外地旅行，不管距离远近，均需向马尼拉当局申请通行证。例如，住在怡朗的外国人如要外出，即使是到仅20英里外的内格罗斯岛，也必须得到在马尼拉的菲律宾总督签署的旅行通行证，怡朗省督无权签发这种证件。因此申请手续往往历时一两个月之久。在欧洲商人的强烈要求下，殖民政府下令对上述法令作某些修改，即把向马尼拉当局申请通行证的规定，改为把经总督签署的空白通行证发到各省，由各省督发放；但这项修改不适用于华侨，他们的申请手续仍按原来的规定办理。

一个合法的旅行通行证必须有政府的印戳和书记的签名，并交纳1比索的印花税。通行证上注明持证人的姓名、年龄、身分和

职业等。到马尼拉邻近省份的通行证有效期为30天，到吕宋岛内边远省份有效期为60天，到其他边远岛屿的期限为90天。1847—1848年颁布的法令把到某些省份的期限延长至12个月。通行证可以延期15天、30或60天，但要再付1比索的印花税。通行证还必须有所经地区的殖民长官的签证。证件期满必须上缴。华侨必须按通行证注明的旅行路线到指定的目的地；要是被发现到通行证没有注明的省份，初犯者罚款30比索，再犯者罚款50比索，第三次被发现者处以监禁。持过期通行证旅行的初犯者罚款5比索，再犯者20比索，第三次犯者取消今后的旅行资格。持不符合其纳税等级的人头税身分证者，按其所属等级的税额之两倍罚款^①。

为了进一步限制和监视华侨的活动，1887年殖民政府下令把马尼拉及各省划分为13个区，由华人甲必丹“任命”13名由殖民政府指定的区长（*mayor lieutenants*）管辖。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向政府报告有哪些华侨没有纳税，为殖民者充当耳目。华侨如果要到另一个区去，必须向所在区的区长以及欲前往的那个区的官员报告他们的旅行路线，并向途中停留地及目的地的官员出示通行证。

1888年7月29日，殖民政府再次重申了1886年1月8日颁布的禁止华侨在明达瑙居住和严禁与穆斯林贸易的法令。在法令颁布前的限定时期内已取得合法资格居住在该地的华侨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1891年1月27日又下令所有非法居住在明达瑙地区（包括和乐岛和巴拉望岛）的华侨必须在1891年5月以前离开该地。期限过后仍滞留者，一经查获，立即解往马尼拉，在那里驱逐出境。1888年法令规定来菲律宾的华人只能从马尼拉港入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53—54.

境。其他港口的殖民长官要是让华侨入境，将被罚款50比索。

上述的种种限制给华侨的经济活动设置了许多障碍。特别是通行证的期限太短，给华商在外省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加上殖民政府的官僚机构办事效率极低，往往贻误了贸易时机。这种通行证的发放也是西班牙人的一种生财之道，他们往往借华侨申领或延长通行证有效期限的机会进行敲榨。对于殖民政府来说，发放通行证所得的印花税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华侨领取一个通行证要花12比索。此外，当局还规定，只有那些付清其他税的华侨，才能申领通行证。因此，通行证发放制度还起着监督华侨纳税的作用，与其他税收制度是相辅而行的。

五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法律歧视

19世纪以前，西班牙殖民者一直把殖民地被征服的人民，看作是西班牙国王的奴仆。19世纪，西班牙国内实行君主立宪制，抛弃了把殖民地人民看作奴仆这一中世纪的传统观念，代之以“西班牙国民”的新概念。虽然这种变化对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但却提出了在西属殖民地的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在1800年以前，西班牙殖民地法律中并没有关于外国人在菲律宾居留的规定。在《印地法文件汇编》里也只有一个专门适用于华侨的部分——《常来》（De Los Sanglegs），因为在那时，华人几乎是菲岛唯一的外国人。“常来”（Sangleys）一词，常与异教徒（infidel）一词连用，表示在文化上对华人的蔑视。华人是被当作一个文化上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的。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鄙弃流寓海外的华侨，华侨在菲律宾的法律地位问题，并未引起争议。那时，实际上也没有确定国籍身分的必要。

从18世纪后期开始，华人被划分为暂住和定居两种，但这只是出于行政管理和征税需要而作的划分，并没有涉及他们的国籍身分问题。到19世纪，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菲律宾全面开放，越来越多的欧美人士到菲居住，殖民政府才制定了管理外国侨民的法律。于是，确定国籍身分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从19世纪20年代起，菲律宾殖民政府一直急于同中国签定商约，以谋求西班牙船只在中国港口的贸易特权。鸦片战争后，西班牙更急于取得列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为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西班牙不得不考虑其对菲律宾华侨的政策对西中缔约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另外，由于清政府对于海外华人态度的逐渐转变，西班牙也必须考虑到中国皇帝对其子民在菲的待遇可能作出的反应。因此，殖民政府从40年代到1864年中西商约签订的这段时间里，放宽了对中国船只在菲贸易的限制，对在菲华人的限制也有所放松，并在政府文件中不再用“常来”这个贬义词，而以中性的“中国人”（Chino）来称呼在菲的华人。这意味着，当局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华人是外国人，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西班牙人把华人看作是外国人，而不仅是一个文化上的少数民族。他们处理华人国籍身分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如果把华人划为外国人，那么华人就享有免税权；而殖民政府是不会甘愿放弃这一巨大财源的。它只让华人享有在菲外侨的某些权利和自由。1863年，殖民当局允许外国人享有财产继承权，1870年又扩大到动产继承权；华侨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1859年，当局宣布所有在菲的外国商人（包括华侨商人），都必须遵守西班牙商业法，服从西班牙法庭的裁决。但是，在政治、税收方面，华人的待遇还是跟以前一样，西班牙政府还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来对待。

从19世纪40年代起，殖民政府开始允许华人入籍，成为“西班牙国民”（实际上是西属殖民地公民）。入籍的条件是在菲定居多年，品行良好，并有六名殖民官员的推荐；受洗也是入籍的一个条件。其允许华人入籍的动机，同在19世纪末给华人授勋的动机一样，都是为了拉拢一部分华侨，特别是富有的和有名望的华侨，使他们忠于西班牙。华人要求入籍的动机，主要是希望入籍后，他们的财产能够得到保护。另一个原因可能与1892年颁行的一项法令有关。这项法令规定，要与菲律宾人或中菲混血儿结婚的华人，除了受洗之外，还必须加入西籍。它究竟有没有严格执行还不大清楚。由于入籍条件比较严格，能够入籍的华人不多。

殖民政府司法制度的黑暗与司法机构的腐败是举世皆知的。殖民政府的法庭根本不是申张正义的机构，而只是维护殖民统治和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的工具。在这样的司法制度下，华侨更是殖民者肆意凌辱和勒索的对象，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根据殖民政府的法律，如触犯同样的法律，华侨要被处以比其他人种居民更重的刑罚。如果案件涉及的双方是华侨和其他人种居民，华侨几乎总是被判有罪。“华人与土人争，无论曲直，罚充苦工；土人戕杀华人，不过监禁”。当局制定一些专门针对华侨的法律。把华侨上街不穿衬衫，没有清洗前院，把大车停放在公共场所，在大车上睡觉，以及在假日工作，都列为犯罪行为。当局还专门设立“华人法庭”，负责对他们认为犯有轻罪的华侨进行初步调查审理，然后递解西班牙法庭。但就连这些法律程序也往往被置之不理，“华人法庭”经常独自草率办案，华侨犯人被警官处死的并不罕见。

殖民当局的法官为了向华侨勒索钱财，往往不惜出动军警，以小事为借口，任意对华侨进行搜查、逮捕。警察惯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搜查为名，向华侨勒索，对付不起钱的就毒打一顿。

“官长徇私，巡差讹诈，暴敛横征”的例子，就是在现存的殖民政府档案里也屡见不鲜^①。

六 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华宣传

在整个19世纪，菲西政府虽然没有发布过大规模驱逐华侨的法令，但反华排华的动议时有出现。当局实际上纵容和支持反华舆论，并煽动反华情绪，离间菲律宾人民与华侨的传统友好关系。这已经成了殖民政府对华侨的既定政策。

1820年，在马尼拉发生了一起屠杀外侨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在西班牙殖民者的暗中煽动和支持下发生的。19世纪初，由于转口贸易的衰落，殖民政府不得不放松对外国人在菲从事贸易的限制。西方商人凭着雄厚的资本和在自由贸易中取得的丰富经验，很快就在菲对外贸易中占优势。西班牙商人无法与之竞争，对外商打破他们的垄断早就深感不满。殖民者中的保守派本来就反对开放菲岛，对外商更加敌视；虽然大势所趋，不可能再维持一统天下，但总希望滋生事端，发泄愤懑。1820年，马尼拉同时流行霍乱与天花。西班牙殖民者乘机散布谣言，把疫症的流行说成是由于外侨在河中放毒所致，以制造排外骚乱。当时一批法国生物学家刚好在菲搜集标本，从事研究工作。西班牙殖民者便嫁祸于人，制造法国人在巴石河放毒的谣言。当地平民百姓缺乏科学常识，便信以为真，一时群情激愤。10月9日和10日连续两天，数千市民携带长矛、短刀和棍棒等武器，集结于花园口广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56—57;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十九日记；《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四。

场（即比农多广场），然后分头挨户搜索、袭击和屠杀外侨。华侨也成为抢劫和屠杀的对象。两天内，惨遭杀害的华侨共计85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在事件中丧生的还有美、法侨民39人，英国水手11人，以及两名丹麦人。

这次暴乱是在殖民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发生的。当暴乱初起时，殖民政府完全不加干涉，后来才装模作样地派出殖民军维持治安。这些士兵到达现场后，看到闹事的市民已经逃散，竟然趁机肆意抢劫。暴民看到殖民政府的这种态度和殖民军队的所作所为，就更加肆无忌惮。到13日，菲总督见情况严重，怕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对西班牙不利，才下令平息暴乱。这次事件史称“花园口惨案”。虽然这个事件不是专门针对华侨而发的，但华侨的生命财产在此事件中损失最为惨重。

花园口惨案之后，为了利用华侨发展菲律宾的商业贸易，殖民政府的官员反华宣传曾一度沉寂。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又重新鼓噪起来。

1843年，西班牙官员西尼瓦尔多·马斯在考察菲律宾经济之后，向西班牙王室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限制中国移民，并把他们集中到种植园里工作。这是19世纪反华运动的序曲。从50年代起，西班牙殖民者掀起了反华宣传的新高潮。这些反华舆论主要针对华人对菲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同化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59年西班牙驻菲总督诺萨加拉伊在离任前夕所写的报告书。他围绕着所谓华侨问题大作文章，认为华侨并非总是有利于菲律宾商业的发展的。继任总督也持同一看法。在殖民政府的煽动支持下，一时谣言四起，反华气焰甚嚣尘上。在马尼拉的一些英国商行甚至接到了匿名信，信中扬言“几个月后，华人这个可恶的种族将要成为满怀敌意的土人的牺牲品”，劝告英国商行停止向华侨贷款并向华侨索债。这无疑是西班牙殖民者玩弄的把戏，

企图以此来要挟英国商行，使他们终止与华侨商人的贸易关系，以达到打击华侨商业的目的。但是西班牙殖民者这一阴谋没能得逞。

1886年，西班牙商人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排华运动，同时推行鼓励西班牙人移居菲律宾，特别是南部的羽达瑙和巴拉望的方案，以取代华侨商业。1886年6月，一些商人和企业主联名向西班牙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华侨提出种种非难，企图煽起反华浪潮。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如下：

在本文件签名的本地居民和来自各省的人士，出于极端的爱国热情和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国家财源的强烈愿望而大声疾呼……是为了使政府能够采纳一个打击华人势力极度扩张和抑制华人过度自由的保护性措施。华人势力的泛滥和他们享有的过分的自由，业已使他们得以对这块土地进行剥削。尽管华人这个种族一向被认为是勤勉的，而事实上却拒绝从事任何生产性劳动，如农业和其他体力劳动等。他们腐蚀和榨干了他们足迹所到的地方。他们总是以帐目欺骗政府，还顽固地坚持保留古怪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些习惯和生活方式顽固地抗拒与良好的行政管理、公共卫生以及警察有关的一切东西。随着我们的人口与习惯的急剧改变，在短短几年之内，这已经对我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①。

同一年，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报纸成了这次反华运动的主要宣传工具。几乎所有报纸都加入了反华合唱的行列。殖民政府的喉舌《西属大洋洲报》，更为反华运动提供“证据”，推波助澜，不遗余力。该报发表的文章攻击华侨是不可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认为华侨的大量涌入，势必会使他们在菲岛的势力坐大。华侨不可能同这个殖民地的生活融为一体，他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60—61.

们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法律，他们永远是一个与这块殖民地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文化实体。在经济上，他们控制和垄断了零售商业，把西班牙人排挤在外。为了保护经济利益，他们惯于行贿，因此，他们是政府官吏腐败的根源。他们的小宗派团体和秘密会社是对殖民地的一个威胁。他们榨取了这块殖民地的财富，并把赚得的钱汇回家乡，因此，他们对公共福利和商业的发展实无贡献可言。他们要求享有权利而又不尽一个殖民地臣民的任何义务^①。总之，这家报纸认为华侨对于这块殖民地有百弊而无一利。这家报纸的一些文章还要政府强迫华侨遵守1867年公布的西文簿记法。该报对华侨发泄的愤怒是历史上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移民问题的忧虑又重新恢复的信号。

西班牙人在这个时期煽起反华浪潮是有其经济原因的。这时华侨已经在各种向他们开放的行业，特别是在商业贸易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西班牙殖民者对他们的成就非常妒忌。殖民政府鼓励华人移民原先是为了获得农业劳动力，而现在华人却成了他们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西班牙殖民者既缺乏经商的才能和经验，又没有华侨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当然不是华侨商人的对手，因此只好以经济限制和煽动反华情绪来打击压抑华侨商业。

19世纪后期反华浪潮的兴起与这时出现的经济危机也有关。1834年马尼拉开港后，西班牙商人在自由贸易竞争中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英美商人绕过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限制，利用英美先进的航运业，控制菲律宾的大部分对外贸易，直接威胁着西班牙的殖民利益。在发达资本主义强国面前，西班牙无可奈何，于是便把怨恨发泄到华侨身上。1842年，西班牙政府派出经济专家西尼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61.

瓦尔多·马斯前往菲律宾考察经济。次年，马斯在所提出的报告中，把外国商人在菲取得的优势部分地归咎于华侨，建议对华侨进行严格的限制。西班牙殖民者还把1855—1861年和1876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归咎于华侨。1886年，始于1884年的经济不景气进一步恶化，西班牙殖民者于是把矛头指向华侨，反华言论又一次激烈起来。菲律宾的西班牙商人再次联名上书西班牙国王，要求对华侨进行限制。只是由于华侨花巨款向殖民政府和马德里的官员送礼，才平息了这一事件。总之，每当经济危机出现，西班牙殖民者就掀起反华运动，把华侨当作替罪羊。一位菲律宾史学家指出，这种现象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反犹运动如出一辙^①。

西班牙殖民政府煽动反华情绪，也有其政治目的。19世纪末，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为了转移菲律宾人民的斗争方向，殖民者经常在菲律宾人民中进行煽动挑拨，企图使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华侨，希望以此来挽救其殖民统治。但是西班牙殖民者的阴谋并没有得逞；相反，正是菲律宾人民与华侨的共同战斗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1898—1935*, P. 64.

第九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华侨经济 活动的恢复和发展

一 菲律宾经济状况的变化

18世纪，西班牙殖民政府在菲律宾实行的经济制度，主要是沿用殖民统治早期的经济制度。尽管西班牙国内朝代变迁，直到18世纪后期，这种经济制度没有发生过任何显著的变化。马尼拉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从中国和印度运来纺织品，再从马尼拉转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的转口贸易，从阿卡普尔科运回的多是亚洲沿海国际贸易主要流通媒介——墨西哥银元。因此，这条航线两端的贸易是有机地相互依存的。菲律宾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这种转口贸易，致使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死气沉沉。殖民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对亚洲商船征收的关税、对华侨征收的居留许可证费和墨西哥的补助金。

西班牙殖民政府从1778年起推行经济发展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殖民政府和皇家公司经营的出口经济作物的产量有了一定的增加，对外贸易有所发展。1810年，菲律宾对外贸易总额为140万比索（不包括转口贸易），其中出口额约为50万比索^①。1825

^①Encyclopedia of the Philippines, Vol. V, P.64.

年对外贸易总额为280万比索，其中出口额增加到100万比索^①。

这一时期，英、法、美等国已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为了替本国工业的发展寻求新的原料供应地和扩大产品销售市场，这些西方列强力图把亚洲的国际贸易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西班牙在马尼拉转口贸易的两大主要货源国——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尼拉转口贸易的传统货源受到严重影响。1736年以后，西班牙殖民政府又对中国帆船贸易加以限制，致使从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帆船大幅度减少^②。为了解决货源，维持转口贸易，王家公司对马尼拉贸易的限制不得不有所放松。1789年，王家公司宣布将马尼拉向所有亚洲商船和载运亚洲货物的西方商船开放三年。这样，马尼拉的转口贸易虽然得以维持，但西班牙对菲律宾商业贸易的垄断也因而被打破了。西方商人开始在马尼拉活动。同时，马尼拉在转口贸易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到19世纪初，这个有250年历史的殖民地贸易体系已走到了它的尽头^③。1815年，大帆船贸易由于墨西哥革命而终止，马尼拉在转口贸易中的作用也基本结束。随着转口贸易的衰落，海关税收急剧下降，1787年海关税收额为1 050万比索，1811年降至470万比索，而到1821年只有210万比

①Vicente B. Valdepenas, Jr. Gemelino M. Bautista,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P. 93, Table 42.

②田汝康：《17至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③W. E. Cheong, "Canton and Manil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 245.

索^①。为了维持财政费用，殖民政府开始允许西方商人在马尼拉经营菲律宾产品的出口业务，以增加出口贸易的收入。继1809年英国商行在马尼拉建立以后，欧洲商人接踵而至，纷纷在马尼拉设立商务办事处。转口贸易的迅速衰落和西方列强经济势力的渗入，迫使西班牙进一步放松对菲律宾商业贸易的垄断。1820年，殖民政府允许马尼拉与亚洲各港口贸易。这对，由于白银来源因美洲爆发革命而完全停止，菲律宾殖民政府的财政费用只能依赖出口本地产品来维持。但是，由殖民政府和王家公司经营的经济作物生产，因殖民政府征派沉重的贡赋和徭役，以及对产品的销售进行控制等许多原因，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19世纪20年代以后，王室和殖民政府已无力继续投资发展菲律宾的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只好听任外商投资种植业，经营农产品的出口。1834年，王家公司宣布破产。同年，马尼拉港正式对外开放。1855年以后，又陆续开放了其他一些港口，西班牙殖民政府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逐步解除。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丧失以及资本主义强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冲击，终于使西班牙放弃了传统的贸易垄断政策，而不得不依靠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农业原料来支撑殖民地的财政，以继续维持其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

马尼拉开港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期，菲律宾的商品性农业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对外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大（详见表1）。

①W.E. Cheong, "The Decline of Manila as the Spanish Entrepot in the Far East, 1785-1826: Its Impact of the Pattern of Southeast Asian Trad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II (No. 2, 1971), P.148.

菲律宾经济状况的这些变化，对这个时期华侨的经济活动有重要的影响。

表 1 1825—1895年的菲律宾对外贸易（单位：万比索）

年 代	出 口	入 口	合 计
1825	100	180	280
1835	280	310	590
1845	300	390	690
1855	590	480	1 070
1865	1 050	890	1 940
1875	1 890	1 220	3 110
1885	2 450	1 920	4 370
1895	3 660	2 540	6 200

资料来源：Valdepenas,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P.93 Table 42.

二 华侨经济活动的恢复

1778年，殖民政府撤销了驱逐令以后，华侨又逐渐回到了马尼拉地区，重新恢复他们的传统行业。殖民政府曾经颁布各种法令，企图把华侨的经济活动限制在农业方面，为其种植指定的出口经济作物。但是华侨并不甘于被限制在农业生产领域里，接受殖民者的奴役和强制性的剥削。为了能够继续从商，他们顺应西班牙殖民官吏的敲榨勒索要求，馈之以财物。这是华侨为求得生存被迫采取的一种自卫方式。殖民官吏私下也希望华侨从事较为

有利可图的行业，以便于对华侨进行勒索，中饱私囊^①。此外，一些殖民者从早期残酷迫害华侨的反面经验中也清楚地意识到，华侨的商业活动对这块殖民地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当局所颁布的限制华侨从事商业的法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相当大部分的华侨仍继续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就在驱逐令撤销的第二年，即1779年，仅在烟草业里，已经有21名华侨烟草商重新开业^②。菲律宾学者阿伦斯梅耶尔认为，在18世纪末，华侨已经支配着局部的贸易行业^③。当时旅菲的法国医生吉罗尼尔指出，在1820年，华侨已经在帕利安之外获得了稳固的商业地位^④。1828年，殖民政府对华侨开征行业税，这实际上是对华侨商业的默许。这些材料表明，到19世纪20年代，华侨已经冲破了西班牙殖民者的限制，基本上恢复了他们的传统商业贸易。

由于这个时期菲律宾经济状况的变化，华侨的经济活动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前一时期，华侨主要从事沿海贸易、城镇零售商业、手工业以及进口和销售中国货物，他们的活动大都被限制在

①关于这点，美国学者海登有如下的评述：“处于被攻击地位的华侨社会，为求得生存，势必产生出一种防卫的技能，这就是金钱的有效运用。很多西班牙官吏把这种贿赂当作收入的来源，这已成为殖民政权默认为的制度。尽管职员们薪俸微薄，却大发其财。华侨弥补了他们一大部分收入，无怪华侨始终不曾被赶出这块殖民地。”见 J·R·Hayde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P.694.

②Ed. C·de Jesus, *The Tobacco Monopoly in the Philippines*, P.27.

③Elliott C·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85.

④Ibid, P.88.

西班牙殖民统治中心的附近区域、西班牙人聚居村落周围。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华侨在恢复其在商业和手工业中的地位以后，又在新出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华侨的经济活动已遍及全菲，无论在范围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前一时期。除了马尼拉以外，南方的和乐也成为华侨的重要活动中心。华侨人口的扩散是与经济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动相适应的。与上一阶段比较，华侨的经济活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阶段华侨最重要的行业是中介商业。他们已经在进出口贸易中形成了一个遍布全菲的收购销售网。他们不仅继续是主要的零售商，而且成为最重要的批发商。一些华侨还建立了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工厂，出现了早期的华侨资本。在菲律宾的经济生活中，华侨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大的作用。

三 华侨与中菲贸易

19世纪，菲律宾的对外贸易主要与西班牙、英国、英属印度、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菲律宾华侨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与中菲贸易相联系。

从18世纪末起，传统的中菲贸易开始转变。在此之前，中菲贸易是依靠中国帆船进行的。随船到菲律宾的华商，通常直接出售运来的货物，并收购菲律宾土产运回中国，很少通过西班牙商人或华侨商人代理经营。有时一艘中国帆船就有40—50名商人随船到菲贸易。他们亲自押运货物，自己直接出售。为了便于对这种贸易进行管理，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殖民政府在马尼拉的圣费尔南多专门设立了一个生丝市场，让中国商人住在这里，直到卖完运来的货物，购足运回中国的货物为止。18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商船开始介入中菲贸易，由中国帆船

进行的这种贸易逐渐被取代。在17世纪，每年到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达20—30艘，有时多达四五十艘；而在1795年，仅有六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①。1797——1812年，平均每年八艘^②，到1818年也只有十艘^③。为了鼓励中国帆船到菲贸易，1832年殖民政府下令免除中国商船进港的烦琐手续和杂税，1834、1837、1843年又多次下令重申这一法令。但是，由于这时大量西方商船介入中菲航运贸易，中国帆船已被逐渐排斥淘汰。1839年，到菲贸易的154艘商船中只有四艘中国船；1840年，187艘中只有四艘；到1849（或1850）年，到达马尼拉的中国船也只有四艘^④。

在1820年以前，菲律宾输往中国的土产占全部出口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主要产品有燕窝、海参、黄蜡、龟甲、贝壳、虾米和鱼翅等。其中仅燕窝的价值就比菲律宾输出的糖、蓝靛、麻、绳索、咖啡和大米合计的总值大得多。1825年，中国仍然是菲律宾土产的主要市场，输往中国的主要有大米、蓝靛、燕窝、龟甲等。19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菲律宾产品的主要市场从中国转向英国和美国。尽管如此，到1843年，输往中国的产品仍占马尼拉出口额的1/3^⑤。1846年，输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少于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在菲律宾出口贸易中居

①James F. Warren, "Sino-Sulu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hilippine Studies*, Vol. 25 (No.1, 1977), P.54 note.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21.

③BR, Vol. 51, P. 153.

④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83 note.

⑤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254.

第二位，输入的中国商品总值在进口贸易中仍占第一位^①。输往中国的产品按出口值的大小顺序为：大米、金沙、硬币、海参、烟草、苏方（可用于提取红色染料的木材，又叫苏木）、棉花、家具木料、马尼拉麻、土布（pina，一种菠萝纤维布）、燕窝、水牛角、咸鱼，以及少量的液体蓝靛和龟甲。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按进口值大小的顺序为：丝绸和生丝、硬币、亚麻、纸张、油蜡、纸伞、瓷器、食品、家具、铁，还有少量的玻璃制品、珠宝首饰和茶叶等。其中绸匹、油蜡、食品、纸张等中国产品年进口额在30万比索以内。这些进口货物一部分在华侨社会内销售，大部分供菲律宾人民消费。其中作为当地纺织业原料的生丝，仅怡朗省每年进口的数量就值40万比索。纸伞在菲律宾广泛使用，玻璃器皿、珠宝首饰、亚麻、金属器具、家具、瓷器等中国产品从16世纪起就一直是进口的传统中国货物。马尼拉食品相当一大部分也是从中国进口的。进口纸张一大部分用于马尼拉的烟厂生产卷烟。

这个时期的中菲贸易虽然很少中国帆船参与航运，但在中菲两地都是由中国人经营的；在中国是香港、澳门和厦门的中国商人，在菲律宾是马尼拉的华侨商人。只有向中国出口大米的贸易例外，它是由西方商人经营的^②。

18世纪末，粤闽一带产米不敷日食，尤其是粤东滨海地区，“耕三渔七，幅员辽阔，民食不敷，岁仰广西桂、柳、梧、浔诸府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65.

②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载：“夷船载米来粤，其米多产自小吕宋，……兴贩亦只港脚（孟买，此处泛指英东印度公司）花旗（美国）诸国。”“凡装米来粤之各国夷船，均系各由本国驶船前往小吕宋等处买米装载来粤”。

之接济。设遇粤西年荒，诸郡闭籴，则粤东米价翔贵，小民粒食维艰。”^①而菲律宾“其地宜稻米，贱时石值三四钱，即昂贵亦不过一两。遇风便，十日可至澳门。”^②从1795年（乾隆六十年）起，清政府又下令重新恢复从菲律宾进口大米。“嘉庆十一年（1806），小吕宋（马尼拉）及噶咭喇（英国）之孟雅利（孟加拉）皆运米进口”^③。但因粤海关“止于免钞，飭令空船出口。由是夷商无利，来米顿稀。”^④为维持大米进口，清政府于道光四年（1824）下令免米船之税，“各国夷船专运洋米来粤，免其文输船钞，所运米谷，起贮洋行棧买，原船载出口，一体征收税课。”这一招果然奏效，“一时黄埔、澳门岁增米十余万石”^⑤。

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向中国出口大米的贸易相当兴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西班牙参与对华贸易的商船从1830年的三四艘增加到30多艘^⑥。1856年，参与中菲贸易的西班牙船只有44艘之多，其中到厦门贸易的有13艘，到香港的有16艘，到上海的有3艘，到澳门的有6艘，到黄埔的有2艘^⑦。大米成为这个时期菲律宾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菲律宾在中菲贸易中首次出现顺差。以前，菲律宾总是以流出银元来弥补逆差；而这时却相反，

①萧令裕：《粤东市舶论》。

②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

③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

④萧令裕：《粤东市舶论》。

⑤萧令裕：《粤东市舶论》。

⑥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83-84.

⑦Warren, *Sino-Sulu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67

中国硬币流入菲律宾，以弥补贸易差额。虽然大米贸易是由西方商人经营，由西方商船运输的，但这种贸易也离不开两地华人的协助。在澳门等中国港口，他们要依靠华商采购返航的货物；在马尼拉，他们把运回的中国商品交给华侨进口商寄售，30天后收回货款和所得的利润。出口的大米绝大部分是从邦加斯南的苏阿尔和马尼拉这两个港口运出的。苏阿尔是最重要的大米出口港，当时有“米港”之称。大米入口口岸除了广东的澳门和黄埔外，还有福建的厦门。

19世纪下半期，英国商品大量输入菲律宾，中国在菲律宾进口贸易中下降到第二位（详见表2）。

表2 1856—1894年各国在菲律宾进口贸易中所占百分比

年份	英国	中国	西班牙	美国
1856—1858	42	35	7	3
1860—1864	47	34	8	2
1865—1867	52	35	4	1
1873—1874	88	4	4	
1875—1879	82*	7	5	1
1880—1884	81*	3	5	4
1885—1889	60*	12	8	2
1890—1894	30*	19	19	3

资料来源：Valdepenas,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P.104 Table 4.7.

* 包括英属印度。

在菲律宾的出口贸易中，中国下降到第三位。1855年—1885年中菲贸易的情况详见表3。

表 3 1855—1885年的中菲贸易 (单位: 比索)

年份	从中国 输入额	占菲进口 总额%	对中国 输出额	占菲出口 总额%	中菲贸 易总额	占菲外贸 总额%
1855					2 198 187	20.54
1875	456 965	3.74	41 856	0.22	498 821	1.60
1880	768 005		39 563		807 568	
1885	485 189	1.98	66 339	0.27	551 528	1.26

资料来源: 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57的《1855—1885年中菲贸易统计表》及 Valdepenas,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P. 93的《1825—1895年菲律宾对外贸易统计表》。

19世纪后半期的中菲贸易与前一时期比较, 贸易的方式和商品都有所不同。到1870年, 中国至马尼拉的帆船贸易已经完全停止了。从1850年到1880年, 中菲贸易大部分是由往返于马尼拉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西班牙船只进行的。1880年以后, 英国的轮船取代了西班牙商船的地位, 几乎完全垄断了中菲航运业。19世纪下半期, 对华出口的某些商品有所增加, 如燕窝、海参等出口略有上升。除了输出燕窝、海参、龟甲、硫磺、乌木、水牛角等土产之外, 从80年代起, 菲律宾也向中国输出马尼拉麻、咖啡、糖、烟草、雪茄等产品, 这些产品在上海销路特别好。但总的来说, 中菲贸易衰落了。

由于菲律宾对外贸易发生了这些变化, 华侨除了继续从事中菲贸易外,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不得不转而从事中介商业活动。

在中菲贸易中, 除了上述马尼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外, 苏禄与厦门也直接通商。苏禄华侨在这种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

苏禄群岛在19世纪下半叶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之前，是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商品集散中心。18世纪末，苏禄发展了它与印度、东南亚各海岛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也加强了远距离的掠夺。从1768年起，苏禄苏丹国在苏禄地区的地位迅速上升。和乐岛成为苏禄群岛对中国贸易的中心。到1800年，地区性的集散已成为苏禄苏丹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

从1760年到1840年，到苏禄贸易的中国帆船载量一般都比以前大。据估计，在1761年后的半个世纪里，通常每年都有一至四艘200—465吨的中国货船到苏禄贸易。1830年，有两艘满载800吨货物的厦门帆船到苏禄贸易，在参与中国—苏禄贸易的中国帆船中，这是最大的船只。这个时期的厦门—苏禄贸易都是由中国船只进行的。输往苏禄的主要商品有陶器、瓷砖、丝、缎子服装、布匹、铜器、熟铁、烟花、茶叶、药材、干果、大米、食油、糖以及武器和军需品等等。其中以陶器和粗纺织品为大宗。一艘大的中国帆船所载货物的价值可达5万到10万比索。运回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苏禄产的珍珠、珍珠母、玳瑁、海藻；婆罗洲东岸产的燕窝、蜂蜡、樟脑；巴西兰、明达瑙的胡椒、丁香、槟榔、木材等。返航的船只一般装载价值6—8万西班牙元的货物^①。苏禄苏丹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进口税并不是根据货物的价值和种类，而是由苏丹或达图与中国船长或商人谈判决定，关税的高低取决于不同的达图对交易的兴趣、市场的行情以及其他竞争者——欧洲商人的诡计对达图所起的作用，最高的达进口货物价值的1/10。1814年，两艘各装有5万和10万西班牙元货物的中国帆船，分别以4 500和5 000墨西哥元完税。除了交纳进口税外，华商还得向苏

①Warren, *Sino-Sulu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P. 54-55.

丹和达图送礼。据当时一位欧洲商人的记载，“尽管没有固定的关税，但华商被抽取和用于送礼所付出的货物往往占了货物总额的一半以上。”^①

与达图交易后，华商将部分货物赊销给当地的华侨，后者则以为中国船只收集土产来偿付货款。华侨还为中国船只预订货物、船上用品，租用出售商品的场地等。华侨在各地零售商品。附近岛屿以及婆罗洲东岸的居民也到和乐岛购买中国进口货物。这个时期的厦门—苏禄贸易相当兴旺。1814年，一位英国海军军官从和乐华侨首领那里得知，中国—苏禄平均每年贸易额为15万西班牙元。19世纪的头30年，交易商品量达到顶峰，每年至少有1.2万—2.5万担（Picul）^②。考古调查也发现，苏禄地区出土的19世纪的中国外销瓷碎片，比18世纪的多得多。这证明了这个时期中国与苏禄贸易的迅速发展。1840年以后，由于马尼拉华侨商人和欧洲商人在和乐贸易活动的增加，马尼拉—苏禄贸易的发展，以及西班牙军舰在苏禄海上的频繁出现威胁到中国商船的安全等原因，来自厦门的中国帆船才逐渐减少。苏禄的对外贸易便主要转向新加坡。

繁荣的苏禄—厦门贸易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到和乐定居。据粗略的统计，从1776—1800年，随中国船到和乐的华人大概有1.8万人，他们大部分随船返回中国，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留居在苏禄群岛。他们大多数是福建沿海的贫民。另外，18世纪中叶被驱逐的马尼拉地区华侨有不少人逃到和乐岛。1758年逃到和乐的华侨就有4 000人^③。1778年，驱逐法令撤销后，他们大部分返

①Warren, Sino-Sulu Trade, PP. 52—53.

②Warren, Sino-Sulu Trade, P. 56.

③BR, Vol.50, P.44.

回马尼拉，但也有一部分留在和乐定居。这样，从18世纪后期开始，和乐就成为旅菲华侨的第二大聚居地和经济活动中心。据一位葡萄牙船长的记载，1803年，在和乐镇定居的华侨有1200名。那里另一位欧洲人估计，1814年和乐镇有1000名华侨，约占全镇人口的12%^①。和乐华侨的人数约占全菲华侨人口的1/7。为了便于开展商业活动，一些华侨还与当地人通婚，信奉伊斯兰教。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和乐进出口商品的销售主要由苏禄贵族经营，但华侨在零售商业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作为中介商和商务委托人，在和乐大贵族和苏禄地区的各村社之间进行商业活动。他们还经营小商店，零售进口产品，收购当地土产。他们从事的其他主要职业有工匠、劳工、佣人等，这些职业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和乐华侨贫困的经济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

四 菲欧贸易中的华侨中介商业活动

马尼拉开港后，特别是1850年以后，菲欧贸易迅速发展。英国棉纺织品大量输入菲律宾。1840年，英国棉纺织品已占菲律宾进口商品的30—40%。中国的手工业品无法与欧洲工业品竞争。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英国棉纺织品一直居菲律宾进口商品的首位。菲律宾对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大米，则由于菲律宾大米短缺，在1870年后完全停止出口。随着中菲贸易的衰落和菲欧贸易的迅速发展，华侨不得不从主要经营中菲贸易而转向主要经营英国进口商品和收购出口经济作物。每年由华商经销的洋布从550万比索到700万比索不等。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迫

^①Warren, Sino-Sulu Trade, P.68.

切需要发展中介商业活动。为了鼓励华侨从事这个行业，殖民政府从30年代起逐渐放宽了对中国人入境和在菲律宾国内流动的限制。1863年，殖民政府允许华侨拥有土地，1870年又允许华侨拥有船只和其他动产^①。

这个时期，华侨的人口地域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华侨绝大多数住在马尼拉地区。例如，1828年，全菲华侨5 708人，5 279人（93%）住在马尼拉地区；1849年，全菲华侨8757人，8 064人（92%）住在这一地区。1850年，西班牙王室发布法令，允许华侨移居外省。1862年，华侨又获准在全菲各省居住^②。从此，马尼拉地区华侨所占比例开始大幅度下降，1873年，马尼拉地区的华侨降到仅占全菲华侨的50%；1894年，再降到只占48%。其余的散布在全菲各地，特别是经济作物产地。1891年官方税收记录显示，全菲华侨的12—15%分布在阿尔拜、莱特、萨马、宿务和南卡马林内斯等麻产区；1881年，有4%的华侨住在西内格罗斯和怡朗等蔗糖产区。在卡加扬和伊萨贝拉的烟草产区，共有华侨1 600人^③。在明达瑙内地和苏禄群岛也有为数不少的华侨。

1844年西班牙王室发布的取消各省省督商务特许权的法令可能对华侨向菲律宾内地扩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和西班牙国内的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产生了大量无业西班牙人，他们想到西班牙残存的海外殖民地去碰碰运气。为了给这些人以新的机会，1844年，西班牙发布法令，取消菲律宾殖民地各省省

①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Valdepenas,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P.102.

②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90.

③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 62-63.

督参与贸易的特权，希望这一措施能促进内地贸易的发展，使新来的西班牙移民有机会参与这一贸易^①。可是事与愿违，这项法令未能使西班牙人垄断内地贸易，却为华侨在内地进行贸易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侨人口的扩散是与经济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动相适应的。对外贸易中的中介商业是这个时期华侨从事的主要行业，他们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形成了遍布全菲的收购和销售网。不仅继续从事传统的零售商业，而且也经营批发商业。

在1840年以前，外国商行全部建立在马尼拉。菲律宾出口的经济作物大部分依靠外省拥有船只的菲律宾商人或中菲混血儿商人运往马尼拉出售，而不是由马尼拉的商人到外省收购和运输的。在40年代，随着经济作物出口的进一步扩大，迫切需要有一个以马尼拉为中心（当时马尼拉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贸易活动能够深入全菲各地的批发商业网。欧洲商人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贸易系统，因为他们对内地的商务不熟悉，而且在马尼拉开港后，殖民政府对欧美商人在菲律宾进行贸易活动的限制仍然非常严格。1840年，菲律宾总督发布命令，重申1828年法令中关于禁止外国商人从事零售商业和到外省从事贸易活动的禁令。1844年，西班牙王室再次发布法令，禁止外国人以任何理由到外省活动，并规定外国人未经殖民政府许可，不得进入马尼拉六公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53, 46.

西班牙法律禁止殖民地官员参与商业。但殖民官吏（主要是各省省督）可通过预付罚金的办法，获得参与商业的特权，即商务特许权。他们常常利用这一特权滥事征购，控制和操纵地方市场，排挤地方商人。关于官吏兼营商业，中国史籍《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吕宋备考》也有记载。

里以外的任何地方^①。直至1857年，仍然重申对外国人的上述禁令^②。但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和发展外省的农业生产，殖民政府对华侨的限制又不得不有所放宽。1839年颁布的法令允许华侨完全自由地选择合适的职业和居住地点；得到总督或各省省督批准的华侨，可以居住在外省和从一省迁往另一省；马尼拉的华侨可以到外省从事贸易，期限为三个月，条件是在通行证的有效期间，必须按1828年颁布的行业税规定的第一等级税额每月纳税^③。华侨商人抓住这一时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贸易系统，迅速发展中介商业。当时一位在马尼拉的欧洲进口商说：

在这里的商行，除了极少数外，都只能在马尼拉把进口商品卖给华人商人。他们是各省商业的中间人……因为这里的进口商和出口商自己根本无法开展这种业务。这个群岛的贸易完全依靠华侨来进行，因为他们可以向外省的华商销售进口的产品，华侨还自己经营运输业务。华侨小商贩到处可见，他们可以到最偏僻的角落去出售商品……而欧洲人甚至不能片刻离开马尼拉到外地去开展业务^④。

为了发展进出口贸易，欧美商人向华商提供贷款，以支持他们开展销售进口商品和收购出口经济作物的业务。殖民政府的档

①Nicholas P. Cushner, *Spain in the Philippines* (Quezon, 1971), P. 199.

②Feodor Jagor, *Travels in the Philippines*, Austin Craig, ed., *The Former Philippines thru Foreign Eyes* (New York, 1917), P.17.

③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52.

④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Vol.2, PP.227-229. 转引自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68.

案资料说明，在1850年以前，华侨已可以从“华人社区基金”中，以6%的利率借贷。如一个叫林森哥（音译）的华侨，在1835年就曾以上述利率借贷2 000比索，两年内归还本息。但社区基金不是华侨借贷的主要来源。在18世纪中后期，有些西班牙人向华侨商人提供资金，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并没有形成专门的借贷组织或制度。在19世纪以前，菲律宾还没有银行，大宗商业投资的贷款来源主要是“慈善基金”；但这种基金不向华侨提供贷款。只有西方商人愿意向华侨商人提供商业贷款。银行业在菲律宾兴起后，西方商行经常充当华侨向银行借款的担保人，负责转交归还的借款，一旦华侨无力偿还债务，他们得承担还债的责任。在实践上，对于专门从事零售进口商品的华侨商人来说，以赊欠方式获得货物比得到贷款更为重要。因此，西方商行通常赊给华侨商人一定数量的进口商品，一般期限为三到六个月。华侨商人往往在到期之前就先偿还一部分贷款，然后再赊得更大数量的商品，如此不断反复。因此，在这种业务中，华侨商人总是处于负债的地位。据估计，华侨商人所欠的这种债务，一年总数约达2 140 000比索。有些华侨商人每月赊得的货物达1—1.5万元（dollars），期限从三四个月到六个月不等^①。这种赊贷方式，对华侨中介商和西方商人都是有利的。华侨商人总是处于负债地位。债权人为了使他们能够清还债务，便源源向他们提供资金或货物。华侨商人因此得以维持并发展自己的业务。而对西方商人来说，这是他们与华侨中介商保持长期业务关系的唯一方法。借这一方法，他们的进口业务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只要华侨商人的延期付款期限不超过合理的限度，西方商人还是乐于向他们继续提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 69-70, 70 note 14.

供商品或资金的。19世纪50—80年代，这种赊贷制度一直相当正常实行着；但到了80年代，由于西方商人在菲律宾的贸易中已经站稳了脚跟，西班牙对西方商人在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也放宽了，西方商人在赊贷方面，便开始采取严峻的措施，不少华侨商人因而遭到破产。

在中介商业中，华侨建立了遍布全菲的商业贸易网——头客系统。这是华侨在中介商业中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个系统是以在马尼拉的头客（专门经营西方进口商品和出口土产的华侨大批发商）为中心形成的。头客在外省设有代理商和商店，为其推销进口商品，同时为其收购出口产品，运往马尼拉，由头客出售给西方商行。这个商业贸易网几乎渗入到菲律宾群岛的每一个角落。马尼拉头客在外省的代理商相当多，有的省有300多人。1859年，仅在怡朗的莫罗镇就有30名与马尼拉的头客有商业关系的代理商或合伙人^①。

头客通常向外省的代理商提供短期贷款。在马尼拉地区，头客把进口商品赊给华侨商店，由他们零售，每周结算一次。头客与代理商的关系往往是秘密的。在华侨社会内，代理商以头客的名义经营，在殖民政府注册时则用代理商自己的名字。这种商业关系不仅有利于销售和收购业务，而且在纳税方面对头客也是有利的。1852年实行的商店税是以营业铺面为基础来征收的。凡是设有店铺的商人或工匠都要交纳商店税；没有开设商店的批发商可以免纳此税。头客一般自己不开设店铺，只是向代理商提供进口商品，因此他们都免纳商店税。这种商业关系对代理商也有莫大的好处。因为他们一般既无本钱，又无法获得贷款；而头客不但通过提供贷款和稳定的货源，使他们能够自己开业，而且保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76 note.

证他们收购的农产品销路的畅通。

这个商业网也为消费者和农产品生产者提供了方便。以前在边远地区只有每周一至两次的定期集市。华侨商业网形成后,华侨的菜仔店 (*tienda de sari-sari*) 遍布全菲, 这些菜仔天天营业, 不仅出售进口货物 (主要是英国廉价棉织品), 还经营食品杂货, 如椰子油、肥皂、绳索、蜡烛、针线、纽扣、包装纸、槟榔、雪茄、烟草等等。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几乎都可以在菜仔店买到。菜仔店还向农民提供贷款, 进行易货交易, 收购农产品。通过这些菜仔店, 华侨的商业贸易网深入到偏僻的地区, 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为了增强与西方进出口商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 从而达到控制价格的目的, 早在19世纪40年代, 马尼拉地区的一些经营纺织品的华侨大进出口批发商已经结成了联盟, 这个联盟一直维持到80年代。每当进口纺织品到港, 他们便联合起来, 成批买进, 再在他们中间分配, 然后再分配给在马尼拉的一些中等的华侨商人以及在各省会如宿务、怡朗等地的代理商, 由他们批发给各地华侨商店出售。为了避免在华侨商人之间发生竞争, 他们以统一的价格出售。这个联盟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 保证所有经营进口棉纺织品的华侨批发商都能分配到进口货物, 特别是那些与外国商行没有业务关系的中小商人。这种联盟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固定组织, 只是在要买进和分配进口商品时才召集起来, 共同协商, 开展业务,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临时性的公司。

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 马尼拉以外的一些港口也陆续开放^①。头客的商业贸易网也相应地起了一些变化。以前头客都是

^①西班牙王室于1855年批准开放邦加斯南省的苏阿尔, 以及怡朗、三宝颜三个港口; 1860年又开放宿务港; 1873年开放阿尔拜省的列加斯比港、莱特省的塔克洛班港。

驻在马尼拉的，而在其他港口开放后，一些头客直接驻在宿务和怡朗等开放港口。例如在宿务，一名叫卢西奥·埃雷拉·黄马扬的头客雇用了45个代理商在宿务市和宿务省的其他社区开展商业活动。他们在怡朗和宿务经营的主要是出口贸易，输出宿务出产的麻、糖和怡朗的糖、土布和苏方等土产。进口贸易，特别是棉纺织品的进口业务，仍然主要由在马尼拉的头客来进行。在60年代，估计全菲出口产品的批发业务，有一半以上是由华侨商人经营的^①。

头客体系并不是一个具有严密制度和周密计划、包罗全菲华侨商业贸易的组织，它只是以在马尼拉、宿务和怡朗的头客为中心，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华侨批发商并非全都同时经营进口商品和收购出口农产品，有的只从事其中一种业务。在外省的华侨代理商，也并非都是头客的雇员，有的是头客的合伙人；在马尼拉的华侨商人提供资本，在外省的合伙人负责实际业务，合伙经营。在外省的一些华侨商人与马尼拉、宿务或怡朗头客的代理商并无直接的业务关系。他们在本地的城镇独自经营商店，并在邻近地区设分店。在马尼拉，也有一些华侨商人直接与外国商行交易，并不通过头客的商业网。有些外国商行也在外省建立仓库，直接经营出口业务。但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还是头客商业网。

华侨能够在中介商业里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省督从事内地贸易特权的废除，对旅行和居住限制的放宽，西方商人提供的贷款和头客商业贸易体系所起的作用外，还因为华侨长期与菲律宾人民共同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需要，同情他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77
note.

们的疾苦，做生意总是耐心有礼，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西班牙商人则以统治者自居，盛气凌人，菲律宾人大都不愿意与他们打交道。对当时菲律宾农民向西班牙人出售蓝靛的情形，一位教士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出售产品的土人被领到办公室。里面的欧洲商人板起脸孔，勉强地对他们打个招呼，然后摆出行家的架势，检查那些农民朴实的劳动成果。翻过几遍后，要么当即拒绝收购，要么就拿到化验室里检验一番。有时，如果他认为产品看起来还可以，又碰巧他的心情也不错，产品就被收购下来了。但是那些可怜的土人在从出纳员那里领到一笔微薄的收入之前，还得被那帮职员奚落责难一番^①。

菲律宾农民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侮辱，他们宁愿跟华侨商人交易，从华侨那里他们不仅可以直接换到他们所需要的用品，还可以得到贷款。因此，华侨商人很受菲律宾农民的欢迎。这也是华侨在中介商业中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 华侨在菲律宾南部地区的贸易活动

在中介商业中，马尼拉华侨商人除了利用头客商业网开展进出口产品的销售和收购业务外，还直接从事马尼拉—比萨扬和马尼拉—苏禄的贸易。马尼拉与苏禄的贸易绝大部分是由马尼拉华侨进行的。1838年的一份商业报告提到：“直到现在，（几乎）没有西班牙商人直接与苏禄居民通商，这种贸易都是由华侨进行的”^②。

①de la Costa, Readings in Philippine History, P. 119.

②Najeeb M. Saleeby, The History of Sulu, P. 219.

马尼拉华侨在马尼拉—苏禄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是由下述原因促成的。

从16世纪下半叶起，西班牙殖民者对苏禄和明达瑙进行了近300年的侵略战争。在这期间，交战双方都不可能直接通商。西班牙殖民区内的菲律宾人因宗教原因，也不便到苏禄贸易。在苏禄地区进行贸易，需要与当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与当地的统治者打交道，更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在马尼拉的商人，需要丰富的经验，对苏禄的商情要了如指掌，才能为苏禄搜集各种适合时宜的货物。马尼拉华侨早就从事马尼拉—苏禄贸易，并有苏禄华侨的协助，具备了上述条件，自然就成为两地贸易的媒介。1787年以后，每年都有商船定期前往苏禄贸易。1796—1803年，西班牙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慑于英国海军以及海盗的袭击，西班牙船只更不敢在南方航行。因此，马尼拉与南方的贸易只能依靠华侨进行。1798年以后，华侨从事的马尼拉—苏禄贸易进一步发展。1798年，有四艘华侨商船到和乐贸易。

华侨商船在3—4月间离开马尼拉，途经安蒂克、怡朗和比萨扬群岛的其他省份，以便采购运往苏禄的大米、烟草、椰油、糖等货物，又在帕奈卸下从马尼拉运来的丝，装上在当地收购的土产继续航行，最后到达苏禄群岛进行贸易。大部分的贸易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马尼拉商船约在9月或10月返航，运回的货物一部分在马尼拉出售，大部分供转口到新加坡、中国、巴达维亚和欧洲各国。

马尼拉商船运载的货物，一般为几个人所有，船主、华人船长、船上商务负责人和其他商人，都占有一定的份额。1811年，驶往和乐的双桅船圣路易斯号，载有四个商人的货物，共值8 000比索。其中两名华侨商人的货物共值3 373比索。1812年，圣何塞夫号载有八个人的货物，共值14 030比索；其中六名华侨的货物共值

13 804比索。马尼拉的华商通常一年中有几条船运货到和乐贸易。

在这种贸易中，如果船舶和货物遭受损失，船长没有责任，但要由他支付航行的日常费用。与苏禄苏丹谈判关税，还得支付其他费用，以满足当地达图的贪婪要求。这些达图还往往拖欠或拒不偿还华商预付给他们的货款。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贸易，必须要有巨大的耐心和高超的经营手段。

在马尼拉—苏禄贸易中，船主或船长通常将部分卖剩的存货托付给和乐的华侨代理商，由他们通过小贩在当地以及边远地区、海岛出售。

运往和乐的货物种类繁多，有印度的棉织品和鸦片，欧洲的陶器、水晶、金属工具和铁，菲律宾北部和中部的的大米、食糖、面包干、盐、蓝靛和各种小手工艺品，以及中国的粗陶器、蚕丝等等，其中以大米和食糖为大宗。据统计，从1786—1830年，从马尼拉开出的134艘商船中有68艘开往苏禄，其中有52艘装载大米和食糖。输往苏禄的这两种货物的总值，有时一年就达2—3万比索。可见华侨从事的马尼拉—苏禄贸易，对苏禄人民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从苏禄运回的货物有海参、鱼翅、珍珠贝、蜂蜡、燕窝、中国瓷器、孟加拉纺织品以及其它欧洲产品，其中以燕窝和海参为大宗。1805—1830年，从苏禄开往马尼拉的67艘商船中，有49艘载有燕窝，其中最多一艘就装有100担；48艘载有海参，最多的一艘装有50吨^①。这两种土产大部分从马尼拉输往中国。

参与马尼拉—苏禄贸易的船只和资金绝大部分是由西班牙船主提供的，出租的船只约200—250吨，每月租金600—700比索，

^①Warren, Sino-Sulu Trade, PP.65-66.

船主通常还提供1 000—2 000比索的贷款，利率约为20—30%。在这种贸易中，西班牙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仍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只要向华侨出租船只和提供贷款，如果航行顺利，就可坐享其成，所获纯利通常可达投资额的15—20倍^①。西班牙人获利丰厚，且自身又无须冒旅途的艰辛和生命危险，所以都乐意支持华侨进行这种贸易。另外，从苏禄运回的土产，相当大部分是供马尼拉转运广州和澳门的。18世纪后期，中国只允许葡西两国到澳门贸易，这种专利也刺激殖民当局支持华侨发展马尼拉—苏禄贸易。因此，在19世纪前期，这种贸易相当繁荣，据1836年马尼拉华商估计，他们每年与和乐的贸易总额达30万比索^②。

马尼拉华侨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马尼拉—苏禄贸易，保证了苏禄人民生活的需要，维持和加强了菲律宾群岛内部的经济交流，对于这个阶段菲律宾经济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世纪下半期，苏禄地区的华侨在对外贸易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对苏禄群岛实行封锁以及海峡殖民地华侨的移入，苏禄华侨在群岛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40年代起，华侨开始从和乐向苏禄群岛各地迁移，到40年代末，他们已经遍布附近的岛屿。1851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和乐的进攻和破坏，加速了华侨的扩散。他们在边远地区很受当地居民的欢迎。1856年，华侨在帕朗、眉奔、卡东东和布阿尔等村庄经营小商店，并以这些侨居地为立足点逐渐向整个苏禄群岛发展贸易。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89;

Warren, *Sino-Sulu Trade*, P. 63.

②Warren, *Sino-Sulu Trade*, P. 66.

由于苏禄贸易状况的变化，新加坡华侨掀起了向苏禄移民的浪潮。据估计，1863年，和乐已有好几百名新加坡华侨，到1871年，人数已超过1 000^①。他们在和乐建立仓库，到附近海岛收购土产，与到和乐的外国商船贸易，逐渐地控制了当地大部分贸易。

在1871年之前，苏禄华商每年都到新加坡贸易。西班牙人在1871年对苏禄实行封锁后，苏禄华商通过亲戚和合伙人在新加坡租用欧洲商船运输，同时继续用小帆船在各岛间进行贸易，打破了西班牙的封锁，从而掌握了苏禄群岛的贸易。苏禄华侨还偷运武器，卖给苏禄群岛以及明达瑙的内地尚未被西班牙征服的土著，支持他们反抗西班牙侵略的斗争。

西班牙的封锁，对其统治下的三宝颜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与和乐传统贸易的中断，必然引起物资匮乏、市场萧条、商业萎缩和经济失调。殖民当局不得不默许三宝颜与和乐之间的走私贸易。三宝颜的商船穿过封锁线到巴西兰，在那里与来自和乐的船只贸易。这种贸易全为华侨掌握，直至1876年和乐被西班牙征服为止^②。通过这种贸易，三宝颜的商业大部分也为华侨控制。据报道，在这之前，即1859年，三宝颜已有300名华侨。他们的店铺占满了一条街，经营各种进口商品^③。80年代中期，三宝颜的华侨有400人，当地居民50%以上的消费品是由他们供应的^④。在80

①Warren, Sino-Sulu Trade, P. 71.

②Antonio Martel de Gayangos, The Island Mindanao, Studies in Moro History and the Island of Mindanao, P. 144; Warren, Sino-Sulu Trade, P. 72.

③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P. 91-92.

④Gayangos, The Island of Mindanao, PP. 139, 144.

年代,有1 000多名华侨在明达璠岛各地从事进口商品零售和收购土产等活动。据估计,他们每年从明达璠运出800—1 000万比索的货物。

80年代早期,位于和乐岛南海岸的眉奔尚未被西班牙征服,当地华侨成为苏禄群岛的武器及其他进口货的供应商。他们控制了明达璠南部海岸、巴拉望和塔威塔威群岛的贸易,又以这些岛际贸易为基础,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和北婆罗洲通商。在西班牙占领的和乐镇,华商只能与三宝颜和马尼拉通商。这样,在和乐与眉奔之间就形成了一条贸易分界线。眉奔的华侨从英属殖民地运进武器,卖给岛民,使眉奔成为苏禄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心。殖民者对此恨之入骨。1887年,西班牙攻陷眉奔,勒令华侨在他们的商店被捣毁之前的24小时内收拾好货物,乘西班牙军舰到和乐镇。90年代,殖民当局每年对和乐华侨进行登记,强迫他们住在指定的地点,禁止到苏禄各地和明达璠贸易。

西班牙在和乐设有海军基地和要塞,但西班牙人不愿意移居到这里,所以大部分贸易还得靠华侨进行。华侨在那里建立了两家商行和一个贸易公司,利用和乐这个自由港发展外贸,其中大部分贸易是与新加坡进行的,其总额年平均达到50万元(dollars)左右^①。

和乐华侨的职业除了商人以外,大部分是劳工、店员和工匠,其中有银匠、木匠、理发匠、面包师、烧炭工、花匠、裁缝、厨师等。据1892年统计,和乐镇内的442名华侨中有商人50名,店员139人,劳工81人,其余的都是工匠^②。

1892年,和乐的华侨又开始向眉奔和苏禄群岛的其他岛屿迁

①Warren, Sino-Sulu Trade, P. 77.

②Warren, Sino-Sulu Trade, P. 76.

移，这是由下述原因促成的：一是因为殖民当局对三宝瓏的华侨商店加紧控制，提高税额，迫使不少华侨离开当地；和乐华侨害怕殖民当局对他们采取同样的措施。二是因为这年有三艘往返于和乐与新加坡之间进行贸易的华侨汽船在风暴中沉没，使和乐的华商陷于破产的边缘。三是因为三宝瓏、哥打巴托、达沃等港口与其他岛屿间汽船的通航，使和乐失去了地区贸易中心的地位。华侨人口扩散的趋势一直持续发展。到1895年，苏禄群岛几乎每个有人烟的岛屿都有华侨居住。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末年，华侨经营的商业网已经遍布整个苏禄群岛。

六 华侨在零售业和其他行业中的活动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马尼拉地区是华侨零售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1797年，马尼拉的帕利安有3 000名华侨^①。1828年，马尼拉和顿多地区华侨占全菲华侨总数的93%；1849年，占92%。他们大部分从事零售商业。

零售业是这个阶段华侨最重要的经济活动。1755年驱逐华侨以后，西班牙人曾集资76 000比索建立贸易公司，并在菲岛各地开设零售店，以期铲除华侨零售商的势力，但不及一年即告倒闭。驱逐令撤销以后，华侨零售商业随之恢复。这时马尼拉的帕利安虽仍然存在，但已失去菲岛贸易中心的地位。1783年，一部分华侨以帕利安远在隔江的圣费尔南多，与外商交易不方便为理由，向总督建议，由华侨集资在城内建一帕利安。此一建议及计划书于是年底转呈西班牙国王。但未得西王准许之前，总督已在圣何塞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29.

建成一小帕利安，允许一小部分华商入城交易。可是到了1785年9月25日，西王却勒令拆除这个帕利安，将175名华侨逐出城外，其理由是华人入城居留威胁西人安全。后由投资帕利安的有势力的西班牙人要求西王重新考虑；西王乃于1790年5月14日复示，准许保留帕利安。但此后帕利安商业一蹶不振。这时期马尼拉的华侨商店主要集中在埃斯科塔区。他们以勤勉的经营，通过血缘和地缘纽带的联系，战胜了欧洲商人和其他竞争者，在零售业上获得了稳固的地位。当时，许多访菲的外国人都注意到华侨的零售商业。

英国商人麦克米金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华侨住在店里，清晨五点即开门营业。通过家族的联系，他们往往垄断了来自外省某些种类的商品。保持紧密的家族联系是他们在零售业方面取得成功的要素。在整个马尼拉地区，经营某些种类商品的所有商店，通常都为某一家族集团所有。法国旅行家J·马拉特在同一时期也谈及使华侨在零售商业方面超过欧洲商人的经营方法。他指出，华侨购进所有合用的商品，分配给各华侨零售商，规定以统一的固定价格出售。由于他们总是雇用自己人，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足以对付任何竞争者的巩固阵线^①。

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华侨在零售业中取得的优势，首先是他们起早贪黑，含辛茹苦，惨淡经营的结果。敏锐的商业头脑，精明的商业才能和丰富的商业经验也是他们在竞争中成功的原因。至于他们在商业上利用同宗同乡关系相互扶持，共谋生

①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P. 89-90. 关于华侨经商的方式，西班牙人在M.B. Pizarro, *Reforms needed in Filipinas* (Madrid, 1827)一书里也有相类似的描述，见BR, Vol.51, P. 229.

计，也是在孤立无援情况下的自卫方式。在殖民统治下，他们备受欺凌，地位更低于当地居民。直到1843年，华侨商店才被允许在其他外国人享有的同等条件下营业^①。西班牙人不仅直接对华侨进行压迫，还煽动当地人民的反华情绪。华侨在当地既无政治权利，又得不到祖国的保护，只能与侨居地同胞团结一致，相依为命，这是理所当然的。

19世纪后半期，马尼拉仍然是华侨经济活动的中心。虽然马尼拉华侨所占全菲华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绝对数字却不断上升。1864年，马尼拉共有华侨1.8万人，1876年为3万人，1896年达到4万人，占全城人口的12.25%。后一数字一直保持到西班牙统治的结束^②。马尼拉华侨商人支配了全菲的华侨商业活动。

70年代中期，马尼拉华侨纺织品零售业集中在埃斯科塔—圣维森特—努埃瓦区、罗萨里奥区、塔沃拉—迪维索里亚区。在埃斯科塔—圣维森特—努埃瓦区，零售进口商品的商店规模最大，出售高级纺织品。这个区的布商在1894—1895年间组织了“义和局布商会”。在罗萨里奥区，进口的纺织品是摆在大商店门口的货架上出售的，价钱比较便宜。这个区的布商于1885—1888年间组织了“福联益布商会”。在塔沃拉—迪维索里亚区，布商在迪维索里亚市场的货摊出售价格最低廉的棉布。这个区的布商也于1885—1888年间组成了“关帝爷会”。这些同业公会在商业上都起着相互扶持，保护本行业利益的作用。其中义和局布商会就是由下面的事件促成的。一位华侨布商因需要回国，便把生意交给儿

①BR, Vol. 51, P. 231;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111.

②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88.

子负责经营。一个德国商人趁机诬蔑这个华侨的生意已经失败，企图扣押这个华侨的产业，并通过外交途径没收其在中国的地产。以陈三多为首的埃斯科塔—圣维森特—努埃瓦区的布商组织了义和局布商会，联合起来对这个德国人进行抵制，终于迫使他停业。义和局还联合其他两个同业公会，实行互助互利，由布商集资设立应急基金，以帮助发生困难的华侨同业。但在1900年以前，上述三个同业公会还是各自独立的。

这个阶段华侨零售业的特点，是在恢复和巩固在马尼拉的商业地位后，向全菲发展，从上一阶段主要经营土产与中国产品，转向经营欧洲的进口货。在马尼拉，华侨商店早已超出帕利安的范围。1856年，圣费尔南多丝市场取消后，华侨仍在该市场所在的拜拜村经商，生意并不衰减。1860年，总督下令拆毁圣何塞的帕利安。至此，存在了278年的帕利安终于消失。同年，金塔公共市场成立，华侨多转到该市场及其附近经商。在外省，华侨在各地设立固定商店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的定期集市。他们也到没有华侨居住，但设有定期集市的市镇贸易。此外，他们也重视流动商业，不管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山乡，都有华侨小商贩的足迹。

除了从商以外，华侨仍然是菲岛最重要的工匠，他们集中在大城市，从事传统的行业，如理发、面包、点心、屠宰、印染、铸造、建筑、造船以及充当木工、车夫、铁匠、鞋匠等。在某些行业中，华侨占了大多数，如马尼拉的马车运输业。1858年，马尼拉的784个鞋匠中，有633个是华侨^①。住在埃斯科塔区的华侨工匠的人数，比当地的菲律宾居民还要多。从事铁器和火炮制造的，几乎清一色是华侨。他们还从事精炼食糖、提炼染料等加工

^①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 90.

业以及饮食服务业。在这些行业里，他们以卓越的才能和高超的技艺，热忱地服务于当地社会。

1850年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码头仓库需要大批劳工。这种菲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大部分由华侨承担。从事这一工作的华侨占华侨总人口的1/10，以新来的契约华工居多，主要集中在马尼拉、宿务和怡朗等港口城市。华侨劳工还被利用于公共工程建设，以及在宿务、伊洛科、勒班托、科迪列拉等地采矿。他们承担了菲律宾经济活动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把华侨吸引到农业生产方面来，殖民政府于1850年宣布，务农的华侨与同一等级的菲律宾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一年只纳税12里亚尔。同年，又给予按专卖制度规定种植烟草的华侨以免税五年的优待。1852年对华侨开征新税，但务农者除外。可是这些措施毫无效果。到1870年，从事农业的华侨还不到500人^①。华侨不愿意从事农业，主要是因为边远农村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长期以来，殖民者利用各种机会在菲律宾人中进行挑拨，恶意中伤华侨，使一部分菲律宾人“从他们的实例中，学到了藐视华人”。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华侨经济的发展，部分菲律宾人对华侨由嫉妒而变为敌视，反华事件时有发生。英国近代史学家福尔曼写道：“要强迫他们在一个缺乏人身安全的殖民地从事农业是办不到的”。部分菲人的反华态度迫使“华侨放弃务农的主意，寻找较安全的城镇居住”^②。因为城镇里华侨集中，较有安全感。当时的英商麦克米金抱怨地说：“尽管甘蔗与麻种植园获得成功的最大机会在于增加进口华工，但是乡村菲律宾人对华人潜在的敌视，以及西班牙人受贿的习惯，使得这机会不可能出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58.

②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P.111, 113.

现。”^①因此，尽管西班牙人本来寻求的是农业劳工，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华侨进入不断扩展的经济新领域。因为庞大的家族系统在华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新来的移民可以逃避农业劳动，隐匿在城市和农村中成为工匠、小贩或小店主。外国商人为了增加农产品的出口，也鼓励华侨从事岛际贸易和中介商业活动。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大都是破产的农民，他们到菲律宾谋生，具有从农村移居城市的性质，因此，他们不愿意继续务农。以上种种原因，使殖民政府吸引华侨从事农业生产的企图归于失败。

1850年以前，麻出口业中的收购业务主要是由欧洲代理商经营的。50年代，华侨在麻产地设立了菜仔店和较大的百货店。菜仔店把以日用品交换得来小量的麻卖给百货店，由百货店的船只运往马尼拉。80年代，全菲这种百货店有30%分布在阿尔拜^②。这些百货店在麻收购业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糖出口业中，华侨所起的作用不大。他们主要从事收购粗糖并进行加工的工作。他们在马尼拉、庞邦加、邦加斯南、巴塔安、巴坦加斯、内湖和宿务，从事粗糖精炼，然后运往马尼拉，卖给外国出口商。80年代，由于英商在怡朗和内格罗斯经营甘蔗种植园，引进现代化糖厂设备，华侨的糖加工业就被英商企业所取代了。

在烟草业中，华侨的活动很活跃。70年代，华侨开始进入卡加扬和伊萨贝拉等产烟省份。烟草专卖的废止(1882年)，为华侨在烟草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1885年，在卡加扬定居的

①Arensmeyer, *Foreign Accounts*, P. 99.

②Wickberg, *Early Chinese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P. 281.

华侨有400多人。三年后，据该省省长的估计，居住在“流动的华人侨居地”的华侨约有700人。80年代，华侨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进口商品，特别是纺织品的零售商业。该省除了一两个镇外，都有华侨商店。1886年，仅该省的图盖加拉奥就有36家华侨商店。伊萨贝拉省的加穆也有18间菜仔店^①。华侨商人以阿帕里为基地，通过遍布卡加扬河流域的菜仔店收购烟草，用船运回阿帕里，再转售给另一些华商，由后者运往马尼拉，批发给外商或华侨烟厂。华侨的经营规模是不显眼的，他们专门收集那些大企业买剩的碎烟叶，但他们从产品定级、购买到运输整个过程都自己掌握，这样就降低了成本，获得较高的利润。

华侨也参与蓝靛出口业。他们在40年代开始到南伊洛科收购蓝靛。到80年代，蓝靛的批发几乎都是由华侨经营的。80年代以后，由于孟加拉和爪哇蓝靛业的竞争，以及苯胺染料的发展，菲律宾蓝靛的出口大幅度下降。

1855年以后，菲律宾需要进口大米，这是片面发展经济作物的恶果。90年代每年从亚洲各港口输菲的大米价值200—300万比索，其中大部分由华侨进口。华侨批发商把进口大米运往各地，由设在各省的菜仔店零售。在1896—1901年菲律宾革命和菲美战争期间，华侨经营的大米贸易达到了顶点。这时沿海贸易中断，各省对大米需求量极大，华侨冒险继续运载大米到各省，买回供出口的农产品，维持了菲律宾经济的运转，保证了当地人民的需要；同时自己也获得很高的利润，为此后华侨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Jesus, *The Tobacco Monopoly*, P.191; Ed.C.de Jesus, *Control and Compromise in the Cagayan Valley*, *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PP. 31-32.

这个阶段，华侨还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工厂。华侨批发商在烟草收购业中的成功，促成了马尼拉华侨烟厂的建立。华侨烟厂一时达到200家之多，出产的廉价香烟很受下层人民的欢迎。这些烟厂中较有名的有许书文、许经黎于1881年开设的许泉庆烟厂有限公司，投资55万比索，有机器30架，工人200名；1890年杨邦梭开设的源馨烟厂，投资75万比索，有机器36架，工人300人，月出烟品4—5万比索^①。这两家企业可能就是当时较大的华侨资本了。华侨也从事酿酒、木材经销等行业。1880年，殖民政府废止了酿酒专利以后，华侨在怡朗、宿务、新怡诗夏、庞邦加、巴塔安、邦加斯南、巴坦加斯和南卡马林内斯开设酒厂，酿造兰姆酒和棕榈酒。在马尼拉，至少有十个相当大的华侨木材商^②。华侨还从事碾米业。虽然没有当时的统计材料，但到了20世纪，华侨在碾米业中已占了75%^③。根据华侨在其他行业逐渐发展扩大的规律，相信在19世纪下半期，华侨碾米业已有相当规模。

在19世纪80和90年代，马尼拉的一些华侨个人大致已有6—8万比索的资产。1894年，至少有十名马尼拉华侨是根据超过2万比索的人息而被课税的^④。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47页。

②Valdepenas,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P. 107.

③Wickberg, *Early Chinese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P. 282. 据长野朗著、黄朝琴译：《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第16页。美治初期，菲各地31家碾米厂中，28家为华侨所有。如以此推算，华侨大米厂则占90%。

④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22.

总之，在19世纪，旅菲华侨的经济活动在恢复了以前的规模后，又有了新的、迅速的发展。“到19世纪末，中国移民已经成为菲律宾经济繁荣的必要因素。”^①

旅菲华侨在当地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菲律宾史学家G·F·赛德写道：“在整个西班牙统治时期，华侨与菲律宾人民和睦相处，他们把精力、经商的才智和优秀的品质，献给了菲律宾的进步与幸福。”^②他们的经济活动，极大地方便了城乡人民的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菲律宾社会经济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

①Arensmeyer, The Chinese Coolie, PP. 195-196.

②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 P. 269.

第 十 章

19世纪的菲律宾华侨社会

— 19世纪华侨社会概况

菲律宾华侨不论是实际人数，还是与当地居民人口的比例，都是东南亚诸国中最小的^①。19世纪40年代中期，华侨人口约为5700人，约占全菲总人口的0.14%；90年代增加到10万，约占全菲人口的2%^②。

这个时期华侨人口的增加完全是大量移民的结果。向菲移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契约劳工制，另一种是通过在非亲属或同乡的关系，在他们的资助下移民。菲律宾华侨大部分是以后一种方

①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3, 1950年，在东南亚地区，华侨人数最少的是北婆罗洲，只有7万，其次是沙捞越和文莱，16.2万人，再次是菲律宾，23万人；但华侨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人口中的比例，则分别为21.9%，29.4%，1.2%。见G. William skinner,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1, P. 79.

② 1845年全菲总人口为3 488 258人，1903年为7 635 426人。见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48 note 5. 19世纪华侨人口的数字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式到菲岛的，这种通过亲戚朋友关系而相互牵引出国的现象，在侨乡中是非常普遍的。有的人只身在外经商，在颇有收益之后，就源源牵引其族亲戚友出国。在南安丰山《陈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乡之族人，……纷赴小吕宋各埠，亲属介绍接踵而行，甚有举家而往者。”^①在福建泉州亭店乡，流传着杨嘉种（杨苗哥）的事迹。他在菲发迹后，用自己的轮船不定期地往来于厦门—马尼拉之间，把亭店乡杨氏宗亲大量牵引到菲，安插到他的商行中工作，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杨姓商业网。到欧战期间，亭店乡通过杨嘉种的大力牵引以及其他宗亲互相牵引，旅菲者已达600多人^②。

由于向菲移民多采取上述方式，在菲律宾华侨社区里就形成了以血缘和狭小地域划分的群帮，这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根据殖民政府90年代的人口统计资料，马尼拉集中了全菲华侨人口的一半以上，约5万人，是华侨最集中的城市。在怡朗和宿务这两个最主要的糖、麻产地，据1894年的统计，分别有华侨2010和1447人。在烟草产地卡加扬，据1893年统计，有华侨1107人^③。从这四个华侨聚居地的人口统计资料抽样调查显示，80%的华侨来自福建的晋江、同安、南安和龙溪等四个县。其中晋江（包括泉州城）华侨占闽籍华侨的50%，以下顺序是同安、龙溪（包括漳州城）和南安。主要的姓氏按人数次序为陈、黄、施、

①转引自林金枝：《福建侨乡族谱中有关南洋华侨史的若干问题》第7页。

②庄为玠：《泉州旅印（尼）菲侨村的调查研究》，《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第9—10页。

③Wio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69.

林、蔡、王、李、吴、许、杨、叶、郭等12个。这12个姓氏占了被抽样调查的华侨总数的 $2/3$ 。居首位的陈姓占了 $1/10$ 。陈、施、蔡、王、李、许、吴等七个姓氏占了调查人数的一半，原籍都是晋江^①。广东籍华侨在19世纪中叶只有500余人，到19世纪末也不过3 000人，仅占华侨人口的5%。由于方言不同，他们与闽侨关系不甚密切，但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菲律宾华侨人口构成方面的这些特点，使地缘组织变型，从大地域结合的会馆变为小地域以乡村为单位的同乡会。地域组织也失去其重要性，血缘组织的宗亲会的地位无形中提高；同时，由于闽粤两地单姓村特别多，不少同乡会实际上成为宗族世系群，经由血缘关系和宗亲会产生密切关系，甚至与宗亲会结合，其组织与功能和其他海外华人社会有显著的不同^②。这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一大特点。

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另一特点是男女性比例非常悬殊。据官方统计，1870年在2.3万名华侨中只有193名妇女，即1 000:8；16年后的1886年在6.6万人中妇女也只有194人，为1 000:3；同一时期在马尼拉的近5万名华侨中有191名妇女，比例为1 000:4。1870年，40%的华侨女性年龄在14岁以下，而14岁以下的男性只占4%。这些女童大都是到菲律宾当妹仔（即家庭婢女、相当于家奴）的，由于男女比例不平衡，华侨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1870年，14岁以下的儿童占华侨人口6%，到19世纪90年代初仅占5%。这些儿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从中国带来的。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集中在马尼拉。中菲混血儿的两性比例在1870年几乎是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172,174.

②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演变》，台北《民族学研究所集刊》42卷，第120页。

平衡的，14岁以下的儿童占了混血儿人口的35%。19世纪末，中菲混血儿在法律上已不被看作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可以选择归入华人或菲人类别。他们大部分成为菲律宾人（Filipino），中菲混血儿阶层自此不复存在了^①。

二 华侨社区的组织

19世纪，由于菲律宾经济状况的迅速变化，帕利安逐渐衰落，最后被取消。先前对华侨的监督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殖民政府利用华侨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殖民当局改而实行甲必丹制，以此来继续对华侨进行严密的控制。

在这一时期，面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压迫，以及他们煽起的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反华排华浪潮，使华侨意识到，要保护自身的利益，只有加强内部的团结，以抗御外部的压力。因此，在19世纪，华侨社会内聚力增强。他们利用甲必丹制在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依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华侨社会内组织起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同时，创办华文报纸和中文学校，以坚持中华传统文化来维系华侨社会内部的紧密团结，奠定进一步提高华侨社会意识的基础。在马尼拉形成了以华人街区为活动中心的社区，在全菲则以共同文化、语言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具有群体意识的族群，通过建立各种传统的团体构成了现代意义的华侨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菲律宾华侨社会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华侨不仅以自身的团结来抗御外来的压迫，而且主动要求清政府在菲律宾设置领事，以便利用母国政府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在前几世纪的菲律宾华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141.

1687年，比农多的华侨和华菲混血儿联合组成“比农多华人公会”（*Gremio de Chino de Binondo*）。这是一个兼有宗教和行政事务性质的组织，也可以说是华侨最早的社区机构。比农多后来成为华菲混血儿的聚居地。1741年，他们脱离比农多华人公会，另组“比农多混血儿公会”（*Gremio de Mestizo de Binondo*）。18世纪90年代早期，马尼拉华侨聚居的帕利安被拆毁，华侨迁到比农多和圣克鲁斯。殖民政府在1800年左右组织了“华人公会”（*Gremio de Chino*），作为管理马尼拉地区华侨的机构。原来的“比农多华人公会”虽然继续存在，但已失去管理职能，变为华侨天主教徒的宗教组织。华人公会的最高领导，便是由华侨“公选”、西班牙国王任命的甲必丹。华人公会和甲必丹制度代替了以前的监督管理体制。

甲必丹的选举、任命方式及其权限有过一些变化。1850年以前，按殖民政府的规定，甲必丹由前任甲必丹、在职和前任的各同业公会头目（头客）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甲必丹在华人公会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过去的公会首领。华人公会实际上由各同业公会的头目操纵，甲必丹只是一个名誉职位。1857年，一些华侨认为这种选举方法不能代表华侨社区富有的商贾名流。他们向殖民政府请愿，要求改变选举方式。殖民政府听取了意见，对选举的规定作了修改，以交纳一、二等商店税的纳税者代替同业公会的头目参加选举；前任甲必丹仍有选举权。

1861年，殖民政府又对选举法作了少许修改，这个选举法一直沿用到1887年。这个选举法规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所有的前任甲必丹，交纳一、二等商店税的商人以及烟厂、酒厂主抽签决定，组成一个12人的选举团（加上将卸任的甲必丹共13人），在指定的日期到甲必丹公署，在西班牙官员的主持下进行选举，选出甲必丹、甲必丹助理（*teniente primero*）、审计员

(*interventor*)、治安官(*alguacil mayor*)各一人。选举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人可以按每种官员提出三个候选人的原则,在选票上写上12名候选人。除了甲必丹以外,得票最多的便可充任甲必丹手下的三名官员,无须经西班牙政府任命。甲必丹的产生,则须将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和在职甲必丹的名单一起上报,由总督选定一人,报请西班牙国王批准后,才能正式任命。总督一般根据候选人所在教区的教士提供的意见,决定甲必丹的人选,考虑的条件主要是道德与经济两个方面。所谓道德,指的是对西班牙政府的忠诚、宗教信仰以及在华侨中的威望。被任命的甲必丹大部分为天主教徒,因为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较为忠顺可靠。经济方面也非常重要,甲必丹必须负起代殖民政府向华侨征收赋税的责任,如税款征收不足,就要由甲必丹筹款补足欠额。因此,当选的华侨必须有足够的财产。

80年代,殖民政府对菲律宾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对甲必丹选举办法也因此相应地作了一些调整。从1887年起,有选举权的人扩大到一至五等纳税者,以及前任和在职的甲必丹、烟厂和酒厂主,但是有资格参加选举的人仍非常少;1887年在马尼拉的4万多华侨里,只有446人有资格参加选举。

至迟在60年代,马尼拉以外的一些地区的华侨也有选举华侨社区官员的权利。1863年,殖民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卡维特华侨选举一名助理市长(*teniente mayor*)和四名治安官(*alguaciles*),以管理该省华侨社区事务;选举团由该省12名最富有的华侨和在职的助理市长组成;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①。

在庞邦加省的圣费尔南多、安赫莱斯、古阿瓜等三个市镇,华侨可以各自选出一名助理镇长和两名治安官。选举均在省会巴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183.

科洛尔举行，两年一次，选举方法与马尼拉相似^①。

在怡朗省，华侨在1878年才开始享有选举权。华侨社区管理官员由一名助理市长和五名治安官组成^②。

80年代，一些西班牙人对甲必丹制度提出非议，指责华人甲必丹和华人公会犹如国中之国，要求对甲必丹以及华人公会的权力加以限制。殖民政府于是在1887年对甲必丹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在甲必丹之下，增设分区助手（*teniente*），华侨俗称“社里老爷”，由殖民政府直接委任，在马尼拉地区共设12名，管辖顿多、比农多、圣克鲁斯、基亚坡等12个区。在外省华侨聚居的地区，也分别设有“社里老爷”。殖民政府设置“社里老爷”的目的，名为协助甲必丹办理征税、华侨出入境登记等事务，实际上起着分割华侨社区，节制甲必丹权力的作用，因为这些“社里老爷”直接对殖民政府、而不是对甲必丹或华人公会负责，也无须经华人公会选举产生。

甲必丹的权力比以前的华人管理官要大，实际上是替殖民政府行使管理华侨的职权。他的职责主要包括：（一）为殖民政府向华侨征收赋税；（二）负责向华侨传达殖民政府的命令，向政府转达侨社的意见，报告侨情；（三）维持华侨社区的治安，行使初级司法权，裁决较小的民事案件；（四）负责办理华人出入境登记手续；（五）管理华侨慈善公益机构。

与监督管理制度相比较，甲必丹制度免除了一个直接管理华侨社区的西班牙人，甲必丹直接向总督负责，管辖范围已经超出帕利安。但是在行使职权时，甲必丹仍需受两名西班牙官员的监督，一个是特别法官，专门负责审理有关华人的刑事案件及较大的民事案件。另一个是检察官，亦称“华人保护官”。由此看

①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 183-184.

来，甲必丹制与监督管理制并没有实质的不同，甲必丹制并非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自治”体制。

1850年以后，甲必丹的权力逐渐增大。圣费尔南多的丝市场取消后，以前全部由西班牙官员负责的管理到菲华船的事务，如核点移民人数，征收关税和其它杂费，安排食宿等，均移交甲必丹负责，殖民政府只派一名财政官监督。

甲必丹在华侨社区里权势相当大，“如县官，理民事，有俸，称曰甲必丹。其上任曰过甲，各铺贺礼，至千金。”^①甲必丹出入乘马车，持手杖，路人皆须回避，以示敬意。如遇到他认为行为不佳的华侨，他可以用手杖相击，被打的也只能低头承受。一些甲必丹利用职权，为虎作伥，鱼肉同胞，在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华商屡诉洋官甲必丹苛敛，不恤商情”^②。

甲必丹公署相当于一个衙门，有初级司法权，负有对涉及华侨社区的案件进行侦讯的责任。甲必丹在由华侨社区选出的八位富商名流的协作下行使司法权。70—80年代，殖民政府又给予甲必丹插手所有涉及华人案件的权力，所有华人犯人在受最后审判之前都要经过甲必丹的审理。

甲必丹还有权处理一些较小的民事纠纷，甚至还有若干惩戒权。甲必丹公署亦称馆，“告状曰上馆”。甲必丹审理案件的程序非常简单，“华侨投诉，至为简单，不具呈文，唯用槟榔与烟枝呈上，述说理由，随时召集双方对质，大都就此可以完结，不必再行涉讼。”^③

①叶羌鏞：《吕宋记略》。

②《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五。

③陈三多：《菲岛华侨历史》演讲词。转引自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501页。

征收赋税是甲必丹的一项重要责任。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税收是由大头客负责的，以后又改由包税人征收，从19世纪30年代起由甲必丹负责。1877年以后，殖民政府曾经在外省的一些地区对华侨实行过巴朗圭制，这些巴朗圭的税收也由甲必丹转交殖民政府。

甲必丹的任期一般为两年，也有连任或多次出任该职的。其去留大抵取决于他在华侨社会的声望和势力，以及与殖民政府官吏的关系如何。出任过甲必丹的华侨究竟有多少，现已无可稽考，史籍中可见的有如下数人^①：

1870—?	林 旺
1875—1877	陈谦善 (Carlos Palanca Tan Quien-sien)
1877—1879	杨尊亲 (Mariano Fernando Yu Chingco)
1881—1883	叶龙钦 (Antonio Elizaga Yap Gaong)
1883—1884	叶龙钦
1885	(临时) 陈谦善
1885—1887	刘平戈 (音译, Mariano Ocampo Lao Pengco)
1888	(临时) 林光合 (Angel Aldecoa Lim Ange)
1888—1889	许志螺 (Federico Gamir Co Sequieng)
1889	(临时) 陈谦善
1890—1892	刘平戈
1892—1893	施 标 (Pio de la Guardia Sy Pioco)
1893—1894	(临时) 陈文耀 (Manuel Perez Tan Yaoco)
1894—1896	陈忠戈 (音译, Gavino Tan Tiongco)
1896—1898	陈灿戈 (音译, Juan Pina Tan Chuaco)

除了上述在西文资料中记有明确任职年代的甲必丹外，在闽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250;

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502—503页。

南侨乡的墓志铭中还发现一位名叫曾天眷的华侨曾在菲律宾任甲必丹。据墓志铭所载，曾天眷生于1841年，卒于1906年。其父是“操儒业”的读书人，因“生计支绌”，只好让儿子“过番”，到菲岛谋生，“时小吕宋未设领事馆，而西人之辖殖民地，例苛烦，侨岷者亟等对付之策，请以华人自治，略如我桂滇两省土司之例，译曰‘甲必丹’。得西政府认可，投举，以公应选。公亦以保护华侨为己任，削苛例，拓利权，造病室，辟坟场，凡有利于人者，知无不为。”^①他出任甲必丹的年代，墓志铭中没有记载。

虽然甲必丹在实质上是殖民者的代理人，但是另一方面也起着华侨社区代言人的作用，负责与政府交涉、请愿。有的华人甲必丹也确实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起保护华侨利益的作用。特别是他们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更为华侨所长怀乐道。在这些甲必丹中，其事迹较为今人所知的，有林旺、杨尊亲和陈谦善等人，他们的主要业绩是设立善举公所、开辟华侨义山和创办崇仁医院等。

1873年，华人甲必丹设立了一个华侨慈善、商务及教育机构，叫“华人公社”（Comunidad de Chino），处理华侨社会内的有关事务。后来商务及教育事务分离出去，这个机构便成为专门管理慈善事业的善举公所，主要负责管理华侨义山和中华崇仁医院。善举公所是一社区性的华人团体，设有董事15人，其中粤籍3人，由广东会馆委派，其余12名董事在闽籍华侨中选举产生。

华侨义山是在林旺任甲必丹期间开辟的（约为1870年）。他

^①林金枝：《福建侨乡族谱中有关南洋华侨史的若干问题》，第7、22页。

在巴石河以北的拉洛马购赠土地，开辟坟场，为贫苦华侨提供埋骨之地。继任者杨尊亲在1878年以1.4万比索的代价，向多米尼克会大主教购得拉洛马右畔旷地，扩充坟场，并集资33 980比索，在新义山中心点建立“崇福堂”，作为奉祀及纪念有功先侨的祠堂。

崇仁医院建于1879年。当时霍乱流行，西班牙人办的医院拒绝收治华侨病人，致使大量病侨得不到医治。甲必丹安东尼奥·叶龙钦发起集资50万比索，立即在拉洛马区华侨义山附近建起崇仁医院，救治病侨。崇仁医院以中医中药治病，特别为贫苦华侨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很受广大侨胞欢迎。1891年，陈谦善又集资3万比索，扩建崇仁医院。该院的经费，起初来自对新来移民所收的费用，后来主要来源于每月对华侨商店收取的费用和对回国华侨收取的费用^①。

在这些甲必丹中，以陈谦善最为著名。他曾三次出任甲必丹，为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作出一定贡献。在美国占领菲律宾后，他曾代理其儿子陈纲，任过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他还是马尼拉最早的华文报纸《华报》（1888年）和《岷报》（1890年）的重要发起人。

在19世纪，华侨社区内还出现了不少自发组织的社团。这些组织承袭中国传统，以血缘和地缘团体最为普遍，大致可分为秘密会社、同乡会、宗亲会、同业公会等几种。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185, 188; 有的学者认为，崇仁医院的建立不可能早于1881年，因为华侨曾于1881年向殖民政府请愿，要求建立华侨医院。见Antonio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68 note 150. 刘芝田先生认为该院是陈谦善创办的。见《中菲关系史》，第503页。

菲律宾华侨最早的社团组织是1817年成立的“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和1820年（一说1824年）成立的“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总社”。这两个组织名义上是音乐团体，实际上是华侨社会内的秘密会社，其首领都称为“家长”。在政治上起着控制华侨社会的作用。对新客提供社会援助也是这两个组织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这种组织是联谊性的结义团体。在海外谋生的华侨，不管其从商或打工，都需要先在同胞中建立私人关系。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传统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象征朋友关系的“义”。华侨把这种观念带到海外。在菲律宾，华侨社团的组织形式也多属于联络感情，互助共济的帮派性结义团体。直到19世纪后半期，有了华人甲必丹公署和后来出现的中华商会，这种秘密会社才失去势力。因此，秘密会社并非菲律宾华侨社会的主流。菲律宾还存在过另一个秘密会党——天地会，这是从中国传入的政治性较强的组织。在1896年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开始时，它曾经公开活动，支持菲民族解放战争。菲律宾革命史上著名的华侨将军刘亨赐，便是天地会的首领之一。

同乡会也是菲律宾华侨社会出现较早的组织。同乡会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自愿团体，在中国本土的城市中通称“会馆”。这种组织由华侨带到菲律宾，仍然以祖籍、地域和方言群为组织单位。在同乡组织中，“广东会馆”成立最早。那时，广东籍华侨主要集中在马尼拉和怡朗两地，主要从事饮食、制鞋业，也有从商的。在马尼拉的华侨中，广东人占1/10，聚居在王城、圣克鲁斯市场、比农多等处。马尼拉的广东会馆成立于1850年，馆址设在圣克鲁斯。在怡朗，广东人占该埠华侨人口的8%。怡朗的广东会馆成立于1870年前后。广东会馆主要起照料粤籍新移民的作用，为新移民提供临时住处，给予贷款以及介绍职业。对粤籍华侨中出现的纠纷，它还起排解、仲裁的作用。

在菲律宾华侨中，福建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大部分来自闽南的几个县，操同一方言。因此，大的地域性组织没有存在的意义。福建人同乡会组织的地域基础不是以一般的省、州、县，而是以乡村来区分；这一点与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侨同乡会组织有显著的不同，闽南单姓村很多，所以不少同乡会实际上是一个世系群或小氏族的团体组织，兼有地缘和血缘两种特性。更由于在同一地区存在的密切宗支关系，同乡会之间又往往有特殊关系，同姓氏的同乡会很自然地会凝聚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会之下，因此，宗亲会也就显得比同乡会更为重要了。这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结构特色之一。

在宗亲会出现之前，福建人曾组织过一个“杂姓会”，它不是闽人用以同广东会馆对立的组织，而是近似于郎君社一类的团体。它于1903年改名为“闽商会馆”，到20世纪30年代还相当活跃。

宗亲会是以同宗为基础结合而成的团体，同宗通常互称“本家”（闽南话则称“堂的”）。最早出现的宗亲会是福建人的“四知堂”，大约成立于1877—1879年间，由当时的华人甲必丹杨尊亲和杨瑞霞、杨硕梓等人发起组织，由杨瑞霞首任总理，会所设在马尼拉的胡安·卢纳街，1915年改为“弘农俱乐部”。粤侨的宗亲会“龙岗公所”成立于1884年。粤侨宗亲会的特色是会中附设宿舍。对于广东人来说，宗亲会与实际生活关系较为密切，亦更形重要，这可能是广东人宗亲会较为稳定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宗亲会还有福建人的“有炳堂”，可能成立于西班牙统治的末期；而大部分宗亲会是在20世纪成立的。

同业公会在18世纪早期就形成了。1720年已出现米商同业公会。该同业公会的会长称为“米店甲黎司”。在19世纪头十年

的税收纪录中，有关于华人马车运输同业公会的记载^①。1888年，木材商组成崇宁社(中华木商会的前身)。布商在19世纪80—90年代也成立了几个同业公会。福联益布商会成立于1885—1888年间；义和局布商会于1894年成立。这两个布商会于1903年合并为中华布商会。还有一个是成立于1888年的关夫子(关帝爷)会，1914年改称为福联和布商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同业公会数目，从20—40个不等^②。这些同业公会，不仅代表本行业的利益，而且在华侨社区中有着重大影响。在19世纪上半期，各同业公会的头领有权参加甲必丹的选举，他们实际上控制了华人公会。在甲必丹代表华侨向殖民政府提交请愿书时，他们还负有在上面签名的义务。

华侨社区内的各种社团，不仅代表和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且彼此还凝聚为一体，以整个华侨社会的力量，抗御外来的压迫，维护整体的权益。它们经常通过华人公会与殖民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利益。

19世纪70年代，大量契约华工到达菲律宾，其中很多人找不到职业，无法向殖民政府交税。殖民政府强迫这些欠税的华工在马尼拉的公共工程中工作，或押到马里亚纳群岛当农业劳工。但由于工资太低，他们仍无法纳税，一些人因此被投入监狱。1881年，华侨社区由华人公会出面向殖民政府请愿，要求把这些华工交给华人公会，由公会偿还他们所欠的税款；在30天内实在无法交纳欠税的华工，由公会出旅费把他们送回国。殖民政府考虑到华侨社区对此事件的强烈反响，只好同意华人公会的要求。华人

①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P. 103, 110.

②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37.

公会的交涉，还迫使殖民政府作出了其他一些让步，如1891年起准许交纳一至四等华人身分证税的华人可以不用再购买通行证旅行；1892年免去上述纳税者的代役费，并退还两年已交纳的代役费。华人公会还代表华侨社会，抗议殖民政府的排华法案，并派出代表，要求清政府在菲律宾设置领事，保护华侨的利益。这显示了华侨社会民族意识的觉醒。

三 清政府在菲设领始末

19世纪中叶以前，清政府一再颁布法令，禁绝人民出国，对私自出海者严厉镇压。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武力威迫下，清政府才被迫放弃这种闭关锁国政策。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利权，其中包括在中国招募劳工的特权。1858年，中英、中法续约规定，华民情甘出口，或去英、法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毫无禁阻^①。自此，出国禁令实际上不废自废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员不满于传统的守旧政策，兴起学西方、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华侨的潜在力量，希望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在自强运动中发挥作用。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清政府对待华侨的政策有了较大变化，从鄙弃、敌视华侨，逐步改变为承认华侨的合法地位，并设置领事加以保护^②。

①《英吉利续增条约九款》第五款，《法兰西续增条约十款》第九款，《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

②关于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转变，可参阅庄国土：《论晚清政府在南洋的设领护侨活动及其作用——晚清华侨政策研究之一》，见《南洋问题》1983年第3期。

清政府设领护侨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当时，秘鲁、古巴华工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清政府与秘鲁、西班牙政府进行交涉，并派出陈兰彬、容闳等官员前往实地调查，取得实据，于1874年与秘鲁订立“查办虐待华工专条和商约”。翌年，派陈兰彬为驻美、日^①、秘正式外交使节。1877年与西班牙订立“古巴华工条款”，1879年在哈瓦那设置总领事。这些措施，对保护华工的正当权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菲律宾，殖民政府在19世纪下半期加重了对华侨的剥削，增加税收，并经常煽起排华浪潮，限制和打击华侨的商业活动。在殖民者的高压之下，华侨社会一方面加强内部团结，组成各种社团，以集体力量保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转向祖国，企求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们看到清政府在关于古巴华工问题的交涉中使西班牙在外交上作出了一些让步，特别是看到在华侨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他们渴望得到祖国保护的心情就更为强烈了。这种强烈的愿望，终于变为主动向中国政府要求在菲设立领事的具体行动。

光绪五年（1879）正月，“寓小吕宋华商陈最良（谦善）具呈，以小吕宋官员苛税虐政请援。”^②1880年，华侨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在菲律宾设领事的请求。当时掌管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信件后，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古巴华工案交涉的步骤，先派员到菲调查，然后再设立领事馆。总理衙门让李鸿章处理此事。李鸿章命令驻美、西、秘国外交使臣陈兰彬，向西班牙

①“西班牙”之西班牙文为Espana，我国旧译“日斯班尼亚”，故故简称为“日”；本节所引文献中的“驻日参赞”、“日外部”、“日人”、“日官”等均据此译名简称引申。

②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七日。

政府提出在菲设领事馆的要求。陈接到指令后，即指示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员与西班牙外交部进行交涉。“光绪六年（1880）七月，驻日（西班牙）黎（庶昌）参赞照会外部请设领事，九月又照催之”^①。但西班牙外交部以此事须先与殖民部商议，并征询驻菲总督的意见后方能作具体答复为理由，始终推诿，不予答复。

1881年郑藻如接任驻美、西、秘国外交使臣，继续与西班牙政府进行交涉。西班牙外交部又提出，1864年中西条约里并没有关于中国在菲设领事的条款；如中国坚持这一要求，就必须另行达成协定，而商定新协定的谈判要等西班牙外交部接到菲律宾总督的答复方能开始。为了表示中国坚持在菲设领事的决心，以及为谈判作好准备，郑藻如在征得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同意后，向西班牙提出派中国官员到菲律宾进行调查的要求。但西班牙政府根本不予理睬。菲律宾总督一再拖延，直到1885年中才向马德里表示反对中国设领事，然后，西班牙政府才正式答复，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

1885年，张荫桓接替郑藻如的职务。他在离京上任前，就在菲律宾设领事一事，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会商，又到天津请示李鸿章，并与西班牙驻华公使L·阿尔瓦·萨尔塞多会晤。1886年，张荫桓出国上任，途经广东时，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进行磋商。张荫桓在粤逗留期间“适于正月间，有小吕宋商董叶龙钦、陈最良（谦善）、林光合、许志螺等来华，呈递华商二百九十家公禀，求设领事。”^②张荫桓当即亲赴香港会见侨领。张与这几位代表

①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七日。

②张之洞：《会筹保护侨商事宜摺，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五。

接触后，感到他们“情词恳切，皆实有不忘桑梓之心，求庇皇朝之愿”^①，但他们对提供领事经费的问题“尚无成说”。因此，张荫桓对设领事的请求亦未作肯定的答复。他在与张之洞商议后，决定“先选派委员前往小吕宋及南洋群岛确查情形”，在查实“办公之经费果有把握且能经久”之后，再派出领事^②。他们选定原籍福建龙溪、曾久居外洋的总兵王荣和与原籍广东新宁（今台山）、曾任驻日本长崎领事官的候选知府余端担任这项使命。除了以“访查商务”为名，调查侨情，为设领事作准备的任务之外，他们还负有向华侨秘密劝捐，筹集建造护侨军舰经费的使命。出使经费由粤海关拨出，共计1380两。就在这个使团即将动身的时候，马尼拉华商又“公遣李继志、官文斗二人来华递公禀”，“称该埠匪徒倡议驱逐华人”，“六月内，该埠匪已滋事数次，连日在内埠加玛邻（即卡马林内斯）等处，华人被害多名，焚劫财物共值二十万元，恳委员速往筹办，议设领事保护，并请乘官轮往，以壮观瞻，船费由该埠商人供给。”^③华商还同时电请已赴美上任的张荫桓设法保护。为此，张之洞致电总署，要求派兵船护送王、余出使。北洋大臣李鸿章回电称，北洋铁舰快船现均往海参崴，南洋快船亦拟赴朝鲜操巡，本无可派。朝廷也认为“徒与官轮壮观，无济于事，转令该埠滋疑，殊属无谓”^④，于是命令他们附商轮前往。

王荣和等于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二十日由广东起程，先至菲律宾。所到之处“华民分诉日（西）人虐待情形，恳请派官

①②《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五。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六八。

④《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

保护，自筹经费。”^①这两位查岛委员当即照会菲总督，并向张荫桓汇报。张于十一月初五接到小吕宋华侨商人禀折，及该委员照会小吕宋总督稿，初七日又收到查岛委员及华商陈谦善、叶龙钦来禀，均表示领事薪俸可就地解决。照会是在对卡马林内斯排华事件进行调查之后，向菲律宾总督特雷罗一佩里纳特提交的；它要求总督追查并惩处肇事者。张接到照会稿后，又递交马德里政府。西班牙外交部假意表示他们将命令菲总督惩处肇事者，并向受害华侨赔偿损失；但始终未见下文，菲律宾殖民当局毫无反应。

1887年5月，张荫桓奉命从美国到马德里递交国书，继续与西班牙政府就在菲律宾设领事问题进行交涉。西班牙政府故伎重演，再次施展拖延战术。但在是否同意中国设领问题上，西班牙外交部与殖民部意见相左。外交部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赞成中国在菲律宾设领事，理由有三：（一）如果坚持不让中国设领事，她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废除1864年签订的中西商约；若出现这种情况，再想签订对西班牙如此有利的条约恐怕非常困难。

（二）在菲有侨民及商务关系的国家均设有领事，唯中国无权设立，中国可能会依照交涉古巴华工案的做法，游说各国，对西班牙施加国际压力，使西班牙陷于尴尬的局面。（三）西方列强对日益衰落的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正虎视眈眈，如果中国以武力护侨，肯定会得到列强的支持。不满的华侨如奋起反抗，对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也是非常危险的。华侨社区的孤立状态不应继续下去，应该让中国设置领事，以保持殖民政府与华侨社会的沟通。

菲律宾殖民当局则从维持其在当地殖民统治的角度出发，坚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四。

决反对中国在菲设领，其理由有四：（一）华人在拥有财产及商业上与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享有同等权利，司法上也是平等的，如果华人认为甲必丹的裁决不公正，还可由西班牙法庭断案。政府还允许华人组成自己的公会，其他外国人均无自己的组织。因此，中国无须再设领保护。（二）领事馆设立后，华人一定会抗交对他们额外征收的赋税，而华人的赋税是殖民地不可少的收入。（三）领事馆设立后，甲必丹制和华人公会在侨社内的作用，必然会被领事馆取代；而对殖民政府来说，甲必丹和华人公会的作用，是领事馆代替不了的。因此，如果让中国设立领事，殖民政府就必须象英国人在新加坡那样，成立华民护卫司之类专门管理华人事务的机构来代替甲必丹制，任用通晓中文的西班牙官员管理。这样一来，将耗费殖民政府一大笔经费。（四）领事馆一旦设立，中国将会以海军作为外交后盾。而中国逐渐强大的海军，是对衰弱的西班牙的一个威胁；领事馆的建立将助长中国的炮舰外交。菲政府或许可以对华人的管理作一些改进，但决不能容忍中国在菲律宾设领事馆。殖民部以菲律宾殖民政府的意见为根据，极力反对中国设领事馆。

在正式答复中国政府再次提出设领的要求之前，西班牙政府派商务总办米亚斯以私人身分，到张荫桓处探听虚实。他表示，中国在菲律宾设领事，“为条约所不载，此为藩部（殖民部）专政，恐难照行。”^①张荫桓据理力争，与他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下面是张荫桓《三洲日记》有关这场辩论的记载：

余（张荫桓自称）答以条约亦并未声明小吕宋不准设领事。

米（亚斯）曰：然。特华人久受甲必丹管束，若中国设官辖之，恐多不愿。尔时必生事端。

^①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

余答以华人断无不乐隶华官治辖之理。且中国口岸均准日（西）国设领事，小吕宋则各国皆设领事而独拒中国，其理安在？

米云：此系条约如此。

余谓：条约第一款“两国商民彼此侨居，均全获保护身家”，明系公法彼此报施之义，岂得为日国设领事在中国为按约，中国设领事在日国口岸为违约耶？

米云：华人在小吕宋五万余，论丁口则已占十分之四。

余谓：中国即设领事，决不得尔政权，且观古巴自有领事以来，尔国政事有贬损否？

米云：古巴不能并论。究竟中国要设领事在小吕宋是何意？

余答以华民众多，若不派领事前往，似对不住百姓。招商局轮船亦欲前往载货，以拓商务。

米云：华人现甚安居乐业，无待华官为之保护；中国商船前往，转于华人有损。此皆查岛委员具报不实，中国因有是举。

余谓：查岛委员所报皆实，已照会外部矣。且该岛日官曾与委员商招华人前往垦荒。

米云：必无其事，或某官自便私图耳。

余曰：新加坡无约而中国亦设领事，英国并不阻止。

米云：新加坡华人情形不同。

辨（辩）论甚久，余不稍让①。

张荫桓看到西班牙又以条约未载为理由，拒绝设领事的请求，就准备亦以条约为根据进行谈判。1864年签订、1867年批准生效的中西《和好贸易条约》第47款规定：“中国商船不论多寡，

①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引文中米亚斯所称“华人在小吕宋五万余，论丁口则已占十分之四”一语不实。查90年代华人只占全菲人口的2%，在马尼拉，华人也只占全城人口的12.25%。

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若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用昭平允。”^①而实际上华商受到的却是最苛刻的待遇。张荫桓利用西班牙的税收记录进行统计，掌握了西班牙违约的事实：

约内第四十七款“中国商民至小吕宋贸易应与最优之国一律相待”，此明文也。而日（西班牙）官所收身税（人头税）、路税（通行征税），自丁卯（1867）换约起，至甲申（1884）共十八年，该岛刊发新例（指1884年新税制）止，共征华人银七百零七万八千一百六十一元二角四仙。专征华人，每人岁纳九元六仙。甲申后乃兼征西人，每人一元五角，华人则四元五角。计至丁亥（1887）共四年，又长征银五十二万零八百三十六元。又路照一项，西人每征四角五，华人每征则一元二角五仙，又须预纳一年身、路税，无理之甚！即与西人比较，将四角五除去，实长征华人八角。自丁卯至丁亥廿一年，共银七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元四角，预纳之身、路税犹在外也。……又每华人岁征医院费二角五仙，甚微。自丁卯换约至本年，廿一年共征二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元七角五仙。此项与甲申以前之身、路税，均系独征华商，甚违一律优待之约。此中人数，就去年（1886）正月至九月数目共计华人四万三千四百零三人，逐年清计尚不止此数也。^②

据此，在与米亚斯会晤后的第三天，张荫桓即电询科士达律师以“索偿已往，禁遏将来”的办法^③。不久，张荫桓接到西班牙外交部通知，“言日后将议新例，为各领事而设，而于小吕宋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5页。

②③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

设官一事仍不能决。”^①西班牙当局对中国在非设领问题，再次采取“既不遽拒，又不允”的拖延策略。

1887年6月，菲律宾总督下令“不准华人行医、药肆售药，必由该国医生考试后，得给准照，方准行医售药。”^②陈谦善等即禀告张荫桓求助。张令驻西代办向西班牙交涉，阻止上述法令实施，并催促西班牙外交部长谟烈就设领事问题作出定议。经过交涉，殖民部才同意华医可暂不按殖民地卫生法处理，而由中国发执照，但须经西班牙驻华领事签署作证，后又改由香港的英国官员签署。菲当局虽不得不承认执照，但又规定中医中药只限于华人使用，并对华医增税，加以歧视^③。菲律宾总督对华侨通过中国政府的交涉，迫使他放弃禁中医的法令一事非常恼火，对华人“大加仇视，多加刻制”，规定华侨向外地发电报要向政府呈交电文底稿^④。华商于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再次请求张荫桓尽早设领事保护，并提供菲律宾总督“滥征华人身、路税之据及官报数种”^⑤。但在中国使臣向西班牙“诘以苛虐华人各端”时，“（西）外部允为革除，而设官一事，绝不松口。”^⑥设领依然毫无进展。外交部推托的理由仍然是殖民部反对。其实这只是西班牙政府玩弄的伎俩。担任过菲律宾总督（1883—1885）的西班牙人诃比耶（霍韦利亚尔），1887年曾经私下向张荫桓透露，“主

①《清史稿》卷一五九《邦交志》。

②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③对华医增收的歧视性税，到1892年才取消，以后只缴纳与其他国籍医药师相同的税款。见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224.

④⑤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⑥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脑在外部，其他枝叶也。”^①实际上，西班牙政府对设领谈判毫无诚意。

张荫桓及其部下迟疑不决，一直没有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索偿菲岛滥征的文件。事情一搁三年，直至1889年4月，西班牙外交部把政府部长会议“原则上接受设领的意见，但近期内不可能实行”^②的决议通知张荫桓后，他感到“现在情况如是，若并此不发，更无以对华民”^③，才向西班牙提出索赔。他此举也无济于事。不久，西班牙摄政皇后又颁布关于西属殖民地领事及其他事务的法令，规定殖民地事务全由殖民部管辖；设置领事问题，外交部无权决定。张荫桓只能与外交部交涉，再谈去下也无意义，便返华盛顿。总理衙门试图与西班牙驻华公使继续谈判，但西班牙外交部指令谈判全部由马德里方面进行，从而使总理衙门的努力亦告失败。

1889年，崔国因继任驻美、西、秘国使臣，次年5月受命从美国赴马德里，打算重新开始设领谈判；但因这时美国旧金山发生地方官向华人发出传票125张，已拘禁20余人的事件，崔国因只得马上返美处理此案。过了不久，西班牙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西班牙反对中国在菲律宾设领事，并拒绝谈判。

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殖民当局对华侨的压迫有增无减。1889年，当局规定年满14岁的华人要交纳全部赋税，而实际上年仅12岁的儿童也被列为征税对象。殖民政府还驱逐由明达瑙入境的华侨，没收其财产。反华事件不时发生。华侨一再向清政府求援，

①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六日。

②转引自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 222.

③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七日。

恳求设领保护。为了迫使西班牙重开谈判，崔国因于1891年向清廷提出，与其索偿滥征，不如禁止西班牙在中国发行彩票。

菲律宾殖民当局在1833年开始发行彩票。60年代初发行到上海，80年代又扩大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地；甚至在古巴的华工中也流行这种彩票。西班牙驻各国领事直接参与推销。发行彩票的收入成了殖民政府的一项财源。这种“吕宋票”在中国广为流行。在上海，每年输入48万。1885年，西班牙又征得清政府同意，在内地发行。于是“日推日广，几遍各省”。1889年丁汝昌率舰队出访日本、菲律宾及南洋各国，发现彩票“行之中国者四分之三”。对西班牙发行“吕宋票”，“以赌资济国用，各国皆议其非，均禁不行。彼不能行之各国，独行中土。”中国商民行使吕宋赌票，受害无穷。用崔国因的话来说，就是“不啻以中土脂膏盈千累万，为他国纳无货之税，无田之租！”西班牙在菲律宾“滥征之为害华民尚在他国境内，此则竟于本境任其剥削，遍及各省闾阎。……即不为抵制他端起见，亦当力禁严除也。”在设领事问题上，他认为“非禁彩票，实无术使彼就我范围，降心相议。”还指出：“即使仅禁彩票，不设领事，而已为内地除数十年之漏卮，为每年减数十百万之耗费”^①。

清政府采纳了崔国因的建议，禁彩票。但是禁令“奉行日久，仍属具文”。直至1894年，甚至在“京城地面，亦有大张招帖领票转售之事”。清德宗于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谕军机大臣：“著刑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南北洋大臣，申明旧章，一律严禁，毋得虚应故事。并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出使大臣，设法禁止，以杜漏卮。”^②但上谕亦不见

^①本段引文，均引自崔国因光绪十七年正月初六日奏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四。

^②《清德宗实录》卷三四二，光绪二十年六月乙卯条。

奏效，况且彩票收入占殖民政府岁入的比例不大，在彩票收入最多的1897年也只占6%^①。因此，即使中国禁绝彩票，也不能使西班牙就范，设领交涉仍陷于僵局。

90年代中期，殖民政府在14个月内把华人入境税从2比索提高到20比索，引起了华侨的强烈不满。他们又多次向清政府请愿，诉说殖民当局的苛政，请求保护。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后，清帝国更形衰败。它连江山都几乎保不住，那里还有能力保护孤处海外的子民呢？海外华侨这时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1896年菲律宾革命爆发，华侨被强征到殖民军中服劳役，从而引起菲律宾人对华侨的敌意，谣传要杀尽华人时，陈谦善在向清政府求援的电报中要求，如果中国无力保护，请委托第三国对中国侨民加以保护。清政府也只好照办，请求英国代为护侨。西班牙考虑到英国在菲律宾的利益，也害怕其他对西班牙抱有敌意的列强插手，便在1896年12月同意由英国领事负起暂时的、非官方保护华侨的责任。而实际上英国领事并未为保护华侨作过什么努力。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华侨，只能再次寄希望于清政府设领保护。

直到1898年6月，在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行将崩溃之际，西班牙政府才最后同意中国在菲律宾设立临时性的领事馆，至动乱结束为止。在领事到任之前，清政府指定陈谦善代理。同年8月，美国占领马尼拉，并在短期内占领全菲。随着菲律宾发生的这一历史性变化，中国驻菲领事馆也从临时变为永久。第一位驻菲领事陈纲——陈谦善之子于1899年1月上任。但是，华侨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清政府要求在菲律宾设领事的交涉，从光绪六年（1880）旅

①.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P.231.

菲华侨请设领事起，迭经历任驻美、西、秘国使臣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等人长期谈判、交涉，直至西班牙在菲律宾统治结束的前夕，才有结果，前后经18年之久。

清政府争取在菲律宾设领事的原因，与在南洋各地设领事的原因一样，固然是由于华侨强烈要求，清政府也意识到华侨的内向之心，但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官员已认识到对南洋开展外交的政治意义，以及利用华侨经济力量的重要性。

1884年，福建海军毁于中法战争后，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更为急迫。张之洞积极建议筹建海军，发动华侨捐款购造军舰。他极力主张设领护侨的另一目的是要吸引华侨的汇款。张之洞还认识到，一旦华侨因不堪忍受迫害而返回祖国，势必加重国内的负担。在1887年王荣和等查岛归来后，他请清廷要求在菲律宾设领事的奏折中指出：“若海外者不安其居，返归内地，沿海骤增此无数游民，何以处之？故保护之举，实所以弭近忧而非以勤远略也”^①。张之洞主张设领护侨的又一目的，是想通过领事在南洋各国兴办书院，向华侨讲授“圣人之教”及“中国礼义彝伦”，以儒学来教化他们^②，以培养民族意识，维持人心，使华侨效忠于清皇朝的封建统治。这个主张是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的。

此外，张之洞极力主张在菲律宾设立总领事馆，在南洋扩大设领范围，向华侨劝捐以筹建南洋海军，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实力，与李鸿章争夺权势。

李鸿章也支持在菲律宾设领事，原因是与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轮船招商局与菲律宾有航运业务，他想进一步扩大中菲航行业务。他也认为菲岛及南洋华侨的捐款对于海防及赈灾是非常重要的。

①②《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四。

的。但是他又不希望张之洞的势力增大，危及他的地位。所以，当张之洞在80年代派王、余等查岛，要求派北洋海军军舰为交通工具时，李鸿章断然拒绝。

对中国要求设领，西班牙本来就持消极态度，而清廷在这方面懦弱无能，更使西班牙或托辞推诿，或干脆不予理睬。本来，在1877年与西班牙订《古巴华工条约》时，应趁国际舆论对西班牙不利，一起签订在古巴、菲律宾两地设领条约，但清政府却坐失良机。而当张之洞在查岛取得实况后向总理衙门提出在菲律宾设领事的计划时，竟遭到拒绝。清廷认为“不宜发之太急”，担心西班牙“启嫌疑”而加以刁难。还以使费支绌万分，筹款困难，以及对领事管辖稽查之难为理由加以反对^①。实际上是害怕张之洞从设领中得益，扩大势力，因此宁可不设或缓设。

由于清政府内部派系的矛盾，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斗争，使清政府在设领交涉中态度不够强硬，这是谈判拖了18年之久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西班牙毫无诚意，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国力衰弱，对西班牙横蛮无理的态度无可奈何。

随着清政府在菲设领问题的解决，华侨总算是实现了他们由来已久的愿望；但是，他们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历史并未因此而结束。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五。

第十一章

华侨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菲律宾革命战争

一 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

19世纪中期以后，菲律宾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大体上是山高利贷者、商人（尤其是中介商）、地主、在殖民机构中任职的菲律宾官员、外国商行的经纪人转化而来的。他们主要从事商业、种植园业以及蔗糖、马尼拉麻、椰干、烟草等加工工业。由于殖民当局在菲律宾片面发展经济作物，对外贸易又几乎为英、美、西等外国资本所垄断，因而，菲律宾资产阶级的上述业务经营，不免对外国资本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

随着阶级力量的发展，菲律宾资产阶级同殖民者的矛盾逐步加深，因而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宣传运动（或称改革运动）。在70—90年代初，他们通过在国外办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宣传人民，启迪民智，提出了给菲律宾以省的地位，改革殖民制度，西菲居民权利平等，发展民族经济，把群岛统一成民族共同体等要求。宣传运动对菲律宾的民族觉醒起了推动作用。

1896年8月30日，以资产阶级激进派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奥为主要领导的革命组织“卡蒂普南”发动武装斗争。1896—1897

年革命爆发。革命斗争的烽火迅速燃遍菲律宾群岛，人民纷纷参加起义，殖民军中的土著士兵不断倒戈。在短时间内，吕宋岛的许多村镇获得解放。

1897年4、5月间，以埃米里奥·阿吉纳多为首的资产阶级稳健派夺取了革命领导权，杀害了博尼法西奥，使革命受到挫折。在革命斗争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阿吉纳多等革命领导人作战略退却，暂时停止斗争，自愿流放香港，另行谋划，以图再起。但国内小规模的反西武装斗争并未停息。

阿吉纳多等到达香港后，立即准备新的革命斗争。从1898年3月至5月，美国人纷纷出面，劝诱阿吉纳多在美国帮助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把菲律宾从西班牙奴役下解放出来”，并保证美国将承认菲律宾的独立，或“至少承认在美国海军保护下的菲律宾独立”。

4月25日，美西战争爆发。5月1日，美国亚洲舰队在马尼拉湾一举摧毁西班牙舰队，进占卡维特港。5月19日，阿吉纳多等乘坐美国军舰回到卡维特港。他立即召集旧部，号召在5月31日举行反西全国起义。到6月中旬，吕宋已基本解放。马尼拉则处于数万起义军包围之下。6月12日，阿吉纳多在卡威特镇宣告菲律宾独立。8月13日，美国远征军撤开起义军，单独进占马尼拉。14日，占领军在马尼拉成立殖民政权——美国军政府。

1898年12月10日，美国与西班牙签订巴黎和约，以2 000万美元的代价，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获得菲律宾的主权。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史称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宣告诞生，阿吉纳多成为共和国总统。此时，决心保卫革命成果，捍卫国家主权的菲律宾人民，同一心要实现菲律宾的军事占领的美国侵略军之间，关系非常紧张。2月4日，美军在马尼拉近郊开枪杀死一名起义军士兵。当起义军要为自己的战友报仇，向美军防线开

火时,美军便“按预定计划”,立刻在全线发动“准确而神速的”进攻。

美国侵略者在展开全面侵略战争的同时,对革命队伍实行分化瓦解。在革命队伍中,妥协派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左右了内阁,架空了阿吉纳多。革命派领导人受到挤排和杀害,起义军在抗战中也不断遭受挫折。同年11月,起义军主力被打垮,分散进行游击战,继续坚持抗美战争。1901年3月,一直坚持领导抗美战争的阿吉纳多,在伊萨贝拉省的巴兰南被美军俘获。并于4月1日宣布效忠美国。在以后短短几个月中,起义军大部分官兵陆续投降,抵抗运动接近尾声。菲律宾终于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二 华侨投身菲律宾革命战争

在菲律宾人民进行反西抗美战争期间,我国人民也正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艰苦的革命发动工作。对于菲律宾的革命战争,孙中山满怀革命热情,打算给予援助。他曾提议,“悉率〔兴中会〕会员至菲岛,投阿〔吉纳多〕民军,速其成功,协定以馀势向支那大陆,起革命军于中原。”^①及后,菲律宾抗美救国战争失败,孙中山转而主张先完成中国革命,然后以中国的力量援助菲律宾独立。他说:“大义无先后,吾党决当立兴义军,遂行夙昔之志愿,若吾事成;则菲岛之独立,直翻掌间耳。”^②1898年5月,菲律宾反西战争重起。美国出于限制革命军势力发展的考

①官崎寅藏著、黄中黄译录:《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②同上书,第115页。

虑，拒按盟约供给阿吉纳多武器弹药。革命政府不得不向外寻求军火。6月29日，革命政府代表马里亚诺·彭西到达日本，设法购买军械。经人介绍，彭西在东京会晤孙中山，委托后者代为购械。会晤中，孙中山还提议率党员至菲岛投独立军，成功后，由菲人协助中国革命。“彭西及中日同志咸赞成之”^①。彭西将情况告知国内。阿吉纳多获悉“中国革命党缺乏餉糈，乃命彭西馈赠总理日金十万元，以表示中菲两国合作诚意。”^②对中国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和“策动惠州、广州军事，菲人之助款，大有力焉”^③。其后，菲革命党人虽处抗美战争的逆境中，但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尚有所赠”^④。经孙中山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犬养毅的努力，1899年7月，第一批军火购备，由日轮“布引丸”载运赴菲，但船至浙江马鞍岛海面时，触礁沉没，军械尽失。接着，彭西托孙中山再次购械。但在这时，菲律宾的革命军主力已被美军打败，起义者转入游击战争，加以美日反动势力的阻挠，这批武器无法转运菲律宾。于是，彭西“欣然赞许”将这批军械借给孙中山，“供中国革命之需”^⑤。可惜，由于经办者日本人中村弥六棍骗购械资金，这批所谓武器竟“尽属废铁”，“绝不能施诸实用”^⑥。

在菲律宾革命战争期间，局势动荡，战事频仍，又受西、美殖民者的屠杀和抢掠，且革命队伍中人良莠不齐，一些不良分子也借机抢掠和杀害华侨，使华侨遭受巨大的苦难。“当美班（西

①②③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④同上，第78页。

⑤同上，第79页。

⑥同上，第80页。

班牙)交绥之时,华人之在小吕宋者,每受池鱼之祸”^①。这种情况不只发生于马尼拉,其他地方亦然。例如:

本年三月间,施务(宿务)土民肇乱,先向华人铺户搜掠银物,旋有西班牙兵船到埠,挥兵登岸,击退乱党,班总督饬兵纵火,凡土人屋宇与华人铺户,焚毁一空。是时各国商人,皆有领事护卫,独华人以护卫无人,颇觉手足无措,东奔西荡,各自逃生,有死于炮者,有死于火者,又有死于兵者。合埠华人九百余名,逃出者只有两人,残惨情形,几乎不忍卒读^②。

西班牙殖民者还在卡马林内斯地区的达特(邇乙)、纳加和利马南等城镇,对华侨大肆进行屠杀。据美联社记者报导,美军侵入菲律宾之后,“对当地居民和马尼拉华侨进行肆无忌惮的抢劫,毁掉他们的财产,对他们进行骇人听闻的敲棒勒索。”^③少数起义军官,在卡马林内斯地区的米纳拉巴克、帕萨卡奥、利马南和卡拉班加等城镇杀害许多华侨;在其他地方,发生了强迫华侨为起义军提供衣料、粮食和款项,虐待华侨等情况。不少华侨还遭到抢劫、杀害^④。

华侨为了免受战乱和骚扰之苦,不少人回国,或移居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留在菲律宾的华侨,大部分同菲律宾人民在反

①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论说汇》卷首。引文中的小吕宋即马尼拉。

②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论说汇》卷首。

③转引自纳罗尼茨基:《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62页。

④Dean C. Worcester, The Philippines, Past and Present, Vol. I, N. 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PP. 156—157, 162, 176, 179, 214, 215—216.

殖民主义、反侵略的斗争中甘同苦，共患难。他们有的组成“华侨义军”，同起义军在前线并肩作战，有的以财力、物力支持菲律宾革命战争。

革命政府尽力保护华侨。在菲律宾革命重起前夕——1898年5月24日，阿吉纳多颁布命令，规定“必须尊重一切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凡无直接或间接资助武装反对我们的行为者，均包括在此类外国人之内。”凡对上述外国人进行杀害、纵火、抢劫和强奸者，“应速决审判，就地处决”^①。当时，革命政府为对付美国的武装侵略，开支浩大，财政困难。因而它把解决上述困难的希望寄托于富有的菲律宾人和华侨身上。革命政府向华侨筹款的方式，一是征收捐税，例如，1898年11月30日，下令规定在非营业的一切外国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必须缴交100—5 000比索的特许费以及同等数额的战争特别税。该令旋于第二年1月撤销。1899年3月，规定18岁以上的华侨要缴交人头税。这一年，华侨交纳的人头税共30万比索^②。二是由地方政府将市场、渡口、屠宰场、度量衡、马匹、车辆、捕鱼的征税权给私人承包^③，其中包括由华侨出资承包；甚至让华侨出资购买一些地方的鸦片垄断权^④。三是向华侨推销公债，募集捐款。仅

①John R·M·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asig City, Eugenio Lopez Foundation, 1971, Vol. Ⅱ, PP. 32—33.

② 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Vol. Ⅰ, P. 462; Vol. Ⅱ, P. 322.

③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Vol. Ⅱ, PP. 503—505.

④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Vol. Ⅰ, P. 472.

刘亨贻一人，即先后为革命政府募集了几十万比索。1899年6月2日，他向政府转交新卡塞雷斯华侨购买公债款10万比索。21日，他把阿尔拜、卡马林内斯两省华侨自愿捐献的44 790比索转交政府^①。10月28日，他把在塔亚巴斯华侨中募得的另一笔22万比索巨款交给政府^②。据说，在若干省份，华侨捐献给政府的款项，为他们居住的社区其他人的两倍^③。华侨还直接参加革命军，为这一神圣事业流血牺牲。

在菲律宾独立战争期间，在华侨当中，对菲律宾革命事业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是著名的华侨将军刘亨贻^④。

多年以来，关于刘亨贻的姓名、籍贯、出国前的经历及其归宿，都存在一些混乱。例如姓名，就有侯亚保、侯甫胞、侯夏鲍、侯苞、侯鲍、侯贻、侯宝华等不同称呼，在文章、书籍中，却未见有称他为刘亨贻的。直到1962年，福建的郑炳山先生，在南

①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Vol. I, P. 478.

②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Vol. I, P. 478; Teodoro A. Agoncillo, Malolos, The Crisis of the Republic,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60, P. 478.

③Tay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Vol. I, PP. 212—213.

④有关刘亨贻的生平和事迹，请参阅 G·F·Zaide, Chinese General in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in Shubert S·C·Liao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P. 120—137. 中文译文见吴景宏：《菲律宾简史与人物》，第157—179页；郑炳山：《菲律宾独立战争的名将——华侨刘亨贻》（打印稿）。

安县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在该县刘林村找到刘氏族谱、刘亨赍的戎装油画像及其旧居,并向该村群众调查了解之后,某些问题才得以澄清。

下面是刘林村刘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亨赍公,字图琮,号纯清,又名扶西^①。天资活泼,聪敏过人。少时侨居南洋之菲律宾。时菲民苦受西班牙帝国之压迫,方图革命,然民智尚浅,公乃教之制器划策,众嘉其能,举为副帅。自是所向皆捷,名震欧亚。当时我华侨居于菲岛者数以万计,皆赖公力,得以保全。故史称为侯赍将军。及菲受美辖,公复历任该处地方长官。在菲传有嗣续,是亦吾族之一派也。公卒之日,菲之军官民众咸为休业志哀,其勋绩可想见矣!惜乎久羁异域,祖国之儿孙稀少,公虽恢宏堂构,而今家运中衰坠落,难免先哲有云: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公亦所谓人杰矣。

公生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三月廿三日卯时。

卒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四月十三日申时。^②

族谱中关于刘亨赍在菲律宾的经历,语焉不详,且有附会(如“举为副帅”),需要借助于菲律宾的史料,才能使其完整。在菲律宾有关刘亨赍的论述中,最详备的是赛德撰写的《菲律宾革命史中一位华人将军》一文。此文对刘评价颇为公允。

华裔自由战士何塞·伊格纳西奥·宝阿将军的生平和业绩,在菲律宾历史中是为人所鲜知的史实之一。这位英勇的炎黄子孙曾用他屡经战阵的利剑,为菲律宾的独立事业作出贡献。他在菲律宾旗帜之下,先是为反对西班牙(1896—1898),继后是为反对美国而战;又由于他在战斗中勇猛过人,对第一菲律宾共和国忠心耿耿,

①刘亨赍在菲取名为何塞(扶西)·伊格纳西奥·宝阿(Jose Ignacio Paua)。

②引自郑炳山:《菲律宾独立战争的名将——华侨刘亨赍》。

因而由埃米里奥·阿吉纳多将军提升为陆军准将。他是菲律宾革命中唯一的华人将军。不幸，我国解放斗争中这位勇往直前的华人将军，一直未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所公认。在我国公立中小学法定采用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没有把他的名字同我们反对西班牙的革命，同我们反对美国的解放战争联系起来^①。

以下据郑炳山调查的史料和赛德专文的资料，叙述刘亨赐的生平及其在菲律宾革命斗争中的业绩。

关于刘亨赐的生卒时间，中菲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在中国的史料中，刘亨赐在世的时间是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廿三日至民国15年（1926）四月十三日，享年54岁。在菲律宾，他却是生于1856年，卒于1922年5月27日，享年66岁。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如何弥合，笔者限于客观条件，难以作出圆满的解决。但就其出生年月而言，可据族谱的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872年4月29日。至于逝世日期，由于他因癌病死于马尼拉的医院，定有医院病历记录，又遗有眷属在菲，笔者宁可采用1922年5月27日这个日期。

由于刘亨赐出生日期记载各异，其出国日期也相去18年，国内史料说他在1890年18岁时，菲律宾史料说他在1872年16岁时到达马尼拉。这种分歧，现在也暂时无法判别。

刘亨赐18岁（约1890年）结婚后，即别离父母和新婚的妻子，到在马尼拉的伯父刘元系的铁铺中当学徒。他为人聪明、勤奋，很快就学会制造各种铁制器物和制作机械的技巧，且善于制作旧式火药銃。他利用工余时间，居然学会了泰加洛语和西班牙语。在革命年代，又流利地掌握比科尔方言，学会一些英语。

^①Shubert S·C·Liao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120.

刘亨贻个性豪爽，倜傥不羁，好交游，同华侨及菲律宾人都有很好的交往。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初，他通过同菲律宾朋友的接触，对宣传运动有所了解，同情菲律宾人民的处境。刘亨贻居住、生活于顿多。这里是卡蒂普南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由他的朋友、后来的起义军将军潘塔莱昂·加西亚介绍，他认识了卡蒂普南的创始人博尼法西奥及该组织的活动家吉列尔莫·马桑卡伊，何塞·图里亚诺·圣地亚哥等人，从而同卡蒂普南有了正式的联系，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积极支持者。其后，通过“潘达”（他对加西亚的爱称），他在卡维特省认识了当地的卡蒂普南活动家阿吉纳多、阿尔特米奥·里卡尔特、比托·贝拉米诺、坎迪多·蒂罗纳和马里亚诺·特里亚斯等著名人士。阿吉纳多赞赏刘亨贻对菲律宾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他对武器和机械的知识和才能。刘“也敬慕和尊崇阿吉纳多的领袖天才、庄重态度和慷慨好友”。

1896年，菲律宾革命战争爆发时，刘亨贻在卡维特省参加革命部队，成为步兵中尉。当时，起义军极端缺乏武器，特别是枪支，在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1896—1897年）的斗争中，每十名革命战士才有一枝步枪。绝大部分起义军战士用以武装自己的，只是短刀、竹矛枪、弓箭，甚至是护身符。刘亨贻从战斗实践中认识到配备火器的迫切性。他建议建立革命军兵工厂，并获得阿吉纳多的嘉许和批准。1896年9月，宝阿中尉就在刚解放的伊穆斯把工厂（包括铸造场和武器库）建立起来，并指导铁匠和具有修理火器经验的人，开始修理缴获的老式大炮和毛瑟枪，制造缚以金属线的长竹炮和无数简陋的火器。成千上万的弹药筒，也装满了自造的火药。驻守于比纳卡杨、诺维莱塔和达拉伊坎壕沟，后来重创殖民军的革命军战士，就是用他们修造的第一批军火装备起来的。

这一年的11月9日，殖民军在拉蒙·布兰科总督指挥下，进攻卡维特省的起义军营垒——比纳卡扬、诺维莱塔和达拉伊坎这一扇形地带。由于敌人来势汹汹，一切可以抽调的兵力，都开赴战场增援。刘亨赐领了一支由卡维特人组成的大刀队上了前线，以简陋的武器打退敌人几次进攻。这次战斗，起义军官兵虽然牺牲不小，但终于使敌人的进攻归于失败。刘亨赐因战功升为上尉。接着，他又指挥部下，参与对圣弗朗西斯科·德马拉翁（现在的General Trias）、纳伊克（在卡维特省，华侨也称它为迺乙）、因当和乃加拉内斯各敌营的一系列进攻。然后于12月底返回兵工厂。

1897年2月初，新总督加米罗·波拉维哈派兵对革命的中心卡维特省发动全面进攻。革命战线吃紧，宝阿上尉再次被征召上前线。革命军虽在各条战线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但无法阻止敌人的攻势。锡朗、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萨利特兰、伊穆斯和其他城镇相继失守。刘亨赐由于在萨利特兰和伊穆斯的防守战中，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建立卓著战功，并击毙殖民军的佩德罗·萨瓦拉将军，因而提升为少校。

在革命趋向低潮时，革命军的总部从卡维特撤往布拉干省北部的比亚克纳巴托村。刘亨赐以深山丛林为基地，对布拉干、庞邦加、邦加斯南、塔拉克等省的敌占村镇发动频繁的袭击。1897年9、10月间，他配合马卡布罗斯将军，反击殖民军对卡曼西山（在庞邦加、新怡诗夏和塔拉克三省的交界处）山区的进攻，使殖民军损失惨重。刘亨赐屡建战功，又提升为上校。

1897年11月1日，宝阿上校参与比亚克纳巴托宪法的签字仪式，并庄严地在宪法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在菲律宾历史上，他是在该国宪法上签字的第一个纯血统的中国人。同一天，他参加了比亚克纳巴托共和国的成立盛典。

1897年底，宝阿上校陪伴阿吉纳多等革命领导人流亡香港。

由于语言上的方便，他被流亡小组公推为翻译，成为当地华人和菲律宾革命领袖间的桥梁，给这些菲律宾人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898年5月19日，刘亨赐与菲律宾革命领导人从香港回到菲律宾，筹划集中全国革命力量，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从5月下旬至6月上旬，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革命队伍急促壮大，武器配备和粮饷的筹集，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革命领导集团一开始就把华侨作为筹饷的主要对象。宝阿因其在华侨中享有威望，又有广泛联系，成了募款的理想人选。革命重起伊始，他便受阿吉纳多之命，先后在马尼拉邻近各省、比科尔地区各省募款。在募捐中，刘亨赐表现了对菲律宾革命事业的高度热忱和责任感。他总是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地，动员和说服人们特别是华侨捐赠钱物，成绩突出。仅在比科尔南部省份阿尔拜、索索贡的华侨中，他就募集了38.6万比索的现款。这是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授权募饷人员中所征集到的最大一笔现款。他在塔亚巴斯省的华侨中募得22万比索的巨款。对募得的财物，他分文不留，全数缴交共和国财政当局，而且往往冒生命危险亲自解往国库。1899年10月，他解送从比科尔地区南部省份募集的另一笔16万银比索巨款，渡过拉盖湾正要驶向塔亚巴斯湾时，受到一艘美军炮艇的追逐。眼看辛苦募来的巨款将要落入敌手，他果断地命令舵手把帆船驶向浅岸，背着敌艇，把银币一袋袋放进海中，然后停船上岸。敌艇无法进入浅水区，只得在海岸几里之处停止追赶，掉头他向。第二天，宝阿返回海湾，捞起钱袋，如数解交国库。他为革命事业募款的努力，得到革命政府的高度评价。1898年9月，他被晋升为准将。

刘亨赐在动员华侨捐赠财物，鼓动华侨青年参加革命军之外，还利用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影响，尽可能地保护华侨生命、财

产的安全。菲岛数万华侨，“皆赖公力得以保全”。在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西班牙殖民者在达特、纳加和利马南等城镇大事屠杀华侨，他即派兵驰援，使2 000多名华侨免遭杀戮。在革命战争的第二阶段，刘亨赙在募集经费过程中，发现有损害华侨利益的现象，就通过革命政府加以制止。1898年7月6日，他把从布拉干省淡博蓬、梅卡瓦扬和波罗等小城镇华侨中募集的2 000比索现金，转交革命政府，随款附上一封给阿吉纳多的信。信中谈到一些起义军军官滥用职权，虐待老百姓，收受贿赂，放任不法商人运货到马尼拉资敌，以及有关那笔捐款的情况之后，说：

再者，我希望获得你禁止对给政府捐款且并非我们的敌人的华侨商人施加暴行的命令。我希望在所有村镇的华侨捐赠完成时，发布一项公告，禁止对华侨的任何损害行为，禁止对他们小本生意的任何干扰，因为这些行为对我们的政府，对你的名誉，都是一种耻辱^①。

刘亨赙在菲律宾革命战争第二阶段的另一光辉事迹，是在比科尔地区抗击美军的侵略。上述那笔16万银比索，是他所募集的最后一笔华侨捐款。在缴交了这笔巨款之后，他回到比科尔地区的阿尔拜省。那里有他在1899年9月组织的小家庭。但他并非为了享受小家庭的温暖，而放弃筹款工作，而是为了到正吃紧的比科尔前线参加战斗。他成了比科尔地区革命军总指挥比托·贝拉米诺少将麾下的一名前线指挥官。

从1900年1月起，美国侵略军加紧了对南泰加洛诸省（卡维特、巴坦加斯、内湖和塔亚巴斯）和比科尔诸省（卡马林内斯、阿尔拜和索索贡）的侵略行动。1月20日，美军夺取索索贡城和布

①D.C.Worcester, The Philippines, Past and Present, Vol. I, P. 157 note 1.

兰、唐索尔两镇。23日，更乘势进攻由刘亨膊负责防守的重要港口列加斯比。刘亨膊的部队由正规步兵和炮兵组成。他们斗志昂扬，视死如归，给美军登陆部队以迎头痛击。战斗打了一个上午，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遭受惨重损失。但到了下午，敌人占了上风。刘亨膊准将认为取胜无望，便主动撤出该港。事后，指挥这次进攻的美国将军科比向占领军当局报告说：“抵抗是那么顽强……以致许多人在肉搏战斗中死伤了，但没有做出投降的任何表示。”^①

宝阿准将从列加斯比退到达拉加，再退到马拉马，在马拉马同贝拉米诺的部队和来自卡马林内斯、索索贡等地的援军会师。军事上的一再挫折，并没有消磨刘亨膊的斗志。在达拉加失守（1月25日）之后仅仅四天，他就连续袭击列加斯比（1月29日、2月1日）、阿尔拜（1月30日）和达拉加（2月6日）。这几次反攻都没有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但他的大刀队却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他的弓箭手则用火箭、放火等办法烧毁敌人的营房和苧麻仓库。他认为，为了争取自由，应不惜付出任何重大代价；为了阻止美军的占领，菲律宾人民不得不忍受暂时的重大牺牲。因此，对这几个地方，他都采取了焦土政策。但这种政策，遭到贝拉米诺的反对。两人间的裂痕由此产生，且与日俱深。2月底，刘亨膊在指挥吉诺巴坦防御战时，竟然受到从背后射来的子弹的袭击。他身体虽幸而未受到任何伤害，但这颗从自己营垒中射来的子弹，却使他的精神大受打击。吉诺巴坦一役结束后，他立即辞去作战司令之职，退隐到在波兰吉的家中，并带着他的家属于同年3月27日向列加斯比港的美军司令投降。

刘亨膊在菲律宾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对菲律宾革命无限忠诚。

^①赛述：《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3页注。^①

他为革命甘冒各种危险，勇敢拼搏。他最后同绝大多数菲律宾革命者一样，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走上向美国侵略者妥协的道路，这的确是使人遗憾的，但刘亨赠对实现菲律宾独立自由的愿望一直没有改变。曾在比亚克纳巴托村见过这位上校的菲律宾律师特奥多罗·贡萨雷斯后来写道：

在比亚克纳巴托，我第一次遇到宝阿上校，就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营地中看到他，那是一种使人感到奇怪的情景——一位穿着上校军服的军官，气宇轩昂，却留着一条辫子。他的士兵是泰加洛人，全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但尽管他是中国人，他们却效忠他，并以能在他的战旗下服役而感到骄傲^①。

在菲律宾侨居那么长的时间，并且在起义军中获得这样高的军阶之后，刘亨赠仍舍不得去掉头上的辫子。1898年6月12日，菲律宾宣布独立。在这一天，他剪掉辫子，以此表示与菲律宾人民共庆这个盼望已久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典。他的行动使他的好友大感惊讶。他却微笑地说：“我剪掉了它。我现在和我那可爱的辫子脱离了关系，就跟你们和你们的西班牙主人脱离关系一样。”^②这件事典型地表明了，刘亨赠对实现菲律宾独立这一目标的一往情深。即使在向美国军事当局投降之后，他还是对他的妻儿说：“我盼望能活到目睹我们可爱国家的独立，亲眼看见菲律宾国旗单独在我们的领空之上，光荣地飘扬。”^③他对菲律宾和

①Liao,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128.

②Liao,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137.

③Liao,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136.

菲律宾革命事业的忠诚，赢得菲律宾人民的赞颂。阿吉纳多后来（1956年）对刘亨赐作出很崇高的评价。他说：

宝阿将军的公正无私和英雄风度，已获得全体菲律宾人民的感佩——他正是为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他既然热爱菲律宾一如其祖国，菲律宾自当视之为她的英勇的子孙了^①。

据说，阿尔拜省列加斯比城附近有一处村镇，就是为纪念这位华侨将军而命名为宝阿（Paua）的。

对菲律宾独立战争作过重大贡献的，还有一位有部分菲律宾血统的华侨罗曼·王彬（1847—1912）。王彬的祖父王奕彬是第一代华侨，福建晋江县人。王彬的父母都是美斯提索，他本身因而“含有75%的华人血统”。他独资开设菲律宾第一家“不二价”商店，经营百货、油漆、木匠工具、器械、文具及手工用品。由于他经营有方，又重商业道德，因而生意兴隆，不久就成为马尼拉富商之一。早在宣传运动时期，他的店铺即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集会场所。他斥资资助宣传运动。在1896年的革命及1899年的菲美战争中，又以大量钱财、物资支持革命党人，因此一度入狱^②。出狱后，支持革命的热诚未减。罗曼·王彬受到菲律宾人民的敬重。为了表彰他对菲律宾革命的贡献，马尼拉市议会于1915年通过决议，将华侨聚居的沙克里斯蒂亚街（St. Sacristia）改为王彬街，并在街口建立纪念牌坊，名为“中菲友谊门”。1973年，更在友谊门附近树立王彬的铜像和纪念碑，供后人瞻仰。今天，王彬街已成为菲律宾著名的唐人街了。

菲律宾历史学家高度评价华侨在菲律宾革命中所表现的献身

①吴景宏：《菲律宾简史与人物》，第184页。

②郑金树：《罗曼·王彬的祖籍及其他》，《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精神。赛德的《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一书，在提到孙中山对菲律宾革命的支持和刘亨勋在比科尔的英勇战斗时说：“菲律宾人民因而永远感激中国的恩德——一种非鲜血或黄金所能充分报偿的恩德。”^①

^①见该书 Vol. I, P. 285.

第十二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 社会的发展

美治时期，菲律宾华侨尽管在政治上仍受到殖民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排斥，经济上受到限制性法律和“菲化政策”的打击，移民也受到限制和苛待，但整个说来，比起西治时期他们较少遭受政治迫害，生命财产较有安全保障。在这种环境中，华侨凭着中华民族勤劳、刻苦的光荣传统，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使菲律宾华侨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下面就华侨人口的上升，经济力量的增长，社会组织的加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分述。

一 华侨人口的上升

据1886年西班牙殖民当局进行的人口普查，这一年全菲华侨人口数字为 93 567人。一位名叫雷耶斯·拉拉的作者在其1899年出版的著作《菲律宾群岛》一书中，列举华侨数字为10万人，其中 4 万人在马尼拉。在革命战争期间，华侨为避战乱，大量离菲，人数急剧减少。据多次出任华人甲必丹、当时任清政府驻菲代理总领事的陈谦善1899年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仅 4 万人，其中2.3

万人在马尼拉。其后一段较长时间，人数未见明显增加。1903年，美国殖民当局对菲律宾进行人口普查，华侨仅有41 035人，同4万之数接近。这次普查之后的15年中，官方统计的华侨人口仅略有增加。1918年的人口数目是43 802人，只比第一次普查时增加2 767人。这表明，根据1903年的702号移民律，虽然官、商、游（览）、教、读五种人及前两者之眷属可经批准入境，但由于批准手续极严，又设诸多限制和苛例，能获得批准入境居留者极少。上述1918年的华侨数只限于具有“合法”身分的侨民数，为数众多的“非法”入境者未包括在内。

菲律宾对移民的限制，未能有效地制止移民律所允许的几种人以外的人入境。

一些希望到菲律宾谋生，但又不属移民律所允许入境的人，千方百计地利用法律的空子。移民律规定，在菲华商的眷属经申请批准可以入境。于是，一些人在侨商的帮助下，作为侨商的未成年子女到菲谋生。其中一些人，申请到华侨较少的外省，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设移民检查员，冒充华商亲属的移民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以这种身分入境的人数，在每年入境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但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目。例如，1906财政年度抵菲的中国乘客为7 966人，其中侨商子女为511人；1907财政年度，抵菲者8 141人，侨商子女为983人。这些未成年的子女中，相当一部分人仅仅是侨商的同乡、亲戚。他们到菲后，成了华侨或其他外国商店、商行雇用的办事员或搬运工人，也有一小部人成为杂役或家庭仆婢^①。

^① 《菲律宾华人现代史》，菲律宾《世界日报》，1983年1月10—12日；陈烈甫：《菲律宾的历史与中菲关系的过去与现在》，第171页。

移民律也准许中国国民以游客的身分入境。于是，一些人以这一身分入境，“然后让当局知道他们有意永久地居留”，进而申请居留权。在20世纪初，一些人以这种方式，取得在菲律宾居留的许可^①。

利用法律文字的漏洞，虽然可以合法入境，但不免要受入境苛例的折磨，要付出相当大的费用，还要受马尼拉的移民经纪人的敲榨勒索。这些移民经纪人都是马尼拉的美国人或当地人，以500比索的保证金取得移民经纪执照后，便以代办入境或离境手续为名，向移民收取按规定或超过规定的25比索“服务费”。因此，大量不具备移民律所规定的入境资格，也无法缴交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入境费，但希望往菲律宾谋生的人，便通过各种渠道，绕过海关和移民局，秘密地违禁入境。用这种办法进入菲境的人，叫做“非法”移民或“违禁”移民。

菲律宾海岛众多，海岸线极长，特别是明达瑙，海岸线长且复杂，极难守备，又缺快艇巡逻，且近婆罗洲。违禁移民往往先到婆罗洲，由熟悉明达瑙海岸情况的摩洛人，将其隐藏在甲板下，载运到明达瑙某个安全的地点上岸。然后，他们或者留在该岛耕种土地，在经过若干年，有所积聚后改从商业；或者由此辗转到其他海岛。通过这种渠道进入菲律宾的移民，数量较多，但根本无法统计。据说，仅在1920年，菲律宾移民局就在明达瑙岛和苏禄（和乐）岛，发现3 000多名从婆罗洲违禁入境的华人移民。他们最后被驱逐回国。但被逐者往往不久便通过同一通道返回菲律宾^②，除了南方的通道之外，一些违禁移民甚至想方设法，径直从设有海关、移民检查官，限制綦严的马尼拉入境，“而没有被海关觉

①《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3年1月13、14日。

②《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3年1月14、15日。

察”，也有一些人经由吕宋北端及其他路线入境^①。

华侨人口的显著增加，是20世纪二三十年的事。这首先是由于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所造成的国内政治的动乱，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引起移民增加。其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原料产品价格成倍上升，出口业兴旺，华侨的经济力量也有很大发展，因而使他们有可能将国内眷属接到菲律宾团聚，或牵引国内同乡同宗到菲助其经营。

再其次，华侨社会人口有了自然增长。法律允许华侨商人可携眷入境，华人女性逐渐增加，男女的悬殊比例也逐渐趋向缩小。1918年，华侨男女比例为13：1，即男40 699人，女3 098人。1933年，在总数71 638名华侨中，男59 054人，女12 584人，即4.7：1。到1939年，已接近于3：1（90 007：27 480）。华侨女性的增多，使当地华侨人数除了通过新移民的到来得到增加外，也通过纯中国血统的土生华侨的出生而增加。菲律宾卫生局编制的1919—1925年马尼拉华侨出生和死亡数，显示华侨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见表1）。

在1918年以后的十多年中，华侨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根据《华人经济公报》提供的数字，1935年华侨人口为110 500人^②（不包括违禁入境者，下同）。1939年，菲律宾人口普查，全菲华侨计117 487人。其分布情况是：马尼拉占这个总数的39%，若连周围地区则占45.4%；超过3 000人的省份有宿务、达沃、怡朗、莱特、奎松（即塔亚巴斯）、黎萨和三宝颜；另外20个省有1000—2000人，其余省份，都有或大或小的华侨

①《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3年1月13日。

②《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3年1月17日。

表 1 1919—1925年马尼拉华侨出生、死亡数统计

年 次	出 生 数	死 亡 数	人口净增数
1919	369	361	8
1920	511	377	134
1921	570	317	253
1922	529	318	211
1923	561	331	230
1924	639	344	295
1925	639	325	314
合 计	3 817	2 373	1 445

资料来源：育干《菲律宾的华侨人数》，载《东方杂志》二十三卷十八期（1926年9月25日）。

社区。唯一没有华侨的是最北端的巴坦省^①。

1939年菲律宾人口普查获得的华侨数，使我们对华侨的迅速增加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因为那些违禁入境者在普查时躲藏起来。同一年，中国驻菲总领事馆对旅居菲律宾的华侨进行一次全面登记，所收登记费用于建造新领事馆。这次登记所得数字是13万人，其中5万人在马尼拉^②。另据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499.

^②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497.

“南洋通报社”估计，在1939年的11.7万多名参加人口普查的华侨之外，加上秘密入境者及信仰基督教后改用菲律宾名者，总数应有三四十万人^①。

1939年的华侨数字，不管是人口普查、总领事馆登记以及南洋通报社的统计得出的数字，都是自菲律宾有华人移民以来的最高数字。

二 华侨经济力量的增长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经济发展，有其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之一，是在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的生产有了发展，经济也趋向活跃。美国在菲律宾推行美菲自由贸易政策，使美国工业品得以向菲律宾倾销，而菲律宾的农业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麻、烟草、椰干、糖等也可以运销美国。为了促进这种对美国异常有利的所谓自由贸易，美国除通过立法形式规定美菲间的自由贸易关系外，还运用殖民政府的行政权力，鼓励建立农场，引入农业机械、科学耕作方法，建造灌溉系统，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设立银行信贷机关。这些措施，当然是为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但客观上也有利于菲律宾生产事业的发展（当然是片面地发展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有利于菲律宾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刺激了菲律宾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虽然，这一发展是以

^②田村寿：《南洋华侨现势》，见张荫桐译述：《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第4页。

美国垄断它的对外贸易为前提的^①，但也为菲律宾人以及华侨在经济上的发展，提供了较之西班牙统治时期更为深厚的土壤。

美国代替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之后，标榜“民治”、“法治”，西班牙殖民当局强加给华侨的苛捐杂税，对他们财产的任意剥夺，对他们生命的威胁等现象，已随之基本消除。正如美国作者海登所说：“虽然普遍认为，在某些地方为种种情况所迫，他们仍然向较小的政治当局缴付一笔非法的贡金（比起西班牙统治时期来，菲律宾政府已把这种剥削形式减少到一个小的程度），但他们已不用再遭受西班牙时期法定的任意掠夺和种种限制了。”^②在这样的条件下，在美国统治最初一段时间里，华侨以其已有的经验、技艺和刻苦创业的精神，相对安心地从事和发展他们的经济。这是有利因素之二。不过，由于菲律宾的对外贸易已大部分为美国商人所垄断，菲律宾的法律又禁止华工入境，宪法上明文规定外侨不得拥有农地、矿山和森林，因此，华侨的经济活动，在美占时期，便主要向菲律宾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商业有关的工业方面发展。

有利因素之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菲律宾经济出现了相对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具体说是1914—1920年，

①在菲律宾进出口贸易总值中，美国所占份额，从1900年的11% 急促升至1910年的41%、1920年的65%和1935年的72%。1899年，在菲律宾进口总值中，美国只占9%，1933年已达64%。同期，美国在菲出口总值中，从占18%直升至83%。见R·Constantino, *The Philippines: A Past Revisited*, Tala Publishing Services, Quezon City, 1957, P. 301.

②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695;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39.

由于战争的影响，国际市场对菲律宾的一些原料和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价格也大为上涨。美国资本家、菲律宾企业主利用这种有利形势，扩大对菲律宾工农业的投资，从而使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业在短期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也迅速发展，短期内增加了糖（原糖）厂23家、椰油厂41家、烟厂51家。出口贸易成倍增长，从1913年的95 545 912比索增至1920年的302 247 711比索。1910—1920年，糖出口量增加了三倍，椰油出口几乎增加了七倍^①。这种形势也促使华侨厂商增加投资，使他们在农产品收购、加工、出口和菲律宾各岛间内海航运业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华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美国统治时期，特别是从20年代至30年代，在华侨经济前进的道路上，也存在着许多险阻，使华侨在推动菲律宾经济发展方面历尽艰辛。

首先是殖民政府和1935年以后的菲律宾自治政府推行菲化政策而对华侨施加种种经营限制。华侨的经营是为菲律宾服务的，对推动菲律宾经济的发展，一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一些人在美国殖民当局的鼓励下，出于政治上的自私动机，总是对这些勤劳守法的华侨横加指摘。在他们的言论中，华侨代替了殖民者，积极的贡献成了灾害，华侨给菲律宾人生计上的方便竟然也成为一种危害。帕塞尔针对这种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菲律宾，华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便当的政治靶子。菲律

^①黄晓沧编：《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85页；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菲律宾史稿》，第91页。

宾政治家对在菲的利润中占有远远大得多的份额的美国人和西班牙人，总是三缄其口；而华侨却成了祭坛上的代罪羔羊和歧视的对象^①。

这些政治家在利用舆论工具，煽动群众的民族情绪的基础上，同政治当局一起，通过立法程序，对华侨的经营大加限制。1921年的簿记法，1922年的禁米条例，1923年的内海航运菲化案，1924年排华风潮，1939年停止发给华侨菜仔店营业执照^②以及1940年的公共市场菲化案，对华侨的商业活动打击极大。

其次，欧战后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都给予华侨经济活动以严重的影响，但对华侨打击最大的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危机首先爆发于菲律宾的宗主国、垄断菲律宾对外贸易的美国。菲律宾首当其冲地遭受美国转嫁危机之害。菲律宾赖以维持国计民生的供出口的经济作物产品价格猛跌。与1928年的价格相比，1933年，麻下跌70%，椰干下跌55%，椰油下跌67%，使菲律宾的出口收入比常年减少近半。不论种植者还是加工部门，都纷纷缩减生产，甚至工厂倒闭，种植者收入大幅度减少，工人失业或工资急剧降低，购买力直线下降。商品滞销，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日常应用的货品，有的把原来的价格减低了百分之五十，有的竟减到〔“到”应为“价”〕百分之七十至八

①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9. 华侨在菲律宾的经济力量，与美国人相比，难望其项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侨在菲各业的投资，估计约为美国人在菲各业总投资的一半。参阅 George E. Tayl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of Partnership*, N. Y., 1934, P. 90.

② 田村寿：《南洋华侨现势》，见《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第49页。

十。”^①华侨商业衰退，买卖困难，甚至要靠马尼拉中华商会的救济，才勉强维持营业。

再其次，是商业竞争的加强。一方面，菲律宾当局为着限制华侨的商业活动，除了通过立法限制华侨的营业之外，还以政府扶植的方式，鼓励菲律宾人与华侨竞争，如由政府贷款扶助菲律宾人的工商业，帮助菲律宾人的大公司与零售商建立有效的联系，组织团体推进商业菲化运动，如1930年由众议院议长曼努埃尔·A·罗哈斯为首建立的新卡蒂普南(Ang Bagong Katipunan)，1934年11月由马尼拉菲籍商人建立的民族经济保护协会(National Economic Protective Association，通称NEPA)。前者旨在“唤起经济上的菲律宾主义精神”，后者致力于推进“买菲律宾货”运动^②。菲律宾政府推行的经济菲化政策取得迅速的进展。据自治政府总统奎松在1941年的年度咨文中的说法，在1935—1939年短短五年中，菲律宾人在零售业中所占比重，已由15—20%升至37%^③。这就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华侨零售商的阵地。

美国人利用殖民特权，利用他们享有与菲律宾人同等权利的方便，运用他们雄厚的资本和现代经营知识，在控制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之外，也积极向菲律宾的内部商业发展。据赫尔穆特·G·卡利斯的估计，到第二次大战前夕，在群岛从事商业的各民族中，美国人在投资方面占第一位^④。

另一个巨大竞争对手是日本人。30年代以前，在菲日本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56页。

②Zaide,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241.

③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711.

④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0.

人^①绝大多数从事手工艺、农耕和捕鱼，只有少数人在较大的城镇从事百货零售和开设摄影店。输入菲律宾的日货，多由华侨零售店代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广大华侨同仇敌忾，在1931—1933年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为继续向菲倾销商品，并为侵略东南亚的所谓“南进”作准备，遂由政府津贴和保护，由日本的大银行家及大资本家在资金和商品方面给予支持，让日本商人在菲律宾建立自己的零售系统。因此，他们的百货店在全菲较大的社镇日见增加。这些百货零售店“远比中国人的店铺新颖和吸引人。日本人引人注目地陈列和经常更换各色各样的廉价货物，并以广告推销的方式推销。”^②面对日本人的竞争，华侨既没有国家的具体支持作后盾，在经营方式上又偏于个人的老式经营，也缺乏现代的管理技术，自不免难于维持原有的地位，以致日本人在零售业和批发业方面所占的比重相应地增大了。“目前的情况同1932年以前的情况之间的差别在于，在与华人商人的生意相应减少的同时，份额更大得多的日本货，现在经由日本零售商销售到菲律宾消费者手中”^③。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困难，华侨的经济力量还是有相当的发展。在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除本世纪30年代外，囿于统计资料的缺乏，笔者难以描绘出华侨经济的发展情况。但大致上可以说，前30年，特别是第一次大战至20年代这段时间，华侨经济力量有较快的增长，这从华侨零售店从1912年的8455家，增至1932年13 758家的变化中，可以看得出来。从1929—1933年经济危机

①1903年，在菲日人不足1 000人，1918年约8 000人，1939年29 262人，其中17 888人在达沃。

②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713.

③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714.

时起，华侨经济由于受经济危机的打击和各籍商人的有力竞争，加上华侨为抗日救国，一再发动抵制日货运动，不惜作出牺牲，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因而长期处于徘徊状态，以致在菲、美、日人经济力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华侨的经济力量相对缩小了。

30年代华侨经济阵地相对缩小，首先表现为投资总额徘徊不前。这可用几个统计、估计数字说明。

表2为日本学者福田省三对华侨1930年投资或资产额的估计数。其估计总数达109 011 500美元(1美元等于2比索，下同)，具体投资分类如下：

表 2

单位：美元

农 业	矿 业	工 业	商 业	金融业	其 他*
63 000	138 500	20 346 000	50 001 000	3 963 000	34 500 000

* 包括渔业、交通业、土地及其他不动产。

资料来源：高事恒《南洋论》，南洋经济研究所1948年版，第258页。

1932年，菲律宾内政局统计华侨各业投资总额为162 932 000比索(未含不动产)^①；如加上不动产方面的投资，当达一亿美元左右。同年菲律宾农商部的统计数字，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它同样未含不动产投资，也未计入银行金融业的资产，总投资即已达502 020 313比索，三倍于内政局的数字有余。其中仅零售业

^①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701.

一项投资，就超过福建省三商业项估计数五倍还多。如果说，经过两年，华侨在商业方面有大的增长，所以零售业投资猛增了，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当时还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华侨维持营业已属不易，怎谈得上增加投资。农商部的统计数字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表 3 外侨在菲律宾各业投资情况

(菲律宾农商部1932年统计) 单位：比索

类 别	外侨总投资数	其 中		华侨所占百分比
		华 侨	其他外侨	
零售商业		269 143 622		
米麦绞业	82 540 113	76 250 950	6 289 163	92.38
出口业	260 844 988	70 168 827	190 676 161	26.90
入口业	217 224 953	58 434 783	158 790 170	26.90
棉毛织品业	45 860 803	12 336 555	33 524 248	26.90
椰干业	19 861 346	9 594 892	10 266 454	48.31
麻业	13 060 695	3 019 491	10 041 204	23.14
木业	4 178 459	2 300 150	1 878 309	55
烟业	18 957 303	771 043	18 186 260	4
合 计		502 020 313	429 640 968*	

* 未含零售商业方面的投资。

资料来源：《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 》乙编，第41页。

大约同一时期，中国驻菲总领事估计：华侨的全部投资为100 500 000美元，即201 000 000比索。其分类投资见表4。这一

估计，同菲律宾内政局的统计数约略相等。

表 4

单位：比索

产 业	投 资 数	产 业	投 资 数
木 材 业	20 000 000	雪 茄 及 香 烟	5 000 000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10 000 000	肥 皂 及 蜡 烛	1 000 000
零 售 商 业	50 000 000	酿 酒	5 000 000
批 发 商 业	30 000 000	不动产及其他投资	80 000 000

资料来源：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701.

根据1964—1965年版的《菲华年鉴》援引菲律宾统计局的资料，1939年华侨资本的产业投资共179 821 000比索，（见表5），加上不动产及其他投资，大约二亿几千万比索^①。

上述福田省三、菲律宾内政局及中国总领事提出的数字，是相近的，是准确的。华侨投资在30年代最初三年，处于停滞状态，均稍超过1亿美元。到了1939年，投资也只增加几千万比索，其徘徊状态显而易见。

以上是从华侨投资历史对比（纵的对比）来说的。从华侨投资与其他国籍资本的对比（横的对比），也可见华侨投资在菲律宾投资中所占份额不大。如表5所示，华侨投资数，仅为美国人投资的60%，未及菲律宾人的1/3，只占总资产额的一个小份额——14.20%。另一个数字也说明这一情况。赫·G·卡利斯在

①根据1940年1月1日美国商业部编制的统计数字推算，华侨投资总额为230 000 000比索。见李国卿著、郭梁等译：《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表 5 菲律宾各种国籍资本的产业投资
(1939年数字, 按核定的资产额计算。单位: 比索)

部门	国 籍 产业投资		菲律宾人	美国人	中国人	其 他
	资产额					
商业	资产额	588 000	204 036	121 128	149 352	113 484
	%	100	34.7	20.06	25.4	19.3
制造业	资产额	356 000	197 224	66 572	26 344	65 860
	%	100	55.4	18.7	7.4	18.5
矿业	资产额	201 000	97 284	74 169	3 417	26 130
	%	100	48.4	36.9	1.7	13.0
运输业	资产额	118 000	76 110	38 232	708	2 950
	%	100	64.5	32.4	0.6	2.5
合计	总资产额	1 263 000	574 654	300 101	179 821	208 424
	%	100	45.5	23.76	14.24	16.50

资料来源: 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中译本), 第206页。
《合计》项系笔者所加。

《东南亚的外国资本》一书中估计, 太平洋战争前夕, 在菲律宾的外国人(华侨除外)投资, 总数为 315 000 000 美元, 即 630 000 000 比索^①。假定这时美国人的总资产额与1939年相同(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美国人即占这6.3亿比索的一半。又假定这时菲律宾人的总资产额仍停留在1939年的数目上(也是不可能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0 note 19; 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 第121—122页。

的)，那么菲律宾人的574 654 000比索投资，加上6.3亿比索的外侨投资，即达12亿比索。这样，华侨的投资——1939年的2.3亿比索，只及这12亿比索的19.17%，也只占一个小份额。若把外侨、菲律宾人、华侨的投资加在一起，则华侨的份额更小，仅占16.10%。

华侨经济阵地缩小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华侨社会的经济支柱

表 6 1912年菲律宾人及各籍侨民在菲律宾国内贸易中的地位
(1912年菲律宾税务局统计)

国 籍	(一)批发商数	(二)零售商店数	(三)售货价 值[比索]	(四)占总售 货值的百分比
菲律宾人	3 152	67 740	80 295 540	14.91
中 国 人	3 335	8 455	320 494 920	59.52
西班牙人	340	557	43 648 326	8.11
美 国 人	207	371	35 454 661	6.58
日 本 人	45	280	1 321 932	0.25
印 度 人	41	90	1 334 322	0.25
英 国 人	54	37	28 695 822	5.33
德 国 人	55	13	20 972 157	3.89
其 他	75	202	6 268 932	1.16
合 计	7 304	77 745	538 486 594	100.00

资料来源：叶绍振《三十年来菲岛国内商业并对外贸易》，载《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第四项数字为笔者所加。

——零售业份额的缩小。表 6 的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自那时以来，由于大战期间原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带来菲律宾商业的繁荣，使1932年各国籍零售商店数与1912年比，都有

了较多的增加（菲律宾零售商例外，数字见表7）。可惜未见1932年各籍商人在这方面的投资和销售额的数字。从店数可见华侨在绝对数字上增加最多，比1912年增加5 000多家。按增加比

表 7 1932年菲律宾各籍零售商店数
（菲农商部统计股统计）

总 数	菲律宾人	华 侨	日 本 人	印 度 人	美 国 人	其 他
72 003	56 758	13 758	719	198	276	294
100%	78.80%	19.20%	0.98%	0.27%	0.38%	0.40%

资料来源：《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丁编，第40页。

率则以日本人为最多，比1912年增加了289.4%。但自1932年起，华侨零售商因遇到前述种种困难，增长速度放慢，在全菲零售业中，在店数、资产或投资额、营业额（售货价值）诸方面所占的份额，都呈萎缩之势。表6、8的统计显示，在店数方面，华侨所占比例从1932年的19.20%降至1941年的12.42%；在销售额（售货价值）方面，1912年菲律宾人仅占14.91%，1941年升至占51.74%，华侨则从占59.52%减少到44.21%。

既然华侨的经济力量主要是在商业方面，零售业又在华侨商业中占有最大优势，因此，零售业阵地的缩小，必然影响到华侨整个商业以至整个经济在菲律宾商业和总体经济中的比重，如1939年华侨在菲律宾投资中就只占百分之十几。再者，尽管在菲律宾各经济部门中（除粮食加工、销售外），华侨在零售业部门传统上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华侨零售业在菲律宾零售业中所占的比例，据迄今公布的数字，最高为1912年，也只占总销售额近60%。

表 8 **1941年菲律宾零售商业单位资产与营业额统计**
(菲律宾调查统计局资料)

国 籍	零售商业 单 位	资 产 或 总 投 资 额		营 业 总 额	
		比 索	百 分 比	比 索	百分比
菲律宾人	106 617	200 323 138	55.82	174 181 924	51.74
中 国 人	15 356	118 348 692	32.98	148 813 239	44.21
其他外侨	1 646	40 187 090	11.20	13 630 239	4.05
合 计	123 673	358 858 920	100.00	336 625 402	100.00

资料来源：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第142—43页。

第一次大战以来，在国内外一直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在美国统治时期，华侨控制了菲律宾国内贸易(商业)的70—80%^①。第二次大战之后，此说甚至发展为华侨控制了菲律宾经济的百分之七八十^②。但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数字根据的；它只是人们凭在马尼拉一地所得的印象而形成的错觉，或者是别有动机者捏造

①叶绍振：《三十年来菲岛国内商业并对外贸易》，见《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D. R. William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N. Y., 1926, P. 15; 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697;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0;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21、23、59页。

②Michael McPhelin,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Shubert S. C. Liao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 184.

的神话。此说给华侨社会带来长期、消极的后果。本世纪30年代至战后，限制华侨商业活动的行政、法律措施有增无已，最后在菲律宾独立之后制定许多经济非化法律，在许多经济领域禁止华侨涉足。“华侨控制菲律宾商业说”捏造者、鼓吹者的目的终于得逞。

下面简要地谈谈这个时期华侨在菲律宾各项经济事业中的经营状况。

在菲律宾各经济领域中，华侨占主导地位的，有粮食（米黍）业、木业和椰干业。据菲律宾农商部的统计（这里暂且借用），华侨在三业中所占比重，分别为92.38%、55%和48.31%。

村田寿认为华侨经营米黍业占全菲的9/10^①。但据卡利斯的估计，在战前菲律宾的2500家碾米厂中，华侨占有75%。华侨碾米厂主往往又是银行家和贷款人。他们以自己的财力，大力资助稻米的生产。某一米厂通常收购某一特定地区的稻谷，价钱由米厂酌定。在稻谷收割之前，常急当地农民所急，预先借钱给他们，使他们度过青黄不接时期，到收购稻谷时扣还。华侨在米业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往往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他们一定会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对生产者压价，对消费者抬价，牟取暴利。一些菲律宾人，特别是政界人士，因此常对华侨拥有众多碾米厂一事横加指责。大概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洛斯巴尼奥斯农学院于二次大战前不久，在新怡诗夏省进行一次稻米购销的专门研究。调查资料表明，米厂主付给稻谷生产者的价钱，同大米的批发价相较，厂主赢利极微。以马尼拉的批发价来说，该省的生产者平均获得米价的37%，华侨碾米商得其余数额。但在厂商所得的13%中，4%为

①田村寿：《南洋华侨现势》，见《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第44页。

加工费用, 3.9%为运费, 2.1%为市场费用, 仅3%是厂主或批发商的利润。“调查结果显示, 华侨商人是以极低的价钱进行这种基本购销业务的”^①。商人从事某种商业, 当然是为了赢利; 但象华侨厂商那样, 兢兢业业, 精打细算, 不憚利微而从事对菲律宾国计民生如此重要的稻米加工、运销业务, 却是难能可贵的。甚至连菲律宾人和其它外侨也不大愿意从事这项利润极小的经营。这才是形成华侨商人在米黍业中所据有的地位的重要原因。其它原因还有: 华侨拥有完整的销售网, 米厂在马尼拉设有总店, 各地设有分店或派出机构; 米商组建了中华米商会(成立于1921年), 便于互助和调协; 资金方面也获得中兴银行等华侨银行或侨商的资助, 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无息的资助, 华侨商人也相互提供贷款。

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 为着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 建筑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新建筑物是用木料建成的。对木材的迫切需要, 促使伐木、锯木业的发展。菲律宾的许多资本和人力投进这一新兴工业, “但华侨被证明更具胆识, 特别在新开创木材工业的地方, 可以说, 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②。华侨在菲律宾木材业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在1901年全菲的46家木材厂中, 华侨开办的有21家(都在马尼拉); 其余分属菲律宾人、西班牙人、美国人和其他国籍侨民所有, 且大都分布各省。起初, 这些华侨木材厂依赖各省的菲律宾人供应原木。及后, 由于木材需要日增, 他们便把经营扩展到各省。到1935年, 在全菲的204家木材厂(场)中, 华侨拥有148家, 投资额达2 679 658比索。占木材业总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7.

②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90.

投资的88%^①。华侨的木材厂（场），除了在马尼拉外，也分散于宿务、怡朗、三宝颜、达沃、碧瑶、比干、拉瓦格、达古班、圣巴勃罗、卢塞纳和塔拉克等城镇。在木材零售业方面，华侨占有较大的比重。据海登说，每年投放市场的零售木材，华侨木商占40%^②。最大的华侨木材商是中兴银行大股东之一的李清泉。他从事植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等系列经营，创办一系列的有关企业，并获得显著成功，因而有“木材大王”之称。他在木材业方面的资本达1100万比索。

在华侨所从事的经济领域中，同菲律宾人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要算零售商业了。华侨的零售店遍布菲律宾城乡，甚至边远的穷乡僻壤，向广大土著居民销售、甚至赊销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

华侨零售商原来主要贩销中国商品。自欧美资本主义势力冲破西班牙人所紧闭的菲律宾大门后，西方工业品逐渐取代中国商品的地位。美国统治菲律宾后，更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向菲律宾销售工业品，使中国商品的销路大受影响。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日本商品大量向菲律宾倾销，充斥市场，又因价廉物美，适应市场要求，中国货不能与之竞争，以致华侨零售商经营的商品，90%是日本产品^③。

华侨批发商和厂商，通过自己的推销人员，或通过血缘、地缘的纽带，或通过零售商的采购人员，把货物供应给各地的华侨商人；而最小的华侨零售商则向各城镇的商行购备货物。因此，

①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91.

②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699.

③《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143页。

在华侨商人中形成从批货到销售的商品流通系统。直接或间接支配各省华侨零售商业的，是马尼拉的华侨商行。除列加斯比、宿务、怡朗、达沃、三宝颜、苏禄（即和乐）等处因与欧、美、日本有直接航线，华商货物可直接进出口外，各省侨商所需货物，都由马尼拉的华侨商行发货，而各省的侨商所收购的土产，也都汇集于这些商行，再集中出口。大商行与零售店之间，马尼拉等大城市的批发商与各地村镇的零售商之间，是互相依存的。

零售商也有大小之分。在较大的城镇，都有规模宏大，资本雄厚的华侨商号，其中有百货店，也有各种专业店，如布匹店、鞋店、珠宝首饰店、钟表店、铁器店、瓷器店、家私店、土产店、杂货店、食品店、药店、电器店和书店等等。这些大商号，几乎都是从小零售店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的；以后，更由大商号发展成商行，经营起金融、信托业务，甚至办起工厂从事商品生产^①。

华侨零售商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小零售商。他们之中以资本只有三四百、六七百比索者居多，少数人拥有一二千比索资本；还有小部分人，是凭信用、血缘和地缘纽带，从大商行赊购货物，或向华侨金融机构贷款，进行小规模零售业务的。这些小零售商，按其经营方式，又可分为坐商性质的小杂物店（漳州籍华侨称“菜仔店”，泉州籍华侨称“菜亚店”），货郎担式的叫卖商贩或“行脚商”，以及在公共市场中的摊档商贩三类。

经营菜仔店的小业主，在零售商中占压倒多数。菜仔店部分

^①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第189页。据滨田恒一援引的材料，华侨开设的工厂，在菲律宾占有重要地位。例如，1940年，在马尼拉一地的981家工厂中，华侨占有900家左右；其职工总人数的60%是华侨工人。滨田恒一：《南洋经济现势》，见《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第121页。

由个人、家庭经营，但大部分雇有一二名华侨或菲律宾人为店伙。菜仔店发售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柴、米、油、盐、酱、醋、酒、咖啡、糖果、火柴、纸烟、糕点、汽水、水果、肥皂、毛巾、牙刷、牙膏、文具、煤油等各种食品和日用品，也有兼售罐头食品、装饰品和纺织品的，一如解放前我国农村中的小杂货店。在菲律宾，除了北端海洋中的巴坦省之外，各省都有或多或少的华侨菜仔店，与菲律宾人或其他外国侨民所设的同类店铺并存。

表7显示的是30年代中期（大约是1934年）各籍人拥有的零售商店数，包括较大的商号，但绝大多数是菜仔店。

在菲律宾，华侨的菜仔店是经营得非常成功的。这可以通过很有说服力的数字显示出来。在表6、表8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不管是1912年还是1941年，从零售商店（绝大部分是菜仔店）数来说，菲律宾人都占有极大的百分比：1912年是87.13%，1941年是86.20%，但这一百分比同他们在营业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很不相称，分别只占14.91%和51.74%；而华侨在店数方面分别只占10.87%和12.42%，但营业额却占59.52%和44.21%。据1938年年底调查，全菲67 728家菜仔店（或称街角杂货店）中，菲律宾人拥有60 810家，在全部投资4 050万比索中占有2 200万比索，但营业额只得22 700万比索，反之，华侨只拥有6 881家店铺，营业额却高达35 800万比索^①。

华侨菜仔店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首先是由于这些华侨小商人富有进取心。对于华侨小商的这种品质，海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段精彩的描写，摘译如下：

① 滨田恒一：《南洋经济现势》，见《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第115页。

中国商人是具有非常精确判断力的开拓者，就象他们一向以来在东方许多地区一样。在他们对菲律宾边远地区的商业扩展中，……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1931年，笔者乘船、骑马和步行，经由现在被一条现代道路横切的路线，从哥打巴托到达沃，作横跨明达瑙的旅行。那条崎岖的小径穿过该岛中心地区（有时不得不用砍刀开路），在原始人居住的处女森林中蜿蜒盘绕。菲律宾官员坚持要为这次考察提供一支保安队护送。在原始地区中心，居然看到一片小店——仅有一张柜台，一打货架和一个睡觉的地方。华人店主不在家，但我们在小径上遇见他了；那时他正领着两名马诺波（Manobo）挑夫——他们背上扛着店主购回以供销售的微不足道的货物——走在从达沃回来的路上。这个华人店主正心甘情愿地回去的那个地方，既与世隔绝，复又危险；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日本人或菲律宾人愿意孤处这样的地方。这个先驱商人的进取心和决心具有典型性。这种进取心，已使远东的边远地区的贸易大部分落到华人手中。

潜藏于菲律宾华人商业成功后面的其他个人品质，对所有那些了解这个非凡种族的人都是众所周知的：活力、节俭、自制、肉体 and 精神的耐力、奋发进取、适应艰苦工作和忍受困苦无穷能量、坚强意志和天赋的商业才能，这就是已经推动华人在菲律宾及其他地方向前迈进的特有品质①。

其次，华侨菜仔店主善于克勤克俭地经营自己的业务，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又一原因。为了发展经营，店主及其家属，同心协力，起早摸黑，凌晨开店，午夜关门，营业时间长达十六小时或十八九小时。三更半夜，有人购货也有求必应。星期日也照常营业。他们对生活要求不高，总是节衣缩食，铢积寸累，把每一个铜板都投放到扩大营业方面去。

①Mayden, The Philippines, PP. 699—700.

再其次，华侨菜仔店主熟悉自己的顾客，给他们以方便，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菜仔店一般开设于城市的街角路口，村镇中心，以便家庭主妇购货。小店接近消费者，店主对所做的买卖，不管凡比索或一仙，不管是整购或拆零，也不管是现款交易或赊欠，同样欢迎。平时对顾客也是谦虚忍让，和善有礼，因而甚为顾客喜欢，生意也比一般菲律宾人的同类小店要好得多。那些远离公共市场的当地人，从其附近的菜仔店，可以购买其全部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无现款，可以赊购一两天的食品；遇到养活家口的男人失业，还可记帐赊购，取得全家所需的食物，待到有了工作，领到工资才还帐。也常有领周薪的人，平时赊帐，周末发薪时才还钱。对于有特殊困难的人，华侨店主还常常给以贷款，以供急需。一些华侨菜仔店，在出售日用品和食品的同时，还兼收购当地的土产品；如烟叶、椰干、麻等，使生产者能够就近销售其产品，得免长途运销和寻觅产品销路的麻烦。这对生产者来说，又是一种方便。

遍布各地的华侨菜仔店，形成巨大的销售网。它们不仅与各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菲律宾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华侨经济力量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成为经营二三盘生意的华侨店、行的商品的直接推销者，是全部华侨零售业伸向各地的触角。华侨工业产品，著名的如酒、烟、油类、肥皂、蜡烛、木屐、汽水、化妆品（珠细里）和饼食糖果等，大都靠菜仔店推销。因而，对于华侨工业的生存和发展，菜仔店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还有，这些菜仔店对华侨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使相当大批华侨获得生计。据统计，30年代初期，马尼拉及其近郊有华侨菜仔店2800多家，每家少者一人，多者三人，平均2.2人，共容纳华侨至少5000多人。如果以这样的比例计算，全菲1万家（剔除较大的零售商

店)，可容纳2万余人；若以正常情况下有15 000家计算，更可容纳3万人。这还只是菜仔店本身能容纳的人数，若连与菜仔店有直接间接联系，且靠它们推销其产品的200多家华侨工业制作厂（1932或1934年马尼拉一地的工厂数）的雇用人数计算在内，它们所维持的就业人数就更大了。以最低数字计算，每家工厂雇用15人，就共有3 000多人。菜仔店直接间接维持着二三万人的就业机会，这个数字，占那时菲律宾卫生局所统计的71 000华侨的40%。此外，菜仔店还是在菲律宾推销中国国货的基本单位。由我国输入菲律宾的食品、日用品，大半是由菜仔店代销的。

有一些零售商贩，肩挑背扛着少量的日用品，沿街、沿村叫卖。这包括被华侨称为“行脚商人”的山东人。他们昼里背着国产布料——山东绸，沿途叫卖，或为人量身，用这种布料给华侨、菲律宾人做衣服；但他们的顾客，更多的是喜欢这种绸料的欧、美侨民。据说，行脚商人每天可做二三十比索的生意，和大多数菜仔店每天的营业额差不多。

在公共市场中设摊摆卖的华侨摊商，主要集中在马尼拉等大城市。他们经营副食品，如鲜肉、杂货、蛋、蔬菜、蒜头、水果、干鱼、面、豆腐、糖果、咸菜、米、点心、咖啡、冻肉等。1940年，在马尼拉的10个大公共市场中，华侨摊商共有854家，设有摊位2 765个^①。他们的生意，规模虽小，资本也有限，但对于马尼拉市民及华侨社会，却关系重大。由于他们经营市民日常的主副食，因而直接影响着市民每天的生活；一旦他们的营业受到障碍，主副食无法正常供应，市民生活就大感不便。1940年，马尼拉的市场华侨摊位的华侨雇员共达2 159人，连同直接间接依靠这种业务经营以维持生活的华侨，人数可达八九千

^①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07—608页。

人^①。这在该市的华侨总数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在菲律宾进出口贸易方面，华侨经营者所占比重不大，估计数从13—26%不等。经营出入口业的华侨商行，有的创设于19世纪后期，大多是在美国统治时期创办起来的。进出口商大多资本雄厚，且兼营金融业或商业、航运业。他们的业务也不限于菲律宾某一地方，在各重要岛屿和我国著名商埠，都设支行或分公司。他们向我国出口菲律宾的木材、麻绳、烟草、雪茄、椰油、水果和用以酿制酒精的糖汁，向美国输出糖、烟叶、椰干和麻；由我国输入食品和纺织物，由美国进口面粉、洋葱、马铃薯、纺织品、钢铁、机械，由越南进口大米等。为方便在菲收购土产品、运销进出口货，一些大进出口商行还自行置备大小轮船，少者一艘，多者几艘。如总行设在马尼拉并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瑙等地开设30多个分支行的洽成行（杨嘉种），备有大轮“孙獭号”、“仙厘龟叻号”，另有小轮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业的先驱；泉益行（施光铭）则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郑正益行（郑焕彩）在其“航业部”自置轮船五艘；一般进出口商行都备有小轮或帆船，川走于菲律宾各岛，进行运输业务。

一些大的华侨进出口商，也是从经营小生意发展起来的。杨嘉种继承其父杨孙獭的菜仔店后，锐意经营，最后发展到在马尼拉拥有总行，在菲各地开设多处分支行，成为侨界巨商。另一大进出口商吴记蕃（1866—1932），先是在一家资本3000比索的侨店任经理，因善于经营，使资本在12年中增至300余万比索。吴记蕃从中分得100余万比索，便独立经营。未几，在马尼拉创办“吴记蕃进出口公司”。在经营进出口业务之外，该公司还办

^①刘芝田：《中非关系史》，第607—608页。

有义源布庄、长江椰油厂、丰年麻袋厂、勤农肥粉厂、竹林纸囊厂、汉冶萍铁钉锌线厂、丰利制造食品豆油厂，在国内也设有上海嘉福行、铁钉厂等企业，还在上海、厦门、福州、汉口等城市设该公司的代理行。

华侨的金融业，主要是由于华侨工商业的发展及侨社的需要而发展起来，为侨社服务的。据30年代我国驻菲总领事的估计，华侨在金融业的总投资共达2 000万比索，在所估计的各类投资中占第五位。这类业务，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汇兑和信局，主要办理华侨与国内之间的信、银来往。从事汇兑信局的，在30年代初，仅马尼拉一地，即有大小60多家，其中有专业商号，例如万里信局、文明行、华南信局等。也有出入口大商行，利用业务上或因自有船只航行于中菲间等方便，兼办汇兑信局的，如马尼拉的谦顺行，主要经营糖、米、杂货出入口，但兼营漳、泉“汇兑唐信”业务；郑正益行既有土产、米业、出入口、航运各部，还设汇兑部，专营香港、上海、厦门等地的汇兑。二是保险业。专门从事这项业务的，有益同人（邱允衡）和贻记公司。前者接受水（海上）、火保险，并为侨商贷款作担保，后者接受水、火和汽车保险。三是银行业，这是华侨金融业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菲律宾华侨办的银行，有中兴、华兴、民兴三家，都设在马尼拉。华兴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China*）创办于1924年1月，股本200万比索（实付100万比索），危机前在北京、上海、香港、厦门、爪哇、印度、欧、美都设有代理。该行在危机期间并入中兴银行。民兴银行也在那个时期关闭。结果只有中兴银行（*China Bank Corporation*）仍维持下来，成为菲律宾华侨经济的中坚。华侨的大商行、小店铺，无不同中兴银行发生联系。该行由李清泉、薛敏老、黄奕住、吴记鑫、陈迎来和邱允衡等华侨商界著名

人士发起，于1920年创办。最初只有资本290万比索（总资产达974万比索），在以后13年中，资本一直超过500万比索（只有1921年是497万比索），但总资产在1921年即已达2 132万比索，1933年为2 476万比索，1937年为2 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关。中兴银行在全菲银行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31年，全菲各银行总资产为24 181万比索，中兴银行总资产为2 408万比索，占全数的9.96%^①。

华侨在不动产方面的投资，战前只限于营业和生产的厂、房及有关设施。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交通阻塞，侨汇不通，一些华侨便把本应汇回国内赡养家口的资金，除了用于企业投资、扩大营业之外，相当部分用于购置不动产。这样，至1938年，华侨拥有不动产即达6 000万比索。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完全不通，加以在日军占领下，菲律宾经济、生产几陷于停顿，投资企业已属不可能。与此同时，不少菲籍产业主为了维持生活，廉价出售其城市地产。根据1935年的菲律宾宪法，除美、菲公民外，外侨一律不得拥有公私农地；矿山林地属于国有，只能租让与菲、美公民或非公民在其中拥有60%以上资本的公司。城市地产、工商业及住宅用地，都未列入上述规定，政府仍准外侨购置。1939年以后，华侨对于城市地产、工商业及住宅用地等项不动产的投资，肯定有可观的增加。

在结束本节以前，顺便谈谈闽、粤籍华侨的行业分布。

菲律宾华侨，大体上闽籍占80—85%，绝大部分来自泉州地区（占90%），漳州地区占的比例很少。粤籍占15—20%，主要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37—38页；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0.

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南海等县。此外，还有少数华侨来自上海、山东、北京及其他地方。

闽籍华侨由于移居菲律宾较早，人数较多，在菲从事商业的历史又较长，因而多从事商业，在侨社中资本较为雄厚，掌握着重要商业，在工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居于支配地位。作为华侨工商业支柱的中兴银行，是由闽籍华侨控制的，他们占有华侨所拥有的零售商业的85%以上，在华侨出入口总投资额128 603 610比索（按1932年菲农商部统计数字）中占99%。其他如纺织品、土产、木材、家具、铁器、米业等等，也多为闽侨经营。粤侨多是在香港、澳门与马尼拉通行轮船以后到菲的，在菲历史较短，经济基础远不及闽侨。他们经营的行业主要是饮食服务业，如酒楼（占侨办酒楼的90%以上）、旅馆、面包、裁缝、洗衣、理发；手工业，如木作、藤织、工艺品等。他们也从事药材、杂货、汇兑、印刷、造船、出入口业，其中杂货业，主要是采办粤侨所需要的广东商品。汇兑业也如闽侨的汇兑业一样，限于为本省、县、区、乡的华侨服务。

三 华侨团体组织的发展

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社会没有全菲性的团体，仅存在个别商业行业公会、秘密会社和按地缘、血缘组织的若干同乡会（如广东会馆）、宗亲会（如龙冈公所）。这在第十章已有详细论述。

美国统治之后，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在中国国内，民族意识日益强烈，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华侨一方面受到侨居国政治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又直接间接地受到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因而民族意识进一步发展，政治觉悟也逐

渐提高，并激发起组织团体的要求。再者，西班牙统治的结束，甲必丹制度的废除，解除了禁锢华侨社团活动的枷锁，为他们组织团体提供了可能性。随着菲律宾人参政范围的扩大和独立运动的进展，一些政治活动家为着某种政治目的，不断提出针对华侨的立法。随着经济上菲化运动的步步推进，华侨在经济活动方面受到的竞争和限制日益增多。整个华侨社会都面临着比过去更加复杂的形势。旧的经营方式已不适应新商战的需要；而华侨商业要在新的商战中生存下去，是非要赶上新的商业潮流不可的。这就要求华侨克服过去漫无组织的状态，团结互助，必要时进行有组织的抗争，以维护侨社的利益和侨胞的生存权利。因此，在美国占领菲律宾后不久，特别是自20年代起，侨社中各种团体组织，便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整个侨社的空气也为之一新。

在1900年至日军占领菲律宾之前的41年间，华侨建立的各种社团，大体上包括商会、工会、同乡会和宗亲会以及地区的侨团、慈善、互助、青年、文化等其他团体组织。其中尤以遍及各地的大小商会为多数。这是与菲律宾华侨社会主要是商业社会，而商业领域又存在着激烈竞争的情况相一致的。

美治时期，在各商会团体中，率先成立的是马尼拉中华商会。它一成立，就起着推动全菲各地华侨商会团体开展组织活动的作用，并享有全菲华侨社会领导机构的地位，成为华侨商业和整个侨社组织的中心。

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侨商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感到有组织商业团体的必要。起初，他们曾建立福建会馆，但会务毫无进展，并很快陷于停顿。有鉴于此，著名侨商邱允衡出而提倡组织纯粹商业团体，以应付新环境的要求。这一倡议立即得到陈清源、叶其蓁、林文质、施光铭、林杰生、杨嘉种、杨尊亲、林安

邦、许孝鸣、杨汇溪、薛清垵、黄呈标、庄天来、郑焕彩、邱奕经、郑汉淇、吴克诚、林为亨、洪明炭、孙高升等20名侨界著名人士的响应。成立商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04年，开始筹划组会，征集会员。8月间，马尼拉中华商会^①宣告成立。它“以发展华侨商业为唯一的谋求，以华侨福利为当然的努力，至于对内对外感情联络，更是不能须臾忽视”^②的。

中华商会的会员有三类：同业公会会员，即马尼拉华侨各业同业公会，作为集体成员参加中华商会；商店会员，即马尼拉商店、工商业公司、行户由华侨创办经理者，或华人股本过半数者；个人会员，即马尼拉之华籍商人或外籍华人。

从名称及会员构成看来，马尼拉中华商会是一个活动范围似乎局限于马尼拉的“纯粹的商业团体”。其实，中华商会是华侨商业的和整个华侨社会组织的中心，它的活动包括商务、侨社两个方面。在该会历次章程中，都以维持华侨商务，保护华侨利益为宗旨。尤以1927年重订的章程规定得最为明确详备：一、保持菲岛华侨利益；二、发展菲岛华侨商务；三、联络华侨团体感情；四、增进华菲国际贸易^③。二、四项明确该会的商务职能范围；一、三项则标示它对整个菲律宾侨社承担的责任。

关于这个商会的商务活动，1931年5月修订的章程开列为七项。一、关于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二、关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三、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四、关

①1904年成立时称小吕宋中华商务局，1906年更名为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1927年5月8日改名菲律宾中华总商会，1931年5月24日才用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名称。

②《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页。

③《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6页。

于工商业统计之调查及编纂事项；五、关于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六、关于工商业之证明及鉴定事项；七、关于商品之征集及陈列事项^①。此外，对危及华侨工商活动的菲律宾有关法案，还进行有组织的抗争。

在有关侨社生活方面，“上而国家民族的兴衰隆替，下而边隅海陬每一侨胞的荣枯得失，无不与该会息息相关”^②。对菲律宾华侨，它有保障其安全和权益的责任。中华商会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来为侨社服务。

一方面，它为首或协同侨社其他团体展开国民外交，不仅向我国驻菲总领事，而且向菲律宾政府和公众转达华侨的意见，为当地的慈善公益事业募捐相当大量的款项，促进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对菲律宾政府、议会对华商的限制措施、立法，以及对入境华人的歧视和苛待，对加诸华侨的诽谤、诬陷、暴力行为进行抗争，为华侨争取合理的待遇。例如，它一再抗议菲律宾海关对入境华人的苛待；从1909起至30年代领导侨社抗争簿记案；协助消弭1924年的排华风潮。1939年，物价波动，菲律宾当局为厉行物价管制，又订价过低，华侨损失奇重，经中华商会交涉，才获较合理定价。

一方面为侨社本身的福利展开活动。例如募集基金，以用于侨社各项事业，特别是慈善、教育事业。它维持着一个华侨学校系统，一家现代化医院（崇仁医院），一座公墓（华侨义山），若干设备完善的交际俱乐部，主持善举公所。对侨社面临的重大困难及其他问题，中华商会也着力解决。在1929—1933年的经济

①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9页。

②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五十周年纪念刊》，转引自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第196页。

危机中，华侨商业衰落，它组织华侨商业救济委员会，设法挽救华侨经济免于衰退。1938—1939年，因菲化政策的推行，华侨商业地位日益下降，加之华商内部缺乏完善的组织，对外又缺乏有计划的联系，以致各商业行业面临困境。中华商会乃发起与领导华侨商业复兴运动，颇著功效。此外，中华商会在排解侨社纠纷（1934年还在会内设立“会员纠纷调解委员会”），改变侨社奢侈风气和不良习俗，提倡俭朴运动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国家、民族，中华商会也尽力履行神圣义务。平时，为赈济国内灾民，为国内其他慈善事业，屡次募寄巨款；遇重大国难或国耻，中华商会则发动华侨爱国运动，予国内斗争以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日益深重。由于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影响，中华商会对国内革命缺乏正确认识，主张“国府”派兵“剿共”；但对日本的侵略，对伪满的成立则态度鲜明，主张“制裁暴日”，“勿轻易议和”，在菲律宾华商中也组织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国内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中华商会甚至冲破国民党的控制，仗义执言。例如，1935年7月，《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重判系狱。中华商会通电指斥该案判处“之不当处”，且“电慰杜重远，及汇银1 000元为彼之援助，并请其力争抗诉”^①。1931年9月和1936年8月，两次同侨社各商会、团体，“通电国内各当局”及国民党中央，吁请和平、统一，“共赴国难”^②。为推动祖国的抗日斗争，中华商会还于1931年10月“为九一八而组织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71页。

②《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7页；《菲华侨吁求和平统一》，载《时事月报》，1936年8月号，第58页。

救国会，捐助义军国币20万元”。1933年1月“函请会员节省年餐酒席，以助义军”，3月“代电请全菲侨胞赞助华北战费”^①。对救济抗战难民，商会更不遗余力，其中不乏动人事例。1937年8月13日沪战发生后，中华商会与我驻菲总领事馆配合，请菲政府特准战难妇孺来菲避难。结果，有5656人在商会担保下得入菲境安顿^②。

到30年代中期，菲律宾各重要省市也有了自己的商会系统。但各省华侨商会组织情况参差不一。华侨较少的省份，华商也较少，一般难于建立各行业商会，只组织包括各业华商的总商会。华侨众多的省份，则因实际需要，由数市镇的侨商组成地区总商会，再由各地区总商会联组成省总商会。这些省总商会，多称中华商会，也有用其他名称的。地方中华商会同马尼拉中华商会虽无隶属关系，但一般都接受马尼拉华商会的指导和号召，它们的会章，也是按马尼拉华商会的章程制订的。各省市的中华商会，也就是各省市华侨社会的领导者、当地侨社的领袖侨团。地方华商会的活动内容，也与马尼拉中华商会原则相同，只是前者的活动限于一定地区范围，而后者则具有全菲性罢了。

菲律宾华侨中，产业工人为数不多，且大多受雇于华侨厂主创办的企业，与厂主多有亲属或同乡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工人运动高涨，华侨工人也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如华侨工人联合会、华侨工人东庆堂（1920）、华侨洋衣工团（1926）、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1926）和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1937）等。苏禄华侨工人也在1931年建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7、68、69页。

②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第198页。

立华侨工友社。关于华侨工人联合会的成立时间，笔者无法提供具体年代。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大事记中，第一次提到该组织，说联合会在1920年8月召开大会讨论九小时工作制问题，中华商会还派出代表参加大会^①。另据颜文初披露，华侨工人联合会（颜称之为华侨工党）在1919年“党务十分发达，努力自建会所，推广分会，组织报馆（按指《平民日报》），开办学校（按指华侨公学），具有蓬蓬勃勃现象。”^②这说明：一、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已有若干行业工会组织，以致需要建立联合会，调协活动；二、会务既已如此蓬勃，足见它建立经年，并非1919年始。30年代初，又出现菲律宾华侨工人协会（或称菲律宾华侨总工会）。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华侨劳工领袖许立为首将工人协会改组为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其成员包括全菲华侨各业工会，如铁工、餐馆、酒厂、糖厂、家器、拖鞋、洋衣、理发、店员等37个工会。它号召爱国团结，反对日本侵略，发动全菲各业华侨工人、店员，建立和发展各自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救亡活动，支援祖国抗战事业。它还推动成立了店员救亡协会、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创办《建国报》、建国中学、民族夜学和国防剧社，并动员爱国青年回国参军参战，或到延安学习。在30年代，劳联会与马尼拉中华商会、洪门联合总会、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所属各团体，并列为四大侨团。

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华侨社会中的同乡会、宗亲会出现较早，但在菲律宾，除广东会馆、龙冈公所这两个粤侨组织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2页。

②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报纸事业》。见《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外，这类团体是在美治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同乡会，宗亲会大都存在于马尼拉，少数在外省；或总会在马尼拉，外地设有分会。这是此类团体的特点之一。另一特点是这类团体的成员乡籍较集中，一乡一姓，或数乡同姓的情况很普遍，不仅宗亲会是血族组织，同乡会也大都具有血族性质。因此，宗亲会比东南亚其他侨社要发达、有力量。第三个特点是粤侨的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成立相对早于闽侨。这可能与粤侨来菲较晚，人数较少，更需同宗同乡间的互助有关。宗亲会的主旨是“敦睦宗谊，促进团结，共济互助，同谋福利”^①。具体地说，一是联络亲谊，利用每年祭祀祖先，召开会员大会或联谊会，集拢一起，举行聚餐联欢，借以联络感情，加强血族联系。二是扶助困难，救济贫病老弱，为在菲贫困族人介绍工作，给予物质或经济支持；给族人中的贫病者施医济药，给穷困的死者赠棺资葬；协助老年族人回国，免致老死异邦。三是排解族人间的纠纷。四是促进族人接受学校教育，为本族增光，如对学业优秀者发给奖学金，对贫苦学生给予助学金。宗亲会也关心家乡的公共福利事业，如发展侨乡教育，建桥修路，修建宗祠，捐款救灾，购械保护家乡等。同乡会也具有与宗亲会相同的任务，但宗亲会一般着重促进在菲族人的共同利益，而同乡会则着重推动侨乡的公共福利事业。闽侨不少同乡会最初缘起，就是出于家乡办学的需要，其中一些同乡会，就是由校董会扩大、发展而来的。

侨社的第四个大的团体组织系统，是洪门组织系统。关于菲律宾华侨的洪门组织，迟至19世纪末年，才有明确可信的记载。1899年，30名粤籍华侨自美国移居菲律宾，组织洪顺堂。不久，洪顺

^①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台《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42期。

堂改名为义英堂。后来，义英堂中的福建人（占该堂300人中的200人）于1902年另组义福堂。1912年，义福堂改组为统一党马尼拉支部；1914年更以中国进步党马尼拉支部的面目出现，亦即洪门进步党的前身。由此以至30年代，又成立菲律宾洪门致公党、菲律宾洪门秉公社、菲律宾洪门竹林协义团和菲律宾中国洪门协和竞业社等一系列组织。1935年8月间，各洪门团体响应祖国团结抗日的号召，经过协商，联合组成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会总会，配合祖国抗日战争开展活动，并创办洪光学校、尚武国术社等，以传播中华文化。

菲律宾华侨社会还存在众多组织，包括综合性团体（如华侨联合会）和工商、青年、音乐娱乐（如桑林、丝竹两大系统）等联谊团体，推进华侨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教育团体，在侨社推广普通话的国语研究社。还有若干慈善团体，主要是马尼拉的善举公所和宿务的兼善公所。马尼拉的华侨义山、崇仁医院（兼办有附设护士学校）、华侨养老院，是善举公所属下的重要慈善机构。兼善公所也办有华侨义山和崇华医院。

四 华文报刊业的发展

侨社报刊业，是适应华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侨社民族意识的萌发和提高；反过来，报刊业的兴起，又推动了华侨经济和侨社民族意识的发展。

华侨报业的倡导者和先驱杨汇溪（字怡洪或维洪，1852—1922），福建海澄人。幼入里塾，修国学。17岁渡菲，仍涉猎经史，并攻习西班牙语和英语，因而精通中、西、英文字，被侨界推崇为“三枝笔都会写”的杰出人才。不久，他被陈谦善罗致，任甲必丹办公署秘书，专办文案外交。在公务活动中，他认识到

报纸在促进侨社的凝聚力和福利方面的重大意义。当时，菲律宾虽有华侨数万人，但侨社之中，完全没有舆论机关。他倡议办报，但未获响应，乃在陈谦善等人支持下，毅然于1888年独资创办侨社第一份报纸——《华报》，自任出版人、经理、编辑、记者和翻译，并特聘香港陆伯州为社外记者，撰写社论，日出十六开四版。办了一年多，便扩股集资，购置字粒和印刷机，并改组为《岷报》，由陆伯州任总编辑，继续以同样版式出版。侨社办报，困难重重。华侨群众，虽大商巨贾，文化水平甚低，商业簿记，信札往来，多由别人代劳，一般劳苦侨胞，文化更低。所以，报纸发行量极其有限。发行量既少，刊登广告者稀，报纸难以自立。《岷报》只办了几个月便告停刊。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杨汇溪坚持办报近两年，其毅力及事业心之强可想而知。

在《岷报》停刊后的九年中，没有人再敢办报。继后出版的四种报纸——《益友新报》、《岷益报》、《警铎新闻》和《公理报》，都是适应国内或侨社政治斗争的需要出现的。

戊戌政变（1898）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南洋一带奔走呼号，号召拯救国家危亡，鼓吹君主立宪，提倡组织“保皇会”。菲律宾部分华侨在马尼拉组织保皇会。粤侨潘庶蕃于1899年创办《益友新报》，作为马尼拉保皇会的机关报，为君主立宪主张造舆论。潘庶蕃自任该报经理和编辑，并自行置备印刷机和字粒。这个报纸的编排、内容和篇幅，比过去的报纸都有改进。但该报也备尝艰辛。开办一年多，不得不改组为《岷益报》，以图支撑下去。这样，它以原班人员，又办了几个月。最后，由于保皇会会员星散，又遇两名印刷工人回港，《岷益报》无法继续出版，于1900年停刊。

华文报纸，出版固然困难，但偌大一个华侨社会，确实需要华文报，以便了解市场和各种商品行情，了解侨居地政府法案、政

令以及市政条例、税则。为适应这种需要，杨汇溪于1905年初要求当局允许一名编辑、一名副编辑和五名排字工人进入菲律宾，以便再办一份中文日报。这一请求于同年10月获得美国陆军部的批准。但新的报纸直至1908年才创办起来。

这份新报取名《警铎新闻》，它是在侨胞爱国热情高涨，团结御侮的形势下诞生的。

1907年，清政府为考察南洋经济情况，宣慰华侨，派农工商侍郎杨士琦乘“海圻”号巡洋舰，历游南洋各埠。马尼拉华侨为该舰来访做好欢迎准备。这年11月上旬，该舰驶进马尼拉湾，停泊于海湾海面。久受外人欺凌的菲律宾华侨，热情勃发，从华人区倾城而出，前往海边欢迎和瞻仰。战舰的甲板上，从凌晨至黄昏都挤满参观者。这件事在侨社中激起了炽热的民族感情，加深了华侨与母国的政治联系。可就在这个时刻，马尼拉西班牙文报纸《商报》（El Comercio）却以殖民主义老爷的态度，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华侨的政治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大泼冷水，嘲讽中国的战舰是用“西方的”钢铁和“中国的”马口铁混制的，在敌人的首轮炮击中就会支离破碎。华侨认为《商报》的言论是一种民族侮辱，十分愤慨，纷纷以退订对该报进行抵制。此事也使到华侨知识界和侨社领导层痛感非有华文报纸，无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便由中华商会出面招股，集得资金8000比索，购买《岷益报》的设备，筹办华文报纸。面对华侨的抵制行动，《商报》先是以查办煽动者，并通过起诉，追回损失相恐吓；恐吓无效，便以辞退主笔为让步，希望借此恢复华侨订户。华侨毫不退让，抵制如故，使《商报》从此一蹶不振。

《警铎新闻》在胜利声中诞生。这份中文报纸以王汉全为总理，以原中华商会董事陈三多为义务经理，聘中西学校校长施健庵兼任总编辑，福州郭公阙为社外记者。该报办报态度严肃。它

尽力鼓励华侨关心祖国政治，鼓舞侨胞的爱国热情。

直至这时，菲律宾华侨报纸仍处草创时期。虽有不少人认识报纸在提高民智，传播经济、社会信息方面的重要性，且不乏有办报、支持办报激情者，但对华侨报纸如何针对侨社的特点、侨胞的觉悟和文化水平，如何适应侨界的需要等问题，经过20年的办报实践，仍未获解决。《警铎新闻》由于未能照顾侨众对了解经济消息和市场行情的要求，其办报的严肃性又脱离大多数侨胞当时的觉悟程度，以致多数华侨认为，阅读这份报纸费时间误业务。因而，该报虽极便宜，且有中华商会极力联系订户，但在全菲也只能销售400份。它一直为生存而努力不懈，但终究难以维持而在1909年停刊。

从1909年起，国内革命浪潮迭起。为配合这种革命形势，革命党人在南洋各地侨社中发动群众，支持国内革命。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先后派遣冯自由、宋震、胡汉民、李箕等到菲律宾各地，向侨胞宣传革命，鼓吹成立阅书报社，秘密吸收同盟会会员，提倡就地办报，也向侨界筹募革命经费。辛亥革命前夕，有关国内革命运动的消息，迅速和持续不断地传到菲律宾，但其真实性却无从证实。辛亥革命爆发后，侨胞迫切盼望了解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事。但他们只能从香港《中国日报》、东京《民报周刊》、上海《天铎日报》和《民主日报》等革命报刊了解革命发展情况；但这些报刊传到马尼拉时，其报道的时事新闻早已时过境迁了。马尼拉的外文报纸，对中国革命的消息虽时有刊载，却又语焉不详，且又非每个侨胞都会阅读。所以，马尼拉同盟会支会的阅书报社，只好每天将专电译出来，印成传单，分发侨众，聊以济急。

1911年10月，由普智阅书报社发起并负责出版小型报一份，定名《公理报》，甚获侨胞欢迎。第二年，更招集股份，扩大组

织，成立“公理报印务有限公司”，添置设备。几经筹备，《公理报》终于在1912年8月3日以四开八版的大报面目出现。该报同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厦门和国内其他大城市，建立定期通讯联系，收集各种稿件，丰富报纸内容。又吸取过去五家华文报失败的教训，为在经济上能自立，以2/3的版面用于登载外商广告。客观上，这时侨社教育事业（小学、中学和成年教育）已有发展，侨胞文化水平亦已有所提高，报纸订户也就日益增多。这都为《公理报》长期出版准备了条件。

《公理报》创办时是同盟会菲律宾支会的机关报。不久，随着支会改为国民党马尼拉支部（1926年又改为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它就成了国民党在菲律宾的党报。《公理报》创办之初，由于有一批中青年作为中坚，又有叶楚伦、吴宗明、颜文初等作为主笔，思想激进，政治立场鲜明，在与保皇派的斗争中，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都颇有贡献。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该报就成为蒋党的喉舌，完全丧失其初期的革命精神了。

自《公理报》创办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侨社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报业也一时达到全盛期。这期间，除《公理报》外，先后出现了17种华文报，不少年份有四五家，甚至六家报纸同时发行。但除《公理报》、《民号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四家之外，一般都只办几个月，一两年或两三年，即因各种原因而停办，其情况有如走马灯，随现即逝。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仅存《公理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新中国报》和《中山日报》五家。日军占领菲律宾后，这几家报纸被标封，停止出版。至战后能够复办的，就只有公理、华商、新闻三家了。

侨社各报，在启迪民智，提高侨胞爱国热情，促进侨社福利

事业和发动侨胞关心国家大事等方面，都起着良好作用。颜文初先生说，“大概好名观念，人所共有。报纸根据这点心理，本记者应尽天职，发为指导与鼓吹的言论，那所得效果很是不少。历来如华北旱灾、五卅惨案、国军北伐，华侨竭诚输将，每次皆在十数万以上。又如各处学校及慈善事业种种建设，一经派员到此募款，多得良好成绩。论起提倡之功，各报记者，应列在第一位。”^①说华侨“竭诚输将”，是出于“好名”，未免抹煞了侨胞的爱国爱乡的热诚；但所说的报纸“指导与鼓吹言论”的作用，记者的功劳，却是应该大加肯定的。

菲律宾华侨出版的期刊，发创者当推马尼拉华侨中西学校办的《教育丛刊》和《教育月刊》。两刊都创办于1917年，均以提倡华侨教育为宗旨。以此为起点，各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不定期刊等纷纷刊行。刊物的种类既有教育的，也有综合、学术、艺术、戏剧、小说、工商、画报等种类。办刊的地方，也由马尼拉发展到宿务、怡朗、三宝颜、达沃等城市，数量总计近50种。但这些刊物持续时间都不长，或者两年，多数不数月或不数期，随即停刊。可见，办刊比办报要困难得多。究其原因，如颜文初先生所分析，一是没有招登广告，经济不能自主，出版若干时间后，资金用完，刊物也随之结束。二是多数侨胞忙于业务，没有时间阅读大块文章，故订户稀少。三是编辑和办刊人多是兼职，无法专心办刊，锐意经营。

五 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西班牙统治时期，无所谓华侨教育。华侨在菲所生子女，幼

^①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报纸事业》。

年受西班牙、菲律宾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薰陶，接受教区僧侣的宗教教育。及长，华侨父辈才教习以经商方式，记账方法，工艺技术；极少数人上教会办的高等学府，如托马斯大学。待至父辈老死，这些侨生子女的大多数人，即以菲律宾人的身分接受家产，继承父业。结果，华侨第二代即完全为土著社会所吸收，成为菲律宾社会中最能干、最有知识的阶层，在利害上与华侨存在矛盾、冲突，甚至有羞认华侨为父，羞认自己为华人的。

19世纪中期以后，较有远见且较富有的华侨，将其侨生子女送回祖国，或延聘国内塾师在家授业，使之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沐受祖国风俗习惯的洗礼，因而在身分上认同于中国，与侨社水乳交融，终身保持中国人的气质；但这毕竟是极少数。那时，侨社得以持续不衰，全赖新客的不断补充。

美国统治菲律宾以后，严禁华工入境。虽然历年仍有违禁入境的，但新移民相对减少。赖大量新移民补充以维持华侨社会的存在，遇到新的困难。但在新的情况下，侨社不仅维持下来，且仍有发展。这除了华侨商人眷属准许入境，华侨人口得以自然繁衍，侨社民族意识逐渐增强，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侨社宣传媒介的兴办及其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华文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由于华文教育的发展，使相当大比例的华侨青少年，在接受华文教育后，成为侨社的新鲜血液，与每年来菲的新移民一起，保证侨社的存在和发展，保持侨社的中华文化特性。因此，“华人和菲律宾人都认识到学校教育在维持华侨社会方面的关键作用。因而，认为没有华文学校教育，就没有华侨社会，这并不过分。”^①

①Gerald A. McBeath,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 1973, P. 79.

少数华侨要侨生子接受华文教育的行动，表明华侨社会已有人认识华文教育的重要性。19世纪末年，中国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在南洋的宣传活动，特别是鼓吹兴办华侨教育，在各侨社中激起兴办新式学校，发展侨社教育的热潮。这时美国正实现对菲律宾的初步占领。为巩固他们在军事方面的胜利，美军事当局大力发展英文教育，建立各级各类学校。一些有远见的侨胞，也认识到“欧风美雨，澎湃东来，为适应〔国内〕废科举设学校之潮流，与夫对付资本主义之剧烈商战，非由教育以培植人材，则无以固吾侨之地位”^①。1899年，我国驻菲首任总领事陈纲（陈谦善之子）到任。陈是新科进士，熟悉时务大势。就任伊始，即征得诸商家同意，于是年4月15日在领事馆（原甲必丹衙署）内办起“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中西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②。

中西学校建立初期，因学校教育也属慈善事业，而主持侨社慈善事业者为善举公所，所以，学校由该所董事管理，经费也由该所拨给。学生上课的课室，就设在领事馆内。学校规模小，且与私塾没有很大差别：学生只有20人，其中大半为侨生子（Mestizo）。校长是前清举人龚绍庭，且是学校唯一的教员。学校草创，既无适当学制可遵循，也无新课本可用，“故学制略如私塾改良，教材则四书五经外，兼授尺牍，以应商场之用而已”^③。

中西学校在施乾（健庵）任校长（第二任）期间，为使学生适应时代要求和商场之用，开始加授英文。由于学生日益增多，

①彭乃扬：《自序》，《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②Alip,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P. 124.

③彭乃扬、李茂周：《校史》，见《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03页。

学校不断扩充，开支逐渐增大。当时，善举公所经费有限，同时要维持义山、医院和学校三部分费用，本身既感困难，也不利学校的发展。所以，中西学校另成立学校董事会，由杨嘉种任董事总理，并向马尼拉、怡朗、宿务募捐学校经费，得32 000比索。有了这笔经费，中西学校便增加班级，增聘教员，购置仪器设备，学生也逐渐增至100多人。

1911年，国内革命运动高涨，许多侨胞要求学习文化。中西学校便办起夜校，招收成年学生100多人，补习中、英文，开侨校办夜校的先河。自此以后，各侨校都设夜校，使成年教育大有发展。各侨校夜校人数，甚至接近日校学生总数。至1914年，中西学校学生已达300多人，夜校学生将近300人。

上一章已经谈到，702号年移民法准许商人眷移居菲律宾。许多青少年以华商未成年子女身分得以入境。纯华人家庭日渐增多。使儿女接受华文教育，成为这些家庭的迫切要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中菲混合家庭，也要求他们的子女接受华文教育。那些新来的、在国内已受或未受教育的青少年，为适应就业及商业竞争的需要，渴望学习文化，首先是学会计算，以及培养中英文读、写的能力。这就对侨社教育事业提出新的要求。辛亥革命前，侨社就已掀起一个兴办更多学校的运动，但因各种原因而未果。辛亥革命后，怡朗也办起菲律宾侨社的第二所学校——怡朗华侨商业学校。但对大量要求入学的青少年来说，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在当时华童已源源入口，父兄皆驰逐商场，何暇严为督责，始基未固，一染纷华，则放浪形骸，无所不至，莫怪老成人常发江河日下，极盛难继之叹”^①。而中西学校前此募集的

^①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教育》，见《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款项，渐将告罄；如无新的经费接济，学校亦有停办之虞。

鉴于上述紧迫情况，中西学校董事会拟招股扩大校舍，增办国民学校，发展华侨教育。但这一事体涉及整个侨社，少数人难于担此重任。于是，便由中西学校出面，征集侨胞意见。结果，侨社舆论“翕然赞同”组织华侨教育会，作为华侨教育的推广机关。1914年12月13日，马尼拉华侨各界代表在中西学校开会，讨论成立教育会问题。同月20日，华侨教育会（Philippine Chines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正式成立。该会决定用“教育附捐”的方式筹集经费。原来，菲律宾税务当局对在群岛经商的商人，按营业额征收1%的营业税，每季征收一次。教育附捐的办法，就是在税务部门征收营业税时，按税金额代教育会加征2%的教育经费^①；如营业税为100比索，加征2比索为教育附捐。这个办法付诸实行，避免过去经费来源靠商人自愿认捐的不稳定状态。而且，按营业额多寡负担教育经费，既公平合理，负担不重，且人人负起发展侨社教育事业的责任。教育附捐办法经侨社各业商人认可，马尼拉税务部门也同意代收，便于1917年4月初开始征收。太平洋战争前夕，教育附捐最后取消，但教育会仍负筹集经费的任务。

华侨教育会的任务之一，是利用教育附捐，在马尼拉兴办学校和维持部分学校的办学经费。到20年代，由该会出资创办和维持的学校已有六所，在校学生共2 000多人。另一任务是推进群岛各地的华侨教育。它要求各地华侨对兴办华侨学校给予配合和捐

^①从1920年9月底起，经侨商同意，教育附捐增为营业税额 的4%。

1923年4月，菲美政府决定营业税增加50%，教育附捐改为 营业税额 的3%，从9月起施行。见颜文初：《三十年来 菲 律 宾 华 侨 教 育》。

助。华侨教育会的要求适应各地侨社的愿望。它推进华侨教育事业的活动也是富有成果的。

到了30年代，每个较大的华侨侨居地，都已建有自己的学校。全菲侨办华文学校，1935年已达80所，1940年更达124所^①。虽然，其中不少学校只拥有几十名、十多名学生，仅有一个课室的校舍，但在某种程度上已满足了侨社青少年入学的要求。

上述学校，按其创办者及经费来源，可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各地商会或直接由商人出资创办的学校，包括各地教育会创办及资助的学校。它们占有上述学校的相当大部分。第二类是各地各界侨胞共办的学校。第三类是由国民党组织创办的学校。第四类是由其他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教育界同人创办的学校。不论哪一类学校，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遇到以下困难。

经费困难。侨校经费来源，一是来自学生学杂费，二是来自侨社各界、特别是商界的捐款。学杂费收入受学生数制约，校大生多，经费便较充足；校小生少，学杂费收入远不敷学校开支。至于捐款，即使象教育附捐这样有一定强制性的办法，也是难有保证，因而是极不稳定的。个人认捐、教育附捐，既是一种义行（还不是一种义务），不可能给予法律上的强制，认捐可以食言，附捐也可能抗缴，少数热心家也难长期全力负担经常不足的学校经费。所以，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遇到经费困难，以致学校不能扩大，甚至有不少学校发不出教职员工的薪金，交不起校舍的租金。一些学校因而取消分校，降低或拖欠教职员工的薪金。为解决经费困难，各地各类侨校都纷纷自行筹款。其办法不外乎发售彩票，发行募捐券和演剧筹款。但这类办法实行起来困难也不少：发售彩票与居留地法律相抵触；购买募捐券无形中又加重一些热心家

①厦门华侨博物院展出资料。

的负担；演剧筹款更是消极的办法。颜文初谈到演剧筹款时说：

由是甲校演剧筹款，乙校亦演剧筹款。埠中热心教育者有数。既慷慨交纳附捐，复解囊购买剧券。俗话说：“软土深掘”，在情理亦说不去。且分学生宝贵时间，忙于售票练剧，亦非永久办法①。

困难虽多，这类消极的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实行，可见学校经费拮据到了什么程度。难怪中西学校校长、华侨教育界著名人士颜文初在1934年大声疾呼“近年岷埠华侨教育，几沦于破产”②。马尼拉侨校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省、市、镇侨校的经费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学生人数少。在菲律宾，既有象马尼拉这样人数累万的庞大侨社，也有一百几十人的小侨社。大侨社，学生来源充足，一些学校，特别是象中西学校那样的著名学校，限于校舍不足，虽然竭力多招学生，仍不能满足学生入学要求。但即使在马尼拉，也有生不盈百的学校。1934年在可统计学生人数的18所学校中，有3所只有学生43—80人。马尼拉以外的省、市、镇侨校，学生少几乎是普遍现象。同年，在可统计学生人数的43所省、市、镇学校中，拥有112—370名学生的只有6所，不及14%；不足30名学生的有19所，占44%，其中一些学校，仅有12—19个学生。学生虽少，可班级俱全，教师需1—3人才能维持较正常的教学活动。复式教学更是普遍现象。教师负担既重，维持费用也不轻，因而经费更感困难，侨界负担更重。

双重课程负担。各侨校既向两国教育部门备案，获得承认，

①颜文初：《菲律宾华侨教育二十年概况》，见《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50页。

②同上书甲编第149页。

而在施教方面，也需适应华侨社会的要求，既要教习母国的文化知识，冀学生懂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文，保持中国人的气质，又要教习居留国教育当局规定的课程。因此，所有的侨校，既要照中国的课程标准，用中国课本，以中文教授各种课程，又要遵循菲律宾的课程标准，用英文教授各种课程。两种标准，两套课程都得兼顾，教师尚可有两套人马，轮流授课，学生却分身无术。所以，在课程安排方面，一般上午四节课（每节45分钟）为中文课程，下午三节课为英文课程。因时间限制，不能安排中、英文的全部课程。为保主要科目，便只好砍掉体育、音乐、美术、劳作，或缩减其课时。于是，学生便整天呆在课堂里，轮番学习中、英文，或重复学习同一课程，如算术、地理、历史，等等。学生因负担过重，经常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学习生活枯燥，身体健康受影响，学习质量也因而难以保证。对于学校来说，为备两套教员，不得不聘请菲律宾人、美国人当英文教师。这又加重了学校的经费开支。

中文教学使用语言也成问题。20年代中期（1926年）以前，侨校上中文课程，因闽、粤籍学生方言不同，一般按籍分班，分别用两种方言讲授。下午上英文课程时，两籍学生则合班上课。这不能不给教学带来不应有的困难，且于国体有碍。从1925年起，华侨教育界发起提倡国语（普通话）运动，马尼拉一些学校在夜校设国语专修科，从实践中加以提倡，报界也大力鼓吹。作为推进国语运动的机构——猛醒国语研究社也于同年成立。于是，在学校里也逐渐用国语代替方言。至1929年，华侨教育会通知各校，此后不得再用方言授课。教学语言问题终于得到妥善的解决。

此外，还存在教材不适应侨生实际情况的问题。菲律宾各侨校的中文课程，采用国内商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这些

教材，作为认字范本，则超过侨生的文化水平；作为传授知识的媒介，则太脱离南洋情况和侨生知识的实际。在战前，教材问题一直都未能合理解决。

困难虽多，华侨教育界还是以竭诚办教育的精神，设法克服，使华文教育蓬勃发展，从而为中华文化在菲律宾发扬光大，作出了可贵贡献。

第十三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对 排华活动的抗争

美国统治时期，虽说未发生过西班牙统治时期那样大规模的排华事件，但华侨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美国殖民者为转移菲律宾人民要求独立的斗争目标，菲律宾一些政客出于政治上和金钱上的动机，社会上少数文人墨客受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驱使，常常利用他们掌握政府部门的政治权力，或利用他们在菲律宾议会的立法权力，或通过社会舆论媒介，不时制造排华舆论，制订排华立法。极少数国家主义者甚至唯恐天下不乱，不惜违背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反华煽动，挑起排华事件。中国移民受到侮辱性的歧视，华侨的正常活动受到限制，侨胞的生命财产不时蒙受损失。华侨为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不得不诉诸法律和舆论，或通过交涉、疏通等方法，对形形色色的排华活动进行抗争。

一 菲美当局对华人移民的限制 和华侨的反限制斗争

美国基本上实现对菲律宾的军事占领之后，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1901年7月4日，美国任命威廉·H·塔夫脱为菲律宾总督，以民政统治代替前此的军事统治。但在美国的整个统治

时期，殖民政权在行政领导方面，始终隶属于美国陆军部^①。这足以揭示民政统治的军事实质。

美国统治菲律宾的一个特点，是以武力作后盾，政治上软化菲律宾人民的反抗，经济上加速开发和掠夺，意识形态方面则推行同化政策。

政治上，美国一开始就抛出让菲律宾人经过若干年的“训练”，逐渐实现“自治”的方案，对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怀柔，逐步扩大他们的参政权，以便增强美国的殖民统治基础。这种方针的具体体现，就是所谓政府“菲律宾化政策”。美国国会在1916年8月29日通过的《琼斯法案》（Jones Law，或称《菲律宾自治法》），是美国国会所泡制的菲律宾行政体制诸法案中最能揭示所谓“菲化政策”实质的一个法案。这项法案许诺，在菲律宾能建立稳定的政府时，就给予独立。法案规定，新建立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拥有立法权，但总督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议会通过有关移民、通货、造币问题的法案，未获美国总统批准，就不能成为法律。法案规定殖民政府各部部长（公共教育部部长除外）和地方官吏都由菲律宾人担任，但所有这些部长、官吏都由总督任命，而总督则是经美国参议院同意，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最高法院虽由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共同组成，但这些法官也是经美国参议院同意、由美国总统任命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殖民者极力通过对教育机构和教会的控制，推行同化政策。美国在菲建立殖民统治后，实行公立学校制度，强制以英语作教学语言。《琼斯法案》甚至规定教育部部长必须由任副总督的美国人兼任，以加强对学校的控制。

^①陆军部中具体管菲岛事务的，是岛务局（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

美国殖民当局加紧兴建各项公共工程（如公路、铁路、桥梁、港口等），掠夺土地，片面发展经济作物，投资开发森林、矿藏，并制订法律，使美国商品免税输入菲律宾。通过这些手法，使菲律宾迅速成为美国的原料取给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美国殖民者一贯限制华侨入境数量，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

华工虽然对建筑横贯美国大陆的南太平洋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和开发美国西部作出巨大贡献，但在西部开发工作大体完成，两大铁路竣工之际，即开始制订排斥华人的法律，使其迫害华侨的行动合法化。1882年，美国与清廷订定新移民律，规定在10年内禁止中国劳工赴美。1888年，又制订20年内限制华工入境的法令。同年规定凡已返国华工，除在美国留有妻室儿女及有1 000美元以上的储蓄者之外，一律不得重新入境。1892年，又规定在诉讼案中，不准华人保释。1902年的限制中国移民法案，更无限期禁止华工入境^①。

西班牙殖民者在近三个半世纪的统治中，对菲律宾华侨始终实行歧视、压迫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在菲律宾社会意识中造成潜在的影响。19世纪以来，随着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出发，从思想意识到言论，都有排斥华侨的倾向。虽然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其所以能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其华侨祖、父辈的经营和资产；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在近代以来，阻碍菲律宾民族经济发展的，是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在菲律宾的经济势力，但他们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反

^①刘芝田：《中非关系史》，第544页；黄绍湘：《美国简明史》，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234页。

对上述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而是针对相对地比较次要的、而且在几个世纪中已同当地经济结成一体的华侨经济力量，甚至针对一般的华侨老百姓和一般的华人移民。这就不能不说是几百年来西班牙殖民者反华排华的潜意识影响，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弱国的国际地位，对华侨处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了。

美国统治集团既有排斥华侨的本性，又顺应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限制华侨的要求，以达其笼络菲律宾上层的目的，所以，从它酝酿侵菲时起，就积极推行排斥华侨的政策。

早在1898年4月下旬，在阿吉纳多流亡新加坡时，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乔治·杜威便授权美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斯潘塞·E·普拉特，同前者达成一项口头盟约，其中第六项规定：关于华人入境问题，应采取措施以免损害菲律宾土著劳工的利益^①。侵菲美军司令、军政府总督、美国少将埃尔韦尔·S·奥蒂斯在美军非法占领马尼拉一个月之后即宣布：美国有关排斥华工的各种法律，适用于菲律宾。奥蒂斯的命令，并不是美国国会的决定，因而带有临时性质。1902年，美国国会正式决定，把美国诸排华法案的实施范围扩展到菲律宾，并指示菲律宾委员会（Philippine Commission）制定必要的条例，以保证美国有关华人移民法案在菲律宾的有效实施。因此，殖民当局根据美国国会1902年的华人移民律，在1903年3月27日通过菲律宾移民律，即702号法令。这项移民律规定：进入菲律宾领土的移民，必须持有入境证；此项入境证的发放，只限于以下三类人：

（一）凡属过去在菲居留的商人及劳工，及现时在菲经营商业的华人眷属，可按移民律请求入境。

^①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 420; 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交涉汇》第四。

(二) 华人男女教员、学生及专门技术人员，预先申请，并获政府批准者，准予入境。

(三) 中国政府派遣来菲的外交官、商务官等官员及其眷属。

除上述三种人外，如发现在菲华侨没有居留证，或无其他登岸保证，因而不符合移民律规定者，可以视作华工，予以逮捕并递解出境。

不久，又有新的规定，使华人移民的身分限制更加严格。缘由是在1894年，中美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在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在十年中禁止华工赴美，从而使美国的排华措施合法化。1904年，该约期满，在重订的条约中，完全没有关于中国移民地位的条款，华工因而从美国及其属领被全面排除。且“劳工”一词被不恰当地加以引申，涉及范畴扩大，以致此后仅仅准许教员、学生、商人、旅游者和政府官员进入美国及其属地，当然也包括菲律宾^①。

702号法令的主旨是禁止新华工入境，这是至为明显的。关于“华工”的定义，在实践中又任意引申，把店员与苦力并列，且任何申请到菲律宾的中国移民，即使是持有菲律宾的出生证明，也可以被视作劳工而加以审查甄别。因此，旅游者和商人在出入境时也受到诸多留难。

菲律宾的移民律令，实际上是照搬美国排斥华工的政策，而不顾当地经济的实际需要。当时，菲律宾工商业的发展，急需熟练工人，而非律宾本地的、以及华侨中的熟练工人，是不能满足这种发展需要的。因此，一些外国在菲律宾的企业，例如西班牙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人经营的菲律宾最大企业塔瓦卡莱拉公司 (Tabacalera Co.)，也要求允许它引进中国熟练工人，用于建筑仓库和其他建筑物。马尼拉的美国商人组织——美国商会也提出同样的申请。在菲律宾长期经商的一些商人，包括美国商人都认为，引进华工，将大大加速群岛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华人是很成功的商人和很好的小贩，因此，如果禁止他们进入群岛，大概就没有人做这种琐碎的事了。在美国国会，也有参议员断言，为了获得充分的、有用的工人，以利于菲律宾的发展，向中国移民打开菲律宾的门户是必要的。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 (1900—1903，也叫塔夫脱委员会) 一方面认为允许中国熟练工人无限制地进入菲岛“是不明智的”，一方面却又承认菲律宾人中的熟练工人远不能满足群岛的迫切需要，因而曾建议，在一个为期五年的时间内，引进有限数量的华人，让这些华人每人带一名菲籍徒工，这样，五年之后，菲律宾人中就将有一批充足数量的熟练工人^①。但美国当局终以允许华工进入将给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带来动乱因素，“菲律宾人自己的愿望是，他们不应受到华工的进一步竞争”^②等为理由，一意孤行，拒绝上述要求和建议，坚持排斥华工入菲的政策。由于美国人认为中国“苦力阶层是潜在的威胁”^③，因而一反西班牙人驱使华侨从事农耕的做法，禁止华人从事农业。这甚至引起菲律宾农业界的不满。在1917年8月30日在马尼拉召开的农业大会上，农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536—538;

《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2年12月12日，1983年1月25、26日。

②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38;

《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2年12月21日。

③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38.

民表示坚决地赞成让华人移民到菲律宾。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立法机构通过法律，接受亚洲的劳工进入群岛，只从事农业工作，并把他们的居留权限为五年。大会还公开宣布，赞成从中国进口契约劳工，声称这一做法将导致群岛的迅速发展^①。但在美国殖民当局坚持排斥华工政策的顽固态度面前，这一要求也未能实现。

殖民者顽固推行排斥华工的法律，使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实行702号移民律后，原来中国熟练工人占极重要地位的建筑业、泥水、伐木、机器、造船、修船等行业，由于华工人数不仅不能得到增加，反而大有减少，因而很快陷于衰退^②。

1924年，美国国会增颁新移民律，其中规定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居美华侨中之不靠工作维持生活者，一旦降至须靠工作方能维持生活时，则要驱逐出境。美国国会于同年批准这项法律在菲律宾施行^③。

1935年11月成立的菲律宾自治政府，于1940年5月通过移民法。这是现代史上由菲律宾独立制订的第一项重大移民立法，它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菲律宾自治政府总统曼努埃尔·L·奎松署名公布施行，并取代前此在菲实施的同美国有关立法相联系的移民法。这项移民法比诸美国的移民法有所放宽。它规定，每一个国家每年移居菲律宾的移民，一律以500人为限。表面看来，该法对各国移民一视同仁，并无歧视，但稍为了解各国

①《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3年2月20日。

②陈达：《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

③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第235页；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 P. 284.

向菲律宾移民情况，就可以看出，它是为了限制中、日两国移民而制定的。从表1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1924年和1927年，各国对菲的移民，只有中、日两国超过500人，其他国家及地区，最多也不过300多人，最少的仅数人。在1930至1939年十年间，中国沿海人民移居菲律宾的，年平均约3500人。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东南亚等地的“南进政策”，大量向南洋各地派遣特务、退伍军人和受过军事等特种训练的人员。所以，在这十年中，日本移民进入菲律宾的，年平均为2163人^①。如果说，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对对菲律宾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防备措施，对其所派遣的“移民”采取限制措施，于菲律宾国防及国内安全是合理的，那么，把从事和平经济活动的中国移民同日本移民等同对待，就明显地具有歧视性质了。

对移民的限制已如上述，对准予入境的中国移民，美菲当局亦设诸多苛例加以留难、限制。例如，按702号移民律规定，华侨商人回中国者，虽然没有受到象工人那样的时间限制，且有可携眷到菲的权利，实际上华侨要取得商人身份是受到诸多限制的。例如，商店企业有独资经营的，也有合资经营的。在向税务部门注册登记时，独资经营者当然以其唯一的东主具名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合资经营者，则无论股东有多少人，却只以其中一人具名登记，并以他的名义领取营业执照。华侨的商业企业，合股经营者不少。菲律宾海关在具体办理华商出境时，往往以税务部门的登记为依据，对册上有名者作商人对待，册上无名的商人则一律当工人对待。这不能不引起侨商的极大反感。经过1909—1910年间华侨长达八个月的抗争，1910年3月，这一苛例才被撤销，华商的权利才得以恢复。但到20年代，税务当局又规定，每

^①施良：《菲律宾研究》，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47页。

表 1 **1924、1927年进入菲律宾的外国移民统计**

国 别	1924年	1927年
中 国	5 265	9 828
日 本	703	2 879
荷 兰	37	67
印 度	43	118
英 国	118	297
法 国	38	52
德 国	73	115
爱 尔 兰	11	
意 大 利	2	22
葡 萄 牙	7	21
俄 国	16	39
挪威和瑞典	24	13
苏 格 兰	16	
西 班 牙	226	316
叙 利 亚	3	5
土 耳 其	14	5
其 他	13	138

资料来源：吴承洛《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中华书局 1929 年版，第二编第10—11页。在原表中，苏格兰作“司各德”，印度作“东印度”。

年至少能缴纳240比索营业税的华侨商人，方得作商人论，否则不算商人，也就不能入境^①。

美菲当局，对入境华侨，无论是新客还是旧客，又诸多刁难，任意侮辱，肆加勒索。下面一段文字，是对这种情况的大概记述：

查厦门地方，实为我们侨民到菲的集中地点，不论新旧过客，都得先到驻在鼓浪屿医生检验合格后，才得放行。还要多方留难，迁延时日，甚至有耽搁至八九日者。等到了轮船入马尼拉时，医生又要覆验，如认有沙眼、头疮等病，就得闭禁于拘留所，再行发回。凡未成年的商人子弟，当初次进口时，可托海关代理人以五百金（金，指比索，下文所用元，亦指比索——引者）担保上岸，现在又闻得增加到一千元之说。海关方面，现又建议打算造一大规模的拘留所，专为对待华人而设，并借此以代替担保制度。这显系以不平等待我民族。……其余如入口要纳十六元的进口税，出口要纳十元的出口税，层层剥削，更属不可胜计^②。

事实上，在此稍后的时间（同是30年代），对华侨商人未成年子弟之初入境者，就实行征收担保金1000比索的办法。“大规模的拘留所”也差不多在同时造成使用。这个大拘留所设在马尼拉附近，华侨称之为“水厝”或“水牢”。入境华侨在候保期间或担保手续办妥之前，一律闭禁在这里。若无保人，或被当地政府认为是“不良分子”，因而不适居留者，则仍拘押“水厝”，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1页；邬翰芳：《菲律宾之对华经济独立运动》，《东方杂志》二十三卷十三期（1926年7月10日）。

②周敦礼：《各国虐待侨胞苛例之一斑和补救方策》，《东方杂志》二十八卷十三期（1931年7月10日）。

听候遣送回国^①。

此外，美菲当局还用所谓验身，按指纹等歧视性措施留难华侨，借机对华侨进行凌辱和勒索。

必须指出，以上苛例，都是单独施用于我国移民的。菲美当局对华人移民之特别严酷，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菲美当局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政策，华侨一再起来抗争。

菲律宾华侨首次反对美国排华移民律的大规模斗争，发生于1905年。因为这次斗争与国内爱国运动同步进行，故放在下章论述，这里不赘。自那时以来，菲美当局歧视中国移民的法令、措施，仍继续施行或有所发展，华侨反对当局歧视华人移民的斗争，因而也未停止。但斗争方式比较缓和，主要是由马尼拉中华商会出面，采取国民外交的方式，针对菲律宾海关和移民当局虐待入境华侨和移民苛律两个方面进行交涉和抗争。

在美国统治时期，马尼拉中华商会为抗议这些歧视性的虐待行为，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历来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下面是

①黎尚桓：《我国南洋侨务的回顾与展望》，《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九期（1936年5月1日）。建立在菲律宾华侨入境主要口岸马尼拉的“水厝”，乃是美国移民局建立在旧金山天使岛（Angel I）移民站的翻版。在1910—1940年间，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都先关在天使岛上，进行隔离检疫和审查，时间长达数周至一年半载。他们在那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任何借口都可使这些移民不能入境而被解送回国。据陈康的未刊文章《永牢十八个月的生活》称，“水厝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借口入境手续不完备或所谓‘违法’为由，任意拘禁华侨和其他外国人的监狱。水厝设在马尼拉港口一个小岛屿上。这个小岛原名为工程岛，四面环水，但设有一座吊桥……桥头两岸都设有岗哨，凡欲到水厝探望亲友的，应持有移民局的准许证，才能通过吊桥进入小岛。”

1907—1933年该会进行这方面斗争的简单记录^①：

- 1907年10月 抗争菲海关借口砂眼疾刁难华侨入口案
1917年1月 抗议菲海关不准华侨登轮送行事
1921年1月 抗议菲海关苛待入口华人及留难入口国货
1922年5月 向海关交涉虐待初到菲岛的华侨
1925年8月 交涉菲海关以种痘、头疮、眼疾等留难华侨入口事
10月 交涉菲海关令入口华人种痘事
1930年5月 函请驻菲中华总领事向美驻华大使交涉取消厦门 华侨出口种痘苛例
1931年4月 致函中国驻菲总领事，据理抗争海关新筑水厝案
1932年4月 抗议菲海关限制华侨上船送客须带居留证案
1933年2月 函请中国驻菲总领事馆据理力争取消菲岛外人入口 税由16比索增加至24比索
1933年9月 致函海关抗议海关码头工人故意刁难华客事

反对虐待华人移民和华侨，是经常性的交涉抗争；反对移民苛律的斗争，则往往是有阶段性的要进行花费时日和金钱的法律斗争。

前章已谈到，第702号移民律允许商人及过去在菲居留的劳工入境。商人有权携带家属，劳工则没有这种权利。“商人”一词的定义，在1893年11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律第二节中作过规定：

在经修正之本法案中所使用“商人”一词，应指下列含义而非其他含义：商人指从事商品购销，在一个固定处所，以其本人名义进行业务经营，并在其宣称作为商人期间，除在其业务经营中不可

①参阅《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6—71页
《本会大事记》。

避免者外，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者^①。

在1903年702号移民律第十二节中，对上述定义亦加肯定。但在施行过程中，这一定义后来又以190号移民通告的形式，作出对华侨商人不利的引申：

凡从事与商业无关之体力劳动的华人，纵使在其收入中有一部分纯粹来源于商业，亦不得作为“商人”^②。

这一修改，已见苛刻，但在执行时，却又具体化成“凡每季度缴交不足5美元税金者非商人”^③。

1909年，菲海关当局公布移民苛法，即219号法令。首先是将从事商业的华侨分成“商人”和“小店主”两类；前者在移民方面可享受商人的权利，后者将不准许在菲居留^④。又在法令中规定：凡出境华侨商人，未以商人身分具名在税务局登记的，一律作工人看待。这后一规定，对那些与他人合股经营，但未具名登记的股东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合股商业企业，不论股东多少，一般只准其中之一具名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余股东，不管人数多寡，均被视为工人。小店主既不属“商人”，小零售商在“商人”中被抹掉了，而实属“商人”的非具名登记者又不算“商人”，则全菲华侨商人中，能合格称为“商人”的，为数便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81.

②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80.

③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81.

④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80.

很少了^①。

为粉碎这一苛例，维护侨商正当权益，马尼拉中华商会决定诉诸法律，进行抗争。但需人充任原告。这时，任中华商会董事职务的著名侨领、侨商陈三多，不顾个人利害，挺身而出，毅然充当原告。在他去领取出境证，得不到商人身分证明后，便以原告人身分，向地方法院控告海关税务司。中华商会则全力支持，为其后盾。1909年5月，中华商会一面延请律师向法院起诉，援引1893年11月3日美国国会移民法案第二节中有关“商人”一词的解释，据理力争。8月，陈三多在地方法院胜诉。地方法院训令海关税务司撤销上述第219号法令。接着，仍由陈三多当原告，向菲律宾最高法院起诉，1910年3月，又获胜诉。至此“苛例始得废除，侨商的权利始得恢复”。费时10个月，耗费7000多比索的法律战役，终以华侨取胜而结束。而陈三多也因此次抗争而赢得更高声望，甚至菲美政府也作出姿态，“以先生为公不计利害，准其不带居留证，自由出入菲岛。”^②

但菲美当局并未因此放弃限制华人商人入境的意图。1925年8月，菲议会就修改“商人”的定义，把标志“商人”身分的最低税金缴交额提高为每年240比索，否则就不能作为商人入境。这比起以前每个季度缴纳5美元（即10比索）来，要高出五倍。其用心，就是借此提高入境条件，减少华商入境。同月，中华商会提出抗议，反对菲议院修改“商人”定义^③。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1、160—161页。

②同上，第51、57、58、161页。

③郭翰芳：《菲律宾之对华经济独立运动》；《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5页。

菲律宾立法议会于1924年提出一项移民法案。这项议案规定，在该案颁布一年之内，菲律宾所有中国居民须呈验批准他们居留菲律宾的证件，另行发给华侨专门的身分证明，违反该法案者将受监禁及放逐^①。

对这一移民苛例，侨社作出强烈反应。11月，马尼拉中华商会联合广东会馆、善举公所进行抗争，并就该案问题于11月24日向伦纳德·伍德总督递交抗议书。抗议书引用各种国际条约的条文，说明该法违反美国宪法和国际法。侨胞还准备在议会通过该议案时，向华盛顿提出法律诉讼。当时的北京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周国贤，虽行将离任，也于11月24日就该议案向伍德提出抗议。面对华侨社会的强烈反对，伍德只得将该案呈送美国司法部长裁决。根据美国司法部长的意见，伍德以该案违反美国宪法而于12月初予以否决。此后，在30年代，该案一再提出，但均未能付之实施。

二 “禁米条例”的颁布和华侨的抗争

自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以来，菲律宾粮食一直不能自给，须由亚洲邻国输入大米。西班牙人统治后期，片面发展出口经济作物，粮食问题益发严重。美国统治菲律宾后，更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作物生产，粮食种植面积日趋缩减。欧战期间，菲岛土产销路大开，价格暴涨。许多生产者放弃粮食生产，改植麻、椰、蔗、烟等作物，粮食生产由此更趋减少。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82—183.

结果，即使平年，也必缺粮数月，要从越南输入大米接济^①。欧战结束以后，粮食问题更加严重。1919年，菲律宾粮食歉收，各缺粮省份，均储粮自用，又值越南禁止出口大米。于是，马尼拉市及南部各省，严重缺粮^②，粮价猛升。就马尼拉而言，一日之间，每斗米有上涨一比索的，一两个月间，每斗米有从十比索左右，涨至十六七比索的。一些华侨米商，因米价不断上涨，存粮又复有限，过早出售，害怕吃亏，自然停售观望。这就形成有钱买不到米的现象。

对于严重的粮食问题，菲美政府常常故意无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别有用心地归罪于所谓华侨操纵粮食业，把人民的不满，转移到华侨这个“最便当的政治靶子”身上。

1919年7月30日，菲议会通过2869号议案，授权哈里森总督禁止大米出口。禁令颁行后，菲美当局又发出通告，规定大米最高限价，超过限价者以犯刑律论处。这就是《禁米条例》。规定大米最高限价损害了米商的利益，同时米商获悉南部各省需粮迫切，于是关门停业。华侨米商向以促进粮食购销，供应社会需要为宗旨，这也是他们利之所在；而他们所以要关门停业，显然主要是对政府上述措施的抗议。但一些报刊却有意趁此机会制造反华舆论，“谓米粮买卖权，握自华人，苟欲夺我粮食，即在其掌握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以致“各处居民，万分激昂，

①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概况》，载《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②1915年，菲律宾产米800多万袋，进口将近300万袋。进口大米主要是供应群岛南部省份。1918年，人均消耗大米2袋，全国总消耗略多于2100万袋。1919年，菲自产大米1600万袋，进口200多万袋，比1918年的总消费量还少300万袋。参看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353.

皆痛恨华人无良，有欲聚众捣毁米铺者”^①。在黎萨电影院一连三个晚上上演一出戏剧，名称叫《华人是公认的吸血鬼》，其目的明显地是要“激发人民大众反对中国人的热情”。演出终结时，人群变得粗野狂暴了。他们成群结队地袭击和凌辱华人。演出第二天（1919年9月18日），美国人办的《电讯报》就发表社论，指出：“在整个目前的大米危机期间，华人一直是菲律宾政客和煽动家（从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到街头演说家）的‘替罪羊’。华人一直被不公正地指责囤积居奇和谋取暴利。物质上的劫掠已毁掉华人的财产，在一些省里，已经对华人商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作品夜复一夜地上演，要不了多久，这样的骚动也必定会在马尼拉发生的。”^②这正是舆论制造者的希望，他们就是要借助这样的局面，造成一种压力，使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华侨的利益。果然，菲美政府发出命令，标封华侨米商全部存粮，由政府分发各处按官定价格出售，售后再将款发还米商。

政府这种不顾米商损失的做法，引起侨社的极大不满。中华商会在菲议会通过2869号法案之初，为米商利益计，于7月向侨商发出通告，禁止运米出口，以免违律受罚。接着，它就投入米案抗争，进行疏通交涉。结果，政府不得不停止由它向各处分售大米的做法，恢复由米商经营，但仍在米价上进行限制，规定上等米价每斗为16.25比索，中、下等米依次减低1比索。

政府所订米价，既损害米商利益，也损害菲律宾水稻种植者的利益，因而遭到产米各省的反对。1920年，产米各省国会议员

①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概况》。

②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353-355.

提出，在麻、糖、椰、烟等农产品涨价数倍的情况下，上述官定米价，相形较不合理，照此下去，不但不能鼓励产米各省农民，反而导致他们罢种稻谷。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菲美政府才将各等米价一律提高两比索。

米案风潮至此宣告平息。在米案期间，华侨米商虽因米价高涨而得到相当的好处，但因政府的限价和标封、公卖，也受到一定的损失。在米案抗争中，侨社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仅中华商会，就为此耗去7 000多比索，这还不算风潮平息后作为平糶费用而捐助政府的5 000比索^①。

这次风潮虽然平息了，但菲律宾缺粮，年年需要进口的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只要粮食进口不继，国内粮食减产，米荒出现，华侨米商便照例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但经过1919—1920年的米案风潮，华侨社会也有了抗争的经验。1934年，菲律宾再度发生米荒。9月，中华商会召集米商会全体董事开联席会议，讨论米荒问题，又致函农商部长，解释米荒原因。对于全菲华侨米商，中华商会也及时通报，指出在米荒风潮中应采取的态度。10月，中华商会还运用舆论工具，进行解释工作，着该会主席薛芬士在西文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华侨米商之为难处”。这样，既有利于消除误解，也有利于华侨与侨居地人民的友好相处。

三 “簿记法”的实施和华侨的抗争

米案在1920年市告结束，簿记法(The Bookkeeping Act)就于1921年在菲律宾议会通过，由此在华侨社会中掀起前所未有的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71页。

的抗争浪潮。

簿记法在1921年抛出，并非偶然。

1905年的非华抵制美货运动，给美国输菲商品以沉重打击。这次打击虽已过去，但由于华侨零售商在菲零售业中仍占有相当地位，一些华侨商人又是美国商品的直接进口商，因此，在美国看来，这些华侨商人的存在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商品倾销政策，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一些抱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不敢正视美国人、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经济势力，却把华侨视为为实现菲律宾经济独立而需要打击的首要目标，总想寻找机会消除这个竞争对手。于是他们便从簿记问题上向华侨开刀。

华侨商人一向用中文记账。这不仅是因为绝大多数华侨商人文化水平低下，不懂西、英或菲律宾的文字，而且，用中文记账，在异国便于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为了限制并消除华侨的商业势力，菲美当局继承西班牙殖民者的伎俩，企图用所谓簿记法，禁止用中文记账，从而使占华侨商人绝大多数的零售商、特别是菜仔店店主无法继续其营业。1909年11月，菲律宾税务局通令，“凡簿记，须以英、西或土等文字记账”。中华商会去函税务局，要求准许华侨用中文记账^①。经过交涉，簿记法未便实施。但自1912年起，税务局一再提出实行此法，而菲律宾议会则几乎年年提出簿记法议案，但每一次提出，中华商会及各地华侨商会，都明确表示反对，并向有关当局（税务局、议会）进行交涉、疏通，还多次组织侨界集会抗议，以阻止簿记法的通过和实施。1914年4月28日《马尼拉时报》发表社论，胡说用“陌生和烦难”的中文记账不便于查核账目，用中文记账是为了某种“秘密”目的，用新簿

^①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7页。

记法可以制止中文记账的弊端，等等。5月7日，中华商会主席施光铭在该报发表文章，据理辩驳。他写道：

许多精通我国语言和文字的著名学者告诉我，我们的簿记和记账方式在其条理清晰、简单明瞭、便于订正和核查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我敢肯定，没有那个有声望的华侨商人会在任何有权行使审查权的人审查他的账簿方面设置最微小的障碍。再者，我也从未听说过有那个华侨因拙劣的簿记而破产^①。

他进而指出，俄国人用俄文记账，土耳其人用土耳其文字记账，希腊人用希腊文记账，说英语的种族用英文记账；中国人用中文记账，恰恰是因为同一理由。否认任何民族的这种被如此普遍承认和普遍享有的权利，是对国际礼仪和相互尊重原则的违反。

“让我们暂且假定：中国政府要求在华全部外国人用中文记账，又将如何呢？”^② 华侨对簿记法的立场，获得马尼拉各籍商人的支持。1911年12月，马尼拉市商人联合会致函中华商会，赞成“记账不可限以英、西或土文”^③。

由于华侨的一再抗争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菲律宾税务局不得不在1914年8月函知中华商会，暂不实施簿记案，但又规定华侨商店设立一估价簿，登记每日买卖总数，以便征收营业税。到了1917年，税务局又发出通告，要求侨商用英、西、土文记账。但在中华商会的抗议下，又于是年自行撤销^④。菲议会亦因上述原因，始终未能通过簿记法案。

1921年2月，哈里森总督即将离任之际，为一举实现他多年

① 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86.

② Ibid.

③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9页。

④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0、61页。

屡欲实施簿记法而未竟的心愿，借此挑拨菲华关系，便利用他最后的机会，亲自将簿记法再次提交菲律宾参议院讨论。法案一经提出，政客和若干当地报纸便加以配合，大造舆论，说华侨商店用中文记账，使税务局查账员难弄清其中“奥秘”，使政府每年损失数百万比索税收；实行簿记法，恰恰是为了堵塞这个漏洞。

提案（编号为2972）提出后，侨社加紧会外交涉、疏通。首先，由侨领李清泉、薛芬士和中国驻菲总领事周国贤往见两院议长奎松、奥斯敏纳及哈里森总督，力陈该法案施行后华侨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不能实施该法案的理由，要求两院详加考虑，要求哈里森收回提案。侨社代表同两院议长辩论了三小时之久。但是，菲两院及哈里森都把推行2972号法案作为一项既定政策，而且认为当时通过该案正适时机，因而，后者拒绝收回提案，前者则在议会闭幕的那天（2月9日）晚上，急忙按原案通过，仅将正式施行的时间由7月1日改为同年11月1日。至此，侨社把撤销该案的最后希望寄托于总督的否决权上。象往常的交涉和抗争一样，中华商会作为侨社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站在抗争的前列，对外进行交涉，对内进行抗争的动员、组织和领导。2月10日至20日，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副会长薛芬士和周国贤总领事，数次与哈里森交涉，要求后者运用其总督权力，否决簿记法。中华商会在2月15日递交哈里森的请愿书中说：

……在菲律宾从事商业，不以上述语言或方言之一作为其母语的居民中，华人是唯一人数最多的居民，……这项待批的法律是保护讲英、西和本地语言的商人的，但把沉重的负担加诸华人身上。而对华人来说，这种负担被率直地认为是行不通的，是无视他们的整体意愿的。……而且，从各个方面看，待批立法都必须看作是对华人极其有偏见和不友好的，其实行将危害他们被法律或其他方面

赋予的商业和财产权利，因而，它的合法性是极端可疑的^①。但哈里森顽固拒绝侨社和中国政府代表的申诉和正当要求，并在去职前夕——21日，匆忙批准该法案，从而使它成为法律。哈里森与非议会在行动上的配合一致，显示两者间事先已有默契。

簿记法的内容如下：

一、任何个人、商店、公司或社团，在菲律宾经营商业或工业或其他种事务，按现行法律，均须用英文、西文或任何一种菲律宾文字记账，否则认为违法。

二、凡违反此项法律者，经定罪后，得科以1万比索以下罚金，或两年以下的监禁，或罚金与监禁并科。

三、本条例定于1921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

这个条例公认是针对华侨小店主的^②。它一旦付之实行，1.5万家菜仔店将因无力雇请记账员，又经受不起严厉的惩罚而被迫停止营业，数万华侨将因而失去生计。较大的零售店以及公司、企业，虽可以雇请外籍人和菲律宾人记账，但他们的经营秘密亦将因此无法保守，从而在商业方面失去竞争力。总而言之，簿记法的执行，将使整个华侨社会受到沉重打击。簿记法还有它的政治影响方面，即损害中华民族、中国的体面。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对外侨在使用文字上施加这样的侮辱性的法律限制；国际上还没有这种先例。再者，菲律宾一开这个先例，其他国家和地区，出于同样的动机，也将仿行，各地华侨社会也将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87—188.

②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705; Remigio E. Agpalo,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tail Trade in the Philippines*, P.24.

因此大受损害。所以，菲律宾华侨社会对此十分重视，严阵以待，作好了随时抗争的准备。

哈里森批准簿记法以后，周国贤总领事向美国政府提交抗议照会，要求撤销簿记法。在议会通过簿记案后，中华商会即组织侨众抗争。2月12日，由该会召开华侨大会，讨论对付簿记案问题的办法，决定建立簿记法抗争干部会和经济部。干部会作为领导抗争的核心机构，以李清泉为主任；经济部则负责筹措抗争活动经费。在该案被总督批准后，华侨群情激愤，各埠华侨社团纷纷电请中华商会合力抗争。中华商会决定诉诸舆论，并与美国交涉。于是，由李清泉派出薛敏老（即Albino Sycip）和吴克诚（即Rafael Gotauco）二人，赴美阐述华侨对簿记法的立场。

薛敏老，福建思明人，薛芬士之弟，1887年生于菲律宾。六岁回国肄业，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专攻法律。1912年毕业，得法学学士学位。回菲律宾执律师职，成为侨社各大团体法律顾问。平时，华侨个人或社团遇法律问题，“皆先生是商，皆先生是决”。在谋求撤销簿记法的交涉中，“先生奔走呼号，苛律谋除中之有力人员也”^①。吴克诚名泽投，福建晋江人，17岁渡菲。后集资购买机器，设厂备船，在三宝颜附近大规模经营木业，“创华侨在商界从来未有之伟业”^②。薛、吴二人为谋侨界福利，牺牲个人利益，欣然承担重任，首途赴美交涉。他们途经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时，将华侨的处境、簿记法的苛刻及其对华侨的不利等情况，详细地向政府要员、各地商会、团体、各界人士及在华各界美国人士介绍。他们还向国内群众、旅华各国侨民广发传单，呼吁他们同情和支持华侨为撤销簿记法而进行的斗争。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63页。

②《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86页。

这些活动,在动员舆论,争取支持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南、北政府的外交要人、各地社团、各舆论机关,都主张郑重交涉,愿作华侨抗争的后盾。他们纷纷向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发出电报和信件,要求南、北政府就簿记法问题同美国政府举行谈判。中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向美国正式提出抗议。连在华的美国各界人士,也表示支持华侨的抗争。在华美国商会认为,在簿记法中排除中文是一种失误,该法应予撤销,或适当修改后再提出。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侨社也纷纷声讨簿记法,全力支持菲律宾华侨的斗争。在美国,波特兰商会决议,谴责该法是对一个友好民族的不友好法令,要求总统、国会予以否决。在马尼拉,美、英、西、法、荷、瑞士、犹太和日本的重要商行总经理也通过决议,支持华侨抗争,认为中国商人对菲律宾经济发展曾作出重大贡献,且一向表现诚实、值得信赖和热心公益。指出簿记法是极不明智、不公正、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是极端不利的。在群岛正经历着一场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该法的实施,必将加深经济不景气^①。

面对簿记法造成的严酷现实,华侨社会团结一致,风雨同舟。5月,全菲华侨商人举行大会,研究用一切合法手段,阻止簿记法的实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当时正奉美国政府派遣在菲律宾进行调查群岛情况的伍德一福贝斯使团,运用其影响,取消簿记法。大会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机构,以便向全菲侨胞经常提供影响侨界利益的立法问题的信息。大会还决定推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加强侨界团结,扩展华侨商业,进一步密切侨商与当地消费者的关系,更加关注影响华侨社会的内部和外部问题,在全菲各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90—191.

省建立中华商会分支组织，加强各华侨商业组织间的团结等^①。

在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下，薛、吴二人到达美国。他们会见美国两院议长、国会菲岛事务委员会、海军部和陆军部长、陆军部岛务局局长等有关长官，陈述此法之不合法、不公正，以及将给华商带来的困难。他们以马尼拉中华商会和菲律宾群岛全体中国居民的名义，交给美国国会《关于菲律宾立法机关2972号立法的备忘录》。其中说：

华侨商人并非新来者。他们就象山川溪谷之于那个美丽群岛一样，是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几乎不可能称他们为外国人——他们是菲律宾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对任何为公众服务的征召都一贯热情响应。……他们构成群岛的商业阶级，正如菲律宾人构成官员阶级和农业阶级一样。……这些散布各省的商人，贷款帮助菲律宾人种植和销售他们的农产品。华侨商人购买他们的农产品，并将之出口，又运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华侨商人构成群岛商业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听过有关他们的买卖业务的怨言。人们普遍承认他们是诚实、公平和正直的。他们的声誉高于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可以看到的任何商业团体的声誉。……华侨商人并非是非律宾所特有。在大洋洲的所有岛屿、荷属东印度、马来亚联合邦、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有华侨商人。正如他们之于菲律宾那样，他们在这些地方也构成商业阶级；这已经经历过许多世纪了。许多国家对这些地区握有统治权。但除了菲律宾的簿记法之外，还没有那个主权国家设想过制订一个如此不合理的、使人难以容忍的法律。……要是允许该法生效，那么，中国人就不能再认为美国是一个需要给予公平待遇的国家！这样说是不会过分的^②。

美国各有关当局表面上对华侨的申诉表示谅解和同情，但以种种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90—191.

②Hayden, *The Philippines*, PP. 709—710.

理由（例如不愿干涉菲律宾议会的立法，已委托新任总督伍德妥善办理等等）进行搪塞，并要两代表回菲律宾再向议会请愿，由议会自动撤销该法。因此，两代表在美交涉，除唤起舆论界注意之外，未曾收到直接效果。

当伍德被任命为总督，在赴菲履任途经上海时，在上海的总商会、银行公会、华侨联合会等团体，都出面力请他就任后关心簿记法。及至他抵达菲律宾，巡视各地，地方华侨团体也先后告诉他华商的营业情况及施行簿记法将给他们带来的困难等情况。伍德因而对华侨的情绪及施行该法的实际困难有较多的了解。为了充分听取华侨对该法的反对意见，菲律宾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于1921年10月21日举行公众意见听取会。由中华商会主席李清泉、秘书刘窝、薛敏老和另外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听证会，陈述华侨的意见。代表团提出华侨社会反对簿记法的理由有四：首先，华侨商业是群岛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簿记法不仅仅对华侨的利益是不利的，对菲律宾商业同样是有害的。其次，如果商人真的要欺骗政府，则用任何一种已知的语文，都是能够做出欺骗行为的。再其次，这种立法一旦实施，则在所有存在华侨商人的国家都可能仿效而使之变得具有普遍性。第四，在菲律宾的革命年代，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菲律宾的革命事业的援助和支持大于华侨的支援。如果华侨为此要求菲律宾有所表示的话，那就没有比现时撤销簿记法更好的表示了^①。

鉴于华侨对簿记法的强烈反对和执行上的困难，伍德于10月26日劝议会推迟对该法的实施。华侨也派代表要求议会废除该法。但议会以华侨曾向美国申诉，不尊重菲律宾议会为由，拒绝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91—192.

华侨的要求，只将实施日期修改为1923年1月1日。

华侨为此继续进行抗争。1922年继续与总督、两院进行交涉，并且做好准备，一旦交涉失败，菲政府强制执行该法，即诉诸法律。在此关键时刻，杨孔莺和许敛（一作许拈）愿学13年前的陈三多，自告奋勇，以身当法，充当原告。

杨孔莺，福建南安人，在马尼拉开设振益木材厂，在厦门办有华侨兴业公司，历任善举公所、教育会、木商会、宏农俱乐部、中华商会董事、会长等职。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在创立南洋闽侨救乡会、旅菲泉永民团后援会的活动中，奔走呼号，组织联络，输财出力，卓有功劳。他关怀侨乡教育，且一手谋划，在厦门“辟地南普陀，傍山临海，凿石疏泉，杰阁崇楼，蒔花种树”，建筑村落，“曰大南新村”。适簿记法抗争需人担任诉讼原告，杨孔莺抱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曾有人劝他不要以身当法，“意谓居人篱下，与立法机关对垒，无异以卵击石，且胜必益深菲议会仇恨，将更待我以横逆，败则依法惩处，将无法自解。”杨孔莺愤然曰：“吾所争者侨商之利也，苟为此而受挫，庸何伤？”^①大义凛然，可敬可佩。

许敛生平未详。

1923年1月1日，簿记法正式生效。杨孔莺、许敛及另外两位陈姓、张姓的华商仍用中文记账，因而被税务局控告于马尼拉初级法院受到逮捕，账簿全被缴去。

在初级法院宣布杨、许二人违反簿记法之后，两人便于3月7日迳自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判决2972号法令违反宪法。并郑重声明，这次上诉，不仅是为着个人，实在是代表全菲华商，请求最高法院制止实施簿记法。但在1925年2月6日最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68页。

高法院的判决中，却宣布簿记法有效和符合宪法。

按当时的法律规定，美国最高法院对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所有涉及美国宪法、法令、条约、所有权、权利和特权的案件诉讼的最后裁定和判决，有权进行复审、改变、撤销、减缓或批准。华侨在菲最高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后，决定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薛敏老和吴克诚二人代表菲律宾华侨，又聘请两名著名律师，共同研究诉讼办法，控告簿记法违反美国宪法。当时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也受侨社之托，给予法律上的帮助。施公使并亲自以律师身分，在美最高法院为讼案辩护，并以菲律宾华侨的名义，向该院提交备忘录。备忘录强调指出：簿记法“不仅是个地方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规章问题。它具有国际性的深远影响。……要是准许该法付诸实施，那么，可以设想将引起报复行动。这是合乎情理的。中国可能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华美国商人用中文记账；这样一来，在华的美国商业就要寿终正寝。”^①

备忘录提出的暗示性警告，是符合对等原则的。美国当局不能不考虑维护美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而且，禁止用中文记账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是违反《菲律宾人权法案》的。那个法案规定：不得颁布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就褫夺任何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或否认给任何个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的律。它也违反美国的宪法，因为它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华人个人的自由和财产，且否认华人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其首席法官就是前任菲律宾总督、前美国总统塔夫脱）于1926年6月7日宣布簿记法违反宪法。

中华商会经过五年多时间、花费16.7万多比索巨款的簿记法抗争，至此取得初步的胜利。华侨对这一得来不易的胜利，欣喜

^①Hayden, The Philippines, P. 206.

异常。但斗争远未结束。

7月初，菲国会又提出新簿记法。新法案极力避免与美国宪法抵触，避免外国商社特别是华侨的反对。其办法是：在群岛商务中使用中文记账将不作为一种犯罪行为，但要用英文、西文或当地文字等其中之一种与中文同时记账。新法对旧法虽有所改良，但在企图通过立法使华侨失去在菲律宾的商业地位这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中华商会立即召集各商会，推举代表向菲议会申诉，指出：

一种账簿登记两种文字，其难一；账簿既须翻译，必添聘西文书记，用费浩大，其难二；账簿须经地方法庭逐页盖印，手续既繁，且须纳费，其难三。至记账之有无作弊，则用西文，何独不能？此例如实行，殊欠公允^①。

在这新一轮抗争中，侨社着重于向议会疏通、交涉，强调要求在华侨与菲律宾人之间建立更良好的感情。侨领李清泉（这时他是中华商会的董事）甚至公开表述这样的信念：两个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应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②。

经过多方解释、疏通，菲议员也认为新簿记法是针对华侨的。经过磋商，终于达成一项折衷办法，这就是后来在1926年12月2日通过的第3292号法案。新法案的主要点是：华商账簿可以不用英文、西文或当地文字记账，但每页须缴纳查账费一仙，作为必要时的翻译费用，其翻译责任归政府负责；不必赴法庭逐页盖印；1928年1月1日开始实施。

至此，簿记法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获得解决。此后

①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概况》。

②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99.

近十年间，政府和华商之间，在簿记问题上相安无事。

1936年11月，即自治政府成立一年后，订定新簿记法，允许用当地一种文字或英、西文以外的文字记账，但要求所有账目都须翻译成政府承认的三种文字之一种，并由簿记员及经理宣誓证明其账目的准确性。这时，新法案已难不倒华侨商人了。因为，华文教育已有30多年的历史，华侨子弟中懂英语者为数众多。而且，华侨在簿记法的长期抗争中痛切地认识到要继续在菲律宾商业领域立足，非解决使用外文记账的问题不可。所以，华侨青年受商业教育，学习商业会计的大有人在。到30年代，不但不缺簿记员，就是会计师也不罕见。新簿记法虽是针对华侨，但已限制不了华侨。为与菲律宾人民及当局友好相处计，华侨也不准备进行新的抗争。因此，在议会通过该案之后，自治政府总统奎松签署该案之前，侨社领导人士只希望在实行新法之前有个准备时期。于是，中华商会与奎松交涉，后者同意展期一年，即1938年1月1日才付诸实施。

簿记法抗争，是菲律宾华侨社会为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经营自由而开展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斗争，前后历15年之久。这次抗争，加强了华侨社会的团结。中华商会不负侨社所望，长期坚持领导侨界进行抗争，它的威望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作为华侨社会领导团体的地位更加突出。在组织上也得到显著的发展。几乎在菲律宾的每一个省都建立了中华商会。通过这些地方商会间的横向联系，以及它们与中华总商会（即马尼拉中华商会）的纵向联系，各地华侨间的关系（包括商业关系）更加密切了。

四 菲化政策的实施和华侨的抗争

经济菲化运动，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其目的

是要剥夺或限制外侨经济阵地和发展机会，以此提高菲律宾人的经济地位，进而实现由菲律宾人掌握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维护经济独立，这是国家主权以内的事情，无可厚非。但在实施这种政策时，对所有的外侨都应平等对待；既要考虑历史因素，肯定他们对发展该国的贡献，也要照顾现状，给受政策影响的外侨以生活出路。但经济菲化政策往往是专门针对华侨的，因而是带有民族歧视倾向的经济政策。

菲律宾自治之后，菲化政策开始大行其道。但最早的经济菲化措施，可追溯到1923年菲律宾议会通过的内海航运法案（The Coastwise Shipping Trade Act）。

菲律宾群岛大小海岛数千个。岛间交通运输完全靠内海航运维持。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岛间航业掌握在西班牙人手中，但因船只不足，中国帆船也参与这种航运。美国占领以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商业网的扩大，航运日益发展。从事这项业务的，有菲律宾、美国的公司，也有其他外国人包括华侨的公司。华侨经营的航运公司，主要有^①：

彬彬行——有大轮“北京号”，川走塔亚巴斯和马林杜克两地。

万益行（杨升高）——有“杨升高号”轮船川走苏里高、塔克洛班和卡加扬（米萨米斯省）之间。

蔡燕运输办事处（蔡燕）——有小轮、小汽艇数艘，运行于菲律宾各口岸城市间。

郑正益行（郑焕彩）——该行航业部拥有轮船五艘，川走各

^①吴承洛：《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第四编，第1—3页；周幼葆：《菲律宾华侨航海事业》；《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96页。

口岸城市。

泉益行（施光铭）——拥有“泉益”、“千里世示”等五艘轮船，来往各口岸城市。

洽成行（杨嘉种）——有“孙獭号”及“仙里龟叻”两艘轮船，为华侨经营内海营运之第一家公司。

此外，怡朗有捷丰行、华商轮船公司，宿务有金顺昌公司，都备有或租用轮船行驶各港口。

这些华侨航运企业，有的是配合本公司的业务，运输各地土产，兼营客运；有的是专业公司，承办货运或专营客运。华侨和菲律宾人在航运业方面，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业务经营上，菲律宾人当然竞争不过华侨，但菲律宾人却握有立法权力。而且，按国际公法，各国沿岸三海里的海面属各该国领海，各国领海及内海（或内河），一律禁止外国船舰航行。内海航运法案，正是运用这两种无可置辩的权利制订的。

菲律宾内海航运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

下列个人或团体享有内海航行权：菲律宾人；居住菲律宾之美国人；全部由菲律宾人及美国人组成之团体；其资本75%以上属于菲律宾人或美国人之团体或公司。

吨位15吨以上之轮船，在1918年2月8日已依法在菲注册者，可享有内海航运权。但其所有权不得改变。如果是团体或公司，其股份不得转售予非菲律宾人或非美国人。

凡轮船为正式运转或将用于正式运转而请求注册，非经海关关长查验满意，并享有内海航运权者，不准注册。

凡轮船之租赁、转卖、让与或抵押给非菲律宾人或美国人，而事先未获海关关长之准许者，向他国注册或挂他国旗号，而事先亦未获得准许者，以及航运时违反本法令任何条例者，应由菲律宾政府没收。

任何个人、团体、公司及社团，凡违反本法令任何条例者，科 5 000比索罚金，或五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科。

在内海航行法制订期间，侨社、华侨航业界及中国驻菲总领事馆，曾酝酿抗争，但碍于国际法承认内海航行权属国家主权，各国有权制订有关法令，因而未付诸行动。根据该法令，华侨航业界虽仍准从事内海航运，但不能添置新船。就是建议以同样吨位新船替换旧船，经议会讨论也未能通过。因此，华侨航业界就只有随着船只的老朽而退出航运，最后结束营业。到日军占领菲律宾时，侨界所剩少数船只，也被日军征用、破坏，华侨在菲律宾内海航运业的历史便告结束。

菲律宾政界掀起经济菲化运动的一个重大目标是零售业。一些菲律宾人向来把清除华侨在零售业的势力，作为清除华侨整个经济势力的首要任务。

菲化零售业的设想，早就在民族主义者中产生。1905年，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发起一个“阿雷瓦洛运动”（Arevalo Movement），鼓励菲律宾人开设零售店，并提倡菲律宾人光顾菲律宾的零售店。他们希望借这种方式，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支持菲人零售店与华侨零售店竞争。但由于菲律宾人在经营方面不如华侨，这个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1923年，国家主义者罗塞斯为鼓励菲人与外侨零售商竞争，建议由政府拨出专款，给有意经营零售业的每个菲律宾人 1 000比索的无息贷款。但这个建议也因遭到主张零售业菲化者的反对而得不到实行。

自20年代起，零售业菲化运动有较显著的进展。这主要是菲律宾当局和民间团体予菲律宾人零售业以有组织的推动。簿记法的通过和实施，实际上就是以剪除菲律宾零售商的竞争对手为其目标的。同时，菲律宾当局一面通过提倡大公司密切与菲零售

商的联系，给后者以种种便利和支持，一面号召菲律宾人买菲律宾的商品，以解决菲律宾零售店的货源和销路问题。为解决资本问题，政府又设立国家银行，还提倡和资助私人设立各种银行，予零售商贷款以方便。

在当局的积极推动下，1929年2月6日第一次召开全菲菲商大会。大会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全菲商会，联络全菲菲律宾商人，力谋菲商与政府合作，求得群岛工商业的发展和使菲律宾人在菲律宾商业中占首席地位。在讨论到零售业时，大会力主菲商销售菲货，菲人购买菲货，使外商不能从中取利。大会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成立全菲菲律宾商人联合会，并在各城市设分会。一是由菲律宾商人集资100万比索，组织商业银行。两个决议，都是要有组织地加强对华侨商人的竞争。

一些鼓吹商业菲化运动的团体也先后建立。如1930年成立的“新卡蒂普南”，以及1934年建立的“民族经济保护协会”等。

随着菲律宾筹备实现自治和自治政府的建立，零售业菲化之议更是甚嚣尘上。1934年，菲律宾为实现自治而召集制宪会议。一些国家主义者趁机大肆活动，希望把菲化的精神写进宪法。他们对宪法中已规定土地、自然资源开发、公用事业菲化尚嫌不足，又提出要在宪法中写上零售业菲化的条文。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制宪会议多数议员赞成零售业菲化，但认为没有必要在宪法中写上这样的条文。但国家主义者坚持本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现政府菲化零售业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参议院议长奎松表现了他的持重和务实态度。他向议员解释说：

我执政的目标之一，是要予菲律宾人在我国的商业活动中获得日益增大的份额的要求以一切方便。这一政策，是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所促成的，而不是由一种狭隘的或感情冲动的国家主义所驱

使……。但菲律宾商人切不要以为，政府会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或者在忽视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在菲律宾从事合法商业活动权利的情况下，给予他们特殊的优惠。在我们的宪法中，规定给予美国人像菲律宾人一样的照顾。至于其他外国人，除了国际法和我国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之外，他们还享有平等和公正待遇的权利。因为，在我国人民还未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就已协助我国的发展了。菲律宾商人有权期望于政府的、而政府又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手段，例如，各种金融机构，贸易和交通的方便，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机会。换句话说，政府正推动和鼓励菲律宾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我国的商业和工业。但是，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他应当以真诚、明智和坚毅的努力去开辟前进的道路^①；他必须做好准备，以便适应合理竞争的高要求，因为，只有在同等的机会下，他才有权期望得到他的同胞的保护。我们不能、也决不能接受一种从任何角度都可能被看作是敌视外国人的政策。在帮助我们的物质进步方面，这些外国人正在做的和今后可能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作过低的估计。吸引外国资本，一直是我主要关切的事情之一^②。

奎松认为，在宪法中对零售业菲化的硬性规定，可能引起与有公民在菲律宾从事该业的国家邦交上的紧张，特别不敢开罪于日本。他也认为，由菲律宾人控制本国零售业，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时机尚未成熟，菲律宾人的经营能力，还不足以取代外侨零售商的地位。

由于奎松的地位和影响，经过他的解释之后，零售业菲化问

①关于这一点，菲律宾商业局局长托马斯·孔费索尔在1933年也曾论及，但比奎松坦率得多。他说，如果菲律宾人要通过“合法的”（非政治的）手段取代中国人，他们就应发挥华人的经济效率，并为社会提供现在由华人提供的服务。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45 note 28.

②Hayden, *The Philippines*, PP.708—709.

题未列入宪法条文。但制宪会议却又通过一项决议，授权国会制定零售业菲化的法律。这无异于为极端国家主义者在零售业菲化问题上，继续兴风作浪留下后路。在菲律宾自治时期（1935—1941），国会众议院几度通过零售业菲化案，但由于参议院和奎松总统都采取慎重态度，这些菲化案终未能成为法律。

与零售业菲化长期议而未行的情况不同，公共市场菲化（Nationalization of Public Markets）酝酿的时间较短，但通过较快。零售业菲化与公共市场菲化，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首先，公共市场摊商实质上是零售商，是零售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公共市场摊商中的外侨全数是华侨，他们在资本、经验、勤劳习惯和信用方面，都远胜于菲律宾摊商，后者难与之竞争。再其次，既然零售业菲化涉及国际关系，又涉及商业的正常运转，因而未能实行，那么，把涉及面较小的公共市场摊位菲化，作为零售业菲化的第一步，以便取得将来实施零售业菲化的经验，对于国家主义者的排外欲，未始不是一种补偿。

1939年11月，马尼拉市议会讨论一项议案，禁止外侨（美侨除外）在公共市场设摊营业；已经营业的外侨，限在条例开始执行后三个月内退出。法案一经传出，侨社团体即进行抗争，同时着手调查华侨摊商状况。当时中国总领事杨光泐，也分别向美国驻菲高级专员、菲律宾总统、内政部、司法部和马尼拉市市长提出抗议，指出该法案违反中美间的条约，又违背奎松宣称的尊重外侨权利的原则。马尼拉市市长在该案于11月27日原则上通过后，予以否决。内政部部长也奉总统意旨，下令马尼拉市议会暂停该案讨论。但马尼拉市议会态度坚决，于1940年3月重提此案，并草草通过。其内容如下：

一、除菲美籍公民外，任何人都不得在马尼拉市各公共市场内以任何方式经营商业。外侨在各公共市场已有商业并领有相当

执照者，应在本条例经市长批准后三个月内退出所租摊位。

二、任何有资格在公共市场经商者，不得雇用非菲籍店员。

三、违反本市政条例者，除科以20比索以下罚款，或处以不少于20天之监禁，或两者并科之外，其在公共市场内之经商权亦应予以剥夺。

该案还须市长批准，才能成为法律。

公共市场菲化案虽限于马尼拉市，但侨社充分认识其严重性及深远影响。据1940年7月8日全市摊商联合会调查，马尼拉10个大公共市场共有摊位7 000多个，其中华侨摊商854家，占有摊位2 765个，华侨雇员共达2 159人。这项菲化案一旦付诸实施，这几千人连同其家属，将完全丧失生计。华侨摊商经营规模虽小，资本也有限，但其营业对华侨商人了解整个商业行情起着晴雨表的作用，市场摊位这个阵地一旦丧失，对华侨商务将产生严重的影响。马尼拉实施公共市场菲化之例一开，其他省市势必群起效尤。而且菲化政策既可在公共市场实行，则它在商业其他领域也可实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公共市场菲化案正式通过后，侨社如大难将至，群情汹涌，纷纷起来抗议，一致主张抗争。中国总领事杨光注再次出面交涉，致函马尼拉市长，指出：马尼拉华侨都是合法入境者，理应享有经营普通事业以维持生计的权利。剥夺他们合法谋生的权利，使他们陷于失业，无以为生，等于驱逐外侨。公共市场营业应注重公平原则，不能偏重法则，以为公共市场为市政府所有，市政府就有权选择租户。华侨在公共市场租摊营业，已有多数年，他们辛勤工作，和平服务，是人所共见的事实，现在突然剥夺他们的生计，是不合理的。经过侨团和总领事的交涉、抗争，马尼拉市市长于4月再一次否决该条例。

1941年，菲议会通过公共市场菲化案，从而使公共市场菲化一下子扩展到全国范围。该案规定该条例自1942年1月1日起实

施。杨光注总领事据理向菲政府交涉。菲律宾自治政府也鉴于中国正在艰苦抗日，日本南侵野心日益显露，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不敢在这样的时刻恶化菲中关系，因而同意延期三年，至1945年开始施行，让华侨摊商有时间改营他业。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菲律宾，公共市场菲化法未能按时执行。

在战前，菲化政策冲击所及，不仅上述诸项，而且扩及下层华侨劳工。在菲律宾的华侨劳工，大约近万人，大多是商店的职工及工厂的熟练工人，且多就业于华侨企业。但菲律宾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却企图用挖肉补疮的办法，通过排斥华工，为众多的菲律宾失业者增加就业机会；鼓吹劳工菲化。菲国会曾于1939年和1940年先后两次提出劳工菲化案。前者规定厂、店职工在10人以上者，90%应为菲、美公民，10人以下者，外侨（美人除外）不得超过5人；已在厂、店供职之外侨，继续保持职位，但新招职工，必须按上述标准。后者规定，厂、店职工在15人以上者，80%须为菲、美工人。两个法案都规定违例者科罚。劳工菲化案的实施，不仅影响上万华侨职工的生计，华侨企业亦将因失去熟练工人、可靠职员和店员，而致业务受到打击。而且，要用使一部分原有职业的人失业的办法，使原来失业者中小小一部分人就业，既非根本办法，于事无所裨益，对外侨也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对此，马尼拉中华商会等侨团进行了交涉。两个法案都得不到议会的通过。

五 1924年的排华风潮

美国殖民者对华侨的虐待、限制政策不但使华侨受到直接的损害，同时也鼓励菲律宾某些势力对华侨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

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招致有民族自尊心的菲律宾人

的反感。其中，特别是既允许菲议会有立法权，但总督、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都可以否定菲议会通过的立法；美国最高法院可以撤销菲最高法院的裁决，更是无视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感情。但在菲律宾有关华侨利益的立法和裁决方面，在华侨按菲美的法规向美国申诉或上诉时，菲美在立法和司法问题的矛盾，却转变成成为菲律宾人对华侨的不满。这是极其违背常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侨被挟在互相矛盾的两者之间，成为不满意一方的“出气筒”。特别是象围绕簿记法问题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一位总督违背国际公法和人权原则，唆使菲律宾议会通过簿记法，而后自己又迫不及待地签署那项法令，使华侨不得不向美国申诉，接着又由美国指示一名新总督延迟那项法令的施行。这不啻是美国人故意挑逗菲律宾人的仇华情绪。所以，在簿记法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华侨与一部分菲律宾人之间的感情之恶化，在1899年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些菲律宾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把对菲美行政、立法、司法关系的不满倾泻到华侨头上，把华侨就簿记法问题向美国申诉和上诉，指为华侨借美国政府和最高法院的力量，压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最高法院。国会议员也以华侨不尊重菲律宾议会而表示不满。在舆论的影响下，一部分菲律宾人仇视华侨的心理又逐渐滋长。在街头路尾骚扰华侨及其店铺的事，不时发生。

菲律宾敌视华侨的势力，对几个世纪殖民主义统治在菲律宾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却把造成他们国家落后，人民贫困的责任，错误地加诸华侨头上。他们“对华人的敌对情绪，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华人是外国人，他们的竞争危害着菲律宾人的生计”^①。在这些势力的煽动下，菲律宾社会存在着一股排华暗流。因此，那些居心叵测者，通过谣言、新闻、文艺、演讲等手段

^①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543.

段，煽动排华暴行，并非难事。

在1924年排华暴乱发生之前，谣言纷起。一个谣言说，自上个月以来，菲律宾人一直在进行一场针对华侨零售店主的静悄悄的运动，以便抢走他们的生意。另一则传闻说，市政官员在分配公共菜市的摊位时，菲律宾人已被赶走，以便使华侨摊商占有他们的摊位。一些极端国家主义者，更趁机出面煽动排华情绪。一名叫做德洛斯·雷耶斯的参议员，利用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借敲榨中国移民自肥这样的老问题，大做排华文章。他说，行贿受贿的行为应对大量中国移民进入菲律宾负责。要是政府认为自己不能制止中国移民，那么，人民就会认为把华人赶走是正当的。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生存的权利。这犹如在一部分菲律宾人敌视华侨的感情中火上加油。马尼拉的圣尼古拉和顿多的菲律宾劳动人民，在所谓“爱国团体”的煽动下，已打算抵制华侨商店，只买菲律宾零售店的货物。排华情绪已被激发起来。这种局面，同1603、1639和1662年三次大屠杀前夕的情景，颇有相同之处。

暴乱发生的直接导因，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买卖争执。马尼拉市桑托克里斯托街的一名华侨店主，向一个菲律宾推销员订购六打润发油。10月18日，推销员却送来12打润发油，还搭配12打胶球。华商拒绝收货，两人由争执而起殴斗。推销员请来了警察，后者袒护推销员。华商不服，与警察大声辩论。警察则以华商有意轻慢和藐视，一面吹警笛，一面拔枪射击，把庄姓侨商击毙。

警察的情绪，明显受到排华气氛的支配，带有借故杀人的性质。但事情传开后，当地受排华情绪支配的人还群起鼓噪，指责华侨目无菲律宾法律，藐视维持治安的警察。一些人居心恶毒，乘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着意把事态扩大。他们说，在上述冲突中有两名或更多警察被华侨杀害。这使不明真相的群众激愤

异常。第二天（星期日），华侨照例悬挂国旗。这被别有用心地指为向当地人宣战的表示。受蒙骗者因而群起骚动。这天上午，全城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人在街头寻衅滋事，打砸、劫掠华侨商店，袭击过往华侨。警察对此视若无睹，甚至参与袭击。许多华侨受伤。华侨商店纷纷关门。马尼拉主要华侨区——罗萨里奥、圣维森特、桑托克里斯托、努瓦、干打拉等大街和比农多区，象深夜一样静寂。平时，海关大厦挤满成百上千处理商务的华侨，现在空无一人，只有公务员闲坐在那里。两批乘岛间轮船抵达的华侨，受到无赖的攻击，在警察受命前来保护之前，这些华侨旅客已饱受冲击。到20日，由于当局采取断然行动，逮捕一名美国人，47名华侨和252名菲律宾人，马尼拉的局势才得到控制，秩序稍有恢复。

暴乱在马尼拉还未完全平息下来，便已向外省蔓延。特别严重的暴乱发生在新怡诗夏省首府卡巴纳图安。那里的华侨受到群体的袭击，侨店被抢掠、打砸，一些华侨惨遭杀害。

马尼拉社会秩序开始恢复的当天，不甘就此罢休的排华势力就蓄意扩大事态。20日下午两点钟左右，泰加洛文报纸《瓦塔瓦特》（Ang Watawat）以一版篇幅，危言耸听地刊登一则荒诞不经的“报道”：

华人与菲律宾人间的乱子已蔓延到上海。据一家在上海有分行的马尼拉商行收到的电报说，在首次冲突中，已有80名菲律宾人被杀。……该市菲律宾人已武装起来，以应不测。

该报还编造谣言，说华人小店主正打算投毒以毒杀菲律宾妇女。另一个更具煽动性的谣言也广泛流传，说是当地的华侨杀死一名菲律宾婴儿，将其肢体用于施魔法和熬药。

20日的《瓦塔瓦特》报出版后，当局没收了报纸的一部分，邮局将另一部分封存。但已经发出的报纸，通过读者之口，不断

被添枝加叶，流传于马尼拉和各省。卡巴纳图安的暴乱进一步发展，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华侨和侨店受到掷击、冲袭和抢掠，九名华侨受重伤。各市镇的华侨、侨店，也多有遭受伤害和抢劫的。马尼拉再次陷入恐怖状态。不少误信谣言的菲律宾人拥上街头，成群结队，磨拳擦掌，遇见华侨，不分皂白，当场施暴。华侨被迫关门闭户以避锋芒。市区的华人区如比农多、顿多和圣克鲁斯，也遭石砸。一些人甚至声言要火烧华人区。华侨商店全部关门，势成罢市。菲律宾人平日都喜欢到侨店购买生活品。但现在照常营业的只有菲律宾人的零售商店。它们马上将商品提价三倍。许多消费者只好不买东西，等待华侨商店重新营业。

排华骚乱初起时，中华商会、善举公所就召集华侨各团体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这一严重问题，还派出代表，会同总领事周国贤向总督伍德、马尼拉市市长罗穆亚尔德斯交涉，要求消弭暴乱，并电飭各省城镇，尽力制止暴徒聚众生事。罗穆亚尔德斯于19日致函周国贤，向侨界致歉。

在暴乱仍受谣言的驱动而继续蔓延的情况下，菲律宾领袖开始感到事态严重。他们认识到，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整个社会生活受到打击，中菲关系受到破坏，而且也可能给美国政府以菲律宾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印象，从而影响国家独立的前途。因而他们也急于平息暴乱。20日下午，由马尼拉市市长和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国家主义者曼努埃尔·罗哈斯，在卢内塔公园召开市民大会。罗穆亚尔德斯、罗哈斯等数人在会上发表演说，说明事件真相，大力进行辟谣。

经过解释、辟谣，一般受煽动者开始冷静下来了。21日，《瓦塔瓦特》报以煽动罪被控告。猖獗一时的排华骚乱，这时才真正平息下来。

1924年的排华骚动消弭了，但导致这场动乱的根本来源远未消

除。排华势力不仅在经济领域不时兴风作浪，以便限制华侨正当经济活动，在政治上也继续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煽动。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菲律宾，对华侨及其财产的侵袭，是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的现象。

在此后发生的此类事件中，较严重较典型的，是1931年2月发生于圣巴勃罗的骚乱。该镇一名菲律宾顾客与华侨小店主的争吵，演成搏斗。这次搏斗吸引了一大群菲律宾人参加。他们从一家华人商店到另一家华人商店，以棍棒和石块捣毁其中的财产。群众性的袭击使圣巴勃罗的市政警察束手无策。为对付估计有2000人的暴乱民众，当局只好从附近驻地紧急调来武装警察。这次排华骚乱平息之后几天，华侨才敢重新开门营业。

第十四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

华侨的爱国运动

前面一些章节已涉及侨社民族意识发生发展的若干方面。本章拟集中阐述美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社会民族意识的发展与国内政治的关系，着重说明菲律宾华侨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关心与支持。

有人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中国当作“天下”，即世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又说，在近代之前，中国人没有国家的意识，只有“世界”这个概念；没有民族主义，只有“文化主义”——对中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没有国家的观念，只有地域和家乡、家族的观念。笔者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本来就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脱离历史，以此苛求古人。但是，既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接触、交往，从而感到中国是个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并以此自豪，产生优越感，那么，说中国人绝对没有国家观念是不符合事实的。华侨有较浓厚的地域、家乡、家族观念，那是由于封建宗法关系和长期远离故国，缺乏国家的保护，怀念故乡故人而产生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并不排斥国家观念而是与之并存的，一旦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1603年，明朝三官员在马尼拉时，华侨热烈欢迎的情景可作佐证。

殖民者的歧视、压迫政策，为侨社民族意识的萌发起着催化

作用。但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由于殖民者的严密控制，也由于华侨尚未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侨社的民族意识迟迟未能萌发，直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以要求设领，办报，兴学等形式开始显示出来。这突出地说明，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政治环境，华侨虽然深受苦难，其痛苦遭遇也不会自行发展为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

一 菲律宾华侨与辛亥革命

19世纪末，中国处于深重危机之中。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为救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或象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提倡变法维新，或象孙中山那样，致力于推翻清政权。但维新派、革命派，都同遭清王朝的严厉镇压，被迫出走海外，把国内的政治斗争带到各地侨社中去。

最先在菲律宾侨社获得立足点的，是康梁的保皇会。1899年，保皇会在卡维特建立支部，不久即迁往马尼拉，出版机关报——先是《益友新报》，后是《岷益报》，为改良运动谋取支持，并使侨众认识祖国所处危急处境。保皇会支部仅存在两年就因会员离散而名存实亡，报纸也停止出版。1906年，康梁派遣徐勤到马尼拉组织“宪政会”支部。改良派再次在菲律宾活跃起来。这时，马尼拉华侨中已有革命党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人数虽少，但富有活动力。这两派在马尼拉的支持者，也展开激烈的论战。可惜当时侨众还未完全觉醒，革命主张未获有力支持。两派在菲律宾的活动，有利于侨胞了解祖国的命运，从而密切了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在侨社的民族意识发展进程中，起了启发引导作用。

1905年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对侨社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1904年，中美《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国内和华侨舆论界，不断提出废约要求，并对美国虐待华侨的措施、暴行进行揭露。在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与美国谈判改约，原则是：可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能禁；可禁受美人雇佣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能禁；可禁未入美之工，而已经在美之工不能禁。条件虽低，美国政府却拒不接受，同时由美驻华公使出面，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出，舆论哗然。1905年5月，上海总商会致电各省商会或商务局，相约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拒绝改约，则将抵制美货。在以后两个月中，美国继续蛮横拒绝改约。一名华侨为此愤然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自杀，又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7月下旬，上海各界首先行动，抵制美货。一时，抵制美货运动风靡全国，又由国内向海外侨社发展。

同美国华侨一样，菲律宾华侨也身受美国排华法令之害。在国内拒约、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下，他们也行动起来，在侨社中掀起反美爱国运动。

1905年8月28日，全菲华人向管理菲岛事务的美国陆军部部长塔夫脱递交请愿书，要求给华侨以其他国家侨民享有的同等权利，要求美国有关当局对“菲律宾群岛的现行‘排华法令’作某种修改”。请愿书在列举菲律宾海关官员对中国移民的种种歧视和凌辱之后，表示极其希望建立“华侨保护协会”，以保护华侨免受凌辱，保障他们的利益和福利，对华工的一切合法要求及需要给予帮助。它要求立即中止加诸华工和知识阶层的凌辱^①。

第二天，马尼拉中华商会在给美国陆军部一份请愿书中，也提出修改移民法，给华侨以平等权利的要求。它说：

①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102.

次于华侨所一致希望的本群岛的繁荣，对于此地华侨社会说来，极为重要的事情是修改在本群岛实施的移民律。这就是说，应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给予华侨与其他外国人平等的权利和特权①。

与此同时，抵制美国人、抵制美国货的运动在侨社也有发展，其首次行动发生在1905年8月18日。这一天，100多名华侨旅客响应广州方面抵制美国一切东西的号召，在已经订了船票的情况下，届开船时间而拒绝登轮，对准备由马尼拉开往香港的“鲁比”号轮船进行抵制。后经了解，原来是华侨误把这艘英国船当成了美国船。这时，马尼拉已存在组织抵制行动的团体。人数虽少但极活跃的侨社革命党人在广东会馆成立抵制委员会。据记载，当时粤侨向该会“捐资以助广州拒约团体者，络绎不绝”②。

正当抵制运动在侨社蓬勃开展的时候，清政府驻菲总领事，却秉承清政府和美国人的意旨进行破坏。12月中旬，身为广州俱乐部执委会成员之一的总领事，以该执委会名义，张贴海报，反对马尼拉的华侨苦力集会鼓动抵制美人美货。12月18日，600多华侨苦力群情激动地在广州俱乐部聚集，谴责执委会和总领事，抨击海报内容，拒绝总领事的要求。参加抵制运动的人数日益增多。但由于清政府和美国政府相互勾结，对抵制运动进行破坏，加以侨社上层的妥协（广州俱乐部执委会的上述行动即是一个例证），抵制运动逐渐平息下去，但“菲律宾华侨抵制美货的影响，直至1907年仍可以在那里感觉出来”③。例如，由于华侨进口商不再进口美国大宗输菲的面粉、棉织品及其他商品，华侨零售商也拒绝出

①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00—101.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84页。

③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05.

售这些美国货，使美国输菲面粉受到好几年的打击，棉织品输菲也显著减少^①。

菲律宾侨社的反美运动，有其本身的原因，即侨胞亲身遭受美国排华法令之害。但它却是在国内的政治运动直接推动下发生的。从时间方面来说，它虽比国内晚近一个月，但其进程与国内运动始终是同步发展的。菲律宾华侨这次政治斗争，使侨社第一次自觉地把自已的活动同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菲律宾侨社密切关心国内政治，积极支持国内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对侨社本身来说，由于各阶层的侨胞都投身反美运动，因而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政治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在1907年欢迎“海圻”号巡洋舰暨钦差大臣杨士琦的来访，以及在随后对西班牙文《商报》的抵制斗争中，都一再显示出来。

侨社开始觉醒，但并不意味着已倾向革命。杨士琦访问马尼拉侨社时，华侨对他的欢迎，一则表示对祖国的感情，一则表现出对清政权仍有幻想。直到1908年，在菲律宾也只有少数革命党的支持者，还未出现革命组织。革命运动未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侨胞政治觉醒还不高。当时，同盟会会员，以新加坡为基地，在海外各侨社展开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但一般来说，菲律宾侨界多数人“时风气未开，民心涣散，闻革命之名，色即为之变。思想落后者，且谓欲致国家于强盛，必待真命天子而后可。”^②他们虽然唾弃慈禧，却继续拥戴光绪，甚至在1908年光绪去世时，侨社还为这位“好皇帝”的过早去世深表哀悼。总之，康梁党在侨社的影响，要大于革命党。

①《菲律宾华人现代史》，《世界日报》，1983年1月3日。

②《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69页。

第二，清政府的专制淫威及于菲律宾侨社。清政府通过驻菲总领事，借美国殖民当局的助力，对侨社的进步倾向，诸多压制。1905年，革命党、保皇党两方的支持者，在马尼拉展开激烈的口头论战，当时的总领事苏锐钊即曾向马尼拉当局施加压力，以图假当局之手，遣散两方的支持者。1908年，香港《中国日报》据实报道总领事杨士钧的腐化和陈腐，杨以向香港法院控告、赔偿名誉损失相要挟，要《中国日报》更正。因此，侨社中一般人，虽“素愤国权之丧失，悲国势之凌夷，咸知非倾覆满廷，别无图强之道。故对革命义举，极表同情；但专制淫威，溢于海外。言及革命者，虽不比国内人民如谈虎而色变；然公然提倡，则亦有戒心。”^①

第三，美国在菲律宾推行的移民律，禁止知识界入境，使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界难以至菲，因而，菲律宾侨社的革命活动较其他地方为迟^②。

但这并不是说，菲律宾华侨界死水一潭，浑浑噩噩。他们还是关心国事的。他们当中也有少数活跃的革命分子，且靠着革命分子的努力，革命活动在侨社还是逐渐发展、扩大起来。早期在菲律宾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志士，著名的有郑汉淇、欧阳鸿钧、杨豪侣、黄汉杰、林日安、陈达三和何宝珩（衡）等人。

郑汉淇，福建思明人。曾负笈香港雅丽士医学院，与孙中山同砚，得医学士学位。1901年至马尼拉行医，“为菲岛华侨业医之先进”。“素主张民族主义，为旅菲闽侨之巨擘”^③。凭着他

①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99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84页。

③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69页。

受过西方现代医学训练，美国殖民当局很快就任命他为卫生局检疫官，“负侨界卫生之责”达20年之久。他利用工作及职务之便，在侨社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侨胞对革命还普遍缺乏正确认识，都担心同情革命而连累国内家属，因而对革命存有戒心；而“先生独具远大眼光，以革命运动为自任，有时登台演讲，……语至沉痛处，闻者辄为动容”^①。

杨豪倡，福建海澄人，菲律宾华侨报业开拓者杨汇溪之子。生长于广东，弱冠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夙有志革命。1903年，国内爆发拒俄运动，留日学生迅即响应，并倡组“拒俄义勇队”，包括杨豪倡在内的留学生纷纷报名入队。此举横遭日本政府及清驻日公使干涉，杨豪倡乃愤而弃学，改至菲岛营商。当时，香港《中国日报》由冯自由主持。杨豪倡在日留学时与冯自由同学。他介绍广东香山县侨商、广泰昌号东主欧阳鸿钧、县安布店闽籍东主林日安为该报驻菲报务代理，又与欧阳鸿钧担任该报义务采访员，同时又协助香港《世界公益报》在菲发行。两报在马尼拉销售数十份，从而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使侨胞逐渐“倾心革命”。1905年秋，在反美爱国运动中，杨豪倡协同欧阳鸿钧等在马尼拉组织抵制一救援会，发动侨胞捐资救援广州罢工工人及拒约团体，每周开会一次，借拒约鼓吹革命。1906年，改良派的宪政会遣徐勤到马尼拉，以图在该处组织分支机构。徐勤在广东会馆召集会议，正欲发表演说，杨豪倡、欧阳鸿钧、柯宝珩、黄汉杰、郑杰等十数人恰赶到，抢登讲坛演说，“痛言君主立宪之不足恃，及康党历来借名行骗”，私吞华侨助款罪行，与会者

①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6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91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18页。

大为鼓掌^①。集会随之而散，徐勤的打算亦告失败。

在菲律宾华侨中，以团体而论，最早支持革命的，是福联和布商会，其会址也成了革命志士集会场所。《福联和布商会成立经过》一文记载：

吾人素愤国权之丧失，悲国势之凌夷，咸知非倾覆满廷，别无图强之道。故对革命义举，极表同情……唯本会同入，多深明大义，悍然无畏，相率活动；虽未明目张胆，创立机关，而不时招集同志，团聚于本会会所，或公开演讲以资鼓吹；或秘密筹议，以作进行。故菲岛侨界之革命运动，即谓开始于本会，亦无不可！且为精诚所激，不仅各个人慨然输资助饷，又将本会所蓄公积之金，所定筵席之费……概行捐充革命军需^②。

1909年初，侨界革命者为传播革命思想，着手建立阅书报社。第一个书报社先成立于卡维特，但很快迁移到马尼拉。其他社区的革命者，也纷纷仿效。这些书报社，大体上由青年鼓动者所建立（成员绝大部分也是青年人），为会员提供革命小册子、书籍、杂志期刊、报纸等读物，也举行公开讲演。通过读书活动，不仅扩大革命队伍，且为日后在菲建立同盟会及国民党支部准备组织基础。

1911年春夏间，香港《中国日报》经理、同盟会会员李其率同盟会南方支部指派至马尼拉，与郑汉淇、杨豪侣、欧阳鸿钧、黄三记、林日安、黄汉杰等人筹组同盟会分会。同年夏秋间，同盟会小吕宋分会成立，入会者有郑汉淇、欧阳鸿钧、黄三记、黄汉杰、王忠诚、邓宝廷、林日安、杨汇溪、郑杰、李棠、李雄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92页；第六集，第184页。

②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99—100页。

等^①，郑汉淇当选为会长。接着，分会又创办《公理报》。

辛亥革命的爆发，破除了侨胞对革命的疑虑和戒心，唤起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革命顺利发展的消息，使侨社人心激动。人们纷纷剪去象征清廷精神统治的辫子，马尼拉城的理发店因而忙得不可开交。华侨商店、餐馆都张贴着报道国内消息的招贴，以致这些地方都成了侨胞讨论国事的场所。为了获得可靠的国内消息，许多华侨每天午后都拥到当地英文报纸《马尼拉时报》报社去，争先购买刚离印刷机的报纸。《公理报》正是为了满足这种迫切的需要，以新闻简报的形式创办起来的。

1911年10月中旬，由郑汉淇主持的普智阅书报社接连在马尼拉大歌剧院演出以革命先烈事迹为题材的戏剧。剧中每提到革命运动，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当戏剧演至高潮，革命旗帜就挥动起来，观众的爱国激情就来一次爆发，歌剧院的屋椽也为欢呼声所震动。“戏剧的情节象革命细菌般感染着成千上万的华侨”^②。

革命的消息也成了募集捐款的动力。在马尼拉大歌剧院的演剧活动，就是为国内革命筹款而举行的。三次演出筹得款项52 000比索。在其他场合，侨胞对义捐也极踊跃。由马尼拉华侨男女青年爱国团体主持的义卖，在两天内就筹集了18 000比索，用以赈济这期间国内遭遇水旱灾荒的灾民^③。马尼拉中华商会在这一年最后两个月和次年1月，为赈济“内乱难民”和“赈

① 杨豪倡当时已回国，未在马尼拉入会。辛亥革命后，他曾供职福建省政府，但未及数月即以病辞世。

②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22—124.

③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123, 127—128.

灾”，有数可见的，共达8 200多比索，另有5 000大洋^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武昌首义的胜利，一些原来对革命持旁观态度的人，现在拥护革命了。从1904—1906年连续三届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的邱允衡，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但革命成败未知的情况下，“慨捐五千元（比索——引者），以为华侨倡，汇归祖国，接济军政府”^②。另一华侨殷商何塞·贝拉斯科·蔡，捐献一千比索^③。这样，在短时间内，募捐运动就取得很好的成绩。据马尼拉报纸报道，到10月18日，已汇给革命政府77 000比索。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又募得3万比索。上述捐款，包括三个晚上演出时所募得的五万多比索^④，但不含赈济、赈灾的捐款。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马尼拉后，许多华侨青年回国投身革命。据报纸消息，至10月17日为止，归国为革命效力的华侨多至900人。与此同时，马尼拉华侨商人还组织了一支习武队，由一名以前曾在日本军队里当过军官的华侨，授以使用武器的训练。起初，参加训练的人还不多，但至10月底，人数很快超过100人。马尼拉许多有声望的华侨，成了习武队最积极的队员。

1912年2月中旬，菲律宾华侨又一次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因为当地华侨收到中国临时政府外交部的通知，革命军已占领北京，宣统帝已于12日宣布退位，临时政府已宣告成立。下面是有关马尼拉华侨区当月15日气氛的一段描述。

昨天，马尼拉城华人区所有建筑都飘扬着新的中华民国的鲜艳

①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9页。

②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59页。

③④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27.

五色旗，埃斯科塔、罗萨里奥街上的华商店铺前也都张挂着五色条旗，同时，欢快的中国人举行庆祝活动。……他们骑着马，乘着用这个新生国家的旗帜装饰起来的汽车和有轨电车专车，欢呼着通过这座城市①。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为国内人民所称颂，也改变了此后的统治集团对华侨的看法。华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华侨在国内享有一定的参政权。1912年3月，福建省政府函告菲律宾华侨选派代表出席议会。在这一年8月10日颁行的临时宪法中，规定海外华侨选派国会议员214名，其中菲律宾华侨应选派六名。1913年，六名菲律宾华侨议员参加国会，他们是马尼拉的代表郑汉淇、何塞·贝拉斯科·蔡、郑蔡哥（音。下同），驻宿务名誉领事代表黄妈官、黄水甘，驻怡朗名誉领事代表叶声。这六人都因对民国的可嘉贡献而被授予“嘉禾”勋章。1912年10月，马尼拉中华商会又应北京政府工商部之召，派施光铭、施至华为代表，出席该部召开的中国工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中国须向美国交涉，准予华工自由入美”议案，该案由会议接受，交由“中国外交部实行向美交涉”②。

二 菲律宾华侨与反帝反袁斗争

从民国初年至20年代，菲律宾华侨又先后投身于反对日、俄帝国主义侵略内蒙、东北，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反对北洋军阀

①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129.

②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9、60页。

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菲律宾华侨都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为祖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辛亥革命，帝国主义本能地采取敌视态度。沙俄和日本在其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在我国东北部制造事端，以实现其领土野心，也借此间接破坏中国革命。

辛亥起义爆发后，沙俄一面向清政府要求外蒙“自治”权和俄国控制外蒙的特权，一面于1911年10月30日在库伦策划外蒙独立，出动俄国军队，赶走清政府派驻库伦的大臣。次年，沙俄更与日本缔约瓜分蒙古和我国东北：循北京子午线，东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西部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傀儡政权订立《俄蒙协约》，攫取“监护”外蒙内政、外交以及各种商业的特权。

这个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各界人士纷纷通电、集会谴责，还进行罢工、抵制俄货和向俄华道胜银行提取存款的斗争。孙中山于12月初，通电全国，提出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抗俄到底的策略，申明“一战不独不亡，而更可发扬国光，卫人道，伸公理于世界”^①的凛然决心。

沙俄的帝国主义行径，又一次触发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潮。1912年10月，菲律宾华侨得到中国可能因蒙古问题与沙俄绝交的消息，且预料中俄间会因这个问题而很快爆发战争。因而，在此后几周中，他们接连举行集会。在会上及平日在华侨店铺中，都谈蒙古问题，都谈论为祖国募集战费问题。在一次有马尼拉侨社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按收入情况订定捐献比例，每月共可捐4万比索。宿务的华侨也表示，如果发生上述战争，他们准

① 转引自胡绳、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及页注1。

备每月拿出2万比索给北京政府。怡朗华侨作出保证，每月提供给政府1.5万比索，直至中国在与沙俄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样，加上马尼拉侨社每月至少4万比索，仅三地侨社每月即可献出7.5万比索^①。由于战争并未发生，侨社因而未将上述保证付诸实现，但华侨的爱国热情，关心国运的精神，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很快便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他在短时间内先后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进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借日本的支持以恢复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有被白白葬送的危险。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讨袁和反日的斗争揉合在一起，先后发生了二次革命、反对日本侵略罪行、护国战争等重大斗争。菲律宾华侨也密切配合国内的斗争，在侨社中一次又一次地开展群众性爱国运动，给国内革命斗争以有力的声援和金钱支持。

马尼拉侨社获悉国内一些省份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进行二次革命的消息，立即由阅书报社召开秘密会议，出席者共80名委员。会后，他们在该城侨胞中募得2.4万比索，以充二次革命的军费。宿务侨胞超越了马尼拉的这一纪录，短期间即捐款2.6万比索，并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如需要更多的援助，还可以增加捐献。还有消息说，有几百名华侨，分多批赴香港，以便进入内地参加革命军。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菲律宾华侨进行一次长达几个月的抵制日货斗争。事情的远因是日本长期以来对我国东北领土的野心；近因则是1912年日本与沙俄订约在东三省划分势力范围，并

①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18.

有传闻说日本派遣两艘战舰到我东北海岸。侨胞认为此举是日本侵略我国东北领土的具体行动，对此表示愤慨，因而发起抵制日货，以示抗议。抵制运动首先开始于巴达维亚，很快扩及马尼拉。各界侨胞、特别是商人纷纷投身到运动中去，反对使用、销售和经营日本工业制品或其他货物。抵制运动的发展，引起美国殖民当局和袁世凯政府的恐慌。1912年11月下旬，北京政府唯恐抵制运动影响它与日本的勾搭，慌忙发电给驻菲总领事杨书文，称中日关系非常良好，抵制行动可能破坏这种友好关系。总领事把北京政府的意见转告马尼拉中华商会。杨书文认为，侨社中存在着“一个不满者的内圈”，他们煽动抵制运动，“要是当地侨社没有这些人，情况要好得多”。美国殖民当局也指使其下属控告救国社（抵制运动的领导核心）个别散发传单的成员。又以救国社对某个华侨商人的生命、财产和声誉进行威胁为名，控告救国社社长郑某（Ty Pat Ty）及五名干事。杨书文乘机要殖民当局对后六人处以流放。但审讯结果，上述人员均被马尼拉初审法院宣告无罪，予以开释。侨胞斥责杨书文“没有爱国心”。甚至在1913年2月联名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召回杨书文。袁世凯为了笼络华侨，不得不于同年5月将杨召回，再派到欧洲任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收回德国侵占的胶州湾，并进一步派兵攻占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一跃成为列强侵华的主凶。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对于日本侵略山东，袁世凯表面上提出抗议，以敷衍全国人民的反侵略要求。对于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虽然未敢立即接受，但却同日本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怒潮席卷全国。菲律宾华侨也团结一致，进行反日斗争。

比萨扬群岛的华侨代表在3月开会，通过一项给袁世凯和北

京政府的决议，保证在政府拒绝接受二十一条要求，从而引发中日战争的情况下，在道义、财政方面给政府以充分的、无条件的支持。宿务侨胞也开会决定，每月捐献给政府4万比索。怡朗的每一个华商，都同意捐献一笔相当于营业税的款项，外加每出口一包糖捐献5仙。这样，仅怡朗的献金即可达数十万比索。

在1913—1915年间，孙中山先是派遣伍平一、李箕、叶夏声等到苏禄、怡朗、马尼拉开展组织工作，并进行募集革命经费、鼓动反袁斗争等活动（1913年10月）。接着又派胡汉民、伍平一到菲律宾南部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秋）。1915年复遣许崇智、宋振、郑洪年、朱卓文到马尼拉指导党务，募集革命经费。这些活动取得重大的成果。1914—1915年，共募得革命经费360 000比索。在原有马尼拉国民党分部之外，又在粤籍侨胞中建立第二党分部。两个支部都宣布忠于孙中山。侨胞中的革命支持者，也坚持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这些活动，也有助于侨胞进一步识别袁世凯的反动本质。

在袁世凯于5月接受二十一条，并在1915年12月复辟帝制之后，侨胞再次加强反袁斗争，主动为护国战争筹款。正当袁世凯指使他的党羽在全国举行所谓团体投票之际，菲律宾华侨却积极地筹备庆祝中华民国建立四周年，以表示他们对袁世凯的政治倒退的抗议。同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与会者严厉斥责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并决定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要他告诫美国银行家不要借款给袁世凯。一些华侨回国参加讨袁战争，其著名人物之一是国民党马尼拉第二分部机关报《民号报》的编辑李思轅。他参加了第七军团，以中校身分战斗于汕头、兴宁一带。

华侨虽远离祖国，但对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问题，是极其敏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华侨盼望中

国以战胜国地位，收回山东的主权。1919年2月初，菲律宾华侨致电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他们要求废除1915年的中日条约，废除列强关于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秘密协议的严正立场。马尼拉中华商会也拍电回国，“请本国息内争，以全力为出席欧洲和平会议我国代表后盾，力争国际平等地位”；又通电“拥护出席和平会议诸代表，力争公理，并请为国努力”^①。但把持巴黎和会的美、英、法、日、意等国却一意孤行，拒绝中国代表的严正要求，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使侨胞大失所望，并作出强烈的反应。在国内“五四”运动影响下，他们又一次使用他们所能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抵制日货。他们又拒绝参加菲律宾当局在这一年8月所组织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以表示对和会偏袒日本的态度愤慨。中华商会、广东会馆、华侨教育会、华侨学生联合会在致菲律宾当局的决议中公开表露了这种愤慨情绪。中华商会致函菲律宾总督哈里森：“表示因山东问题，不愿参加欧战胜利的庆祝”^②。华侨学生联合会的决议说：

我们，……强烈地反对和平条约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日本取得对山东省胶州半岛的控制，并成为该半岛的所有者。有鉴于此，为了忠于我们的国家，我们拒绝参与在胜利的幌子下而举办的庆祝活动。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活动恰好就是一种挫折和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14点的直接亵渎^③。

在这次爱国运动中，华侨学生第一次参与政治斗争，并在斗

①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2页。

②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2页。

③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38.

争中起积极的作用。站在学生运动前列的，是马尼拉的华侨学生。他们不仅同其他华侨团体一起，对“胜利庆祝”明确表示拒绝，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华侨学生联合会，较早地开展斗争。他们组织的华侨学生戏剧社，还演出一系列戏剧，借以显示他们的爱国感情，并借此筹集款项，汇寄回国，支援国内同学的爱国斗争。此后，华侨学生联合会还出版《救国日报》（1923），

“宗旨是与海内学生一致主张，宣传救国”；又出版《晨钟》等不定期刊物作为宣传手段，分送侨众。因而，华侨学生联合会也就“成为侨界中有力机关”^①。

在此后将近十年的国内军事割据，军阀混战，南、北政府对峙的严重局势中，菲律宾华侨始终站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一边，支持祖国的统一事业，支持北伐战争，并为此给南方政府以巨大的道义和财政支持。1927年初，一些华侨学生和居民，甚至纷纷回到祖国，或者参加北伐军，或者到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以中国国民的身分，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努力。

三 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形成以中国为其侵略目标的既定国策，对中国的军事挑衅事件和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也频频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反对日本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人民最迫切、最主要的任务。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菲律宾华侨，在民族危机中同国内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反对日本

^① 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报纸事业》。

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不仅作国内同胞反日斗争的后援，而且在异国土地上利用合法手段进行反日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蒋、桂、冯、阎四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北进，发动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的战争。日本为阻止英美势力北向发展，维护其在中国北方的势力，悍然占领济南，截断津浦铁路，并在济南展开血腥的大屠杀。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5月3日济南惨案。全国人民对济南惨案莫不义愤填膺。惨案消息传到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谴责日军的暴行，募款支援在济南同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并决定募捐一笔等于马尼拉华侨所缴纳的全部收入税的款项给南京政府，决定抵制日货。一个捐献运动随即在马尼拉侨社中兴起。由吴记菴倡议，侨胞以个人、团体名义，或认捐款项，或认捐飞机，以便在厦门创立一所航空学校和组建一个空军中队。个人及团体纷纷认捐飞机：吴记菴五架（每架值2万比索），杨廷灿（音）、陈老芳（音）、中华烟商会、木商会、布商会各一架，铁商公会、米商会、怡朗社区各1万比索，其余杂货商会、烟叶商会、鞋业商会、烛商会1000—8000比索不等。其中特别感人的是，吴记菴不仅捐机五架，而且派其儿子吴启标到厦门创办“民用航空学校”，“不惜重资聘请中外飞机师三名，每年招生50名，所费达数万元。学校开办数年，先后共20多万元，均由他全部独力承担。”^①

富有的华侨答应为济南的军队募款数百万比索。一些工资收入者也保证为此捐出自己工资的一半。各地华侨社区纷纷要求了解马尼拉社区的做法，以便按马尼拉侨领所作出的决定行动。

侨胞痛斥国民党政府在济南惨案中对日的软弱态度，普遍要

^①吴少牧：《吴记菴传略》，见《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第159页。

求对日宣战。中华商会等马尼拉华侨社团，为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中国，分别致电美国总统、国务卿、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个别国会议员、国联和日本人民、报纸、日本首相，要求公正对待中国，制止日军的暴行。各地的侨领，也利用纪念“国耻日”（5月9日）的机会，在各城镇组织群众大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团结。

华侨青年更以要求回国参战的行动，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在5、6月间，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作好乘船回国参战的准备。为此，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对这些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侨胞空前团结。5月10日，全菲华侨社团在中华商会开会，商讨打倒北方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会议为此决定筹集专款，并成立一个领导全菲侨胞行动的抗敌会。这次爱国运动，导致各帮会（或堂会）的和解。马尼拉侨社大约有20个帮会，在全菲拥有2000—6000成员。它们平时因帮派利害，时起纷争，甚至常打堂战。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各帮会达成协议，宣布停止纷争，一致对日，共同携手，协助祖国战胜日本。它们还曾打算在侨界组织志愿军回国参战。

显示华侨团结的另一重要事实，是1928—1929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抵制运动在惨案消息传到马尼拉时即已开始，但在一段时间里，还仅限于无组织的个人抵制活动。1928年月初，国民党军队已从旧军阀手中收复京津一带，但日军仍赖在济南。侨胞感到有必要把有组织的全侨抵制日货活动提到日程上来。同年7月，宿务出现告侨胞书，号召侨胞不要忘记日军在济南的大屠杀，决不屈服于敌人的武器，坚持英勇抵抗，不同日本人保持任何经济接触，并号召抵制日货。随后，菲律宾华侨抗敌会成立，决定要华侨商人在10月31日以前清除存货中的日本货。抵制运动于11月1日正式开始。抗敌会宣布不准侨商买卖日货，并决定派出有影响的侨

胞到各省去推动抵制运动。到1929年3月，抵制日货的浪潮已席卷全菲各华侨社区。一些抗拒这一运动的侨商处境孤立，被排除在华侨社会交往之外。为了使抵制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抗敌会于3月初组成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指导委员会，一个是执行委员会。同时，发电给国民党宿务分部、宿务中华商会、宿务华侨基督教青年会、国民党怡朗分部、怡朗中华商会以及南部岛屿的其他华侨团体，要求他们继续扩大抵制运动。

这次抵制日货运动取得很大的成果。从1928年5月到次年年初，抵制运动已使进口菲律宾的日本货大幅度下降。1928年12月，日本进口货值达170万比索，1929年1月降至110万比索。后一数字，与圣诞节已过，购销趋于低落也有些关系；但鉴于1928年10、11两月日货进口量已显著减少，则1929年1月的剧减，无疑主要是由华侨厉行抵制日货造成的^①。抵制运动在4月初趋向低落。4月12日，广州抗敌会结束抵制运动，并以此事通知菲律宾华侨抗敌会，后者便随即宣布解散。

造成抵制运动低落、抗敌会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引起这次爱国运动的条件已发生变化。从1928年10月起，中日双方经过近半年的谈判，终于在1929年3月28日达成协议。协议中规定日本从山东撤军，但只字不谈追究日军在济南杀害中国军民、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责任，反而要中国方面负起保护“在中国之日本国臣民之生命及财产之安全”的责任。正是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妥协外交，扼杀了1928—1929年的反日爱国运动。

1928—1929年的反日高潮结束后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和1932年连续制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侨社又一次掀起长达几年的反日爱国运动。

^①吴承洛：《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第二编，第55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华商会和各行业商会联合通电国内各当局，“吁请和平”。通电说：“在此危急关头，国家生存系于一发之际，全国上下，必须摒除个人恩怨，同心协力，共克危难。”^①宿务、怡朗、卡皮斯侨社也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敦促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消除分歧，共同对日，要求世界各地华侨抵制日货，并召开群众大会，为抗日事业募集战费。为动员侨众，使侨社的抗日爱国运动有组织地进行，推动运动的发展，马尼拉侨胞还在9月23日成立由15名著名人士为领导的救国会。救国会立即向南京政府、国际联盟、美国总统、国务卿和个别参议员发出呼吁，要求为正义、人道和世界和平，制止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制止他们无故毁灭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暴行。同月，捐助东北义勇军国币20万元，以示支持^②。各地侨社也纷纷成立救国会，募款慰劳东北抗日将士。

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的侵略行动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有恃无恐，得寸进尺，在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之后，于10、11月间又发动对黑龙江省的进攻。当时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抵抗，并取得一定的胜利。马尼拉侨胞听到胜利的消息，11月13日即决定汇寄1万比索给马占山，并致电鼓励。同日又致电南京政府，建议：如果日军不遵守国联要它在11月16日以前撤出东北某些地方的决定，就进行全国总动员。

在日军继续扩大侵略行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79;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7页。

②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279—280.

策，国际联盟对日本的偏袒态度，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战公约^①签字国对东北问题的消极态度，使得希望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希望列强主持公道的华侨大失所望。他们放弃幻想，决定负起救国重责，团结全侨，加强反日爱国行动。

为谋求全菲侨胞统一行动，1931年11月26日，全菲163个华侨团体、其中包括91个救国会的代表303人，加上马尼拉的侨众，共3000人在马尼拉举行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痛陈历届政府无能，使祖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和丧权失土之辱，大义凛然地宣布：救国兴邦属人民本分。大会宣告：

此次倭寇乘着我国天灾人祸之际，不宣而战的强占了我东三省。有守土之责者，既持不抵抗于前，任由倭寇凶横无忌，复倡和平镇静于后。……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危急到这样田地，专赖着几个拥兵自卫者，或几个常持着弱国无外交的外交官去挽救那么危急的狂澜，那是梦想的。……我们人民须得起来自救，须得起来自拔。全菲救国大会的产生，就是为自救自拔，为实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责任的^②。

大会决定通电南京政府立即以武力收复失地，电请宁、粤当局化除成见，立刻促成统一，电请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彻底抵制仇货，惩办奸商，并为此制订全菲华侨一致彻底抵制仇货大纲。大会还要求成立一个由懂外国语言的华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向群岛内外的外国人宣传中日战争的真相，派遣人员回国学习飞行术，派有经验者购置飞机部件交国民党政府，建立永久性的救国代表

①非战公约亦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28年8月由法、美、英、比、德、波、意、捷、日等国在巴黎签订，1929年7月25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定，禁止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②杨荣标编：《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第12页。

大会。大会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在30日决定建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推曾廷泉为主席，黄晓沧、杨荣标和杨静桐等也成为该会重要领导人。同时，又出版《旗帜》，作为它的宣传喉舌。

那加的华侨青年，有组织地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又掀起新的献金热潮。到1932年1月初，菲岛华侨已为救国事业征集了25万美元，另外给马占山将军寄去40万美元^①。

在华侨反日爱国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战事，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地大举发动进攻。上海人民和驻沪的十九路军官兵，自发起来，进行英勇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粉碎了日寇发出的在四个小时内占领上海的狂言，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由于蒋介石集团从内部破坏抗日，日本复又从外部进行偷袭，迫使兵力薄弱的十九路军不得不于3月3日从上海撤退。5月5日，蒋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从而背叛了淞沪抗战军民。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3月制造伪满洲国，妄图将我国神圣领土东北三省，永远分割出去。

淞沪突变在侨胞中迅速地得到回响。他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发起来。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二天，救国联合会驰电蔡廷锴，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保卫上海，旅菲华侨将为此提供道义和财政上的支持。一个回国参军和爱国捐献的热潮迅速兴起，成百上千华侨争取回国效力。有些人已经回国，并参加了保卫上海的战斗。在战斗于闸北、江湾、吴淞的十九路军著名的第六十一师中，有252名华侨，其中五人来自菲律宾。一些马尼拉和达沃的华侨青年，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82.

还参加负责保卫吴淞要塞的学生军。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华侨青年踊跃回国抗日的热潮影响下，700名菲律宾青年（大部分是菲律宾大学学生）也千方百计要求到上海或东北的中国军队中服役^①。

这次捐献的规模，比历次都大得多，而且不再象从前那样捐给政府当局，而是直接捐给在前线抗日的部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这深重的国难中，华侨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②。另据蔡廷锴司令部透露，到1932年9月，在收到海外华侨的共500万美元捐款中，菲律宾华侨独占80万美元。而据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1933年6月的报告，在1931—1933年的26个月中，菲律宾华侨为赈济水灾灾民，支持十九路军防守上海，支持东北和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共捐输200万美元^③。厦门一家报纸当时这样评价菲律宾华侨的捐献：“菲律宾华侨约9万人，占海外华侨七八十分之一，但对国事捐输，最为踊跃，如十九路军在沪抗日的一个月之内，菲（华）侨曾汇回国币80余万元，竟占全部华侨捐款的1/8。”^④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283—284

②另一个表明菲律宾华侨对蒋介石集团不抵抗政策不满的事例是，正当沪局危急，蒋介石集团却破坏上海军民抗日，同时对日明显表现妥协倾向之际，马尼拉中华商会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速出兵援沪，勿轻易议和；并建议发行巨额抗日公债，以图长久抵抗。”见《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7页。

③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P. 284—285.

④厦门《华侨日报》，1933年5月1日。当时1美元值2比索，1比索值国币2.5元。

必须指出，当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商况异常不佳，百业萧条，华侨经济遭受很大打击，许多工商企业靠商会救济维持，至少有1万多侨胞失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在两年多时间里尚能献金200万美元，足以显示菲律宾华侨拳拳赤子之心和高度爱国热情。在捐献中，出现不少动人事例。大商巨贾，踊跃捐输。华侨商界巨子李清泉，沪战发生时，“斥资首倡汇助国军”；赖工资活已养家的升斗小民，也不甘落后。怡朗华侨店员，一致同意献出工资10%，以充战费；其他人也乐意地捐献收入的一半。华侨社团，除动员会员正常捐献和进行募捐之外，还一再号召会员节省开支，以作救国战费。马尼拉中华商会在1931年10月，为九一八“而捐助义军国币20万元”；马尼拉中华木商会在事变发生后，“开会员大会，实行救国储金”，还在1932年和1933年春节前夕，两次通告会员节省“午餐费”，“充作救国战费”和“救国储金”。中华商会在1933年1月“函请各会员节省午餐酒席，以助义军”。由于侨界热诚捐输，“斯役，菲岛捐金，为南洋群岛冠”^①。

菲律宾华侨捐献的另一个方面，是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募款献机。事情是这样的：1932年11月7日，沪战著名将领翁照垣抵马尼拉，受到热烈欢迎。在8日晚的宴会上，他向与会者呼吁：航空救国是一条出路，请为航空协会帮忙，俾航空救国得以实现^②。呼吁一经提出，组织航空协会分会，捐募款项购机的热潮即席卷全菲各地华侨社区。马尼拉华侨首先行动。11日，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7、69、73、114、120、156页。

②《华侨日报》，1933年12月2日。

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①及各行业商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募集捐款购置飞机一中队（15架），并决定筹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不久，分会成立，数日之间，登记会员即近4 000人^②。分会在成立宣言中说：

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体侨胞为主体召集大众之能力，造大家之事业，具毁家救国之心，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捐款，专为建设空防，决不移作他用。所有购造飞机，专备对外作战，决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私人利用^③。

在航空募捐中，马尼拉分会理事会主席李清泉，“慨然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约值彬银（即比索）二万五千元，以为侨界倡。本商会同意捐航空会二万元。”^④印度尼西亚华侨、中兴银行大股东之一的黄奕住，九一八及一二八两事变时，适寓菲律宾，“菲（华）侨正倡航空救国，君慨捐五万金，购机以赠，闻者为之感动。”^⑤至1933年1月初，菲律宾各地华侨已组织航空建设分会35处，共捐得机款约合国币300万元^⑥。由于菲律宾华侨购机捐献声势浩

①据《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第79、80页，马尼拉虽有救国委员会之组织，“唯因工作上时感不周，岷中华商会有鉴及此，特联络国民党总支部于廿一（1932）年2月3日召集各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共策一切救国方略”，最后一致议决组织国难后援会，马尼拉救国委员会亦为成员之一。国难后援会主席为李清泉。该会成立不及一年，即汇5万国币支援淞沪抗战，20万元为福建国防建设费，2万元接济东北义勇军。

②《华侨日报》，1932年12月2、4、16日。

③同上报，1932年12月16日。

④同上报，1933年1月19日。

⑤《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157页。

⑥《华侨日报》，1933年3月16日，1月20日。

大，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特在中兴银行二楼设驻菲办事处^①。结果，这次共购机十五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给十九路军^②。

1931—1933年的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另一重要行动，就是抵制日货。这次抵制运动的特点是坚持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且家喻户晓，行动坚决。按全菲华侨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制定的抵制条例，凡购办仇货者，该项仇货应捐充救国储金；第二次再犯者，则照所办仇货原价加倍捐作救国储金；故意破坏抵制运动者，将其姓名、照片登载华文报，全菲华侨，便应与其断绝商业交易、经济往来。该破坏者死不得葬身华侨义山；不得享受或参加华侨教育、团体的权利；全菲华侨不得与之缔结婚姻；并将该破坏者之姓名、照片及破坏行为告国内救国机关存案。

抵制日货运动，在动员侨胞的爱国情感，在一定时期内打击日货对菲进口和在菲流通方面是成功的。表1反映的是日货输菲的消长情况，其中1931—1932的进口值显著降低，1932年甚至不及1930年货值的50%。这主要是华侨对日货实行抵制的结果。从1931年起美菲当局提高进口税及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日本对菲输出也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同是在经济危机时间的1930年和1933年，日货进口额都同危机前的1928年几乎相等；同是受提高进口税的影响，1933年日货进口值却高于1931年。但华侨在抵制运动中，在给日货进口以巨大打击的同时，自己也付出很大的代价。日本人在遭到抵制运动的打击之后，便在1932年着手建立自己在菲律宾的零售系统。在短期间内，

①《华侨日报》，1933年3月16日，1月20日。

②转引自梁上苑：《菲律宾华侨抗日战争历史概述》。

③杨荣标：《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第28—29页。

从马尼拉到明达瑙，日本人的百货商店，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

表 1 **1927—1933年日货输菲值**

年 度	进口值 (比索)	占菲进口总值%
1927	22 185 451	9.58
1928	25 861 753	9.60
1929	23 879 095	8.11
1930	25 912 971	10.53
1931	21 953 482	11.05
1932 *	12 310 012	7.75
1933 *	25 112 448	6.96

资料来源：《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143页。

*据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88, 1932年日货进口值数字相同，但仅占菲进口总值的7%；1933年进口值为19 190 000比索，占菲进口总值的13%。

现。华侨零售商的经济地位，也随之受到打击。中国驻菲总领事邝光林1933年上半年说的一段话，形象地道出这种情况：

两年之前，我在菲律宾作过一次旅行，走遍各主要城市和省份，特别注意各个地方的华侨和日侨商店的数目。在两年前作第一次旅行时，在宿务我只看到五家日侨商店，但在三个月前作的第二次旅行中，我发现已有30家或更多的日侨商店涌现出来。今天，在菲律宾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那里有一家华侨商店歇业，那里就有几家日侨商店开业，取而代之①。

①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88.

在马尼拉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三年前(按指1931年)的黎刹街只有日本商店三四间，现在已增至十八间，而华侨的却一天天的减少”^①。这都说明，华侨商业在经济危机打击和日商的竞争中有所衰落。但华侨是爱国的，抵制日货是他们爱国御侮的一件有力武器。他们在使用这一武器时，向来是有冒风险、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的。《新闻日报》编辑吴半生^②在1928年说过：

我们不知道抵制〔口货运动〕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抵制是否成功。但我们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③

这段话，同样是所有参加1931—1933年抵制口货运动的爱国侨胞的心声。

四 菲律宾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以东北为前进基地，相继进侵热河、察哈尔。蒋介石政府一面宣布“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一面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从而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四省的“合法”性，把察哈尔、河北大片国土奉送给日本。华北门户洞开。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1935年，扩大对冀察两省的侵略，扶持汉奸、流氓无赖、土豪劣绅，制造华北“自治”闹剧；而国民党政府畏敌如虎，满足了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年12月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让日本推荐的汉奸把持这个机构，使两省

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乙编，第50页。

②又名吴重生，1928—1929年和1931—1933年两次抵制日货运动领导人之一，侨界著名爱国报人。在整个30年代，他痛斥日本军阀侵华行为，不遗余力。日占菲后，被列入黑名单，成为占领当局通缉的侨领之一，著有《出死入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记述其在日军围捕追缉中，宁死不屈，度过1105天险难的经过。

③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P. 289.

处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在这华北危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华北地方的一些爱国官兵和民众，自发起来抗日。各阶层人民群众、海外华侨，以各种方式，展开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呼吁全国同胞武装自卫。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重申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海内外同胞奋起救国。同年12月9日，北平爆发有历史意义的学生爱国运动，给全国各阶层人民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

在全国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蓬勃开展。鉴于国难深重、亟需全国精诚团结，而国民党政府却仍热衷于内战。中华商会等马尼拉十多个华侨团体致电1936年7月10—14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呼吁力求统一，齐一战线，共赴国难。电文说：

国事艰危，外侮急迫，兹值各方领袖聚首一堂，讨论国事，兴废安危，关系重大，海外闻风，同深殷盼，国家丁兹危运，国人所希望于诸公者，惟有排除成见，开诚相见，本精诚团结之初衷，定抗敌救亡之方策。至军事财政，尤宜力求统一，乃能齐一战线，共赴国难，一发千钧，唯诸公实利图之。敝会等身在异邦，心存祖国，秉匹夫有责之义，一息尚存，难安缄默，恳切呼陈，统希亮察^①。

国民党政府既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又不准“侈言抗日”，使一些受国民党影响的侨团，如中华商会等，也一度趋向保守。因而，侨社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靠当地华侨进步组织和进步侨

^①《时事月报》十五卷第二期（1936年8月），第58页。

领推动。例如,在上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八一”宣言的影响下,在侨领许立^①等的领导下,马尼拉也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民武分会在侨胞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国活动。怡朗侨社,则在侨领高作楫、华侨商业学校爱国教师陈曲水、郑士美、张幼庭、蔡序鏊、黄重凯等人领导下,以商业学校为阵地,在侨界开展救亡运动。他们于1935年成立“怡朗华侨救亡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年正式成立“怡朗华侨救亡会”。这是菲律宾第一个华侨救亡组织,在当时仅有3 000多华侨的怡朗,拥有正式会员130多人。当地的读书会、学习会的成员,各爱国社团、爱国侨胞,都成为该会的支持者。由于该会的积极活动,不仅孤立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而且争取到怡朗中华商会主要负责人蔡木山、黄鼎铭、高标奢等人,使中华商会成为救亡会的活动阵地,也争取了国民党怡朗

①许立(1905—1971)又名许敬诚,福建晋江人。1924年至菲,当店员、小学教员,但主要从事华侨职工运动,团结爱国华侨,团结国际友人的工作。1927年以后,他积极动员菲律宾华侨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团结各界华侨,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大力推动侨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许立团结各界华侨,成立抗日救亡团体,介绍革命军队抗日战绩及解放区、游击区抗日斗争成就,发动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并多次组织华侨青年赴延安学习,投身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许立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一直坚持领导华侨同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直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据连贯、林林等:《悼念优秀侨务干部许立》,载香港《大公报》,1979年8月20日。

党部书记林寿柏,国民党元老王尚琴,使他们与救亡会合作^①。从而使救亡会不断扩大对当地侨胞的影响。华侨各劳工组织,与侨社各爱国团体通力合作,为要求对日进行全力战争而呼喊。左翼力量积极推动抵制日货的运动,并为祖国救亡运动募捐款项。他们还创办一批学校,出版《前驱日报》,作为进行救亡运动的活动基地和宣传阵地^②。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到菲律宾,侨胞抗日救国感情立时高涨,“战斗到底”的口号响彻各地侨社。各华侨社团,在国家危亡关头,求同存异,团结救国。国民党马尼拉分部、中华总商会、广东会馆、各文化教育团体,各行各业组织和各社会集团,于7月18日联合组成“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或称菲律宾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敌会”),由李清泉任主席(1940年他在美逝世后,由杨启泰继任),杨启泰(杨任主席后由史国铨继任)、薛芬士任副主席,下设经济、总务、宣传、抵制等组。各省市侨社也纷纷成立抗敌会的分支组织。由华侨各行业工会组成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也随之建立。其他华侨抗日救国团体,也先后建立起来,一时多达143个^③。

①高作楫:《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的回忆》(油印稿);高天雄、吴国源(蒋奋):《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的片断回忆》(油印稿)。

②Antonio S.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以下简称*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18.

③《英勇奋战在吕宋岛上——记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载《福建侨乡报》,1982年9月9日。

各埠华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各地侨领都慷慨陈词，激励侨胞的爱国热情，强调团结的必要性。各家侨报都密切注视国内战情的发展，及时登载，甚至每天都出版号外。一个小小的胜利消息，也都使侨胞感到欢欣鼓舞。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蔡廷锴适在菲律宾休养胜地碧瑶休养。在听到卢沟桥事变消息之后，许多侨胞频频探访蔡将军，往往问及他打算在什么时候回国^①。他在7月13日离开这个著名休养胜地之前，曾对挤到碧瑶华侨爱国学校的300名华侨发表讲话。他要求侨胞坚定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侨胞也热烈称许蔡将军回国打仗的决定，并一致保证，他们将给国民党政府的抗日行动以全力支持。8月，在内湖省的圣巴勃罗，成百上千的侨胞举行集会，当地中华商会主席号召侨胞为保卫祖国而募集款项。大会通过决议，首次捐款5万比索，从9月起每月捐献2万比索^②。

从那时开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菲律宾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他们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宝贵的贡献。

为祖国的抗日战争，菲律宾华侨在财力方面作出巨大牺牲。在献金运动中，上自侨领富商，下至学童小贩，无不踊跃解囊，尽力捐献。其中多有感人事例。当时《华侨日报》作过如下报道：

马尼拉华侨，近盛食爱国面包，其事甚可纪。盖有华童子杜兴桥，年甫十四，倾其储蓄二十六元（比索，下同），购面包一千，载送华侨妇女慰劳会，请为送前线军人。会人以面包既不便寄，而童子热诚诚为可嘉，因议售之而寄款，名曰爱国面包。《新闻日报》盛纪其事，以激励侨人购之。见义勇为者咸踊跃解囊，一崇朝而售

①《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页。

②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22.

罄，得款三千金（比索），是足以供战士万余人一日之所需。以二十六元之资而化成三千之款，侨人好义固可嘉，童子热诚尤足使人兴奋①。

华侨店员谢维同（音），以50比索买一条爱国面包。他说，“我并不富裕。但既然一个学童能捐一比索救助祖国难民，我总能付得起这个数目。可惜我不能多捐些。”② 圣巴勃罗市的华侨烧包小贩阙希义（音），向别人借1仙，凑够3比索捐献。这是他一周的节余，原打算汇厦养家的③。

由于侨胞热诚捐输，到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菲律宾华侨就已汇50万比索回国。战争仅及一年，全菲侨界各种捐献金额如下：义捐国币2 742 020.49元，月捐250万元，购公债5 510 300元，航空捐187 504.6元；另慰劳款253 806.13比索，救济款397 561.06比索。以上合国币12 075 713.84元④。到1939年，菲律宾华侨汇给国民党政府的捐款总数，已达600万美元，即1 200万比索⑤。

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另一形式，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侨社共同行动，在1939年掀起献机热潮。当时每架战机值10万比索。据史料记载，杨启泰（另有一说是铁商会）独捐20万比索，庄万益（音，亦有记载为庄万里）独捐10万比索，杂货商会、百货商会、纸烟商会、木商会、信托商会、屠宰行业、菜仔店协

①《华侨日报》，1937年11月11日（夕刊）。

②③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P. 23—24.

④傅无闷（总编）：《南洋年鉴（1939）》，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年版，辰183页。

⑤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24;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 549—550.

会各捐10万比索，怡朗和帕奈华侨社区捐国币40万元。连本身没有或无甚收入的华侨中小学生、华侨妇女界也各集资10万比索，购买“学生号”、“妇女号”机献给祖国^①。

菲律宾华侨捐输的又一方式，是同东南亚各地华侨一道，组织统一机关，筹款汇寄祖国。抗战后，侨领李清泉屡次致电陈嘉庚，提议“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机关，领导筹款。”印尼侨领庄西言亦函陈嘉庚提出同样要求。陈嘉庚均以新加坡缺乏适当领导人选，自己缺乏相当才望，以及马来亚形势复杂，未予接受，但表示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②。第二年（1938）7月3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陈嘉庚：“本院已委外〔交〕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所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③

于是，陈嘉庚登报并通函香港、马来亚、缅甸、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西里伯斯、菲律宾、安南及暹罗等处的筹赈会、慈善会，商会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参加大会的有上述各地代表共164人。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总部设在新加坡，选举陈嘉庚任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任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宣布“大会目的在谋组织领导机关，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并协助政府完成建国大业”。号召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

① 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P.

24—25; 《华侨革命史》（下），第696页。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47—50页。

③ 《南侨回忆录》第47—48页。

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①。大会还由各地侨社自报每月义捐数目，并开列筹捐赈款各种办法供各侨社参考。南侨总会成立后，由该会集中南洋各属侨社常月捐汇寄行政院款项，1938年每月达国币400余万元，1939年共7 000万元，1940年300余万元；加上购买公债、其他汇款，数目更大。1939年，华侨汇款11亿元，南洋华侨占2/3。华侨捐款及汇回家的款项，每月可达2 000余万元，几及每月战费开支的1/3^②。

在南侨总会集汇回国的常月捐中，菲律宾华侨所占数额，并不大(见表2)；但人均捐款数则为东南亚各地华侨之冠(见表3)。

表 2 南洋各属华侨经南侨总会汇寄回国捐款情况

(1938. 10—1940. 12 单位：国币元)

地 区	每月认捐	应 捐	实 汇 额
马 来 亚	1 337 000	34 760 000	85 430 000
英属婆罗洲	24 000	624 000	3 313 000
东 印 度	544 000	14 150 000	31 530 000
菲 律 宾	500 000	13 000 000	14 880 000
緬 甸	300 000	7 800 000	8 030 000
越 南	250 000	6 500 000	1 564 000 *
合 计 **	2 955 000	76 833 000	144 456 000

资料来源：《南侨回忆录》，第313页。

* 不完全统计，实际数要更大些。

** 缺泰国、香港及东印度若干地方数字。这些地方华侨认捐数加上表列认捐数，常月捐总数应为400万元。

①《南侨回忆录》，第48—58，62—66页。

②《南侨回忆录》，第55、120—121、265、295、310、312页。

表3 1938—1940年南洋各属华侨义捐按人每月平均数比较
(单位：国币元)

地 区	华 侨 数	每月平均捐款数	人平均捐款数
菲律宾	140 000	700 000	5.00
马来亚	2 350 000	4 200 000	1.75
緬 甸	450 000	540 000	1.20
东印度	1 600 000	1 600 000	1.00
越 南	445 000	200 000	0.50

资料来源：《南侨回忆录》，第344页。

然而，就资力而言，菲律宾侨社居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东印度之下。因此陈嘉庚先生对菲律宾华侨的捐献热诚，给予高度评价：

七七抗战事起，由首府岷埠侨领等提倡捐输，成立 筹赈会，其他散处各岛屿者，亦热烈响应。若以个人比较，其数目为 南洋各属华侨冠。……菲律宾政府既未歧视华侨，募捐者工作可自由 行动，且殷富侨领出为领导，以身作则，故成绩最佳①。

抗战开始之后，许多华侨青年为爱国热忱所驱使，一批批回国参军，赴前线作战，或为战争服务。为救祖国于危亡，他们中许多人还在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热血青年中，由于政治信仰不同，有的参加国民党军队，有的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在抗日救国这个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

1938年，有16名华侨青年，在菲律宾接受飞行训练之后，于7月6日派到汉口，参加空军部队。这支来自不同侨居国的华侨青年，组成“流星联队”。在此之前，在中国空军中就有菲华青

①《南侨回忆录》，第338页。

年。其中之一的刘灵韶（音），1937年8月15日，就在南京上空击落日机一架。其后，他还在汉口、长沙、柳州上空参加过战斗，成为当时的王牌飞行员之一。许多华侨青年作为志愿兵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1938年下半年，在广东一役，就有来自菲律宾的80名华侨志愿兵参加战斗，其中有78人献出了生命。1939年初，15名马尼拉华侨青年参加军事运输部队，驾车奔驰于江南前线^①。

侨社也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华侨青年的要求，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事业。怡朗华侨救亡会就曾组织20多人，分三批回国参加救国事业。第一、二批十多人，被输送到延安，先在“抗大”、“陕北公学”学习，然后分配到各地工作。第三批直接参加了新四军。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先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②。

一支命名为“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的华侨青年队伍，在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时，历尽曲折。其历程充分反映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和这批华侨青年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

1937年12月中旬，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倡议

①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26. 菲律宾华侨汽车司机返国服务，在此前的1937年冬即有一批15—20余人。见《南洋年鉴（1939）》辰183页；《华侨日报》（夕刊）1937年11月5日；《侨务十三年》1945年专刊一期第70页。据后一刊物同页，曾有菲华童子军22人回国从事战地服务，仅2人生还。

②高作楫：《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的回忆》；高天雄、吴国源：《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的片断回忆》。据两文作者不完整的回忆，这三批回国青年中，有张幼庭、白刃、蔡振声、高铭奢、吴性白、黄灿煌、黄景熙、黄登保、戴永美、黄子英、戴碧轩、李烈、孙易彬、许飞鹏、王精华、郭华忠、蔡甘泉等。

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①，以在报上刊登广告和散发传单的方式，公开征集队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有亲自前来报名的，有写信应征的，也有由华侨进步组织推荐的。民武分会经过审查了解，在其中吸收六七十人^②，并派当时年仅24岁的得力干部沈尔七^③任该队的负责人。义勇队组成后，立即在马尼拉集中进行训练。

①事见沈福水：《爱国华侨的光荣——忆“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广东侨报》1985年1月16日；郑山玉：《抗日旌旗到江南》，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一集；以及蔡建华1985年5月10、27致作者的信。据蔡建华回忆，义勇队的名称是“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参加新四军后的名称应该是“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作者采用这两个称呼。

②郑山玉：《抗日旌旗到江南》；张兴汉：《抗日战争中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贡献》，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华侨史论文集》第2集。

③沈尔七（1914—1942），原名庆矩，福建晋江人。1930年渡菲当店员。九一八事变后，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华侨职工爱国运动和“民武会”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并与华侨劳工领袖许立一起建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和“劳联会”。1937年底，受托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并率队回国。义勇队参加新四军后，沈奉命回菲。1939年，再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回国。皖南事变前再次奉命回菲。1941年第三次回国，在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12月，在宝安县一次战斗中牺牲。参阅沈福水：《爱国华侨的光荣》；郑山玉：《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华侨烈士沈尔七的一封信》（油印稿）；高天雄：《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团纪事》，见《华侨沧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高天雄：《怀念沈尔七同志》，见《侨史学报》1985年2期；俞炳辉：《华侨抗日英雄》，见《星火燎原》1983年第4期。

在华侨义勇队即将启程回国时，在归国旅费问题上第一次遇到阻力。原来，民武分会与抗敌会商定，义勇队归国旅费由抗敌会负责。但当义勇队要提款购买船票时，由于国民党驻菲总支部从中作梗，抗敌会拒绝支付经费。此事激起侨胞的极大义愤。连当时驻菲总领事段茂澜也觉得这样做不妥，只好以个人名义写信说明缘由，让民武分会向侨胞筹集。劳联会联同12个基层工会，也联合发表宣言，号召侨胞踊跃捐献，一些工会组织还举行募捐活动。几经周折，才筹足回国路费。

1938年1月18日，义勇队第一批归国人员共28人^①由马尼拉起程回国，22日抵厦门，受到厦门各界欢迎。但厦门国民党军政当局却以让每一队员当排长为诱饵，企图把义勇队就地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在诱骗失败后，又以办理集体护照的手法，妄图把义勇队禁锢在厦门，不让他们参加新四军。义勇队为粉碎国民党的改编阴谋，于26日发表《告祖国各界同胞书》，要求协助他们顺利完成向家乡报告菲岛侨胞的抗日救国运动，宣传和鼓动同胞团结起来粉碎日寇侵略野心，以及奔赴前线与日寇血战的回国任务^②。

义勇队还组织各界座谈会和利月出席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各区纪念“一二八”六周年等机会，报告菲岛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盛况，申明义勇队回国的使命，表达回国参加抗战的强烈愿

①据蔡建华、张光向作者提供的名单，这28人是：顾问 沈尔七，队长 戴血民，副队长余志坚（蔡建华），队员 杨血映、郑显玉（映明）、杨振声、林四季、陈消海、萧山章、陈杨德、杨奕万、陈藻亨（绍痕）、王天华、施炳文、蔡培团、庄丁米、庄志忠、林谋湾、李铁民、黄长水、蔡忠义、孙仲英、许振文、张光、黄卓云、黄德锐、关若萍、李俊民。

②厦门《江声报》，1938年1月27日。转引自郑山玉：《抗日旌旗到江南》。

望。但国民党当局甚至连下乡宣传也不允许，拒不签发护照。义勇队被迫滞留厦门，经费告罄。但为实现抗日夙愿，他们变卖衣物、用品，甚至仅有的宣传工具——两把小提琴，节衣缩食以维持生活。

义勇队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获得厦门各界同胞的支持，并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抗日团体的关怀和帮助。国民党当局最后被迫让步，同意放行。2月5日，义勇队前往漳州，在那里一方面等待菲律宾侨胞的接济款项，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抗日宣传，并与闽西新四军联系。十多天后，义勇队以到南靖县宣传为名，包乘专车直奔龙岩白土村，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由沈尔七任团长，俞炳辉任教导员，戴血民、余志坚、杨血映任班长。此后，服务团成员始终配合新四军，开展宣传抗日的工作。

菲律宾华侨还组织回国慰问团，从精神上、道义上给抗战事业以鼓舞和支持。

1939年，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发起组织回国慰劳团，当地中外文报纸及电台，也将有关消息及时报道。侨社一时又形成一次爱国热潮。爱国华侨青年纷纷赶来报名。不久，劳联会即挑选23人，组成以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政治教导员的慰劳团^①。这些团员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其中有两名女青年。许立也送未成年的儿子（呈伟）参加，团员中有

^①据高天雄1986年4月7日致作者信，慰劳团组成如下：团长王西雄，政治教导员沈尔七，音乐教员周东君，团员蒋人坚、蔡友华、张伯钧、许呈伟、曾俊峰、邱仲尧、郑聘昌、傅友志、杨民生、庄永民、吴新才、吴男彩、吴华光、施义钳、王汉杰（黄杰）、郭汐江、郭席排、张匡时、蔡紫茵、高天雄。

许多人从未回过祖国，个别人生母还是外国人，对祖国的各种情况都不够熟悉，回到祖国，困难不少。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献身祖国抗战事业的坚定信念，都有慰问活动结束后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思想准备，因而也都有准备吃苦的决心。特别可贵的是团员的路费都是自筹的。当年3月，慰问团成员集中马尼拉，进行突击训练，排练慰问节目，学听、学讲普通话。在集训期间，爱国华侨纷纷送来捐献给新四军的医疗器械、药品、100多面锦旗，给慰问团送来乐器和其他宣传用品。5月中旬，慰问团离马尼拉赴香港，由廖承志指示，经越南，过镇南关，6月到桂林，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去延安的要道已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又对边区进行封锁。根据指示，慰问团决定到皖南慰问新四军。他们一行23人^①离桂林向皖南进发，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踪，于8月初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代表全菲爱国侨胞，慰问新四军和前线军民，并将医疗器械、药品及其他慰问品分送部队各单位。两个月后，他们又到前线慰问新四军独立一、三团和三支队，然后回到军部，编入军部教导队，进行学习和训练。六个月后，他们被分配到新四军各部队、机关，从事军事或政治工作。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原慰问团的大部分团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鉴于总会从未派代表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和痛苦群众，总觉“海外华侨于义实有未尽”，便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回国慰劳视察团。第二年，东南亚各地侨社共派代表50人回国慰劳，其中包括来自菲律宾的代表。在慰劳团在重庆分成三团往各地慰劳时，菲律宾侨领陈忠懋任第二团团团长，率团前往湖

^①慰问团一行连团长、政治教导员，原25人，在桂林停留时，有两人因思想准备不足，自行离团返菲。

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进行慰劳活动^①。

海外侨胞对抗战将士关怀备至而对卖国逆贼则恨之入骨。汪精卫投靠日本侵略者之后，菲律宾广大侨胞义愤填膺，侨界舆论一致声讨。侨社还专门组织“惩治汪逆委员会”。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后，侨胞更是同仇敌忾，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在报章上，都一再谴责汪精卫一伙卖国求荣，猪狗不如，反复表示决心支持中央政府，把战争进行到最后目标实现时为止。

此外，七七事变后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遍及各地侨社，并且一直坚持到1942年初日军占菲才被迫中止。

^①《南侨回忆录》，第129—130页。

第十五章

日本占领时期的菲律宾华侨

一 日本占领菲律宾

日本帝国主义为排挤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掠夺东南亚地区的资源，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珍珠港被袭的当天（亚洲时间8日），日军猛炸吕宋各主要口岸及美军在马尼拉附近的空军基地。9日，日潜艇侵入马尼拉湾。10日，日舰队分两路进攻吕宋南北海岸要地，15日在南吕宋列加斯比港登陆，21日在林加因湾登陆。日军从南北两面对马尼拉展开钳形攻势。24日，驻菲美军和菲律宾自治政府撤至巴塔安及科雷吉多岛。26日，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此后几天，由于日军的轰炸，美军的自行破坏，马尼拉所有的军营、工厂、汽油库、船坞、码头、政府机关等都遭到严重毁坏。马尼拉的繁荣市区，大火持续七日之久。在爆炸声中，火焰之下，歹徒横行，肆意洗劫。整个马尼拉城处于惊恐之中。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在此之前，比萨扬群岛和南部岛屿已基本上处于日军铁蹄之下。2月，自治政府撤离科雷吉多岛，辗转流亡美国。远东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于3月中旬由科雷吉多岛潜赴澳大利亚，并在那里设立他的新总

部。4月9日，巴塔安半岛完全沦入敌手，科雷吉多也成孤岛。5月6日，麦克阿瑟的继任者乔纳森·W·温莱特将军率1.2万美菲军向日军投降。翌日，温莱特又通过广播，下令全部美菲军停止抵抗，就近向日军投降。至此，日军占领全菲。

占菲初期，日本搜罗菲律宾的合作者建立傀儡政府——菲律宾行政委员会（**Philippine Executive Commission**）。但行政委员会各部的实权，都掌握在日籍顾问手中；而委员会本身，又受占领军司令部特设的“军政监部”（简称“军部”）的指导和监督。

日本占领者对菲律宾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他们在全菲肆意制造恐怖，每每借口搜查反抗分子而纵情逮捕击杀良民。对无辜被监禁者，动辄施以灌水、炙膝、压脚、拔甲、捶钉床、柔术摔跌、倒吊拷打、犬咬等酷刑。他们以枪毙十名人质的威胁，对付伤害一个日本人的行为。对工厂、银行、学校、教会、印刷厂、戏院，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日军对美菲俘虏任意虐待。在巴塔安和科雷吉多岛投降的8万多美菲军士兵，在被强迫从巴塔安步行至塔拉克省的奥顿尼尔（**O'Donnell**）集中营的途中，死于疲倦衰竭、疟疾、饥饿和日军刺刀之下者，数以万计。

日本占领者对菲律宾实行掠夺政策。他们滥发纸币——军用票，大量劫取菲律宾的物资，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物资奇缺，物价直线上升，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他们随意封工厂、商店和栈房，没收所存物资。凡与军需有关的五金器材、机械、粮食等，无不搜刮净尽，除供占领军用之外，还运回日本。

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多时间中，菲律宾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而作为侨民的华侨，既因他们是日本敌国的子民，又因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对祖国抗战所表现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日行动而倍受迫害。

二 日本占领当局对中国外交官 和侨领的屠杀迫害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日军在吕宋岛南北登陆作战之后，菲岛华侨就预感到华侨社会难逃日寇的蹂躏。华侨社会开始采取应变措施。

中国驻菲总领事馆和侨领，在这严峻的时刻，面临着双重的应变任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侨领都是侨界抗日救国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在中华总商会、抗敌后援会中担任重要职务，领导着侨社的抗日宣传、救国捐献、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菲岛一旦被日寇占领，他们将首当其冲地遭受日寇的报复和迫害。因此，他们必须一方面为自身的安全采取应变措施。另一方面，又要为整个侨社的应变作出安排。为此，中国驻菲总领事杨光泮，几乎天天同菲律宾华侨抗敌会、中华商会的重要领导人接触，以便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作出估计。在获悉日军已在林加因湾登陆，并朝马尼拉疾进的消息之后，他们一度考虑疏散该城的华侨，但鉴于城中华侨居民人数众多，集体疏散困难，他们只好作出希望华侨特别是抗日活动分子设法自救的决定。小部分华侨匆匆离开马尼拉。抗敌会、中华商会的大多数干部和总领事馆的全体官员，仍然留下来，以便照顾大部分留在马尼拉的侨胞。领事馆官员打算利用国际公法有关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和侨民的条款来保持侨社的安全。

但是中国驻菲外交官们忘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半个世纪以来一再践踏国际公法的记录，也对日本占领者残害敌国侨民和外交官的疯狂性估计不足。

其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菲的日本领事和领事馆人

员,一些伪装成“商人”、“旅客”和“游览观光者”、“水手”的日本间谍就已收集有关华侨的情报,伪装成摄影师的日特,早已拍下华侨集会的照片,作为他们日后进行迫害的根据。日军一占领菲律宾,对华侨的逮捕、监禁和处决就开始了。这种清洗行动,首先针对四种人:抗敌会的领导成员,该会下属抵制日货委员会的领导人,国民党的著名党员以及共产党的积极分子。1941年12月20日,日军在达沃登陆后,上述人员立即遭受逮捕。25日,日军在苏禄兜捕和处决许多反日的华侨。在他们占领马尼拉之后,爱国华侨一批一批地被逮捕。许多人被就地处决。类似的情况,在菲律宾各个华侨聚居中心,都先后发生。

日本占领者曾设想把全体华侨安置到集中营。但占领当局根本无力解决集中后华侨的食宿问题。而一些从日本的实际利益考虑问题的日侨,深知菲律宾经济的运转离不开华侨,硬要把华侨关进集中营,不仅将导致菲律宾经济严重衰退,而且也将使占领当局背上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力阻当局推行集中措施,“谓菲岛精华,即寄托于华侨,若将华侨集中,地方不能繁荣,有碍于‘皇军’政策的推行。”^①况且强制华侨集中,也不利于争取可能的合作者,所以此举只好作罢。

但是日寇对中国总领事馆官员和爱国侨领是决不放过的。

日军进入马尼拉城时,除杨庆寿随习领事匿避外地之外,总领事杨光注以下七名外交官都留在城内,因为他们未接政府撤走的命令。他们也认为,外交官员最多成为敌人的俘虏,不会危及生命;只要在日军入城前后的混乱时期免遭不测,安全就不成问题。所以,他们只是在城内暂避,例如杨光注就暂避于其西班牙籍女

^①张家福:《菲岛沦陷期间的华侨》,《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94页。

秘书家中。领事官员的家属，仍留居在市内的圣梅萨。

1942年1月2日，日军入城。杨光注接到日驻菲副领事木原约他到瑞士领事馆会晤的电话。在瑞士领事馆，一日本军官告诉他，日本不承认重庆政府，所以他不再具有外交官身分。该军官还要求杨光注通知侨领集中到一个地方，免遭不测。直到这时，杨光注还相信，他们最多集中监管，决无生命危险。这样，杨光注就把已匿藏在外的杨庆寿找了回来。1月4日，中国总领事馆八名外交官员——杨光注，领事莫恩介、朱少屏，随习领事萧东明、姚竹修、杨庆寿，一秘卢秉枢，学习员王恭玮被拘于马尼拉市内的菲律宾大学。

8日，42名爱国侨领也被关押于同一地点。

日本占领当局拘押这批侨领的经过，见于杨启泰的《沦陷三年应变经过》：

〔1月〕7日下午许友超告我，谓有姓朱的台湾人带宪兵要抓他。是日傍晚，又有友人带台湾医生张海藤见我。他说，宪兵已出令抓人，第一二批名单已发出，将来凡属抗敌会、〔国民党〕党部及支分部、商会，及各途商会的重要分子，均要被抓。最好能自己集中在一处，免得宪兵到处抓人骚扰……8日上午，我们一行42人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中，海藤以电话通知敌宪兵，敌宪兵中尉大仓就带了宪兵十余名，将我们全体押往菲大校舍拘留所。我们到校舍时，见杨总领事莫领事等都已在那里①。

这42人包括抗敌会主席杨启泰，中华商会主席薛芬士，抗敌会委员薛敏老、史国铨、许友超、余清箴、李世杰、洪开年、黄士琰、杨肇根、王立璇、陈温良、陈水盛、林书晏、蔡祖增、吴道盛、林锦谷、陈三多、詹孟杉、林水樵、李焕彩、苏必辉、黄毓

①转引自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45页。

欣、吴宾秋、吴家盘、郑汉荣、伍相时、黄海山，抗敌会抵制组（即抵制日货委员会）的陈穆鼎、黄念打、蔡派恭、李连朝、施教锯，文化界的于以同，教育界的颜文初，国民党人吴九如，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洪清机等。此外，后来还陆续逮捕的有抵制组的苏财安、李福寿，财务组的桂华山等。他们人被拘捕，财产也被标封、挪用。

领馆官员和侨领被关押的初期，日本占领当局还想劝诱他们，供其利用，故还给他们一些自由和优待，如允许伙食由青年会集体代办，准许亲属戚友探视和送食物。从3月初旬起，占领当局即胁迫他们接受以下几个条件：一、通电劝重庆政府对日“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二、在三个月内，为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1200万比索）的两倍的款项；三、组织伪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如被拘侨领、外交官接受这些条件，可立即释放，被封财货可以解封，已动用者可以照价偿付。但这些中国人“公议绝对不能接受”。杨光注答覆时说，华侨多数从事商业，于政治素少主张，对和平问题，无须再发通电。捐款方面，因战事发生，交通、商业均告停顿，无法进行。至华侨协会，已闻外间有人开始组织，等等，对敌人要求，婉加拒绝^①。

接着，日本占领当局要杨光注说出大量法币存放地点。原来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政府将在美国印制的大批法币运菲，准备转运国内。但因战事发展，交通不便，这批纸币暂放置马尼拉海关。及后局势恶化，总领事馆已奉命将这批纸币销毁。占领当局不知法币已被销毁，为了将它弄到手，用以破坏我国金融，削弱我国抗战能力，便从杨光注身上打主意。同时，他们又

^①桂华山：《菲律宾狱中回忆录》，第43页。

向杨启泰施压加力，要他交出华侨中所谓“激进”，“危险分子”名单。但都没有得逞^①。

日寇利诱胁迫无效，便于3月19日，将领事馆官员投入圣地亚哥堡监狱，将28名侨领移往比里必大监狱^②，严刑折磨，反复审讯^③。但这些中国人都坚贞不屈，未改爱国初衷。敌人无计可施，便趁攻占巴塔安的余威，于4月中旬作出判决：对八名中国外交官以进行反日活动、予重庆政府军事援助、抵制日货和破坏治安四条罪名，判处死刑。对于爱国侨领，则认定他们为首以金钱支持抗日，无异于士兵在前线与日本人打仗，除5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外，28人被判20年徒刑，9人被判死刑。军政监部给他们罗织的罪名是，支持妨碍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计划”的重庆政府，不服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拒绝与日本合作。同时宣布，所有被判刑的爱国侨领的财产，均作敌产予以没收和标封。

4月15日陈穆鼎、黄念打、蔡派恭、李连朝、施教锯、于以同、颜文初、吴九如和洪清机等9名爱国侨领，在华侨义山被秘密处决。17日，八名中国外交官被蒙住两目，并且连绑着，由日本宪兵押至华侨义山东南洼地，面对早已挖就的土坑，进行枪杀，然后掩埋。遇难领事官员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杨总领事还斥责日寇不顾国际公法，必将自促灭亡。表现了大无畏的气概。

① 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P. 37, 38, 41.

② 桂华山：《菲律宾狱中回忆录》，第43—44页。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一书则说，两批中国人都由菲律宾大学移至圣地亚哥堡监狱关禁。见该书PP. 38, 42.

③ 有关审讯的情况，桂华山有较详记述，见《菲律宾狱中回忆录》，第27—29页。

17名烈士牺牲了。敌人虽得逞于一时，但在道义上却给日本民族留下耻辱的记录。军政监部迟迟不敢公布判决和处决中国外交官和爱国侨领一事。直到同年5月24日，才刊出告示，公布执行判决情况。但仍不敢直讲中国外交官员被处决的事^①。

被判20年监禁的侨领除了上述28人外，后来又增加八人，其中包括桂华山、许志北、蔡奇祐等。他们虽然身陷囹圄，但是都坚信敌人的占领是绝对不会延至20年之久的。后来，日军的军事形势逆转，占领当局被迫采取怀柔政策。为了争取侨领和华侨的合作，日本占领当局便于1943年3月至10月间先后三次以“赦免”或“大赦”的形式，将被禁的36名侨领释放^②。这些侨领出狱后，绝大多数人对“合作”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如薛芬士，被释放后立即带着家属，匿藏于北吕宋附近的富加岛，避开占领者要他充任伪华侨协会会长的纠缠，拒绝同敌人合作^③。与释放侨领的同时，其被封财产、物资，也在1943年陆续启封。

①这个告示说：“日本军发动太平洋战事之前，支那人抗日指导者，及反日华侨，主势力黄念打等以下约五十名，早已在逮捕取调中，兹据日本军军事法庭审判结果，其罪状已明白，理应将其全部处死，后以其内犯情最严重者约廿名，先执行处决，其余认为情有可原，予以改悛，由最高司令官特令免死，改为一等徒刑，长期监禁。”转引自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49—650页。

②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P. 60—61. 根据桂华山《菲律宾狱中回忆录》，1943年2月12日，薛芬士、陈三多等6名60岁以上被囚者被赦出狱。4月19日，薛敏老、杨启泰、许友超等18人获赦出狱。10月24日，桂华山、史国铨、黄海山等7人大赦出狱。以上共31人。另有吴宾秋、黄士琰病死狱中，陈温良、伍相时保外就医。见该书第60—61、63页。

③蔡建华1985年7月6日致作者信。

上述遭受残杀迫害的爱国侨领，还仅限于马尼拉一地，而且是同一批受害者。至于其他爱国侨领被害的也属不少。例如，抗敌会抵制组的另两名委员苏财安、李福寿，因家属被扣作人质，出而自首，结果在8月19日，与在新怡诗夏因积极资助游击队而被捕的陈琼和另一粤侨一起被杀害。许多地方抗敌会的主席和委员，如巴坦加斯省纳苏格布镇的蔡及时，新怡诗夏省卡巴纳图安市的庄祖武，碧瑶市的陈辉杉，达沃市陈清泉等，都先后遇害。

三 日寇铁蹄下的华侨社会

日本占领时期，华侨社会遭受巨大的破坏，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

从日军在菲律宾登陆时起，华侨就连遭逮捕、杀害，上节所述，已见其端。华侨财产遭受洗劫，则在日军将至未至之际，已经开始。其严重性从马尼拉侨店受洗劫的情况可见一斑。

陈笑予在《菲岛沦陷三年之华菲动态》中有如下记载：

在1941年之最后一日，麦亚杜（即麦克阿瑟）将军乃下令，一面撤退，一面破坏有军事价值设备……当时岷市各处传出不少可怖消息，南北两面日军已包围岷市，除美菲军之自行破坏军事建设外，加之日军不断轰炸，若干所在，均发生大火，……且因菲政府之开放码头货栈，任人前往搬取货物，结果而至无可搬取时，若干暴民，遂乘机向附近各商店抢劫，并进而抢劫洲仔岸（罗萨里奥）等街布店与珠细里（化装品）店，甚至扩大其抢风，推进至各菜市各菜仔店，且多以华侨开设者作对象，故华店在此时期告损失者不少①。

①转引自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18—619页。

张家福先生有类似记述：

1942年元月初一二，因菲政府投降^①，自动将所有军警武装缴械，而日军尚未入城，菲歹徒乘机抢劫，市郊如巴阁（帕科）、仙范（圣胡安）、仙佛兰西斯戈、巴西（帕萨伊）等处侨店，相继被抢，岷市华人集居之地，多已有暴徒窥伺，少数且已被掠夺，华侨财产毫无保障^②。

日军进入菲律宾之后，把华侨财产视作“敌产”，将全菲所有华侨大商店、仓库、工厂加以标封，对其中的物资和商品，予取予夺，搜运殆尽。华侨经济的支柱——商业，由此受到严重的摧残。

日本占领当局为了笼络某些菲律宾人，也企图在菲商业中铲除华侨零售商，尽力将华侨驱到农村从事粮食生产。占领者认为，在“东亚共荣圈”中，华侨的职责是充当粮食生产者，应从零售业中撤出，让位给菲律宾人。华侨继续充当零售商人，以中间利润维持生计，是不能容忍的^③。日本占领当局为达到这一目的，极力煽动菲律宾人的种族主义情绪，“通过转变群众对华人的感情，使华人成为替罪羊”。于是，“零售业从华人转移到菲律宾人手里”。日本人把这种转变归因于占领当局对菲律宾人的同情，“但一个似乎更为可能的原因是……许多菲律宾人利

① “1942年元月初一二”，即1942年1月1日。“菲政府”，实指当时的菲留守政府。1941年12月24日，菲政府正、副总统奎松、奥斯敏纳率政府要员撤往科雷吉多岛，准备转往美国组织流亡政府，留下马尼拉市长何塞·B·巴尔加斯、司法部长何塞·P·劳雷尔、众议院议长J·尤洛等留守政府，以便与日占领军接触。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傀儡政府的头目。

② 张家福：《菲岛沦陷期间的华侨》。

③ 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50.

用日本人对华人的敌视，给华人加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和黑市活动的罪名，借机要挟、骚扰华人，勒索钱财。这些通常有耐心、宽容的华人出于求生的希望，便关闭店铺，以摆脱种种色色的敲榨勒索”，从而把零售业让给菲律宾人^①。

华侨工商业者，因原有货物被掠一空，又无新货源，于是降为小商摊贩。一些人在被迫捐出“大东亚战争献金”2 000比索之后，获得伪华侨协会“生活必需品组合”配给的小量火柴、香烟、猪油、煤油、肥皂等日用品，按官价销售。一些人暂且充当流动香烟小贩，将香烟拆包按支零售。一些人从事旧物买卖。一些稍具胆量者，则每天奔走于城乡间，从乡间采购蔬菜、木薯、番薯、绿豆、米、黍等农产品，到城市出售，以赚取微薄收入，养家活口。

留在大都会、中小城镇的华侨，不仅谋生艰难，而且饱受通货膨胀、物价腾升、物资匮乏之苦。占领者无限制发行军用票，使币值猛跌。通货膨胀率，不是以年月计，而是以早晚计。一杯咖啡，早上售80比索，晚上便升至100比索。家庭主妇往往要提一篮军用票上街才能换回一篮（或更少）菜蔬薯豆等食品。因此人们一得到军用票便立即用以抢购食品、用品，尽快使之脱手^②。这更造成币值狂跌，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到了后来，城镇居民只能靠黑市买卖求生存。有积蓄者，尚可勉强度日，大多数人，则越来越陷于贫困饥饿的绝境。

日寇对东南亚地区华侨的方针，是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基础

①T. A. Agoncillo, *The Fateful Years, Japan's Adventure in the Philippines, 1941—1945*, Vol. 2, Quezon City, R. P. Garcia Publishing Co., 1965, PP. 552—553.

②陈烈甫：《菲律宾的历史与中菲关系的过去与现在》，第231页。

上，对华侨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最大限度的掠夺。居住在大中城市和菲律宾各中心地区的华侨，身受日宪兵当局、伪华侨协会、邻里协会（保甲）的三重管制，谋生、行动毫无自由。而且，以“献金”名义出现的强迫捐款，以“志愿服役”形式进行的强迫劳役，以各种借口进行的物资征调，轮番而来，使侨胞穷于应付。城镇华侨无法忍受，被迫大量遁居农村山镇。

华侨人口的转移，在日军占领各城镇前夕和占领之初，就已开始。那时，华侨离开城镇，主要是为了逃难，逃避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免遭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有的是决心到农村、山区进行抗日游击斗争的。现在，华侨用各种方式，冒种种危险，继续离开城市，则主要是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对于久居城镇者来说，农村生活是极难适应的，但他们在那里没有饿死之虞，生活容易对付得多。所以，日占期间，城镇的华侨居民减少了。例如，马尼拉华侨战前有4.7万人，1944年已减至2.6万人^①，减少了44%强。他们在农村、山区，或靠战前积蓄，节俭度日，或开荒种地，上山砍柴，赖以糊口。由于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占领者，当地居民同这些落难华侨之间，关系一般是和谐的。当地农民山民，大多数对华侨怀有同情心。他们热心帮助华侨，使后者适应当地环境。遇到日本人清乡搜山，还设法把华侨藏匿在家中，予以保护^②。特别是吕宋北部的山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华人（林风手下的群众），对华侨的情谊异常亲切。华侨也以自己的财物，慷慨帮助当地人民。

但山区、农村并非孤岛，也难免遭受日寇的蹂躏。一些遁

^①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75.

^②菲律宾农民山民与避难华侨的这种关系，吴重生在《出死入生》一书中多有具体记述。

居农村和山镇的华侨，常因日寇进攻游击区而辗转迁徙，颠沛流离。一些华侨甚至被指为游击队，惨遭杀害。在班乃岛，仅1943年9月一个月内，就发生了三起大屠杀事件：沙拉镇的桑波农波罗村，因否认知道游击队的所在，便有60（一说30）名华侨被杀害。帕西镇也有84名华侨遇害。吉马拉斯岛的布恩纳维斯塔地区遭到日军“扫荡”，有90多名华侨被活活打死——有的砍头，有的用舂米的大槌捶死。1944年1月，在宿务的图波格村，30名华侨只因有帮助游击队的嫌疑而被刺死。1944年6月，日军巡逻队在明达瑙岛追击游击队时，在拉瑙·巴拉扬用刺刀捅死约30名华侨。在薛芬士藏匿的富加岛，也有50名华侨难民被惨杀。

日本占领者野蛮地破坏华侨在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们首先封闭全部华文报纸和华侨学校，以此作为他们控制华侨社会，推行愚民政策，消灭华侨爱国思想、民族意识，把华侨变成日本顺民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封闭华文报纸，并未能断绝华侨了解战局发展的消息来源。一般华侨最初是设法收听重庆、旧金山以及其他的短波广播。后来，占领者严厉控制收听广播，下令登记收音机，剪掉短波段，并规定凡收听上述短波广播者处以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华侨各地下抗日组织，或建立秘密电台，或按各自的政治倾向，秘密收听延安、莫斯科、重庆以及盟国的广播，记录新闻，编辑消息，出版油印小报，分发侨社，传播有关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国内抗日战争的进展、菲律宾人民和华侨抗日锄奸的情况等消息。这些小报，数量不少，较主要的有：属左翼抗日组织的《华侨导报》，创刊于1942年4月19日，每周出版一次；属右翼抗日组织的《大汉魂》、《导火线》、《照妖镜》、《前锋》等。《华侨导报》除报道国际、国内和华侨侨居地反法西斯斗争消息之外，还及时揭穿敌奸的造谣和欺骗宣传，鼓动侨胞起来进行有组织的

抗日战争，受到侨胞的欢迎。篇幅由八开一版，发展到四版，有时六版，份额由最初的约350份增至后来的1500—2000份，发行范围从马尼拉，中、南吕宋，扩大到列加斯比、宿务和怡朗。

一年之后，占领当局便认识到，为达到奴化华侨的目的，不是光封闭华文报就能办到的，需要有一份华文报纸，以便“启发和引导”华侨“走正路”^①。1943年3月，他们利用马尼拉华文报社原有的设施，办起《华文马尼拉新闻》。这家由军政监部直接控制的报纸，由于在华侨报界找不到附敌分子合作，只好指派台湾人主持。该报是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的，它只发表日本新闻社播发的新闻和有关统制华侨的法令，因而在侨社中臭名昭著，尽管军政监部强迫华侨订阅和捐款“赞助”，但发行数只有4500份。大多数华侨宁可传阅地下小报，而不愿意看这份敌报。《华侨导报》也注意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加强正确的报导，以戳穿它的造谣欺骗，并号召侨胞以“三不”——不卖敌报，不订敌报，不在敌报登广告，进行抵制。就这样，《华文马尼拉新闻》出版不到两年便寿终正寝。

沦陷期间，华侨已经四散逃难，侨校本来就难以维持。1942年2月18日，占领当局宣布，凡是由中国人或任何敌对国侨民管理或拥有的学校，在接到许可通知之前，一律不得重开^②。全部侨校因而被标封、停办。下半年，日占领当局计划重新开放两所华侨学校，让华侨学习日本语文，以便推行奴化教育。为此，军政监部数次传华侨教育界人士——洪敦友和刘芝田谈话，强迫侨校开课。但他们两人都以“缺少校具、教具，教员、学生四散为理

①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71.

②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72.

由”；婉转拒绝合作^①，使当局复办侨校的计划胎死腹中。后来，军政监部又指使华侨协会出面办起“扬子职校”（Yang-te Vocational School），但招生时，却无一人报名，虽几次延长报名时间，仍无人问津。

学校停办以后，华侨教育界人士的生活是极其困难的。侨校教师的待遇本来很低，平时无甚积蓄。战争爆发之后，抗敌会也只给各校教师两月工资，充作遣散费。但华侨教育界人士，不论留在城镇，还是逃到外地，都能保持民族气节。这些战前的教书先生，有的参加抗日斗争，有的办小型补习班或任家庭教师，继续从事本行工作，有的以砍柴、种菜、贩卖香烟、开小食档糊口，度过黑暗痛苦的三年，始终顶住敌人开办伪校的引诱，拒绝与敌伪合作。

自1944年10月美军在莱特岛登陆并进入吕宋岛作战以后，日军节节败退。日军在败退之际，在马尼拉和吕宋各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

大屠杀是预谋性的，是日军撤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军到来之前，日寇就或公开或私下向盼望美军到来的人（这在菲律宾人和华侨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发出威胁：“是的，美国人将要到来。他们将运来大量的食物。但你们不能活着吃东西了。”在1945年1月，当北路美军已逐渐向马尼拉推进时，又有传闻：日军深恐华侨游击队在美军入城时协助美军作战，拟把所有华侨青年男子集中^②。

1945年2月3日，美军在华、菲游击队引领下，突入马尼拉市巴石河以北市区。残余的日军渡河退至河以南市区。南撤之

①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53页。

②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69页。

前，他们已在北部市区实行焦土政策。撤退之后，则一面负隅顽抗，一面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2月4日至10日，在王城、埃尔米塔、马拉特、新加朗、班达干、帕萨伊、帕科以及塔夫脱大街的住宅，全部毁于火，居民不是死于火，即死于日军刺刀之下。王城数千各籍居民，除一、二华侨幸免外，几乎全部死光。

尤其是2月5日那天，日军沿门挨户，搜索居民，勒令男女分开排列街上，男的一排立被机关枪屠杀，女的亦被拥掠，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有一部分则被手榴弹掷击，四肢散离，遍布街上，其凄惨情况，诚非笔墨所能形容。又该区①华侨居民，包括男子妇孺，则被追集中于一间天主教堂及三间戏院内，然后用汽油把各院门淋湿，投掷手榴弹使其焚烧，凄叫惨号之声，一时震天动地，那些逃出者，则遭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一一予以击毙②。

从马尼拉争夺战后期（2月底）起，驻内湖省日军陆续撤至山区，妄图作困兽斗。在撤退过程中，又在该省的卡兰巴、圣巴勃罗、圣克鲁斯、帕桑汉、洛斯巴尼奥斯等城镇和沿途各地进行大屠杀。其中，屠杀华侨最多的是圣巴勃罗“二二四惨案”。2月24日早晨，圣巴勃罗市日驻军司令通知所有15—50岁的菲、华男性居民，立即到当地天主教堂集合。在此之前，该市伪华侨协会会长陈宗狮、林德源等曾接游击队警告，要他们让华侨离开该市，但他们不听忠告，反而于是日遵从日军的命令，强迫上述年龄的华侨集中。居民集中后，日驻军司令出来讲话，叫嚷：“现在仍有小部分人梦想英美军队回到菲律宾。我怀疑你们之中是否还有人会再次看到英美军队。”接着，伪称要他们帮助日军构筑战壕。日军先

①原文作者未说明“该区”所指

②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70—671页。

将600多名华侨押到康塞普西翁村的椰林中，让他们挖掘好阔六英尺、长十英尺、深六英尺的地沟之后，就把他们关进屋里，再五人一组地带出，一一刺死，推进沟中。其中少数人受伤未死，逃进医院，又于次日被杀。这次被杀的华菲居民共8 000人，其中华侨600多人。

在巴坦加斯省，也发生了屠杀事件。3月11日，塔那湾镇有100多人被杀，其中华侨40多人。

在日军占领菲律宾的三年半中，华侨牺牲者估计达1万人，财产损失估计近2.5亿比索，其中马尼拉华侨损失123 414 000比索。这就是说，财产损失几近华侨战前在菲投资的总数^①。

四 伪华侨协会的成立及其 事敌害侨活动

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目的是为了掠夺该地区的物产资源，以支持其全面的侵略战争。他们的华侨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1942年2月14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订出《华侨对策纲要》，其中规定：

华侨对策主要在华侨所在地施行，其要点在于使他们在我国掌握之下，对帝国国防必需物资的生产和取得方面作出贡献。为此，按情况需要施加适当政治压力，使他们与我方相配合，同时利用其原有的经济机构及习惯，指导他们积极配合帝国的政策，随着情势的变化，并应逐渐控制华侨的社会势力^②。

^①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P, 80, 90.

^②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简而言之，日寇对华侨的政策，就是控制与利用；利用是目的，控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在日军登陆并占领菲律宾之初，占领当局挟其对中国人的刻骨仇恨，乘其军事胜利的余威，对华侨肆意掠夺、逮捕、杀害，迫使他们放弃反日爱国立场，转而采取亲日立场，与其侵略政策合作。他们拘禁中国领事官员、侨领，一则以之作为人质，迫使华侨合作，一则迫使被拘禁者出面建立华侨傀儡组织，并运用他们的威望和号召力，驱使华侨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出钱出力。但日寇这一手已以失败而告终。广大华侨既未因外交官和侨领之被监禁而放弃爱国立场，被监禁者也未为求生而丧失民族气节。

随着1942年5月6日科雷吉多岛的陷落，日军占领菲律宾全境，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占领当局开始在菲律宾作长久计，企图使菲律宾在为他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中作出贡献。日本对菲律宾的统治，由最初以武力高压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政治拉拢和控制为主。对华侨的统治，也在继续残杀反日爱国分子的同时，着力培植和拉拢亲日分子，两手兼用，以加强对华侨社会的控制和利用。

日军占领菲律宾之初，为加强对岛民的控制，即已在城乡普遍建立“邻里协会”。每一邻里协会由10—15户居民组成，负责维持治安，分配生活用品，并为“圣战”征调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占领者提供各种服务。邻里协会内实行连保制，彼此监视，全体对个人行为负责，借此限制和消除反日活动。到1944年6月，全菲共有邻里协会126 716个，内含1 515 697户。仅马尼拉一地，就有14 038个协会，185 911户。城乡华侨居民也都被编到邻里协会中去。但邻里协会仅仅是由若干户组成的小小治安组织。它们对控制华侨的抗日行动，具有某种作用，但要它们为日寇的华侨政策

服务，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日寇在封闭、解散华侨原有一切团体组织之后，便由军政监部策划另组亲日团体。

军政监部在利诱被监禁的中国外交官和侨领出面组织伪华侨协会的企图落空之后，便退而求其次，在华侨中物色和培植亲日分子，筹建傀儡组织。其主要人选，一个是以亲日闻名的吴筭来，一个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过一段革命经历的郑汉淇，还有一个是日本的凶恶走狗陈天放。

吴筭来是马尼拉华侨商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从事对日进出口贸易，并经销日货，交易颇大，与当地日商有密切交情。“九一八”事变以后，全侨进行抵制日货，吴筭来虽改营“远胜汇兑公司”，但并未改弦易辙，仍暗中继续与日本商人交易，因而赢得日本人的垂青^①。

郑汉淇参加伪华协的背景未详。

对组织伪华侨协会，广大侨胞态度冷淡。它完全是在军政监部导演下，由一小撮人筹备起来的。先由吴筭来开列出77名发起人名单（不管他们同意与否），由军政监部加以发表。6月1日，华侨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宣告成立，由吴筭来任会长，郑汉淇为副会长，陈天放任秘书长。会务由一个九人执委会，一个六人理事会管理。其重要职员，均由军政监部审定的亲日分子担任。

菲律宾华裔陈守国教授在评论华侨协会的目标时说：“华侨协会，是日本当局为置全体华侨于其监视之下、并使当地华侨与日军事当局在建立一个新菲律宾方面通力合作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采纳了西方在东南亚实行的以华制华的殖民方

^①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53;

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55页；陈烈甫：《菲律宾的历史与中菲关系》，第236页。

法。”^①

军政监部把对华侨分而治之的方法，也用到华侨协会的组织方面来。按协会计划，原拟在各省设立分会，形成系统。但日本军事当局不愿意全侨有一个统一组织，纵使这个组织是受当局监督、赞助，并由亲日分子控制的。根据军政监部的训示，已成立的华侨协会只能管辖大马尼拉市和中吕宋各省。其他各地，另设华侨协会。各地协会既对驻当地日军机关负责，也统归军政监部领导。各个华侨协会之间，不能有直接联系。先后成立华侨协会的地方有宿务、怡朗、莱特、萨马、三宝颜、哥打巴托、苏禄、达沃，在吕宋，则另有阿巴里、比干、拉瓦格、图盖加拉奥、碧瑶、圣巴勃罗、卢塞纳、列加斯比等。

伪华侨协会成立之后，干了许多坏事。

第一，协助日寇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活动。华侨协会成立不久，就秉承占领当局的意旨，于1942年7月7日致电重庆政府，敦促国民党领袖“审时度势”，停止抗战，“同日本站到一起”。

第二，引诱华侨作日本的顺民。战时，菲律宾物资紧缺，来往限制严格。日军事当局利用这种情况，加以利诱，使华侨加入协会。例如，加入协会并领取会员证后，日军事当局才承认其为良民，其生命财产才得到保障；通过协会的帮助，华侨才能领到“通行证”、“良民证”等一类证件，有了证件才能到各地经商、谋生。而要成为会员，首先就得放弃爱国立场，向侵略者屈膝。因为，每个会员除了要缴交10比索的“大东亚圣战献金”，从而在良心上认可日本的侵略战争之外，还要举行宣誓。誓词写道：“余今觉悟，余乃系东亚民族一分子，愿以至诚，服从大日本

^①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53.

军指导,尽忠努力,以完成东亚新秩序,决不再有援蒋抗日行为……”^① 协会还秉承占领者的意旨,强迫华侨对当局各种重大决定表示拥护。对日伪举行的各种庆典、仪式,当局要员的往来,则强迫华侨组织庞大的队伍参与欢庆或送往迎来,充当啦啦队。

第三,为日寇举办华侨献金运动。这是协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协会成立之后,日军政府便通过协会,向华侨摊派捐款。各地侨胞在一年多里被迫交给占领当局的“献金”超过1000万比索^②。在这种强制性的“献金”活动中,一些人是由于利欲薰心,见利忘义。因为“献金”2000比索者,可以成为军政监部组织的“日用品供应组合”的会员,有权按期向协会领取火柴、香烟、肥皂、猪油等日用配给品,用以转售。在物质紧缺的当时,这是个重要的财源。但对大多数华侨来说,这是“花钱向占领者购买保护”^③。

第四,在华侨中实行所谓“劳动奉仕”,即硬性摊派人力,为占领军充苦役。占领者常以“志愿服役”为名,滥征菲律宾人和华侨劳动力,无偿地用于“增产粮食运动”和各种军事工程。每次征调华侨人力,都是当局下令后,即由华侨协会负责向各保甲摊派,并按当局要求,组织劳动和进行现场监督。1944年4月,协会奉命抽调人力到新马尼拉(战后改为奎松市)修筑飞机场。这项工程共需1.5万工,限一个月內完成。于是,16—60岁的男性华侨,都被迫从事一天苦役。每天轮派500人,由协会派

①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56页。

②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p. 54—55.

③Tan,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55.

人监工,还要求超额完成每天的劳动定额。同年5月,协会为日军征募一批铁工。6月又为伪马尼拉市政府征调华侨参加“增产粮食运动”,每天轮流派250人到田间劳动,长达一个月之久。由于马尼拉伪华侨协会在强迫劳役中积极充当日寇的爪牙,因而获得日本军方赞赏。后者因此奖给伪华协一纸“奖谢状”,并奖给吴筍来一笔奖金。但吴筍来立即把钱交还日本人,作为“华侨”对菲律宾防务的赠款^①。其他地方的华侨协会,也都曾受命组织强迫劳役。例如,当美军在南太平洋战事中节节胜利,战火将又烧到菲律宾之际,莱特的3000名华侨就曾被编成“志愿服役团”(Voluntary Service Corps),达沃也有“劳动服役团”(Labor Service Corps)的组织,强制华侨为日军生产粮食和构筑工事。日伪的强迫劳役,使广大侨胞叫苦连天,怨声载道。马尼拉华侨抗日组织,因势利导,发表《(为)反奴役告侨胞书》,发动侨胞开展反奴役斗争。

第五,为虎作伥,协助日寇兵当局侦查华侨抗日分子,镇压华侨抗日力量。特别是美军在莱特登陆(1944年9月20日)之后,华侨协会敌视抗日力量的活动更加猖獗。那时,该会由曾廷泉任第二任会长。他以伪华协属下的青年会为据点,纠集侨社流氓、败类,组织“普智”特务队,专门破坏华侨的抗日运动。

第六,操纵保甲组织,鱼肉侨胞。伪华侨协会指挥华侨邻里协会活动,操纵保甲长。一方面通过严厉清查户口,控制侨社,限制侨胞的正当活动;另一方面则卖力为日寇征调华侨服劳役,摊派捐款,强迫华侨出钱出人,为日寇捧场;同时还乘势敲榨,鱼肉同胞。1944年,米价高涨,粮食配给额全部停发。这

^①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659—660页。

时，曾廷泉却以筹设“华侨商业公司”，复兴华侨经济为名，强抢华侨粮食和物资资敌。协会一些职员，也甘当走狗，对侨胞作威作福，敲榨勒索，残害同胞，无所不为。

伪华侨协会的所作所为，招致爱国侨胞的憎恨，因而处境孤立。其头面人物，包括第一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若干理事、干事，也在1943年6月至1944年9月间纷纷被抗日志士刺杀。

由于附敌分子一一被杀，日宪兵当局对华侨实行报复政策。他们每夜搜查华侨住宅，逮捕、杀害“嫌疑犯”，并网罗败类，刺探华侨地下抵抗组织的情况。日宪兵当局还扬言要杀死1万华侨，为吴筍来之死进行报复。日本军事当局还任命专门主管华侨事务的宪兵军官，负责改组华侨协会，冀图给这个傀儡组织加添活力。

伪华侨协会在1944年11月改组后，由曾廷泉担任会长。应当指出，曾廷泉任伪职时，美军已在莱特站稳脚跟，以奥斯敏纳为总统的菲律宾自治政府已在该岛首府塔克洛班行使职权。美军已着手登陆吕宋岛的作战准备。马尼拉的抗日游击活动空前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廷泉还甘当日寇帮凶，掠夺和镇压侨胞，破坏华侨抗日运动，当然激起众怒。华侨抗日游击支队马尼拉大队，于1944年12月对曾廷泉进行一次伏击。但因手榴弹投不进门窗紧闭的汽车，这次伏击未达目的。但这次伏击事件毕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广大侨胞人心大快，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战士斗志更加高昂。曾廷泉则如惊弓之鸟，一直称病不出，其他附敌分子欺压华侨的活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时的伪华协人员，感到大势已去，大都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甚至暗中烧毁文件，为自己准备后路。伪华协已成了一具僵尸，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五 华侨的抗日斗争

菲律宾华侨有与侨居国人民共同反殖民主义奴役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华侨在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历次爱国热潮中，提高了政治觉悟，锻炼了斗争意志，增强了政治组织性。祖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不怕牺牲，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了侨胞的斗志，因而，从“七七事变”以来，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甚至亲临战场，对日作战。在日本侵略战争阴云笼罩太平洋上空之时，少数华侨青年已作好一旦战火烧到菲律宾，就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一些曾回国参军、参战或参加过军事训练的华侨青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回到菲律宾，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华侨游击队、地下抗日组织的领导人和中坚分子。

日寇侵入菲岛后，华侨就在各个抗日团体的领导下，以不同的方式，直接间接地投身到斗争中去，又一次同菲律宾人民携手并肩，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占领者。

在日寇占领下，华侨社团组织因形势变化，有的被迫停止活动，有的则及时转入地下。要在法西斯统治的险恶条件下，领导侨胞进行抗日斗争，各团体组织都必须适应形势的需要，重新组合或改组。因此，在巴塔安陷落前后，华侨各抗日组织便先后建立。它们在华侨和菲律宾人的支持下，有的活跃于农村山区，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有的秘密活动于占领当局的心脏地带和地方中心，出版地下小报，收集情报，除暴锄奸，发动和组织侨众同敌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战争后期，当美军登陆菲岛对日作战时，这些抗日组织又给美军提供有关敌人的军事情报，作美军的前导，并直接参与解放菲岛的军事行动，参加救护和救济难

侨、难民，抢救在集中营的盟国侨民、俘虏等工作。

菲律宾华侨抗日活动，是菲律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者斗争的组成部分，对菲律宾的抗日解放斗争，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论是从华侨史的角度，还是从菲律宾史的角度，华侨在这方面的活动、牺牲和贡献，都是应予记述的。

当时，属左派组织的地下抗日团体有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抗日游击组织有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属国民党系统的地下抗日组织有四个，习惯称为“四抗”，即华侨战地民主血干团、华侨战时青年特别工作总队、华侨义勇军和华侨青年抗日迫击团。现将各组织的概况及其战斗历程分述如下：

华侨战地民主血干团 简称血干团，是“四抗”中较为活跃的组织，成立于1942年七八月间，其骨干成员，是1938年回福建参加第十三补训班的华侨青年，团长是曾任金门县县长的李海若。该团主要在马尼拉从事地下活动，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和进行锄奸工作。它出版小报《导火线》和月刊《丹心》。1943年底，血干团发生分裂，多数派仍留在血干团，少数派另组迫击团。1944年年中，血干团组织受到日寇的严重破坏，元气大伤，直至美军重返吕宋，才恢复活动。在抗日期间，该团牺牲数十人。

华侨青年抗日迫击团 又称迫击三九九团或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简称迫击团。该团原是血干团的一个大队，成员都是战前华侨店员救国会（店救会）的骨干。队长陈培德（礼智）是血干团创办人之一。1943年底，陈培德、蔡水波、郑书鹤等几十名血干团成员，因不满血干团上层领导消极抗日的态度，毅然脱离血干团，另组迫击团。迫击团的第一任团长就是陈培德，第二任团长是蔡振声。此后，迫击团在抗日活动、打杀侨奸方面，同华支马尼拉大队互相配合。1944年9、10月间，华侨各抗日团体受敌伪严重破坏。迫击团被破坏最早，组织暴露。陈培德等12名迫击团

成员和五名血干团成员，于9月初到中吕宋参加华支。其后，迫击团很快又在马尼拉重组，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在美军收复马尼拉的战斗中，迫击团也配合作战，并协同华支、抗反同盟、洪门等各抗日侨团，从事护侨和抢救华侨财产，救济和收容难侨等活动。在美军解放南吕宋省时，该团随军作战，且有多人阵亡。在抗日斗争中，该团先后牺牲34人，其中包括陈培德、蔡振声、蔡水波、郑书鹄、胡翰清、姚貽沙、沈秋萍等领导成员。

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 简称特工队，成立于1942年4月。其主要成员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领导人是林作梅。特工队的宗旨是：为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协助维持治安；在财力和粮食方面，给菲正规军及残余美军以帮助。该队还组织小分队，为奥顿尼尔战俘营的逃生者提供救援、食物、衣服和医病帮助。办有油印小报《先锋》。在美军登陆林加因之前，该队主要从事收集和向美军提供军事情报。

华侨义勇军 其基干是国民党党员，司令是原国民党驻菲总支部书记长施逸生。该组织在马尼拉从事收集情报和锄奸活动，出版小报《大汉魂》。在美军光复马尼拉后，义勇军扩大队伍，在北吕宋配合美军作战。

“四抗”组织之间，彼此缺乏相互配合，其影响也因而受到局限。但它们在菲律宾沦陷期间，一直坚持抗日斗争，这是应予肯定的。

洪门复兴委员会和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 洪门复兴委员会成员是洪门进步人士，领导人是许志猛（即王全忠）。办有油印小报《侨商公报》，创建游击队“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抗锄的成员是洪门人士及其子女、华侨学生、青年、小商人等。它的成员也分散参加各抗日团体组织，如华支、迫击团、“青抗”等。王全忠任总指挥，庄芬士（杰鹄）任副指挥，高山（望

星)任参谋长,杨维(静桐)任秘书长。1945年初,应美军要华侨游击队配合他们作战的要求,抗日锄奸义勇军扩大力量,配合盟军和华支光复马尼拉,并积极进行救援难侨的工作,如在大火中抢救华侨财产,创办“北中”难民收容所等。接着,王金忠又带领队伍,开赴南吕宋前线,配合美军第十一空运师追歼残敌,颇著战功。

华侨抗日组织中,最重要、因而对菲律宾抗日斗争贡献最大的,是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和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 简称“抗反同盟”。它同第三节中所说的《华侨导报》、后面将要详细介绍的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是同一系统的三个兄弟团体,彼此互相支援和合作^①。

大约是1941年12月10日,“菲律宾华侨抗日护侨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侨同美菲军及当地政府一起,反击日寇侵略。同时上书麦克阿瑟,要求发枪武装华侨青年,对日作战,并要求让华侨青年组织战地劳役大队,到前线为美菲军服务。劳联会已为此组织了12个劳役大队。但麦克阿瑟却迟至20日才作覆,对武装华侨青年及劳役大队赴前线服务一事,避而不答,只同意他们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战时民防队,参与维持秩序,灭火救伤等工作。后因战事发展太快,此议未及实施,而马尼拉已宣布为“不设防城市”^②。1941年除夕,约400名马尼拉爱国华侨青年,响应劳联会提出的“准备武装抗日,准备打游击”的号召,由该会负责人许立率领,撤离行将陷落的马尼拉,奔赴中吕宋,来到庞邦加省东北角的干达巴镇所属曼地利村,同集中在这里准备武装抗日的中吕宋农民领袖会合,一起举办军事政治班,学习游击战

①梁上苑:《菲律宾华侨抗日战争历史概述》。

②蔡建华1986年3月8日致作者信。

的战略战术。当时，敌伪军警经常到这里搜捕革命政党和农会领袖，抢掠禽畜。各地盗匪流氓也趁机蠢动，打家劫舍。中吕宋这时虽有自卫性质的零星武装小队，但仍无力对抗敌人的搜索队伍，从正面保护群众。几百名华侨，只好随当地村民，东奔西突，躲避敌人的骚扰。而且，组织游击队的工作刚刚开始，而华侨集中的马尼拉，却需要有人发动、组织和领导侨胞开展抗日斗争。于是，除留下几十人之外，大部分青年和部分干部，被派回已稍见安定的马尼拉和其他城市。被派回马尼拉的干部陈村生、林辉灿、郭健、林季良、麦慕平等，经过艰苦的地下活动，在3月间组织了“抗日反奸大同盟”，4月创办起《华侨导报》。参加抗反同盟的，有由战前的劳联会、店员联合会（店联）、青年联合会（青联）、粤侨联合会（粤联）等改组而成的华侨工人抗日反奸大同盟（工抗）、华侨青年抗日反奸大同盟（青抗）、华侨妇女抗日反奸大同盟（妇抗）、华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店抗）、粤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粤抗）。同月，中吕宋、南吕宋建立抗反同盟分盟。此后，比科尔、怡朗、宿务也建立分盟。

抗反同盟与《华侨导报》互相配合，团结抗日友团，致力于动员和教育侨众，与敌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在政治上给伪华侨协会以全面打击，发动侨胞同伪华协事敌害侨的活动作斗争。1944年4—6月间，敌伪推行强迫劳役，又逢粮食价格飞涨，有关部门停止配给粮食，广大侨胞面临绝境。抗反同盟和华支马尼拉中队，先是在4月间印发《（为）反奴役告侨胞书》，号召广大侨胞拒绝为敌人服劳役。继而，又在6月号召侨胞进行“反对奴役，争取米粮”的斗争。6月15日晚，它们发动侨胞，在日伪宪警密布的马尼拉王彬街、努埃瓦街一带的华侨中心区举行示威，在华侨区所有电影院、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捣毁“新时代区”保甲长办事处，抗议和声讨强迫劳役、掠夺

米粮的法西斯政策，这一行动，使侨社震动一时，大大鼓舞了侨胞的斗志。这一年的抗战七周年纪念日，抗反同盟等抗日团体又在马尼拉大光明、亚洲两戏院举行示威性纪念仪式，发表纪念演说，散发抗日传单，张贴国旗、标语。

1944年10月以后，抗反同盟乘有利形势扑杀奸伪，并普遍散发劝告信和警告信，以瓦解伪华协，麻痹保甲机构。

抗反同盟给华侨游击支队以积极的支持。抗反同盟和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两者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抗反同盟领导者之一的陈村生，稍后成了华支的参谋长。华支的伤、病退伍人员，在回到城市后，成了抗反同盟的活跃分子。抗反同盟的许多抗日、锄奸行动，需要华支配合和支持。而抗反同盟则是华支在侨社中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华支以抗反同盟输送的人员补充、扩大游击队伍。在三年中，抗反同盟曾动员几百盟员和侨胞参加华支。华支的马尼拉中队（以后扩充为大队），是以抗反同盟下属各成员团体的武装小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抗反同盟又常常发动劳军活动，不断给华支输送慰劳捐款、衣物、用品、医药，从精神和物质上给华支以有力的支持。

在美军解放马尼拉前后，抗反同盟为配合美军作战，同华支和其他抗日友团一起，向美军提供驻马尼拉日军的确切情报。

抗反同盟致力于保护华侨的利益。在美军行将从北面进入马尼拉市区，日军已撤至南市区，华支马尼拉大队已占领伪华侨协会会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时，抗反同盟会同华支马尼拉大队和其他友团，通力合作，扑灭大火，抢救受伤侨胞及其财产。在美军要炮轰北市区时，它协助动员华侨疏散，避免被炮火伤害。炮轰过后，华侨中心区发生大火，抗反同盟又投入新的战斗，维持华侨区的社会秩序，武装保护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灭火和救济难侨。它先后设立难民所七处，收容难侨达6_000名。

抗反同盟在三年的战争历程中，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有36名优秀干部和盟员献出了宝贵生命。该盟的三年战斗，使“敌人闻抗反而惊叹，侨众闻抗反则争相爱戴”^①。这是对抗反同盟三年斗争功绩的高度概括。

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劳联会组织撤至中吕宋的那批热血青年，在部分干部、大部分群众返回城市从事地下斗争之后，留下的几十人，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决定以农民运动发展较快、群众基础较深厚、粮食取给较易、与马尼拉联系也较方便的中吕宋阿拉亚特山一带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42年3月2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②在中吕宋正式成立。那几十名华侨青年，作为民抗军的战斗员，分散参加民抗军的六个支队，每个支队七八个人。各支队每一次对敌伪出击，他们都积极参加，且勇敢善战，得到民抗军指战员的赞赏。

1942年5月19日，分散于民抗军各支队的华侨队员，集中自成独立作战单位，称为“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也称“48支队”^③。当时，华支只有队员52人，配备借来的七支火烧枪^④，另有两支短枪，十多把茅刀^⑤。武器的短缺和队伍缺乏训练，是华支一开

①引自梁上苑、蔡建华：《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第231页。

②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简称民抗军。在菲律宾，通称Hukbalahap或Huk，是泰加洛语Hukbo Ng Bayan Lapan sa Hapon的缩称。

③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这个别名，取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和八路军番号中的“四”和“八”，含有以这两支人民队伍为楷模，向它们学习之意。

④美军撤退前烧毁军火库遗下的枪枝。

⑤杜展鹏：《坚持敌后抗日的菲律宾华侨》，《光明日报》，1985年9月10日。

始就面临的两个急切问题。

6月初，华支分成两队，福建队由吴紫清（吴扬）率领，广东队由蔡建华（余志坚）率领，开赴巴塔安。7月初，华支驻扎于巴斯布尔山（华侨称为劳青山）区的巴斯布尔村。一方面在这里进行军政训练，提高政治素质，提高军事技术，并按照国内游击战争的要求，制定了三大纪律原则、八大要求和八项注意^①，作为华支铁的纪律；另一方面以就近夺取敌人武器，或动员村民捐献美菲军散落的武器，或到山区搜寻美菲军丢弃、埋藏的军火武器等办法，取得武器装备。到9月初他们离开巴斯布尔山时，已成为一支拥有78人，政治觉悟、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都大大提高的游击队伍了。它拥有的武器，已超过它的人数：80多支步枪，4支自动步枪，1挺重机枪，5挺轻机关枪。火力大大超过日军的一个连队。

华支在雨季回到干达巴沼泽地带，休整队伍。在巴斯布尔山的三个月，由于疟蚊横行，粮食缺乏，大部分队员患了疟疾和烂脚症。在休整中，他们的主要战斗任务是袭击圣米格尔公路上的日寇军车和货车，破坏日军的运输。在太平洋战争的周年纪念日，华支协同民抗军进攻新怡诗夏省的圣伊斯德洛镇，俘虏全体伪警20多名，缴获一批武器，烧毁镇政府建筑，以军事打击作为给日寇“庆祝日”的贺礼。

从1942年12月初起，日军对吕宋进行分区扫荡，遭到华支和民抗军的有力反击；被歼近千。1943年1月22日，百余日军企图进攻驻在森林中的各抗日领导机关。驻守庞邦加河边干通巴矿地、负责保卫抗日机关安全的华支战士，和来犯之敌40余人展开

^①具体内容见黄杰、蔡建华、里昂（执笔）：《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三年游击战纪实》，第22页。

激战，战斗从上午8时一直进行到中午12时，结果，华支以一位班长轻伤的代价，毙伤日军30余人，内毙伤敌军官各一人。华支的辉煌战绩，受到菲律宾军民的赞扬。当捷报传到马尼拉时，华侨社会纷纷展开庆祝和慰劳活动。

1943年2月12—14日，华支和民抗军一连三个晚上进袭新怡诗夏省的卡比奥镇。敌人老羞成怒，调集200多人，进攻该镇所属圣胡利安村的民抗军。华支赶去支援，从敌人后面包抄过去，与民抗军前后夹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敌军七八十人。

游击战在菲律宾第一大粮仓中吕宋的逐步升级，使敌人如刺在目，急欲除之而后快。从1943年3月5日早晨起，日军调动5000人和同等数目的伪军，兵分五路，并以空军配合，对阿拉亚特山脚一带和森林区进行大包围，大扫荡。包围的中心，是游击队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机关所在地的森林区，目的是要一举消灭根据地的全部游击队。游击队对敌人这次行动，事先虽有所察觉，但重视不够，准备不足。敌军重重设围，又派几支队伍进入森林搜索，使华支与友军的联系完全断绝，粮、水全无，被迫反复潜移。他们忍受饥渴，经过四天的辗转，才在当地村自卫队的帮助下，冲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突围出来。在此后的两个月中，敌人到处追踪华支，使它不得不在庞邦加、桑巴列斯、塔拉克、布拉干四省来回转移，最后与民抗军一个支队，于4月底5月初开进布拉干省圣米格尔的大山中。

敌军追踪而至，严密封锁山脚。民抗军已化整为零进行活动，当地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华支在山上疲惫不堪，食宿无着，病员日增，药物缺乏，同马尼拉的联系也已中断。华支面临存亡关头。要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唯一的选择，就是“到南吕宋去”，开辟新地区。那里的农民也有革命斗争的传统。那里山多野果多，即使长期被困山中，也不致挨饿。在那里，也容易同马

尼拉、同外界取得联系。但要到南吕宋，就必须走出圣米格尔山，通过渺无人烟、崎岖陡峭、广袤漫长的马德雷山脉。

1943年5月9日，华支全体队员踏上新的征途。他们一路上忍饥挨饿，爬山涉水，穿过布拉干、黎萨、塔亚巴斯（现奎松省）、内湖四省的蛮荒山地，经过26天行军，于6月3日抵达内湖省的帕埃特（白地）和朗哥斯一带山中。长行军胜利结束。

南吕宋当时除有一小支民抗军以外，还有许多不同派别的游击队，主要的是马京游击队（**Marking Guerrillas**）、菲律宾后备军官游击队（**ROTC**）、奎松游击队（**President Quezons own Guerrillas**）。这些游击队各自为政，甚至互不相容，常为争地盘而发生火并。而且，在华支到达之前，日寇曾进行过两次“围剿”，抗日游击运动因而处于低落状态。民抗军也由支队集中行动改为小队分散活动，对敌人的打击力大大减弱。

华支到达南线，推动民抗军恢复原来的组织形式，还充任民抗军的教官，帮助它组建四个新的支队，即黎萨支队、波尼法西奥支队、卢纳支队和马尔瓦支队。华支的到来，对南吕宋各抗日游击队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华支对各游击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搞好与各游击队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在实践中，华支以敢于、善于打游击战的模范行动，带动各游击队消除等待主义思想，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华支还分别同民抗军、ROTC及其他美菲军单位签订《军事行动协定》、《互助协定》等盟约，加强在抗日斗争中彼此协作。在各游击队之间发生纠纷时，华支采取中立态度，耐心调解。因此，华支在南吕宋整整两年，战斗活动遍及黎萨、内湖、塔亚巴斯、巴坦加斯四省，同各支游击队始终友好相处。

华支在南吕宋积极维护华侨和当地群众的正当利益。遇到华侨受到某些游击队的滥征、加派和迫害时，华支便积极进行调查交

涉，同他们耐心谈判，提出解决办法，一般都得到纠正。一次，马京、ROTC两支游击队要帕桑汉镇伪镇长捐助几万比索军饷。伪镇长指定当地一百多位华侨负担该款。华侨向华支申诉。华支派人警告伪镇长，不能硬性向华侨摊派捐款，否则华支将进攻该镇，以示惩罚。伪镇长不敢违抗，摊派一事便不了了之。在华支驻扎的塔亚巴斯镇伊拉散村附近，一支游击队的首领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奸淫抢掠，嗜杀成性，甚至掳走两名美菲军游击队员的女儿。附近村民纷纷向民抗军和华支控告他的罪行，美菲军也请求救援被劫少女。华支会同民抗军、美菲军组成联合指挥部，设计活捉该首领，召开公审会，由村民进行控诉，然后把他处决了。事后，联合指挥部立即展开政治宣传，散发告人民书、告兄弟游击队书和其他宣传品，详述事件的经过，使人们理解这样做是为了抗日，为了替人民除害。华支这些护民行动，得到侨胞和当地人民的拥护。华支的威望更高了。

1944年夏，华支鉴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速发展，深感扩充队伍的迫切性，便发出“扩大武装斗争，迎接盟军反攻”的号召，并于8月1日发表《为扩大队伍迎接反攻告侨胞书》。华侨青年纷纷响应，要求参加华支。华支顺利地扩充原有的南吕宋大队和马尼拉大队，并于9、10月间在中吕宋平原新建两个大队——广东独立大队和福建大队。后两大队各有百余人。华支这次扩军，为日后扩大军事行动，配合美军作战打下了基础。

从11月到12月，民抗军在中吕宋开展“保卫收获的斗争”，华支积极与之配合。1945年1月9日美军在林加因湾登陆以后，中吕宋和南吕宋的华支队伍，在敌人后方扩大军事行动，破坏公路、桥梁、铁路，截断日军的交通线。同时，配合民抗军攻占中、南吕宋各省的重要城镇，包括新怡诗夏省的哈恩、圣马利亚、卡比奥，塔拉克省省会塔拉克，庞邦加省省会圣费尔南多，内湖省

的马海海、纳卡冷、里留、马格达莱纳、黎萨、毕拉、卡拉万、圣巴勃罗和省会圣克鲁斯等，歼灭大批敌伪，解放战俘营中的美军俘虏，牵制了日军的力量，从而为南北两路美军迅速向马尼拉进军铺平道路。

1945年2月3日，华支中吕宋的两个大队配合美军，神速进入马尼拉城北，解救被囚在圣托马斯大学的数千盟国侨民和比里必大监狱的囚犯。华支马尼拉大队，也于第二天凌晨占领伪华侨协会会址，与友团一起救火，抢救难侨。5日，上述三个大队从北郊正式开进市区。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华支又配合美军，与在市区负隅顽抗的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同时担负提供情报，消灭残敌，看管俘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侨胞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开设难民所，收容与救济难侨等工作。

在马尼拉争夺战行将结束的2月底，华支要求开往南吕宋，以解救仍在敌军铁蹄下的当地人民和侨胞。获得美军当局同意后，华支将集结在马尼拉的三个大队全体队员重新编为两个大队，即第二、第三大队（南吕宋大队为第一大队），于3月3日开往南线，与美军第十一空运师协同作战。

在这以前，华支第一大队已配合美军、ROTC、民抗军等，成功地抢救了关在内湖省洛斯巴尼奥斯集中营的2000多名盟国侨民。

在第二、三大队开到南线后，与在南吕宋的第一大队，分别被派往美军第十一空运师各炮兵营。在作战中，他们表现出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能力。因而，其他炮兵营也要求华支派人配合作战。华支乃抽调干部，动员华侨青年参军，组成第四大队。比科尔地区的华侨也组成一个大队，番号为第五大队，也叫比科尔大队。至此，华支战斗在南吕宋四个省（内湖、塔亚巴斯、巴坦加斯、卡维特）和比科尔三个省（阿尔拜、南卡马林内斯和

北卡马林内斯)的抗日战场上。到6月为止,他们参加大小战斗50多次,歼灭敌军近千人。

6月,吕宋岛的残敌已告肃清。7月4日,菲律宾全境宣告解放。

华支在三年时间里,转战吕宋岛14个省份和马尼拉市,经历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 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战利品。队伍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52人,发展到1945年初的五个大队,700多人。但华支本身,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牺牲77人,其中包括参谋长陈村生,华支驻中吕宋代表尤鸿源,华支副总队长高华岳,马尼拉别动队长林辉灿、副队长林时力、陈廷芳,副指导员黄奕慈,还有43人受伤。

华支转战南北,抗日杀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了侨胞抗日直到胜利的信念,积极推动了菲律宾华侨的抗日运动。华支队伍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生活艰苦朴素,发扬了中国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获得友军和当地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从而提高了祖国的声望,也提高了菲律宾华侨的地位。华支作为菲律宾华侨的代表,在空前严峻的三年中,为菲律宾的解放立下了战功,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他们与菲律宾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维护群众的利益,表现出华侨对第二故乡的热爱。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菲律宾人与华侨间的隔阂、菲律宾人对华侨的误解和偏见。民抗军总司令路易斯·塔鲁克在论及这种社会影响时说:

四十八支队在农民中的出现,粉碎了一种陈旧鄙陋的习惯,即侮辱性地对待华人,且通常以他们作为菲律宾人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灾祸的盲目反应的替罪羊。四十八支队队员极受中吕宋人民的爱戴。后者常常想尽办法,在住宿、食物方面

予支队队员特别的照顾和帮助①。

对于华支与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菲律宾人作出正确的评价。1945年8月26日，菲律宾一名营指挥官诺塞特为要求嘉奖华支而呈交总司令部的函件，就作出了客观的高度评价。他说：

华支的官兵都是他国公民，按照义务来说，他们可不必负任何直接抗敌的责任。可是他们采取了这种行动，这就体现了他们抱着扶弱锄强的人类本性。诚然，中国也在对日本作战，但他们尽可以采取轻便的办法，即可向敌人投降，由敌人送他们到集中营去。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宁愿决心参加战斗，不惜为战斗而尝尽一切艰苦和牺牲，他们中间有的已战死，有的已变成残废。如所周知，当一个人知道他是站在优势方面而去战斗，那是会有勇气的；当一个人明知我方已无能力阻挡敌人冲入我们的国土时，还敢于投身战斗，在那种情况下要鼓起勇气，真是难而又难之事。他们这班爱国分子自始至终同我们并肩作战，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为此，本职深信他们是值得大大奖励的；因为，如果从特殊意义上说，他们对美国、菲律宾和其他盟国是尽了很宝贵的努力，而从一般意义上说，他们是为了民主的信念而建立了非常的伟绩②。

①Luis Taruc, *Born of the People*, P.76.转译于*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P. 83.

②转引自梁上苑、蔡建华：《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第124页。

主要参考书（文）目

1. 中国古籍

脱脱：《宋史》

徐松：《宋会要辑稿》

马端临：《文献通考》

赵汝适：《诸蕃志》

宋濂：《元史》

柯劭忞：《新元史》

汪大渊：《岛夷志略》

张廷玉：《明史》

《明实录》

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陆容：《菽园杂记》

张燮：《东西洋考》

何乔远：《闽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赵尔巽：《清史稿》

《清实录》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

王产威：《清季外交史料》

梁廷枏：《粤海关志》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

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

张荫桓：《三洲日记》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我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中文著作

《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1899—1929）》

《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899—1949）》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刘芝田：《中菲关系史》，正中书局1964年版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正中书局1981年版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吴承洛：《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中华书局1929年版

吴景宏：《菲律宾简史与人物》，新加坡青年书局1965年版

余 炜：《一六〇三年菲律宾华侨惨杀案始末》，香港《新亚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何若庸：《菲化十二年与华侨》，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6年版

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香港朝阳出版社1985年版

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63年版

陈烈甫：《菲律宾的历史与中菲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正中书局1968年版

- 陈烈甫：《菲律宾资源经济和菲化政策》，正中书局1969年版
-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正中书局1983年台修一版
-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1946年版
-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一、二、四、六辑，中华书局版
- 《英勇奋战在吕宋岛上——记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福建侨乡报》，1982年9月9日
- 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演变》，（台）《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期
- 桂华山：《菲律宾狱中回忆录》，马尼拉中国印书馆1947年版
- 梁上苑、蔡建华：《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4年第五辑
- 黄杰、蔡建华、里昂：《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三年游击战纪实》，1945年连载于马尼拉《华侨导报》，1982年打印本
- 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海外出版社1957年版
- 黄晓沧主编：《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中华商会出版部1936年版
- 《菲律宾华人现代史——美国统治时期的菲律宾华人》，菲律宾《世界日报》，1982年11月15日至1983年5月20日
- 杨荣标：《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编纂社1935年版
-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 英文著作

- Agpalo, Remigio E.,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tail Trade in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Q. C., 1962
- Alip, Eufonio M., "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 Alip and Sons Inc., Manila, 1959
- Arensmeyer, Elliott C., "Foreign Accounts of the Chi-

- 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th-19th Centuries" ,
 Philippine Studies, Vol. 18 (1970)
- "The Chinese Coolie Trade and the Philippine:
 An Inquiry" , Philippine Studies, Vol. 28
 (1980)
- Blair, Emma Helen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 1493-1898, 55 Vols. ,
 Cleveland, Arthur Clark Co. , 1903-1907
- "Censu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903" , Washington
 D. C. , 1905
- Chang, Pin-tsun, "Chinese Maritime Trade: the Case of
 Sixteenth-Century Fu-Chien" ,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3 (打印本)
- Cheong, W. E. , "Canton and Manil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d. , Jero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Costa, H. de la, S. J. , : "Readings in Philippine His-
 tory" , Manila, Bookmark, 1965
-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Felix, Alfonso(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 Vol. I,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
 se, Manila, 1966
- "Filipino Heritage, The Making of a Nation" , Lahing
 Publishing Inc. , 1977
- Foreman, Joh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 London, 1906
- Galang, Zoilo M. ,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ippines" ,
 Vols. 5, 8, Exequiel Floro, Manila, 1951

- Gayangos, Antonio Martel de, "The Island of Mindanao, Studies in Moro History and the Island of Mandanao",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Inc., XXIV, 1976
- Hayden, Joseph Ralston, "The Philippines: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Macmillan Co., N. Y., 1955
- Jusus, C. de (ed.), "The Tobacco Monopoly in the Philippines", Manila, 1980
- Liao, Shubert S. C.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1964
- Lim, Benito and F. Bonifacio,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Trends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Asia and Oceania" (UNESCO), 1979
- McCarthy, Charles J., "On the koxinga Threat of 1662", Philippine Studies, Vol. 18 (No. 1, Jan., 1970)
- McCoy, Alfred W. and C. de Jesus (ed.), "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Manila, 1980
- Omohundro, John T., "Chinese Merchants in Iloilo, Commerce and Kin in a Central Philippine City",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ec.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80
- Saleeby, Naleeb M., "The History of Sulu",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63
- Tan, Antonio S.,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

- 1935: 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wakening" ,
Garcia Publishing Co., Q. C., 1972
-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Q.C., 1981
- "The Philippine Chronicles of Fray San Antonio" , His-
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Manila, 1977
- "Travel Accounts of the Islands, 1531-1787" , Publications
of the Pilipiniana Book Guild, XIX, Manila, 1971
- Valdepenas, Vicente B., Jr. Gemelino M. Bautista,
"The Emergence of the Philippine Economy" ,
Manila, 1977
- Warren, James F., "Sino-Sulu Trade in the Late Eigh-
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Philippine Stu-
dies, Vol.25 (No.1 1977)
- Wickberg, Edgar, "Early Chinese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1850-1898" , Pacific Affairs,
Vol.35 (1962)
- "The Chinese Mestizo in the Philippine
Hi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¹
(Mar., 1964)
-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Zaide, Gregorio F.,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 Manila, 1950
-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istory,
Government and Civilization)" , Rex Book
Store, Manila, 1963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菲律宾华侨史

作者 =

页数 = 4 8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总序 [朱杰勤]	
前言	
第一章	16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中菲关系和菲律宾华侨
	一 远古的移民
	二 经济交流
	三 政治交往
	四 16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菲律宾华侨
第二章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和华侨大批赴菲
	一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
	二 华侨大批赴菲
第三章	16 世纪后期华侨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及潘和五事件
	一 林凤进袭马尼拉
	二 华侨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三 华侨遭受的限制和迫害
	四 潘和五等刺杀菲律宾总督
	五 菲西当局同中国的交涉和对华侨的报复
第四章	1603 年的华侨起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一次大屠杀
	一 华侨起义的背景
	二 华侨起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一次大屠杀
	三 大屠杀后菲西当局面临的经济、军事危机
	四 中、菲当局关于屠杀案的交涉
第五章	17 世纪初至 30 年代华侨社会的变化和 1639 年的抗暴斗争
	一 旅菲华侨再度激增
	二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限制和掠夺
	三 卡兰巴计划
	四 华侨的抗暴斗争和殖民当局对华侨的第二次大屠杀
第六章	17 世纪中后期华侨的处境和殖民者对华侨的第三第四次大屠杀
	一 17 世纪中叶菲律宾的形势和华侨的处境
	二 郑成功护侨的正义行动
	三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三次大屠杀
	四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四次大屠杀
第七章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新迫害和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 70 年代的华侨社会
	一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新迫害
	二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华侨社会的变化
	三 华侨的反西斗争和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第五次大屠杀
第八章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政策
	一 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转变
	二 菲西当局对华人的移民政策
	三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税收政策

	四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职业及旅行政策
	五	菲西当局对华侨的法律歧视
	六	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华宣传
第九章	1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华侨经济活动的恢复和发展
	一	菲律宾经济状况的变化
	二	华侨经济活动的恢复
	三	华侨与中菲贸易
	四	菲欧贸易中的华侨中介商业活动
	五	华侨在菲律宾南部地区的贸易活动
	六	华侨在零售业和其他行业中的活动
第十章	1	19 世纪的菲律宾华侨社会
	一	19 世纪华侨社会概况
	二	华侨社区的组织
	三	清政府在菲设领始末
第十一章		华侨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菲律宾革命战争
	一	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
	二	华侨投身菲律宾革命战争
第十二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发展
	一	华侨人口的上升
	二	华侨经济力量的增长
	三	华侨团体组织的发展
	四	华文报刊业的发展
	五	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十三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对排华活动的抗争
	一	菲美当局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和华侨的反限制斗争
	二	“禁米条例”的颁布和华侨的抗争
	三	“簿记法”的实施和华侨的抗争
	四	菲化政策的实施和华侨的抗争
	五	1924 年的排华风潮
第十四章		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华侨的爱国运动
	一	菲律宾华侨与辛亥革命
	二	菲律宾华侨与反帝反袁斗争
	三	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四	菲律宾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
第十五章		日本占领时期的菲律宾华侨
	一	日本占领菲律宾
	二	日本占领当局对中国外交官和侨领的屠杀迫害
	三	日寇铁蹄下的华侨社会
	四	伪华侨协会的成立及其事敌害侨活动
	五	华侨的抗日斗争
附		主要参考书(文)目
附录页		